

列寧文選

列寧文選

第二卷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準備與實行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目次

準備與實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17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23
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政黨底行動綱領草案）	27—56
這次革命底階級性	27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28
兩個政權並存的特殊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29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的特殊策略	32
革命護國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33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35
在我國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36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39
把各銀行與資本家底新迪加收歸國有	42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狀況	42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破產了——必須建立第三國際	48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產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5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會議	57—61
代表會議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	57
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	60
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草案）	62

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 (論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演說)……	64
論口號……	76
革命底教訓……	83—96
尾聲……	96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97—136
飢荒逼近……	97
政府之毫無作爲……	98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101
銀行國有……	103
新迪加國有……	108
取消營業秘密……	110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114
調節消費……	117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120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124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127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131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134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書)……	137
革命底任務……	143—151
與資本家妥協政策底危害作用……	145
政權歸蘇維埃……	145
給各國人民以和平……	146
土地歸勞動者……	148
防止飢荒及經濟破壞……	148
與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149
革命和平發展……	150
旁觀者底意見……	15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布) 中央會議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	155
告布爾什維克黨員書……	156
致中央委員書……	160

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162—269
初版序言	162
再版序言	163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164—179
（一）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164
（二）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167
（三）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170
（四）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173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179—190
（一）革命底前夜	179
（二）革命底總結	183
（三）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188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190—209
（一）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190
（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194
（三）國會制底消滅	198
（四）民族統一底組織	203
（五）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207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209—232
（一）「住宅問題」	209
（二）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212
（三）給伯伯爾的信	215
（四）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	218
（五）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 <u>法蘭西內戰</u> 一書所作的序言	225
（六）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230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232—250
（一）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233
（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235
（三）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240
（四）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243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250—268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252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254
(三)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260
初版書後	269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270—284
(一) 告工人, 兵士和農民的宣言	270
(二) 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72
(三) 關於和平問題報告的結論(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77
(四)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280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285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言(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	287
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民底聯盟(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292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295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300
向參加為遣散軍隊事而召集的第一次全軍隊代表大會代表們提出的問題	303
怎樣組織比賽?	305
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	314
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	317
關於立刻單獨媾和並簽訂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	319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327
奇談與怪論	329
腳踏實地	337
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	339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345

現時主要任務	367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372—406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372
現時的總口號	375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377
為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384
提高勞動生產率	387
組織競賽	390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393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401
結論	404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論飢荒（致彼得城工人的信）	409
致各省縣蘇維埃電	417
工人同志們！我們去作最後的決戰呵！	419
在「紅色軍官日」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23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424—520
序言	424
考茨基怎樣把 <u>馬克思</u> 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427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437
被剝削者能與剝削者平等麼？	445
蘇維埃不可以變為國家組織嗎	452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459
蘇維埃憲法	467
什麼是國際主義？	475
在所謂「經濟分析」的幌子下替資產階級効勞	488
附錄一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513
附錄二 <u>王德威爾</u> 得論國家的新書	513
奪得了與記載了的東西	521

在 <u>俄國共產黨</u> （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524
在 <u>俄國共產黨</u> （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544
關於幫助東方戰線事致 <u>彼得格拉</u> 工人的信.....	561
<u>俄國共產黨</u> （布）中央委員會有關東方戰線情況的提綱.....	562
謹防奸細！.....	566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567
向 <u>匈牙利</u> 工人致敬.....	575
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580
大家都去與 <u>鄧尼金</u> 鬥爭！（ <u>俄國共產黨</u> （布）中央委員會致黨組織的信）.....	605—622
目前主要的任務.....	606
向人民解釋關於 <u>高爾察克</u> 和 <u>鄧尼金</u> 的真象.....	607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	608
在逃兵中的工作.....	609
直接幫助軍隊.....	609
縮小非軍事工作.....	611
臨近戰線地區的工作.....	613
對軍事專家的態度.....	615
後方肅反工作.....	618
動員全民作戰.....	620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622
關於戰勝 <u>高爾察克</u> 事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623
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	631
告紅軍兵士同志們.....	634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635
與燃料恐慌作鬥爭.....	646

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650
關於戰勝 <u>鄧尼金</u> 事致 <u>烏克蘭</u> 工人和農民的信	659
論勞動紀律	666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 <u>俄國</u> 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668
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686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689—778
（一）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 <u>俄國</u> 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689
（二）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691
（三）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694
（四）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練出來的呢？	699
（五）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706
（六）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713
（七）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721
（八）『不作任何妥協』麼？	731
（九）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741
（一〇）幾個結論	753
增補	768
（一）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768
（二）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770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772
（四）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774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779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790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796
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 <u>俄國</u> 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799
致 <u>土拉城</u> 同志書	817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統一的決議草案	821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傾向的決議草案	825
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829
致 <u>阿捷爾拜疆</u> 、 <u>格魯吉亞</u> 、 <u>阿爾明尼亞</u> 、 <u>達格斯坦</u> 、 <u>哥里共 和國</u> 共產黨員同志們的信	842
論糧食稅（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	845—880
代引言	845
關於 <u>俄國</u> 現時經濟（摘自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小冊子）	846
論糧食稅，自由貿易，租讓制	856
政治總結和緒論	873
結論	879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 <u>俄國</u> 共產黨策略的報告	
大綱（草案）	881—890
（一）蘇俄底國際形勢	881
（二）國際範圍內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	882
（三） <u>俄國</u> 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	883
（四） <u>俄國</u> 無產階級與農民	883
（五）蘇俄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軍事聯盟	884
（六）過渡到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間之正常經濟關係	884
（七）蘇維埃政權容許資本主義容許租讓制的意義和條件	885
（八）我國糧食政策的成效	886
（九）社會主義底物質基礎和 <u>俄國</u> 電氣化計劃	886
（一〇）『純粹民主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社會革命黨人與孟 什維克這些資本同盟者底作用	887
新時光，新形式的舊錯誤	890
論清黨	899
十月革命四週年	902

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金子底作用	911
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	920—930
（一）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	920
（二）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職工會	921
（三）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的國家企業與職工會	921
（四）承認土地工廠等私有制而由資本家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不承認土地和多數大企業私有制而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這兩者間的根本區別	922
（五）職工會中恢復自願會員制	923
（六）職工會與企業管理方面	924
（七）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機關與管理機關的作用	925
（八）與羣衆的聯繫是職工會一切工作底基本條件	926
（九）無產階級專政下職工會內部情況的矛盾	927
（一〇）職工會與專門家	928
（一一）職工會和對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影響	929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931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974
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律制度（給斯大林同志轉中央政治局）	977
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981
關於我國出席海牙會議代表團任務問題的幾點意見	995
日記摘錄	999
論合作制	1004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1011
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案）	1015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1020
簡要註釋	1036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四月三號夜裏，我才到達彼得格拉，所以要在四月四日舉行的會議上來作關於革命無產階級任務的報告，自然只能用個人名義，並只好聲明沒有充分準備。

爲了使我自己和誠意的反對論者便於工作起見，我所能做到的唯一辦法，便是準備了書面提綱。我宣讀過這個提綱，並把原文交給了策烈鐵里同志。當時我讀得非常之慢，並讀過了兩次：起初是在布爾什維克會議上，隨後又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底聯席會議上。

當我把我個人的這個提綱交去付印時，祇加上了一些最簡短的註釋，而在報告裏面，這些註釋是發揮得更爲詳細的。

提綱

(一)這次戰爭從俄國方面說來，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下，無條件地仍是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爲這個政府是資本主義性的；所以我們在戰爭問題上，決不能對『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的讓步。

覺悟的無產階級祇有在下列條件之下，才能同意進行那種真正證明革命護國主義正確的革命戰爭：（一）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跟隨無產階級的貧苦農民掌握；（二）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放棄一切兼併；（三）真正與一切資本利益完全斷絕關係。

因為贊成革命護國主義的大眾份子底廣大階層，無疑是誠意的，他們承認戰爭，只是由於不得已，而不是爲着侵略；因為他們是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周詳地、堅毅地、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解釋資本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證明如果想以真正民主的和平，而不是以強力的和平來結束戰爭，就非推翻資本統治不可。

要在作戰軍隊中最普遍地宣傳這種觀點。

交戰兵士間實行聯歡。

（二）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

這個過渡時期底特點就在於：一方面有最高限度公開活動的可能（俄國目前是全世界各交戰國中最自由的國家）；他方面又沒有用暴力壓迫羣衆的現象；最後，羣衆對於這個是和平與社會主義底死敵的資本家政府，持着不覺悟的輕信態度。

這種特點，使我們在剛醒覺過來參加政治生活的極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進行黨的工作時，必須善於適應這種特殊條件。

（三）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贊助；說明它的一切約許，特別是關於放棄兼併的約許，全係謊話。要揭穿這個政府，揭穿這個資本家政府，而不去「要求」它停止其爲帝國主義的政府，因為這是一種不可容許的散佈幻想的行爲。

（四）必須承認，我們黨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較之那染受資產階級影響而把這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來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的聯盟——即從人民社會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起，直到組委¹（齊赫芝、策烈鐵里等人），斯節克洛夫等等止的聯盟——只佔少數，暫時還只佔微弱的少數。

要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當這個政府還染受資產階級底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需求來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當我們還佔少數時，我們要實行批評與揭示他們的錯誤，同時宣傳必須使全部國家政權轉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羣衆從經驗中免除自己的錯誤。

(五)不是要有國會制的共和國，因為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的共和國，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至上由全國各地工人、雇農、農民代表蘇維埃組成的共和國。

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

一切官吏必經選舉，並可隨時撤換，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

(六)在土地綱領上，應把重心移到雇農代表蘇維埃。

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國內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而由當地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處置之。組織單獨的貧農代表蘇維埃。把每個大田莊（其面積約從一百俄畝至三百俄畝，依地方及其他條件為轉移，依地方機關底決定）組成爲模範農莊，由雇農代表蘇維埃負責監督，並由公費經營之。

(七)國內一切銀行立刻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之。

(八)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實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監督產品底社會生產和分配。

* 即以全民武裝來代替常備軍。

(九) 黨的任務：

(甲) 立刻召集黨底代表大會；

(乙) 改變黨綱，主要是：

(一) 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

(二) 對國家的態度以及我們關於『公社式國家』*的要求；

(三) 修改陳舊了的最低限度綱領；

(丙) 改變黨底名稱**。

(一〇) 革新國際。

發起建立革命國際，建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反對『中派』***的國際。

爲使讀者明瞭我爲什麼要將誠意的反對論者底『偶然現象』，當作是罕有的例外而把它特別着重指出起見，我就請讀者拿哥里登伯爾格先生下面這種反駁與這個提綱比較一下，他說：列寧『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揭起了國內戰爭的旗幟』（摘自普列漢諾夫先生底統一報²第五期）。

難道這不是奇談麼？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的是：『因爲贊成革命護國主義的大衆份子底廣大階層無疑是誠意的…因爲他們是受了資產階級底欺騙，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周詳地、堅毅地、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錯誤…』

* 卽類似巴黎公社的那種國家。

** 全世界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護國派』與動搖的『考茨基派』）背叛了社會主義，投降了資產階級，所以我們應改名爲共產黨，以代替『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

*** 所謂『中派』就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搖擺於沙文主義者（等於『護國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那個派別，卽德國的考茨基之流，法國的龍格之流，俄國的齊赫芝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國的麥克唐納爾之流等等。

而資產階級中那班既不屬於護國主義底大眾份子，也不屬於其廣大階層，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先生們，公然把我的見解轉述成爲『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揭起了（!）國內戰爭的旗幟（!）』（關於國內戰爭，無論在提綱上或報告中都一字沒有提過！）…

這是什麼？這與鼓吹摧殘行爲的煽動有何區別呢？這與俄國意志報³有何區別呢？

我寫着、讀着、咀嚼着的是：『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需求來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

某些反對論者却把我的見解轉述爲：號召『在革命民主派隊伍中進行國內戰爭』!!

我之所以攻擊臨時政府，是因爲它沒有指定迅速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甚至沒有指定任何日期，而只以約許來敷衍了事。我證明過，如果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則立憲會議底召集是沒有保障的，它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他們却捏造我的見解，彷彿我反對最迅速地召集立憲會議!!!

若不是數十年來的政治鬥爭教訓了我，要把反對論者的誠意看作是罕有的例外，那我也許要稱這種話爲『夢話』了。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他的報紙上稱我的演說爲『夢話』，好得很，普列漢諾夫先生！但是且看你們的爭辯伎倆，該是何等蠢笨、愚鈍和不敏呵。假使我講了兩點鐘的『夢話』，爲什麼數百聽衆竟容忍這種『夢話』？其次，爲什麼你們的報紙竟以整欄篇幅來論述『夢話』？那你們真是完全不能自圓其說。

呼喊、辱罵、叫囂，當然比企圖敘述、解釋和回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各年中，如何議論巴黎公社底經驗及無產階級需要何種國家的問題，容易得多。

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先生，大概是已經不願回憶馬克思主義了吧。

我摘引了盧森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稱德國社會民主黨爲『臭屍』的話。而普列漢諾夫，哥里登伯爾格這班先生們就『生氣來了』… 爲誰生氣呢？就是爲那些被人稱之爲沙文主義者的德國沙文主義者呵！

可憐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的沙文主義者，已經頭昏腦亂了。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舊曆七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二十六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〇三至一〇七頁。

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不認清這個問題，便談不到什麼自覺地參加革命，更說不上領導革命了。

我國革命中非常出色的特點，就在於它造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這件事實是要首先認清的；因為不了解它，就不能前進。對於舊的公式，例如對於布爾什維主義底舊『公式』，要善於加以補充和修改，因為這些公式，一般說來，原是正確的，可是到了具體實現時，却竟另一樣了。關於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問題，以前誰都沒有想到，並且也不能想到。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除臨時政府，即資產階級政府外，同時又形成了另一個政府，即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個政府現在還是薄弱的，還處在萌芽狀態，但它終究無疑地是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着和成長着。

這另一個政府底階級成份怎樣呢？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穿軍服的農民）。這個政府底政治性質怎樣呢？就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憑靠革命的奪取手段，憑靠民衆自下直接倡首的政權，而不是憑靠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的政權。這完全不是迄今在歐美各先進國佔統治地位的那種通常國會制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所一般存在着的政權。人們時常忘記這種情形，常不思索這種情形，可是全部實質却正在這裏。這個政權是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同一式樣

的政權。這個政權式樣底基本標誌，就是：（一）政權底本源，不是預先由國會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民衆在當地自下的直接發動，用句很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二）以全民直接武裝來代替那離開民衆並與民衆對立的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之下，國家秩序是由武裝的工農自己，即武裝的人民自己來保衛的；（三）官吏，即官僚，或又是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來代替，或至少要受人民特別監督，把他們變成爲不僅要由人民選舉，並且一經人民要求就可撤換的簡單代表；他們應從盤據高位而領取資產階級式高俸的特權階層，變爲使用特種『武器』的工人，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普通工資。

巴黎公社這種特別式樣的國家，其實質就在於此，而且僅在於此。普列漢諾夫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輩（『中派』，即搖擺於沙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老爺們，以及所有一般現在居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都把這種實質遺忘了和曲解了。

他們用空話來敷衍，他們裝聾作啞，支吾搪塞，他們千番百次地相互慶賀革命，但不願去想一想，工兵代表蘇維埃究竟是什麼。他們不願看到顯明的真理：既然有這類蘇維埃存在，既然它們多少是一種政權，那末也就是說，在俄國存在着巴黎公社式樣的國家。

我特別着重『多少』這兩個字。因爲這祇是處在萌芽狀態的政權。它自己既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直接妥協，又作出許多事實上的讓步，就是已經而且正在把自己的陣地讓給資產階級。

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齊赫芝、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之流作了『錯誤』呢？這種想法乃是無稽之談。祇有庸人，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才能這樣設想。原因是無產者和農民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上述領袖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就在於他們不去啓發工人底意識，反而加以蒙蔽；他們不去推翻小資

產階級的幻想，反而加以鼓勵；他們不去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反而使這種影響鞏固起來。

由此可見，爲什麼我們自己的同志，也作了這樣多的錯誤，而竟『簡單地』提出問題：是否要立刻推翻臨時政府？

我的回答是：（一）這個政府應該推翻，因爲它是資產階級的寡頭政府，而不是全民政府；它不能給予和平、麵包和完全的自由；（二）這個政府此刻不能推翻，因爲它有與工人代表蘇維埃，首先是與主要的蘇維埃，即彼得格拉蘇維埃所作之直接和間接的，形式上和實際上的妥協維護着；（三）這個政府決不能以尋常的方法去『推翻』，因爲它憑靠於第二個政府，即工人代表蘇維埃對資產階級的『贊助』，而這第二個政府，却是直接表示大多數工農意識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式樣更高更好的政府，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來，我們至今也還不知道。

覺悟的工人要獲得政權，一定要把大多數羣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現時既無採用暴力手段對付羣衆的事實，也就再沒有別的道路去獲得政權了。我們並不是布朗基主義者⁴，並不是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烏煙瘴氣，反對沙文主義的護國派思想，反對空話，反對依賴於資產階級。

我們要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布爾什維主義底優秀信徒已經造成了這個黨底各種因素；我們要團結起來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工作；無產者和貧農將日益增多地轉到我們方面來。因爲實際生活，每時每刻都將打破『社會民主黨人』，齊赫芝、策然鉄里、斯節克洛夫之流，『社會革命黨人』，更『純粹的』小資產者等等底小資產階級幻想。

資產階級主張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

覺悟的工人主張工人、雇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底單一政權，——主張這個單一政權是應以啓發無產階級意識，使其解脫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作準備起來，而不是以冒險政策準備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却搖擺不定，妨礙着這種啓發和解脫的事業。

這就是決定我們任務的實際階級力量底對比。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舊曆九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二十八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
版，第一卷，第一一三至一一五頁。

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

無產階級政黨底行動綱領草案

俄國現時所處的歷史關頭，有下列各種基本特徵：

這次革命底階級性

(一) 僅僅代表那指揮全部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官吏)的一小羣農奴制地主的舊沙皇政權，已被摧毀和廢除了，但沒有摧毀到底。帝制沒有正式剷除。羅曼諾夫輩的惡黨，仍在繼續進行帝制陰謀。農奴制地主底大土地所有制，還沒有消滅。

(二)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轉入新階級手裏，即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這個範圍內，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業已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已與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期間萬分忠順地擁護過「血腥的」尼古拉⁵和「絞手」斯托雷平⁶的明顯帝制派份子(如古契科夫及其他比立憲民主黨人⁷更右的政治家)締結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資產階級新政府，已企圖而且已開始和羅曼諾夫輩談判關於恢復俄國帝制的問題了。這個政府，在高叫着革命辭句的喧聲中，任命舊制度底擁護者分掌國家要職。這個政府把國家機器底全部機關(軍隊、警察、官吏)交給資產階級，總想使它改良得越少越好。羣衆之革命創首行爲和民衆自下奪取政權的舉動，是革命真正勝利底唯一保障，但新政府已開始竭力加以阻礙。

直到現在，這個政府甚至還沒有指定召集立憲會議的日期。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農奴主沙皇制度底物質基礎，新政府並未去觸動它。這個政府對於壟斷性的財政機關、大銀行、資本家組成的新迪加和卡德爾等等底行動，根本也不想加以調查、公佈和監督。

新政府中最主要的，左右全局的總長位置（內務部、陸軍部，即指揮軍警官吏，指揮壓迫羣衆之一切機關的司令所），均爲明顯的帝制派和大地主土地佔有制擁護者所盤踞。立憲民主黨人，即昨天才變成了的共和派，違背心願的共和派，僅獲得對於支配人民的機關和對於國家政權機關沒有直接關係的次要位置。勞動派底代表和『也是社會主義者』的克倫斯基⁸，除了以響亮的詞句來麻醉民衆的警惕心和注意力外，是不起絲毫別的作用的。

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即在內政方面說，資產階級新政府也不配享有無產階級方面絲毫的信任，而無產階級也就不應予以絲毫的贊助。

新政府底對外政策

（三）現在由於客觀條件的關係，對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是爲了瓜分資本主義贓物，爲了滅亡弱小民族而繼續和英法等帝國主義列強聯合進行戰爭的政府。

新政府服從俄國資本及其強有力的保護者和主人，亦即世界上最富裕的英法帝國主義資本底利益，違反工兵代表蘇維埃之代表俄國各族人民真正大多數所極端肯定表示出的願望，而不採取任何切實步驟去停止爲資本家利益而使各國人民互相屠殺的戰爭。它甚至沒有把那些明明是包含掠奪內容（瓜分波斯，搶劫中國，搶劫土耳其，瓜分奧地利，奪取東普魯士，奪取德國殖民地等等），明明是俄國和英法帝國主義強盜資本聯結一起的密約公佈出來。這些條約都

是由沙皇政府締結的；數百年來，沙皇政府之掠奪和壓迫其他民族，要甚於其他霸主和暴君，它非但壓迫，並且污辱和腐化大俄人民，把他們變為屠殺他國人民的劊子手，而新政府竟追認了沙皇政府所締結的這些條約。

新政府追認這些強盜式的可恥條約以後，違反工兵蘇維埃代表俄國各族人民大多數明白表示的要求，而不向各交戰國人民作立刻休戰的提議。它用許多冠冕堂皇、有聲有色、但毫無內容的宣言和辭句來敷衍了事，這樣的宣言和辭句在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口裏，總是用來欺騙被壓迫人民中那些輕信的和幼稚的羣衆。

(四) 所以在對外政策方面，新政府非但不配享有絲毫信任，而且就是向這個政府繼續提出要求，要它表明俄國各族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要它放棄兼併等等，這實際上祇是欺騙民衆，使民衆懷着不能實現的希望，阻滯民衆意識底啓發，間接使民衆容忍戰爭之繼續；而這個戰爭底真實的社會性質，並不是由善良的願望來決定，而是要由進行戰爭的政府底階級性質，由這個政府所代表的階級與俄英法等等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聯繫，以及這個階級所進行的實際政策等等來決定的。

兩個政權並存的特殊局面及其階級意義

(五) 我國革命最主要的特徵，最須要加以深思熟慮的特徵，便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就形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這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表現於有兩個政府存在：一個是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臨時政府』，它掌握有全部政權機關；另一個是補充的、輔助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它沒有掌握國家政權機關，可是直接憑靠着顯然無疑的大多數民衆，憑靠着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底階級根源及其階級意義，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不但掃除了整個沙皇帝制，不但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並且已接近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跟前。彼得格拉及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正是上述這些階級底這種專政（即不憑靠法律而憑靠武裝民衆底直接強力的政權）。

（六）俄國革命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顯然爲大多數地方蘇維埃所信任的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竟自願把國家政權轉交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同臨時政府訂立關於贊助它的協定，自願把首位讓給它，而祇以監視和監督立憲會議底召集（其召集日期，臨時政府甚至至今還沒有宣佈）爲己任。

這種在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形式的非常特殊的情況，使兩個專政錯綜結合起來：一個是資產階級專政（因爲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種專政，就是說既不憑靠法律、也不憑靠預先有所表示的民意，而是憑靠強力奪取的一種政權，並且實現這種奪取的，是一定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工兵代表蘇維埃）。

毫無疑義，這種『錯綜』情形，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一國之內決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有一個是定要化爲烏有的；俄國整個資產階級已在各處竭力用各種方法排除和削弱工兵代表蘇維埃，使其化爲烏有，來造成資產階級底單一政權。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祇是表現革命發展中的過渡時期，此時革命已超出普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但還沒有進到『純粹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

這個不穩定的過渡情勢之階級意義（和階級原因）如下：我國革命，也和其他一切革命一樣，曾要求羣衆表現莫大的英勇氣概和自我犧牲精神來與沙皇制度作鬥爭，並且一下子就把空前衆多的平常人，捲入了運動漩渦。

一切真正革命之科學的和實際政治上的主要標誌之一，就是在『平凡人』中間，進而積極地、獨立地、活躍地參加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建設的人數，非常迅速而急轉地劇增起來。

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現時正在沸騰着。十年來在政治上沉眠不醒，因受沙皇制度的殘酷壓迫，因替地主和廠主作苦工而在政治上頹靡不振的千百萬羣衆，已經醒覺起來並趨向於政治活動了。這千百萬人是誰呢？大部份是小業主，小資產者，即站在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那些人。在歐洲各國中，俄國是小資產階級成份最多的國家。

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潮浸沒了一切，它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也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薰染了和籠罩了很廣大的工人階層。

小資產階級所過的生活，是業主式的，而不是無產階級式的（指它在社會生產中所佔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是依賴資產階級，在思想方式上也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

對資本家，即對和平與社會主義底這死敵抱着不覺悟的輕信態度——這就是俄國羣衆現時政治底特點，這就是在歐洲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最多的國家底社會經濟基地上以革命速度長成的現象。這就是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間『妥協』底階級基礎（我要着重指出：我所指的，與其說是形式上的妥協，不如說是事實上的贊助、默認的妥協，以不覺悟的輕信態度讓出政權）；這種妥協給了古契可夫輩一塊肥肉，給了他們真正的政權，而蘇維埃所獲得的却只是克倫斯基輩底約許、尊敬（暫時的）、籠絡、空話、担保和假客氣。

俄國無產階級人數不足，其覺悟性和組織力不夠，——就是這種情況底另一原因。

一切民粹主義的政黨，直至社會革命黨，都始終是小資產階級

性的；組委黨（齊赫芝、策烈鐵里等等）也是一樣；非黨的革命者（斯節克洛夫等）也同樣隨波逐流，或則沒有抵擋住，沒有來得及抵擋住這種浪潮。

從上述情形中產生的特殊策略

（七）馬克思主義者所應顧計到的是客觀事實，是羣衆和階級，而不是某些個人等等，因此上述實際情形底特點，就使馬克思主義者必然得出現時的特殊策略。

這種特點提出了一個首要的任務：『把酸醋和胆汁灌入革命民主辭句的甜水中去』（如像我黨中央委員會中一位同志特奧多羅維奇昨天在彼得格拉舉行的全俄鐵路職工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那樣，——這句話是說得非常中肯的）。進行批評的工作，解釋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底錯誤，準備和團結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黨底成份，把無產階級從『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烏煙瘴氣中解脫出來。

這似乎『祇是』一種宣傳的工作。其實這是最實際的革命工作，因為革命其所以停頓，其所以爲空話所梗塞，其所以『裹足不前』，並不是由於外來的阻礙，並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方面使用暴力（古契可夫暫時還祇以採用暴力反對兵士羣衆相威脅），而是由於羣衆不覺悟的輕信態度，因此不作這步工作，就不能推動革命前進。

祇有和這種不覺悟的輕信態度作鬥爭（而與之鬥爭的方法，可以並且應該祇是在思想上，用同志態度去說服，指出實際生活底經驗等），我們才能從猖獗一時的革命辭句中解脫出來，而真正推進無產階級底意識，推進羣衆底意識，推進羣衆在當地的奮勇堅決的首創精神，推進他們去自動實現、發展並鞏固自由、民主以及全部土地歸全民所有的這一原則。

(八) 各資產階級和地主政府底全世界經驗中造成了兩種壓制人民的方法。第一種就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第一（刑棍的尼古拉）和尼古拉第二（血腥的尼古拉）把這種劊子手的應有盡有的方法，都已經最高限度地表演給俄國民衆看了。但此外還有另一種方法，英法資產階級受到多次偉大革命和羣衆革命運動底『懲戒』後，已把這種方法修琢得最巧妙了。這種方法就是欺騙，籠絡，講空話，無數的約許，小恩小惠，讓出不重要的，而保持重要的東西。

俄國現時底特點，就是由第一種方法極迅速地轉到第二種方法，由用暴力對付民衆轉到籠絡民衆，轉到以空洞的諾言欺騙民衆。正像貓聽着饞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的故事一樣⁹。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把持政權，保衛資本底利潤，爲着俄國資本和英法資本底利益來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以空言約許、鄭重宣言、動人聲明來搪塞齊赫芝、策烈欽里、斯節克洛夫這般『廚子』底演說；儘管這些『廚子』在那裏威脅、忠告、央求、懇請、要求、正式宣言…貓還是聽着廚子演說而大啖其肉。

民衆底輕信的不覺悟性，和不覺悟的輕信態度，將日益消失，尤其是在無產者和貧農方面，因爲實際生活（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教導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底領袖，『應該』教導民衆去信任資產階級；無產者應該教導民衆去不信任資產階級。

革命護國主義及其階級意義

(九) 『差不多把一切』都浸沒了的小資產階級浪潮，其最巨大和最鮮明的表現，要算是革命護國主義。它真是俄國革命往前發展時和勝利途中的死敵。

誰在這一點上受了誘惑而無能解脫出來，那他對於革命便毫不中用了。但羣衆之受誘惑，却與領袖不同，而他們之解脫，也是另一樣的，是經過另一種發展進程，經過另一種方法的。

革命護國主義，一方面是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結果，是農民和一部份工人不覺悟的輕信態度所產生的結果；他方面是小業主利益和觀點底表現，因為兼併和銀行利潤對於小業主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利益的，所以他們就『神聖地』保守着那用屠殺他國人民的政策去腐化大俄羅斯人的沙皇制度底傳統。

資產階級欺騙民衆，利用對革命的高尚白豪心，來把事情加以曲解：似乎因為革命底這一階段，因為由古契可夫、米留可夫的所謂共和國代替了沙皇的帝制，於是戰爭的社會政治性質，在俄國方面就發生了變更。民衆也就相信了——暫時相信了——這種謊言，這在頗大程度內是由於那使民衆除大俄羅斯人以外，把俄國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大俄羅斯人底財產或領地的舊來成見，還在發生作用。沙皇制度腐化大俄羅斯人民的卑鄙行爲，使大俄羅斯人慣於把其他各族人民都看作下等東西，『照理』應屬於大俄羅斯的東西，這種腐化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滅掉的。

我們要善於向羣衆說明，戰爭底社會政治性質，不是由個人，團體以至某國人民底『好意』來決定的；而是由進行戰爭的那個階級底地位，那個階級底政策，即戰爭所繼續的政策，由現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那個經濟勢力，即資本底聯繫，由國際資本底帝國主義性質，由俄國在財政上、銀行事業上、外交上對英法等國之依賴等等來決定的。要用羣衆所能瞭解的話來好好解釋這一點，這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絲毫不犯錯誤地一下子做到這點。

但我們宣傳底方向，或是正確些說，我們宣傳底內容，却應該如此，也祇能如此。如果對於革命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那就不管

用怎樣漂亮的辭句，用怎樣『實踐的』理由來作辯護，都是叛賣社會主義，都是完全背棄國際主義。

『打倒戰爭』這個口號，當然是正確的；但它沒有估計到目前任務底特點，沒有估計到目前必需用別種方法去接近廣大羣衆。這個口號，據我的意見，好似『打倒沙皇』這口號一樣，『過去美滿時代』的笨拙鼓動家，就是簡單直接地帶着這個口號，走到鄉村裏去，結果挨過農民的打。革命護國主義底大衆份子，是誠意的，——這不是指個人，而是指階級說的，就是說，他們所屬的階級（工人和貧農），從兼併和壓迫外族人民的事情上，實在是得不到便宜的。他們並不像資產者和『智識份子』先生們那樣，這些先生們明知不排除資本統治，就不能排除兼併政策，於是用漂亮的詞句，無限量的約許，不可勝數的允諾來毫無心肝地欺騙民衆。

護國主義底大衆份子，是以平凡人態度簡單觀察問題：『我不願兼併，但德國人却來『擠壓』我，因此我所擁護的是正義的事情，而不是什麼帝國主義的利益』。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向他再三解釋，說明問題不在於他個人的願望，而在於羣衆的，階級的和政治的關係及條件，在於戰爭與資本利益及國際銀行網的聯繫等等。祇有這樣反對護國主義，才算認真，才可預期勝利；這種勝利之獲得，也許不會很快，但是可靠而穩固的。

怎樣才能結束戰爭？

（一〇）戰爭不能『依照願望』來結束。單方面底決定是不能結束戰爭的。借用一個護國派兵士的話來說，『槍尖插地』是不能結束戰爭的。

用充滿在護國派、半護國派、半國際主義派報紙上的論文中，在不可勝數的決議與宣言中，以及工兵代表蘇維埃底各種決議中

的種種辭句：如像各國社會主義者底『協定』，全世界無產者底『發動』，各國人民底『意志』等等，也是不能結束戰爭的，——所有這些辭句無非是小資產者空洞的，幼稚的，好意的願望而已。又如所謂『『表明』各國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無產階級輪流作革命發動』（在俄國無產階級以後，就『輪到』德國無產階級）等等的辭句，是最有害不過的了。所有這一切都是路易勃勒主義¹⁰，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以『政治運動』爲兒戲，實際上重演『貓吃肉』的故事。

雖然戰爭無疑是祇有利於資本家強盜，祇是使他們發財，但戰爭並不是由於資本家強盜底惡意所產生的。產生戰爭的，是半世紀來全世界資本底發展，全世界資本底無數線索和聯繫。若不推翻資本底政權，不使國家政權轉入另一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那就不能跳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達到民主的，非強力的和平。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俄國革命，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開始。這次革命作了停止戰爭的第一步。但祇有第二步，才能保證戰爭的停止，這第二步就是：國家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這將是全世界範圍內『衝破戰線』的開始——衝破資本利益戰線的開始，祇有衝破這條戰線之後，無產階級才能使人類擺脫戰爭慘禍，給人類以穩固的和平幸福。

俄國革命既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就已經把俄國無產階級引到這樣來『衝破資本戰線』的障地跟前了。

在我國革命中生長起來的新式國家

（——）工兵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尚未被人們所瞭解，這不僅是說大多數人不明白這些蘇維埃底階級意義及其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是說它們之爲新形式的國家，正確些說，新式樣的國家，也是人們所不瞭解的。

資產階級國家中最完善最先進的式樣，便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政權屬於國會；國家機器和管理機關是通常的，即常備軍，警察，官吏等；官吏實際上是不更換的，擁有特權地位，高踞人民之上。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提出了一種最高式樣的民主國家；據恩格斯底說法，這種國家，在某些方面已經不成其為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它以人民自身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的軍隊和警察。巴黎公社底實質，就在於此。資產階級的作家曾謾罵並誹謗巴黎公社，就中還誣譏它打算立刻『施行』社會主義。

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所開始建立的，正是這一式樣的國家。由全俄人民代表立憲會議或蘇維埃總委員會等等聯合起來的工兵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現時我國已開始實現着的新式國家；它的實現，是由於千百萬民衆底主動，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動創立民主制，既不等待立憲民主黨人的教授先生們寫成自己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底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中的老學究和老頑固們，如普列漢諾夫或考茨基先生之流，放棄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曲解。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承認一般地在革命時期中，特別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必需有國家和國家政權。

馬克思主義和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一流先生們之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承認在上述時期中所必需的，不是什麼尋常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那樣的國家。

後一式樣的國家和舊式國家間的主要區別如下：

由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回轉到帝制，是非常容易的（歷史已經把這點證明了），因為全部壓迫機器：軍隊、警察和官吏，

依舊完整無恙。而公社及工兵農等等蘇維埃則打碎並廢除這架機器。

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限制並窒息羣衆底獨立政治生活，不讓羣衆直接參加自下至上的全部國家生活之民主建設事業。工兵代表蘇維埃則與此相反。

工兵代表蘇維埃重新造出巴黎公社所創造的那一式樣的國家，馬克思稱這種式樣爲『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苦羣衆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人們通常反駁說：俄國人民還沒有發展到『施行』公社制的程度。這是農奴主底論調，農奴主曾說：農民還沒有發展到享受自由的程度。凡是在經濟實況中和大多數人民意識中沒有絕對成熟的改革，則公社，即工農代表蘇維埃，決不會『施行』，決不設想『施行』，而且也是不應該施行的。經濟上的破產和戰爭所產生的危機愈是厲害，就愈加需要有便於醫治戰爭所加諸人類之可怕創傷的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俄國人民底組織經驗愈少，就應愈加堅決地着手由人民自己來進行組織建設的工作，而不是專由資產階級政客和那些享有『肥缺』的官僚去做。

我們把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一流先生們所曲解而成的冒牌馬克思主義底舊偏見拋棄得愈快，我們對於幫助人民立刻在各處建設工農代表蘇維埃並使它們掌握全部生活的事業愈加熱心，而李沃夫先生之流又把立憲會議底召集推延得愈久，則人民就會愈加容易從中選擇（經過立憲會議，假如李沃夫很久都不召集立憲會議時，那就不經過它），而擁護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人民自己進行新的組織建設工作時，起初是不免會犯某些錯誤的；但是，犯着錯誤而向前進，總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律學教授們來起草關於召集立憲會議，永遠奠定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基業而消滅工農代表蘇維埃等的法律，要好一些。

假使我們能夠組織起來，並且把自己的宣傳進行得很好，那末不僅無產者，就是十分之九的農民，也會起來反對恢復警察，反對永不更換的擁有特權的官吏，反對脫離人民的軍隊。而新式國家底實質也僅在於此。

(一二) 以民警代替警察，——這種改革是從全部革命進程中產生出來的，並且現時在俄國大多數地方已實施起來了。我們應該向羣衆說明，在大多數通常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這種改革的生命總是非常短促的；資產階級，就連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階級，也總是恢復帝制時代的舊式警察，這種警察是和人民隔絕，而受資產者指揮，慣於多方壓迫民衆的。

要_不讓警察恢復，祇有一種方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警，把它和軍隊融合起來(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全體男女公民以至青年和老人，都應一律參加這種民警，其年齡標準，大概可以定為從十五歲起至六十五歲為止。僱傭工人和僕役等等在民警中服公務的時日，應由資本家付給他們工資。必須吸收婦女來獨立參加一般政治生活，並且不僅參加政治生活，而且要吸收她們參加人人應當擔任的經常公務，若不這樣，那末不要說社會主義，就連完備而堅固的民主制度也是談不上的。而如照顧病人、照料無家孤孩、注意飲食衛生等等一類的『警察』職務，除非有婦女在實際上——而不祇是在紙面上——獲得平等的參加權，是根本不會執行得滿意的。

不讓警察恢復，吸引全體民衆的組織力量來建設人人充當的民警，——這就是無產階級為保護、鞏固和發展革命起見所應該灌輸於羣衆中去的任務。

土地綱領與民族綱領

(一三) 現在我們還不能確切知道，俄國農村中是否會在最近將來爆發強烈的土地革命。農民中的階級分化，——一方面是雇

農、僱工和貧農（『半無產者』），另一方面是富裕農和中農（資本家和小資本家），——近來無疑地是加深了的；但我們尚不能知道，這種階級分化究竟已加深到何種程度。祇有經驗，才會解決而且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爲着俄國農民土地革命利益計，我們無產階級政黨，不但絕對應該立刻提出土地綱領，並且還應該宣傳立刻可以實現的實踐辦法。

我們應該要求一切土地國有，就是說，把國內一切土地都轉爲國家中央政權底財產。這個政權，應該規定移民土地之大小等等，規定保護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絕對禁止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租佃者之間，即國家和農戶之間有任何的中介行爲（絕對禁止土地轉租）。但土地底全部處置權，以及一切關於土地享有及使用的地方條件之規定權，都應完全而唯一地操在各省和各地方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手裏，而不應操在官僚、官吏手中。

爲提高糧食生產技術和增加生產範圍起見，爲發展合理化的大規模農莊和實行對於它們的社會監督起見，我們應努力使農民委員會把沒收來的每個地主田莊都改組爲巨大的模範農莊，由雇農代表蘇維埃負責監督之。

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反對社會革命黨人中所流行的那些小資產階級辭句和政策，特別是什麼『消費』標準額或『勞動』標準額以及『土地社會化』等等的空談，而說明出，在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免除羣衆生活貧困與遭受壓迫的狀況。

無產階級政黨並不立刻，並不一定要分裂農民代表蘇維埃，但它應該解釋，必須組織特別的雇農代表蘇維埃和特別的貧農（半無產者）代表蘇維埃，或至少要去組織具有這種階級地位的代表們所舉行的特別的經常會議，作爲一般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面單獨的黨派。不這樣，則民粹派籠統說一般農民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甜蜜辭句，

都會成爲富裕農欺騙貧苦羣衆的護符；而富裕農無非是各種資本家中的一種而已。

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工兵代表蘇維埃，進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或純粹官僚式的宣傳，勸導農民在立憲會議未召集以前，不要奪取地主土地，不要開始土地改革；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反對這種宣傳，應當號召農民立刻自動實行土地改革，並根據各地農民代表蘇維埃底決定，立刻沒收地主土地。

同時特別重要的，就是堅持必須增加食品底生產，以供給前綫兵士和城市，絕對不許有任何損壞牲畜、工具、機器和建築物等等的行爲。

（一四）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所應首先主張宣佈並立刻實行的，就是使所有一切爲沙皇制度所壓迫、所強力合併或強迫拮制在國界內的大小民族，即被合併的民族，都享有與俄國分立的完全自由。

假使不去真正實現分立的自由，那末一切放棄合併政策的聲明和宣言，都終歸是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或小資產階級的幼稚願望而已。

無產階級政黨力求建設儘可能巨大的國家，因爲這對於勞苦羣衆是有利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融合，但它想用以達到這個目的方法，不是強力，而唯一是各民族工人和勞苦羣衆之間的自由和友誼的聯合。

俄羅斯共和國愈是民主化，它之組成爲工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愈有成效，則吸引一切民族勞苦羣衆自願趨向於此種共和國的力量，也就會愈加強大。

分立的完全自由，最廣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詳細規定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辦法——這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綱領。

把各銀行與資本家底新迪加收歸國有

(一五) 無產階級政黨，在小農國內，當極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時，決不能抱定『施行』社會主義之目的。

可是，只有以『幾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辭句為掩飾的資產階級詭辯家，才能藉口這個真理，來辯護那種把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熟了的緊急革命辦法延不執行的政策，這些辦法，在戰時往往已為許多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而且為着預防日益逼近的全盤經濟破壞及飢荒起見，乃是絕對必要的。

如實行土地國有，將資本家底一切銀行和新迪加收歸國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來立刻加以監督等等辦法，決不是『施行』社會主義，但這是應當絕對堅持，並儘可能用革命方法來實現的。這些辦法，只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且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實現；若不採用這些辦法，那末要醫治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防止快要臨頭的破產，便是不可能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正是『靠戰爭』大發橫財，而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是永遠不會害怕侵犯這些資本家和銀行家之空前高額利潤的。

社會主義國際內的狀況

(一六) 俄國工人階級底國際義務，正是在現時特別厲害地提到首要地位。

現在只有懶漢，才不宣誓相信國際主義；就連沙文主義的護國派，就連普列漢諾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就連克倫斯基也自稱為國際主義者了。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尤其必須要十分明顯地、確切地、肯定地用真正的國際主義去和口頭上的國際主義對立。

向全世界工人發表空洞宣言，說自己矢忠於國際主義的空口担保，企圖直接或間接規定各交戰國革命無產階級實行發動底『次

序』，妄圖在各交戰國社會黨人之間訂立關於革命鬥爭的『協定』，忙碌於召集各社會黨代表大會以便從事和平運動，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主張、企圖和計劃，無論其作者如何誠摯，但從其客觀意義上看來，都只是一些空話，最多也不過是一種幼稚的善良願望，只能作為沙文主義者欺騙羣衆的掩飾而已。法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幹國會主義欺詐勾當的手段方面是最狡猾而最老練的了，他們一方面高呼空前響亮動聽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辭句，同時對於社會主義和國際又實行空前可恥的叛變，加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內閣，投票贊成軍用預算或軍事公債（如像齊赫芝、斯科別列夫、策烈鐵里、斯節克洛夫等近來在俄國所幹的那樣），反對本國的革命鬥爭等等，他們在玩弄這種把戲方面，真是早已打破紀錄了。

善人君子常常忘記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底殘暴兇惡環境。這種環境，不容許空談，這種環境在嘲笑那些幼稚的甜蜜願望。

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這就是竭誠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毫不除外地幫助（以宣傳、同情和物質來幫助）所有各國中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幫助這種鬥爭和這種路線。

除此以外，其餘一切都是欺人之談和馬尼洛夫精神¹¹。

在兩年以上的戰爭時期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所有各國內都造成了三種派別；誰要是離開了實在的基地，不承認這三種派別之存在，不去分析它們，不去為真正的國際主義派作澈底鬥爭，那他就是自陷於軟弱無力，束手無策和錯誤之中。

三種派別如下：

（一）社會沙文主義派，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沙文主義者；這些人是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是在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

這些人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各國正式社會民主黨底正式領袖們，大多數都是如此。這就是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先生之流，德國的謝德曼輩，法國的倫諾德爾、黑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沙拉底之流，英國的漢德曼、費邊派和『工黨份子』（指『工黨』領袖），瑞典的布蘭亭之流，荷蘭的士魯里斯特拉和他的黨，丹麥的斯道寧格和他的黨，美國的伯格爾及其他『保護祖國派』等等。

（二）第二派，即所謂『中派』，這些人搖擺於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真正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派』全體都賭咒發誓，硬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硬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多方『逼迫』政府，贊成多方『要求』本國政府『表明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贊成各種各樣的和平運動，贊成不兼併的和平等等等等——同時也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中派』贊成『統一』，中派反對分裂。

『中派』是專講小資產階級善良空話，口頭上高談國際主義，實際上是胆怯的機會主義和對社會沙文主義者逢迎討好的派別。

問題底關鍵就在於『中派』不相信必須以革命來反對本國政府，不宣傳革命，不進行忠誠的革命鬥爭，而臆造出最卑鄙的——聽起來好像是絕頂『馬克思主義』的——拒絕革命的各種遁辭。

社會沙文主義者，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者。他們代表那些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所收買（優厚的工資，尊貴的位置等等），而幫助本國資產階級掠奪和壓制弱小民族，幫助他們為瓜分資本主義贓物而鬥爭的工人階層和集團。

『中派』是為腐敗的合法性所腐化了的，為國會制度等等環境所敗壞了的老頑固派，是慣於肥美位置和『平安』工作的官僚。在歷史上和經濟上講來，他們並不是什麼特殊階層，而不過是工人運動從已往階段，即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階段轉到新階段的過渡現象；已往階段，給了無產階級許多寶貴的東西，特別是教給

了無產階級一種必須的藝術，亦即緩慢地、堅毅地、有系統地進行廣泛和最廣泛的組織工作的藝術；而自從那開闢了社會革命紀元的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發生以來，新階段已成為客觀上必然到來的了。

『中派』底主要領袖和代表是考茨基，他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到完全破產的標本人物，是絕頂無氣節的標本人物，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最可鄙的搖動和叛變底標本人物。『中派』在德國有考茨基、哈阿茲、萊得布爾和國會內所謂『工人或勞動友誼社』；在法國有龍格、普列斯曼和一般的所謂『少數派』；在英國有斯腦頓、麥克唐納爾及其他許多『獨立工黨』首領和一部份英國社會黨首領；在美國有黑爾克維特及其他許多人；在意大利有屠拉梯、特列維斯、莫其良尼等；在瑞士有格里姆等；在奧地利有阿得列爾之流；在俄國有組委黨，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齊赫芝及策烈鐵里等等。

自然，單個的人物，有時不知不覺地從社會沙文主義底立場轉到『中派』底立場，或是相反，從後者轉變到前者。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不管有個別人物從一個階級自由轉到別個階級，但各個階級是各不相同的；同樣，在政治生活上，不管有個別人物從這一派別自由轉到那一派別，不管那些想融合各派的企圖和努力，但各個派別是各不相同的。

（三）第三派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齊美爾瓦爾得左派』¹²最能切近表現他們的主張（我們把他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所發表的宣言轉載到附錄內，以便讀者能夠按真實文件來認清這派底產生）。

主要的特點，就在於他們既與社會沙文主義派又與『中派』完全破裂。他們進行竭誠的革命鬥爭來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和本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他們的原則是：『主要敵人在本國』。無情地反對社會和平主義者的甜蜜辭句（社會和平主義者是口頭上的社會

主義者，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夢想不必推翻資本底壓迫和統治而獲得永久的和平），反對那些利用種種遁辭來否認因這次戰爭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性、適當性、適時性的言論。

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國是『斯巴達克團』或『國際社』，李卜克內西即其中之一員。李卜克內西是這派和新國際，即真正無產階級國際底最有名的代表。

李卜克內西曾號召德國底工人和兵士倒戈反對本國政府。李卜克內西曾在國會講台上公開地作這種號召。隨後，他又跑到柏林最大廣場之一的波茨坦廣場上，向示威羣衆散發秘密印刷的宣言，號召『打倒政府』。他因之被捕，被判處苦工徒刑。他現時坐在德國的苦工監獄裏，在德國有幾百，甚至幾千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都因進行反戰鬥爭而被監禁了。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與信札上，不但與本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謝德曼、列金、達維德之流），並且還與本國的中派，即與本國的齊赫芝、策烈鐵里輩（即考茨基、哈阿茲、萊指布爾之流）作過無情的鬥爭。

在一百一十個國會議員中，只有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奧多、柳勒打破紀律，打毀與『中派』及沙文主義者的『統一』，而反對全體。只有李卜克內西一人代表社會主義，代表無產階級事業，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其餘一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正如盧森堡（她也是『斯巴達克團』底團員和領袖之一）所正確形容的那樣，已成爲臭屍了。

德國另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的團體，就是布勒門城的工人政治報。

在法國，最接近於真正國際主義者的，有羅里歐和他的朋友（而布德龍和麥爾黑姆已墮入社會和平主義），以及在日內瓦發行明天雜誌的法國人基爾波；在英國，有工聯會員報和不列顛社會黨

及獨立工黨底一部份黨員（如略塞爾曾公開號召與叛賣了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分裂），有蘇格蘭的國民教員，社會主義者馬克林，他因為進行反戰革命鬥爭，而被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判處苦工徒刑；英國有好幾百社會主義者，都因這種罪名而坐牢。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在美國，有『社會主義工黨』以及在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內那些從一九一七年一月開始發行國際主義者報的份子；在荷蘭，有發行論壇報的『論壇派』（潘業枯克、郭泰、文可伯、羅蘭霍利斯特），在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上他們曾是中派，現在投到我們方面來了；在瑞典，有少年黨或左派黨，以林特哈根、納爾曼、卡爾遜、司得立姆、赫龍特等為領袖，赫龍特曾在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上親自參加建立『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工作，現因進行反戰革命鬥爭，被捕入獄；在丹麥，有特禮兒及其朋友，他們退出了斯道寧格總長所領導的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的丹麥『社會民主黨』；在保加利亞，有『契斯紐克派』；在意大利，最接近於國際主義的有黨底書記拉撒里和中央機關報前進底編輯塞拉底；在波蘭，有拉狄克，甘業茨基及其他統一於『全國管理委員會』內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此外還有盧森堡、梯什科及其他團結於『總管理委員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們草就了『全體表決』底理由書（一九一七年一月）來和本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及『中派』作鬥爭，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他們在台賽舉行的蘇黎支區社會黨大會上，提出了原則上的革命的反戰決議；在奧地利，有阿得列爾底左派青年朋友，他們也常在維也納『馬克思俱樂部』內活動，該俱樂部現時已為最反動的奧地利政府所封閉，奧地利政府因阿得列爾英勇地——雖然思慮不周——槍擊總長，正在殘害他；以及其他等等。

問題並不在色彩底濃淡上，這種色彩底濃淡，就在左派中間也是有的。問題是在派別上。在可怕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要作真

正國際主義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就是問題底全部實質。這樣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們才負荷着社會主義底整個將來，只有他們才是羣衆底領袖，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在帝國主義戰爭環境下，社會民主黨人中以及一般社會主義者中的改良派與革命派底區別，客觀上必然要起變化。誰要是僅局限於向資產階級政府『要求』締結和約或『表明各國人民趨向和平的意志』等等，那他在實際上就墮落到改良派的立場。因為戰爭問題，客觀上祇是革命問題。

要從戰爭過渡到民主的非強力的和平，過渡到使各國人民從那『靠戰爭』發財的資本家老爺們底無數萬萬利息盤剝之下解放出來，——要做到這點，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了。

對資產階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要求各種各樣的改良；但要不陷於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義，便決不能要求那些被帝國主義資本底千百條繩索所細縛着的人們和階級去斬斷這些繩索；而不斬斷這些繩索，則所謂用戰爭來反對戰爭的一切議論，都是空洞的騙人辭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頭上的革命家，實際上的改良主義者，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者，實際上的社會沙文主義派底幫手。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破產了——必須建立第三國際

（一七）齊美爾瓦爾得國際，一開始就站在動搖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場上，這就使齊美爾瓦爾得左派不得不立刻劃清界限，獨樹一幟，而發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齊美爾瓦爾得國際底主要缺點，其破產（因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經破產了）底原因，就是在實踐上足以決定一切的最主要的

問題上，即與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與王德威爾得，鳩思曼等爲首的海牙（荷蘭）社會沙文主義的舊國際完全分裂的問題上猶疑不決。

在我國還不知道，齊美爾瓦爾得國際的多數正是考茨基派。但這是不能不估計到的主要事實，並且這個事實在西歐已爲人所共知了。就連沙文主義者，即德國極端沙文主義者，超等沙文主義黑姆尼次報編輯兼超等沙文主義的巴烏斯的鐘聲報撰稿人蓋立曼（自然是個『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是激烈主張社會民主黨『統一』的人），也不得不在報紙上承認說，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齊美爾瓦爾得的多數是一個東西。

一九一六年末和一九一七年初的情形，已把這個事實完全確定了。不管昆塔爾宣言¹³怎樣斥責社會和平主義，但整個齊美爾瓦爾得右派，整個齊美爾瓦爾得的多數，都墮落到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了：如考茨基之流在一九一七年一二兩月的許多演說；法國的布德龍和麥黑爾姆與社會沙文主義者一致投票贊成社會黨代表大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舉行的）及『勞動總同盟』代表大會（勞動總同盟是法國工會全國的組織，這次代表大會也是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舉行的）所通過的和平主義的決議；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如此，那裏全黨都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而屠拉梯本人，則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演說中，甚至『滑到了』（自然不是偶然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鼓吹民族主義論調的地步。

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底主席格里姆，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與他本黨內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格雷里哈、普斐留格、繆勒爾等）聯合起來反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在各國齊美爾瓦爾得派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舉行的兩次會議上，有幾個國家底左派國際主義者，如少年國際組織底書記和極好的國際主義報紙少年國際底主筆苗春別爾格，我黨中央代表季諾維也夫，波蘭社會民主黨（『全國管理委員會』）代表拉狄克，參

加『斯巴達克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哈爾施坦等，曾正式痛罵齊美爾瓦爾得多數底這種陽奉陰違首鼠兩端的行動。

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很大的能力；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人階級，像俄國工人階級這樣展開了如許的革命毅力。但能者是多勞的。

再不能容忍齊美爾瓦爾得的泥坑了。再不能爲了遷就齊美爾瓦爾得的『考茨基派』而和普列漢諾夫輩、謝德曼輩的沙文主義國際仍舊保持半推半就的關係。應該立刻和這個國際斷絕關係。留在齊美爾瓦爾得國際裏，只應是爲着傳達消息。

正是我們，正是現在，應該刻不容緩地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新國際；更正確些說，我們應該毫不畏怯地高聲承認，這個國際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已在活動了。

這就是我在上面所確切列舉了的那些『真正國際主義者』底國際。他們，只有他們，才是革命國際主義羣衆底代表，而不是惡化羣衆的人。

如果以爲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數量太少，那末就請每個俄國工人自問一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前夜，俄國覺悟的革命者是否很多呢？

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正確表現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思想和政策。問題底實質，不在於『宣佈』國際主義，而是要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會做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不要以指望什麼協定和國際大會來欺騙自己。當帝國主義戰爭尚在繼續下去的時候，則國際間的交際關係也就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軍事專政底鈹榨所壓住。甚至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輔助政府存在的『共和派』米留可夫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也不放瑞士社會主義者，瑞士社會黨書記，國際主義者，即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的柏拉登進入俄境，雖然他的妻子是俄

國女子，他要到妻子親戚那裏去，雖然他在里加參加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因而坐過俄國的監獄，在出獄時向沙皇政府繳納過保證金，而現在想取回這筆保證金；雖然如此，但米留可夫還是不放他進入俄境。既然『共和派』米留可夫能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俄國幹出這種勾當，那末資產階級關於實現不兼併的和平的種種允諾和約許，空話和宣言等等，究竟有什麼價值，自可不言而喻了。

英國政府逮捕托洛茨基的事實如何呢？不放馬爾托夫出瑞士，而希望把馬爾托夫誘到英國，使之和托洛茨基受同樣的命運，這件事實又是如何呢？

我們不要自作幻想。不要自欺。

既然事實證明了，甚至於從斯托哥爾摩也不放那些忠於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到我們這裏來，甚至於不准把他們的信件寄給我們，雖然當局完全可以用最嚴密的軍事檢查手續來審察這些信件，因之要『等待』國際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就無異是做國際主義底叛徒。

我們黨不應『等待』，而應立刻建立第三國際，——那時坐在德國和英國監獄中的千百社會主義者將可輕快地長吁一口氣了；成千成萬現時正在舉行罷工和示威而使德皇威廉這個惡徒和強盜害怕起來的德國工人，他們會在祕密的傳單上，看到我們的決議，看到我們對李卜克內西——並只是對於他——表示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們現在也和『革命護國主義』作鬥爭的決議；他們看到這樣的傳單時，便會更加堅信自己的革命國際主義。

能者是多勞的。全世界現在沒有一國有俄國這樣的自由。我們利用這種自由，並不是去宣傳贊助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護國主義』而是要勇敢地、忠實地本着無產階級的李卜克內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無論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叛徒們，或對『中派』動搖份子，都是絕對勢不兩立的。

(一八) 既然如此，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統一之絕對沒有可能，也就不必多費口舌了。

寧可只剩兩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這就是說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與組委黨，齊赫芝及策烈鐵里等統一的念頭；這些人在工人報中與波特列索夫實行聯盟，他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裏面贊成發行公債¹⁴，他們已墮落到『護國主義』立場了。

讓死人去殮葬自家的死屍吧！

誰想救助動搖者，自己就應該首先不動搖。

我們黨究竟應有何種在科學上正確，在政治上能幫助啓發無產階級意識的名稱呢？

(一九) 現在我要講到最後一個問題，即我們黨底名稱問題。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稱的一樣命名為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把共產黨宣言當作基礎的。這個宣言中被社會民主黨所曲解所叛賣的有以下兩主要點：(一) 工人無祖國，所以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就是叛賣社會主義；(二)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已被第二國際曲解了。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馬克思曾經屢次——例如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上——說到這點，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又更通俗地重複說過這點。人類離開資本主義所能直接過渡到的，只是社會主義，即公共佔有生產資料，並按各人的工作來分配生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所寫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我黨名稱（社會民主）底後半部，在科學上也是不正確的。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是反對任何國家的。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首領，即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類先生們，把馬克思主義俗化和曲解了。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但（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考茨基一流人的不同之處）這國家並不是尋常資產階級國會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而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的國家。

我的第三個理由，就是在我們這裏，實際生活即革命在事實上已經創立了這個——雖然現時還處於幼弱萌芽狀態的——新式『國家』，而這種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這已經是羣衆底實踐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底理論了。

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是由那些與民衆隔離的武裝隊伍來控制羣衆。

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式國家也是一種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武裝隊伍，需要最嚴格的秩序，需要用強力來無情地鎮壓帝制派和古契可夫資產階級的一切反革命企圖。

但是，我們這裏現在產生着的新式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這種武裝隊伍就是羣衆自己，就是全體民衆，而並不是駕於羣衆之上，與羣衆隔離，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人。

不要往後望，而要向前看，不要往後去望通常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這種民主是用舊的帝制的管理機關、警察、軍隊和官吏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

要向前去看現在產生着的新的民主，這種民主已經不成其爲民主了，因爲民主就是由民衆統治，而武裝的民衆是不能自己統治自己的。

民主這個名詞用在共產黨名稱上不僅是在科學上不正確，並且這名詞現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已是罩在革命民衆眼睛上的一種眼罩，妨礙着他們自由地、大胆地、自動地去建設新制度，即工農等等代表蘇維埃，作爲『國家』唯一政權，作爲任何國家『消亡』之先聲。

我的第四個理由，就是說要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勢。

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那樣，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自覺地容忍過『社會民主』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名稱。因爲當時，即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提在日程上的任務是要慢慢進行組織和教育工作。其他的工作是沒有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現在還是）不但在理論上，並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正確地估計了時局，沒有瞭解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工人被帝國主義利潤所腐化，巴黎公社遭到了失敗，德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剛剛獲得勝利（一八七一年），半農奴制的俄國還處在年代悠久的沉眠狀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正確地估計了時局，瞭解了當時國際形勢，瞭解了要慢慢進到開始社會革命的任務。

我們也要瞭解新時代底任務和特點。我們決不要做法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些人，馬克思曾說過：『我所種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却是跳蚤』。

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它依其客觀的必然性，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戰爭已使全人類瀕於深淵，已使全部文化瀕於毀滅，已使新的數百萬人以至無數萬人瀕於野蠻化和滅亡的境地。

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再沒有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正在開始的時候，當這個革命尚是畏畏縮縮，尚不堅決，尚不自覺，尚用過分信任資產階級的態度來開始進行的時候，大多數（這是真情，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首領，『社會民主黨』議員，『社會民主黨』報紙，——而這也就是人們用來影響羣衆的工具哩，——却背叛了社會主義，叛賣了社會主義，轉到了『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羣衆被這些領袖弄得惶惑莫定，被他們弄得心中無主，被他們所欺騙了。

難道我們還要沿用那已如第二國際一樣腐朽了的老舊名稱來鼓勵這種欺騙，助長這種欺騙麼？

就讓還有『許多』工人是誠懇相信社會民主黨的罷。現在已經是學習怎樣區別主觀和客觀的時候了。

主觀上，這些工人社會民主黨人，是無產階級羣衆最忠實的領袖。

但全世界客觀形勢却是這樣，即我們黨底舊名稱便於人們去欺騙羣衆，妨礙運動前進，因為羣衆在每一步驟上，在每種報紙上，在每個國會黨團內所看見的都是那些領袖，即言論最響亮，行動最刺目的人，而他們全都『也算是社會民主黨人』，都是『主張』和社會主義叛徒，即和社會沙文主義者講『統一』的，都是拿出『社會民主黨』所發給的舊支票來要求兌現的…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呢？..『那會把我們與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混淆起來的』呵…

爲什麼我們不怕和社會民主黨人及社會自由黨人混淆起來，不怕和法蘭西共和國內用資產階級手段欺騙羣衆要算是最先進最狡猾的那個資產階級政黨，即急進社會黨人混淆起來呢？..據說：『羣衆已經習慣了，工人們已經『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了…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把革命底最近任務，把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客觀情形，把第二國際已遭可恥破產的事實，把包圍着無產者的那些『也算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狐羣狗黨破壞實際事業的事實，都置之不顧了。

這是因循慣例的理由，沉眠不醒的理由，頑固守舊的理由。

而我們則要改造世界。我們要結束世界帝國主義戰爭，要結束這個有數萬萬人民捲入漩渦，有數千萬萬資本利益糾纏在內的戰爭，要結束這個若沒有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便不能以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的戰爭。

同時我們却又自己害怕自己。我們却不想脫掉已經『穿慣了的』，『可愛的』，醜醜的襯衫。

現在已經是拋棄醜醜襯衫的時候了，已經是穿起清潔襯衣的時候了。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彼得格拉。

一九一七年九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二八至一五五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 （『四月』）全俄代表會議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舊曆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代表會議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

（五月十一日（舊曆四月二十八日）通過）

俄國地主土地佔有制之存在，是農奴制地主權力底物質支柱和能於使帝制復辟的保證。這種土地佔有制，必然使俄國絕大多數居民，即農民陷於貧困、遭到盤剝和備受抑壓，必然使全國各方面的生活都陷於落後的地步。

俄國農民土地佔有制，無論份地（村社的和農戶的）或私有土地（租佃的和購買的）都從下至上，縱橫錯綜地為半農奴制的舊關係，為農奴制時代所遺傳下來而把農民劃分成各種類別以及地塊散亂滲雜等等的現象束縛着。必須打破所有這些陳舊了的有害的界限，必須『剷除阡陌』，從新改造一切土地佔有制關係和農業經營方式，以求適應於全俄與全世界經濟底新條件，——這就是農民力求把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的物質基礎。

不管一切民粹主義的政黨和派別怎樣慣於給農民羣衆反對農奴制地主土地佔有制的鬥爭，以及一般地反對俄國全部土地佔有關係和使用關係上一切農奴制桎梏的鬥爭，披上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外衣，其實這個鬥爭本身所表現的，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絕對進步的以及經濟上必須澈底打破這一切桎梏的趨向。

土地國有雖是資產階級性的設施，但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階級鬥爭最能自由進行，使土地使用關係上最能擺脫一切非資產階

級附屬物的設施。除此而外，土地國有既是廢除土地私有制，那它在實際上就會是給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一個極強大的打擊，所以無產階級黨應當極力贊助這種改造。

另一方面，俄國富裕農民早已造成農民資產階級的成份，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良辦法無疑是加強了，加增了和鞏固了這些成份。在鄉村的另一極端上，也同樣地加強了和加增了農業僱傭工人，即無產者，以及接近於他們的半無產農民羣衆。

對地主土地佔有制的破壞與剷除若愈堅決，愈澈底，俄國一般土地關係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造若愈堅決，愈澈底，則農業無產階級反對富裕農民（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會發展得愈加有力而愈迅速。

俄國革命底命運和結局，如果正在開始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不會給我國以直接的強大影響的話，那就要全靠城市無產階級能否領導農村無產階級並使農村半無產階級大眾與之聯合，或者是這一大眾將跟隨着那個趨向於與古契可夫輩、米留可夫輩聯合，趨向於與資本家和地主聯合，即一般趨向於反革命勢力的農民資產階級走去——這樣一點來決定。

代表會議根據這樣的階級狀況和階級力量對比，決議如下：

（一）無產階級黨竭力為立刻完全沒收俄國一切地主土地（以及皇室、教堂、閣部等等所有的土地）而鬥爭。

（二）黨堅決主張立刻把一切土地轉歸那些組織在農民代表蘇維埃中，或組織在其他真正是完全由民主選舉產生而絕對不受地主和官吏支配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農民。

（三）無產階級黨要求把全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土地國有就是將一切土地所有權交歸國家，而把土地處置權交給地方民主機關。

（四）黨應當堅決反對臨時政府，因為它以盛加略夫為代表所發表的言論及其共同聲明，都是強迫農民來『與地主訂立自願協

定』，實際上就是強迫他們接受地主性的改良，並威脅農民，說要懲罰他們的『擅自行動』，這也就是居民中的少數（地主和資本家）轉到採用暴力手段反對大多數；同時黨應當堅決反對那些勸說農民在立憲會議召集以前不要奪取全部土地的大多數民粹派人以及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底小資產階級動搖態度。

（五）黨忠告農民奪取土地時要採取有組織的方式，不容許有絲毫損壞財產的行爲，並要關心增加生產。

（六）所有一切土地關係的改造，只有在全部國家機構完全民主化的條件下，即是一方面廢除警察、常備軍和實際上享有特權的官吏，另一方面實行完全不受上級機關監視和監護之極廣泛的地方自治制條件下，才能順利實現，才能穩固。

（七）必須立刻到處着手建立單獨和獨立的農業無產階級組織，一方面組織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單獨的半無產階級農民代表蘇維埃），另一方面在共同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以及一切城鄉管理機關等等中組織無產階級團體。

（八）俄國有許多地方的農民委員會將地主底耕畜農具交給組織在這些委員會中的農民，以便在公共調劑的基礎上來耕種一切土地，黨應當贊助這些農民委員會底創舉。

（九）無產階級黨應當忠告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要他們力求爭得把每個地主田莊組成爲規模夠大的模範農莊，而由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農藝家領導下，採用最好的耕種技術，用公費經營之。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舊曆三日）刊
載於兵士真理報第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頁。

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¹⁵

(五月十二日(舊曆四月二十九日)通過)

民族壓迫政策是專制制度與君主制度底遺產，而地主、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則支持着這種政策，目的是要保護其階級特權並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現代帝國主義加強着征服弱小民族的趨向，因而成爲加深民族壓迫的新因素。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能達到剷除民族壓迫，那就只有在保證一切民族和語言完全平權的澈底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和管理制度之下，才能實現。

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能具體實現，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由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團結，並促進各民族間真正民主的接近。

現時芬蘭和俄國臨時政府間發生的衝突，特別顯著地表明，否認自由分立權的結果，便是公然繼續沙皇政府底政策。

決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和某個民族在某個時機中實行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後一問題，無產階級黨在每一場合，都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底利益，完全獨立地加以解決。

黨要求廣泛的區域自治，取消自上的監督，取消強迫施行的國語，並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於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條件及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計，來劃定自管區以及自治區底疆界。

無產階級黨堅決排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將學校等等事宜劃出國家管轄範圍而交給某種民族議會處理的辦法；民族文化自治制是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業作工的人，按其所屬的『民族文化』彼此分開，就是說，使工人和本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間的聯繫加強起來；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却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黨要求在憲法中加入一條基本法律，將某一民族所享有的任何特權以及對於少數民族各種權利的任何侵犯，都宣佈為無效。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把俄國境內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等。只有這樣把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組織，才使無產階級有可能來進行反國際資本和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勝利鬥爭。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舊曆三日）刊
載於兵士真理報第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

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

(舊曆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

土地問題決議草案

(一) 一切地主土地和私有土地，以及皇室、教堂等等的土地，概應立刻毫無報償地轉歸人民所有。

(二) 農民應當有組織地經過農民代表蘇維埃，立刻奪取當地全部土地，以便實行經濟上的處置，但絕對不以此預決立憲會議或全俄蘇維埃委員會——如果人民把國家中央政權交給這樣的蘇維埃委員會的話——關於土地制度的最終規定。

(三) 土地私有制概應廢除，即是全部土地所有權應專屬於全體人民；而處置土地之權則應屬於地方民主機關。

(四) 農民應當拒絕資本家、地主及其臨時政府關於就地與地主『協商』來規定立刻處置土地辦法的建議；對於全部土地的處置，應由各地大多數農民有組織的決議決定之，而不應由大多數與少數並且是寥寥無幾的少數間的協定，即農民與地主間的協定來決定。

(五) 不僅地主，而且資本家也在竭力進行鬥爭，並將以全力進行鬥爭反對把一切地主土地無報償地轉歸農民，資本家不只擁有很大的金錢力量，而且擁有經過報紙，經過許多慣於資本統治的官吏和職員等等來影響那些還是愚昧無知羣衆的力量。所以不打破農民羣衆中對資本家的信任，不建立農民和城市工人間的密切聯盟，

不把全部國家政權完全轉歸工兵農等代表蘇維埃，則將一切地主土地無報償地轉歸農民的事業便無法貫徹到底，無法鞏固起來。只有歸這種蘇維埃掌握的政權，只有不是用警察，不是用官吏，不是用與人民脫離的常備軍來管理國家，而是經過全民普遍武裝的工農民警來管理國家的這個政權，才能保證上述各種爲全體農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

（六）農業僱傭工人和貧農，即因沒有足夠的土地、耕畜、農具而部份地要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農民，應當以全力去建立獨立組織，組成爲特殊的蘇維埃，或在共同的農民蘇維埃中組成爲特殊的團體，以便捍衛自己的利益，反對那些必然力圖與資本家和地主聯合的富農。

（七）由於戰爭的結果，俄國也如其他一切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非交戰國）一樣，因勞動力不夠，因煤鐵等等缺乏，而感受經濟破壞，災禍，飢荒的威脅。只有實行由工農代表去監視並領導全部產品之生產和分配事宜，才能挽救國家。所以必須立刻準備使農民代表蘇維埃與工人代表蘇維埃成立協定，用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來交換農具和衣履等等，而不要資本家作中介，並排除他們對工廠的管理。爲了同一目的，必須鼓勵把地主底耕畜農具轉歸農民委員會，而使這些耕畜農具歸公共使用。同樣應當鼓勵把每個規模巨大的地主田莊建成模範農莊，根據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決議，在農藝家領導下，用最好的農具來共同耕種土地。

一九一七年刊載於土地問題材料一書。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八九至九〇頁。

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 維埃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六日
(舊曆六月三日至二十三日)

論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舊曆四日)

同志們，在規定給我的短短時間中，我只能說一說執委報告人和隨後發言人所提出的幾個基本原則問題，而且我想這樣要比較適當一些。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出席的是什麼會議，此刻舉行全俄代表大會的蘇維埃是什麼，什麼是革命民主制，人們在這裏千番百次地重複說到革命民主制這個名詞，只是爲了掩蓋對這民主制全不瞭解和完全背棄的事實罷了。因爲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到革命民主制，而抹煞蘇維埃組織底性質，它的階級成份，它在革命中的作用，關於這些，一句話也不說，同時却覬覦民主派的稱號，這是很可怪的。人們在我們面前描寫在全西歐都有過的那種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底綱領，描寫現在一切資產階級政府——我國政府也在內，——都承認的改良綱領，同時却又向我們說什麼革命民主制。他們是在什麼人面前說話呢？是在蘇維埃面前呵。那我就來問問你們，在歐洲是否有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

共和國，存在有與這蘇維埃多少相似的機關呢？你們必得回答說：沒有。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機關，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機關，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產階級政府，連同那種剛才向我們描述過的，而在一切國家中提議過幾十次，却始終是紙上空文的改良『計劃』，或者是人們現在向之投訴的這樣的機關，這樣的新式『政府』，即為革命所創造的，是僅在歷史上革命巨大高漲，例如在法國一七九二年以及一八七一年時，在俄國一九〇五年時才有過先例的政府。蘇維埃，——這是在任何一個通常資產階級國會制國家中所沒有的機關，而且決不能與資產階級政府同時存在的。這就是我們在我黨決議案中叫做工農民主共和國的那種更民主的新式國家，在這種國家中，惟一的政權定會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如果以為這是個理論問題，那便是無益的想法，如果以為可以把這個問題避開不談，那便是無益的企圖，如果想用現在還有某種機關正與工兵蘇維埃同時存在的事實來支吾搪塞，那便是無益的遁辭。不錯，它們是同時並存的。但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才產生了空前多的誤會、突衝和磨擦。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才使俄國革命在第一次高漲，第一次前進之後發生停滯，發生現時在我國聯合政府中，在一切對內對外政策中，因準備帝國主義的進攻而表現的那種退步現象。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通常的資產階級政府，那時農民、工人、兵士等等的蘇維埃就不需要，那時蘇維埃若不被那些把持兵柄而絲毫不顧克倫斯基總長之滔滔雄辯的反革命將軍們所驅散，便會無聲無臭地死滅。這樣的機關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既不能後退，也不能停在原地，而只有前進才能生存。這就是並非俄國人空想出來，而是由革命創造出來的那種新式國家，因為沒有它，革命就不能勝利。在全俄蘇維埃內部必不可免地要發生各政黨間爭奪政權的磨擦和鬥爭。但這將是由羣衆根據自身政治經驗來消除各種可能的錯誤和幻想(喧聲)，而總長們所作的報告，援引什麼他們昨天已經

說過，明天還要寫出，後天還會約許等等，對於消滅錯誤和幻想是不會有幫助的。同志們，這從俄國革命所創立而現在處在存亡關頭的機關看來，是很可笑的。蘇維埃照現時這樣繼續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並非小孩的工人和農民竟要來開會通過那不能經受任何文據檢驗的決議，聽那不能經受任何文據檢驗的報告！這樣的機關是過渡到一種新式共和國，該共和國將建立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的堅強政權，此種政權現時在西歐還是不能存在的，而俄國革命沒有這種政權便不能勝利，即不能戰勝地主，不能戰勝帝國主義。

沒有這樣的政權，就談不到我們自己會獲得這樣的勝利，並且我們愈加留心考察人們在這裏向我們建議的綱領以及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則兩者之間的基本矛盾就愈加觸目地顯露出來。人們說，——如像報告人和其他發言人就是這樣說的，——第一屆臨時政府真是不好！而以前當布爾什維克，時乖命舛的布爾什維克說『不給這個政府以任何贊助和任何信任』時，人們却是如何紛紛責罵我們為『無政府主義者』呵！現在大家都說以前的政府是不好的了，試問這幾乎是社會主義者充任閣員的聯合政府又怎樣呢，它與前屆政府有什麼區別呢？關於什麼綱領、計劃的空談不是說得夠多了麼，這些東西不是說得足夠了麼，不是到了實行的時候了麼？從五月六日建立聯合政府起到現在已過了一個月了。請看看事實，看看那在俄國以及一切被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國家中所有的經濟破壞情形吧。爲什麼發生經濟破壞？就是由於資本家掠奪無厭。這才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這是報紙上公開承認了的事實，而且並不是我們的報紙，當然不是什麼布爾什維克報紙，而是內閣機關刊物工人報上發表的；煤炭供給的定價由『革命』政府提高了！而聯合政府也竟沒有把這種情形改變絲毫。有人說，俄國可否立刻施行社會主義，可否立刻一般地實行根本改造，——同志們，這全是空洞的遁辭。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理，正像他們自己所常常說明的那樣：『我們的學說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過渡到純粹社會主義的純粹資本主義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的，且在戰時是決不能有的，而只有某種中間的、某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因為有幾萬萬人被捲入各國資本家間所進行的罪惡戰爭中，正處在生死關頭。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約許改良，——這是空話。現在的問題是要進行我們此刻所需要的步驟。

如果你們想援引『革命』民主制這個名詞，那你們就要把這個概念與在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民主制區別清楚，因為現在該是拋棄所謂『革命民主制』的空談，拋棄那種用『革命民主制』這一名詞來互相慶賀的行動，而按馬克思主義和一般科學社會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來作階級的品評的時候了。人們向我們提議的東西，乃是過渡到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主義民主制。也許從西歐普通標本的觀點來看，這是好極了的。可是現在有許多國家處在滅亡的前夜，而我們所說的那些實際辦法，看來似乎是非常複雜而難於進行，還必須加以特別研究，好像前一個發言人，郵電總長公民所說的那樣，——其實這些辦法是十分明顯的。他說，在俄國沒有一個政黨會表示決意擔負握取全部政權的責任。我回答說：有的！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拒絕這個責任，我們黨也就不拒絕這個責任：它隨時隨刻都準備握取全部政權。（鼓掌，笑聲）。

你們儘可任意嘻笑，可是如果總長公民在這個問題上把我們和右派政黨相提併論的話，那他會得到應有的回答的。任何一個黨都不能拒絕這個責任。並且當自由還存在着的時候，當着所謂實行逮捕和充軍到西伯利亞的威脅——這種威脅是出自反革命派方面，而與反革命派同事的，却有我們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總長們，——還只是一種威脅的時候，任何一個政黨都會說：向我們表示信任吧，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綱領拿給你們看的。

我們在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代表會議上就已製定了這樣的綱領。可惜人們不尊重這個綱領，不遵行這個綱領。顯然要把這個綱領作一通俗的解釋。我且勉力來把我們的決議，我們的綱領，向郵電總長公民作一通俗的解釋吧。我們綱領中關於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就是立刻，——爲此是不需要有任何攔延的，——要求公佈所有那些高達百分之五百至八百的駭人聽聞的利潤，而資本家之獲得這種利潤，並不是像『純粹』資本主義制下的資本家在自由市場上獲得的，而是藉供給軍需品獲得的。請看，這就是真正必須而且可能實行工人監督的地方。這就是你們如果自稱爲『革命』民主派時所應當代表蘇維埃實行的，而且是可以立刻實行的辦法。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使人民看清真正的無政府狀態，看清真正玩弄帝國主義的把戲，玩弄民衆財產，玩弄幾十萬人生命的行爲，這些生命是明天就會因我國繼續窒息希臘而死亡的。請你們把資本家老爺們底利潤公佈出來，逮捕五十個或一百個最大的百萬富翁吧。只要把他們拘留幾星期就行了，那怕是用軟禁尼古拉·羅曼諾夫那樣的優待條件來對待他們也罷，都可達到一個簡單的目的：強迫他們說出各種綫索，欺詐手段，貪慾無厭的齷齪行爲，由於這些貪慾詐行的結果，使我國甚至在新政府下每天損失的數目都以百萬計。這就是造成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破壞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們說：我國一切仍如舊觀，聯合政府沒有改變絲毫東西，它只加上了一大堆宣言和好聽的聲明書。不管人們多麼誠懇，不管他們多麼誠意希望勞動者都好，但實況是沒有改變的——掌握政權的仍舊是原來那個階級，其所執行的政策，並不是民主政策。

人們向我們說什麼要使『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民主化』。難道你們真不知道，這句話只對於俄國才是新穎的麼？在其他國家不是已有幾十個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閣員向國人這樣約許過麼？既然我們面前擺着活生生的具體事實：地方居民選舉政權機關，而中央却

硬要指定或批准地方政權機關人選來破壞起碼的民主原則，試問這些約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資本家掠奪人民財產的現象繼續着。帝國主義戰爭繼續着。而人們却答應我們改良，改良，又改良，可是這些改良在現存的範圍內是根本不能實現的，因為戰爭壓倒一切，決定一切。有人說戰爭並不是爲着資本家利潤而進行的，爲什麼你們不同意這種說法呢？標準何在呢？首先就在於是哪一個階級當權，哪一個階級繼續主政，哪一個階級繼續利用銀行和財政業務而榨取幾千萬萬利潤？幹這一切勾當的，仍然是那個資本家階級，所以戰爭也就仍然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無論第一屆臨時政府也好，無論那幾乎是社會主義者充當閣員的政府也好，都沒有改變絲毫東西。秘密條約仍然是秘密條約，俄國仍然是爲海峽而戰，爲繼續略霍夫對波斯的政策¹⁶等等而戰。

我知道，你們不願意這樣，你們當中大多數人都不願意這樣，閣員們也不願意這樣，因爲這是不能願意的事情，因爲這是殺害幾萬萬人生命的事情。可是且拿現在米留可大輩和馬克拉可夫輩大說特說的那種進攻來看吧。他們完全懂得這是一回什麼事情；他們知道，這是與政權問題，與革命問題相關連的。人們說，應當把政治問題與戰略問題區分開來。須知連提出這樣的問題都是可笑的。立憲民主黨人明明瞭解，現在擺着的問題是政治問題。

至於說從下層發動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可能引起單獨媾和的結局，——這是誣蔑。我們如果握得政權的話，那我們所要實行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逮捕那些資本巨頭，斬斷他們玩弄陰謀手段的一切綫索。否則，所有關於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等詞句，都是空話。我們所要實行的第二個步驟，就會是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分開，而單獨向人民宣佈：我們認爲一切資本家都是強盜，無論特勒青科也好，——他絲毫也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過較蠢一些罷了，——法國的資本家也好，英國的資本家也好，任何其他國家的資本家也好，都是一樣。

你們自己的新聞報弄糊塗了，不說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而提議恢復原狀。不對，我們不是這樣來瞭解『不兼併』的和平的，連農民代表大會所說的，都比較近於真理些，它說，要建立『聯邦』共和國，其意思就是，俄羅斯共和國無論對哪一個民族，都不願用新的或舊的方式去壓迫它們，無論對哪一個民族，不管對芬蘭也好，對烏克蘭也好，都不願用強力手段強迫它們和它同居共處；而現時陸軍總長却向芬蘭和烏克蘭百般挑釁，造成不可容許的衝突。我們希望有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具有堅強政權的俄羅斯共和國，可是這個堅強政權只有由各族人民自願同意才可建立起來。『革命民主』是個莊嚴的名詞，可是，人們却以之稱呼那個用卑鄙挑釁手段來增加對烏克蘭和芬蘭問題上的困難的政府，而烏克蘭和芬蘭甚至沒有表示出要分立，而只說：『請不要把起碼的民主設施延擱到立憲會議去吧！』

當你們還沒有放棄自己的兼併時，便無法締結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須知這是很可笑的，這是一種把戲，歐洲每個工人都會對此嘲笑說：『他們口頭上說得倒很漂亮，號召各族人民推翻銀行家，自己却把本國銀行家送到內閣裏去當總長』。逮捕他們，揭露他們的欺詐把戲，查明各種綫索吧，——你們却不這樣做，雖然你們擁有不容抗拒的權力機關。你們經過了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事變，你們知道，革命是不能按主觀願望來幹的，其他各國的革命都是經過流血起義的艱苦道路才幹成功的，而在俄國却沒有一個團體，一個階級能抵抗蘇維埃政權。在俄國這種革命可能是例外地成為和平革命。這個革命如果立刻與一切資本家階級斷絕關係，立刻向各國人民提議和平，那末在極短期間內，就會也從法國人民方面，也從德國人民方面得到同意的表示，因為這些國家快要陷於滅亡，因為德國狀況毫無希望，因為它沒有救路，因為法國也…

（主席說：『你的發言時間完了』）。

再有半分鐘我就講完…（喧聲，會場上有人請繼續說下去，有人抗議，有人鼓掌）。

（主席說：『報告大會，主席團提議延長發言人底說話時間。誰反對？大多數贊成延長發言時間』）。

我說過，假使俄國革命民主派，不是口頭上的民主派，而是真正的民主派，那它就會推動革命前進，而不會與資本家妥協，不會空談什麼不兼併不賠款的和平，而會消滅俄國自己方面的兼併，並直接宣佈，它認為任何兼併都是犯罪的強盜行爲。那時就會可以避免爲了瓜分波斯和巴爾幹而使千百萬人瀕於死亡的帝國主義的進攻。那時就可以開關達到和平的道路，這條道路不是什麼簡單的，——我們並不這樣說，——在這條道路上也許會發生真正革命戰爭。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像巴查羅夫今天在新生活報上提出的那樣；我們只說，俄國所處的條件，使它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時所需執行的任務，比原來想像的要容易些。它所處的地理條件，使那些憑靠資本及其掠奪利益的列強，如果冒險來反對俄國工人階級及與之聯合的半無產階級即貧農的話，那末這對於它們，就會是極端困難的任務。德國已瀕於覆滅的境地，而在美國——它想吞併墨西哥，並且大概很快就要同日本作鬥爭——參戰以後，德國狀況已是無可挽救的了，德國定會被消滅掉的。法國所處的地理條件，使它遭受的痛苦最多，它疲困到了極點，這個國家遭受飢餓的程度比德國少些，可是人力底損失却比德國多得無可計量。所以假使你們第一步就從約制俄國資本家底利潤開始，而剝奪他們榨取幾萬萬利潤的任何可能；假使你們向各國人民提議和平，反對所有一切國家底資本家，並逕直聲明說，你們決不同德國資本家以及凡是直接間接贊助他們或與之勾結者作任何談判，任何交際，並說，你們拒絕與法英資本家發生關係，——那時你們就會是在工人面前控訴他們。那你們就不會把發給麥克唐納出國護照¹⁷的事情當作勝利，

麥克唐納爾從來沒有作過反資本的革命鬥爭，其所以放他出國，是因為他沒有表示過爲反對英國資本家的革命鬥爭思想、原則、實踐和經驗，而我們的馬克林同志和幾百個英國社會主義者却因進行這種鬥爭而坐牢，我們的李卜克內西同志也因此而坐牢，他之所以被拘禁在苦工牢裏，只是因爲他說過：『德國兵士們，開槍打你們自己的凱撒吧』。

大多數臨時政府委員在特別召集的第三屆杜馬會議中——我不知道，照算起來，這屆杜馬究竟是第幾屆，是第三屆，還是第四屆，——每天揚言威嚇，製造空氣，要把我們拘禁到苦工牢裏去，並且已在起草司法部關於此事的新法令，其實把帝國主義者資本家拘禁到這樣的苦工牢裏去，難道不是還要正確一些麼？馬克林和李卜克內西，這才真是把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思想見諸實行的社會主義者。要向各國政府說的，也就是這樣的話。爲了爭取和平，必須在各國人民面前控訴各國政府。那時你們就能使一切帝國主義政府都陷於窘境。現在却是你們自己陷於窘境了，既然在三月十四日爲和平事業告人民的宣言上說，『推翻你們的皇帝，你們的國王，你們的銀行家吧』，而我們自己雖握有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這樣一種空前未有的，按數量、經驗、物質力量來說都是極豐富的組織，却同我們的銀行家訂立聯盟，建立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政府，並寫着那在歐洲已寫了好幾十年的改良草案。歐洲那裏的人在嘲笑我們這種爲和平鬥爭的方法。只有當蘇維埃握取政權，並用革命手段行動時，歐洲人才會瞭解這種鬥爭。

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在階級規模上反對資本家，作出停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步驟而不經過流血的革命。真的只有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就是俄國。當工兵代表蘇維埃還存在的時候，俄國始終會是這樣的國家。蘇維埃與普通式樣的臨時政府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只有當舉行進攻不會實現時，蘇維埃才能照舊存在。舉行

進攻是俄國革命中全部政局的轉變，即是從期待和平與準備由下層舉行革命起義來獲得和平的局面轉變到重新進行戰爭的局面。從一條戰綫上的兵士聯歡，進到一切戰綫上的兵士聯歡，從人們甘冒坐苦工監牢危險而用麵包穀同飢餓的德國無產者交換削筆小刀這種自發的聯歡，進到自覺的聯歡，——這就是已經顯現出來了的道路。

當我們把政權握到自己手裏時，我們就會制裁資本家，那時，就不是現在進行的這種戰爭了，因為戰爭底性質，要看進行戰爭的是哪一個階級來決定，而不是看紙上寫的什麼東西來決定。在紙上是隨便什麼都可以寫的。但是當資本家階級還在政府裏佔多數，那就不管寫的什麼東西，不管寫的如何漂亮，不管當總長的有多少幾乎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戰爭仍舊是帝國主義戰爭。這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見的。阿爾巴尼亞的例子，希臘和波斯的例子，已是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這點，所以我就很奇怪，爲什麼大家都攻擊我們的書面聲明（關於進攻問題的聲明書），却沒有人說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很容易就答應了擬定計劃，而對具體辦法却總是攔延下去。很容易就寫了不兼併的和平的宣言，但阿爾巴尼亞，希臘，波斯的例子却是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後發生的事咧。關於這些事件，在那並非我黨機關刊物，而是政府機關刊物，閣員機關刊物的人民事業報上寫着：窒殺希臘，這是對俄國民主制的侮辱。米留可夫，這個被你們當作什麼大人物看待，其實他不過是他們黨裏一個普通黨員，而與特勒青科沒有任何區別的人，連他也寫道，逼迫希臘的是協約國的外交。戰爭仍舊是帝國主義的，却不管你們多麼願意和平，你們對勞動者的同情多麼誠意，不管你們對和平的願望是多麼誠懇，——我完全相信，在羣衆中對和平的願望不能不是誠懇的，——你們還是無能爲力的，因爲除了繼續發展革命而外，決沒有其他方法能夠結束戰爭。俄國革命一開始，下層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也隨着開始。如果你們握取了政權，如果政權轉歸了革命機關

掌握來進行反對俄國資本家的鬥爭，那時別國的勞動者就會相信你們，那時你們就會能夠提議和平。那時我們的和平，至少從兩方面，從兩個精疲力竭，大勢已去的國家方面，就是說從德國和法國方面，可以有保障了。假令那時客觀情勢使我們必得進行革命戰爭，——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我們也不担保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那我們會說：『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如果革命階級握得政權，如果它真正排除了資本家對於施政方針的任何影響，使他們無法擴大那藉以獲得幾萬萬利潤的經濟破壞現象時，那我們是不會拒絕進行戰爭的』。革命政權會向所有一切國家底人民宣佈說，各國人民都應當是自由的，德國人民不得為保有亞爾薩斯和羅來因而戰，法國人民也不得為保持其殖民地而戰。因為法國如果為其殖民地而戰，那末俄國也有基發和布哈拉，這也是類似殖民地的區域，那時就會開始來瓜分殖民地了。怎樣去瓜分它們呢，按照什麼標準呢？按照力量。而力量已經是改變了的，資本家的狀況是除了戰爭外，則別無出路。當你們握得革命政權時，那你們就可以經過革命的道路來達到和平：向各國人民作革命的號召，拿你們的例子來解釋策略。那時，在你們面前就會展開用革命手段奪得和平的道路，你們就會極有可能使幾十萬人免於死亡。那時，你們就可以堅信德國和法國人民會擁護你們。那時，即令英美日底資本家想用戰爭來反對革命工人階級，但由於工人階級已把資本家制裁住，排除掉，並握得了監督權而已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即令英美日資本家想進行戰爭，百分之九十九證明他們是無法進行的。只須你們聲明說，你們不是和平主義者，你們將要保衛自己的共和國，保衛工人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而抵抗德法及其他國家資本家的侵犯，——只這一點，就足以保障和平了。

正是因此，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關於進攻問題的聲明書有莫大的根本意義。俄國革命全部歷史中的轉變關頭來到了。俄國革命開始

時，英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幫助了它，英國資產階級以為俄國是像中國和印度一類的國家。結果相反，除了現時由地主和資本家佔大多數的政府外，還出現了蘇維埃這個按其力量說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代表機關，而你們現在却以參加資產階級底聯合內閣來殘害它。結果相反，俄國革命使下層羣衆進行反資本家政府的革命鬥爭在一切國家中到處都獲得三倍的同情。目前擺着的問題是：不前進，便後退。在革命時期停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此，所以進攻是全部俄國革命底轉捩點，不是按這進攻在戰略的意義上說，而是按它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說。現在舉行進攻，便是繼續帝國主義的大屠殺，使幾十萬，幾百萬人爲室殺波斯及其他弱小民族——不管某個總長底意志與意識如何，客觀上是如此的——而死亡。使政權在貧農擁護之下轉歸革命無產階級，便是過渡到以最有保障的，人類歷史上最無痛楚的形式來進行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過渡到使革命工人在俄國和在全世界上都獲得政權和勝利（會場中一部份人鼓掌）。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舊曆十五和十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八十二和八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一七七至一八八頁。

論 口 號

在歷史的急劇轉變關頭，往往連先進的黨都在或多或少的長時間內不能理解新局勢而重複着舊的口號，這種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可是到今天已失掉任何意義，歷史之急劇轉變來得如此『突然』，舊口號也就這樣『突然』地喪失它的意義。

看來，全部國家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可以重演着類似這樣的情形。這個口號在我國革命這一去不返的時期中，即大約從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七月四日止的這個時期中曾是正確的。到現在，這個口號顯然已不正確了。不懂得這一點，便絲毫也不能瞭解現時各種迫切問題。每個口號都應當從一定政治局勢之一切特點底總和中得出來。而現時在七月四日以後的俄國政局，是與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這一時期中的局面根本不同的。

當時，在過去這一革命期間，國內有所謂『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無論在物質上或形式上都表現出國家政權不穩定的過渡狀態。不要忘記，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

當時政權處在動搖狀態中。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根據自願協定分掌着政權。蘇維埃是由不受外部任何強力壓制的自由羣衆和武裝工人兵士底代表團所構成的。武器在人民手中，沒有外部的強力壓制人民，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這就展開了並保證了整個革命有按和平道路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在這和平發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驟，即可以直接實現的步驟底口號。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而這種和平發展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的時期

是可能的，並且當然是最符心願的，可是到現在，這種發展已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顯然，並不是所有一切贊成『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的人都充分思考過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所謂和平發展，不僅在於當時（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個嚴重的力量能夠反抗和妨礙政權轉歸蘇維埃。不僅如此而已。當時和平發展之所以可能，還因為蘇維埃內部各階級間和各政黨間的鬥爭，在全部國家政權及時轉入蘇維埃掌握的條件下，是可以最和平而最無傷害地進行着。

人們對於後面這一點，也還沒有充分加以注意。蘇維埃按其當時的階級成份說來，是工農運動底機關，是工農專政底現成形式。如果蘇維埃握有全部政權，那末小資產階級階層底主要缺點，主要毛病，即對資本家的輕信態度，便會在實踐中消滅掉，便會為他們自己在設施中的經驗所糾正。執掌政權的各階級和各政黨之彼此更替，在蘇維埃獨掌政權和掌握全權的基礎上，是可能在蘇維埃內部和平進行的；一切參加蘇維埃的政黨與羣衆的聯繫，可能依樣是堅固而不致削弱的。必須時刻注意到，只有參加蘇維埃的各政黨與羣衆間這種最密切，而且可以自由擴展與加深的聯繫，才能促進着和平地消除這種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小資產階級幻想。政權轉歸蘇維埃的這一事實本身，還不會改變，而且也不能改變各階級的相互對比關係；它絲毫也不會改變農民底小資產階級性。但它會及時地大大促進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而接近工人，以至與工人聯合起來的事業。

如果政權及時轉歸了蘇維埃，這本來是很可能的。這就會對於人民最輕快，最有利益。這樣的道路會是最無傷害的，所以當時應當以最大的努力來爭取這一道路。可是現在這個鬥爭，這個為要使政權及時轉歸蘇維埃的鬥爭已經完結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已成爲不可能的了。開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七月四日轉變底意思，就是說，在這次轉變以後，客觀形勢急劇改變了。政權底動搖狀態停止了，政權在有決定意義的地方，已轉到了反革命手裏。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與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妥協基礎上，諸政黨關係的發展，使這兩個小資產階級黨成了實際上參加並幫助反革命屠殺的兇幫了。小資產者對資本家所抱的不自覺輕信態度，已使他們被各黨鬥爭進程推落到自覺擁護反革命者的地步。各黨關係發展底一個週期告終了。二月二十七日，各階級一同反對帝制。七月四日後，反革命資產階級與帝制派及黑幫份子攜手，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拉到自己方面，部分地用恐嚇手段嚇住他們，而將國家實際政權交給了卡芬雅克輩¹⁸，交給了在前綫槍殺抗命兵士，在彼得城摧殘布爾什維克的那個武人匪幫底手裏。

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現在聽起來會是一種癡人夢想，或者是故意嘲弄。這個口號客觀上會是欺騙人民，叫人民去幻想，似乎現在也是只要蘇維埃願意取得政權，或作出這樣的決議，就可獲得政權，似乎在蘇維埃裏還有某個政黨沒有因其幫助劊子手的行為所玷污，似乎可以把已有過的事實抹煞掉。

如果以為革命無產階級竟會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贊助過摧殘布爾什維克，贊助過在前綫上槍殺兵士和解除工人武裝的行為，遂實行什麼『報復』，而『拒絕』幫助他們去反對反革命勢力，那就是極端錯誤的想法。這樣提出問題，第一，便是把市儈的道德觀念加之於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只要有益於事業，不僅總是贊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而且也贊助大資產階級）；第二，便是——這是主要的，——企圖用『道德觀念』來模糊問題底政治實質的市儈手段。

問題底實質就在於，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權，現在已經是不能夠的了。只有進行堅決的鬥爭，戰勝現時真正擁有政權的人們，即是

戰勝那些依靠調入彼得城的反動軍隊，依靠立憲民主黨人和帝制派的武人匪幫、卡芬雅克之流，才能取得政權。

問題底實質就在於，能夠戰勝這些新掌握國家政權者的，只有革命民衆，而發展民衆運動的條件，則不僅要使民衆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且要使他們離棄那背叛革命事業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

誰把市儈道德觀念混入到政治問題中，那他便會議論說：就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擁護了解除無產階級和革命軍隊武裝的卡芬雅克輩是作了『錯誤』；可是應當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而『不阻難』他們去改正『錯誤』；使小資產階級較易於動搖到工人方面來。這樣的議論，如果不是對工人的新欺騙，也是孩童的幼稚見解，或簡單的蠢笨想法。因為小資產階級羣衆之動搖到工人方面來，正會表現於，而且只會表現於這些羣衆離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事實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現在只有宣佈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唐恩和拉啓特尼科夫爲劊子手們的幫兇，才能算是改正『錯誤』。我們完全無條件地贊成這種『改正』『錯誤』的辦法……

我們說過，革命底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現在應當補充一句，恰恰是歷次革命中隨時隨刻都有真正政權何在的問題被模糊起來，有形式上的政權與實際上的政權分離開來的事實。一切革命時期底主要特點之一，也就在這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人們不知道實際政權究竟在政府手裏，還是在蘇維埃手裏。

現在特別重要的，是使覺悟工人清醒地觀察觀察革命底根本問題：究竟目前國家政權是在誰的手裏。你試去想想政權底物質表現是什麼，且不把空話當作事實，那你不難答覆這個問題。

恩格斯寫過，國家首先就是武裝隊伍連同一些如像監獄之類的物質附屬物。在現時，這就是士官生和特別調入彼得城的反動哥薩克；這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拘禁在牢獄裏的人；就是那些封閉真理報¹⁰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一定部份兵士武裝的人；就是

那些槍殺同樣一定部份兵士的人，就是那些在軍隊中槍殺同樣一定部份軍人的人。這些劊子手，就是政權的實際掌握者。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是沒有政權的總長，是木偶總長，是幫助屠殺的政黨底領袖。這是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因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個人大概都『不贊同』屠殺，並不因他們的報紙怯懦地用遁辭推卸屠殺責任，而有所改變；這樣改換政治外裝的把戲，是不會改變問題實質的。

封禁彼得格拉十五萬選民底機關刊物，士官生因工人沃義諾夫從印刷局裏取出真理小報，便把他殺害（七月六日）的事實——難道這不是劊子手的行爲麼？難道這不是卡芬雅克輩底舉動麼？人們會說：無論政府也好，蘇維埃也好，對這事件『都是沒有罪過的』。

我們回答說：那這對於政府和蘇維埃就更壞了，因為這就是說，它們是零，它們是傀儡，實際政權不在它們手裏。

人民首先而且主要是應當知道真情，知道國家政權實際上是在誰的手裏。應當把全部真情告訴人民：政權是在一羣卡芬雅克之流的武人（克倫斯基，某些將軍和軍官等等）手裏，而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的資產階級之整個階級以及經過一切黑幫報紙，經過新時代，活言論等等報紙活動的帝制派都是擁護他們的。

應當推翻這個政權。否則，與反革命作鬥爭的一切詞句都是空話，都是『既欺騙自己，又欺騙人民』。

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總長們及其政黨，現在也是擁護這個政權的；必須向人民說明他們充當劊子手的作用，說明他們的黨在犯了四月二十一日，五月五日，六月九日，七月四日這些『錯誤』以後，在他們贊同進攻政策——這個政策已十分之九預決了卡芬雅克輩在七月的勝利——以後，就必不可免地弄成這樣的『結局』。

要把對人民的全部鼓動工作都加以改造，使鼓動工作估計到此次革命底具體經驗，特別是七月事變底具體經驗，就是說，要使鼓動工作明確指出武人匪幫，立憲民主黨人和黑幫份子是真的人民

公敵，要使鼓動工作肯定地揭露小資產階級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充當過並且還在充當着劊子手兇幫的作用。

要把對人民的全部鼓動工作都加以改造，務必說明，不推翻武人匪幫底政權，不澈底揭破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不把這兩黨在人民中的信任剝奪掉，則農民獲得土地的事業便全無希望。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常態』條件下會是很長期，很困難的過程，但戰爭和經濟破壞將大大地推進這種過程。這樣的『推進機』，可以使一個月，甚至一星期，就能等於一年。

反對上述言論的，大概會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是說，現在談堅決鬥爭，便是鼓勵零星發動，而零星發動就正會幫助反革命勢力；第二種是說，推翻反革命勢力，便仍然是使政權轉歸蘇維埃掌握。

我們對第一種反駁意見回答說：俄國工人已有充分的覺悟，不會在顯然不利的時機受人挑撥的。如果他們在現時實行發動和抵抗，便會是幫助反革命勢力，這是無可爭論的。進行堅決鬥爭，只有在廣大羣衆中湧起革命新高潮時才有可能，這也是無可爭論的。但只是一般地說革命高潮，革命高漲，西方工人底幫助等等這還不夠，必須從我國已往事實中作出一定的結論來，要估計到的正是我國的教訓。而從這種估計中所將得出的口號，正是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奪得了政權的反革命派。

第二種反駁意見，也是以極其普泛的議論來代替具體的真理。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外，沒有任何力量能推翻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正是革命無產階級，在有了一九一七年七月經驗以後，應當獨立地奪取國家政權，——不這樣，便決不能有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獲得貧農或半無產階級底擁護，——這就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們已經解答過，有些什麼情況能夠大大加速這一出路的到來。

蘇維埃可能而且一定會在這一新革命中出現，但不會是現在的蘇維埃，不會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機關，而會是同資產階級作革命

鬥爭的機關。到那時，我們也將主張照蘇維埃模型建設全部國家，這是一定不移的。這不是關於一般蘇維埃的問題，而是與現時反革命勢力，與現時蘇維埃底叛賣行為作鬥爭的問題。

用抽象的概念來代替具體的東西是革命中最主要的過失之一，最危險的過失之一。現時的蘇維埃塌台了，因為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佔據蘇維埃中的統治地位而使蘇維埃完全破產了。在目前，這些蘇維埃活像被牽去屠宰的，蹬在屠刀下咩咩地哀訴着的馴羊一樣。現在蘇維埃在已獲勝利並繼續勝利的反革命勢力之前軟弱無力，一籌莫展。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可以瞭解爲『簡單地』號召把政權轉交現時的蘇維埃，而如果這樣說，如果號召這樣做，那在現時便是欺騙人民。欺騙是最危險不過的東西。

俄國階級鬥爭和政黨鬥爭之發展，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的這一週期已經告終了。開始了新的週期，在這新週期中參加活動的，不會是舊的階級，不會是舊的政黨，不會是舊的蘇維埃，而會是由鬥爭火焰鍛鍊過，革新過，由鬥爭進程教練過，改造過的一切了。不要向後望，而要向前看。要運用七月事變後新的階級範疇和政黨範疇，而不要運用舊的範疇。要在新的週期開始時，拿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已經勝利了的事實作爲出發點，它之所以獲得勝利，是全賴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它妥協的政策，而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能把它打敗。在這新的週期中，無論達到反革命勢力的澈底勝利，或達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澈底失敗（不戰而敗），或達到新革命底新高漲，當然都會要經過許多不同的階段。可是，關於這點，只有以後，當這些階段分別顯現出時，才能具體來說…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三三五至三四一頁。

革命底教訓

一切革命都是廣大民衆生活中的急劇轉變。如果這樣的轉變沒有成熟，那末，便不能發生真正的革命。每個人生活上的任何轉變，都會使他學得很多東西，使他增加閱歷，體驗人生，而革命也是一樣，它使全體人民在短時期中得到最豐富最寶貴的教訓。

在革命時期中，幾百萬，幾千萬人在每星期中所學得的東西，要比平常夢昧生活的一年還多些。因為在整個人民生活急劇轉變的關頭，可以特別明顯地看見，人民中各個階級所追求的目的怎樣，它們擁有何種力量，它們用何種手段動作。

每個覺悟的工人，兵士，農民，都應當仔細地思考俄國革命底教訓，特別是現在七月末，當這顯見我國革命第一個階段業已挫折而終結的時候。

(一)

試來看看，究其實，工農羣衆進行革命時所力求獲得的是什麼？他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大家知道，他們所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麵包和土地。

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情形又怎樣呢？

不僅沒有自由，而且已開始恢復先前那種橫暴制度。對前綫士兵施行死刑，把自動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提交法庭懲辦，搗毀工人報紙底印刷所。不經法庭手續而肆行封禁工人報紙，往往甚至不提出任何罪名，或者提出顯係誣罔的罪名而任意逮捕布爾什維克。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懲辦布爾什維克並不是破壞自由，因為這只是按一定的罪狀懲辦一定的人。可是這種反駁顯然是故意撒謊，因為無論怎樣也不可以因某個人犯罪便搗毀印刷所和封禁報紙，就即令這種罪狀已經證實，已為法庭所確認了的話。假使政府認定整個布爾什維克黨，他們的方針，他們的觀點根本是違法犯罪的，那就是另一回事。可是誰也知道，自由俄國的政府曾不能這樣作，而且也沒有這樣作。

地主和資本家底報紙因布爾什維克進行反對戰爭，反對地主，反對資本家的鬥爭而加以瘋狂謾罵，並且當還沒有想出任何一個罪名來反對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時候，就已公然要求逮捕和懲辦布爾什維克，這便是揭破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罪名純係誣竊的主要證據。人民渴望和平，而自由俄國的革命政府，却根據從前沙皇尼古拉第二爲着俄羅斯資本家掠奪他族人民的利益而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那些秘密條約，又去進行侵略戰爭。這些秘密條約始終沒有公佈。自由俄國政府只是托詞推諉，至今沒有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正義的和平。

糧食沒有。飢荒又逼近起來。大家都看見，資本家和富人藉供給軍需品來全無心肝地詐騙國庫（戰爭現在使人民每天花費五千萬盧布），高抬物價，賺得空前未有的利潤，對於認真統計產品底生產和把產品分配給工人的事情，却一點也沒有作。資本家之強橫無理日益厲害起來，任意把工人拋出工廠，而且這還是當人民深感貨物缺乏的時候幹出的事。最大多數農民在多次代表大會上極明確地大聲聲明說，他們宣佈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不公道的，是搶劫。而以革命民主自居的政府，却一連數月欺騙農民，用約許和攔延來愚弄他們。資本家一連數月不讓切爾諾夫總長頒佈禁止土地買賣的法令。可是當這個法令終於頒佈了之後，資本家們便對切爾諾夫造謠

誣蔑，橫施攻擊，這種攻擊直到現時還在繼續。政府竟這樣卑鄙無恥地保護地主，甚至把農民提交法庭，懲辦他們『擅自』奪取的行爲。

欺騙農民，勸他們等待立憲會議。而資本家却又將這個會議底召集日期，再四遷延下去。現在因受布爾什維克要求的逼迫，只好把這個召集期指定在九月三十日，資本家又公然大叫大喊，說這是『辦不到的』短促期限，而要求延期召集立憲會議…資本家和地主政黨，『立憲民主』黨，即所謂『人民自由』黨中最有威信的黨員，如像帕寧娜，公然鼓吹把立憲會議底召集期推延到戰爭結束之後。

解決土地問題等到立憲會議，召集立憲會議等到戰爭結束，結束戰爭等到完全勝利。結論就是如此。資本家和地主既在政府中佔有多數，就公然欺侮農民。

(二)

試問在推翻了沙皇政權的自由國家裏，怎麼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國家中管理人民的，是未經任何人選舉的皇帝和一小羣地主，資本家與官吏。

在自由國家中管理人民的，只是那些由人民自己選舉出來擔任管理的人。在選舉時，人民分爲各個政黨，通常居民中每個階級都組成自己單獨的政黨，例如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各自組成單獨的政黨。所以在自由國家裏，人民底管理都是經過各政黨底公開鬥爭及它們之間自由協定來進行的。

自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推翻沙皇政權以後，俄國已成爲自由國家，在將近四個月中，管理正是經過各自由組成的政黨間之公開鬥爭，以及它們之間自由協定來實現的。因此，爲了瞭解俄國革命底發展，首先就要研究哪些黨是主要政黨，這些政黨所擁護的是哪些階級底利益，所有這些政黨相互間的關係又怎樣。

(三)

在推翻沙皇政權以後，國家政權轉到了第一屆臨時政府手中。這個政府是由資產階級代表，即資本家所組成，而與他們聯合的還有地主。「立憲民主」黨，即資本家底主要政黨，佔着首位，成爲資產階級底當權黨或執政黨。

政權落到這個政黨手裏，不是偶然的，雖然當時與沙皇軍隊作鬥爭，爲自由而流血的人，當然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和農民，水兵和陸軍兵士。政權之所以落到了資本家政黨手裏，是因爲這個階級擁有財力，組織力和知識力。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中，俄國資本家階級及與之聯合的地主在組織自己的事業上所獲得的成效最多。

立憲民主黨向來就是帝制黨，在一九〇五年是這樣，從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的時期中也是這樣。自人民戰勝沙皇暴政以後，這個政黨宣佈自己爲主張共和的黨了。歷史經驗表明，資本家底政黨，每當人民戰勝了帝制的時候，總是同意作一個贊成共和的黨，只要能保住資本家底特權及其對人民的無上權力。

立憲民主黨口頭上擁護『人民自由』，實際上是擁護資本家的，於是一切地主，一切帝制餘孽，一切黑幫份子，馬上就站到它那方面了。證明這一點的，有報紙刊物，有選舉中的事實。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以及所有黑幫派的刊物，在革命以後，都與立憲民主黨人採取同一論調。一切帝制黨不敢公開活動，在選舉時便擁護立憲民主黨，例如在彼得格拉便是這樣。

立憲民主黨人獲得政權後，便用一切力量去繼續進行強盜侵略戰爭，這個戰爭是那與英法資本家訂立了秘密強盜條約的沙皇尼古拉第二開始的。按這些條約的規定，答應俄國資本家在勝利時可以佔領君士坦丁堡，加里細亞和阿爾明尼亞等等。而對於人民，立憲

民主黨人政府則用空洞的遁詞和約許來敷衍了事，把工農所必需的一切重要事情，概行推到立憲會議去解決，却又不指定這個會議底召集日期。

人民利用自由，開始自動組織起來。佔俄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羣衆之主要組織便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在二月革命時已開始組織起來，而在二月革命幾星期後，在俄國多數大城市中以及許多縣份中，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一切覺悟先進份子，都團結在蘇維埃內了。

蘇維埃底選舉是完全自由的。蘇維埃是真正的民衆組織，即工農組織。蘇維埃是真正大多數民衆的組織。工人和穿軍服的農民都是武裝起來了的。

不言而喻，那時蘇維埃能夠而且應當把全部國家政權握到自己手裏。直到召集立憲會議時止，國內除了蘇維埃政權外，決不應有任何其他政權存在。只有這樣，我國革命才會成爲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這樣，真正力求和平，真正不願意進行侵略戰爭的勞動羣衆，才能開始堅決不移地執行那定可結束侵略戰爭而奠定和平的政策。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才能制裁那些『藉戰爭』大發橫財，而把國家弄到經濟破壞和飢餓境地的資本家。但是，在蘇維埃中，贊成革命工人政黨的，即贊成要求把國家政權轉交蘇維埃的社會民主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僅佔少數。蘇維埃中的多數代表都是贊成那反對把政權轉交蘇維埃的社會民主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這兩個政黨不但不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代之以蘇維埃政府，而且主張擁護資產階級政府和與之妥協，同它一塊組織共同的政府。多數人民所信任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一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就是革命從開始以來，在整整五個月中的全部發展進程底主要內容。

(四)

我們先來考查一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實行這種妥協的經過情形，然後來探討多數民衆信任他們的原因。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俄國革命所有各個時期中，都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資本家實行妥協的。

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當沙皇政府一被推翻，人民剛剛獲得勝利時，資本家底臨時政府就把克倫斯基當作「社會主義者」拉入政府組織中。其實克倫斯基從來也不是社會主義者，而只是勞動派底一份子，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才開始列名於「社會革命黨人」中，這在當時已經是沒有危險，而且是不無利益的了。克倫斯基當時是彼得格拉蘇維埃底副主席，資本家底臨時政府馬上就設法經過他來懷柔並馴服蘇維埃。蘇維埃，亦即在它裏面佔大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竟自甘馴服，當資本家底臨時政府一成立後，就立刻同意「擁護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諾言。

蘇維埃自認爲是檢查和監督政府行動的機關。蘇維埃底領袖建立了所謂「聯絡委員會」，即是與政府聯絡，與政府接洽的委員會。身居蘇維埃領袖地位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這個委員會中經常和資本家政府進行談判，老實說，就是充當不管部的閣員或非正式的閣員。

在整個三月間以及幾乎整個四月裏的情況，都是這樣。資本家運用推延支吾的手段，以圖贏得時間。資本家政府在這個時期中，沒有進行一個發展革命的多少嚴重的步驟。甚至對於自己的直接任務，即召集立憲會議一舉，都連半點也沒有作，沒有把問題提交各地，甚至還沒有成立負責籌備此事的中央委員會。政府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暗中復活那些由沙皇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搶劫分贓的國際條約，儘可能小心謹慎暗地來阻碍革命，什麼都答應，半點也不

執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聯絡委員會」裏當傻瓜，甘受甜言蜜語、約許和「明天」的款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好像一篇有名寓言中所說的那隻烏鴉，甘受虛榮奉承的誘惑，而高興地聽信資本家底花言巧語，說什麼他們非常尊重蘇維埃，非經蘇維埃同意，決不採取任何步驟。

實際上呢，時間一天天過去了，資本家底政府沒有幫助革命作半點事情。而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內却已恢復了秘密的強盜條約，正確些說，批准了這些條約，並與英法帝國主義外交家作同樣秘密的補充談判，使這些條約「活躍」起來。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個時期中，却已給作戰軍隊中將軍和軍官的反革命組織奠定了基礎（至少是使他們互相接近了）。爲了反對革命，它在這時期中却已開始把工業家，工廠主組織起來，這些人原是在工人逼迫之下不得已才再三讓步，但同時又開始對生產怠工（損壞生產），並準備一到適當的時機，便停止生產。

但組織先進工農於蘇維埃中的事業在不斷地前進着。各被壓迫階級中的優秀份子感覺到了，不管政府與彼得格拉蘇維埃怎樣訂有協定，不管克倫斯基如何花言巧語，不管建立有「聯絡委員會」，但這個政府始終是人民底敵人，革命底敵人。羣衆感覺到了，如果不打破資本家底抵抗，那末和平事業，自由事業，革命事業是必然會遭受失敗的。羣衆中的義憤和急不可耐的情緒，日益增長起來了。

(五)

這種義憤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便爆發出來。運動是自發而起的，誰也不會去準備它。運動非常激烈地反對政府，有一團人甚至武裝出動，走到瑪麗姬宮去逮捕內閣閣員。大家都已顯然明白，政府是不能支持下去的了。蘇維埃當時能夠（而且應當）握取政權而不遇到任何方面的絲毫抵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但沒有

這樣做，反而維持了正在倒台的資本家政府，又與政府妥協更加使自己陷入泥坑，而作出更加斷送革命的危害步驟。

革命之教育各個階級是非常迅速，非常澈底的，決非通常和平時候所可比擬。資本家組織得最好，在階級鬥爭和政治方面最有經驗，所以學會得最快。他們看見政府狀況已無法維持，就採用其他各國資本家在一八四八年後幾十年中所採用過的手段來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這種手段就是建立所謂『聯合政府』，即是由資產階級底代表和社會主義者中間的倒戈份子來組織共同的聯合內閣。

在自由及民主制與革命工人運動並存得最久的國家裏，如英法兩國，資本家曾多次運用這種手段，並獲得很大的成功。『社會主義的』首領加入資產階級底內閣後，總是成爲傀儡和木偶，成爲掩護資本家的屏幃和欺騙工人的工具。俄國『民主共和主義』的資本家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手段。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馬上就甘受愚弄，於是五月六日有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參加的『聯合』內閣，就成爲事實了。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中的傻瓜們歡天喜地，自鳴得意地沉醉於他們領袖入閣的榮耀光芒中。資本家高興得手舞足蹈，他們得到了『蘇維埃領袖』來作反人民的幫手，得到了這些人答應贊助『前綫進攻動作』，即是繼續進行原已停頓了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諾言。資本家知道這些首領是外強中乾，軟弱無能，知道資產階級方面關於監督以至組織生產，關於和平政策等等的諾言，是永遠也不會執行的。

果然如此。革命發展中的第二階段，從五月六日起至六月九日或十八日止，完全證實了資本家關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易受愚弄的打算。

當壁舍浩諾夫和斯科別列夫以花言巧語既騙自己，又騙人民，說什麼將要把資本家底利潤百分之百都奪來，說『資本家底抵抗已

經打破了』等等的時候，資本家却在繼續鞏固自己的勢力。在這一時期中，並沒有，也真是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制裁資本家。那些由社會主義者中的倒戈份子充當的關員，只是轉移被壓迫階級視綫的留聲機，而全部國家管理機關實際上仍保留在官僚（官吏）和資產階級手裏。大名鼎鼎的工業次長帕里琴斯基是這種機關底標本代表，對任何一個反對資本家的辦法都加以阻礙。總長們從事空談，一切仍如舊觀。

策烈鐵里總長更是資產階級時常用來反對革命的工具。當喀琅施塔得那裏的革命者竟敢於擅自撤換政府所委派的政治專員時，策烈鐵里就被派去『安撫』喀琅施塔得。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報紙上大肆造謠誣蔑，舉行惡意瘋狂的攻擊來反對喀琅施塔得，加它以希圖『脫離俄國而獨立』的罪名，用各種各樣的論調重複此種此類的荒謬無稽之談，來恐嚇小資產階級和庸夫俗子。被嚇倒了的愚鈍庸人中最標本的代表策烈鐵里，最『誠意』地陷入資產階級攻擊手段的圈套，最熱心地『剿撫』喀琅施塔得，而不瞭解自己是充當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奴僕。結果他成了執行與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作如下『妥協』的工具，就是喀琅施塔得的政治專員不應簡單由政府任命，而要由當地選出之後，經政府批准。從社會主義方面倒戈到了資產階級方面的關員們，也都花費時間來作這類可恥的妥協勾當。

凡是資本家關員所不能出面去替政府辯護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蘇維埃中，那裏便有『社會主義的』關員斯科別列夫，策烈鐵里，切爾諾夫等等出現（正確些說，是被資產階級派到那裏去的），而他們也就誠心執行資產階級的事務，拚命袒護內閣，替資本家辯護，用再三再四的諾言和百般等待的勸告來愚弄人民。

切爾諾夫總長特別奔忙地與其資產階級的同僚講交易：直到七月間，直到七月三四兩日運動後發生了新的『政權危機』時，直到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時，切爾諾夫總長始終都在忙於多益有趣和深

孚民望的事情，即忙於『勸告』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忠告他們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買賣。這禁止土地買賣一舉，在彼得城舉行的全俄農民代表大會（蘇維埃）上就已鄭重約許農民了。可是約許始終只是約許。切爾諾夫無論在五月或六月都不能實行這個約許，直到七月三四兩日革命浪潮自發而起，而同時又有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的事件之後，才使他有可能實行這個辦法。但就在那時，這個辦法也還是單弱無力，而不能使農民之爭取土地反對地主的鬥爭有嚴重的改進。

這時，對於在前綫上重新開始帝國主義強盜戰爭這一反革命帝國主義的任務，原來是遭人民痛恨的古契可夫所無法執行的，而新掛名的社會革命黨黨員，號稱『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克倫斯基却有聲有色、頗具成效地執行起來了。克倫斯基為自己的華麗詞句所沈醉，而那些把他當作小卒玩弄的帝國主義者又用甜言蜜語去恭維他，阿諛他，讚美他——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他誠心誠意向資本家服務，勸導『革命軍隊』來同意重新進行戰爭，以履行沙皇尼古拉第二與英法資本家訂立的條約，好使俄國資本家獲得君士坦丁堡和里沃夫，埃爾斯倫和達拉布松。

俄國革命從五月六日起至六月九日止的第二階段，就是這樣經過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勢力加強了，鞏固了，而在『社會主義者』閣員們掩護和擁護之下，就準備好了進攻，既反對外部敵人，又反對內部敵人，即是反對革命工人。

(六)

六月九日，革命工人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準備在彼得城舉行示威，使羣衆中繼長增高與無可遏阻的不滿和義憤能有組織地表現出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首領們既為與資產階級的妥協所糾纏，又為帝國主義的進攻政策所束縛，覺到自己在羣衆中喪失影響

而大起恐慌。興起了總的狂吠，反對示威，這次狂吠把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結合在一起。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導之下，並由於他們與資本家妥協政策的這一結果，小資產階級羣衆轉向於與反革命資產階級聯盟的形勢已完全確定，已萬分明顯。六月九日危機底歷史意義和階級意義就在這裏。

布爾什維克取消了舉行示威的決定，因為他們絕不願意在這時引導工人進行拚命的鬥爭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聯合勢力。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了多少保持一點在羣衆中的信任，不得不定於六月十八日舉行總示威。資產階級氣忿若狂，它正確地看清了，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動搖到無產階級方面的表現，於是決定用前綫上的進攻來麻痹民主派底行動。

的確，六月十八日使革命無產階級底口號，布爾什維主義底口號在彼得堡羣衆中獲得了燦爛驚人的勝利，而在六月十九日，資產階級和拿破崙主義者*克倫斯基就鄭重宣佈了正是於六月十八日開始的前綫進攻。

這次進攻實際上就是爲了資本家利益，反對絕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意志，而重新進行強盜戰爭。所以進攻就必然引起一方面大大加強沙文主義，並使軍權（因而也使政權）轉入拿破崙主義者的武人匪幫手中，另一方面就轉到實行以暴力對待羣衆，追究國際主義者，取消鼓動自由，逮捕和槍斃那些反對戰爭的人。

如果說，五月六日是用麻繩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綁到了資產階級底勝利戰車上，那末，六月十九日便是用鉄鍊把他們當作資本家底奴僕鎖住了。

*拿破崙主義（因法國兩個拿破崙皇帝而得名）是用以稱呼這樣一種政府的，這種政府利用資本家政黨與工人政黨彼此間極端尖銳的鬥爭，而努力裝作是非黨政府。其實這種政府是服務於資本家而最能用空言約許和小恩小惠來欺騙工人的。

(七)

羣衆底憤怒，由於重新進行強盜戰爭的結果，自然愈加迅速，愈加厲害地增長了。七月三四兩日，羣衆義憤爆發起來，布爾什維克曾企圖加以遏阻，他們對於這種爆發，自然應當努力賦予以最有組織的形式。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正如替資產階級服役而已被主人鎖住了的奴隸一樣，什麼都同意幹：同意把反動軍隊調進彼得城，同意恢復死刑律，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底武裝，同意實行逮捕，通緝，並不經法庭手續就封禁報紙。於是執政的資產階級所不能完全握取，而蘇維埃又不願握取的政權，就落到了拿破崙主義者的武人手裏，而立憲民主黨人和黑幫份子，地主和資本家自然是完全擁護這一匪幫的。

一級一級地往下滾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既踏到了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斜坡上，也就自然無可遏阻地一直往下滾到底。二月二十八日，他們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中答應有條件地擁護資產階級政府。五月六日，他們把資產階級政府從破產中拯救了出來，並同意舉行進攻，而甘願變作它的僕役和衛士。六月九日，他們與反革命資產階級聯合舉行造謠誣譏和瘋狂忿恨的攻擊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六月十九日，他們贊同重新開始了的強盜戰爭。七月三日，他們同意調來反動軍隊：這就是把政權澈底交給拿破崙主義者的開端。一級一級地往下滾去。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弄到這樣可恥的結局不是偶然的，而是歐洲經驗多次證明過的小業主，即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所造成的結果。

(八)

當然誰都看見過，小業主怎樣拚命掙扎，力圖『出頭』，做個真正的主人，掙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資產階級的地位。當資本主義還在統治的時候，小業主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或者自己進到資本家底地位（這是至多只有百分之一的小業主所能達到的），或者變為破產的業主，半無產者，隨後成為無產者。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它的首領們，都趨向於資產階級。這些首領總是用可能與大資產階級謀妥協的約許和担保來安慰自己的羣衆，結果最多也不過是在極短期內得到資本家對勞動羣衆中一小部份上層份子作微末的讓步；而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總是跟着資產階級的尾巴跑，成為資產階級之軟弱無力的附屬物，成為財政大王手裏的馴服工具。英法底經驗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俄國革命的經驗，當事變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及其所造成的深刻危機影響下而以非常速度發展着的時候，亦即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七月止這時期中的經驗，極鮮明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所說小資產階級不穩定的老真理。

俄國革命底教訓表明，勞動羣衆要想擺脫戰爭，飢荒和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鉄鉗，便只有與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完全斷絕關係，明白瞭解它們的叛賣作用，拒絕和資產階級作任何的妥協，堅決站到革命工人方面來。只有革命工人——如果他們獲得貧農擁護的話——才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實行無代價地奪取土地，達到完全自由，消除飢荒，打破戰爭，達到正義的堅固的和平。

尾 聲

這篇文章從內容上就可以看出是在七月底寫的。

八月間的革命事變完全證實了本文所述各節。隨後八月終發生的科爾尼洛夫暴動²⁰，造成了革命底新轉變，而向全體人民顯著地表明了，立憲民主黨人與反革命將軍聯合一起，力圖驅散蘇維埃和恢復帝制。這個革命新轉變底力量如何，它能否消除那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危害政策，這是不遠將來的事實就會表明出來的…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舊曆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刊載於工人報第八第九兩期上。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印成單行本出版。附有九月十九日(舊曆六日)所寫的尾聲。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三七三至三八八頁。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饑荒逼近

必至的災禍已臨到俄國頭上。鐵路運輸紊亂不堪，且日益解體，勢將完全停頓。供給工廠的原料和煤炭運輸行將停止。糧食運輸快要中斷。資本家故意和一貫對生產怠工（損壞，停閉，搗毀和阻碍生產），指望以空前的災禍來使共和國和民主制度，蘇維埃和一般工農團體陷於破產，促進帝制復辟和恢復資產階級地主的專政。

空前大規模的災禍和飢荒勢所不等地逼臨到頭上了。這在所有一切報紙上都已千番百次地說過。各政黨，各工兵農蘇維埃所通過的不可勝數的決議案也都承認，災禍難免，並已逼近眼前，必須拚命設法防止，人民必須『英勇努力』來挽救滅亡等等。

這一點是大家都談論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承認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決定了的。

可是絲毫的辦法也沒有採取。

革命已有半年，災禍逼臨得更近。大批工人失業。只要想想：國內百貨俱空，國家在有充裕糧食和豐裕原料的情形下，竟因產品缺乏和工力缺乏而感受着滅亡危險，——並且是在這樣的國家內，在如此危急的關頭，却造成了大批失業現象！際此革命（有些人稱之為大革命，可是暫時也許稱之為腐朽的革命要比較公正些）半年中，既有了民主共和制度，又有了許許多多傲然自稱為『革命民主』的團體、組織和機關，實際上却簡直沒有採取絲毫認真防止災禍，防

止飢荒的辦法，這還待證明麼？我們之臨近破產，愈來愈急，因為戰爭是不等待的，而它所造成之民衆生活各方面的紊亂狀態也就變本加厲起來。

其實，只要稍微加以注意，稍微思索一下，便足可相信，防止災禍和飢荒的辦法是有的，這種辦法是十分明瞭簡單，是完全可以實現，是民衆力量完全能夠做到的；其所以不採取這些辦法，只是因為，惟一是因為要實行這些辦法，就會觸犯一小羣地主資本家底空前利潤。

真的，可以担保說，在任何一個演說中，在任何派別報紙底任何一篇文章中，在任何會議或機關底任何一個決議案中，沒有不十分明白肯定地承認到防止災禍與飢荒的基本主要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規定產品生產和分配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任何浪費，一一加以節省。監督、監察、統計——這就是防止災禍和飢荒的首要辦法。這是不容爭辯而為衆所公認的。這也正是人們所不作的，其所以不作，是因為害怕觸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害怕觸犯他們用抬高物價和供給軍需品（而現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間接為戰爭『工作』）所獲得的空前無比的駭人利潤，亦即衆所共知，衆所共見，衆所驚駭喟嘆的利潤。

而國家方面竟沒有採取絲毫辦法來實行多少認真的監督、統計和監察。

政府之毫無作為

全國各處對國家施行的任何監督、監察、統計，以及實施這些辦法的任何嘗試，都經常地一貫地實行怠工。只有幼稚到了極點的人才不懂得，只有雙倍虛偽的人才假裝不懂：這種怠工是從何處發端，並且是用何種手段進行的。因為這種由銀行家和資本家所實行

的怠工，他們這種破壞任何監督、監察、統計的舉動，都是適應着民主共和政體，適應着『革命民主』機關底存在。資本家老爺們極高明地領會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本是一切贊成科學社會主義者都在口頭上承認的，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其友人一攀上總長次長等等高位之後，就立刻把它忘掉了。這個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體來代替君主政體是分毫也不觸犯資本主義剝削制底經濟本質，因而反過來說，只須把那保護資本主義利潤之神聖不可侵犯權的鬥爭方式加以改變，就可以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同樣順利地保持這種權利，亦如前此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一樣。

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對任何監督、統計、監察實行怠工的現代最新手段，就是資本家在口頭上『熱烈』承認監督『原則』及其必要（所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是一樣），不過主張這種監督的施行應該是『逐漸的』，按步就班的，『由國家調節的』。其實，這種好聽的詞句不過是用來掩蓋對監督的破壞，把它化爲烏有，變爲空中樓閣，掩蓋其以監督爲兒戲，而將任何切實認真的步驟都攔延不行，建立各種非常複雜龐大，毫無生氣的官僚監督機關而已，這些機關全以資本家底意志爲轉移，絲毫無所作爲，而且不能有所作爲。

爲了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們且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找出幾個證人來，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正是在革命頭半年內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參加過『聯合政府』，因此他們對於縱容庇護資本家的政策，對於資本家破壞任何監督的行爲，都要在政治上對俄國工農負責的。

在『革命』民主派所謂『全權』（莫開玩笑！）機關中最高機關之正式機關刊物中央執委（即全俄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發行的第一百六十四期上，登載有專司監督問題的專門機關底決議，這個專

門機關也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建立，並在他們把持之下。這個專門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在它的決議上正式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中央機關毫無作爲』，全係事實。

難道證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破產的證據，有比他們親手簽字的這個文件更好的麼？

還在沙皇制度時代，就已認定有調節經濟生活之必要，並已建立了一些負此責任的機關。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經濟破壞狀況繼長增高，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革命共和政府底任務，自始就認定是要採取嚴重堅決辦法來消除這種破壞現象。當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組成時，在五月六日發表的昭告國人的鄭重宣言中，曾約許負責施行國家監督和調節辦法。那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以及一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們賭咒發誓，說他們不只對政府行動負責，而且他們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全權機關』也在切實監視並檢查政府底工作。

從五月六日以後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在這長漫漫的四個月中，俄國因舉行帝國主義的荒謬『進攻』而葬送了幾十萬兵士，經濟破壞和災禍飛速地逼近起來，況且夏季時無論在水運方面，農業方面以及調查礦藏等等事業方面，都有作出許多成績的極大可能，——那知過了四個月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認說：政府所設監督機關『毫無作爲』！！

這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儼然以國家要人的態度，在現時（我作此論文時，恰當九月十二日民主會議²¹的前夜）高談什麼只要與工商業界的啓特、啓對奇輩²²，即梁布申斯基，布伯力科夫，特勒青科之流成立聯合政府來代替那與立憲民主黨人成立的聯合政府，便可挽救時局呀！

試問何以解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種可驚的盲目病呢？難道他們是些因極端愚鈍幼稚而不知道所作何事，自甘迷誤的政治

嬰孩麼？或者是他們佔據總長、次長、督撫、政治專員等等高位過多的事實，才必然產生一種特殊的『政治上』的盲目病麼？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可能發生一個問題，也許監督方法和辦法是一種極端複雜、困難、未經試驗、甚至是人所不知的事情吧？其所以久延未行，也許是因為立憲民主黨中，工商業者階級中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國家要人雖已汗流浹背、勞累半載來探求、研究、發現實行監督的辦法和方法，但是這個任務過於困難，所以才仍未解決吧？

真可嘆惜！竟有人把事情說成這樣，來努力蒙哄不識字和不開通的愚昧農夫以及那些輕信人言竟毫不留心考查的庸夫俗子。究其實，甚至沙皇政府，甚至『舊制度』，在建立軍事工業委員會時就已知道實行監督的基本辦法，主要方式和手段：即使居民按各種職業，工作目的，勞動部門等等聯合起來。可是沙皇政府因害怕居民聯合，所以極力設法限制，故意排斥這種衆所共知，輕而易舉，全可施行的監督方式與手段。

一切交戰國受到戰爭所造成的極端嚴重的困苦災難時，或多或少地受到經濟破壞和飢荒時，早已擬定，決定，採用，並已再三實驗過許許多多的監督辦法，所有這些辦法，幾乎總是歸結於把居民聯合起來，歸結於在有國家代表參加之下，在國家監察之下等等來建立或獎勵建立各種各類的團體。所有這些監督辦法都是衆所共知，千番百次地說過寫過了，各先進的交戰國所頒佈的關於監督的法律也已經譯成俄文，或在俄國報章雜誌上詳細記載過了。

假使我們的國家真想切實認真實行監督，假使它的機關不是因獻媚資本來而自陷於『毫無作為』的地步，那末國家只須一舉手之勞就可以從現有的極豐富監督辦法中找到已經知道，已經施行過的

辦法。這裏的唯一障礙，即爲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向民衆隱瞞了的障礙，始終是因爲實行監督就會暴露資本家底駭人利潤，就會損害這些利潤。

爲了把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實質上就是關於任何一個若願意挽救俄國，使其擺脫戰爭和飢荒的真正革命政府底政綱問題）解釋得更加明顯起見，且把這些最主要的監督辦法列舉出來，逐一加以考查吧。

我們會看見，政府如果不只是以革命民主的稱號來引人發笑，那它只須在其成立的最初一星期中，頒佈實施最主要監督辦法的法令，規定認真而嚴重的懲罰辦法來處分那些用欺騙手段迴避監督的資本家，並號召人民自己來監視資本家，監視他們是否誠實執行關於監督的法令，——這就足能使監督制早已在俄國實現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監督辦法：

（一）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由國家監督它的營業，或實行銀行國有。

（二）把各個新迪加，即資本家底最大壟斷公司（糖業，煤油業，煤業，冶金業等等的新迪加）收歸國有。

（三）取消營業秘密。

（四）強迫工業主，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新迪加化（即是強迫他們合併爲各種組合）。

（五）強迫人民聯合於各種消費協社中，或獎勵這種聯合並監督之。

且來把這些辦法逐一加以考查，看看在用革命民主手段來實行的條件下究有何種意義。

銀行國有

大家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底中心，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系統底神經中樞。談『調節經濟生活』而避開銀行國有的問題，這就無異是暴露自己絕頂愚昧無知，或者就是以華麗詞句和漂亮約許來欺騙『老百姓』，而預先立意不執行這種約許。

監督並調節糧食底運載，或者監督並調節一般產品底生產和分配，若不監督和不調節銀行營業，便是荒謬可笑。這好像是提取偶然賺得的『幾個哥比』，而不理會那成百萬盧布的橫財。現代銀行已與商業（糧食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不『干預』銀行，便絕對不能作出絲毫認真，絲毫『革命民主』的事情。

然而，也許這種由國家『干預』銀行的事情是一種非常困難複雜的手續吧？人們通常都是努力以這種情景來恐嚇庸夫俗子，而努力這樣作的，當然是資本家及其衛士，因為這對於他們是有利的。

其實，銀行國有絕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絕對沒有任何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困難，而僅僅是被極少一些富人底卑污貪慾底利益所阻撓。銀行國有其所以常常被人與沒收私產混為一談，是由於那些利於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報紙故意散佈這種混淆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銀行所操縱的那些集中於銀行裏的資本底所有權，是有印刷的和書面的字據為之證明的，這些字據就叫做股票，債券，期票，收條等等。在實行銀行國有時，即是把所有一切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時，這些字據一個也不會作廢，一個也不會改變。誰按儲蓄券擁有十五個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他仍舊是十五盧布的所有者，誰擁有一千五百萬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也仍然享有由股票，債券，期票，貨物證等等所表現的一千五百萬盧布。

那末銀行國有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就在於對各單個銀行及其營業，即無法實行任何真正的監督（縱令取消了營業秘密等等），因為無法察覺在編製決算時，在建立空牌企業和分行時，在使用冒名人等等時所採取的一切極複雜，極紛繁，極狡猾的手段。只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為一，——這種合併的本身絲毫也不改變私有財產關係，重說一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任何一個哥比，——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監督，當然要在施行上述其他各種辦法的條件之下。只有實行銀行國有，才可以使國家知道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盧布往來流通的處所，以及這種流通是怎樣發生和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只有監督銀行，監督這個資本主義流通過程底中樞及其主要軸心和基本機構，才可以不僅口說，而且真正辦好監督全部經濟生活，監督重要產品生產和分配事宜，才可以辦好『調節經濟生活』的事情，否則，這種事情必然始終會是關部欺騙老百姓的空話。只有在把各個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的條件下，實行監督銀行營業，加上施行往後那些容易實現的辦法，才可以辦好真正徵收所得稅，不致有隱瞞財產和收入的事情，至於現在的所謂所得稅，其最大部份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實行銀行國有，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使銀行經理和職員自己來執行。並不需要由國家方面設立任何特殊機關和採取任何特殊準備步驟，這個辦法正是用一道命令，『一舉手』就可以實現的。因為既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債券等等的程度，那它就恰巧造成了實行這種辦法的經濟上的可能性。這裏剩下的事情只是統一簿記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國家決議立刻用電報通知，在每個城市中召集銀行經理職員會議，在每省和全國範圍內召集他們的代表大會，以便立刻把各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那末這一改革在幾星期內就可以辦好。自然正是那些經理和高級職員將要設法抵抗，極力欺騙國家，故意攔延等等，因為這班老爺們會喪失他們收

入特別優裕的位置，會喪失其獲利特別豐厚的欺詐營業的可能；全部實質就在於此。可是合併銀行的事情，並不會有絲毫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國家政權不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即是不害怕打破一切因循慣習），不只在口頭上是民主的（即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不是保護一小羣富人底利益），那末只須發佈一道命令，以沒收財產和監禁來懲治那些稍敢延擱和企圖隱瞞文據、賬目的銀行經理，董事和大股東；只須——舉例說——把貧窮職員單獨組織起來，並對於凡是揭發富人方面底欺騙和延擱行爲者均給以獎金，就可以極順利極迅速地把銀行國有事業實行起來。

銀行國有對於全體人民，特別是對於農民和小工業者大眾，而不是特別對於工人（因為工人很少與銀行有來往），是會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勞動力方面的節省會是不可計量的，假定國家保存銀行原有職員數量，那末，這就會是向普遍利用銀行方面，向廣泛增加分行數目，擴大銀行營業大眾化方面等的莫大進步。正是對於小業主，對於農民說來，信貸之大衆化及簡易化，將大大增長起來。而國家方面就第一次有可能起初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營業，而不會有任何隱匿，其次就監督這種營業，然後就調節經濟生活，最後就獲得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的巨款來進行巨大的國家設施，並不要因所謂『中介』而付給資本家老爺們巨大的『酬勞』金。正是，而且只是因為如此，所以一切資本家，一切資產階級教授，整個資產階級，以及所有替它服務的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涎沫直噴地拚命力爭，反對銀行國有，臆造出無數遁詞來反對這個最容易而最迫切的辦法，其實甚至從『國防』觀點，即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辦法也有莫大的優點，它可以大大提高國家底『軍事實力』。

這裏也許會有人反駁說：那末，何以如像德美這樣先進國家實行了極好的『調節經濟生活』辦法，而沒有想實行銀行國有呢？

我們回答說：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雖有君主民主之別，可是兩者

都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是帝國主義的。它們既然是這樣的國家，所以在實行其所必須的改革時，就採用反動官僚的方法，而我們在這裏說的，則是革命民主的方法。

這個『小小的差別』確有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差別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這個名詞在我國（特別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裏），幾乎成了一句口頭禪，如像『謝謝上帝』一語，就是那些並非愚昧無知得相信上帝的人也常說的，又如像『可敬的公民』一語，有時甚至用來稱呼那些在書報或統一報上的撰稿人，雖然幾乎人人都可猜到這些報紙是由資本家爲了自身利益而創辦而維持的，因而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參加這些報紙，本來是少有『可敬』的地方。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這個名詞當作鋪張的詞句，當作流行套語來用，而思考它的意義，那末要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就要真正顧及大多數民衆底利益，而不是少數人底利益；要做一個革命者，就要最堅決最無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過時的東西。

據我們所聽見的，無論在美國或德國，無論是政府或統治階級，都不覬覦『革命民主』這個稱號，而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却覬覦這個稱號（其實是污辱這個稱號）。在德國一共只有四個有全國意義的私人大銀行，在美國只有兩個：這些銀行中的財政大王覺得在實行聯合方面較爲容易，較爲方便，較爲有利的，是用私下、祕密、反動手段，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是用官僚手段，而不是用民主手段，這樣就可以收買官吏（這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成了通例），保存銀行底私有性質，而這正是爲了保持營業祕密，正是爲了從國家方面榨取千百萬『額外利潤』，正是爲了保障能在財政方面來幹種種欺詐把戲。

無論美國或德國，其『調節經濟生活』的方式都是給工人（和一部份農民）造成軍事苦工營，給銀行主和資本家造成天堂。這些

國家的調節辦法就在於使工人『緊張』到挨餓地步，而（用祕密，反動官僚手段）保障資本家獲得比戰前還高的利潤。

這樣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國主義的俄國也完全可能；而這一方式也就不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輩實現着，並且也由克倫斯基協同特勒青科，涅克拉索夫，伯爾納茨基，普羅科坡維奇之流實行着，後面這班人也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掩護銀行之『不可侵犯性』，及其獲得駭人利潤的神聖權利。不如說句真話吧：人們是想在共和制度的俄國用反動官僚的方式來調節經濟生活，可是由於有『蘇維埃』存在，『常常』難於實行，第一個科爾尼洛夫會想驅散蘇維埃而沒有成功，可是第二個科爾尼洛夫又會努力設法驅散它的…

這才是真話。這句雖則苦辣，却很簡明的真話，對於啓迪民衆方面，要比說什麼『我們的』，『偉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好聽的騙詞有益得多…

* * *

銀行國有，就會大大促進同時實現保險事業的國有，即是把一切保險公司合併爲一，集中它們的活動，由國家加以監督。在這裏，保險公司職員代表大會，也可以把這種合併立刻實施而不會有何種困難，只要革命民主國家下令這樣辦，並嚴令各保險公司底各個經理和大股東務須負責毫不遲延地實行這種合併就行了。資本家投在保險事業方面的資金有幾萬萬，全部工作都是由職員進行的。把這一事業合併起來，就可以減低保險費，使一切保險者獲得極大的便利，並減輕他們的負擔，可以在原有人力和資金的條件下擴大這種業務底範圍。除了極少一些收入豐裕者的因循慣習和私利目的以外，決沒有任何其他的情況能阻碍這種改革，加之這種改革又能提高『國防力』，節省國民勞動，展開許多有極嚴重意義的真正『調節經濟生活』的可能，而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新迪加國有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國民經濟體系的區別，就在於它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極密切聯繫與相互依賴。要是沒有這一點的話，則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會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的。由銀行統治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這種互相依賴性引伸到了極點。銀行和各巨大工商業部門已緊密結合而不可分離了。這在一方面就是說，不實行由國家壟斷工商業新迪加（糖業，煤業，鉄業，煤油業等等新迪加）的步驟，不把這些新迪加收歸國有，而單把銀行收歸國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這就是說，要認真實行調節經濟生活，就須同時把銀行和新迪加一概收歸國有。

且拿糖業新迪加來作例證吧。這個新迪加還在沙皇時代即建立起來，那時就已將許多設備得極好的工廠合併為一個極大的資本主義組合，這種合併自然全是按照最反動的官僚方式實行的，它保障資本家獲取駭人聽聞的利潤，而使工人和職員處於絕對無權，卑賤，萎靡，奴隸的地位。那時國家就已實行監督並調節生產，以便使財閥和富豪獲得利益。

這裏要做的事情，只是頒佈一個召集職員、工程師、經理、股東底代表大會，實行統一會計，由工會實行監督等等的簡單命令，來把反動官僚的調節變為革命民主的調節而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實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事實上仍保留着按反動官僚方式調節糖業的辦法，一切都仍舊：濫費國民勞動，因循守舊，讓波布林斯基和特勒青科輩大發其財。要號召民主派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官僚，要號召工人和職員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糖業大王」，這就是能夠而且應當在幾天內一舉作成的事情，——只要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用恰恰是與這班糖業大王實行「聯合」的計劃來蒙蔽人民意識；並且恰

恰是由於這樣與富人聯合，其結果就使政府在調節經濟生活方面『毫無作爲』的現象，成爲絕對不可免的了*。

再拿煤油業來看吧。先前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已把煤油業大規模『社會化』了。兩三個煤油大王——這就是操縱幾百萬以至幾萬萬資金，專剪息票爲生，而從那在實際上、技術上、社會意義上，都已經是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並已經是由幾千幾百職員和工程師經營的『業務』中獲取驚人利潤的人。煤油工業國有是可能一舉而而成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國家所應該做的事情，特別是當國家遭受着極大的危機，無論如何都要節省國民勞動，增加燃料生產的時候。當然，官僚式的監督在這裏不會有絲毫結果，不會絲毫改變情況，因爲『煤油大王』無論對付特勒青科輩也好，克倫斯基輩也好，亞甫克森鉄夫輩也好，斯科別列夫輩也好，都如同對付沙皇總長一樣的容易，而對付的方法就是推延、支吾、約許，以至直接和間接收買資產階級報紙（這就是所謂『社會輿論』，而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鉄夫之流正是『重視』這種『輿論』），收買官吏（即由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鉄夫輩留在不可侵犯的舊國家機關中舊位置上的官吏）。

要想作點認真的事情，就必須從官僚制過渡到民主制，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來實行這種過渡，就是說，要向煤油大王和股東們宣戰，發佈命令：如果他們推延煤油業國有事業，隱瞞收入和賬目，對生產怠工，不採取辦法提高生產的時候，即行沒收他們的財產並處以徒刑。應當喚起工人和職員底首創精神，立刻召集他們來舉行會議和代表大會，當他們建立了周到完備的監督制並增加了生產時，便把一部分利潤撥給他們所有。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立刻實行了這種革命民主的步驟，那末世界上燃液蘊藏最豐富國家之

* 當我寫到這裏時，我在報紙上看見克倫斯基政府宣佈實行糖業壟斷，自然是按反動官僚的方式來實行，而不召集職員和工人代表大會，不昭告大眾，不制裁資本家！！

一的俄國，就可能在夏季內利用水運，在供給人民以必需數量燃料的事業上作出很多成績。

無論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都是什麼事情也沒有作，僅僅玩了一套官僚主義的改良把戲而已。一個革命民主的步驟也不敢採取。煤油大王如故，因循停滯如故，工人和職員對剝削者的怨恨如故，在這基礎上產生的場合現象如故，濫費國民勞動如故，一切都如在沙皇時代一樣，所改變了的，只是『共和國』秘書廳收發文件上的印信而已。

煤炭工業所具有之技術上、組織上實現國有的『現成』條件並不薄弱些，那班掠奪人民的強盜，即煤炭大王在管理上的無恥程度也並不輕微些；在這裏，我們看見有工業主公然怠工，公然損壞設備，公然停止生產等許多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連孟什維克的內閣機關刊物工人報都承認這些事實。結果怎樣呢？也是連什麼也沒有作，僅僅舉行了幾次由工人和煤業新迪加中強盜們各派『半數』代表參加的舊時反動官僚式的會議而已！！沒有採取任何革命民主步驟，沒有絲毫企圖建立唯一切實的監督制，即從下面由職員工會，由工人，用恐怖手段對待那班危害國家、停止生產的煤炭工業主的辦法來實行的監督制！怎麼可以這樣作啊，我們『大家』不都是主張建立如果不是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便是與工商業界聯合的『聯合政府』嗎，而聯合政府的意義也就是把政權留在資本家手裏，讓他們橫行無忌，讓他們阻碍事業，把一切都壓到工人頭上，加緊經濟破壞，這樣來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的叛亂！

取消營業祕密

若不取消營業祕密，則監督生產和分配的辦法，不是仍舊成爲只供立憲民主黨人用來愚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又用來愚弄勞動階級的空洞約許，便是這種監督只

有用反動官僚的方法和手段才可實現。不管這一點對於凡屬沒有成見的人都是如何明顯，不管真理報主張取消營業秘密如何堅決（替資本服役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封禁真理報，大半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但我們的共和政府以及『革命民主派全權機關』還是絲毫也沒有去想想這一實行真正監督的首要步驟。

這裏正是實行任何監督的關鍵。這裏正是那搶劫人民並對生產怠工的資本底致命處。正因為如此，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就害怕觸及這個地方。

資本案所通常提出，而為小資產階級不加思考地重複着的理由，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一般地絕對不容許取消營業秘密，因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個別企業對市場的依賴，使得必須保持商業簿計和商業週轉——當然銀行週轉也在內——之『神聖不可侵犯權』。

凡是這樣或那樣重複這種理由或類似這種理由的人，都是自甘受欺，又以之欺騙人民，都是閉眼不看現代經濟生活中兩個衆所共知的極重大的基本事實：第一個事實就是大資本主義，即銀行、新迪加、大工廠等等經濟底特點。第二個事實就是戰爭。

到處都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恰恰根本排除那保持營業秘密的合理性，使它成為虛偽，成為只是掩蓋財政欺詐行為和使大資本獲得駭人利潤的工具。大資本主義經濟，單按其固有的技術本性來說，就已是社會化的經濟，即是它為千百萬人而工作，並以其營業來直接間接地聯合着幾百、幾千以至若干萬的家庭。這並不是那種小手工業經濟或中農經濟；這兩種經濟完全無所謂商業簿記，所以取消營業秘密也與它們無關！

在大經濟中，其營業情形反正有幾百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持營業秘密的法律在這裏並不是為了滿足生產或交換上的需要，而是用來掩蓋投機和極不正當的謀利方式，掩蓋公然欺詐的行為，大家

知道，在股份公司中，這種欺詐行爲是特別流行，是用足以欺騙大眾的偽造賬目和決算書辦法來特別巧妙地掩蓋着的。

在那些生產本身沒有社會化，還是零碎分散的小商品經濟中，即在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中，還可說保持營業祕密是必不可免的，而在大資本主義經濟中保持這種祕密，便是保持極小一羣人底特權和利潤而反對全體人民的利益。既然規定了股份公司必須公佈賬目的制度，那就是說，法律也承認了上述這個事實，不過這種監督——這是在一切先進國家以及在俄國都已在實現着的——正是反動官僚式的監督，這種監督並不讓人民看清真象，不讓人民知道股份公司營業底全部真情。

在這裏，若按革命民主方式來作，就應立刻頒佈另一種法令，取消營業祕密，着令大企業和富人公佈最完備的賬目，讓任何一部份在民主意義上說來有充分數量（譬如一千或一萬選民）的公民，都有權審查任何一個大企業底一切文據。這樣的辦法只須頒佈一道命令就完全可能而容易實行起來；只有這個辦法才會開展民衆監督的首創精神，經過職員協會，經過工人工會，經過一切政黨來實行；只有這個辦法才會使監督成爲認真的和民主的事業。

此外還要加上戰爭這點。絕大多數工商企業現在不是爲『自由市場』工作，而是爲的供給國庫，供給戰爭。所以我在真理報上說，那些用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的理由來反對我們的人是撒謊，是加倍的撒謊，因爲這裏所說的，不是要現在立刻直接施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揭發盜竊國款的事實。

『供給戰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即直接間接與供給軍需品有關的經濟）乃是有系統的，法定了的盜竊國款行爲，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連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反對取消營業祕密，也就表明他們不過是盜竊國款的幫辦和庇護者。

戰爭使俄國現在每天耗費五千萬盧布。這個每天五千萬的數

目，大部分都是付給軍需品供給者。在這五千萬中至少每天有五百萬，也許有一千萬以至更多的數目成了資本家和多少與之勾結的官吏們底『正當收入』。特別是那些貸款去經營軍需品供給事業的大公司和銀行，在這裏賺得了空前未聞的利潤，這正是用盜竊國款的方法來發財，因為對於這種乘戰爭災難的『機會』，乘幾十萬、幾百萬人死亡的『機會』來欺詐人民和掠奪人民的行爲，決不能給以另一種稱呼。

關於這種從軍需品供給事業中獲得駭人聽聞的利潤的情形，關於爲銀行所隱匿了的各種『保證信件』，關於利用百物騰貴發財的是些什麼人等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這是『社會人士』都用嘲笑態度談論着的，甚至那些照例把『不快意的』事實隱瞞不說，把『困難』的問題迴避不談的資產階級報紙都對這點也有不少的個別明確指陳。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說，大家都忍受，大家都容忍那專說『監督』『調節』等漂亮話的政府！！

革命民主派，如果他們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義者，那他們就會立刻頒佈法令，取消營業祕密，責成軍需品供給者和商人公佈賬目，禁止他們任意行動，非得政府允許，不能放棄其所經營的業務，用沒收財產和槍斃*的辦法來懲治那些隱瞞與欺騙民衆的人，組織自下的檢查和監督，即由人民自身，由職員協會、工會以及消費者團體等等用民主方式從下面來實行檢查和監督。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足配稱爲嚇慌了的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重複着所有那些嚇慌了的市儈們的話，說什麼採用『過嚴』辦法時，資本家就會『逃走一空』的，說沒有資本家，『我們』就會幹不好，說也許英法百萬富翁也會因之

*我有一次已在布爾什維克刊物上指出過，只有當剝削者用死刑來對付勞動羣衆藉以維持剝削制時，才能承認反對死刑的理由正當。不用死刑來對付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恐怕是任何一種革命政府都行不通的。

『見怪』，而他們是『贊助』我們的咧，諸如此類等等。竟令人覺得，似乎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見的辦法，從來沒有試行過的『烏托邦』，其實早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在法國就有那些真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真相信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性的戰爭，真是依靠誠意相信此種辦法的民衆的人們，已善於建立對富人的革命監督，並達到舉世傾服的結果。而在這一百二十五年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造成了銀行，新迪加，鐵路等等等，就使工農對剝削者，對地主資本家實行真正民主監督的辦法容易百倍，簡單百倍了。

按實質上說，關於監督制底全部問題都歸結於誰監督誰，即哪一階級是監督階級，哪一階級是被監督階級。直到現在，在我們共和制的俄國，在所謂革命民主派『全權機關』參加之下，仍舊承認地主和資本家為監督者，仍舊讓他們為監督者。結果就必然造成了激起民衆公憤的資本家盜劫行為，以及資本家用人工方法支持着的經濟破壞現象。應當不怕打破舊事物，不怕大胆建設新事物，應當堅決徹底地實行由工農對地主資本家的監督。而這却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害怕得要死的事情。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強迫實行新迪加化，例如，強迫把工業主合併於組合中，是在德國早已實行了的。這裏絲毫新東西也沒有。這裏，由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罪過，又使共和制的俄國完全停滯不振，這些不名譽的政黨竟在此時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和布伯力科夫輩，或者和特勒青科及克倫斯基跳起雙人舞來『款待』俄國。

強迫新迪加化，一方面是一種由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這種發展到處都使階級鬥爭組織起來，使組合數目增加，式樣

紛繁，意義增長。另一方面，強迫『組合化』是任何一種多少認真的監督辦法和任何一種節省國民勞動辦法之必要的先決條件。

例如德國法律責成同一地方或全國的皮業工廠主合併為一個組合，而且由國家派代表參加這個組合的董事會，以實行監督。這種法令絲毫不直接——即就法令本身而言——觸動私有制關係，不剝奪任何私有者的一個哥比，並且還沒有預決到，究竟這種監督會用反動官僚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還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

這種法律可以而且應當在我國立刻頒佈，決不要荒費一個星期的寶貴時間，而要讓社會環境本身去解決實行法令的更具體的形式、速度、及監察方法等等。爲了頒佈這樣的法律，國家並不需要什麼特設機關，什麼特別研究，以及任何預先調查，只須有決心與那些『不慣受』這種干預，不願意喪失額外利潤——保障這種額外利潤的，除了毫無監督狀態外，還有照舊法擅自經營的情形——的資本家底某些私人利益斷絕關係而已。

爲了頒佈這樣的法令，並不需要任何機關，任何『統計』（切爾諾夫想用它來代替農底革命首創精神），因爲這種法令的實行，應當責成工廠主或工業主自身，責成現有的社會力量來作，並由這些現有的社會（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來加以監督，不過這種社會力量一定要是屬於所謂『下層等級』，即屬於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這些階級按其能作英勇舉動，能作自我犧牲，能遵守同志紀律方面來說，在歷史上總是表現得比剝削者高得無可比擬的。

假定說我國有真正革命民主政府，假定它決議要每個生產部門中凡是僱用有——舉例說——兩個工人以上的工廠主和工業主都必須聯合於縣組合和省組合之中。切實執行法律的責任，首先加之於工廠主、經理、董事、大股東（因爲所有這些人都是現代工業底真

正首領，真正主人）身上。如果他們規避立刻執行法律的工作，便認作是逃避軍役而以軍法治罪，實行連環保，各自以其全部財產為担保，一人有罪，大家負責，大家有罪，各人分担。其次，要一切職員也擔負執行這個法律的責任，務使他們也組織為一個團體，再就是一切工人及其工會也要擔負這個責任。『組合化』底目的，就是要樹立最完備、最嚴格和最詳細的賬目報告制，而主要是在購買原料，推銷產品，節省國民資金和勞力方面實行聯合營業。這種節省，在把各自分立的企業聯合為一個新迪加時，就會達到極大的規模，經濟學上是這樣指示，而一切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的例子也是這樣說明的。我要再重述一遍，這種合併為一個新迪加的辦法，其本身是一點也不會改變私有制關係，不會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這一情況其所以必得再三着重指出，是因為資產階級報紙經常『恐嚇』中小業主，說什麼一般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想『剝奪』他們的財產；這種說法顯係撒謊，因為社會主義者甚至在完全社會主義革命時也不想剝奪，也不能剝奪並且也不會剝奪小農財產的。而我們所常說的，始終只是那些要立刻實行的最迫切的辦法，這些辦法已在西歐實現了，凡是多少澈底的民主派都應當立刻把它在我國實現起來，以便防止已經逼臨的難逃災禍。

如果要將極小業主和小業主合併為各種組合，那就無論在技術上或組織上都會遇到嚴重困難，因為他們的企業零散不堪，技術極為簡陋，業主本人又不識字，或不開通。然而正是這些企業可以不包括在此項法律之內（在我們上面假設的例證中已經指出這點了），縱令不把他們合併，更不用說合併較遲，也不會造成什麼嚴重障礙，因為數量極大的小企業在生產總量中的作用，對於整個國民經濟上說來都是微小不足道的，除此而外，它們常是或多或少依賴於大企業的。

有決定意義的只是大企業，在這裏已具備有實行「組合化」之技術上組織上的資料與人力，其所缺乏的，只是革命政權爲了發動和運用這些人力和資料，而須嚴厲無情地去對待反革命勢力的這種堅強、堅決首創精神。

國家愈缺乏通曉技術的人材以及一般智識幹部，就愈加迫切需要儘可能迅速，儘可能堅決地下令實行強迫合併，而且首先要從最大企業和大企業開始，因爲正是合併才可以節省智識幹部，才有可能完全利用並更正確地分配這些幹部。如果甚至在沙皇政府之下，俄國農民在其窮鄉僻壤，也能於一九〇五年後，戰勝沙皇政府所造成的千百障礙，而在建立各種組合事業上大進了一步，卅末大工商業和中等工商業的合併，當然可以在幾個月內實現，或者還要實現得更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政府憑靠着「下層」民衆，民主勢力，即職員工人之擁護、參加、同情及其利益興趣，強迫這樣做，並號召他們起來實行監督就行了。

調節消費

戰爭迫使所有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都實行了調節消費的辦法。麵包證問世了，而且成了通常的現象，接着又有其他各種購物證出現。俄國亦非例外，也施行了麵包證制。

然而，正是利用這個例子，我們也許可以最明顯地來把防止災禍的反動官僚辦法與革命民主辦法作一比較，前者力求以最低限度的改造爲限，而後者爲了不褻瀆自己的稱號，就應當認定自己的直接任務，是用強力與一切老舊過時的東西斷絕關係，並儘快地促進運動前進。

麵包證制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調節消費的主要標本辦法，其目的，其任務，只有一點（至多也只是實現這一點）：就是分配現存食糧，使大家夠吃。規定了最高消費額的，遠不是所有一切東

西，而只是主要的『大衆』食品。不過如此而已。再不關心別的事情了。用官僚方式計算現有的存糧，把它按人口分配一下，規定每日糧額，把它實行起來就完事。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因為這些東西『橫豎』很少，這些東西『橫豎』很貴，『大衆』是買不起的。所以毫無例外地在所有交戰國中，甚至在德國，在這個可以說無疑是最準確、最精密、最嚴格調節消費的模範國家裏，我們都看見富人經常規避任何消費『額』的法律。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家』都帶譏笑態度說着，並且在德國社會主義的報紙上，有時甚至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不管德國那嚴似軍紀的檢查機關如何橫暴，還是經常登載有評述富人『菜單』，富人在某個療養地方（凡是… 有錢的人都可以冒稱病人到那裏去療養）可以任意領得多少白麵包，富人用山珍海味的奢侈食物代替平民食品等類的消息和短評。

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害怕損壞資本主義底基石，僱傭奴隸制底基石，富人在經濟上的統治基石，害怕發展工人以及一般勞動羣衆底自動性，害怕『煽起』他們的嚴正要求；這樣的國家除了麵包證外是什麼也不需要的。這樣的國家隨時隨地都不會忽略自己反動的目的：鞏固資本主義，不使它受人損害，在一般地『調節經濟生活』，尤其是調節消費方面，僅限於採用那些爲贍養人民所絕對必需的辦法，並不圖謀這樣真正調節消費，就是說：監督富人，把更多的戰時負擔加到那些在平時享有特權，養尊處優，既醉且飽的富人身上。

用反動官僚方式來解決戰爭向人民提出的任務，就是祇限於施行麵包證，平均分配那些爲營養所絕對必需的『大衆』食品，一點也不放棄官僚主義和反動政策，即是說，一點也不放棄原來的目的：不發動窮人、無產階級、民衆（『平民』）底自動性，不容許他們監督富人，而把那使富人可以享受奢侈品的漏洞留得更多一些。在

所有一切國家中，重複一句，甚至在德國，——更不消說俄國了，——這樣的漏洞是留得極多的『老百姓』忍飢受餓，富人却常到療養所去，用另外的各種『附加物』來補充國家規定的低微的消費額，並且不讓別人監督自己。

剛在自由平等的旗幟下作過反沙皇制度革命的俄國，按其實際政治制度說來，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國的俄國，這裏，這種衆所共見的富人容易規避『麵包證』制的現象，是特別使人民刺目，特別引起民衆不滿，憤慨，怨恨和義憤的。這種容易規避的程度特別的大。暗裏的價格特別之高，尤其是依靠『交情』（而這只有富人才有），什麼都可以得到，而且得到的很多。人民却忍飢受餓。調節消費的辦法僅僅以極狹窄的官僚反動的範圍爲限。政府方面一點也不想到，一點也不關心到用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則來實行這種調節。

『大家』都感受站隊購物的痛苦，可是……可是富人却派自己的僕人去站隊，甚至僱傭專僕來做這件事情！這也叫做『民主制度』！

當國家空前貧困的時候，革命民主政策爲了防止臨頭災禍，不會僅僅限於實行麵包證制，而會加上以下的辦法：第一，強迫全體居民聯合爲消費協社，因爲沒有這樣的聯合，就無法實行完備的消費監督；第二，要富人執行勞動義務，使他們無報酬地在這些消費協社中作書記等類的勞動；第三，真正把所有一切消費品平均分配給居民，使戰爭的困苦真正均勻分担；第四，實行真正由居民中貧苦階級去監督富人消費的監督制。

在這一方面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在組織正是由人民中貧苦階級來實行的監督制方面表現真正的革命精神，就是使每個現有的智識幹部都奮發起來，使全體人民底真正革命毅力都發展起來的莫大推動力。而此刻呢，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俄國中的閣員們，也如他們在

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專說什麼「全體都爲造福人民而勞動」，什麼「振奮一切力量」的漂亮話，可是人民却看見，却感觸到這些話全是虛偽。

結果是踏步不前，而經濟破壞的程度却不可阻遏地增長着，災禍日益逼近，因爲仿照利爾尼洛夫的榜樣，仿照奧登堡的榜樣，仿照一般帝國主義的榜樣來對工人施行軍事苦役制，是我國政府所不能做的，因爲革命底傳統、記憶、痕跡、習慣和組織，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民衆中；而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作些真正嚴重的步驟，又是我國政府所不願意的，因爲它全身從頭到腳，都爲依賴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合」的關係，以及害怕觸犯資產階級實際特權的心理所貫注所束縛住了。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我們考察了防止災禍飢荒的各種方法和辦法。我們到處都看見民主派方面，以及政府和擁護政府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聯盟方面，這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爲了證明，這些矛盾不僅在我們的敘述中寫着，而是實際上存在着，這些矛盾之不可調和是爲有全民意義的實際衝突所證實了的，——爲了證明這點，只須從我國革命半年來的歷史中，指出兩個特別標本的「總結」和教訓也就夠了。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歷史，就是第一個教訓。璧舍浩諾夫之「統治」及其倒台，就是第二個教訓。

其實，上面所述各種防止災荒的辦法，總之是要從各方面鼓勵（直到強迫）居民「組合化」，首先是鼓勵民主派，即大多數居民，——就是說，首先是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特別是貧苦的農民「組合化」。而居民自己爲了克服戰爭所造成的空前困難、苦痛和災禍，已經自發地走上這條道路了。

沙皇政府曾極力阻撓居民自動地和自由地『組合化』。可是沙皇帝制崩潰後，民主組織就已在全俄各地開始發生並迅速發展起來。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各種供給委員會，糧食委員會，燃料會議以及諸如此類的組織，都來進行防止災禍的鬥爭了。

在我國革命半年來的全部歷史中，關於本問題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自稱爲革命共和的政府，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權機關』名義所擁護的政府，竟進行了反對民主組織的鬥爭，並打敗了這些組織！！

帕里琴斯基因進行這個鬥爭而獲得了傳徧全俄的臭名。他藏在政府後台活動，而不在人民面前公開講話（正與一般立憲民主黨人所愛用的活動方法一樣，他們樂意推出策烈鐵里來『對付人民』，自己却暗地包辦一切重要事情）。帕里琴斯基阻礙並破壞了自動成立之民主組織所進行的一切嚴重辦法，因為任何一個嚴重辦法都不能不『損害』到啓特、啓對奇底無限利潤和專橫氣焰。而帕里琴斯基正是啓特、啓對奇最忠實的衛士和奴僕。結果，弄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在報紙上公佈過的事實，——帕里琴斯基竟公然下令取消過各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底指令！！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全部歷史，——而他『統治過』數月之久，並恰恰是在策烈鐵里，斯科別列夫，切爾諾夫當『閣員』的時候，——始終都是爲了迎合資本家及其齷齪私利而破壞民意和破壞民主派決議之醜不堪聞的歷史。自然報紙上所能發表的僅是帕里琴斯基『功業』的極小一部分，至於要把他阻難防止飢荒的罪行澈底查明，這只有當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所成立的真正民主政府才可辦到，那時無產階級會把帕里琴斯基及同類人物底案件，毫不隱匿地提交人民裁判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帕里琴斯基只是一種例外而已，你看，他不是被趕走了麼…可是問題正在於帕里琴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

例，把帕里琴斯基趕走後，情形絲毫也沒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另具姓名，同樣的帕里琴斯基罷了，資本家底全部『影響』，爲迎合資本家底利益而破壞防止飢荒辦法的全部政策，是絲毫也沒有被觸犯。因爲克倫斯基一流人只是保衛資本家利益的屏障而已。

這種情形之最明顯的證據，便是糧食總長壁舍浩諾夫退出內閣的事實。大家知道，壁舍浩諾夫是個極端溫和的民粹派份子。可是他在組織糧食事業方面很想誠意作事，想與民主組織發生聯繫並依靠這些組織來作。壁舍浩諾夫工作底經驗及其退出內閣的事件，其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爲這個最溫和的民粹派份子，這個『人民社會』黨黨員，雖決意儘量與資產階級妥協，畢竟還是不得不退出內閣！其原因是由於克倫斯基政府爲迎合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利益，竟提高了糧食定價！

請看斯米特在九月二日出版的自由生活報第一期上對這個『步驟』及其意義的描寫吧：

『在政府決定提高定價的幾天以前，全國糧食委員會裏發生了如下的情景：右派代表羅洛維奇是個頑強擁護私商利益，無情反對糧食壟斷和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人，他帶着自滿自足的笑容當衆聲明說，據他所知道的消息，糧食定價很快就要提高了。

工兵蘇維埃代表回答說，他絲毫也不知道這樣的事實，當俄國革命尚在繼續下去的時候，決不能有這樣的舉動，不管怎樣，政府非與民主派全權機關——經濟委員會和全國糧食委員會商議，是決不能有這種舉動的。農民蘇維埃代表也同意這個聲明。

可是，不幸得很！事實給了這個反聲明一個非常殘酷的修正：說對了的，原來不是民主派底代表，而是富豪份子底代

表。原來他對於預備侵犯民主派權利一事，消息極為靈通，雖然民主派底代表曾以憤懣態度，否認了發生這種侵犯事件的任何可能性』。

總之，無論工人代表或農民代表都以絕大多數人民名義，肯定地聲明了自己的意見，而克倫斯基政府却為資本家利益，幹着恰恰與此相反的勾當！

資本家底代表羅洛維奇原來是個對於民主派所不知道的那些消息極為靈通的人，——正如我們所始終看到的資產階級刊物言論報和交易所公報對克倫斯基政府中消息最為靈通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種消息極為靈通的事實說明什麼呢？顯然是說明資本家有自己的『門徑』，而把實際政權握在自己手裏。克倫斯基是個傀儡人物。當他們需要他的時候，就把他使用起來，要怎樣使用，便怎樣使用。千百萬工農底利益竟為了一小羣富人底利潤而被犧牲了。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怎樣回答這種令人憤恨的欺侮人民的舉動呢？也許他們向工農發表了宣言，說克倫斯基及其同僚幹了這種事情後，那只好把他們逮捕下獄吧？

當然不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僅僅用他們所把持的『經濟部』名義，通過了一個我們已在上邊提到過的嚇人決議案而已！在這決議案中，他們聲明說，克倫斯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是一種『誤國辦法，使糧食事業以及全國經濟生活遭受莫大的打擊』，並指出這些誤國辦法之實施是公然『違』法的！！

這就是妥協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就是與克倫斯基勾結並想『寬宥』他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

政府違法，為了富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採取這種危害全部監督事業，糧食事業以及整理那極度恐慌的財政事業的辦法，——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却繼續說什麼與工商業界妥協，繼

續去同特勒青科開會商議，寬宥克倫斯基，而僅限於通過一紙使政府可以安然置之高閣的決議！！

這裏就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下面這個真理，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叛賣了人民和革命，而布爾什維克則成爲羣衆底真正領袖，甚至原來擁護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羣衆也在內。

因爲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才能肅清克倫斯基之流所幹的那些豈有此理的勾當，並恢復那被克倫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壞着的管理糧食、供給等等事宜的民主組織底工作。

布爾什維克底行動——這從上述例證中可以極明顯地看出——乃是代表着全體人民底利益，代表着保證糧食和供給事業底利益，代表着滿足工人和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利益，而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種動搖、不堅決、真正叛賣性的政策，這個政策已把國家弄到作出提高糧食價格這類可恥事情的地步！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提高糧食定價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的影響。這就是使濫發紙幣的現象更加擴大，使物價更加抬高，使財政更加紊亂，使財政破產更加逼近起來。大家都承認，濫發紙幣是最壞的一種強迫公債，它正使工人和貧民底生活狀況最爲惡化，它是財政混亂的主要罪因。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擁護的克倫斯基政府，却正是採用這種辦法。

爲要認真消除財政紊亂和防止勢不可避免的財政破產，除了用革命手段去與資本利益斷絕關係，並實行真正民主監督，即是由工人和貧農「從下面」對資本家實行監督的道路，亦即上文中始終論述的那條道路而外，別無他途。

無限制的濫發紙幣就是鼓勵投機勾當，使資本家可以用投機手段賺得億萬橫財，並對於急需進行的擴大生產事業造成莫大困

難，因為原料、機器等等的價格因此愈益昂貴，而且急劇飛漲。當富人把藉投機獲得的財富隱瞞起來時，要採取什麼辦法才有濟於事呢？

可以徵收所得稅，對巨額收入和最大收入規定很高的累進稅率。我國政府繼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之後實行了這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大半仍是空中樓閣和死的條文，因為第一，紙幣價格愈跌愈快，第二，投機獲利的來源愈多，營業秘密的保持愈加可靠，遂使隱瞞收入的現象愈益厲害起來。

要使累進稅成為實在的，而不是空中樓閣，就必須厲行實在的，而不是紙上虛文的監督。如果監督仍然是官僚主義的，那末，對資本家的監督便無法實行，因為官僚有千百條綫索與資產階級聯系着和糾纏着。所以在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不管是君主國也好，共和國也好，整理財政都是由實行那種使工人作軍事苦役，或成為軍事奴隸的『勞動義務制』才達到的。

反動官僚式的監督，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民主共和制的法國和美國在內——把戰爭重担推卸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身上的唯一手段。

我國政府政策底基本矛盾，就在於不得不採用反動官僚式的監督，以免和資產階級爭鬧，以免破壞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同時為了可以隨時欺騙人民，又把它叫做『革命民主式的』監督，因而就激起剛把沙皇制度推翻的民衆底憤怒。

其實，只有施行革命民主的辦法，只有把被壓迫階級，工人和農民，即把羣衆聯合為各種團體，才有可能來實行對富人的真正監督和極順利地打破隱瞞收入的現象。

現時正在努力獎勵用支票流通的辦法來防止濫發紙幣。這種辦法對於貧民是毫無意思的，因為貧民橫豎是朝不保夕，橫豎他們的『經濟週轉』是每星期完成一次，而把他們所賺得的很少幾文錢交

還給資本家。對於富人，用支票流通則能有莫大意義，特別是在同時實行如像銀行國有和取消營業秘密等類辦法的時候，因為這使國家可以真正監督資本家底收入，真正向他們抽稅，真正把財政體系『民主化』（同時就加以整理）。

可是阻礙實行這種辦法的，正是害怕損害資產階級特權，害怕和它破裂『聯合』的心理。因為若不實行真正的革命辦法，不實行極認真的強迫手段，那資本家是不會服從任何監督，不會公開自己的賬目，不會將他們所儲藏的紙幣交給民主國家『存記』的。

已聯合為各種團體的工農，若把銀行收歸國有，施行一切富人所必須依法執行的支票流通制，取消營業秘密，規定以沒收財產來懲治隱瞞收入的罪行等等，就能極易於使監督成為普遍化的實在監督，正是對富人的監督，而實行這樣的監督時，就能使凡是握有國家紙幣的人，凡是隱藏這種紙幣的人都把紙幣交還給國庫。

爲了這，就必須有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派底革命專政，就是說，爲了這，民主制必須成為真正革命的民主制。這就是問題的全部關鍵所在。這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不願意做的事，他們用『革命民主』的幌子來欺騙人民，實際上則擁護資產階級底反動官僚政策，而資產階級却總是以下列規則爲其行動方針：「après nous le déluge」——只要我們安全，那怕洪水滔天！

我們通常甚至不覺得，對於資產階級私有制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反民主的習慣和成見，如何深刻地侵蝕了我們的心靈。當某個工程師或銀行主公佈工人收支賬目，公佈關於工人工資及其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時，一般人認爲這是極正當而公道的事情。誰也不想把這認作是侵犯工人『私人生活』，認作是工程師底『偵探或告密』行爲。資產階級社會把僱傭工人底勞動與工錢看作是自己的公開賬簿，任何一個資產者都有權隨時拿來察看，隨時揭曉，說這樁是工人過於『奢侈』，那樁似乎是工人『偷懶』等等。

可是反過來的監督呢？如果職員、辦事員、僕役等底團體被民主國家邀請來檢查資本家底收支，公佈這種材料，幫助政府來反對隱瞞收入的現象，那又會是怎樣呢？

那資產階級該會如何狂吠起來反對『偵探』，反對『告密』呵！當『老爺』監督僕役，資本家監督工人時，一般人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私人生活，却並不被認為是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有權要求每個『僱傭奴隸』作報告，隨時把他的收支公佈出來。但被壓迫者企圖監督壓迫者，要把他的收支清算明白，揭露他的奢侈生活，那怕是在戰爭期間，當這種奢侈生活會使前線軍隊簡直遭受飢荒死亡的時候，呵，那可不行呀，資產階級是不容許有『偵探』和『告密』行爲的！

問題又是歸結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底統治是與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制度不可調和的。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害怕走向社會主義，便不能做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以上所述，很易於引起那些受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流行機會主義思想浸潤的讀者的反駁，說這裏所論述的辦法，其實大多數不是民主主義的，而已經是社會主義的辦法！

這種在資產階級報紙，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報紙上常見的（用這樣或那樣形式）流行的駁議，乃是用司徒盧威式的武裝來保衛落後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他們說，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施行』社會主義還太早，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應該做資產階級底奴僕（雖然法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由於採用了恐怖手段去反對一切壓迫者，也反對地主，也反對資本家，而使自己的革命成了偉大的革命！）。

那些替資產階級服役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轉到了他們行列中，——其所以這樣主張，是由於不懂得（照他們這種意見底理論基礎來看）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什麼是國家？什麼是革命民主制？因為懂得了這些東西的人，就不能不承認，不走向社會主義便無法前進。

大家都談論着帝國主義。可是帝國主義祇不過是壟斷的資本主義而已。

俄國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的資本主義，這是有『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²³，糖業新迪加等等充分證明了的。這個糖業新迪加又顯然表明了壟斷資本主義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

什麼是國家呢？這就是統治階級底組織，——例如在德國便是容克和資本家底組織。所以德國的普列漢諾夫輩（謝德曼、連奇等人）稱之爲『軍事社會主義』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得簡明些，就是使工人作軍事苦役，而對資本家利潤則實行軍事保衛。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是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即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會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至一些步驟！

因爲資本主義的最大企業既然成了壟斷的，那就是說，它供應着全體人民的需要。既然它成了國家的壟斷，那就是說，由國家（國家在實現了革命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就是人民底武裝組織，首先是工農底武裝組織）來指導全部企業，究竟爲着誰的利益呢？

——或者是爲着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那末這就不是革命民主制的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制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或者是爲着革命民主派底利益；那末這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爲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過是把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轉過來服務於全體人民底利益，於是也就不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制了。

在這裏，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表明：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更把這種組織底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加十倍）前進。

或者是成爲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那末就不能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或者是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照普列漢諾夫，唐恩，切爾諾夫之流的理由來非難這種步驟，說什麼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等，那末就必然墮落到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科爾尼洛夫等的立場上，即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鎮壓工農羣衆底「革命民主」趨向。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我國革命底基本矛盾也就在於此。

站着不動是不行的——在一般歷史上是這樣，特別在戰時是這樣。必須走着，不前進，便後退。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在用革命手段奪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由技術和文化水準所制約，所決定的步驟：在農民所經營的農業中是不能「施行」大機器經濟，而在糖業生產中則不能把大機器經濟取消），是不能前進的。

害怕前進，便是後退，而克倫斯基輩在米留可夫和普列漢諾夫之流的欣然讚賞下，在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愚蠢贊助下所作的事情，正是這樣。

戰爭既非常加速了使壟斷資本主義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

程，因此也就使人類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了，這就是歷史底辯證律。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這不祇是因為戰爭所造成的慘痛產生出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為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

* * *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對於社會主義這問題是以學理主義的態度，即是根據他們讀得爛熟却不很瞭解的學理來觀察的。他們把社會主義想像為一種遼遠而不可知的模糊的將來。

其實，社會主義現已出現於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窗牖內，在這最新資本主義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巨大設施中，社會主義都實際地直接地顯現出來了。

什麼是普遍勞動義務制呢？

這就是在最新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一個前進的步驟，進到按照一定的總計劃來調節全部經濟生活的步驟，進到節省國民勞動，防止資本主義濫費國民勞動的步驟。

在德國，是由容克（地主）和資本家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所以它就必然成為使工人作軍事苦役的制度。

可是，你試想想，這一制度由革命民主國家來實行的時候，會有怎樣的意義吧。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所施行，所調整，所指導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在完全民主制存在的條件下，除非對羣衆施行空前殘忍的暴力手段，決不能從這樣的步驟退回到資本主義去。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既說到防止臨頭災禍的辦法問題，我們就要把另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說明一下：這就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聯繫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間，即萬惡強盜戰爭與正義民主戰爭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過，我們所闡明的一切防止災禍的辦法，是會大大加強國防能力，換言之，即加強國家軍事實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不把掠奪戰爭變為正義戰爭，把資本家爲了自己利益所進行的戰爭變為無產階級爲了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則這些辦法是不能實行的。

的確，把銀行和新迪加收歸國有，同時取消營業祕密和實行工人對資本家的監督，不僅會使國民勞動大大節省，不僅可能節省人力和資財，而且也會使勞動大衆，即大多數居民底生活狀況改善。大家知道，在現代戰爭中，經濟組織是有決定意義的。在俄國，糧食，煤炭，煤油，鉄都很充分，——在這一方面，我國底狀況比歐洲任何一個交戰國都要好些。當用上述辦法消除經濟破壞，鼓勵羣衆來自動參加這個鬥爭，改善羣衆生活狀況，實行銀行國有和新迪加國有，俄國便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民主制度來把全國在經濟組織方面提到更加高得無比的程度。

假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與那阻礙一切監督辦法，對生產怠工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政府』，而在四月間就使政權轉歸了蘇維埃，並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去作『倒閣組閣』的把戲，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去爭得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盤踞一些總長次長等等的高位來過官僚生活，而是把力量用去領導工農實行對資本家的監督，領導工農進行反資本家的戰爭，那末，俄國現時就會已是在經濟上完全改造的國家，就會實現了土地農有，銀行國有，即是說，在這

些方面（而這是現代生活極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會比所有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要發展得高些。

實現了銀行國有的國家，其國防能力，其軍事實力定比銀行留在私人手中的國家高些。土地已歸農民委員會所有的農民國家，其軍事實力定比土地仍歸地主所有的國家高些。

人們常常援引法國人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時的英勇愛國精神和軍事義勇奇蹟。可是他們常常忘記當時惟一可能造成這種奇蹟的物質的、歷史經濟的條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毀那過時的封建制度，使全國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過渡到自由的農民土地佔有制，並且是用真正革命民主主義的速度，堅決手段，毅力和忠誠精神來實現這種過渡，——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國，而把它的經濟基礎改造革新了的物質經濟條件。

法國底例子告訴我們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這就是要使俄國成爲具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要使在俄國也達到羣衆英勇的「奇蹟」，那就必須用「雅可賓式的」無情手段掃除一切舊的東西，而在經濟上革新俄國，改造俄國。這在二十世紀時代是不能單用推翻專制制度（法國在一百二十五年前已不僅限於此）來達到的。這甚至不是單用革命手段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因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叛變了農民！），單是把土地轉交農民所能做到的。因爲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單有對土地的統制，而沒有對銀行的統制，是不能使人民生活改造和革新的。

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在物質方面，即生產方面的革新是與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聯繫着，是與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底專政（當時民主派還沒有和無產階級分開，而無產階級還幾乎是和民主派溶合在一塊的）聯繫着，是與向一切反動勢力作無情的戰爭聯繫着。那時全體人民，特別是羣衆，即被壓迫階級，都充滿着無限的革命熱情；大家都認爲當時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的戰爭，而且事實上也真是這樣的戰爭。革命的法國防禦了反動君主歐洲的侵犯。

並不是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而是在多年以後，當國內反動勢力獲勝以後，拿破崙的反革命專政才把法國所進行的戰爭由防衛的戰爭變成了侵略的戰爭。

在俄國怎樣呢？我們繼續進行着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戰爭是爲着資本家利益，與其他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遵照沙皇與英國等等資本家所訂秘密條約來進行的，在這些條約上答應俄國資本家劫掠他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里沃夫，阿爾明尼亞等等。

當俄國還沒有提議締結正義和平並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的時候，則俄國所進行的戰爭，仍舊是非正義的，反動的，侵略的戰爭。戰爭底社會性質，它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由敵軍蹬在什麼地方來決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是這樣想法，而墮落到了無知村夫底庸俗見解之中）。戰爭底性質是由戰爭所繼續的是什麼政策（「戰爭是政策底繼續」），是由哪一階級爲了什麼目的才進行戰爭的事實來決定的。

引導羣衆去作履行秘密條約的強盜戰爭而指望羣衆表現熱情，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國底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日益明白覺悟到戰爭底罪惡性質，資產階級不僅不能打破羣衆底這種信念，恰恰相反，他們對戰爭罪惡性質的悟解力正在增長着。俄國兩都無產階級已澈底成爲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了！

這裏怎麼還談得到擁護戰爭的羣衆熱情咧！

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是彼此緊結而不可分離的。沒有人民在大胆堅決實行偉大經濟改造中所表現的莫大英勇精神，便不能使國家成爲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而不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不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民主和平，不以此來把侵略、強盜、犯罪的戰爭變爲正義、防衛、革命的戰爭，便不能喚起羣衆底英勇精神。

只有對內對外政策上都忠誠澈底地與資本家斷絕關係，才能挽救我國的革命，才能挽救我們被帝國主義鈇磨壓榨着的國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現代俄國底民主派要想成爲真正革命的，就應該與無產階級最密切地聯合前進，擁護這個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所進行的鬥爭。

把防止必至的空前災禍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後，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此。

戰爭既造成了莫大的危機，使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都緊張到極限，使全部現代社會組織受到莫大的打擊，於是就使人類只能二中擇一：或是死亡，或是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最革命的階級，好來最迅速、最急進地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

由於許多歷史原因——俄國比其他國家大爲落後，它所遭受的戰爭困難特別之大，存在着最腐朽的沙皇制度，一九〇五年革命傳統之生氣勃勃，——就使俄國比其他國家先爆發革命。革命所已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說來，在幾個月以內便趕上先進國家了。

可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這是可能的，因爲在我們面前擺着有許多先進國家底現成經驗，有它們在技術和文化方面的現成結果。有在歐洲高漲着的反戰抗議，有日益發展着的全世界工人革命環境給我們以精神上的幫助。有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極少見到的革命民主自由督促着我們，驅策着我們。

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在這樣的時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證實着——在形式上有

相當的改變——布爾什維克的老原則：要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奪取過來。只有這樣才是挽救革命的保證。

而農民在全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是人數最多的。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負起了反動的作用：把農民阻留在資產階級影響下，引導農民去與資產階級聯合，而不去與無產階級聯合。

革命經驗迅速教導着羣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反動政策已在破產：他們已在兩都蘇維埃中被打敗了。在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中都有『左』的反對派增長着。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在彼得城舉行的社會革命黨市代表會議上，趨向於與無產階級聯盟，而拒絕與資產階級聯盟（建立聯合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數。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重複着資產階級最愛說的把資產階級與民主派對立起來的論調。可是這種對立其實是毫無意識的，正好像尺與斗之不能對比一樣。

有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只有絲毫不懂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十足蠢才，才能否認這點。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需要這種荒謬的對立，是爲掩蓋一件無可爭論的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有着小資產階級的事實。小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的階級地位，是必然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與資產階級聯盟。他們的全部『聯合政策』底實質，整個聯合內閣，標本的半立憲民主黨人克倫斯基底全部政策底實質就在這裏。在這半年的革命中，這個政策已遭到完全破產了。

立憲民主黨人幸災樂禍地說：革命遭受了破產，革命既沒能消除戰爭，也沒能消除經濟破壞。

這是謊話。遭受破產的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加上孟什維克，因為這個聯盟統治了俄國半年，在這半年中，使經濟破壞狀態加強了，使戰爭局面弄得更混亂，更困難了。

資產階級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的聯盟破產得愈充分，則人民也就學會得愈迅速。人民也就會更易於找到正確的出路：這出路就是貧苦農民，即大多數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盟。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

一九一七年十月末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四七一至五一四頁。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書

現時佔統治地位的各『社會主義』黨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最惡毒和可以說是最流行的曲解之一，就是散播一種機會主義的謊語，彷彿準備起義和一般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就是『布朗基主義』。

機會主義派底首領伯恩施坦，是因誣譏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而臭名昭著的；現時的機會主義者高喊什麼『布朗基主義』，其實並沒有給伯恩施坦底貧乏『思想』添上絲毫新的內容，一點也沒有把它『豐富』起來。

人們竟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而誣譏他們為布朗基主義者！難道有比這樣曲解真理更令人憤懣的事麼，因為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正是馬克思把這一點說得最肯定、最準確、最無可爭論，他正是把起義稱為藝術，認為我們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我們必須爭得第一次勝利，乘敵人張惶失措之際，片刻不停地向敵人進攻，以求達到接連不斷的勝利等等，等等。

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於陰謀，不是依靠於黨，而是依靠於先進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於人民底革命高潮。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於革命發展進程上的轉變關頭，即民衆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中途徘徊的、不

堅決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關頭。此其三。把這三點當作起義的條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區別的所在。

但是，當這些條件已經具備時而還不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那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了。

爲什麼正是現今這個關頭應當認爲是我們黨必須把起義看成客觀事變進程所提出的當前任務，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時機呢，——爲要證明這點，也許最好是運用一種比較的方法而把七月三四兩日的情形拿來與九月間的情形比照一下。

在七月三四兩日的時候，可以不違反真理而這樣提出問題：奪取政權也許是要正確些，因爲敵人反正是會誣指我們暴動而以懲治暴動者的辦法來懲治我們的。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當時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因爲起義勝利底客觀條件當時還沒有具備。

(一) 當時作爲革命先鋒隊的階級還沒有擁護我們。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中間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時我們在兩都蘇維埃中間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這種多數只是由七八兩月事變的經過，即由『懲治』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經驗所造成的。

(二) 當時還沒有全民革命高潮。現時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後，這個高潮已經有了。外省的情形和許多地方蘇維埃奪得政權的事實都已證實了這點。

(三) 當時在我們的敵人中間以及在中途徘徊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全部政治上的動搖。現在這種動搖已經是極厲害的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即協約國的和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因爲『協約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底首腦——在那究竟是戰到最終勝利還是單獨媾和來反對俄國的問題上已經動搖不定。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因顯然失去民衆中的多數而極厲害地動搖起來，拒絕繼續同立憲民主黨人聯盟，即拒絕同他們建立聯合政府。

(四) 所以，在七月三四兩日舉行起義就會是一個錯誤：因為當時我們無論在實力上或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權。在實力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雖然彼得城有時也會落在我們手中，可是那時我們的工人和兵士還不會去為佔領彼得城而拚命鬥爭：當時他們還沒有這樣『兇猛』，他們無論對克倫斯基輩或對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都還沒有這樣切齒痛恨，當時我們的人還沒有因目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摧殘布爾什維克而受到沉痛的教訓。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兩日那個時候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軍隊和外省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之前是可能而且一定會向彼得城進攻的。

現在的形勢却已完全不同了。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本階級底大多數，即能夠引導羣衆前進的這個革命先鋒隊，人民先鋒隊底大多數。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人民底大多數，因為切爾諾夫退出內閣一舉乃是遠非唯一而又極為明顯具體的標誌，表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人所實行的聯盟（以及從社會革命黨人本身）方面是得不到土地的。而這正是革命帶有全民性的中心關鍵之所在。

現在我們有本黨所處的優勢地位，因為全部帝國主義以及整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聯盟都發生了空前的動搖，而我們的黨却切實知道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現在我們有一定勝利的保證，因為民衆已瀕於絕望的境地，而我們却給全體民衆指示了正確出路，既在『科爾尼洛夫事變時』給全體人民表明了我們領導底意義，以後我們又向聯盟派提出過妥協的建議，並在他們毫不停止動搖的情形下遭到了他們的拒絕。

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的實行妥協的提議尚未遭到拒絕，以為『民主會議』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便是莫大的錯誤了。妥協是

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然便沒有可能提出它來。但是這些其他政黨拒絕了這個提議。民主會議只是一種會議而已。千萬不要忘記一點，即在民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底代表，並沒有義憤填胸的貧苦農民底代表。它是人民少數底會議，——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把民主會議當作國會看待，那我們便犯了莫大的錯誤，我們便陷於不可救藥的國會迷裏了；即令民主會議宣佈自己爲國會，宣佈自己爲代表革命的全權國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的。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以外，只能在彼得城和莫斯科底工人區域內解決。

現在我們具備有獲得起義勝利的一切客觀前提。我們所處的地位非常優越，因爲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能結束苦惱人民的各種動搖，才能結束世界上這種最令人苦惱的現象；因爲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會打破用單獨媾和手段來反對革命的把戲，而以公開提議更完滿、更公道、更迅速的和平，即有利於革命的和平來打破這套把戲。

最後，只有我黨在起義中終究獲得勝利時才能挽救彼得城，因爲如果我們的和平提議竟被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協定都不能得到，那我們就要做『護國派』，我們就要做各主戰黨底首領，我們就要做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會用真正革命手段來進行戰爭。我們將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靴鞋。我們只留給他們一些麵包殼，我們要叫他們穿草鞋，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靴鞋都送到前線上去。

那時我們就能捍衛住彼得城。

進行真正革命戰爭的資源，不論是物質資源或精神資源，在俄國還是大得無可限量的；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以指望德國人至少會同意與我們休戰。而在現時得到休戰，就無異是戰勝了全世界。

*

*

*

我們既意識到絕對需要有彼得城和莫斯科工人的起義來挽救革命，來擺脫雙方聯盟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媾和』實行瓜分俄國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就應該把我們在民主會議的全部政治策略適應於日益增長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應該證明我們不只是口頭上接受了馬克思所說必須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思想。

我們應該在民主會議中即刻鞏固布爾什維克黨團，而不要專求數量，不要害怕使動搖份子留在動搖份子營壘中：他們留在那邊要比證在堅決忠誠的戰士營壘裏較為有利於革命。

我們應該發表一篇簡短的布爾什維克宣言，用最鋒利的語句指出說，冗長的演說以及一般『演說』都是不合時機的，而認為必須即刻動作起來挽救革命，絕對必須與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用『單獨媾和』來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我們在宣言內應當用極簡短極鋒利的語句來說明這個結論，把它聯繫到我們的政綱草案：給各國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駭人聽聞的利潤，制裁資本家駭人聽聞的破壞生產行爲。

這個宣言愈簡短愈好，愈鋒利愈妙。在這宣言中還必須明顯指出兩個極重要之點：民衆已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動搖不定而受盡了痛苦和折磨；我們必須和這兩個政黨澈底破裂，因為它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我們要立刻提議締結不兼併的和平，立刻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我們這樣來作，就可以達到或是立刻休戰，或是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會轉到防衛戰方面，而革命民主派就會在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真正正義的，真正革命的戰爭。

我們既宣讀這篇宣言，既號召解決問題而不是說空話，號召動作而不是寫決議案，就應立刻把我們整個黨團都派到工廠和營房裏去，因為那裏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地方，那裏才是生活底神經中樞，那裏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泉源，那裏才是民主會議的推動力之所在。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用熱烈激昂的演講來說明我們的政綱，並指出或者是民主會議完全接受這個政綱，或者就是武裝起義。折衷辦法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垂危了。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把我們的整個黨團都集中到工廠和營房中去，那我們就能正確估計到開始起義的時機。

爲要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看待起義，即是把起義當作一種藝術，我們同時就要不放過一分鐘，而立刻組織起義隊伍底司令部，分配力量，把可靠的部隊派遣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領彼得巴夫洛堡²⁴，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要把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城市中心進展的隊伍派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²⁵；我們應當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進行最後的拚命戰鬥，一下子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的起義司令部設在中央電話局近旁，使它與一切工廠，一切部隊，一切武裝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聯絡起來。

這當然都不過是舉其大概，不過是爲了說明在現今這個時機若要忠於馬克思主義，若要忠於革命，便非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不可。

尼、列寧。

寫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舊曆十三至十四日）。

一九二一年初次刊載於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二期上。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〇八至一一二頁。

革命底任務

俄國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是屬於這個階級。這個階級之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是不可免的。只有當這個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的時候，才能保證容易而和平地、迅速而安穩地達到革命事業底勝利，和平與自由事業底勝利，勞動羣衆獲得土地事業底勝利。

俄國革命底進程向我們指明了這種動搖在實踐上的表現。我們不要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抱着幻想，而要堅決立定在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道路上。貧農底窮困，戰爭底浩劫，飢荒底慘禍——所有這一切，都日益顯著地向羣衆表明無產階級道路底正確，和擁護無產階級革命是必要的。

所有一切指望與資產階級『聯合』，指望與資產階級妥協，指望可以『安穩』等到立憲會議『迅速』召集等等的小資產階級『和平』妄想，都被革命過程殘酷無情、毫不寬容地打破了。科爾尼洛夫叛亂是最後一次殘酷的教訓，是一次大規模的教訓，是對於資本家和地主在當地欺騙工農，軍官欺騙兵士等等千千萬萬小教訓的補充。

在軍隊，農民，工人中醞釀着的不滿、義憤和忿怒情緒正在增長。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底『聯合』之無所不允，却毫不履行的政策，正使羣衆憤慨，使他們看清真象，把他們推上*起義的道路。

社會革命黨人中的左翼反對派（斯皮里多諾娃等）和孟什維克中的左翼反對派（馬爾托夫等）在發展着，其人數在這兩個黨底『總委會』中和『代表大會』上已佔百分之四十。而在下層，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特別是貧農中，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大多數都是『左派』。

科爾尼洛夫叛亂教導着羣衆。科爾尼洛夫叛亂使人們學會了許多東西。

還無從知道，究竟現在蘇維埃會能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袖們走得遠些，因而使革命和平發展有所保證呢，或是仍然踏步不前，因而使無產階級起義成爲不可避免呢。

這是無從知道的。

我們的任務是幫助羣衆儘量作到一切，以保障實現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幫助這點的辦法就是解釋我們的綱領，闡明它所具有的全民性質，闡明它之絕對適合極大多數居民底利益和要求。

下面所述各節，也就是解釋這個綱領的嘗試。

我們帶着這個綱領多多走往『下層』，到羣衆中去，到職員，到工人，到農民中去，不僅要到受我們影響的農民中去，而且特別要到受社會革命黨人影響的農民，到非黨農民，愚昧無知的農民中去。努力提高羣衆的認識力，使他們能獨立判斷問題，通過自己的決議，派遣自己的代表團參加民主會議，參加蘇維埃，參加政府，那時不管會議底結局如何，我們的工作也不會是白費的。那時這種工作，無論對於民主會議，或對於立憲會議的選舉，或一般地對於任何政治活動都是有用處的。

生活教導着羣衆理解布爾什維克綱領和策略底正確性。從四月二十日起，到科爾尼洛夫叛亂止——時間多麼少，閱歷多麼多。

羣衆底經驗，被壓迫階級底經驗，在這個時期中教給他們的東西真多得很，於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首領完全與羣衆分離了。若是能做到把最具體的綱領交給羣衆去討論，那末正在這裏，這一點就會表現得最明顯不過的。

與資本家妥協政策底危害作用

(一) 讓資產階級代表繼續留在政府中，那怕其人數不多，讓阿列克塞也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基昂，賈卡林等等將軍這種顯然的科爾尼洛夫派，或讓克倫斯基這種已表明其在資產階級面前軟弱無能，而又慣於玩弄拿破崙主義手腕的人，繼續握有政權，——這就無異是洞開門戶，一方面招致資本家所故意加速和加深的飢荒和勢所不免的經濟崩潰，另一方面招致軍事上的潰滅，因為軍隊痛恨大本營，而不能具有熱情去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除此以外，若是科爾尼洛夫派的將軍和軍官們繼續握有政權，一定會故意向德國人開放戰線，如像他們在加里細西和里加所作過的一樣。只有根據下述新原則來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這點。經過四月二十日以來的教訓後，繼續和資產階級作任何的妥協，便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而不僅是作了錯誤而已。

政權歸蘇維埃

(二) 全部國家政權應根據一定綱領完全轉歸工兵農蘇維埃所選出底代表，並且政權應完全對蘇維埃負責。各地蘇維埃應立刻改選，一方面是用以估計內容特別豐富的最近幾星期革命中全部人民經驗，另一方面是用以剷除有些地方仍未糾正的那種極不公道的情形（選舉方面的不均衡，不平等及其他等等）。

在還沒有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機關的地方和在軍隊中，全部政權都應完全轉歸地方蘇維埃及其所選出的政治委員，以及其他只是由選舉產生的機關。

全國各地都應在國家全力贊助之下無條件地實行武裝工人和武裝革命軍隊，即已在事實上證明能夠鎮壓科爾尼洛夫派的軍隊。

給各國人民以和平

(三) 蘇維埃政府應立刻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即同時既向該國政府，也向該國工農羣衆）提議馬上根據民主條件訂立總的和約，並立刻訂立休戰協定（那怕只是三個月也好）。

民主和約底主要條件是放棄兼併（掠奪），——這並不是說歸還各列強所喪失了的領土等，這樣的瞭解是不正確的；而是說，每個民族，無論在歐洲或在殖民地中，毫無例外地都有可能由自己自由決定，究竟是組織獨立的國家，或是加入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這才是對於放棄兼併的唯一正確的瞭解。

蘇維埃政府既提出媾和條件，它自己就應立刻在實際上着手執行這些條件，即公佈並廢除那些束縛我國的祕密條約，就是原來由沙皇訂立，答應俄羅斯資本家有可能掠奪土耳其，奧地利等等的祕密條約。其次，我們必須立刻滿足烏克蘭人和芬蘭人底要求，保障他們以及一切住居在俄國的他族人民享有完全自由，直到自由分立為止，同時對全部阿爾明尼亞也採取這樣的原則，必須把駐在阿爾明尼亞境內以及我國所佔土耳其領土上的軍隊概行撤退等等。

這樣的媾和條件是不會得到資本家的歡迎的，可是在所有各國人民中却會獲得莫大的同情，會引起他們的熱忱和一致痛恨遷延強盜戰爭這一義憤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大爆發，這就極有可能使我

們一下子得到休戰和同意開始媾和談判的回答。因為工人的反戰革命，到處都無可遏制地高漲起來，要推動這個革命前進，決不是和平空談（一切帝國主義政府早已用這種空談來欺騙工農，我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一樣），而只有與資本家斷絕關係並提議和平，才能做到。

要說任何一個交戰國連休戰提議都不接受，這是極少可能的，假若情形真的會是這樣，那末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成了真正不得已的，真正是正義的和防衛的戰爭。單是無產階級和貧農覺悟到這一點，就足使俄國在軍事方面也加強多倍，特別是在與那些搶劫人民的資本家完全斷絕關係以後；更不用說，那時我們方面所進行的戰爭，將不僅口頭上，而且實際上會是與所有各國被壓迫階級聯合進行的戰爭，是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進行的戰爭了。

在這裏也要警告民衆，叫他們不要相信資本家底謊言，說什麼英國及其他各國資本家，當我們破裂與他們結成的現時搶劫聯盟時，就會使俄國革命遭受嚴重的危害，這種謊言有時是使那些最胆怯的人和庸俗市儈們受到欺騙。這種謊言澈頭澈尾都是虛假的，因為『聯盟國底財政支持』不過使銀行家發財，其『支持』俄國工農，只是像一根絞索支持着被絞死的人一樣。俄國有足夠的糧食、煤炭、煤油、鐵，要正確分配這些產品，只須剷除那些劫掠人民的地主和資本家就行了。至於說俄國人民可能受到現時聯盟國方面對它宣戰的威脅問題，那末凡是以爲彷彿法國人和意大利人能把自已軍隊與德國軍隊聯合起來進攻提議締結正義和平的俄國，這種想法都顯然荒謬可笑；說到英美日等國，那就即令它們向俄國宣戰（這是它們萬難做到的，一方面由於這樣的戰爭為羣衆所極不歡迎，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國家資本家之間有因瓜分亞洲，特別是因掠奪中國而發生的物質利益的分歧），也不能使俄國受到它在與德奧土戰爭時所受到的那種損害和災難的百分之一。

土地歸勞動者

(四) 蘇維埃政府應當立刻宣佈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並把這些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解決時為止。地主所有的農具，也應交給這些農民委員會支配，使之無條件地首先轉給貧苦農民無報酬地享用。

這種辦法早已為絕大多數農民所要求，無論在他們代表大會底決議上或各地寫來的幾百份代表委託書上都是這樣說（這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上所登載的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底綱要上可以看見），所以這是絕對必須立刻施行的辦法。農民在「聯合」內閣時期已飽受了故意遷延的痛苦，現在再也不能容許遷延了。

凡是把這種辦法延不執行的政府，都應認為是反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應份被工農起義所推翻，所打倒。反之，只有實行了這些辦法的政府，才會是全民政府。

防止飢荒及經濟破壞

(五) 蘇維埃政府應立刻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由工人監督生產和消費的辦法。五月六日以來的經驗證明，不實行這種辦法，則一切實行改良的約許和企圖都是無能為力的，而威脅全國的飢荒和空前災禍正在一星期比一星期地逼近起來。

必須立刻把銀行和保險事業以及各重要工業部門（煤油，煤炭，冶鐵，製糖業等等）收歸國有，同時要無條件地取消營業秘密和規定由工農來嚴格監察極少數的資本家，這些資本家利用供給國家需要品發財，並拒絕報告賬目，拒絕繳納加於他們利潤和財產上的公道稅額。

這種辦法並不剝奪中農，哥薩克和手工業者私有財產中的一個哥比，而對於平均負擔戰爭重荷，這是絕對公道的，對於防止飢荒

是刻不容緩的。只有制裁資本家的搶掠行爲，並制止他們故意停止生產的行爲，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實行糧食與工業品的正常交換，使富人將其所隱藏的數十萬萬紙幣歸還國庫。

不實行這種辦法，也就不能辦到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因為地主土地大部份是抵押在銀行裏，地主利益和資本家利益是彼此不可分離地糾纏在一起的。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最近通過的決議（見工人報第一百五十二期）不僅承認政府所施行的辦法（如像提高糧食價格使地主富農發財）是極端『有害』，不僅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各中央機關完全無所作為的事實』，並且甚至承認這個政府『違法』。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底這種承認，就是再一次表明，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完全犯罪的政策。

與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六）科爾尼洛夫叛亂和卡列金叛亂²⁶得到了以立憲民主黨（『人民自由黨』）爲首的整個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擁護。這是已被中央執委新聞報上公佈的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

可是，並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完全鎮壓這次反革命叛亂，甚至沒有採取任何辦法來加以查究，而且在政權尚未轉歸蘇維埃以前，也決不能實行任何嚴重辦法。不管什麼委員會，如果不擁有國家政權，便不能實行完滿的緝查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夠而且應當實行這種辦法。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逮捕科爾尼洛夫派的將軍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底罪魁（古契可夫，米留可夫，梁布申斯基，馬克拉可夫一流人），解散反革命的組織（國家杜馬，軍官聯合會等等），把參加這些組織的人交給地方蘇維埃監視，解散反

革命軍隊，以保障俄國免遭勢所不免的『科爾尼洛夫』叛亂企圖的重演。

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成立委員會來對於科爾尼洛夫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案件，那怕是由資產階級起訴的案件，作出完滿公開的審查，只有這樣的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才會號召工人來完全服從它和贊助它。

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有成效地打破資本家利用從民衆身上搶劫來的千百萬鉅款，霸佔各巨大印刷所和大多數報紙這種極不公道的現象。必須封禁資產階級反革命報紙（言論報，俄國言論報等等），沒收它們的印刷所，宣佈私人在報上登載廣告的事要歸國家壟斷，把這些廣告一概改登到蘇維埃所創辦並向農民說明真情的政府報上去。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資產階級手上的那種肆意造謠譏諷，欺騙民衆，使農民陷入迷途，準備反革命發動的有力工具剝奪掉，而且這是應該剝奪掉的。。

革命和平發展

（七）現時在俄國民主派前面，在蘇維埃前面，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前面展開了革命歷史上非常罕見的機會，來保證立憲會議如期召集不再遷延，來使國家免遭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大災禍，來保證革命底和平發展。

如果蘇維埃現在把國家政權完全地、單獨地握到自己手裏來執行上述綱領，那末蘇維埃不但會能獲得俄國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階級和絕大多數農民的擁護，而且會能獲得軍隊和大多數人民偉大革命熱情的贊助，若沒有這種熱情，便無法克服飢荒和戰爭。

現在決不會有任何抵抗蘇維埃的行爲，只要蘇維埃自己不動搖就行了。沒有一個階級會敢於掀起暴動來反對蘇維埃，而地主和資本家在科爾尼洛夫叛亂時受到了教訓，當蘇維埃一提出決絕要求時，

他們就會和平地讓出政權。爲了打破資本家對蘇維埃綱領底抵抗，只要實行由工農來監視剝削者，並用沒收全部財產和短期監禁來懲治那些抗命不從者的辦法也就夠了。

蘇維埃奪得全部政權後，就在現時也還能——大概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由人民和平選舉自己的代表，各政黨在蘇維埃內部作和平鬥爭，由實踐來考驗各政黨底綱領，使政權和平地由一個黨轉到另一個黨手裏。

若是放過這個機會，那末革命發展底全部進程，從四月二十日的運動起至科爾尼洛夫的叛亂止，已指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必然會發生最尖銳的國內戰爭。必至的災禍會使這個內戰接近起來。凡是人底智慧所能思考到的事實和理由，都表明這次戰爭底結局，一定是工人階級在貧苦農民擁護之下得到完全勝利來實行上述綱領；但這個戰爭也許會是非常嚴酷的，流血的，使地主資本家和同情他們的軍官犧牲幾萬性命的戰爭。無產階級爲了挽救革命，會不惜任何犧牲，而要挽救革命，除了實行上述綱領外，決不可能。但是，假使蘇維埃能實現其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那無產階級是會盡量擁護蘇維埃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九日和十日（舊曆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刊載於工人之路報第二十和二十一期上。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三一至一三九頁。

旁觀者底意見

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是在十月八日，要在九日就送達彼得城的同志們手中，恐怕是很少有希望的。也許這幾行字會到達得太遲，因為北方蘇維埃代表大會定於十月十日舉行。雖然如此，我還是想來提出我的『旁觀者底意見』，希望在彼得城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兵士所準備的發動雖是很快就會舉行，但還沒有實行時，仍可供同志們採納。

全部政權應轉歸蘇維埃，這是很明顯的。同樣，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權（或者說布爾什維克的政權——現在這兩個概念是二而一的），定能獲得世界各國，尤其是各交戰國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特別是俄國農民之極大的同情和竭誠的援助，這也是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應該認為不容置辯的。這是人所共知和早已證明了的真理，無庸贅述。

所要加以說明的是未必全體同志都已充分明白的問題，即：政權轉歸蘇維埃，現時在實踐上就是武裝起義。看來，這似乎是很明顯的，但並非所有的人都細心思索着這點。現在拒絕武裝起義，就等於拒絕布爾什維主義底主要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就等於根本拒絕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但武裝起義乃是受特別法則支配的一種特別的政治鬥爭形式，這些法則必須細心加以思索。關於這個真理，馬克思說得非常明顯，他說武裝『起義如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

馬克思認為這種藝術底主要法則如下：

(一)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

(二) 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

(三) 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

(四) 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

(五) 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

『歷史上最大的革命策略匠師唐通說過：勇敢，勇敢，再勇敢』，——馬克思用這幾句話總結了一切革命中關於武裝起義的教訓。

如果把這點應用到俄國，應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那就是說：一定要同時既從外邊，又從內面，又從工人區，又從芬蘭方面，又從列維里，又從喀琅施塔得，儘可能迅速而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城，要用全部艦隊舉行進攻，要集中大大超過那擁有一萬五千至兩萬（也許更多）的我國『資產階級近衛軍』（士官生），我國『凡台軍隊』（一部分哥薩克）等等的力量。

要把我們的三個主要力量——海軍，工人和陸軍這樣配合起來動作，使能一定佔領並不顧任何損失都要保持住：（一）電話局，（二）電報局，（三）各火車站，（四）尤其是各橋樑。

要挑選最堅決的份子（我們的『突擊隊員』和青年工人以及優秀水兵）來組成一些不大的隊伍，派他們去佔領一切最重要的地點，並參加各處所有一切重要的動作，例如：

包圍彼得城並截斷其與外部的交通，用海軍、工人和陸軍的配合攻擊把它佔領起來，——這就是要用藝術技巧和三倍勇敢精神來執行的任務。

要把最好的工人編成攜帶槍枝炸彈的隊伍，派他們去進攻和包圍敵人底『中心機關』（各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等等），口號是：寧可全體犧牲，決不放走敵人。

我們希望當已決定實行起義時，各領導者定會卓著成效地運用唐通和馬克思底偉大遺訓。

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底成敗，都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

旁觀者。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舊曆八月）。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初次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四四至二四六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 委員會會議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舊曆十日）

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認為：俄國革命底國際環境（德國海軍中的起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全歐洲增長底極端表現；其次，帝國主義世界以撲滅俄國革命為目的的威脅），軍事狀況（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及其同流已經毫無疑義地決定把彼得城讓給德軍），無產階級黨已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的事實，——此外，更加上農民起義以及人民轉而信任我們黨（莫斯科的選舉），最後，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顯然已在準備着（原有軍隊之調出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調入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包圍明斯克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中央委員會認為：武裝起義已經不可避免，而且起義時機業已完全成熟，茲特號召全黨一切組織以此為準繩，並根據這個觀點去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特區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之調出彼得城，莫斯科人與明斯克人之發動等等）。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初次刊載
於探照燈雜誌第二十(四十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
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五五頁。

告布爾什維克黨員書

同志們！我還沒有可能收到星期三，即十月十八日彼得城的報紙。當我從電話中聽到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非黨的新生活報上發表的聲明書全文時，我真不肯相信有這回事。可是，懷疑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得不利用機會使這封信能在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上交給黨內同志，因為對於這種空前未聞的工賊行爲默而不言，便是罪惡。

實踐問題愈是嚴重，甘犯工賊行爲的人愈是負責和「著名」，則這種行爲就愈加危險，就應當愈加堅決地把這些工賊驅逐出去，則因這些工賊過去有什麼「功勞」而表現猶豫不決，就愈加不可饒恕。

你們只想想看！黨內都知道，黨從九月起就討論着起義問題。誰也沒有聽說這兩個人中有誰寫過一封信或一張聲明書！現在，可以說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夜的時候，兩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忽然發表言論反對大多數，並且當然是反對中央。這一點雖沒有公開說出，可是這對於事業的危害更大，因為用暗示口吻說出是更加危險的。

從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聲明書原文中可以十分明顯看出，他們是反對中央，否則他們的聲明書便是沒有意思的，可是他們所反對的究竟是中央哪一個決議，却沒有說明。

爲什麼？

當然是因爲中央沒有把這個決議公佈。

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

對於最重要的戰鬥問題，在十月二十日這個危急日子的前夜，兩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竟在非黨的報紙上，而且正是在那個關於本問題與資產階級携手反對工人政黨的報紙上，攻擊黨中央沒有公佈的決議！

這豈不是比之普列漢諾夫於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所有在非黨刊物上發表的那些被黨極端詬厲斥責過的言論更卑鄙幾千倍，更有害幾百萬倍嗎！那時所說的還只是關於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所說的，却是關於奪取政權的起義問題呵！

關於這樣的問題，在中央已經通過決議之後，竟在羅將科輩和克倫斯基輩面前，在非黨的報紙上來反對這個沒有公佈的決議案，——還能想到有比這更下賤的叛賣行動，更可恥的工賊行爲嗎？

我假如因過去曾和這兩個從前的同志接近而對責斥他們一事表現動搖，那我就會認爲這是自己的恥辱。我直接說，我再不認爲他們兩個是同志了，我將以全力在中央面前，在代表大會面前力爭，要把他們兩人開除出黨。

因爲如果尚未公佈的中央決議，在其通過之後，竟容許在非黨的報紙上來反對，因而在戰士隊伍中造成動搖和混亂，那末，工人政黨便無力解決那實際生活所愈益頻繁向它提出的舉行起義這個困難任務。

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生們去和幾十個張惶失措的人，或立憲會議的候選人組織自己的黨吧。工人是不會加入這樣的黨的，因爲這個黨底第一個口號便會是：

「關於決戰問題在中央會議上遭了失敗的中央委員，儘可到非黨的報紙上去攻擊黨沒有公佈的決議」。

讓他們去給自己建立這樣的黨吧；我們布爾什維克工人黨只會因此獲益不淺的。

當將來把一切文件都公佈出來了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底工賊行爲就會暴露得更加明顯得多。暫時且讓工人去把下面這個問題思考一番：

『假設全俄職工會中央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之後，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數決定，要準備舉行罷工，可是關於罷工時間及其他任何消息暫不公佈。假設有兩個委員竟以顯係欺騙的所謂『特殊意見』爲藉口，在通過決議之後不僅寫信給各地方組織說要重新審查決議，而且竟擅自在非黨的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信。最後，假設他們自己又在非黨的報紙上攻擊這個決議——雖然這個決議還沒有公佈出來，——因而，把罷工事情在資本家面前告密。

試問工人對於把這種工賊開除出自己隊伍的事情是否會表現動搖呢？』

* * *

至於說到起義問題的情形，現在離十月二十日這樣近，我在遠方無法判斷工賊們在非黨報紙上發表聲明書一舉把事情損害到了何種程度。但毫無疑義，在實踐上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要補救這件事情，首先就必須以開除工賊來恢復布爾什維克陣綫底一致。

我們愈是把反對起義的思想論據揭露出來，則這些論據的薄弱性就愈加顯明。我在日前關於這個問題寫了一篇文章送到工人之路報²⁷，如果編輯部不認爲可能把它發表時，那末，想必黨內同志可以閱看這封信的原稿。

這些所謂『思想』論據可以歸結爲兩點：第一，『等待』立憲會議。等等再說，也許等得到的，——這就是全部論據。管它飢荒，管它經濟破壞，管它兵士底耐心會消耗殆盡，管它羅將科把彼得城讓給德國人的步驟，管它關廠抵制，也許會等得到的。

也許，也許，這就是全部證據底力量。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觀主義。在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那裏一切都好，我們這裏一切都不好。資本家那裏一切都準備得好極了，工人這裏一切都不好。軍事方面的『悲觀主義者』喊破喉嚨，『樂觀主義者』却只好默不作聲。因為在羅將科和克倫斯基面前說出一些什麼來，恐怕除了工賊外，未必會有人覺得愜意的。

* * *

困難的時刻，艱鉅的任務。嚴重的叛變。

但任務還是會得到解決的，工人們會團結起來的，農民起義和前綫兵士迫不及待的情緒定會發生作用的！更緊密地把隊伍團結起來吧，——無產階級定會獲得勝利！

尼、列寧。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舊曆十八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初次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七七至二八〇頁。

致中央委員書

同志們！

二十四日晚上我寫這幾行字時，局勢已經危急萬分。已是十二分明顯的了，現在，遲延起義就真是等於自尋死路。

我竭盡全力來說服同志們，現在一切正如千鈞一髮，當前的問題決不能由會議或代表大會（甚至蘇維埃代表大會也好）來解決，而只能由人民、由羣衆、由武裝羣衆底鬥爭來解決。

科爾尼洛夫輩所實行的資產階級進攻，維爾合夫斯基之撤職²⁸，都證明不能再等待了。無論如何，必須在今天晚上或今天夜間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裝（如果他們抵抗，就戰勝之），把政府當局逮捕起來。

不能等待了！！等待就會失掉一切！！

立刻奪取政權的價值就是：保護人民（不是代表大會，而是人民，首先就是軍隊和農民）免受科爾尼洛夫政府之蹂躪，這個政府把維爾合夫斯基趕走並擬定了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陰謀。

誰應當取得政權呢？

這在現時是不重要的：就讓革命軍事委員會「或另一機關」取得政權吧，只要這個機關聲明，它只把政權交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軍隊利益（立刻提議和平），農民利益（立刻奪取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和飢民利益的人。

必須立刻把各區，各團及一切力量都動員起來，並馬上派代表團到革命軍事委員會去，到布爾什維克中央去堅決要求：無論如

何，不管怎樣都不要讓克倫斯基及其伙伴們掌握政權到二十五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間解決一切。

歷史不會饒恕那些遲延從事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可以在今天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却延到明天去冒犯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

我們今天奪取政權，並不是奪取它來與蘇維埃對立，而是爲了交給蘇維埃。

奪取政權乃是武裝起義的事情；它的政治目的，在奪取了之後就會闡明出來的。

等待十月二十五日動搖不定的投票表決，便是自取滅亡或形式主義；關於這種問題，人民有權而且必須不用投票，而用強力來解決；在革命危急的關頭，人民有權，而且應該指揮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好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們。

這是一切革命底歷史所證明了的，而如果革命者明知挽救革命，提議和平，挽救彼得城，防止飢荒，把土地轉交農民的事業都唯他們是賴，却放過時機，那末這些革命者便是犯了滔天的罪惡。

政府正在動搖中。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它完全推翻！

遲延發動，就等於自尋死路。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舊曆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五年初次發表。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頁。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
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時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加速並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它所加在勞動羣衆身上的駭人聽聞的壓迫，也就愈益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我們在這裏是指它們的「後方」而言——已變成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牢獄。

遷延不止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慘象與災難，使羣衆底生活狀況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義憤加強起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它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已獲得實際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成份，造成了在全世界上各正式社會主義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科夫斯卡婭，路班諾維契以及稍帶掩飾色彩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及其同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達維德等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爾，黑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漢德曼和費邊派²⁹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表示奴僕式的卑鄙迎合態

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偉大列強是早已在剝削着和奴役着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恰恰就是爲了分割和重分這種贓物的戰爭。若不與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則使勞動羣衆從一般資產階級影響下，特別是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便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且來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而對於這個學說被遺忘了的或遭受了機會主義曲解的諸方面，加以特別詳細的論述。其次，我們將特別分析從事於這種曲解的主要代表，即在這次戰爭時期中陷於極端可恥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給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作一主要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大概正在完結其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講來，整個這次革命，祇能認爲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鍊條中的一個環節。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就不僅獲得了實際政治意義，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義，因爲這個問題是關於要向羣衆說明，爲着使自己從資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應當在最近將來做些什麼事情的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時幾乎沒有改變。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作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現今的遭遇，正如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底學說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遭遇一樣。當偉大革命家在生時，壓迫階級總是用不斷的追究來酬答他們，總是以最野蠻的惡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中傷來對待其學說。當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說是把他們偶像化，給他們的名字賦予某種榮譽，以便「安慰」並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閹割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其革命鋒芒，而使之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這樣「修琢」馬克思主義的事情上正趨於一致了。他們把這學說底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遺忘，而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覺得可以接受的東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頌揚。現在，所有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要藐視他們呀！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這些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甚至日益頻繁地說着什麼「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彷彿這個馬克思造就了極有組織的工人協會乃是爲了進行劫掠戰爭哩！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學說。爲了這點，我們就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著作中拿出許多很長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證，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且難於通俗；但是沒有這

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一切句段，或至少是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句段，必須儘可能完備地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夠獨立地領會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全部見解，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又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真憑實據地證明出來和一目了然地指明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講起，這書於一八九四年已在斯多德牙爾以行第六版了。我們必須從德文原本中譯出引句，因為該書俄文譯本雖多，但其中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是譯得極不好。

「國家——恩格斯在總結他那歷史的分析時說道，——絕不是從外面強迫加於社會的一個力量。國家也並非如黑格爾所斷定的是什麼「道德觀念底現實」或「理性底外形和現實」。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方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爲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彼此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駕於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當中產生出來，但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思想，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恰巧就開始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而按兩個主要方面進行着。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雖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僅僅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却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調和階級底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則國家就會既不能發生，也不能支持下去。而按市儈的和庸俗的大學教授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哩！——看來，國家却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既把這種壓迫法定和鞏固起來，同時又緩和階級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彷彿緩和衝突乃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鬥爭手段。

比方所有一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當關於國家底意義和作用的問題恰巧成了非常嚴重，成了在實踐上立刻行動，而且是廣大規模行動的問題時，他們都一下完全落到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所有這兩個黨底無數決議及其政治家們底許多論文，都完全被這個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所浸透。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決不能和它的對立方（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這一點却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也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着貌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更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又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述一點：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駕於社會之上而

「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並且非消滅統治階級之所建立，而在其中體現了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如我們在下面所可看見的，就是馬克思根據對革命任務之具體歷史分析而絕對肯定地作出的結論。而正是這個結論竟被考茨基——這點我們在下文中要來詳盡指明——…所「遺忘了」和曲解了。

（二）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國家與舊的氏族（或宗族）組織不同的第一個特徵——恩格斯繼續說，——就是它按地域標準來區分其管治下的公民」…這樣的區分法，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與按宗族或氏族為標準的舊組織作過長期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特徵，就是社會權力底建立，這個權力已經和那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居民不直接符合了。這個特別的社會權力之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後，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這個社會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構成這個權力的，不僅有武裝隊伍，而且還有實體的附屬物，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機關，這些東西是氏族社會制度中所沒有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那稱之為國家的「力量」，即由社會中產生出來，而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且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底主要點何在呢？就在於那些支配有監獄等等的特別武裝隊伍。

我們完全有權說這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權力是與武裝居民，與其「自動的武裝組織」，「不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如同所有一切偉大革命思想家一樣，他盡力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正是那種被普遍流行的庸俗觀念認作是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以為常的，而為那些不僅牢固並且可說是頑梗不化的偏見所奉若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底主要工具，但是——難道可以不這樣麼？

在十九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而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沒有眼見過一次大革命，——這是不能不這樣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何以需要有駕於社會之上而使自己與社會脫離的特別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等）這個問題，西歐的和俄國的庸人一味從斯賓塞³⁰或米海洛夫斯基³¹那裏借用三言兩語，藉口說什麼社會生活複雜化，什麼職能分化等等，來作答覆。

這樣的藉口似乎是「合乎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即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個分裂，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與那些使用棍棒的猿猴羣，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宗族社會的人們底原始組織比較起來，祇是程度上複雜得多，技術上高越得多，但這樣的組織總會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為彼此敵對，且敵對得不可調和的各個階級，而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那它們便會彼此武裝鬥爭起來。於是就有國家形成起來，就有特別的力量，特別的武裝隊伍成立起來，而每次革命在破壞國家機關時，都明白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力圖恢復那替它服務的特別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如何力圖創造這類的新組織，即能於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組織。

恩格斯在上述議論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是每次大革命都

在實際方面明顯地而且以廣大行動規模提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別」武裝隊伍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往下就會看見這個問題怎樣由歐洲歷次革命和俄國幾次革命底經驗所具體表現出來。

但我們且回頭來看看恩格斯底敘述吧。

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個社會權力是薄弱的（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北美在帝國主義前期自由移民佔多數的那些地方），但一般說來，這個權力是在加強着：

…「社會權力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化以及鄰近國家增大與人口增多的程度而加強起來。例如拿現今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把社會權力激增到勢將吞食全社會甚至全國家這樣的高度」…

這一段文字至遲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標明為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底完全統治來說，無論就最大銀行底專權現象來說，無論就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來說——在法蘭西還剛才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兩國，甚至還更薄弱些。從那時起，「侵略競爭」已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因為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國家所瓜分完結了。從此海陸軍備已無限增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由於英德兩國互爭世界統治權，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強盜戰爭，使社會一切力量都被強盜國家政權「吞食」到已接近於完全崩潰的地步。

恩格斯還在一八九一年就己能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大強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而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當正是這個競爭已經加劇許多倍並產生了帝國主義戰

爭的時候，却用『保護祖國』，『保衛共和國與革命』等等的辭藻，來遮掩他們保護『自家』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的行爲！

（三）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維持駕於社會之上的特別的社會權力，就需要賦稅和國債。

…『官吏既掌握着社會權力和徵稅權，——恩格斯說，——他們就成爲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氏族（或宗族）社會各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對官吏們說來已經是不夠的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於是製定出一些關於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區區不足道的小警察』都擁有大過於氏族代表的『權威』，可是甚至文明國底軍權首領，一見氏族首長享有的那種『不是用威迫手段獲得的社會敬意』時，都得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提出了官吏之爲國家政權機關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一八七一年如何由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過，而在一九一二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煞過。

…『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就是那個最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佔統治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就成爲在政治上也佔統治的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並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不過也常遇到一些例外的時期，那時彼此鬥爭的階級達到這樣勢均力敵的狀態，使國家政權暫時得到對於這兩個階級的相當獨立性，成爲彷彿

是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仲裁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獨裁君主制，法國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德國底俾斯麥時代，就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在已轉而壓迫革命的無產階級以後，當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業已軟弱無力，而資產階級又還沒有充分力量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就是如此。

在民主共和國內，——恩格斯繼續說，——「財富運用自己的權力，是間接的，但因此是更可靠的」，——第一，就是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美國）；第二，就是用「政府與交易所聯盟」的方法（法國與美國）。

現今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甚至在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國內，都已把這兩種維護並實施財富專權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舉例來說，既然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頭幾個月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帕里琴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中對於一切制裁資本家和制止其掠奪行為，制止其藉供給軍需品來盜竊國庫的種種辦法，都實行怠工，既然帕里琴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是用另一個完全與帕里琴斯基同樣的人來代替了他），就被資本家「獎賞了」年薪十二萬盧布的位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是直接的收買呢，還是不直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加聯盟呢，還「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切爾諾夫輩與策烈鐵里輩、亞甫克森輩與斯科別列夫輩究竟起着什麼作用？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還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財富」專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其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為它不依賴資本主義之不良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經過帕里琴斯基輩，切爾

諾夫輩，策烈鐵里輩等等）這個最好的外殼之後，就能如此可靠地，如此牢固地來確立自己的權力，致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無論何種人員、機關或政黨之更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權力。

還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為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顯然是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長期經驗，所以他說道，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像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一樣，都正是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懷着一種妄想，並且要人民相信這種妄想，以為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裏」真正能夠表現大多數勞動者底意志並保障這一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個妄想；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聲明，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宣傳和鼓動中，是隨時隨地都遭到曲解。至於恩格斯在這裏所駁斥的這個妄想底全部虛偽性，則我們以後在繼續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今」國家的見解時，還會加以詳細揭破的。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總結如下：

「由此可知，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必需要國家，而且根本就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各階級時，國家就因這種分裂而成爲必要的了。在我們現時正迅速走近之生產發展底更高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復必要，而且還成爲對於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出來一樣。階級一經消逝，國家也就會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以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爲基礎按新方式來

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會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是它所應份到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而與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派底宣傳鼓動作品中，很少遇見。而且就即令遇見有這段引文時，也多半是彷彿崇拜偶像才把它引用來的，就是說，是爲了向恩格斯正式表示敬意，而絲毫也不企圖思考一下，所謂「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這意思是說，該預先要有何等廣濶而深刻的革命。他們甚至往往不懂得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一語，負有這樣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頻繁，它又這樣明顯地指明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爲機會主義的流行把戲底本質所在，遂使我們必須對此作一番詳細考察。現在我們且把從中引出這語句的那段言論全部轉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但這樣一來，它就消滅它自己之爲無產階級，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一切階級區別和階級對立，而同時也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過去和現在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進展着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即必需有剝削階級底這個機關，以便維持其生產底外部條件，就是說，特別是以使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柑制在當時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之內。國家曾是整個社會底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祇是因爲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底國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國家公民資格的奴隸主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

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當國家終究真正成爲全社會底代表時，它就會自行成爲贅物了。當任何一個必須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已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單獨生存競爭已不復存在，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過火行動也一併消失時，那時就會沒有什麼必須加以鎮壓了，而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即國家，也就會再不需要了。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贅舉而自行泯沒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我們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關於『自由人民國家』的語句，這個語句在鼓動的意義上是可以暫時存在，但歸根到底說來，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我們也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關於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杜林先生推翻科學的舉動，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可以大胆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議論中，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成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認爲國家『消亡』而與無政府主義『廢除』國家的學說不同的這一點。這樣來截斷馬克思主義，就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在這樣的『解釋』之下，就僅僅留下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爲只有慢慢的，平坦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風暴，沒有革命。對於國家『消亡』之流傳的，普遍風行的，大衆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瞭解，無疑是蒙蔽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最粗暴的，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曲解，這種曲解在理論上是由於把我們已在上面

完全引錄來的恩格斯「總結」議論中也指出了的最重要情節和理由都遺忘了。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既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也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至於這是什麼意思，那却「照例」是不加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點，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在這幾句話當中，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底經驗，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簡明地表示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來更詳細地論述。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制度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

第二，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恩格斯這個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這裏已說得十分明顯了。而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少數豪富對千百萬勞動者所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所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消滅國家之爲國家」，也就在於此。以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不言而喻的，這樣以另一個（無產階級的）「特別力量」來代替這一個（資產階級的）「特別力量」的更換，絕對不能按「自行消亡」形式來實現。

第三，恩格斯說到「消亡」一語和甚至說得更鮮明更光彩些的「泯沒」一語時，他完全明白而肯定地說是指「國家以全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以後，即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代而言。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那

些無恥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也就是關於民主制底「泯沒」和「消亡」。驟然看來，這似乎是很奇怪。但是祇有那些對於民主制也是國家，因之當國家消逝時民主制也就消逝這點不會思索到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瞭解」。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祇有革命才能夠把它「消滅」。而作為最完滿民主制的一般國家，是只能「自行消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他說「國家自行消亡」的這個著名原理後，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他從「國家消亡」這個原理中所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可以担保地說，在讀過或聽過關於國家「消亡」言論的每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不僅是把他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用去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已。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大概有九個人不懂得何謂「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為什麼攻擊這個口號就是攻擊機會主義者。歷史就是這樣寫法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被人暗中假造為普遍流行的庸人主義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重述了千百次，被人庸俗化了，被人最簡單化地打進頭腦中去，成為頑固的成見了。而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蒙蔽了，被人「遺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要求和流行口號。在這個口號中，除了對於民主制概念的市儈浮誇的描寫而外，是別無半點政治內容的。既然人們當時是為合法而用這個口號來暗示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會同意從鼓動觀點上來「暫時」「辯護」這個口號。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性的，因為它不僅表現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粉飾，而且表現不瞭解社會主義觀對一般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擁護民主共和制度，作為在資本主義下對於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可忘記，即使在最民

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然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

第五，在恩格斯這本含有大家都記得他關於國家消亡議論的著作中，還有關於強力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對這種革命作用底歷史估計也就變成了對強力革命的真正頌揚。這是「誰都不記得」的，關於這個思想底意義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而在羣衆中的日常宣傳鼓動中，這些思想簡直不起任何作用。其實這些思想是同國家「消亡」論密切聯系而成爲一個嚴密的整體。

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論吧：

…「至於強力在歷史上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除作惡而外），「即革命的作用；至於照馬克思底話，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新社會的時候，強力就是這個舊社會底接生婆；至於強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道路和破壞僵死硬化了的政治形式的手段，——關於所有這一切，杜林先生都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了推翻剝削者的經營制度，強力也許是必要的——這是他覺得很可惋惜的咧！——因爲據他說，任何應用強力的行爲都會使應用強力的人敗壞德性呵！雖然在每次勝利的革命以後都有過高度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進展，但他終究說出這種話來了！加之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須知民衆可能被迫進行強力衝突，這至少會有如下的益處：可以拔除那因三十年戰爭的恥辱而沒入民族意識中的一種奴僕精神。而這種黯淡的、萎靡的、軟弱無力的僧侶思維，竟敢自薦給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麼？」（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第二編第四章末段）。

怎樣才可以把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即直至他逝世時為止，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來與國家『消亡』論結合為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義，用無原則的或詭辯的方法任意（或爲了討好於當權者起見）抽出其中這個或那個議論來把它們結合起來，而且在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都正是把國家『消亡』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現今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論馬克思主義的正式作品中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現象。這樣一種替代，自然是不新奇的，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常見的事。當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爲機會主義時，把折衷主義偽造爲辯證法是最易於欺騙羣衆的，能夠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它顧到了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一切矛盾影響等等，而其實則不給予任何對於社會發展過程的完整的革命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強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這是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還要更詳細說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之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所替代，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而按通例是只能經過強力革命來實現。恩格斯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完全同馬克思屢次的聲明相符合（我們要記得，在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底結尾一段中，曾傲然公開聲言強力革命之必不可免；我們要記得，約在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³²批評一書中曾毫不留情地攻擊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性）——這種頌揚，絕不是『執迷』，絕不是豪語，也不是論戰伎倆。必須有系統地教育羣衆來這樣瞭解，而且只是這樣瞭解強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底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對於馬恩學說的背叛，其特徵就在於所有這兩個思潮都把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遺忘了。

由無產階級國家來替代資產階級國家，除非有強力革命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消滅，即任何國家底消滅，則只能經過「自行消亡」而實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別革命形勢時，分析每一個別革命底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而我們現在就正要說到他們學說中這個絕對是最重要的部份^α。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已經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底最初著作——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作成的。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在這兩部著作中，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一般基礎而外，還有在相當程度內對於當時具體革命形勢的反映，因此我們來考察考察這兩位作者在尚未做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結論之前他們關於國家的言論，也許要較為適當一些。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寫道，——將創造一個摺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階級對抗底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拿這個關於國家隨階級消滅而消逝的思想之一般概述，來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敘述對照一下，確是很有意義。

…「當我們敘述無產階級發展中那些最一般的階段時，我們也就循序考察了現存社會裏多少是隱藏着的國內戰爭，一直

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那時無產階級就用強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無產階級變成（直譯：提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集中一切生產工具於國家手中，即集中於已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儘量迅速地增殖生產力總量」（一九〇六年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第三七頁）。

這裏我們看見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最精彩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說的那樣）的思想，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這個關於國家的定義，在各正式社會民主黨普遍流行的宣傳鼓動作品中，不僅從來沒有加以解釋過，而且恰巧是被遺忘了，因為它是與改良主義絕不相容，它是當面打擊那些說什麼「民主制底和平發展」的通常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幻想的。

無產階級需要有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覆着，硬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却「忘記」補充說，按照馬克思底意見，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是「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別的權力組織，是為了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強力組織。究竟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哪一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為着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能領導這個鎮壓的，能實現這個鎮壓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因

爲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的革命階級，是唯一能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反資產階級鬥爭，將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之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維持剝削制，即是爲着極少數人底私利而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之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完全消滅任何剝削制，即是爲着絕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以階級妥協的夢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見解也是夢想的，他們不是把這個改革想像爲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而是想像爲由少數來和平服從那已經瞭解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是和承認國家超階級性的觀點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而在實踐上就走到叛賣勞動階級利益，舉例說，這是已由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七一年革命底歷史所表明，這是已由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在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所表明了。

馬克思曾畢生奮鬥來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現時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復活了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把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貫引伸爲論政權，論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這一特別階級能做到，因爲它所生存的經濟條件準備它去進行這種推翻，給它以實現這種推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者階層，同時却團結着、統一着、組織着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夠成爲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這些羣衆受着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往往比無產階級所受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却不能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鬥爭。

馬克思所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要歸結於承認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

何人分享而直接憑藉羣衆武裝力量的政權。爲要實現推倒資產階級，就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爲統治階級，變爲能夠鎮壓資產階級所必然進行的拚命反抗，並能夠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來建設新經濟制度的這樣的統治階級，才能夠做到。

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權，集中的權力組織，強力組織，既用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廣大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却把工人黨教育成爲一些脫離羣衆而代表那班工資較優的工人們利益的代表者，只圖在資本主義下『營謀』苟安生活，爲着一飯之惠竟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即放棄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系。這個作用底完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特別的強力組織，那末由此就會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不預先消滅，不預先破壞資產階級給自己設立的國家機器，則創造無產階級這樣的組織是否可能呢？共產黨宣言曾接近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時，就說出了這個結論。

(二) 革命底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他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把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澈底的。它還經歷着苦難的考驗。它在有條有理地執行着自己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舉行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底頭一半，現時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另一半。它首先使國會權力臻於完備，以便得到推翻這個權力的可能。現在，當它已達到這地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之表現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為與它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着重點是我們加的）。『而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這後半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有極複雜的人為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隊伍加上五十萬大軍，——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氣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而且這個寄生機體是加速了這種崩潰過程』。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又擴大了政府權力底容量，機關和行政人員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除了更大的分工外，沒有增添絲毫新的東西」…

…「最後，國會制的共和國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竟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底工具和集中。迄今所有一切政變都祇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不是把它毀壞」（着重點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底奪得，視為自己勝利時主要

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第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了莫大的進步。在那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為抽象，還是表現於最普泛的概念和語句中。在這裏，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而且做出了格外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說：過去一切革命祇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毀壞的。

這個結論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點。而正是這個基本點，不僅被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所完全遺忘，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曲解了(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一般的歷史總結，使人們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得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勝利以後就會立即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既不需要，並且是不可能有的。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怎樣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提出來且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既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就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偉大年代底歷史經驗來做基礎。馬克思底學說就在這裏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哲學的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在各被壓迫階級獨立行動面前，國家機器如何變遷，如何演進呢？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任務怎樣呢？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君主獨裁政體崩壞時代。最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關，即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種機關恰恰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線的聯系。每個工人底經驗都把這種聯系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階級由於切身所受的苦痛領略到這種聯系的意味，——正因為如此，所以工人階級這樣容易懂得並且這樣牢固地領會到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教訓，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不是昏聩地和輕浮地否認這個教訓，便是更輕浮地『一般地』承認它，却不願做出相當的實際結論來。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那些腐蝕着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然而正是『塞住』生命氣孔的寄生蟲。現時在正式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那視國家為寄生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專有的屬性。這樣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把社會主義玷辱到這種地步，竟將『保護祖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藉此擁護並粉飾這個戰爭的市儈們，當然是很有益處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經過歐洲從封建制度崩潰時起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須得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其支配，大半就是經過這個機關來實現的，因為這個機關給予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底上層份子以比較舒適、安靜和尊榮的位置，使這些位置底佔有者駕於人民之上。試看一看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後半年中所發生的情形吧：以前首先委任黑幫份子充當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贓物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却力圖把這些改良遷延『到立憲會議的時候』，而對立憲會議的召集則又慢慢遷延到戰爭結束時再說！但

是對於瓜分贓物，佔據各部總長、次長、督撫等等肥缺，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配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在一切中央與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並重分「贓物」勾當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總結，客觀的總結，毫無疑義的是：各種改良辦法是延期了，官吏位置是分配過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的重新分配來改正了。

但在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間（如以俄國為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間）「重分」官吏機關的事實愈多，則各被壓迫階級，首先是領導它們的無產階級，就會愈加認清自己與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黨——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黨也包括在內——就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關，即仍是鞏固那個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抱定任務不是改良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把它破壞，把它消滅。

這樣提出任務，並不是由於邏輯的推論，而是由於實在的事變發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新穎經驗。馬克思該如何嚴格地依據歷史實際經驗，這點我們可從以下事實中看出來：他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那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時，經驗還沒有給予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去。在一八五二年，根據如自然歷史觀察這樣的確切性所能指出的，還只有下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到要「集中自己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毀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裏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為公理，把它們移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

大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爲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序言裏說，——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階級搏戰，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國達到更加澈底的結局。這種階級搏戰所在以進展及其結果所藉以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鮮明。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它是一個純粹等級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它所具有的典型式的明顯性，實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而抬起頭來的無產階級反對那佔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裏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國所未見過的』（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起，法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發生了停頓，但這個停頓，無論如何長久，絲毫也不是說，在行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不可能表現爲階級鬥爭達到決然結局的模範。

我們且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底歷史拿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吧。我們可以看見比這要遲緩些，複雜些，舞台更廣濶得多，但總還是同樣的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或在君主制的國家（如英國，在相當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等等），都形成着『國會權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贓物』的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爲搶奪政權而鬥爭，而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始終不變，——最後，『行政權力』，其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又臻於完備和鞏固。

毫無疑義，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全部最新進化中的共同特

徵。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這三年內，法國用迅速的、尖銳的、綜合的形式來表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巨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裏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裏，由於對無產階級的高壓之加厲，「國家機器」都異常加強起來，官吏軍事機關都空前增長起來。

現在，全世界歷史，無疑是在較一八五二年更廣大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給了最可注意的材料。

（三）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³³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摘要登載於新時代雜誌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裏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各個階級底經濟解剖。我所作出的新貢獻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底一定歷史階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聯繫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深刻的先進思想家底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確的。而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瞭解和承認。無怪乎當歐洲底歷史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一切「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考茨基所著無產階級專政那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這本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按市儈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則卑鄙地背棄它的一個標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出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站在馬克思用上述言論所品評過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因為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內。（而在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

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是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 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一）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硬說企圖推翻政府就會是絕望的蠢舉。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人們強迫工人決戰，而工人已出身應戰時，當起義已成爲事實時，馬克思就不管當時有種種惡兆，而終以極愉悅的心情來歡迎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不以迂儒態度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如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而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却按自由主義精神大叫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公社社員們顯出如他所說的『衝天』的英勇精神而表示歡愉。雖然這次羣衆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在其中看見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個相當進步，是比較幾百個綱領和議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自己所抱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爲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就是由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是於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寫成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

…『特別是——他們繼續說，——巴黎公社已證明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提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放在單括號內的語句，是由兩位作者從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主要教訓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竟把它作爲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恰巧就是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這個修改底意思是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們，即使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的讀者們所不知道的。關於這個曲解，我們將在下面專論曲解的那一章內詳細說及。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那句名言之流行的庸俗『見解』，就在於認爲似乎馬克思在這裏是着重指出緩慢發展底觀念以與奪取政權的觀點等等對立。

而其實却恰巧相反。馬克思底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以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爲限。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即正值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寫信給庫格曼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見，我認爲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着重點是馬克思所加：在原文上有zerbrechen一字），「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嘗試恰巧就是如此」（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期，第七〇九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種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在「毀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這幾個字中，已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簡明表示出來了。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已被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遺忘，而且簡直被他曲解了！

至於馬克思從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引出的語句，我們已在上面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議論中，有兩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以大陸來局限自己的結論。這在一八七一年時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閥機關，並且在頗大程度內還沒有官僚制度。因此馬克思就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於人民革命，曾想像不必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預備條件，也是確有可能的。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

「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

第二，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份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

如果列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得承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民衆，最大多數人民，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當中都沒有顯然積極地、獨立地起來為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奮鬥。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其中未曾有過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時得到過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無疑義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民衆，大多數人民，呻吟於壓迫和剝削之下的社會最「下層」的人，都曾獨立奮起，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嘗試，即按自己方式來建設新社會以代替那正被破壞着的舊社會的嘗試，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

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實現。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爲自己開闢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由於許多內外原因而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在說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時，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是說得很多而且時常說過的），而極嚴格地估計到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在對比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國家機器，既是工人利益，也是農民利益所要求的，這個共同要求把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關於剷除「寄生蟲」而用某個新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呢？

（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 國家機器呢？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還是十分抽象的，正確些說，還只指示出任務，而沒有指示出其解決的方法。以「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關於這個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究竟會採取哪種具體形式，這個組織究竟會如何與最完備和最徹底「爭得民主」這點

相吻合，——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既不願意陷於空想，就期待由羣衆運動的經驗作出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把公社底經驗——不管它是怎樣少——加以最仔細的分析。我們且把該書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時，從中世紀發端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無孔不入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都發展起來了。隨着勞資間階級對抗底發展，『國家政權愈益帶有用以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機器底性質。在每次表明是階級鬥爭相當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底純粹壓迫性質，總是日益公開顯露出來』。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用以進行反勞動戰爭的全國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形鞏固了。

『公社是與帝國絕對相反的』。『它是這樣一種共和國底一定形式』，『其任務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底帝制形式，而且要消滅階級統治本身』…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形式，究竟是什麼呢？公社所曾開始創立的國家究竟怎樣呢？

…『公社所頒佈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這個要求是現時一切想自稱爲社會主義的政黨底綱領中都寫着的。但是，它們的綱領究有什麼價值，這是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行爲中看得最明顯的，他們在事實上恰巧是在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以後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成。這些代表是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公認爲工人階級代表的人』…

…「向來都是國家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被革除其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底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的機關…其他一切行政部門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得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上等國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權以及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除而消除了…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立刻就着手來毀壞那精神壓迫底工具，即僧侶底勢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上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由公開選舉，而成為負責並隨時可以撤換的」…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那已被打碎之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備的民主制：取消常備軍，對一切公務人員施行完全選舉和撤換制。但在事實上，這個「僅僅」却是表明以一種在原則上不同的機關來代替另一種機關的偉大的更替。這裏恰巧看見「數變為質」底實例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想像的那樣最完全最澈底的程度，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由國家（即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特別力量）變為一種已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於公社曾特別必要，而公社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沒有充分堅決地來這樣作。但是這裏，實行鎮壓的機關，已是居民大多數，而不是少數，如像向來無論在奴隸制下，無論在農奴制下，亦無論在僱傭奴隸制下所有的情形那樣。而既然是由人民大多數自己去鎮壓自己的那些壓迫者，那末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便已經不需要了！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就開始消亡。人民大多數能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底特殊機關（特權官吏，常備軍底長官），由自己來直接執行這些事情，而國家政權職能底執行本身愈是全民化，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性也就愈見減少。

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着重指出過的公社所採取的辦法：取消支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公務人員底薪水減低到等於「工人工資」的水準。在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如下的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轉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轉為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鎮壓某一個階級的「特別力量」的國家，轉為由人民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中被人遺忘得最厲害的，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通俗的解釋中——這樣的解釋不可勝數——是不說這一點的。對於這一點，正像對於已經過時的「幼稚行爲」一樣，「照例」是不講的，好像基督教徒得到國教地位時，便「遺忘了」原始基督教之帶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爲」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不過」是幼稚原始民主主義底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始者」之一，即以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曾屢次演習鄙陋的資產階級嘲笑「原始」民主主義的伎倆。他也如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也如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那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不在某種程度內「回返」到「原始」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不然，試問怎可進到使國家職能由大多數居民和全體居民來執行呢？）；第二，以資本主義成果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主義」，是與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前期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創立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而在這個基礎上，舊「國家政權」底絕大多數職能，已如此簡單化，已可化為這樣一種簡單到極點的登記、填表、檢查的手續，以致每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執行這些職能，以致只要給以通常「工人工資」就足可執行這些職能，以致可以（而且應當）把這些職能中的任何特權性的「長官制」影子都取消掉。

對一切公務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完全選舉制和隨時撤換制，將其薪水降低到通常『工人工資』的水準，——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辦法，足可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利益結合起來，同時就會成爲由資本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辦法是關係於社會底國家改造，即純粹政治的改造，但這些辦法當然祇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的步驟聯繫起來，即祇有與生產資料底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爲社會公有制的過渡聯繫起來，才能顯出其全部意思和意義。

『公社——馬克思寫道，——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關於『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爲它消滅了兩項最大的費用，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很少數人能『高昇』，能『出頭』——在資產階級意義上說，——即是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升爲生活有保證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凡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而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佔大多數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政府壓迫，是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政府。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既實現這一點，同時就是向着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國家這方面前進一步。

（三）國會制底消滅

『公社——馬克思寫道，——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這裏，普選權不是爲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 und zertreten），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使其能爲自己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員，正好似個人選舉權爲了同一目的服務於任何一個工廠主一樣』。

這個在一八七一年對國會制所作的精彩批評，現在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為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對國會制的批評，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作，且根據這個十足加二的正常理由來把任何對國會制的批評都宣佈為「無政府主義」!!所以毫不足怪的，就是在「先進的」國會制的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維德、列金、桑巴、倫諾德爾、亨德孫、王德威爾得、斯道寧格、布蘭亭、比沙拉底等等之流的「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而日益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不管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革命辯證法看作為時髦的空談，漂亮的辭藻，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所慣作的那樣。馬克思善於無情摒棄無政府主義，因為無政府主義不會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底「豬欄」，特別是在顯然沒有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國會制給以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當在國會中鎮壓並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底真正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國會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那末，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底觀點來看，擺脫國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國會制呢？

又得再三反覆地說：馬克思從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請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遺忘得一絲不留，以致他們除了對於國會制的無政府主義批評或反動批評而外，簡直不懂得任何其他的批評。

擺脫國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

而是在於把代表機關由清談館變為『工作的』機關。『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真是打中了現代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和國會『哈巴狗』們底要害！請看任何一個國會制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後台辦理，是由閣部、官廳、參謀部執行的。在國會裏，僅僅專為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真是真情實理，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它還未來得及建立真正的國會以前，國會制底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立刻發生作用了。腐敗市儈中的英雄們，如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輩，切爾諾夫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竟有本領把蘇維埃也按最卑劣的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方式弄污了，將其變成爲清談館了。『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用種種清談和決議來愚弄那些輕信的農夫。在政府內面，實行不斷的更換角色，一方面爲的要依次安插儘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來『飽嘗』優厚尊榮的肥缺，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工作則在官廳和參謀部中『作』着！

當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人民事業，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爲業的『好社會』中人底絕頂直爽口吻——自供說，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閣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仍然是舊的，它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的』對那些革命創舉實行怠工！而且即使沒有這個自供，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不也是證明了這點麼？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這些在內閣官場中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的切爾諾夫輩、路薩諾夫輩、孫齊諾夫輩以及人民事業報其他諸編輯先生們，竟喪盡廉恥，公然毫不害羞，毫不赧顏地當衆宣佈說，——儼如談閒一樣，——在『他們的』閣部中一切照

舊!! 革命民主的辭句是用來欺騙一般鄉下愚民的，而官僚辦公廳裏的耽擱延宕則是爲博得資本家底「歡心」，——這就是「誠實的」聯合政府底實質。

在公社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那貪污腐敗的國會制的機關中，論斷和討論底自由不會墮落爲騙局，因爲議員們應當親自來工作，親自來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來檢查在實際生活中所得的結果，親自來直接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着，可是作爲一種特殊系統，作爲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地位的國會制，在這裏是沒有了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則我們就不能想像出什麼民主制，甚至連無產階級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統治的志願，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願，而不是爲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辭句，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如謝德曼和列金輩，桑巴和王德威爾得一流人所幹的那樣，則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不要國會制。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克思講到既爲公社，又爲無產階級民主制所需要的那個官吏機體底職能時，他拿「其他任何僱主」所僱用的人員來與之比擬，即拿那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員」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與之比擬。

馬克思是連絲毫空想主義痕跡也沒有的，就是說，他並沒有虛構和幻想一個「新」社會。反之，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爲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拿無產階級羣衆運動底事實經驗作根據，而努力從這經驗中取得實踐的教訓。他向公社「學習」，正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底偉大運動經驗學習一樣，從來不向這些運動講過一句迂儒的「訓言」（如像普列漢諾夫說：「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或如策烈鐵里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一舉而把官吏機構到處澈底消滅，這是談不上的。這是空想。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吏機器打碎，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機器，以便可以逐漸使任何官吏機構化爲烏有——這却不是空想，而是公社底經驗，而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當前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管理底職能簡單化了，給我們以拋棄「長官制」的可能，而把全部事情都歸結爲無產者（以統治階級資格）用全社會名義來僱用「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制，不要任何從屬關係；這些由於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而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根本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祇會把社會主義革命延遲下去，一直延遲到人們變成另外一種人時爲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想由現在的人們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服從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國家官吏底特別『長官制』可以並且應當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就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已經是一般市民底知識水平所足可勝任，並且只給予『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執行。

我們工人自己從資本主義所已造成的成果爲基礎來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倚靠自己工人的經驗，創立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它，把國家官吏底作用歸結爲不過是執行我們委託的人員，歸結爲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平常薪水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所有各色各樣和各種程度的技術專家），——這就是我們的無產階級任務，這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可以而且應當從此開始的起點。這個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自然會使任何官吏機構逐漸『消亡』，使這沒有括弧的，

不像僱傭奴隸制的新秩序逐漸創立起來，在這一秩序下，日益簡單化的監督和報告職能，將由大家來輪流執行，然後將成爲習慣，最後，便將不復成其爲特殊階層底特殊職能。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稱郵政爲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式樣組織起來的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一切托拉斯都變爲這種式樣的組織。這裏站在那些工作苦重而忍飢受餓的『簡單』勞動者頭上的，也同樣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僚。但是，社會管理底機體，在這裏已經預備好了。祇須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底銜手去粉碎這些剝削者底反抗，毀壞現代國家底官僚機器，——那時，我們就有一個去掉了『寄生蟲』而擁有高度技術設備的機體，這個機體完全可以由已經團結起的工人們自己動用起來，僱用一些技師，監工和會計員，而付給他們全體以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亦如付給全體『國家』官吏一樣。這就是對待所有一切托拉斯之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既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估計到那已由公社實際開始了的（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全部國民經濟組織得如像郵政一樣，使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所有一切職員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水，使其受武裝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消滅國會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各勞動階級擺脫資產階級對於這些機關的糟踏。

（四）民族統一底組織

…『公社在它來不及詳細去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簡要大綱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應當…成爲甚至一個最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是會由各公社選舉出來的。

…「那時還會留歸中央政府的爲數不多而意義重大的一些職能，則不應該廢除——硬說應當廢除，這是故意僞造，——而應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即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不應消滅，反而應當用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現實，其方法就是消滅那以這個統一底體現者自居，但同時却想離民族而獨立，且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其實，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而已」…「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權底純粹壓迫機關，而其合理的職能，則要從這觀覷着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底負責公僕」。

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之不瞭解——也許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瞭解——馬克思這些議論，該到了何種程度，這點在叛徒伯恩施坦所著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上，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正是論到馬克思上述一段話時，伯恩施坦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說來，在所有一切重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幾字放在括弧內，想必他是用以表示譏諷的意思）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底思維進程是萬分接近的」。自然，——伯恩施坦接着又說，——市政局底意義在增長着，但是「我覺得成問題的，是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未必就是如此消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放，融解）現代國家，如此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其組織，如像馬克思和蒲魯東所設想的那樣：由各省或各省區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省區會議本身則又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織之，——這樣一來，全國代表機關底舊形式就會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一三四和第一三六頁）。

把馬克思對於「消滅國家政權這寄生蟲」的觀點拿來和蒲魯東底聯邦制混爲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爲機會主義者連想也想不到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根本不是要以聯邦制來和集中制對立，而是要打碎現存於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只是他在自己周圍，在市儉庸人之流中和「改良主義」沈滯環境裏所看見的東西，卽只是「市政局」！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則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關於這一點竟沒有人 and 伯恩施坦 爭論過。許多人都曾駁斥 伯恩施坦，——特別是在俄國著作界中有普列漢諾夫，在西歐著作界中有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說到伯恩施坦這一對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之不會用革命頭腦思索問題，不會思考革命，真是到了極點，竟把「聯邦制」加到馬克思身上，把他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爲一談。而想做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却對此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之最庸俗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個庸俗見解，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論公社經驗的議論裏，是連一點聯邦制的影子也沒有的。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相同處，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所看不見的；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不同之處，却恰巧是伯恩施坦所認爲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和蒲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之處，是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的，因爲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或巴枯寧不同之處，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待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者。在他上述那段議論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那些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能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認作是消滅集中制！

而如果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裏，完全自由地組織在各地公社內，將一切公社底行動統一起來打擊資本，打破資本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轉交全民族，全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麼？難道這不是最澈底的民主集中制麼？並且不就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麼？

伯恩施坦連想都想不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由各公社自願結合而為一個民族，可能由各無產者公社自願溶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伯恩施坦，也如任何一個庸人那樣，以為集中制只是一種自上的，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並維持着的東西。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的這些見解會有人曲解一樣，遂故意着重地說，如果非難公社要消滅民族統一並取消中央政權，那就是有意偽造。他故意使用『組織民族統一』一語，以便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拿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說的人，是比任何聾子都要聾些。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就正是^{不願聽說}要消滅國家政權，^{不願聽說}要消滅這個寄生蟲咧。

（五）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引幾段。

…『新的歷史創舉底通常命運，——馬克思寫道，——就是人們把它當作是抄襲舊的，甚至是早已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因為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之相似。於是這毀壞（bricht——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公社底復活…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聯盟（孟德斯鳩，基朗特派）…看作是那反對過分集中制的舊鬥爭底放大形式』…

…『公社制度定會把那些寄生於社會而阻滯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吞嚥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也就會把法國底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定會使鄉村生產者，受每一省區內各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使他們能在那裏獲得城市工人作為其自身利益底天然代表者。而公社本身底存在又自然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已在成為贅物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那是『寄生贅瘤』的『國家政權』，『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時成為贅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公社經驗時用來評論國家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而現在却只得將其發掘出來，使廣大羣衆能夠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根據他對所經歷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作出的結論，恰巧是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機已經到臨的時候，被人們遺忘了。

…『公社所引起的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現的利益之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極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

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公社底真正祕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反對佔有者階級之鬥爭底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制度就會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空想主義者曾從事於「發現」各種使社會能在其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根本擺手不談任何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國會制的民主國家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極限；他們在這個「模範」面前祈禱到碰破頭額的地步，並且把任何想毀壞這些政治形式的意向都稱之為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底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說，國家是一定會消逝的，而國家消逝底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沒有敢於去發現這個未來底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考察法國歷史，加以分析而作出按一八五一年事變所應作的結論：情形正歸結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而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革命運動業已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不管這個運動遭到挫折，不管這個運動爲期很短且顯然軟弱無力，而終於開始來研討，看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使勞動底經濟解放可能實現的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可以而且應當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

我們往下就會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中，在另一種條件下，繼續着公社底事業，並證實着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之點。恩格斯曾屢次說到這個問題，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個問題底其他方面發揮得非常鮮明而有力，因之我們對這些解釋必須加以特別說明。

(一)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公社底經驗，並再三說到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就是在論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顯然闡明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今國家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使我們有根據來把這兩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又顯然闡明那些不同的特徵，或者說達到國家消滅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這個問題是完全如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解決的：即是藉供求關係在經濟上逐漸的均衡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法，本身又再三地產生出這個問題，就是說，不能給予任何的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會要看時間和地方情形而定，同時也與那些更深遠得多的問題相聯繫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從事於臆造將來社會結

構底空想體系，那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時在各個大城市中已有很充足的住房，只要把這些住房應用得合理，便可以立即幫助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東，而把那些沒有住房的工人或現時住在人數過多住宅裏的工人們搬進這些房屋裏去。而當無產階級一奪得政權時，這種為社會福利所要求的辦法，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的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說到國家政權活動底內容。剝奪住宅和佔據住宅，也是按現代國家底命令實行着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手續方面來說，也會『下令』佔據住宅和剝奪房屋。但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勾結着的官吏，對於實施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顯然，簡直是毫不中用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在實現後一種辦法時，單個工人變為一個住房、一塊農民土地以及某些勞動工具底所有者；而在實現前一種辦法時，則由『勞動人民』成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發給個人或協作社。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的辦法並不就是要消滅地租，而是要把——雖然用變態的形式——地租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會排除承租和出租制底保存』（第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內將考察這段引證中提到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恩格斯說得謹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未必』——『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會毫無代價地發給住宅。把屬於全體人民的住宅取費租給各個家庭，就既要徵收這筆租金，也要

實行相當的監督，又要有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有特別的軍閥官僚機關連同其負責人員獨享的特權地位。而過渡到可以免費發給住宅的情形，則是與國家完全「消亡」相關連的。

恩格斯講到布朗基主義者在公社以後並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立場上來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底必要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乃是進到廢除階級，同時也就廢除國家的過渡」…（第五頁）。

那些愛好咬文嚼字批評的人們，或那些從事於「摧殘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也許以為，在這裏承認「廢除國家」，而在上述反杜林一段議論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公式來駁斥，是有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責備國際主義者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風氣，日益普遍地流行起來了。

國家隨階級之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一書中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議論，並不是簡單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似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

因為現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關於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曲解了，所以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在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彙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威權主義者』；這些論文僅在一九一三年才譯成德文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上。

…『如果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的立場時寫道，——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來替代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一種侮辱原罪的莫大罪惡，因為他們爲了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爲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竟不放棄武器，不廢除國家，却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一冊，第四〇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哩！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那認爲國家從階級消逝而消逝，或國家隨階級廢除而廢除的意見，而是反對使工人拒絕運用武裝，拒絕採用有組織的強力，即拒絕那應服務於『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一目的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那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的國家，以免人們把他與無政府主義鬥爭底真實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以廢除國家爲目的這一問題上，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意見。我們肯定地說，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運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爲要消滅階級，就必須有被壓迫階級底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選定最激烈最明顯的問題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工人推翻資本家底桎梏後，是應當『放棄武器』呢，還是應當利

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打破後者的反抗呢？而由這一階級來有系統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階級，若不是「暫時形式的」國家，那又是什麼呢？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問問自己：他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麼？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黨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的麼？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闡明得更詳盡，更通俗得多。他首先就譏笑蒲魯東主義者那種糊塗觀念，因為蒲魯東主義者自稱為「反威權主義者」，即否認任何威權，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行中的海船來說吧，這些以應用機器和由許多人有計劃合作為基礎的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服從關係，因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某種威權或權力，則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動作起來，這難道不明顯麼？

…「如果，——恩格斯說，——我提出這種論據來反對那些最頑固的反威權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是呵！這是對的，但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代表的那種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爲只須改變某一事物底名稱，就可改變這一事物本身哩」…

恩格斯這樣來指明了威權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底階段不同而變更，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很荒謬的；並補充說，採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是在日益擴大着，然後恩格斯就由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推論進而說到關於國家的問題。

…「如果，——恩格斯寫道，——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的社會組織祇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威權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成爲必要的事實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對名詞。

『爲什麼反威權主義者不只以叫喊反對政治威權和反對國家爲限呢？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爲，國家以及政治威權，將由於未來社會革命底結果而消逝，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爲關注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威權主義者却要求一舉而把政治國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產生出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底第一步動作就是廢除威權。

『這些先生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鎗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會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威權主義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麼，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僅僅是散佈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這一點，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底事業。在前後兩種場合內，他們都只是效勞於反動派』（第三九頁）。

在這段議論中間，牽涉到那些在考察關於國家消亡時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將專門論述這點）時應當考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係指出國家消亡底過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在其消亡底相當階段上，可以名之爲非政治的國家。

恩格斯這段議論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做恩格斯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三年以

來，已與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幾百萬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當採取的爭論態度。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這就是恩格斯對問題的提法。無政府主義者所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強力、權威、政權、國家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歸結為一句十足的市儈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厭棄。恩格斯底意見則完全不是這樣：他着重指出，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滅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然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即恰巧是機會主義派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所通常迴避不說，而專門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研究」的問題。並且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很果斷地說：公社不是應該更多多運用國家底，即握有武裝、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革命政權麼？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都是簡單用庸人底譏笑語句來敷衍，或至多也不過是用一句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樣的社會民主派，說它背叛了自己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是爲了極具體地來考察：無產階級對於銀行和國家，究竟應當採取什麼辦法。

（三）給伯伯爾的信

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致伯伯爾信中下述的這一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問題的著作內，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之一。附帶說說，據我們

所知道的，這封信第一次由伯伯爾刊印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第二卷中，這卷回憶錄是於一九一一年，即在這封信寫就並寄出之後經過三十六年才出版的。

恩格斯在這封致伯伯爾的信中，批評了那也由馬克思在致布拉克的有名信中批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特別說及國家問題時，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夠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再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相當的』（見德文原本第三二一至三二二頁）。

要注意到：這封信是關係於黨綱，而這個黨綱是馬克思在他距此信僅幾星期後發出的信裏批評過的（馬克思底信寫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那句話中使用『我們』二字時，他毫無疑義是以自己和馬克思底名義來向德國工人黨底領袖提議，從黨綱中把『國家』字樣勾銷而代之以『公團』字樣。

如果向現在這班爲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偽造出的『馬克思主義』底頭目們提議如此修改黨綱，那末他們該會怎樣狂吠起來，大罵『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爲了這點會褒獎他們的。

而我們則要做我們的事。在審查我們黨綱的時候，是絕對要注意到恩格斯與馬克思底忠告，以便更接近於真理，以便恢復馬克思主義而清除掉一切對於它的曲解，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困難也許只會在於名詞上。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團』，而恩格斯所採用的那個，並不是表示單個公團，而是表示各個公團底總和，公團底體系。在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字，所以我們也許只得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字，雖則這個字也有其不便之處。

『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斷語。看了上文以後，這個斷語是完全可以懂得的。公社已再不成其爲國家了，因爲當時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居民底大多數，而是居民中的少數（剝削者）；它已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自己上台來代替那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凡此一切，都是離開了原來意義的國家。而如果公社臻於黨內，那末在它中間，國家底痕跡就會自行『消亡掉』，它就會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將無事可作而逐漸停止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字樣來挖苦我們』，——恩格斯說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而言。恩格斯之所以認爲這種攻擊是正確的，乃是因爲『人民國家』是與『自由人民國家』一樣荒謬，一樣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會努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其在原則上正確，使其除去那些對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偏見。可惜！恩格斯這封信竟被擱藏起來達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便

會看見，就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複着那些爲恩格斯所警告過的錯誤。

伯伯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寫信回答恩格斯，就中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於黨綱草案的批判，並說他責備了李卜克內西底那種讓步態度（伯伯爾底回憶錄，德文版第二卷，第三三四頁）。但是，如果拿伯伯爾所著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來看，那我們就會在其中遇見一些對於國家問題的完全不正確的議論：

『必須把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爲人民的國家』（我們的目的，一八八六年德文版，第一四頁）。

這是刊印在伯伯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吸收了這如此頑固重複着的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議論，尤其是當恩格斯底革命解釋被藏匿着，而全部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四）愛爾福特綱領³⁴草案批評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決不能不說到恩格斯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寄給考茨基，而直至十年以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出來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因爲這主要是爲了批評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制度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而作的。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也給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表明恩格斯曾如何細心深思地考察了最新資本主義底種種變態，並因而如何善於在某種程度內預示到現今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如下：論到該綱領草案所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特質的『無計劃性』（：lanlosigkeit）一語時，恩格斯寫道：

…『當股份公司進到統治並壟斷整批工業部門的托拉斯時，那就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

了』（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冊，第八頁）。

這裏已經指出了對最新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估計中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變成爲壟斷的資本主義。後面這幾個字是必須加上着重點的，因爲最廣泛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言，似乎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未曾產生，至今沒有產生，而且也不能產生的。就儘管托拉斯產生出某些計劃性，儘管資本大王們預先多少計算一國範圍或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多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其新階段上，但毫無疑義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的資本主義之「接近」於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底真正代表看來，乃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容易實現，可以實現和不可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所有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但我們再回轉來講國家問題吧。恩格斯在這裏給了三個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與國家制度間的聯系；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說到共和國，那末恩格斯是把這點當作他對愛爾蘭特綱領草案批評的重心。如果我們記起當時愛爾蘭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它成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標本的事實，那就可以毫無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乃是批評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

「草案底政治要求——恩格斯寫道，——有一個很大的缺點。該草案中沒有說到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到的東西」。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憲法不過是一八五〇年最反動憲法的抄本，德國國會，正像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君主專制底遮羞物』，想在這法定各小國存在和法定日耳曼各小國聯盟的憲法基礎上，實行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產』，那就是『顯然荒謬的思想』。

『提到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是不能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在綱領中提出的。但是恩格斯並不因『大家』都以為滿足，就簡簡單單容忍這個不言而喻的理由。所以他又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當推進的。恰巧現時在大部份社會民主黨刊物上散佈着的(ein-reissende)機會主義，表明這件事情是如何必要了。現在，人們害怕那反社會黨人法令⁸⁵又會恢復起來，或是因回想起在這個法令盛行時所作過的某些過早的聲明，就想要黨承認德現今的法定制度足以和平實現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害怕非常法令復活為出發點的這個基本事實提在第一位，且毫不遲疑地稱之為機會主義，並申言說，正因在德國缺乏共和制度與自由，所以關於『和平』道路的夢想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充分謹慎，而不自行掣肘。他承認，在具有共和制度或具有很廣泛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呵！）有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一切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宣稱有這種可能，且在沒有任何必要時作出這種宣言，那就等於替君主專制揭去其遮羞物，而親自去替它遮蓋裸體罷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於是其中絕大多數正式領袖就果然成了君主專制底掩蓋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他們把一些普泛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在第一位，而藉此將那些在大事變一發生，在政治危機一爆發時，就會自然而然提到日程上來的迫近的具體問題掩蔽起來。其結果就只會使黨在有決定意義的關頭突然陷於束手無策的狀態，而在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使黨不知所從和缺乏一致，因為這些問題是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的…』

『這樣為着眼前片刻的利益而忘却宏偉的根本大計，這樣貪圖一時的成功，這樣專為一時成功而不估計將來結果的鬥爭，這樣為了現在而犧牲將來運動的態度，也許是導源於『誠實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都是機會主義，而且『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更要危險些…』

『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一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這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持有形式，這是法國大革命所已經表明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重複說到一個昭然貫澈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認為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絲毫不消除資本統治，因而絲毫不消除對於羣衆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必然會使這個鬥爭如此擴大、如此展開、如此暴露、如此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羣衆根本利益時，則這種可能就會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即在這個羣衆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的條件下，見諸實現。這在整個第二國際內，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遺忘情形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

論到與居民民族成份有關的聯邦共和國問題時，恩格斯寫道：

『什麼東西應當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它有反動的君主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國分立制，這個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底種種特點鞏固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整體的德意志中）。『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形式。聯邦共和國一般和整個說來，現今還是在美國廣大地區上所必需的；雖然在其東部一帶它已成爲障礙了。如果在英國建立聯邦共和國，那就會是一個進步，因爲在英國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個民族，而其國會雖然是統一的，可是此刻已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存在着。聯邦共和國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爲障礙物了。那裏，其所以還可容忍聯邦共和制度，這僅僅是因爲瑞士自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純粹消極的一員而已。若在德國實施瑞士式的聯邦制度，那就會是一大退步。聯盟制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兩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盟的國家，都有其特別的民法和刑法，有其特別的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同時並存的由各邦國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自治邦不管其大小如何都以一個邦的資格來參加表決』。在德國，聯盟制國家是達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過渡，我們的任務不是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³⁶往後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運動』來對它加以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反而非常細心地努力去分析那些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個別情形底具體歷史特點來看清某一過渡形式是由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把聯邦共和國看作或者是例外情形和對於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進到集中

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特殊條件下的『進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提出民族問題。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批評小國家系統底反動性以及在一定具體情形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現象，可是他無論何處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偏向，——這個偏向是荷蘭和波蘭兩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的』小國家市儈狹隘民族主義之極正當的鬥爭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在這個無論從地理條件，或統一的語言，或數百年來的歷史看來都似乎已把英國各單個小疆小域底民族問題『解決了』的國家裏，恩格斯也估計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問題還沒有消逝，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共和國底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為實現統一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進行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運用這個概念時那樣，把民主集中制瞭解為官僚主義的意思。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也不排斥廣闊的地方自治制，這種地方自治只要有各『公社』和各省區自願地堅持國家底統一，便可絕對消除任何官僚主義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

…『總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國』——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觀點時寫道，——『但不是如像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不過是一七九八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從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八年，法國每一省，每一公社（Gemeinde）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正是我們也應當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才可不要官僚制，這是美國和第一法蘭西共和國已經向我們指明和證明了的，而現在澳洲、坎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又一次地指明給我們看。

這種省區的和公社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聯邦制自由得多的制度，在那裏，雖然單個自治邦對於整個聯邦國家是很獨立，但它對於縣和公社也是獨立的。自治邦的政府任命縣知事和地方長官，這是在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現象，我們將來在自己國家中也應當斷然排除，亦如排除普魯士的專員，縣長，省長以及一般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點，恩格斯提議扎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規定如下：「在各省各縣各公社經過依普選制選出的官吏來實行完全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當局和各省當局」。

在被克倫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總長底政府所封禁的真理報上（第六十八期，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已經指出過，關於這一點——自然遠不只這一點——我國假革命假民主派底假社會主義的代表們，是如何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自然，這些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來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根據確鑿事實，按最確切的實例，駁斥那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以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些。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是比聯邦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真正要多些。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和省區等等所享受過的最多的自由，是集中制共和國所給予，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給予的。

對於這件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在我們黨的宣傳和鼓動中，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充分注意到。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爲法蘭西內戰一書第三版上作的序言中，——這篇序言是作於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最初登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對有關國家態度的問題作了許多饒趣的附帶指示而外，又對公社底教訓作了一個極鮮明的總結。這個總結，由於有從公社起至當時止二十年間的全部經驗而更加深刻化，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那流行於德國的『國家迷信』的這個總結，真可稱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定論。

『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說，——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因此，在每一次由工人爭來的革命以後，就發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遭受失敗』…

這個對於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瞭。問題底實質——就中也關於國家問題（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明得非常切要中肯。而恰巧這一實質，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大學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迴避不說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一個『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烈鐵里獲得了榮幸（卡芬雅克式的榮幸）機會來洩漏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秘密。策烈鐵里在其六月十一日發表的『歷史的』演說中，偶然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裝的決定，同時當然把這個決定冒充爲他自己的決定，並且一般地是『國家』所必要的！

策烈鐵里於六月十一日發表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是每一個著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家都可引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來證明策烈鐵里先生所主持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革命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也與國家問題有關的附帶指示，是關於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其腐朽而愈益機會主義化，於是對於『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的有名公式，也就愈益加上庸俗的曲解。就是把這個公式曲解成爲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黨也是一件私人事情！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當時所奮起反對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還只看見自己黨內機會主義底是微小的萌芽，因此他在當時說得很謹慎：

『參加公社會議的，幾乎盡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它的決議就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有些決議是把作爲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基礎，而被共和派資產階級因其卑鄙怯懦所拒絕了的改良辦法，加以法定。例如實行了如下的原則：宗教對國家而言僅僅是私人事情。公社頒佈的另外一些決議，則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在某種程度內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的內腑』…

恩格斯故意把『對國家而言』幾字加上着重點，乃是針對着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加以打擊，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把宗教宣佈爲是對黨而言的私人事情，——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底黨降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僧水準，這種市僧願意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這一任務。

將來著述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的人，當探究該黨在一九一四年陷於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論文中那些向機會主義大開門戶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於一九一三年„Los von Kirche-Bewegung“（與教會分離運動）的態度爲止。

但是現在我們且來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怎樣給奮鬥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的教訓吧。

以下就是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教訓：

…「正是至今存在的集中政府底壓迫權力——軍隊，政治警察，官僚，即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所創立，而從那時起被每屆新政府當作適宜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敵人的權力——正是這個權力，應該在法國到處傾覆，亦如它已在巴黎傾覆過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本來應當承認，工人階級得到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從事管理；工人階級爲要不致又喪失剛才爭得的統治，它就應當：一方面剷除那至今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全部舊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就應當保證有可能防範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而宣告所有他們毫無例外地都可以隨時撤換」…

恩格斯再三着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它的根本特徵，即把本來是「社會公僕」、社會機關的官吏，變爲社會主人的現象仍然保留着。

…「爲了不讓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這種現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都委任那些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了按選舉者決議隨時可以撤銷被選舉者的法制。第二，它給予所有一切公務人員的薪水，不分職位高低，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所一般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

* 這在名義上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計算，約等於六千盧布。有些布爾什維克犯了一種完全不可寬恕的罪過，例如他們竟在市議會中提議支付九千盧布的薪水，而不提議對全國施行以六千盧布爲最高限度的薪金，——這個數目是足夠的。

這樣就造成了防止那種濫營祿位和升官發財主義的可靠隄防，何況公社此外還施行了各代表機關代表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

恩格斯在這裏講到了一個有趣味的界綫，一達到這個界綫，徹底的民主制就變為社會主義，同時也就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為，爲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服務機關底職能變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以便使絕大多數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然後且使全體居民都能擔負，都能勝任，而爲要完全排除升官發財主義，就必須使那些雖然是收入不豐但亦「榮譽」的國家服務機關中的位置，不能成爲博得銀行或股份公司內肥美餽份的橋樑，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很常見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却又是多餘的事。這種似乎很機智而實則不正確的論調，對於任何一個民主設施——連對官吏支付普通薪水的辦法也在內——都可以如此重復，因爲貫徹到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會消亡掉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舊時有句笑話：如果一個人脫掉一根頭髮，那末他是否就成了禿頭呢？

把民主制發展到底，尋求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踐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爲社會革命而鬥爭中的基本任務之一。如果民主制是一種單獨存在的東西，那末任何民主制都不能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無論何時都不會是「單獨存在」，而會是「總合存在」的，將也要影響到經濟，推進其改造，受到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是活生生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繼續說：

…『這種炸毀（Sprengung）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它的情形，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詳細描寫過了。但是，這裏還須再一次簡單論述這種代替底幾個特點，因為恰巧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已經由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說來，國家是『觀念底實現』，或譯成哲學語句，便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亦即永恆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而由此就產生了崇拜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事物的迷信心理，這種崇拜心理之所以很容易根深蒂固起來，是因為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似乎全社會公共事業與公共利益只能用舊有方法來處置和保護，就是說，只有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作。人們以為，假使不再去迷信世襲君主制度而主張民主共和制度，那他們就已是非常勇敢地前進了一步。其實，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至少國家也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獲得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害；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也如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設除這個禍害底惡劣方面，直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一代人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的時候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叫他們在君主制度由共和制度所代替時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讀起來好像是直接對於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一般先生們的教訓，他們在其參加『聯合』政府的實踐中，正表現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對於國家的崇拜！

還要指出兩點：（一）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國家之為『這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是『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度下的，但這根本不是說，壓迫底形式對於無產階級就漠不相關，如

像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誨』的那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鬥爭形式和階級壓迫形式，能夠大大促進無產階級為消滅一般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二）爲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才能完全拋棄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呢——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底消除問題相關連的，我們現在正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恩格斯講到『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曾連帶說及這一點。

恩格斯在他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一八七〇年代雜著彙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的自序（作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中寫道：所有一切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一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名詞，因為當時法國蒲魯東派和德國拉薩爾派都自稱爲社會民主主義者。

…『因此在當時，馬克思和我兩人——恩格斯繼續說，——都覺得爲了表明我們持有的觀點，絕對不可用這樣一個帶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許可以過得去（mag passiren），雖然它對我們這樣的黨，是仍舊不確切的（un passend，不適當的），因為我們黨底經濟綱領不簡單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逕直是共產主義的，因為我們黨底最終政治目的是在消除全部國家，因而也就是消除民主制。但是，真正（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政黨的名稱，是始終不會完全名符其實的：黨在發展着，而名稱却依然如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臨終時都仍然忠實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曾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確切的黨的名稱，但是未曾有真正的，即羣衆的無產階級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有了真正的黨，但其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其名稱在科學上的不正確性不會對它隱瞞起來，不會妨碍它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個談諧家會用恩格斯的說法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有真正的黨，它發展得很好；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沒有意義的怪異名稱，除表示我們在一九〇三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佔有多數³⁷的這一全屬偶然的事實而外，絕對沒有其他什麼意思的名稱，也是「可以過得去」的…也許現在，由於我們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市會民主黨人在七八月間肆行追究的結果，已使「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成爲享有全民榮譽的名稱，除此而外，這種追究又還表明我們黨在其真正的發展上作了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進步，因此，也許我自己也對於我在四月間提出的變更我黨名稱的提議猶豫起來。也許我要向自己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爲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幾個字留下放在括弧內面…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在通常談論國家問題時，人們常常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過而我們已經在上文中順便指出了的那個錯誤。就是說：人們常常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消亡也就是民主制底消亡。

驟然看來，這樣的斷語似乎是極端奇怪而難於了解的；也許，甚至有些人會發生這樣的恐懼心：莫不是我們期望有一個將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麼？因爲民主制也就是承認這種原則哩。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同一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制度，就是說，是為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這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施行有系統的強力的組織。

我們所抱定的終極目的，是要消滅國家，就是說，要根本消滅任何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強力，任何加於人們的強力。我們並不期望有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但是，我們既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就深信社會主義將轉變為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必要來對人們施用強力，不會有任何必要來使這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使這一部分居民服從於另一部分居民，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起碼條件，而不需要有強力和服從。

為要着重指出這個習慣的因素，所以恩格斯就說到新起的一代人，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掉」——這裏所謂國家制度是指任何國家制度而言，連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也在內。

為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考察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瓦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刊登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上，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為詳盡的說明。在這精彩著作中批評拉薩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之聯繫的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伯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派』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驅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團』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為甚至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至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底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頗為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

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絲毫沒有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正像例如一個自然科學家提出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進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却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國與它在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乃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管其形式如何紛繁複雜，而各個不同的文明國度裏各個不同的國家却有一個彼此共同之點：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制度』，以與其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死亡時的那個未來相對立。

『其次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遭到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那時，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類似的社會職能仍然會保存？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與『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起來，也是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的』…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以後，就來說明問題的提法，且似乎是特別警告說，爲要給這個問題以科學的答覆，就祇可依據確切判明了的科學材料。

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所完全確切判明了的第一點，亦即先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今又爲那些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遺忘的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時期或特別階段。

（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繼續說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便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底發展情形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那些實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民主制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究竟是怎樣變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它實際上始終只是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

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的。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際此時期中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所作的，要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所作的多得多。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的這種政治上覺悟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大眾生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擯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離開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離開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之是完全虛偽和騙人的民主制而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平穩朝着「愈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別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緝成爲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爲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爲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許多剝奪自由的手段。爲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鎮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伯爾的信中很燦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份子，即是把他們摒除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澈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是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

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世箴言上所重複着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力，不需要什麼強制，不需要什麼服從，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為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憤恨，引起抗議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供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則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那它也就會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有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別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這樣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兇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加於剝削者少數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

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乃是一件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悖的，於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的需要性就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羣衆底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預先在這裏指出一下）就夠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為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個別別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情，却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情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羣文明人都很容易和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的事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違背公共生活規則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生的根本社會原因，乃是羣衆被剝削，羣衆陷於飢寒貧困，而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漸進程度如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去憑空幻想，而是把現時所能確定的東西加以更詳細的確定，即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間的區別。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為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不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所說的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胞胎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歸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份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它也如任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

「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別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為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夠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在內，連「我們的」杜干³⁸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彷彿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彷彿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此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式的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是不復存在的了。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認許不等人們按不等量的（事實上不等的）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

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所以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為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四）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亂除的。

這種剝奪就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礙着這種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種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將勞動變為「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並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速度為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為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³⁹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各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各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想到要

「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沙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⁴⁰一樣，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並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家，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家來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蠱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的，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過的他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

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掘壕隊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為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式地臆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為若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哩！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也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

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都是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剛從資本主義胞胎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裏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人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為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這個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為一種僵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羣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點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民主制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

——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羣衆——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警——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這裏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即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實現了的人人識字情形，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些已經社會化的巨大的複雜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條的手續*。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職能了」（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論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和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智識份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為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底卑鄙醜惡現象，並為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為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因為當大家都已學會管理並且實際上已在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舉動就必然會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智識份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的），於是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為習慣了。

到那時候，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關於國家對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如一般關於革命的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有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增長而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標本的現象，就

* 斯大林同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並發揮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以及在社會主義已經獲得勝利和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條件下這國家的任務。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聯共（布）中央工作報告內說道：

『…一九一七年八月，即是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成立幾個月以前，列寧寫成了他那部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列寧認為他這部著作底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當時立意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裏，他打算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列寧在他這本書第二部分裏，是想依據我們國家裏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繼續闡明和發揮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沒有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但列寧所沒完成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該去完成的（掌聲如雷）。

國家是在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所以產生，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和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是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保護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從前，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曾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了要推翻資本主義，不僅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必須剝奪資本家，而且必須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吏機關，打破它的警察，而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

是甚至當他們直接觸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來加以迴避，或者不理會它。

一般整個看來，我們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上採取了既有利於機會主義又培養機會主義的這種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把它完全庸俗化。

爲要簡括說明這詞可悲的過程，我們且拿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作的。但是決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加以變更而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初原有職能在將來也應當完全保存。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境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的。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爲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那些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條件。於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就實現了兩個基本的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一點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底職能是要鎮壓那些不順從的人，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爲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這一點也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也進行過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是爲了保護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而從前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却是爲了保護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新經濟底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著了一本專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關係問題的小冊子，標名為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是於一八九四年用德文出版的。

普列漢諾夫異想天開地論述這個題目時，竟把反無政府主義鬥爭中最迫切最緊急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即關於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和一般關於國家的問題完全避開不談！他的這本小冊子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份子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份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因此而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爲捉拿懲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是歷史上從所未有，並且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停止在此地。我們是在繼續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中譯本 第七八九至七九三頁）。——編者。

最出色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藝的部分，其中包含有許多關於斯底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史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着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

題目上的這種配合，不但令人可笑，而且足以特徵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的全部活動：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普列漢諾夫正這樣表明自己是個半學究，半庸人，在政治上是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走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最詳盡地說明了自己關於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的見解。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出版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評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鬥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代表大會閉幕後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曾企圖恰把巴黎公社宣稱為『他們自己的』，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同時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這些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甚至沒有給一個略近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把整個關於國家的問題迴避不說，毫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公社以後的全部發展過程，這就必然要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因為機會主義所最要求的，正是完全不提出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單是這點也就是機會主義獲得勝利了。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在俄國文壇中的譯本，無疑是比在任何其他國家文壇中多得無可計量。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戲謔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的還要多些（附帶說說，在這句戲謔話裏含有比說出這話的人所料想的還更加深切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對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作品的需求，表現得非常厲害，空前未有，並且所得到的這些作品的譯本要比其他各國多得無比，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隣國底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底所謂年輕基地上來了）。

考茨基之特別著名於俄國，除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以外，就是他與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的論戰。然而有一件差不多沒有人知道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把考茨基怎樣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最大危機時期中滾到最可恥的錯亂境地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立場上去的情形加以考察，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不說的。這一事實就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曙光雜誌，曾不得不與考茨基爭辯，而把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決議⁴¹叫作『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所持的態度是曖昧的，躲閃的，並且是調和的。在德國文獻中還刊行過考茨基底信札，這些信札也表明他在奮起攻擊伯恩施坦以前表示過同樣厲害的動搖。

然而，含有更大得無比的意義的事實，就是現在當我們研究考茨基最近叛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看到，在他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和問題解釋方式中，他恰恰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著作，即是他著的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在其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斥馬克思主義爲『布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資產者千百次重複這種指斥來攻擊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特別說到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企圖——我們已經說過，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成就的——把馬克思對於公社教訓的觀點與蒲魯東的觀點混爲一談。伯恩施坦曾特別注意到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序言中特別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中把它至少重複過三次，將其極端曲解成爲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炸毀（Sprengrung，即炸毀，是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而在伯恩施坦說來，似乎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分的革命手段。

這真是對馬克思思想之最粗蠻最醜陋不過的曲解了。

而考茨基在他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最詳細的辯駁中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肯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絕頂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他把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恩格斯序言中的一段話引來後，就說什麼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但它一般地是能夠握取這個機器的，如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與馬克思真正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加在馬克思頭上，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問題的最重要的區別，被考茨基抹煞了！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問題，——考茨基在『反對』伯恩施坦時說道，——我們可以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見德文版第一七二頁）。

這不是反對伯恩施坦的論戰，而其實是向他讓步，是把障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此刻所需要的，恰巧祇是要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根本問題都『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這四十年當中，教誨無產階級，說它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已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却玩弄手法，拿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替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爭辯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道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這樣的話頭來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倆對於無產階級黨應準備工人階級去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存在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我們且拿考茨基另一部更加成熟的，也多半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錯誤的著作來說吧。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裏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拿來作為他所特選的題目。他提供了很多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迴避過去。在這本小冊子內到處都只是說奪取國家政權，這就是說，他選擇的語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它認許奪取政權而不必破壞國家機器。恰巧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認為在共產黨宣言綱領上已經『陳舊』的東西，考茨基却在一九〇二年把它復活起來了。

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特闢一節，專論『社會革命底形式與武器』。其中講到羣衆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大國家底權力工具如官僚和軍隊』，但是關於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並非偶然的了。

考茨基把問題敘述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這個綱領底條款。至於一八七一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一問題方面所給出的新東西，他却一不置一辭。考茨基用下面這樣一些『堂皇』動聽的老生常談來敷衍了事：

『不言而喻，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革命本身就預定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定會改變我們現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如馬吃燕麥，窩爾加河流入裏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深刻的』鬥爭一類的話，來迴避下面這個對革命無產階級是很迫切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對於民主制的態度，比較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處』，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考茨基既迴避這個問題，在事實上就是在這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而在口頭上却向它宣佈赫赫可畏的戰爭，強調『革命思想』底意義（試問如果害怕向工人宣傳革命底具體教訓，那末這個『思想』究竟還有多大的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了』。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考茨基寫道，——可以同時存在着形式上極不相同的各種企業：官僚的（??），工聯的，

合作社的以及個體的企業」… 「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如下的形式：由工人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而這個國會就規定工作規則並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可以交給工會辦理，另外一種企業則可以按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見一九〇三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頁和第一一五頁）。

這個議論是錯誤的，它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公社教訓做例子所解釋的，是倒退了一步。

從似乎必須有「官僚」組織方面來看，鐵路是和大機器工業內所有一切企業，是和任何工廠、大商店以及大資本主義農場絕對沒有什麼區別的。在所有這些企業中，生產技術都要求有絕對嚴格的紀律，要求每個人萬分準確執行其所擔負的那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使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使機器損壞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

但是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式的國會。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僅僅「規定規則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如像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範圍以外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東西」，當然會「規定規則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卻不會是「官僚的」。工人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碎，把它根本毀壞，把它粉碎無餘，而代之以仍然是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的機關；爲了防範這些人變成官僚起見，將立即採取那些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的辦法：（一）不僅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水不得高於工人底工資；（三）立刻過渡到使一切人

都來執行監督和監視底職能，使一切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就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爲『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思索過馬克思底話：『公社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考茨基完全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的區別，資產階級國會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用的）與官僚制（反人民的）聯成一氣，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則會立即採取辦法來根本剷除官僚制，且能夠把這種辦法實行到底，一直到把官僚制完全消滅，把供人民享用的民主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崇拜』國家，『迷信』官僚主義的態度。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的和最好的一本反機會主義的著作，即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因爲它是一九〇九年，在我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大進步，因爲其中不是說到一般革命綱領，像在一八九九年爲反對伯恩施坦而作的小冊子那樣，不是不管社會革命到來時期如何而泛論社會革命底任務，像在一九〇二年著的社會革命小冊子那樣，而是講述那些使我們必得承認『革命時代』正在到來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指出一般階級矛盾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着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以後，在東方自一九〇五年起也開始着同樣的時期。世界戰爭以驚人的速度逼臨而來。『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的革命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的時期了』。『革命的時代正在開始』。

這些斷言是完全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爲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德國社會民主黨曾答應要作什麼，而到戰

爭爆發的時候，它（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墮落到了怎樣下流地步了。『現在的形勢——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道——會引起一種危險，使人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視作比實際上更溫和的人』。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原來比人們所感覺到的還要更溫和得多，更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說過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而所有這些迴避問題、甘守緘默、托辭推諉等行爲總結起來，就必然產生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事實，關於這個事實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爲代表來聲明說：我保持着革命見解（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革命底新時代已經到來（一九〇九年）；但是，既然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我就畢竟要違背馬克思還在一八五二年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一九一二年）了。

在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裏，問題正是這樣直截提出的。

（三）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潘業枯克以『左翼急進』派代表之一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這個派別有盧森堡，拉狄克及其他等人參加在內，極力堅持革命策略，而一致確信考茨基已轉到毫無原則地動搖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中派』立場上。這一見解底正確性已爲戰爭所充分證明，此時，『中派』（有人稱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派』，已把它全部可憎的卑鄙齷齪性完全表露出來了。

潘業枯克在他標題為羣衆行動與革命而論到國家問題的一文（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三十卷，第二冊）裏，把考茨基底立場估計為『消極的急進主義』立場，估計為『毫無作爲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第六一六頁）。潘業枯克這樣提出問題後，就談到我們所注意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任務題目。

『無產階級鬥爭——他寫道，——不簡單是爲爭奪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和消除（直譯爲消散，Auflösung）這些武器…只有把國家組織完全破壞，即鬥爭底最後結果已經到來時，鬥爭才告終止。人民多數底組織消滅佔統治他位的少數底組織，而以此證明自己的優越性』（第五四八頁）。

潘業枯克用以表示自己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他的意思畢竟是很明顯，且來看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這種意思，倒是很有趣味的。

『直到現在——考茨基寫道，——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要奪得國家政權，而後者却想要破壞這個政權。潘業枯克則想要把兩者兼而有之』（第七二四頁）。

如果潘業枯克底議論犯有不明晰和不充分具體的毛病（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因與本題無關，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是把潘業枯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旨找到了，而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却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爲自己的目的，認爲這個目的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只有當使國家走到消亡的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可以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完全消滅國家，却不懂得實現這種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必須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完全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所構成的公社式的國家制度代替之；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應當用什麼去代替它和無產階級將怎樣來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由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其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利用現代國家爲手段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反對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業枯克，因爲馬克思正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就是說，不能簡單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到新人手中來運用，而應當打碎、毀壞這個機關，代之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到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爲他恰恰完全抹煞了爲機會主義者所絕然不能接受的這個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把「奪取」解釋成爲簡單獲得多數，這就恰恰是替機會主義者留下一個逃身穴洞。

考茨基爲掩飾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起見，就採用書獃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自己底話。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說必須使『強力斷然集中於國家政權之手』。而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問道：潘業枯克莫不是想破壞『集中制』麼？

這就不過是一套把戲了，正與伯恩施坦在以聯邦制代替集中制的見解上，把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混爲一談的把戲相像。

考茨基所『引證』的話，與本題格格不入。集中制是無論用新

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可能實現的。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會是集中制，可是這將是以『完全破壞』國家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為基礎。考茨基採用十足的騙子手段，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那些盡人皆知的議論迴避不說，却拖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句。

…「也許潘業枯克想要消滅官吏底國家職能麼？——考茨基接着說道，——但是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更不待說在國家行政機關內了。我們的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國家官吏，而是要求官吏民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的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在我們尚未奪得國家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鬥爭是不是要消除（直譯為消散 *auf löst*）國家政權。內閣中有哪一部及其官吏可以消除呢？」於是他就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所取消…為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得到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將來的國家』以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我們這個反對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第七二五頁）。

這顯然是欺假手段。潘業枯克所提出的，恰恰是關於革命的問題。這是無論在他那篇論文底標題上或在上面摘引的那一段文字當中，都說得很明顯。考茨基既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就恰恰是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現在我們是反對黨，而在奪得政權以後，我們再來特別談論吧。革命化為烏有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求的。

這裏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而代之以由武裝工人構成的新機關。考茨基暴露出自己對於『閣

部』的『崇拜』，但試問爲什麼不可以例如由擁有十足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所設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閣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將來會是『閣部』仍然存在，還是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關；這些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還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線的聯繫，並且是完全頑固守舊的），抑或要加以破壞而用新的去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由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由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用新的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基本思想，而考茨基却把它抹煞掉，或是完全沒有瞭解它。

他提出關於官吏的問題，顯然表明他沒有瞭解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底學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行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所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下，民主制是被僱傭奴隸制和羣衆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所縮小，壓抑和割削得殘缺不全。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職員就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出變爲官僚的趨勢，就是說變爲脫離羣衆而駕於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主義底實質所在，而當資本家沒有被剝奪以前，當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公務人員都不免會相當『官僚化』的。

從考茨基的話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選舉的公務人員將仍然存在，那末在社會主義下，官吏也將仍然存在，官僚制也將仍然存在！這點恰恰不對。馬克思正是按公社底實例而指明在社會主義之下，公務人員將不復是『官僚』，將不復是『官吏』，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除實行選舉制以外，還實行隨時撤換制，並且還實

行使薪俸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準，並且還以『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實質上，考茨基用以反對潘業枯克的全部論據，尤其是考茨基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的那個妙極了的理由，就表明考茨基是重複着伯恩施坦一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伯恩施坦在他所著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這本叛徒作品中，激烈反對『原始的』民主制觀念，反對他所稱爲『教條式的民主制』的東西：如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不領報酬的公務人員，軟弱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維伯夫婦所解釋的英國工聯底經驗。據說，工聯似乎是『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一三七頁）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按其七十年來發展的情形，工聯確信原始的民主制真已毫不中用，乃代之以通常的民主制，即與官僚制結合的國會制。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條件下發展，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發展的，在這個制度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禍害、強力、不公平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等的現象，非有種種讓步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下，『原始的』民主制底許多成分必然要復活起來，因爲，人民大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第一次起來不僅實行獨立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一切人都將輪流來管理，於是就會很快地習慣於不要任何人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頭腦，在公社底實際辦法中所看到了的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畏怯成性，因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決然脫離關係而害怕它和不願意承認它，無政府主義者則或由於急躁，或由於一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底條件而不願意看見它。『連想也不要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閹部和官吏哪能行得通呵』——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推論的，因爲機會主義者滿懷着庸人思想，實

際上不但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性，而且還怕革命怕得要死（如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祇須關心到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着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底具體教訓，用不着分析應當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那被破壞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指無政府主義者中的優秀份子，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一流人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如此推論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得出的策略就是一種絕望底策略，而不是那種勇敢無情、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實際條件、用以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公社在數星期間就能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作出實行上述種種辦法來擴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義的榜樣。我們將做法公社社員底革命勇氣，我們將把他們的實際辦法當作是指示實際迫切且立刻可能實現的辦法，那時，我們既按這樣的道路前進，就能達到完全破壞官僚主義。

實現這種破壞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時間，將發動羣衆去過新生活，將使大多數居民一無例外地都可執行『國家職能』，而這也就會一般地使任何國家都完全消亡下去。

…『羣衆罷工底任務——考茨基繼續說道，——無論何時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某問題上採取讓步態度，或用一個遷就(entgegenkommende)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對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於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造成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相當變動(Verschiebung)…於是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也如從前一樣，

仍然是以取得國會中大多數為手段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爲駕於政府之上的主人翁」（第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這就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在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在行動上則背叛革命了。考茨基思想僅限於要一個「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較之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這一原則，是倒退到庸人思想方面去。

考茨基祇須實現他所愛好的與謝德曼輩、普列漢諾夫輩以及王德威爾得輩的「統一」，因爲他們都贊成要爭得「遷就無產階級的」政府。

我們則要實行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們分裂，而爲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務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爲政府。這真是「天大的區別」。

考茨基祇須同列金輩、達維德輩、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輩、策烈迭里輩和切爾諾夫輩這些親熱伙伴們同處，因爲他們都完全贊成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變動」，爭取「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這是極高尚的目的，其中一切都是機會主義者所可接受的，其中一切都是始終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範圍以外的。

我們則要實行和機會主義者分裂；而整個覺悟無產階級就會隨同我們一塊鬥爭，不是爲爭取「勢力對比底變動」，而是爲推翻資產階級，爲破壞資產階級國會制，爲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爲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而鬥爭。

* * *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有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如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達維德、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包括斯堪的那維亞人斯道寧格和布蘭亭在內），在法國和比利時有饒勒斯派

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屈拉第、特列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其實是一個始終依賴自由派的），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國會黨團工作裏和在黨底政論方面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統治的作用，他們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毫無掩飾的機會主義。在這班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却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毫無重大的區別。

我們根據這一情況，可以作出結論說：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們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公社底經驗不僅被他們遺忘，而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教導工人羣衆說，快到工人們應當發動起來的時候，那時務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代替它，並這樣來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為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社會的基礎；——他們不僅沒有這樣作，反而教導工人羣衆以相反的東西，而他們對「奪取政權」的瞭解，則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處逃身穴洞。

當國家連同其因帝國主義實行競賽而加強了的軍事機關，已變成爲屠殺千百萬人民生命的軍事怪物，以求解決這一爭執，究竟是由德國或英國，由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時候，把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曲解和隱諱起來，是不能不起極大作用的*。

* 在手稿內還有如下一段：

第七章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

本章所標明的題目，如此廣闊無垠，是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的。在這本小冊子中，當然只好限於說明那些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政權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在此截止。——編者）。

初版書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寫的。我當時已擬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大綱。但是除題目以外，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成，因為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妨礙」了。這種「妨礙」只可引為慶幸。但是，本書第二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也許要延擱一個長的時期；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

作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彼得格勒。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

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一至一〇四頁。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 蘇維埃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
(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一)

告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宣言

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了。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絕大多數蘇維埃選派的代表。代表大會上也有很多農民蘇維埃代表參加。妥協派把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職權從此完結了。代表大會憑靠着絕大多數工人、兵士和農民意志，憑靠着工人和防軍在彼得格拉所實現了的勝利起義，業已把政權掌握到自己手中。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了。臨時政府大多數委員已被逮捕了。

蘇維埃政權將向各國人民提議立刻締結民主和平，並在一切戰綫上立刻休戰。蘇維埃政權將保證把地主、皇室和寺觀的土地概無報償地轉歸農民委員會處理，將實行軍隊充分民主化，以捍衛兵士底權利，將建立工人監督生產制，將保證按時召集立憲會議，將設法供給城市以糧食和供給鄉村以首要日用品，將保證俄國境內所有一切民族都享有真正自決權。

代表大會議決：各地全部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各地蘇維埃也就應負責保證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會號召前綫兵士應具有警覺性和堅定性。蘇維埃代表大會堅信革命軍隊在新政府尚未爭得締結其將直接向各國人民提出的民主和平以前，定能捍衛革命，使其不受帝國主義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將採取一切辦法，實行向各有產階級徵發和收稅的堅決政策，以此來保證革命軍隊的一切必需品，並改善兵士家屬底生活。

科爾尼洛夫黨徒——克倫斯基，卡列金及其他人等——正企圖調遣軍隊到彼得格拉來。有幾個被克倫斯基用欺騙手段調動的隊伍已經轉到起義民衆方面了。

兵士們，積極反抗科爾尼洛夫黨徒克倫斯基呵！小心戒備着呵！
鐵路工作人員們，阻止克倫斯基派往彼得格拉的一切兵車呵！
兵士們，工人們，職員們，革命底命運與民主和平底命運完全握在你們手中呵！

革命萬歲！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
農民蘇維埃代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刊載於工人與兵士報第九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別爾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一至三〇二頁。

(二)

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

和平問題是現時最緊急和最迫切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講得很多，寫得很多，想必你們大家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不少的討論。因此讓我來宣讀這個應由你們選出的政府來頒佈的宣言吧。

和平法令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革命所建立起來並憑靠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進行正義民主的和平談判。

本政府認為，一切交戰國中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半死半活的工人和勞動階級絕大多數所渴望，而為俄國工農在推翻沙皇帝制後所極肯定堅決要求的正義的或民主的和平，乃是必須立刻締結的不兼併（即是不侵佔別國土地，不強迫合併別的民族）和不賠款的和平。

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提議立刻締結這樣的和平，並決意毫不遲延地，不待各國和各民族底人民代表會議最終批准這一和約底全部條件，就馬上採取一切堅決步驟。

本政府根據一般民主派底法權意識，特別是勞動階級底法權意識，認為凡是把弱小民族合併於強大國家而沒有得到這一民族所明確自願表示出的同意和願望，都是兼併或侵佔他國土地的行爲，並不管這種強迫合併是何時實行的，不管被強迫兼併或被強迫割制在別國境內的這民族之發展或落後的情形如何，最後，不管這個民族是住在歐洲或是住在遠隔大洋的國家中，都是一樣。

如果某個民族被強力割制在別國境內，如果違反這一民族方面的願望，——不管這個願望是表示在刊物上，人民大會上，政黨決議上，抑或表現於反對民族壓迫的激動和起義上，都是一樣，——而不給這個民族以權利，使之能在完全撤退兼併國軍隊或任何較強民族底軍隊條件下，不受絲毫強制地，用自由表決方法來解決這個民族底國家生存問題，那末合併這民族的行爲便是兼併，亦即侵佔或暴力行爲。

本政府認為，爲了各富強國家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佔的弱小民族而繼續這次戰爭，便是反人類的莫大罪行，所以鄭重聲明，決意根據上述對一切民族都是同樣正義的條件，立刻訂立停止這次戰爭的和平條約。

同時本政府聲明，決不認為上述和平條件是最後通牒式的條件，即是說，它同意考慮其他任何和平條件；所堅持的，只是交戰國任何一方提出這種條件都要儘量迅速，條件本身要提得極端明顯，要絕對排除任何含糊和任何秘密。

本政府廢除秘密外交，決意在全體人民面前完全公開地進行一切談判，立刻着手把地主資本家政府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至十月二十五日止所批准或締結的秘密條約完全公佈出來。既然這些秘密條約底全部內容往往大半是使俄羅斯地主和資本家獲得利益和特權，使大俄羅斯人保持或加強兼併，所以本政府宣佈這些條約無條件地立刻作廢。

本政府向各國政府和人民提議立刻開始公開進行媾和談判時，同意或用電報交換公文，或由各國代表互相談判，或在各國代表會議上舉行討論等方法，來進行這種談判。爲了便利這種談判起見，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權代表到各中立國去。

本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提議，立刻締結休戰條約，同時認爲這休戰期間要至少是三個月，俾使所有捲入戰爭或被迫參戰的一切民族代表所參加的和平談判完全可能結束，同時又使各國人民代表會議完全可能召集起來最終批准和平條件。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作此種媾和提議時，又特別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即英法德覺悟工人們呼籲。這些國家的工人對於進步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貢獻最多，如英國憲章運動⁴²之偉大模範，法國無產階級實行過多次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最後，德國工人之反非常法令的英勇鬥爭，以及爲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羣衆組織所進行的那種足爲全世界工人模範的長期堅強而有紀律的工作。所有這些無產階級英勇精神和歷史創舉底模範，都使我們堅信上述各國工人定會瞭解他們現在所擔負的，使人類擺脫戰禍及其惡果的任務，因爲這些工人定會以各方面的，堅決的，竭誠努力的活動，來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民衆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制的事業有成效地貫徹到底。

* * *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革命所建立起來並憑靠於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應當立刻開始和平談判。我們的呼籲應當是既向各國政府，也向各國人民發出的。我們不能漠視各國政府，因爲這樣就會使訂立和約的機會遷延下去，而人民政府是不應當這樣作的，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權利不同時也向各國人民呼籲。各國政府與

人民之間到處都是分歧的，所以我們應當幫助各國人民來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們自然要極力堅持我們所主張的不兼併不賠款的全部和平綱領。我們決不會放棄這個綱領，但我們應當不讓敵人有可能來說，他們的條件是另一種性質的，所以無須來同我們進行談判。不，我們應當使他們無機可乘，而不應該用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我們的條件。所以也就加入了一項，說我們同意考慮任何和平條件與一切提議。我們同意考慮，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去接受。我們把這些條件和提議提到立憲會議上討論，立憲會議將有全權來決定，什麼是可以讓步的，什麼是不能讓步的。我們要與各國政府底欺騙手段作鬥爭，這些政府都是口頭上講和平，講正義，而實際上在進行強盜侵略戰爭。沒有一個政府會將它所想的事情全部都說出來。我們却是反對秘密外交，所以定要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行動。我們不忽視困難，而且沒有忽視過困難。戰爭是不能用拒絕的辦法來結束的，戰爭是不能由單方面來結束的，我們提議休戰三個月，可是我們也不拒絕更短的休戰期，好使疲憊了的軍隊可以在相當時期中喘息一下，此外在一切文明國家中都必須召集國民大會來討論和平條件。

我們提議立刻締結休戰條約，同時就向那些在發展無產階級運動方面有過許多貢獻的國家中的覺悟工人呼籲。我們既向作過憲章運動的英國工人呼籲，也向屢次在起義中表現過其全部階級覺悟力量的法國工人呼籲，也向經歷過反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的艱苦鬥爭並建立了強大組織的德國工人呼籲。

在三月十四日的宣言中，我們會提議推翻銀行家，但自己不但沒有推翻本國的銀行家，而且甚至和他們締結了聯盟。現在我們已把銀行家政府推翻了。

這個政府和資產階級會盡心竭力以圖彼此聯合起來，而把工農革命沈沒於血泊裏面。可是三年戰爭使羣衆獲得了充分的教

訓。其他國家中也發生了蘇維埃運動，在德國有被劊子手威廉底容克軍官們鎮壓下去了的海軍起義。最後，要記着，我們不是住在非洲荒漠中，而是住在歐洲，這裏一切事情都是很快就可知道的。

工人運動定會佔上風，定會開關達到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舊曆十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刊載於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〇八期和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三至三〇七頁。

(三)

關於和平問題報告的結論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

我不說到宣言底一般性質。你們代表大會將要成立的政府，對於個別不大重要的條款可以提出改變。

我要堅決反對把我們對和平的要求用最後通牒方式提出。最後通牒的方式可以葬送我們的全部事業。我們不要由於與我們的條件有某些細微出入，遂使帝國主義政府可能藉口說，因為我們抱着毫不調和的態度，所以無法進行和平談判。

我們要把我們的宣言到處散發，使大家都能知道。要想把我們工農政府所提出的條件隱瞞起來是不可能的。

。要想把我國推翻了銀行家和地主政府的這個工農革命隱瞞起來是不可能的。

若用最後通牒的方式，各國政府就會置之不理，若採用我們提出的條文，則各國政府就一定要回答的。讓各國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想的是什麼。我們不願意祕密談判。我們願意使政府隨時都在本國輿論監督之下。

如果由於我們的最後通牒方式以致某一個遼遠邊區的農民無從知道別國政府是想的什麼時，那他會怎樣說呢。他就會說：同志們，爲什麼你們撇開了提出各種和平條件的機會呢。我倒想來討論討論這些條件，審查審查這些條件，然後就叫我的那些出席立憲會議的代表們怎樣去對付就行了。如果別國政府不同意的話，那我就決意用革命手段來爲正義的條件鬥爭，可是，也許對某些國家說來

會有某一種條件，竟使我要決意向這些國家的政府提議，由它們自己去繼續爭鬥吧。我們的思想，只有推翻全部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完全實現。這就是農民所能對我們說的話，他還會責備我們在小節上也太不讓步了，其實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要揭破資產階級及其派去充當政府首領的君主或非君主劊子手們所幹的全部卑鄙可惡行爲。

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使各國政府可能藉口說我們不肯讓步，而向人民隱瞞其驅使他們走上屠殺場去的目的。這只是一滴水，可是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拒絕這一能滴穿資產階級侵掠行爲頑石的一滴水。最後通牒方式就會幫助我們的敵人，減輕他們的困難地位。我們要把一切條件都告訴人民。我們要把我們的條件向各國政府提出，讓它們去回答它們本國的人民吧。我們要把一切和平提議都提交立憲會議去解決。

同志們，條文中還有一項是你們應當仔細注意的。秘密條約一定要公佈。關於兼併與賠款的條款一定要廢除。同志們，有各種各樣的條款，——強盜政府彼此間不只是訂立了關於搶劫的協定，而且在這種協定中，也包括有一些關於經濟協定以及其他關於友善邦交的條款。

我們既不用條約來束縛自己，也不讓別人用條約來束縛我們。我們拒絕一切關於搶劫和暴力的條款，但凡是關於友善條件和經濟協定的條款，我們都是樂於接受的，這樣的條款我們決不能拒絕。我們提議休戰三個月，我們其所以選定這樣長的期間，是因為各國人民被這延長到三年以上的血腥戰禍弄得疲憊不堪，渴望休息休息。我們應當懂得，必須讓各國人民來討論和平條件，要他們在有國會參加之下表示自己的意志，爲此就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我們其所以提出長期休戰，是要使終日備受屠殺慘禍的前綫軍隊得到休息，可是我們也不拒絕更短休戰期間的提議，我們要把這種提議加以考查，並且我們定要接受這種提議，那怕是向我們提議休戰一個月或

一個半月都好。我們關於休戰的提議也不應當是最後通牒式的，因為我們決不讓敵人藉口於我們毫不調和來向人民隱瞞全部真象。休戰提議決不應當是最後通牒式的，因為不願休戰的政府便是犯罪的政府。假使我們不把關於休戰的提議用最後通牒方式提出，那我們就能迫使各國政府在本國人民面前成爲罪魁，而人民對於這樣的罪魁是不會客氣的。有人會反駁我們說，我們不採用最後通牒方式，便是表示我們軟弱無力；可是現在已是要把資產階級方面所謂人民力量的全部謊語拋掉的時候了。在資產階級看來，只有當羣衆服從帝國主義政府底意旨，盲目跑上屠殺場去的時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當國家能用政府機關底全部權力，按資產階級當局意志，隨便把羣衆拋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資產階級才承認這個國家是強有力的國家。我們對於力量的見解却是另一樣的。照我們看來，國家之所以強而有力，是由於羣衆有覺悟。只有當羣衆能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能自覺地去進行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是強有力的。我們絲毫用不着害怕說出關於疲憊的真象，因為試問現在有哪一個國家不疲憊，有哪一國人民不公開說出這種情形呢？且拿意大利來看吧，在那裏，由於這種疲憊而產生了要求停止戰爭的長期革命運動。難道在德國不是發生了喊出停戰口號的工人羣衆示威運動麼？難道劊子手威廉及其奴僕們所無情鎮壓了的德國海軍起義不是由於疲憊所引起來的麼？既然在像德國這樣有紀律的國家中都能發生這樣的現象，都開始說到疲憊，說到要停止戰爭，那我們絲毫也用不着害怕公開講出這點來了，因為這是真情，無論對於我國或一切交戰國，甚至非交戰國，都是確實的真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舊曆十月二十八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〇八至三一〇頁。

(四)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認為革命已經證明並表明出，把土地問題提得十分明顯是非常重要的。武裝起義，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之發生已顯然證明應當把土地交給農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實行妥協政策假借各種口實來拖延土地問題的解決，因而把國家弄到經濟破壞並激起農民起義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犯了莫大的罪惡。他們所說的鄉村中的騷亂和無政府狀態，顯然是謊言和怯懦的欺騙手段。試問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因合理辦法而引起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呢？假使政府底舉動是合理的，假使它所施行的辦法適合貧農的需要，難道農民羣衆還會激動起來嗎？但是政府所採取的，也就是亞甫克森鐵夫和唐恩領導的蘇維埃所贊同的一切辦法，都是反對農民，這便迫使農民不得不舉行起義。

這個政府既引起了起義，却又來把自己所引起的這種現象高喊為騷亂和無政府狀態。政府本想用鐵和血來鎮壓起義，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兵士，水兵和工人底武裝起義所剷除了。工農革命底政府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問題是可以安慰和滿足極大量貧農羣衆的。現在我向你們宣讀應由你們蘇維埃政府頒佈的法令條文。這法令中有一條內載入了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代表蘇維埃委託書所制定的給各地土地委員會的委託書。

土地法令

(一) 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 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室和寺觀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都一律轉交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時為止。

(三) 對於沒收來的財產，即今後已屬全民公有財產之任何損害行動，一律認為是應受革命法庭懲辦的嚴重罪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應採取一切必要辦法來保證在沒收地主田莊時遵守最嚴格的秩序，決定應沒收地段底大小及應沒收的是哪些地段，編造全部被沒收財產的確切冊據，用革命手段極嚴格保護轉歸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產業及一切建築物，工具，牲畜和儲存的食品等等。

(四) 偉大土地改革之實施，在立憲會議對於這些改革尚未作最終決定之前，到處都應以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編輯部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委託書製定的農民委託書為指南，這個委託書已公佈在該報第八十八期上（彼得格拉，第八十八期，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

(五) 普通農民和普通哥薩克底土地概不沒收。

關於土地問題的農民委託書

「土地問題只有全民立憲會議才能加以全盤解決。

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公正辦法應如下：

(一) 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禁止土地買賣、租佃或抵押，以及任何其他方式的讓渡。

全部土地：國家的，皇室的，閣部的，寺觀的，教堂的，租有的，嫡長繼承的，私人的，公共的和農民的等等土地，概

無報償，取消其原主所有權，轉為全民財產並交歸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

因財產制改革而受到損失的人，只有在為適應新生活條件所必需的那時間內，才有權享受社會的幫助。

(二) 所有地內蘊藏：鑛產，煤油，煤炭，食鹽等等，以及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和水利，一律轉歸國家享用。一切小河，小湖，小森林等等轉歸村社使用，但必須由地方自治機關管轄。

(三) 凡具有高度技術的農場地段，如菓園、種植場、苗圃、溫室等等不得分割，而應改為模範農場，並視其範圍大小和意義如何，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城市和鄉村中的莊園土地連同家有菓園和菜園，仍歸原主使用，同時此種地段之大小和因使用而應繳納稅額之多寡，概由立法手續規定之。

(四) 養馬場，官有和私人的純種牲畜場和純種家禽場等等，概行沒收，轉為全民財產，並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關於贖金問題應由立憲會議審核之。

(五) 所有已被沒收土地上的耕畜和農具，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概無報償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

地少農民底耕畜和農具不在沒收之列。

(六) 俄國全體公民(不分性別)，凡願意用自己的勞動，在自己的家口幫助下，或組織共耕社來耕種土地者，都可獲得土地使用權，但僅限於他們有力耕種土地時期內。禁止僱傭勞動。

凡村社社員偶然喪失勞動力在兩年以內時，該村社必須在該員尚未恢復勞動力前這期間內，用共耕辦法予以幫助。

凡農人因年老或殘廢而永遠無法自耕土地時，便喪失其土地使用權，但由此可以領得國家撫卹金。

(七) 土地使用制應當是平均的，即是把土地依地方條件，按勞動標準額或消費標準額分配給勞動者。

土地使用方式應當是完全自由的，可根據各個鄉村決議，隨便採用按戶，按莊戶，按村社，按勞動組合的方式來耕種。

(八) 全部土地從其脫離原主之日起，即劃入全民公有地產總額中。關於分配土地給勞動者的事宜，由地方和中央自治機關——自按民主原則組成的無等級的城鄉公社起至各省中央機關止——掌管之。

地產總額應視居民增殖程度以及農業生產率和農作術之提高程度如何而舉行定期的重新分配。

當改變份地界限時，份地上原歸某人享用的基本地段應保存下來，不得加以更變。

因故離村者底土地，應歸還地產總額中，同時離村者底家屬或離村者所指定的人，有領得離村者所遺下地段之優先權。

因增加肥料和根本改良土壤所耗費的價值，在將土地交還地產總額中時，其尚未使用的部分，應予以報償。

若個別地方現有地產不夠滿足當地全體居民需要時，則多餘的人口應遷往他處。

移民事宜以及移民費用和農具供給等等概由國家負擔。

移民應按下列次序辦理：首先是自願遷移的無地農民，其次是行爲不端的村社社員，逃兵及其他此類人等，最後，是用抽籤或商妥的辦法』。

這個委託書底全部內容既是全俄絕大多數覺悟農民唯一的願望，着即宣佈其爲臨時法律，並應在立憲會議尚未開幕之前儘可能立刻實行，其中某些部分必須逐漸施行時，則由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決定之。

*

*

*

在這裏有人喊道，說這個法令和委託書原是社會革命黨人所製定的。就讓它這樣吧。無論是誰製定的，豈不都是一樣嗎，我們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不顧及下層民衆底決議，那怕我們是不同意這個決議的。把這個決議運用到實際中去，在各地實行起來，農民自己就會在生活考驗中懂得，究竟真理何在。即令農民甚至會繼續贊成社會革命黨人，即令他們甚至會使該黨在立憲會議上獲得多數，那我們也還是要說：就讓它這樣吧。生活是最好的教師，生活會指明出誰是正確的，就讓農民從這一頭，我們從另一頭來解決這個問題吧。生活會使我們兩者在革命創造工作的總流中，在製定新的國家制度事業中接近起來的。我們應當跟隨生活走，我們應當讓民衆享有完全發揮其創造精神的自由。已被武裝起義推翻了的舊政府，曾想藉助於沒有更換的舊時沙皇官僚，來解決土地問題。可是這些官僚不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一味反對農民。農民在我國八個月的革命時期中，已學會了一些東西，他們自己想解決關於土地的一切問題。所以我們反對在這個法令草案中加以任何修正，我們不想把它詳細規定，因為我們寫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動綱領。俄國幅員廣大，各地條件不同；我們相信農民自己會比我們更善於正確適當地解決問題。究竟是按照我們的方式，還是按照社會革命黨人綱領的方式，問題底實質並不在這裏。問題底實質是在於使農民堅信鄉村中再沒有地主了。讓農民自己去解決一切問題吧，讓他們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吧。（熱烈鼓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舊曆十月二十八日）刊載於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百〇九期和真理報第一百七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一一至三一五頁。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一) 在僱用工人職員共計五人和五人以上，或每年資金週轉在一萬盧布以上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等等企業中，施行由工人監督一切產品和原料之生產、保存和買賣事宜的辦法。

(二) 工人監督，在有可能的小企業中則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在其他情況下則經過其所選出的代表實行之，此種代表應立刻在全體大會上選出，須有選舉記錄，並須把被選人姓名通知政府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 非經工人職員所選代表之許可，絕對禁止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或工廠（參看第七條）停工，以及對生產進程作任何改變。

(四) 一切賬簿文件及一切倉庫和儲存的原料、工具、產品等，應一無例外地向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公開。

(五) 凡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底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只有職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才有權取消這種決議。

(六) 在一切有全國意義的企業中，一切企業主和一切由工人職員選出行使工人監督權的代表，概應對國家負維持嚴格秩序、紀律和保護財產之責。凡犯有疏忽怠慢、隱瞞存貨和賬目等等罪行者，除沒收全部財產外並處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七) 凡為國防事業工作以及與生產民衆生活必需品有關的企業，概認為是有全國意義的企業。

(八) 工人監督辦法細則，由各地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和職員委員會之全體代表會議規定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舊曆三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七十八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中央委員會宣言

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

同志們！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代表佔了大多數。

這個事實是為要瞭解剛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發生了並獲得了勝利的革命所必須知道的基本事實。正是這個事實常常被資本家底一切擁護者和不自覺的幫手，即破壞新革命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基本原則的人所置諸腦後而避開不說的。俄國除了蘇維埃政府外，決不應當有別政府。在俄國，已經奪得了蘇維埃政權，並保證使政府從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裏過渡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裏，能簡單由蘇維埃決議，簡單由改選蘇維埃代表的辦法來實現，而不必經過任何的革命。

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佔了大多數。所以，只有由這個黨所組織的政府才算是蘇維埃政府。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成立新政府和把政府委員名單提交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的幾點鐘前，曾邀請三位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即卡姆科夫，斯皮羅和卡列林三同志來參加自己的會議，並請他們參加新政府。我們深為惋惜的，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志竟拒絕了這一提議，我們認為他們這樣拒絕，是革命者和擁

護勞動羣衆利益的人所不容許有的行爲，我們隨時都願意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接納到政府中來，可是我們聲明，我們既是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多數黨，不僅有權，而且要在人民面前義不容辭地組織政府。

大家知道，我黨中央委員會向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提出了純粹是布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名單，並且代表大會也批准了這個純粹是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委員名單。

所以那些說什麼布爾什維克政府不是蘇維埃政府的種種欺騙聲明，是絕對撒謊，只有人民公敵，只有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謊話。恰恰相反，只有布爾什維克政府，現時，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後，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集時止，或直到蘇維埃改選時止，或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新政府時止，只有布爾什維克政府才可以被承認爲蘇維埃政府。

* * *

同志們！有幾個我黨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會委員，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根，李可夫，米留亭及其他幾人，在昨天，十一月四日退出了我黨中央，而後面這三個人並退出了人民委員會。在我們這樣大的黨裏，雖然我們的政策方針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也難免有個別同志在和人民之敵作鬥爭中表現缺乏堅定果決精神的事實。目前擺在我黨面前的任務真是極其宏偉，而困難也是很巨大的，——於是有幾個以前負重責的我黨黨員，隨着資產階級進攻時動搖了，並從我們隊伍中逃跑了。全體資產階級及其一切幫手們因此都歡天喜地，幸災樂禍，高喊什麼布爾什維克政府塌台了，預言布爾什維克政府將要傾覆。

同志們！不要相信這些謊話。逃跑同志底行爲簡直像逃兵底行爲一樣，不僅拋棄了付託他們的職位，並且破壞了我黨中央委員會要他們至少等到彼得格拉和莫斯科黨組織決議後再行退出的直接

決議。我們堅決責斥這種臨陣脫逃的行爲。我們堅信，凡身爲我黨黨員或同情我黨的覺悟工人、兵士和農民，也都會這樣堅決責斥這些逃兵的。

可是，我們聲明，我黨幾個上層份子底臨陣脫逃行爲，連絲毫連一分鐘也不會動搖那些擁護我黨的羣衆底一致，因而也就不會動搖我們的黨。

同志們總還記得，這些逃兵中的兩個，即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拉起義前就已表現過逃兵和工賊的行爲，因爲他們不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那有決定意義的中央會議上表決反對起義，而且在中央通過決議之後，竟在黨工作人員面前鼓動反對起義。大家知道，那些害怕站到工人方面，而多半趨向於資產階級方面的報紙（如新生活報）當時都隨同一切資產階級刊物大喊大叫，說什麼我黨「場台了」，「起義破產了」等等。可是實際生活很快就推翻了這一些人底謊言和誣蔑以及另一些人底懷疑動搖和怯懦。人們想藉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破壞彼得格拉起義的步驟來煽起的「風浪」，原來不過是一杯水裏的風浪罷了，而羣衆運動底偉大高潮，彼得城和莫斯科，前綫戰壕中和鄉村中的千百萬工人、兵士和農民底偉大英勇精神，一下子就把這些逃兵拋開了，簡直像火車泥開路上的木屑一樣。

讓一切信念不堅定的份子，一切動搖份子，一切懷疑份子，一切甘受資產階級威嚇，或被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幫手們底叫喊所嚇怕了的份子去慚愧無地吧。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兵士羣衆中是半點也沒有動搖的。我黨堅定一致如像一個人一樣，屹立不搖地保護蘇維埃政權，保護一切勞動者底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利益。

資產階級的下流記者和甘受資產階級恐嚇的人齊聲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讓步，說我們不調和，說我們不願與他黨分掌政權。同志

們！這是謊話！我們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過，並且現在還提議請他們和我們分掌政權。既然他們拒絕了，這並不是我們的罪過。談判是由我們開始的，並且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我們又在談判中作了種種讓步，直到有條件地同意讓彼得格拉城市杜馬一部分議員底代表參加政府，雖則這彼得格拉城市杜馬是科爾尼洛夫黨羽底巢穴；如果科爾尼洛夫派的這班萬惡匪徒，如果資本家和地主底子弟，士官生們，又像上星期日在彼得格拉所作過，而現在還想再做的（這是由破獲普里什克維奇陰謀以及昨天十一月三日在他那裏搜獲的文件所證實了的）那樣來試圖抵抗人民意志的話，那這個巢穴就定會首先被民衆剷除的。可是那些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背後並經過他們來為資產階級利益活動的先生們，却把我們的退讓態度解釋為我們軟弱無力，並藉此來向我們提出新的最後通牒。在十一月三日的會議上，有阿布拉莫維奇和馬爾托夫先生出現，並提出最後通牒，說是如果我們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封禁資產階級報紙，便不能進行任何談判。

我們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委會拒絕了履行這個顯然是從卡列金，從資產階級，從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黨羽方面發出的最後通牒。普里什克維奇底陰謀⁴³，以及第十七軍團之一部底代表團於十一月五日來到彼得格拉威嚇我們，說要向彼得城進攻（這種威嚇是很可笑的，因為這些科爾尼洛夫黨羽底先頭部隊已被擊潰，並在加琴納附近逃竄了，而其大部份已經拒絕反對蘇維埃）等事變，都表明阿布拉莫維奇和馬爾托夫先生們底最後通牒實際上是由誰發出的，證明這些人實際上是替誰服務。

讓一切勞動者安心而堅定吧！我們黨任何時候都不會向蘇維埃中的少數所提出的最後通牒讓步，這個少數是甘受資產階級恐嚇，不管他們有怎樣的『良好願望』，實際上不過是科爾尼洛夫黨徒手裏的傀儡。

我們堅定地站在蘇維埃政權原則上，即是站在由最近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多數所組成的政權原則上；我們會同意，並且現在還同意與蘇維埃中的少數分掌政權，但這個少數必須誠懇忠實地服從多數，並執行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全體批准的，即採取逐漸而堅定不移步驟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然而對於那些並沒有羣衆擁護，實際上只有科爾尼洛夫黨徒，沙溫可夫黨徒，士官生等等擁護着的知識份子小團體提出的最後通牒，我們是決不會屈從的。

讓一切勞動者安心而堅定吧！我們的黨，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黨是團結一致、屹立不搖地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那些決意無論如何都要達到和平勝利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千百萬城市工人、前綫兵士和鄉村農民，照舊是在擁護我們黨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八十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五六至三六〇頁。

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民意聯盟

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今天，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當我在農民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有人當衆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立即回答過了。這個問題和我的回答，必須立刻讓全體讀者大眾知道，因為形式上我雖只用自己個人的名義回答，其實我是代表整個布爾什維克黨說話的。

當時情形如下：

講到布爾什維克工人與現在為許多農民所信任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聯盟時，我在發言中極力證明，這個聯盟可能是『誠懇的聯合』，誠懇的聯盟，因為僱傭工人底利益與被剝削勞動農民意利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可以滿足兩者底利益。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滿足他們的利益。所以無產階級與被剝削勞動農民意間的『誠懇聯合』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反之，被剝削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聯合』（聯盟）決不能是『誠懇的聯合』，因為這些階級底利益是根本分歧的。

請設想吧，——我說，——在政府中布爾什維克將佔多數，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僅佔少數，甚至那裏假設只有一個例如擔任農業人民委員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這樣的情形下，布爾什維克能夠實現誠懇的聯合麼？

能夠的，因為在與反革命份子（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護國派在內）作鬥爭中布爾什維克是不調和的，但他們在表決由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准的土地綱領內那些有關純粹是社會革命黨人條款的問題時，却應該放棄表決權，例如關於土地平均使用和把土地重行分配給小農的條文。

布爾什維克在表決這樣的條文時放棄表決權，絲毫也不是背棄自己的綱領。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條件下（實行由工人監督工廠，接着是剝奪這些工廠，實行銀行國有，建立最高經濟委員會來調節國內全部國民經濟），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人必須同意被剝削的勞動小農所提出的過渡辦法，只要這些辦法不致危害社會主義事業。我在發言中說，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九年），也曾屢次承認說，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在大農業國中與在小農業國中是不能一樣的。

我們布爾什維克在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執委會會議上表決此種條文時，應該放棄表決權，因為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站在他們方面的農民）同意實行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時，土地平均使用制只會是走向完全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之一。無產階級強迫農民接受這樣的辦法當然是荒謬的，可是無產階級為了社會主義勝利的利益，在選擇這些過渡辦法的問題上應當向被剝削的勞動小農讓步，因為這些辦法不會危害社會主義事業。

當時有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我彷彿記得是飛奧費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如下一個問題：

『如果在立憲會議中，農民想通過關於土地平均使用制的法律，資產階級却反對農民，問題全靠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決定時，布爾什維克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我當時回答說：工人與被剝削勞動農心底聯盟責成無產階級黨在社會主義事業將由實行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有了保障的情形

下，必須投票贊成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照我的意見，布爾什維克在這樣的場合舉行表決時，有權特別聲明，說自己有不同意的地方等等，可是在這樣的場合舉行表決時放棄表決權，就無異是因與自己同盟者有局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叛賣在爲社會主義鬥爭中的同盟者。布爾什維克在這樣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叛賣農民的。土地平均使用等等辦法無論如何也不會危害社會主義，只要政權握在工農政府手裏，只要實行了工人監督，實行了銀行國有，建立了工農最高經濟機關來指導（調節）全部國民經濟等等就行了。

我當時所給的回答就是如此。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舊曆十一月十九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九十四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八八至三九〇頁。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一) 以前把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列入革命社會民主黨綱領裏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立憲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表現，因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帝國主義共和國，在建立國會時，就用許多違反民主制的辦法來準備偽選。

(二)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最初之日起，便屢次着重指出過，蘇維埃共和國較之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更高形式的民主制。

(三) 在由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時期，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與具有立憲會議這一花冠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較），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

(四) 在我國革命進程中按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提名單來召集立憲會議一舉，是絕對沒有可能經過立憲會議的選舉來正確表示一般人民意志，特別是勞動羣衆意志條件下實現的。

(五) 第一，按比例制的選舉，只有當各黨候選人名單適合於民衆實際分化，就是說，只有當人民真是分化為反映在這些名單上的

各黨派情形時，才能真正表現民意。大家知道，在我國，從五月起至十月止，在人民中特別是在農民中擁有最多同情者的黨是社會革命黨，它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提出了統一的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可是在立憲會議選舉後與尚未召集之前，這個黨已經分裂了。

因此，在選民大衆底意志和立憲會議當選人成份兩者之間，連形式上的符合都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

(六) 第二，人民意志，特別是各勞動階級意志與立憲會議成份這兩方面不相符合，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而是社會經濟的、階級的原因，這就是立憲會議選舉是在絕大多數民衆還不能知道十月蘇維埃革命，即工農革命之全部規模和意義時舉行的，因為這次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即是在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已經提出之後開始的。

(七) 十月革命爲蘇維埃奪取了政權，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得了政治統治，並把它轉交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這次革命目前正在經歷其一貫向前發展的各階段。

(八) 這次革命是從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首都的勝利開始，當時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即無產者和政治上最積極部分農民底先鋒隊，使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絕大多數，並居佔了執政的地位。

(九) 隨後，革命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間蔓延到了全體軍隊和農民羣衆中，其表現首先是在撤換和改選那些舊的上層組織(各集團軍委員會，省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央執委會等等)，這些上層組織所代表的是革命底過去階段，妥協階段，即革命底資產階級階段而不是無產階級階段，所以這些上層組織必然要在更深更廣的民衆逼攻之下退出舞台。

(一〇) 被剝削羣衆實行改造自己組織領導機關的這一強大運動，到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還沒有完結，而尚未閉幕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便是這運動的階段之一。

(一一) 因此俄國階級鬥爭中所形成的階級力量底實際分化，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情形與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各黨所提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中所反映出的那種情形之間，是有原則上的區別的。

(一二) 最近烏克蘭的事變（局部地在芬蘭和別洛露西亞以及高加索的事變）也同樣表明出烏克蘭拉達⁴⁴，芬蘭議會等等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勢力，與這些民族共和國內的蘇維埃政權即工農革命兩者間的鬥爭過程中發生着階級力量底新分化。

(一三) 最後，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反革命暴動所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反工農政府的國內戰爭，使階級鬥爭徹底尖銳化了，致使歷史提在俄國各族人民面前，首先是提在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問題，再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民主主義的手段來解決了。

(一四) 只有由工農完全戰勝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暴動（其表現是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運動），只有用武力無情鎮壓這種奴隸主的暴動，才能實際保障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革命中事變進程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已使『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在事實上成了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及其幫手們底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全不顧及工農革命底勝利品，不顧及蘇維埃政權，不顧及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和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等等。全體人民都明白起來了，這個口號實際上就是號召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人民都明白起來，如果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背道而馳的話，那末前者就等於在政治上宣佈了自己的死刑。

(一五) 和平問題是人民生活中特別緊迫的問題之一。在俄國爭取和平的真正革命鬥爭，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勝利之後才開始，而這個勝利已經產生出初步的成果，如公佈祕密條約，締結休戰協定，以及開始公開談判不兼併不賠款的普遍和平。

廣大民衆直到現在才有機會真正充分和公開看到爭取和平的革命政策，並研究這一政策的結果。

在選舉立憲會議時，民衆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顯然，從這一方面看來，立憲會議的代表成份與在終結戰爭問題上的真正民意不相符合，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六) 由於上述各種情節就得出如下的結果：立憲會議既是在工農革命以前，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按各政黨所提候選人名單選出的，它也就必然與在十月二十五日開始舉行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被剝削勞動階級底意志和利益相衝突。這個革命底利益自然要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限，何況因為在召集立憲會議的法令中沒有承認人民有隨時改選自己代表的權利，以致這些形式上的權限也被損毀了。

(一七) 凡是直接或間接想從形式法律方面，只以通常資產階級民主制為限來觀察立憲會議問題，而不估計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情形的企圖，都是叛變無產階級事業而轉到資產階級觀點上去。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少數上層份子因不善於估計十月起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陷入了這種錯誤中，但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絕對天職却是要警告大家不要犯這種錯誤。

(一八) 由於立憲會議選舉結果與民意及與被剝削勞動階級底利益不相符合所造成的危機，只有由人民來儘可能廣泛迅速地實現其改選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只有立憲會議自身贊同中央執委會關於這種改選的法令，只有立憲會議絕對聲明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及其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工人監督制問題

上的政策，只有立憲會議堅決加入到與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反革命勢力相敵對的營壘中來，它才有希望得到無痛楚的解決。

(一九) 若沒有這些條件，則因立憲會議所產生的危機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決，即是由蘇維埃政權方面採取最積極、最迅速、最堅決的革命手段來反對立憲民主黨和卡列金派的反革命勢力，並不管這個反革命勢力是用何種口號和機關（那怕是用立憲會議代表名義）來作掩飾的。凡是想使蘇維埃政權在這一鬥爭中受到掣肘的任何企圖都是幫助反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一十三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三六至四四〇頁。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糧食恐慌情形，以及由於投機業、資本家和官吏底怠工和一般經濟破壞所造成的饑荒威脅，致使必須採取非常的革命辦法來反對這種禍害。

爲了使全國公民，首先是一切勞動階級在其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能立刻從各方面毫無顧忌地採取革命的、革命的手段來進行這種鬥爭並着手調整全國正常的經濟生活起見，特議決下列法規：

實行銀行國有及其必要辦法的法令草案

(一) 一切股份企業概行宣佈爲國有財產。

(二) 各股份公司底董事和經理以及屬於富有階級（即全部財產在五千盧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五百盧布以上者）的一切股東必須有條不紊地繼續經營業務，執行關於工人監督的法令，把一切股票向國家存案，每星期應將自己的活動情形向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報告。

(三) 所有國家內外公債一律宣告作廢。

(四) 握有債券和各種股票的小私有者，即屬於居民中勞動階級的小私有者底利益，予以完全保障。

(五)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即從十六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的一切男女公民，都必須執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或其他蘇維埃政權機關所指定的工作。

(六) 規定下列辦法為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第一個步驟：凡屬於富有階級的人（參閱第二條）都必須備有工作人消費摺或工作人收支摺並正確記載之，必須把這些證摺交到相當工人組織，或當地蘇維埃及其機關去登錄各人已執行的工作情形，每星期登錄一次。

(七) 為了使糧食及其他必需品有正確的統計和分配起見，國內全體公民都必須加入某一個消費協社。糧務局，供給委員會及其他類似機關，以及鐵路工會和運輸工會，都必須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監督本法令之執行。特別是富有階級的人，在組織和進行消費協社業務方面，必須執行蘇維埃所指定的工作。

(八) 各鐵路職工會必須火速製定並立刻開始實行各種非常辦法來更正確地辦理運輸事業，特別是載運糧食，燃料及其他最緊要的必需品，其行動準則首先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定單和發車證，其次是由各蘇維埃及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委託的機關發出的定單和發車證。同樣責成各鐵路工會協同各地蘇維埃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以至採用革命手段來反對投機小販，並無情取締一切奸商。

(九) 各工人組織，職工會和地方蘇維埃，必須毫不遲延地把快關閉的和要復員的企業以及失業工人動用去進行有益的生產，製造必需品，着手尋找定貨、原料和燃料。各地工會和蘇維埃必須無論如何都不攔延這種工作，同時在尚未奉到上級機關特別指令之前，即開始實行城鄉產品底交換，但須嚴格遵守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底指示和指令。

(一〇) 凡屬富有階級的人必須將其所有現金存入國家銀行或分行以及各儲金社中，每星期領作消費需要的數目不得超過一百至

一百二十五盧布（按當地蘇維埃底規定），而領作生產和商業需要的，必須有工人監督機關所發給的證書。

爲了監視本法令之切實執行起見，將頒佈用現行紙幣兌換其他紙幣的規則，凡犯有欺騙國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應受沒收全部財產的處分。

（一一）凡不服從本法令的人，怠工者，罷職官吏以及投機商人均應受上述處分並加以拘禁或押往前線，或罰作苦工。各地蘇維埃及其所屬各機關，必須趕急擬定最革命的辦法來反對這些真正的人民公敵。

（一二）職工會及其他勞動者組織應協同地方蘇維埃組成飛行監督團，其中須有黨和其他組織所推薦的最可靠的人參加，監督團底責任就是監視本法令執行的情形，檢閱工作底數量和質量，並將違犯法令或迴避法令者提交革命法庭審判。

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一九一八年初次刊載於國民經濟雜誌第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四三至四四五頁。

向參加爲遣散軍隊事而召集的第一次 全軍隊代表大會代表們提出的問題

(一) 德國人在最近將來開始進攻的可能程度如何：

(甲) 從冬季舉行進攻之體力上與技術上的可能性來看；

(乙) 從德軍兵士羣衆底情緒方面來看；這種情緒是否能阻止德軍進攻，或至少延緩進攻？

(二) 在我們立刻破裂媾和談判，德軍立刻舉行進攻的情形下，可否預料德國人能使我們受到有決定意義的失敗呢？他們能否佔領彼得格拉呢？

(三) 是否要顧慮到和平談判破裂的消息會在軍隊中引起普遍的混亂情緒以及從前線逃跑的現象，或者可以深信，軍隊聽到這種消息後還是會堅定地守住防綫呢？

(四) 如果德軍在一月一日開始進攻，我軍在戰鬥力方面能否抵抗住這一進攻呢？如果不能夠的話，那末要經過多久時間後，我軍才能實行抵抗德軍底進攻呢？

(五) 在德軍迅速舉行進攻的情形下，我軍能否有秩序地退却，並保存所有的大砲，如果能夠的話，那末在這種情形下，能把德軍深入俄國腹地的動作阻住多久呢？

(六) 總之：從軍隊狀況看來，究竟是應當努力遷延媾和談判，還是因爲德國人堅持兼併政策，寧可用革命手段立刻斷行破裂媾和談判，作爲準備過渡到可能進行革命戰爭的堅決步驟呢？

(七) 應否立刻加緊進行反對德人兼併政策和主張革命戰爭的鼓動呢？

(八) 若是向作戰軍中頗大部份隊伍徵求意見，並要得到對於上述諸問題比較合式的完滿答覆，這件事情能否在很短期間內（譬如五天到十天）辦好呢？

(九) 可否指望在聽到關於德國人堅持兼併政策的消息以後，大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紛爭便會減輕下去，甚至這種紛爭將變成爲友誼的力量團結呢，或者也許烏克蘭人會乘大俄羅斯人更加困難的狀況來加強其反大俄羅斯人的鬥爭呢？

(一〇) 如果軍隊能夠舉行表決的話，那它是會贊成在割地（喪失所有被佔各省區）及使俄國經濟極感困難的諸條件下立刻媾和呢，還是會贊成極度緊張力量來進行革命戰爭，即是贊成抵抗德國人呢？

寫於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末。

一九二七年初次刊載於列寧學院錄存，
第二卷。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五六至四五七頁。

怎樣組織比賽？

資產階級的作家在過去以至現在都耗費着無數紙筆，來頌揚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底競爭及私人進取心等等壯舉和美質。他們責備社會主義者不願意瞭解這些壯舉底意義和不顧及『人底天性』。其實，資本主義早已把那能使競爭在相當廣濶範圍內培植進取心，毅力和大胆倡首精神的獨立的小商品生產排倒下去，而代之以大的和巨大的工廠生產，股份公司，新迪加及其他壟斷組織。在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就是空前殘暴地壓制居民大眾的，即居民中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者底進取心、毅力和大胆倡首精神，競爭也就是排斥比賽而代之以財政上的欺詐行爲，專橫霸道和對社會上層份子的卑鄙逢迎。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比賽，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規模地，真正廣濶地運用比賽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勞動羣衆來參加這種使他們能顯現自己身手，能發揮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幹的工作，而才幹在民衆中乃是取之不盡的泉源，可是資本主義把這才幹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地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資產階級底傭僕和食客們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爲枯燥的、官場的、單調的、死氣沈沈的軍營生活。錢囊底看門狗，剝削者底奴僕，即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老爺們，總是用社會主義來『恐嚇』民衆，而正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民衆却陷於勞苦不堪、半飢半飽、極端

貧困的苦工牢獄和軍營生活的境況中。使勞動羣衆擺脫這種苦工牢獄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工人監督制，實現銀行國有。往後的步驟將是實行工廠國有，務使全體居民加入消費協社（同時這種協社也就是產品推銷協社），由國家壟斷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貿易。

只有現在才真正使羣衆有廣泛的可能來表現進取心，比賽和大胆倡首精神。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實行真正工人監督來制裁他的每個工廠，趕跑了地主剝削者並已奪去其土地的每個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了使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能力，可以稍爲翻身，可以揚眉吐氣，可以覺得自己是人的這種活動場所。千百年來都是替別人勞動，替剝削者做奴役式苦工的人，經過了這樣的時光之後，現在才第一次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而且是憑靠一切最新技術和文化的成果來工作。

當然，自爲勞動代替了奴役勞動，這種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交替，是不能不遇到磨擦，困難和衝突，不能不採用強力手段來對待那些頑梗不化的寄生蟲及其傭僕的。對於這一點任何一個工人也不會有什麼幻想：工人和貧苦農民，既受了積年累歲替剝削者做苦工時的痛苦所鍛鍊，既受了剝削者的無數欺侮凌辱所鍛鍊，既受了苦重難堪的貧困生活所鍛鍊，他們也就知道要打破剝削者底反抗是需要時間的。工人和農民絲毫也沒有沾染小智識份子老爺們，所有這些新生活報派以及其他敗類等等底情感主義的幻想，這般老爺們『高喊』反對資本家，喊得喉嚨啞，並『指手畫腳』，『痛斥』資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作事，要實現自己的威脅，要在實踐中來真正撤銷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便痛哭流涕起來，其舉動就好像挨了打的小狗兒一樣。

用自爲的勞動，即用在全國的（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國際的，在世界的）巨大範圍內有計劃有組織的勞動來代替奴役勞動，這種

偉大更替，除了要用『軍事』辦法來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之外，還需要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施展出組織上和組織家的巨大努力。組織任務是與採用軍事辦法無情鎮壓昨日的奴隸主（資本家）及其奴才——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老爺們的任務溶為一體而不可分割的。昨天的奴隸主及其在智識界中的傭僕們總是這樣想，這樣說：我們從來都是組織者和長官，我們會號令一切，我們想仍舊當這樣的人物，我們不會來聽從那些『老百姓』，那些工人和農民的話，我們不會服從他們，我們要把知識變作保護錢囊特權和資本對人民統治的武器。

資產者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總是這樣說着，想着，行動着。從自私自利的觀點上看來，他們的行為是很自然的：農奴制地主所豢養的那些食客和寄生蟲，戈里里所描寫的那些牧師、司書、官吏等類人物，痛恨拜林斯基⁴⁵的那些『智識份子』，也『很難』與農奴制分離。可是剝削者及其在智識界中的奴僕們底事業決毫無希望。工人和農民正在打破他們的反抗——可惜還打得不十分堅決無情，——並且一定會打破這種反抗的。

『他們』以為『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苦農民，決辦不好社會主義革命所加到勞動羣衆肩上的那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真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務。『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慣於替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效勞的智識份子這樣安慰自己說。他們這種厚顏無恥的打算決不會實現：富有學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來，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勞動羣衆方面，幫助民衆來打破資本僕役們底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是很多的，這些人材現在剛剛才自覺有力，醒悟起來，趨向於生動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獨立從事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

現在最主要任務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務的話，——就是要儘量廣濶地發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這種自動倡首精神。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

種荒謬、粗野、卑鄙醜陋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等階級』，只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這是成見。支持這種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舊，奴才習氣，尤其是資本家醜陋的私利觀念，這些人正是樂於藉管理來搶劫，為搶劫而管理。這樣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會忘記自己需要有智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熱心，又恰恰是在現時，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點沒有什麼迷誤，也決不會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於知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才幹，在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所藐視所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才幹，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乃是取之不盡的泉源，並且是一個最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還未習慣到他們現在是統治階級，他們還不夠堅決。革命是不能在畢生都迫於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脅下工作着的千百萬人中，一下子就造成這種品質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喚醒着這些品質，打破一切舊障礙，斬斷陳腐的桎梏，把勞動羣衆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裏，它的生命力就在這裏，它的不可戰勝性也就在這裏。

實行統計與監督，這就是每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每個消費協社，每個職工會或供給委員會，每個工廠委員會或一般工人監督機關底主要經濟任務。

人們有一種舊習慣：總是用不自由人底眼光來觀察勞動標準，觀察生產資料，只想擺脫多餘的重担，只想從資產階級那裏撈得一點東西。必須與這種陳舊習慣作鬥爭。這種鬥爭已由先進的有覺悟的工人開始了，他們正在給工廠工人中的異己份子以堅決的回擊，這種份子在戰時出現得特別多，而現在還想照舊用怎樣能『多撈一塊就跑』的唯一想法來對待人民工廠，即對待那些已轉為人民財產的

工廠。農民中和勞動羣衆中所有一切覺悟的，誠實的，有思考力的份子，都會在這一鬥爭中站到先進工人方面來。

既然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已經建立，已有保障，則實行統計與監督，——如果這些辦法是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以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資格來實行，或者依照這個政權的指示和委託來實行的話，——即到處實行普遍的，包括一切的統計與監督，實行對勞動數量和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這便是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之所在。

爲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統計與監督，只能是由羣衆來實行的。只有由工農羣衆自願而誠意地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共同進行這種對富人，對騙子，對懶漢，對流氓而實行的統計和監督，才能克服可惡資本主義社會底這些餘孽，才能克服人類中的這些糟粕，這些無可救藥的，腐敗的，僵死了的成份，這種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惡疾、瘟疫和毒癰。

工人和農民們，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們！土地、銀行，工廠都已轉爲全民財產了！大家親自來統計與監督產品底生產和分配吧，——這就是，而且只有這才是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勝利的保障，才是戰勝一切剝削和一切貧窮困苦的保障！因爲俄國有足夠全體人民享用的糧食、鉄、木料、羊毛、棉花和麻，只是要正確分配勞動和產品，只是要對這種分配建立全民周詳切實的監督，只是要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戰勝那些人民公敵：富人及其食客，其次是騙子、懶漢和流氓。

對於這些人民公敵，社會主義底公敵，勞動者底公敵，是不容有絲毫寬恕的。要對富人及其食客即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作殊死的決戰；要對騙子、懶漢、流氓決戰。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資本主義底兒子，都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社會底產物，在這種社會中，一小羣人掠奪人民，欺侮人民，在這種社會中，貧窮困苦的現象使成千累萬的人走上邪路，忘記自己的人格，去幹無賴流

氓、賣身受賄、欺騙詐取的勾當，在這種社會中，必然養成勞動者這樣一種心理：只要能逃避剝削，那怕用欺騙伎倆也好；只要能設法避免可惡的工作，那怕是一分鐘都行；只要能避免飢餓，能使自己和家口飽足一下，便想盡方法，不擇手段來撈得麵包，那怕是一小塊也不錯。

富人和騙子是同胞兄弟，這是資本主義養育成的兩種主要的寄生蟲，這是社會主義底兩種主要敵人，對於這些敵人應當由全體人民加以特別監視，當他們稍一違犯社會主義社會底規則和法令時，便應無情地加以懲治。在這方面表示任何軟弱，任何動搖，任何憫惜，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莫大罪行。

爲要使社會主義社會免除這些寄生蟲的危害，就應當組織對勞動數量，對物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即由千百萬工農羣衆自願、努力、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實行的統計和監督。統計和監督要十分簡易，使每個誠實、精明、能幹的工人和農民都能勝任，而爲要組織這樣的統計和監督，就必須喚起工農自己的，即從他們中間產生的組織人才，就必須喚起他們在組織成績方面實行比賽，——並在全國範圍內佈置好這種比賽，——就必須使工農份子明白懂得，要向有學識的人徵詢意見是一回事，要由『普通的』工農來監察那些『有學識』人所常有的疏懈行爲，却是另一回事。

這種疏懈、粗忽、大意、草率、舉動急燥，愛用討論來代替作事，用空話來代替工作的惡習，無事不幹而一事不成的惡習，是『有學識人』底特性之一，這根本不是由於他們天性惡劣，更不是由於他們心懷惡意，而是由於他們的一切生活習慣，由於他們的勞動環境，由於疲勞過度，由於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非常態的分離現象等等等等所產生出的。

由於我們隊伍中智識份子這種可悲的，但在現時是不可避免的性質，由於工人對智識份子底組織工作沒有實行充分的監督所產生出

的錯誤等等，在我國革命進程內所常有的那些錯誤、缺陷和過失中，起了不少的作用。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他們應該免除這種毛病，而他們定會脫掉這種毛病。若沒有有學識的人、智識份子、專門家底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每個多少精明的工人和農民對於這點，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人中的智識份子決不能抱怨，說工農方面不充分注意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同志尊敬態度不夠。但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督却是另一回事。智識份子往往能提供極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實行這些意見和指示，要真正切實監督來把言論變成事實時，他們却『笨手笨腳』，無力得可笑，無力得可恥，無力得荒謬絕倫。

所以在這一方面，若沒有從『老百姓』出身，即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底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萬事皆人爲』，——工人和農民應當把這個真理記得爛熟。他們應當懂得，現在最主要的應當是實踐，現在已經進到了這樣的歷史關頭，這時，理論要變爲實踐，理論要由實踐來鼓舞，要由實踐來糾正，要由實踐來檢閱，這時，原來馬克思所說的這句話是特別正確的，他說：『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⁴⁶，——在實踐上對富人和騙子加以切實約束、制裁、加以完全統計和監督的每一步驟，都勝過一打關於社會主義的漂亮議論。因為『朋友啊，理論是暗淡的，而生活之樹却是常青的』⁴⁷。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應當反對智識份子所愛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在細則方面，在地方特徵方面，在處事方式方面，在實踐監督的方法方面，在消滅和制裁寄生蟲（富人和騙子，智識份子中的懈怠者和狂人等）的手段方面的多樣

性，在基本上、根本上、主要問題上，不僅不會破壞統一性，反而會保證統一性。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自下的首倡、主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我們的蘇維埃現在也是遵循着這種道路。可是它們還有些『胆怯』，還沒有開展自己的能力，還沒有『浸入』到自己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的新的偉大創造工作中去。必須使各地蘇維埃更大胆、更有主動精神地來從事工作。必須使每個『公社』——每個工廠，每個鄉村，每個消費協社，每個供給委員會都能來實際組織對勞動和對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都能在這方面互相比賽。這種統計和監督底綱領是簡單明瞭，誰都懂得的：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有麵包吃，每個人都不要穿壞鞋子和破衣服，都有溫暖的住宅，誠實作工，使任何一個騙子（其中也包括不願作工的懶漢）都不致逍遙法外，而是坐在牢獄裏，或受到最苦重的強迫勞動的處分，使任何一個違反社會主義規則和法令的富人都不會逃脫騙子所遭受的命運，而這種命運照道理也是富人所應該遭受的。『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訓條。這就是要在實踐上辦好的事情。我們的『公社』，我們由工農出身的組織家，尤其是智識份子出身（其所以說尤其，是因為他們太慣於，過分慣於以自己的普泛指示和決議案自豪）的組織家，若有這樣的實踐成績是應自豪的。

各公社和城鄉小支部，都應當自動製定出成千成百的對富人、騙子和懶漢作實際統計和監督的方式與辦法，並在實踐中把它們試驗好。在方式與辦法方面底多樣性，是生命力底保障，是勝利地達到共同一致目標的保證，這個共同一致的目標就是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肅清跳蚤般的騙子和臭蟲式的富人等等等等。在一個地方拘禁十幾個富人，一打騙子，半打偷懶的工人（如像彼得城裏，特別是黨印刷局裏的排字工人懶於作工，這同樣也是流氓式的行

爲)。在另一個地方叫他們去清掃廁所。在第三個地方，叫他們坐了監牢之後，給他們一張黃紙證書，使全體人民在他們悔過以前，把他們當作危害份子來加以監視。在第四個地方，從十個偷懶罪犯中拿出一個來就地槍斃。在第五個地方，想出各種不同方法來配合運用，例如用有條件釋放的辦法來使富人、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騙子和流氓中那些可以改正的份子迅速自新過來。方式愈紛繁愈好，共同的經驗就會愈加豐富，社會主義的成功就會愈加可靠而迅速，實踐就會愈加容易規定出——因爲只有實踐才能規定——最好的鬥爭手段和方法。

究竟在哪一個公社裏，在大城市中哪一個街坊裏，在哪一個工廠裏，在哪一個鄉村中，已經沒有飢餓者，沒有失業者，沒有富足的懶漢，沒有資產階級奴僕中的惡徒以及自稱爲智識份子的怠工者；哪裏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情作得多些；哪裏多給窮人建造了良好的新房屋，多把窮人安置到富人房屋裏去居住；哪裏對於正常供給貧家每個小孩一瓶牛奶的事情作得多些；——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各公社、村社、消費生產協社、共耕社和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應當開展比賽。正是在這種工作上，組織家的才幹當應實際顯現出來，並應提拔這種人才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組織家的人才在民衆中是很多的。不過他們被壓抑住了。應該幫助他們發揮起來。他們，而且只有他們，在羣衆贊助之下，能夠挽救俄國，挽救社會主義的事業。

弗、列寧。

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舊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初次刊載於真理報第十七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六八至四七六頁。

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⁴⁸

立憲會議決議：

(一)

(一) 俄國宣佈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均歸蘇維埃掌握。

(二)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聯盟基礎上，而成為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二)

立憲會議之基本任務是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除社會之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無情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使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獲得勝利，茲決議如下：

(一) 廢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連同一切建築物、農具及其他農業生產上的附屬物，均宣佈為全體勞動人民底財產。

(二) 批准蘇維埃關於工人監督和關於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法令，以便保證勞動人民對剝削者實行統治的權力，並作為使工廠、礦山、鐵路和其他生產資料及運輸機關完全轉歸工農國家所有的第一步驟。

(三) 批准將一切銀行收歸工農國家所有的法令，作為使勞動羣衆擺脫資本壓迫的條件之一。

(四) 爲了消滅社會中的寄生階層起見，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

(五) 爲了保證勞動羣衆掌握全部政權和消除恢復剝削者政權的任何可能起見，特令實行武裝勞動者，建立社會主義工農紅軍並完全解除有產階級底武裝。

(三)

(一) 立憲會議表示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造成此次空前罪惡戰爭以致殺人遍野的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底血爪下解救出來，因此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執行的下述政策：廢除祕密條約，現時交戰雙方軍隊中的工農進行最廣泛的聯歡，無論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來達到各國人民間以民族自由自決爲基礎的不兼併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二) 爲了同一目的，立憲會議主張與資產階級文明世界底野蠻政策完全斷絕關係，這種政策是以奴役亞洲和一般殖民地以及弱小國家中數萬萬勞動民衆爲基礎，造成少數特殊民族中剝削者底福禍。

立憲會議表示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爾明尼亞有自由實行自決的政策。

(三) 立憲會議認爲宣告廢除歷來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訂債款的蘇維埃法令是對國際銀行和財政資本的第一個打擊，並深信蘇維埃政權定會堅定地遵循這條道路前進，一直達到國際工人起義反對資本壓迫的完全勝利。

(四)

立憲會議係根據十月革命前各黨所提名單選出，當時民衆還不能全體奮起反對剝削者，還不知剝削者在捍衛其階級特權時實行反抗的力量如何巨大，還沒有動手在實踐上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所以立憲會議認為，如果將自己與蘇維埃政權對立起來，那就甚至從形式觀點上說，都是根本不正確的。

按實質說，立憲會議認為現在當人民與剝削者作最後鬥爭的關頭，在任何一個政權機關中都決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餘地。政權應當完全唯一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頒佈的法令，並認為自己的任務應僅限於規定社會之社會主義改造底根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因而也就是更加密切鞏固的聯盟，所以它認定自己的任務僅在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底根本原則，而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羣衆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舊曆四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

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⁴⁹

俄國革命一開始就提供出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作為一切被剝削勞動階級底羣衆組織，作為唯一能夠領導這些階級為其政治上經濟上完全解放而鬥爭的組織。

在俄國革命第一個全時期中，蘇維埃壯大了，強固了，數量上增加了，並根據自身經驗消除了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認識了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形式的欺騙性，而在實踐上得出結論：若不和這種形式以及任何的妥協政策破裂，則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蘇維埃，便是這種破裂的表現。

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以前所提候選人名單選出的，因而它所表現的乃是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執政時舊的政治勢力對比關係。那時人民投票贊成社會革命黨候選人時，還不能在擁護資產階級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加以選擇。於是這個本應成為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花冠的立憲會議，就不能不成為橫梗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道路上的障礙。

十月革命既把政權交給蘇維埃，並經過蘇維埃交給被剝削勞動階級，這就引起了剝削者底拚命反抗，而在鎮壓這個反抗中，便完全表露了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開端。勞動階級根據經驗於是信服了：舊資產階級國會制已經過時，它與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是絕不相容的，只有階級機關（蘇維埃便是這樣的機關），而不是全民機關，才能克服有產階級底反抗並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在現時，凡是拒絕由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拒絕人民所已奪得的蘇維埃

共和國而贊助資產階級國會制和立憲會議，便是向後倒退，便是使整個的工農十月革命陷於破產。

在一月五日召集的立憲會議上，由於上述各種情形，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亞甫克森跌夫和切爾諾夫底黨得以佔有多數。這個黨當然拒絕了討論蘇維埃政權最高機關，即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承認蘇維埃政權綱領，承認『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承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之確切明瞭而不容任何曲解的提案。於是立憲會議就斬斷了它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間的任何聯繫。所以現時在蘇維埃中佔有顯然絕大多數並享有工人和大多數農民信任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之退出這樣的立憲會議，自然是不可免的了。

事實上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外拚命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公開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把勞動階級爲了擺脫剝削而以強力來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的必要辦法叫做非法橫行，辯護替資本服務的怠工者，甚至公然號召採用恐怖手段，這種手段並已由一切『不知名的團體』着手實行起來。因此，留在立憲會議中的那一部分人顯然只會起着這種作用，即掩蓋反革命派爲推翻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鬥爭。

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

立憲會議宣告解散。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刊載於中央製委新聞報第五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九四至四九五頁。

關於立刻單獨媾和並簽訂割地 和約問題的提綱

(一) 按俄國革命現時狀況看來，幾乎全體工人與絕大多數農民都無疑地是站在蘇維埃政權及其所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方面。在這點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已經有了保障。

(二) 同時，各有產階級深知爲保存土地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後決戰當前而實行瘋狂反抗，由於這種反抗所引起的國內戰爭，還沒有達到它的頂點。蘇維埃政權在這戰爭中的勝利是有了保障的。但必然還需要經過一個相當時間，必然要大大緊張力量，必然要經過一個爲任何戰爭，尤其是國內戰爭所定會引起的嚴重破壞與混亂的相當時期，才能把資產階級底反抗鎮壓下去。

(三) 此外，這種反抗還採取各種不如此積極的和非軍事的形式：如怠工，收買流氓，收買替資產階級服役的好細，使他們鑽進社會主義者隊伍中來破壞社會主義者底事業等等等等，——這種反抗竟如此頑強而又能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遂使打破這種反抗的鬥爭必然還要遷延一些時日，恐怕至少要經過幾個月的工夫，才能使各種主要形式的鬥爭告一結束。然而若不堅決戰勝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所實行的這種消極與隱蔽的反抗，則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四)最後，俄國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上的各種組織任務，是非常龐大而且困難，所以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既有為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而本身的文化水準又不很高的條件下來解決這些任務，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五)總括所有這些情況，便可以完全肯定地得出結論說，爲使社會主義在俄國獲得勝利，便需要有一個相當的時期，至少是幾個月的時間，在這幾個月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政府要完全不受束縛地來先在本國戰勝資產階級，並把廣泛而深刻的羣衆組織工作辦理就緒。

(六)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實際狀況，應成爲決定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一切國際任務的基礎，因爲在戰爭第四年度的國際形勢，使我們對於在歐洲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中（連德國也在內）爆發革命並推翻其政府的大概時機，完全無法估計。毫無疑義，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應當來到，並且一定會來到的。我們對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一切希望，正是以這種信心和這種科學先見爲根據。我們的一般宣傳工作，尤其是組織交戰兵士聯歡的工作，應當加緊並使之發展。但是若以企圖斷定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是否在最近半年內（或類似這樣的短時間內）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爲基礎，而來規定俄國社會主義政府底策略，那就是一種錯誤。因爲這點絕對無法斷定，所以一切類此的企圖，客觀上都必然會走到盲目的孤注一擲。

(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進行的和平談判，已完全闡明，在現時，即是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時，德國政府（它是完全能夠操縱四盟國中其餘諸政府的）內無疑是主戰黨佔了上風，該黨在實際上已向俄國提出了最後通牒（可以而且必須預料到，這在日內便會正式提出）。這個最後通牒就是，或則繼續戰爭，或則接受割地和約，即是簽訂此種條件的和約：我們要讓出自己所佔據的一

切土地，而德國人則保存其已佔得的一切土地，並要求我們賠款（以支付俘虜給養費為名義），其數目大約為三十萬萬盧布，分作幾年付清。

（八）現在俄國社會主義政府面前擺着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或是立刻接受這種割地的和平，或是立刻進行革命戰爭。這裏，任何中間的決定，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再無法繼續推延下去了，因為我們為了故意遷延談判，已經施盡了一切可能的以至不可能的方法。

（九）若把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論據拿來考察時，我們首先所看到的論據，就是說現在單獨媾和，客觀上便是同德帝國主義者妥協，便是『同帝國主義者勾結』等等，因而這種媾和就是完全背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基本原則。

然而，這個論據顯然是不正確的。工人在罷工失敗時簽訂不利於他們而有利於資本家的復工條件，這並不是叛變社會主義。只有那些為着一部份工人底利益而使資本家有利的人，才是叛變社會主義，只有這類的妥協才是原則上不可允許的。

誰把同德帝國主義進行的戰爭稱為防衛戰和正義戰，而實際上却得到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並把同他們訂立的祕密條約對人民隱瞞起來，那他就是叛變社會主義。誰一點也不隱瞞人民，不與帝國主義者訂立任何祕密條約，而只因當時沒有力量繼續戰爭，才同意簽訂不利於一個弱國，而利於一個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和約，那他絲毫也沒有叛變社會主義。

（一〇）主張立刻進行戰爭的另一個論據，就是以為我們若簽訂和約，客觀上便成了德帝國主義底奸細，因為這會使德帝國主義能從我國戰綫上調走軍隊，並獲得由我方釋放的幾百萬俘虜等等。可是這個論據顯然也是不正確的，因為現在進行革命戰爭，客觀上便會使我們成為英法帝國主義底奸細，給它們以達到自己目的的助

力。英國人會向我們的最高總司令克里連科直接提議，若是我們繼續戰爭，就按每個兵士每月一百盧布來付給我們的經費。即令我們不拿英法分文款子，然而我們既牽制一部分德軍，客觀上畢竟還是幫助它們。

由這一方面看來，在此兩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完全擺脫某種與帝國主義的聯繫，並且顯然在未推翻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前，是不能完全擺脫這種聯繫的。由此應得出的正確結論，就是從社會主義政府在一國內獲得勝利之日起解決各種問題時，不應以某個帝國主義較好爲出發點，而應專以如何能使業已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最便於發展和鞏固的條件爲出發點。

換言之，現在我們的策略不應以幫助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中的某一集團比較有利的原則爲基礎，而應以如何可以更加穩妥可靠地保證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一國內鞏固起來，或至少能支持到別國也起來加入時的原則爲基礎。

(一一) 有人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反戰派，現在已成了『敗北派』，並且請求我們不要對德帝國主義讓步。可是我們之承認敗北主義，只是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而言，而在形式上或實際上同『友好』的帝國主義聯合來達到戰勝他國帝國主義的辦法，我們始終是反對的，因爲這種辦法在原則上既不允許，並且根本上是不中用的。

因此，這個論據不過只是上述論據的變形而已。如果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向我們提議把單獨媾和一事遷延到一定時期，而保證在此時期內在德國發動革命的話，那我們對此問題也許能作另一種看法。可是德國的左派不僅不這樣說，反而正式聲明：『你們儘力支持下去吧，但在解決問題時，要以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實際狀況爲根據，因爲關於德國革命的事，絲毫也不能給以確切的約許』。

(一二)有人說，在黨所作的許多聲明中，我們直接『約許過』進行革命戰爭，現在若簽訂單獨媾和條約，那就是違背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這不是事實。我們說過，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政府必須『準備並進行』革命戰爭，我們說這話原是爲了反對那種抽象的和平主義，反對那種完全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可以進行『保護祖國』戰爭的理論，最後，是反對一部份兵士中貪生怕死的本能；但我們並沒有担承任何義務，竟不顧時機可能如何而冒昧開始革命戰爭。

就是現在，我們也絕對應當準備革命戰爭。我們執行着自己的這個約許，也如同我們一般地執行了一切能夠立刻執行的約許那樣：我們廢除了各種祕密條約，我們向各國人民提出了正義的和平，我們曾盡量設法遷延，並屢次遷延了媾和談判，以便使其他各國人民有時間起來參加媾和談判。

但是解決關於此刻可否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就應專以估計到實現這點的物質條件和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利益爲依據。

(一三)把我們對於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各種論據之批判總括起來，就應得出結論說，這種政策也許可以適合那班專求外觀漂亮，色彩奪目的人底癖性，可是完全沒有顧及到已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所處時期的階級力量及物質因素之客觀對比關係。

(一四)毫無疑義，我們的軍隊在目前和在最近幾星期內（也許會在最近幾個月內）絕對無力來順利擊退德國的進攻，第一，因爲大多數兵士極端疲憊，加上糧食事宜的空前破壞，以及過於疲憊的軍隊無人替換；第二，因爲馬匹完全無用，會使我們砲隊必遭滅亡；第三，因爲完全沒有可能來保衛由里加至列維里一帶的海岸，這就給敵人以最可靠的機會來佔據里夫省其餘部分，而後佔據亞斯特梁省，並從後方來包抄我軍很大一分部隊，最後，進佔彼得格拉。

(一五) 其次，同樣無可懷疑的，我軍中大多數是由農民出身的兵士，在現時絕對會贊成割地媾和，而不會贊成立刻進行革命戰爭，因為按社會主義原則改組軍隊，把赤衛隊編進軍隊等等的事業還剛剛開始。

在軍隊完全民主化的情況下，違反大多數兵士底意志去進行戰爭，那就是冒險的行動，而要組成真正堅固與思想健全的社會主義工農軍隊，又至少需要若干月的工夫。

(一六) 俄國貧苦農民有力支援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他們在現時却無力馬上就去進行嚴重的革命戰爭。若在此問題上忽略這種階級力量的客觀對比關係，那就會犯着無可補救的錯誤。

(一七) 因此對於現時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應有如下的看法：

如果德國革命會在最近三四個月內爆發並獲得勝利，那末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政策，也許不致斷送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如果德國革命在最近數月內不爆發，那末在繼續戰爭的條件下，事變進程必如下述：俄國會因最嚴重的失敗不得不簽訂更不利的單獨媾和條約，並且這種條約將不是由社會主義政府來簽訂，而是由某個其他的政府（例如，由資產階級拉達與切爾諾夫派聯盟的政府，或由類此的政府）來簽訂了。因為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的農民軍隊受到最初幾次失敗之後，——可能甚至不是經過幾個月，而是經過幾個星期後，——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的。

(一八)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若僅僅為着德國是否會在最近幾星期的最短期間內開始革命這一點，而把已在俄國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命運作孤注一擲，那就是完全不可容許的策略。這種策略乃是冒險的策略。我們沒有權利去這樣冒險。

(一九) 況且，即令我們簽訂單獨媾和條約，德國革命按其客觀基礎說來，也絕不會因而感到困難。也許沙文主義的烏煙瘴氣會

使它暫時遭到削弱，然而德國的狀況仍然會是極端困難，它同英美的戰爭將是持久的，雙方都是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這一事實已被完全徹底揭穿。俄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榜樣，將在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成爲活生生的模範，而這個模範所起的宣傳作用與革命化作用將是非常巨大的。這裏是資產階級的制度及兩個強盜集團間赤裸裸的侵略戰爭。那裏是和平與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

(二〇)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銀行和大工業國有化的基礎上，在城市與鄉村小農消費協社實行物與物交換的情形下，如果有幾個月和平工作的保證，則俄國的改造，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這種改造將使社會主義在俄國並在全世界內都成爲不可戰勝的了，同時也就可以造成建立強大工農紅軍的強固經濟基礎。

(二一) 在現時，只有社會主義共和國本着明顯提出並由社會主義軍隊完全贊同的，即推翻其他各國資產階級的這目的而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戰爭，才算是真正革命的戰爭。不過現時，我們顯然還不能提出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現在進行戰爭，那客觀上就是爲解放波蘭、立陶宛和庫爾蘭而進行戰爭。可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不離開馬克思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底原則，便不能否認社會主義底利益應該高於民族自決權底利益。我們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盡其所能來爲芬蘭、烏克蘭以及其他民族實現自決權，並且還在繼續這樣作。然而，如果具體情勢使得社會主義共和國底生存在現時會因維護幾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庫爾蘭等等）被破壞了的自決權而遭受危險，那末，保證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利益，當然應當高於民族自決權底利益。

因此，誰說『我們不能簽訂恥辱和約而出賣波蘭等等』，那他就是沒有看清若簽訂以解放波蘭為條件的和約，只會更加使德帝國主義去加緊反對英國，反對比利時，塞爾維亞及其他各國。以解放荷蘭、立陶宛、庫爾蘭為條件的和約，從俄國方面看來也許是『愛國主義的』和約，可是絲毫也不會改變其為同兼併者，即同德國帝國主義者締結的和約。

尼、列寧。

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舊曆七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
一九三至一九九頁。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爲了使疲憊不堪，瘡痍滿目的國家免除新的戰禍，我們作了莫大的犧牲，竟向德國人聲明我們同意簽訂他們所提出的媾和條件。我們的使者已於二月二十日（舊曆七日）下午從列日查出發到赫文斯克去，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回答。德國政府大概是有意遲遲不答，顯然是不願意媾和。德國軍閥執行各國資本家底委託，想窒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農，把土地交還地主，工廠交還銀行家，政權交還沙皇。德國將軍們想在彼得格拉和基也輔建立自己的「秩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危急萬分。俄國工農底神聖責任，是要在德國無產階級尚未起義和尚未勝利之前，始終忠誠地捍衛蘇維埃共和國，反對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德國的寇軍。

人民委員會議決：（一）全國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都用於革命防衛事業。（二）責成各蘇維埃和各革命組織戰到最後一滴血來保衛每一個障地。（三）各鐵路組織及與之有關的各蘇維埃，必須以全力阻礙敵人利用交通機關，在退却時必須破壞道路，炸毀鐵路建築物；全部車輛——車箱和車頭——立刻開往我國東方內地去。（四）凡有落入敵手危險的一切存糧和一般食品以及一切貴重財物，應當無條件地加以消滅；責成各地蘇維埃對此加以監視，並由

各蘇維埃主席親身負責。(五)彼得格拉，基也輔以及沿新戰線所有一切城鄉市鎮的工農，都應當組織掘壕營，由軍事專家指揮，挖掘戰壕。(六)資產階級中所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男女，均應編入掘壕營，受赤衛隊員底監視；違者槍斃。(七)所有一切反對革命防衛事業而站到德國資產階級方面，以及想利用帝國主義寇軍底侵入來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出版機關，一律封禁；這些出版機關中凡有勞動能力的編輯員和工作人都動員去參加挖掘戰壕以及其他有關國防的工作。(八)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偵探，一律就地槍決。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社會主義祖國萬歲！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舊曆九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三十二期和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三十一期。

選自國內戰爭時期的列寧著作，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九至三〇頁。

奇談與怪論

我黨莫斯科省委常務局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議案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員會，拒絕服從那些『與履行同奧德所訂和約條件有關的』中央決議，並在其對於該決議案的『說明書』中聲明說，『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是恐難避免的』*。

所有這些語句中不僅沒有什麼奇談，而且也沒有什麼怪論。在單獨媾和問題上與中央意見大相背馳的同志們，嚴厲責備中央，並認定分裂不可避免，這是完全自然的。這都是黨員極正當的權利，這是完全可以瞭解的。

但是附在決議案後面的『說明書』便是奇談怪論了。該說明書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省委常務局認為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恐難避免，因而抱定任務，要團結所有那些既反對單獨媾和派，又反對黨內一切機會主義穩健份子的澈底革命的共產主義者。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我們認為那怕就是喪失這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東西的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我們照舊認為我們的基本任務是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傳播到其他一切國家去，並

* 決議案底全文如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莫斯科省委常務局，在討論中央工作之後，對於中央底政治路線及其成份表示不信任，因此一有機會，便主張改選中央。此外，莫斯科省委常務局並不認爲自己應當絕對服從那些與履行同奧德所訂和約條件有關的中央決議』。本決議案是由全體一致通過的。

在俄國堅決實行工人專政及無情鎮壓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勢力』。這裏我們把那些真是… 奇談與怪論的字句加上了着重點。問題中心也就恰恰在這些字句中。

這些字句把該決議案作者底全部路綫都引伸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這些字句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他們錯誤的根源。

『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這… 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這是奇談，因爲甚至在前提與結論之間都沒有聯繫。『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使蘇維埃政權遭到軍事失敗，也是適當的』——這樣的提綱還可說是正確或不正確的，但總還不能稱之爲奇談。這是第一。

第二，蘇維埃政權『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這就不僅是奇談，而且簡直是怪論了。顯然作者陷入到糊塗不堪的迷堂中了。須得打破這個迷堂才行。

關於第一個問題，作者的意思顯然是說，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是遭受軍事失敗而弄到喪失蘇維埃政權，即使俄國資產階級獲得勝利，也是適當的。作者說出這句話，就是間接承認我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寫的，而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發表在真理報上的提綱中的話是正確的，我說，若不接受德國向我們提出的媾和條件定會使俄國失敗，並使蘇維埃政權被人推翻。

由此可知，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真理始終是佔上風的！我的『極端』反對者，以分裂相威嚇的莫斯科派，正因爲他們已公開說到分裂，便不得不也將自己的具體意見澈底說出，這種意見正是那些專用關於革命戰爭的籠統空談來搪塞了事的人們所寧肯迴避不說的。我的提綱與論據底全部實質（這是凡願細心讀讀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我所寫的提綱的人，都會看得出來），是指明當時必須立刻接受極苛刻的和約，同時又要嚴重準備革命戰爭（並且正是爲着這種嚴重準備工作的利益）。而那些專說什麼革

命戰爭的籠統空談的人們，却曾把我的論據底全部實質迴避不談，或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實質，不願意注意到這個實質。但是現在我應當誠懇感謝我的這些『極端』反對者——莫斯科派了，因為他們把自己對我的論證實質所持的『默然抵制的陰謀』撕破了。莫斯科派首先對於這些論據實質作了回答。

他們的回答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的回答就是承認我的具體論據底正確：是的，——莫斯科派承認了，——我們馬上若同德軍開戰，我們的確會遭受失敗*。是的，這種失敗，的確會使蘇維埃政權塌台。

我再一次誠懇感謝我的『極端』反對者——莫斯科派，感謝他們把那對我的論據實質，即是對我所說的，如果我們即刻應戰就會遭到何種結局這一具體指示所持的『默然抵制的陰謀』撕破了，並感謝他們毫無畏懼地承認了我的具體指示之正確性。

其次，我的論據底正確性，既然實際上已為莫斯科派迫不得已而承認了，可是他們仍然來從事反駁，究竟有何理由呢？

理由就是為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也可以的。

為什麼國際革命底利益定要求這樣作呢？問題中心就在於此，那些要想反對我的論據的人，其立論的真正實質也就在此。但無論在決議案中，無論在說明書中，恰巧對於這個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却一字也沒有提到。關於衆所共知與無可爭辯的問題，決議案作者却找到了時間與地方來說到——既說到『無情鎮壓俄國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勢力』（就是用足以喪失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底手段

* 有人反駁說，當時躲避戰爭橫豎是不可能的。對於這種反駁意見已有事實作回答：我的提綱是在一月八日宣讀的：到一月十五日我們本已有可能得到和平。若不是……若不是由於革命的空談，我們一定已經得到了暫時的休憩（對於我們，即令是最短促的暫時休憩，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精神方面，都有巨大意義。——因為那時德國人將要宣佈新的戰爭）。

和辦法嗎？），又說到反對黨內一切機會主義穩健份子，而關於恰恰是爭論的問題，也就是有關反對媾和者的立場實質問題，却一聲不響！

這真是奇怪。非常的奇怪。決議案作者對此之所以默不作聲，豈不正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特別軟弱無力嗎？若是明白說出爲什麼（爲什麼國際革命底利益要求這樣作），那他們也就許會揭穿自己了…

但不管怎樣，我們須得找出那些可能是決議案作者引爲根據的理由來。

也許作者以爲國際革命底利益禁止與帝國主義者締結任何和約嗎？這種意見已由一些反對締結和約者在彼得城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可是擁護這種意見的，只有反對單獨媾和者中極少數的一部份人。顯然這種意見是走向否認布列斯特談判的適當性，否認「甚至」以歸還波蘭，拉脫維亞和庫爾蘭爲條件的和約。這種觀點之不正確（例如在彼得城的反對媾和者中的大多數便反對這種意見）是一目了然的。按照這種觀點，社會主義共和國處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是連任何經濟條約也不能締結的，假若不飛到月球上去，那就簡直無法生存了。

也許作者以爲國際革命底利益是要求助長這種革命，而能助長這個革命的，大概只是戰爭，絕不是和平，因爲和平便會使羣衆覺得彷彿帝國主義是「法定了」的吧？像這一類的「理論」是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始終否認「助長」革命，革命是隨着那產生革命的階級矛盾尖銳化底成熟程度而發展的。這類的理論與認爲武裝起義無論何時和在何種條件下都是必須採取的鬥爭形式的觀點一樣。其實，國際革命底利益，是需要已推翻國內資產階級的那蘇維埃政權起來幫助這個革命，不過幫助的形式應根據自己的力量去選擇。爲要在國際範圍內幫助社會主義革命，那怕是使這種

革命在本國內失敗，——這種觀點，甚至從助長革命的理論中也是引伸不出來的。

也許決議案作者以為德國革命已經開始，已經達到公開的全國內戰的程度，所以我們應當獻出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德國工人，應當以犧牲自己（『喪失蘇維埃政權』）去拯救已經開始決戰而陷在嚴重打擊之下的德國革命吧？就這種觀點看來，我們前去犧牲，也許可以牽制住德國一部份反革命勢力，因而就會救全德國革命。

當然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那怕就是遭受失敗，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這不僅是『適當的』（如決議案作者所說），而且簡直是應該的了。但這種前提顯然沒有。德國革命在成熟着，可是顯然還沒有成熟到在德國爆發革命的程度，還沒有成熟到在德國發生內戰的程度。我們『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的辦法，顯然也幫助不了德國革命之成熟，反而會妨礙它。我們會以此幫助德國反動勢力，為其所利用，而使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更感困難，使那些尚未轉到社會主義運動方面來的德國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廣大羣衆更加離開社會主義，因為他們會被蘇維埃俄國的潰敗所嚇倒，如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潰敗把英國工人嚇倒了一樣。

不管怎樣，在作者的議論中，是找不出邏輯來的。足以辯護『為着國際革命底利益，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這一主張，是沒有合理論據的。

『蘇維埃政權現時變成為純粹形式的東西』——這就真是怪論，莫斯科決議案底作者竟公然說出這種怪論來了。

據說，既然德帝國主義者要我們繳納貢賦，既然他們要禁止我們進行反德的宣傳鼓動，那末蘇維埃政權便失掉了意義，而『變成為純粹形式的東西』了，大概這就是決議案作者底『思維』程序。我所以說『大概』，是因為作者並沒有拿出絲毫明確理由來證實自己的上述提綱。

說蘇維埃政權的意義似乎是形式上的，因而可以採取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的策略，這一『理論』底內容便是沒有出路的極端悲觀情緒，是完全絕望的悲觀心理。反正沒有救路，就讓蘇維埃政權也遭滅亡吧，——從這種心理上才寫出了這個怪誕的決議。有時用以掩飾這種意思的所謂『經濟』論據，也是歸結於同樣沒有出路的悲觀主義：既然人家可以強迫我們繳納貢賦，要這要那，試問哪裏還說得上什麼蘇維埃共和國呢。

除了絕望以外，再沒有旁的東西了：反正是要滅亡的！

在俄國現今極困難的境況下，這種心理是很了然的。不過所謂『了然』，並不是對於覺悟的革命者說。正是這樣一種心理表明莫斯科派底觀點走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七九三年時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說他們的勝利品，即共和國與民主制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說那怕就是喪失共和國也可以的。他們所充滿在胸懷中的，並不是絕望，而是對勝利的信心。但口頭上號召進行革命戰爭，同時却在自己的正式決議案中寫着『那怕就是喪失蘇維埃政權』，這便是把自己的面目澈底揭破了。

十九世紀初，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普魯士及其他許多國家所遭到的失敗以及被侵略者征服、侮辱、壓迫等等的痛苦，較之一九一八年俄國所遭受的這種痛苦，簡直大得無可比擬，無可測量。然而普魯士底優秀人士，當拿破崙軍隊底鉄蹄把他們踐踏得比我們現在所已遭到的蹂躪更加厲害百倍的時候，也沒有絕望過，也沒有說過他們的國家政治機關成了『純粹形式的東西』。他們並沒有表示絕望，也沒有被『反正是要滅亡』的心理所支配。他們曾簽訂了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加苛刻得多，殘酷得多，恥辱得多，受壓迫得多的和約，他們善於堅定地忍受住侵略者所橫施的壓迫，靜待時機，然後又奮起作戰，又陷於侵略者的壓迫下，又簽訂屈辱

的，屈辱到了極點的和約，然後又重新奮起，並終於獲得了解放（當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競爭的強大侵略者間的爭執）。

爲什麼這樣的事情不能在我國歷史上重演一次呢？

爲什麼我們定要陷入絕望境地而寫出比最恥辱的和約還更加可恥的決議，說什麼『蘇維埃政權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呢？

爲什麼在同現代帝國主義巨魁鬥爭中所遭到的嚴重軍事失敗，就不能也使俄國人民性格鍛鍊起來，加強其自我紀律，消滅高傲空談惡習，學會堅韌精神，引導羣衆走向普魯士人被拿破崙打敗時所採取過的正確策略：自己既沒有軍隊了，就只好簽訂最恥辱的和約，以便養精蓄銳，爾後一再奮起呢？

爲什麼他國人民能堅忍地經住多次慘痛，而我們祇初次遇到非常苛刻的和約時，便應陷入絕望境地呢？

試問這種絕望策略與無產者底剛毅精神有什麼符合之處？因爲無產者懂得，若是沒有力量的時候，那就只好屈服，並善於隨後在任何條件下都養精蓄銳，以便無論如何都要一再奮起，——試問這種絕望策略究竟是適合於無產者底剛毅精神，還是適合於小資產者底無氣節性呢？因爲小資產者在我國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爲代表，在大放革命戰爭的空砲方面，真是打破紀錄了。

莫斯科『極端』派中的親愛同志們，這不是無產者底剛毅精神！每天的艱苦考驗都會使最有覺悟與最有堅忍性的工人離開你們。他們會說，蘇維埃政權不僅當侵略者已進到普斯科夫城並要我們繳納價值一百萬萬的糧食、礦產、現金的貢賦時，沒有變成爲，也不會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而且就是當敵人出現於尼什涅城和頓河岸羅斯干夫城，並要我們繳納價值二百萬萬的貢賦時，它沒有變成爲，也不會變成爲純粹形式的東西。

任何時候，任何外國侵略，都決不能把人民的政治機關（而蘇維埃政權不僅是比歷史上所有過的一切政治機關都高出多倍的政治

機關而已)變成『純粹形式的東西』。相反的，外國的侵略，只會加強人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同情，只要… 只要蘇維埃政權自己不去幹冒險舉動。

若是沒有軍隊而拒絕締結最屈辱的和約，那就是冒險，人民對於這樣拒絕和約的政權所作的冒險行動，是有權加以責難的。

簽訂比布列斯特和約還沈痛百倍恥辱百倍的和約，在歷史上已有過這樣的先例（上邊已經舉出了例子），它並沒有使政權喪失威信，又沒有使政權成為形式的東西，也沒有使政權或人民遭到滅亡，反而鍛鍊了人民，教導了人民甚至在侵略者鉄蹄踐踏的艱鉅情況下，也善於作這種準備真正有力軍隊的極困難的事業。

俄國現今正在準備進行新的，真正的衛國戰爭，即保衛與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戰爭。也許另一個時代——如拿破崙戰爭時代一樣——將會是侵略者強使蘇維埃俄國進行的多次解放戰爭（定是多次戰爭，而不是一次戰爭）的時代。這是可能的。

因此，可恥的絕望心理，比那因為沒有軍隊而不得已締結的任何苛刻和約，極端苛刻的和約更為可恥，比那最可恥的和約還要可恥。如果我們認真看待起義和戰爭的話，那我們就是簽訂十個極端苛刻的和約也決不會滅亡。如果我們不讓絕望與空談來斷送自己的話，那侵略者是決然滅亡不了我們的。

尼、列寧。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三十七期和第三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
二九七至三〇三頁。

腳踏實地

由於德寇背信棄義襲擊俄國革命所掀起的革命高潮，已經成爲事實。到處都來電表示，決心爲保衛蘇維埃政權而撕殺到最後一個人。本來以另一種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農政權也是決不會有的事。

然而與德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進行戰爭，單靠熱忱是不夠的。若以輕率態度去對待現時這次嚴重、頑強、流血的戰爭，那就會是極端幼稚，甚至是犯罪行爲。

戰爭應當以認真的態度去進行，不然就根本不要進行戰爭。中間道路這裏是不會有的。既然德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進行戰爭，那末我們的神聖義務就是要清醒地估計自己的狀況，籌算力量，檢查經濟機構。所有這一切工作都應以戰時速度來完成，因爲在我們目前狀況下，任何遲緩，便真正等於『自尋死路』。甘尼巴爾已闖到門口了⁵⁰；——這是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的事。

爲要認真進行戰爭，必須有組織得很堅固的後方。若沒有充分的武裝，沒有充分的給養與充分的訓練，那怕是最優秀的軍隊，最忠實於革命事業的人員，也會立刻被敵人消滅掉的。這是極端明顯，用不着加以解釋的道理。

我們革命軍底後方情形怎樣呢？至少可說是最可悲痛的。由於前次戰爭的結果，我們的運輸業完全解體了，城鄉間的商品交換被破壞了，其直接結果，就是各大城市中發生飢荒。

我們的軍隊受到敵人猛打擊，現時正在實行根本改組。熟悉現代作戰條件的舊軍隊，已經沒有了。被這次戰爭弄得困苦不堪，因三年半的戰壕生活以致精疲力竭的舊軍隊，其戰鬥力已等於零了。紅軍無疑地是極好的戰鬥『材料』，然而還是沒有加工製造過的原料。爲要使它不致成爲德軍的砲灰，就必須加以教練，使其嚴守紀律。

我們面前擺着極大的困難。各地方蘇維埃在拍發了關於決心與外敵鬥爭的電報之後，應即呈報以下各項：已向彼得格拉送去了多少車箱糧食；能立刻派出多少軍隊到前線去；有多少紅軍戰士在受訓練。對於一切武器和彈藥都應加以登記，要立刻恢復武器與彈藥的生產。應把鐵路上的投機小販和流氓一概肅清。到處都應恢復極嚴格的革命紀律。只有履行所有這些條件時，才可以認真談到戰爭。否則，一切關於『最革命戰爭』的議論，都會是空話。空話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害的，而際此緊急關頭，則可能造成覆滅的厄運。

我深信，我們的革命能夠克服當前的巨大困難。它已經作了很大的工作，但爲要順利完成我們的事業，還須加倍努力。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勝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三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四至三〇五頁。

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

我們可憐的『左派』昨天竟出版了自己的報共產主義者⁵¹（應當說是：馬克思時代以前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這報上說了許多遁詞，想來逃避歷史教訓，逃避多次的歷史教訓，逃避自己的責任。

逃避也是枉然的，無論如何都是逃避不了的。

拚命逃避的人們，大費氣力，勞累得滿面是汗，『甚至』不惜耗費印刷油墨，在報紙上登載無數論文，來證明『暫息論』是毫無根據的壞『理論』。

唔！儘管他們怎樣大賣氣力也推翻不了事實。英國諺語說得好：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事實是：自三月三日下午一時德軍停止軍事行動時起，至三月五日晚上七點鐘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止，我們是獲得了暫息時機，並且我們已經利用這兩天工夫來進行了切實的（不是空談，而是腳踏實地做去）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工作。這是事實，這是會為羣衆日益明瞭的事實。當無力再戰的前線軍隊，拋棄大砲，連橋樑也顧不及炸毀就狼狽奔逃的時候，要保衛祖國並提高其國防能力，那就不是空談進行革命戰爭（在軍隊這樣狼狽奔逃時，主張革命戰爭的人連一個部隊也沒有遏阻住，却還空談革命戰爭，——簡直可恥已極）所能辦到的，而是要作有秩序的退却來挽救殘餘軍隊，要利用每天的暫息時間來實現這一目的，——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

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

我們可憐的「左派」，爲要逃避事實，逃避事實的教訓，逃避責任問題，就極力對讀者掩蓋不久前才發生的，有歷史重要性的，尙屬新鮮的事實，而却援引早已過去並且是不關重要的事實來模糊他們。例如拉狄克在自己的論文中，回憶他十二月間（在十二月呵！）在遞給「人民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寫過關於必須幫助軍隊支持下去的問題。我沒有機會閱讀這個報告書，因此我就尋思自問：爲什麼拉狄克不把這報告書全部發表出來呢？爲什麼他沒有確切了當地說明，他當時對「妥協和約」這一名詞究竟作何瞭解呢？他爲什麼不回想一下不久前的事實：他在真理報上所寫的話，他以爲可能在歸還波蘭的條件下與德帝國主義者締結和約的幻想（最壞的幻想）呢？

爲什麼？

就是因爲可憐的「左派」不能不抹煞那些揭穿他們「左派」應負散佈幻想之咎的事實，因爲這種幻想在實際上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礙了德國革命底增長和發展。

布哈林現在甚至企圖否認他同他的朋友們曾斷定說德國人不能舉行進攻的事實。可是，許許多多人都知道這是事實，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是這樣斷言過，都知道他們既散佈這種幻想，也就是幫助了德帝國主義，並且妨害了德國革命底發展；須知德國革命現在因大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在由農民組成的軍隊狼狽奔逃時，喪失了成千上萬的大砲和價值若干萬萬的財富而被削弱了。這是我在一月七日提綱中已經明白確切地預言過的。如果布哈林現在迫不得已却「拒不招認」的話，那對於他就會更壞。凡是記得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所說德國人沒有進攻可能這句話的人，現在看見布哈林只好「拒不招認」他親口說出的話時，只會聳肩表示詫異而已。

而對於那些不記得這些話的人，或是沒有聽見這些話的人，我

們就給他們指出一些比拉狄克在十二月所寫的東西對現時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並更有教益的文件。這些文件可惜是被「左派」向他們的讀者隱瞞了的，這就是（一）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我黨中央與現今「左傾」反對派共同會議上的表決結果；以及（二）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央會議上的表決結果。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會議在表決關於是否應當立刻與德國破裂談判的問題時，贊成的（在可憐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報底撰稿人中）只有司徒可夫一人。其餘的人都是反對的。

關於萬一德國人破裂談判或是他們提出最後通牒時，是否可以締結割地和約的問題，表決反對的只有奧布林斯基（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把「他的」提綱登載出來呢？為什麼共產主義者報對於這點默不作聲呢？）和司徒可夫，其餘的人都是贊成的。

關於在這樣的情形下是否應當簽訂已提出的和約條件問題，表決反對的只有奧布林斯基和司徒可夫，其餘的「左派」份子都放棄表決權！這是事實。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表決關於誰贊成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時，布哈林和洛莫夫「在這樣的問題提法下拒絕參加表決」。表決贊成的沒有一個人。這是事實！

關於是否應當「把恢復和平談判的事推延下去，就是說，在德國進攻尚未充分（正是如此！）明顯之前以及這種進攻對德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尚未表現出來以前，暫不舉行談判」的問題，在現今的「左派」報紙撰稿人中，表決贊成的有布哈林、洛莫夫和烏里茨基三人。

關於「如果德國人進攻已成事實，而在德國和奧國又還沒有革命高漲的時候，我們是否要締結和約」的問題，放棄表決權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烏里茨基。

事實是很頑強的東西。而事實說明，布哈林否認了德國有進攻的可能，散佈了幻想，他用這種幻想在實際上，——雖不是他所心

願的，——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害了德國革命底增長。革命空談底實質也就在於此。本來是向這間房裏走，却走進另一間房裏去了。

布哈林責難我不來具體分析現今和約的條件。可是不難明白，爲了說明我的論據和問題實質，並沒有任何必要來具體分析這些條件。爲了這層，只須證明下述一點就夠了，就是說，在我們面前的真實絕路，而不是幻夢中的絕路只有兩個條件：或者是承認這樣的條件，而獲得至少幾日的暫息時間，或者就淪爲比利時和塞爾維亞的地位。這是在哈林——至少對彼得城說——也未能否認的，這是他的同志波克羅夫斯基所承認了的。

至於說，新條件比惡劣、苛刻、屈辱的布列斯特條件更惡劣、更苛刻、更屈辱的話，那末這種在偉大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面前所犯的罪過是要由我們可憐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烏里茨基之流來負責的。這是由上面引證過的表決情形所證實了的歷史事實。這件事實是用任何遁詞也躲避不了的。給過你們的布列斯特條件，而你們却以裝威作勢，妄自尊大作回答，以致弄成更惡劣的條件。這是事實。並且你們對此應負的責任是決然推卸不掉的。

我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寫的提綱中，極端明顯地預言過，由於我們軍隊的狀況（這是不能由「反對」疲憊農民羣衆的空談而變更的），俄國若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約，就會要締結更壞的單獨和約。

「左派」是上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圈套，因爲這些資產階級本來是要把我們拉進對於我們最不利的戰爭中去。

至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主張立刻進行戰爭，顯然是與農民分離了，這是事實。而這件事實也就說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的不鄭重性，正如一九一七年夏季所有社會革命黨人所執行的那種似乎是「革命」政策一樣的不鄭重。

最覺悟與最先進的工人很快就會撇開這種革命空談的瘴氣！這是彼得城與莫斯科的榜樣所正在表明着的。彼得城內的優秀工人區域，如維波爾格區與瓦西列也夫島區，已經覺醒起來了。彼得格拉工人代表蘇維埃並不主張立刻進行戰爭，它懂得必須準備，並且已在準備這個戰爭。在莫斯科，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日舉行的布爾什維克城市代表會議上，反對革命空談的人已經獲得勝利了。

「左派」之傲然自欺該到了何種怪誕地步，這點從波克羅夫斯其文章裏的一句話中就可看出來。他說：「要打仗，就要現在打」（波克羅夫斯基加的着重點）…「要趁着，——聽吧！聽吧！——趁着俄國軍隊尚未遣散而新軍尚未編成的時候來打」。

誰不逃避事實，那他就會知道，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間，無論在大俄羅斯，在烏克蘭，在芬蘭，妨害回擊德寇的莫大障礙都是我們的那個沒有遣散的軍隊。這是事實。因為這個軍隊已經不能不狼狽奔逃，並使紅軍部隊也受到它的牽動。

誰願意學習歷史教訓，不躲閃對這種教訓應負的責任，不逃避這種教訓，那他至少也會記得拿破崙第一與德國的戰爭。

普魯士與德國屢次同侵略國締結過比我們的苛刻十倍，恥辱十倍的和約，直至承認由外國人充任警察，直至承認派遣自己軍隊去幫助拿破崙第一進行侵略戰爭的義務。拿破崙第一同普魯士所訂的條約之蹂躪德國，分割德國，比現時與登堡和威廉對我們所施的壓迫要厲害十倍。可是，在普魯士却有人能不裝威作勢，而簽訂了極端「可恥」的和約，他們之所以簽訂這樣的條約，是因為沒有軍隊，雖是簽訂了苛刻十倍恥辱十倍的條約，但後來他們還是做到了起義和進行戰爭。這樣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許多次。歷史上有過幾次這類的和約與幾次這類的戰爭。有過幾次得到暫息的情形。有過幾次侵略者重新宣佈戰爭的事實。有過幾次某一被壓迫民族與某

一壓迫民族聯盟的事件，這個與侵略國互相競爭的壓迫民族，自己也同樣是侵略國（請那些主張不要帝國主義者幫助而進行『革命戰爭』的人們注意！）。

歷史就是這樣演進的。

過去是如此。將來也會如此。我們已進到多次戰爭的時代。我們正接近新的衛國戰爭。我們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正在成熟的條件下將去開始這個新戰爭。俄國無產階級和俄國革命在這一艱難困苦的道路上，定能醫好裝威作勢與革命空談的惡習，甚至既能接受極苛刻的和約，也能重新奮起的。

我們締結了提里齊特式的和約。我們也會達到我們的勝利，達到我們的解放，如像德國人在一八〇七至一八一〇年的提里齊特和約之後，達到了在一八一三和一八一四年從拿破崙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目的。由我們的提里齊特式和約到我們獲得解放時的距離，想必更短一些，因為現在歷史進展得快些。

打倒裝威作勢的惡習！為切實工作，整飭紀律和加強組織而奮鬥！

尼、列寧。

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四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六至三一〇頁。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在俄國共產黨（布）

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政治報告底內容本來可以用列舉中央委員會各種設施的方式，可是現時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的報告，而是關於我國整個革命的概述；祇有這種概述，才能使我們的一切決議有着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根據。我們應該考查革命發展之已往的全部進程，並闡明爲什麼革命底繼續發展起了變化。在我國革命中發生了對於國際革命將有巨大意義的轉變，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勝利底原因，在於當時隨着無產階級走的，不僅有農村羣衆，而且還有資產階級。所以很容易戰勝了沙皇制度，達到了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沒有達到的目的。在二月革命時，工人代表蘇維埃之自動的自發的成立，重複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經驗，——我們當時就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原則。羣衆根據本身鬥爭經驗學習了革命底任務。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事變，是示威運動與類似武裝起義舉動之一種特殊的結合。單是這次事變就足夠使資產階級政府傾覆。從此就開始了長期間的妥協政策，此種政策是由當時執政的小資產階級政府之固有本質中產生的。七月事變還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因爲羣衆對這還沒有充分覺悟。所以無論哪一個負責的組織，都不曾號召羣衆這樣去作。可是，在偵察敵情的意義上說，七月事變具有極大的意義。科爾尼洛夫叛亂和接着發生的種種事變，給了一些實際的教訓，而使十月勝利成爲可能的了。在十月革命中還

想與他黨分掌政權的人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將十月勝利與七月辜變、前綫進攻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等等聯繫起來，正由於這些事變，才使千百萬羣衆覺悟到蘇維埃政權已是必不可免的了。接着就是我們在全俄各地凱歌行進，隨之而來的便是大家對和平的渴望。我們知道，單方面拒絕戰爭是得不到和平的；還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我們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四月到十月的這個時期中，兵士們已明白地覺悟到：妥協政策總是遷延戰爭，促使帝國主義者荒謬無野地企圖舉行進攻，而更加沉陷到還會延長多年的戰爭中去。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無論如何都要趕快轉而採取積極的和平政策，必須將政權拿到蘇維埃手裏來，澈底掃除地主土地佔有制。你們知道，不僅克倫斯基，而且亞甫克森鉄夫都是擁護地主土地佔有制的，他們甚至逮捕了各土地委員會委員。於是，這個政策，這個已經由我們灌入到了最廣大民衆意識中的『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使我們能夠在十月間很容易地在彼得堡獲得勝利，並將俄國革命底最後幾個月變成全盤的凱歌行進時期。

國內戰爭業已成爲事實。我們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戰爭初期所預言過的，即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意見，當時大部份社會主義者都對這表示不相信，或甚至加以嘲笑，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一個最大而又最落後的交戰國內，却已變成事實了。在這國內戰爭中，絕大多數的人民，都站在我們方面，因而使我們非常容易地獲得了勝利。

前綫歸來的軍隊，把自己那種要剷除妥協主義的最大的革命堅決性，帶到他們足跡所至的一切地方去了；於是妥協份子，白衛隊，地主子弟們，便在民衆中間失去了任何靠山。這一反對他們的戰爭，隨着廣大羣衆以及調來反對我們的軍隊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的情形，而逐漸變成了革命的凱歌行進。在彼得城區域加琴納戰綫上的情形便是如此，那裏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企圖調來進攻

赤色首都的哥薩克軍隊，動搖起來了；此後在莫斯科，奧倫堡，烏克蘭等地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全俄各地湧起了國內戰爭的巨浪，我們到處都異常容易地獲得了勝利，這是因為果實已經成熟了，因為羣衆已經經歷過了與資產階級妥協的一切經驗。『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已經由羣衆用長期的歷史經驗來實際審查過，而成為羣衆底切身要求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的最初幾月，就成了全盤的凱歌行進時期。由於有這種凱歌行進的情形，遂使人們把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所立即遇到而且不能不遇到的那些困難情況忘記，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說來，還在舊制度內部，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掃除、摒棄和破壞舊社會所有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一完成這個任務，就算是完成了它所應作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時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越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而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如果俄國革命中那種經歷了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不是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創立了蘇維埃，那它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為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為轉移。蘇維埃就是這種現成的形式，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經歷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盤的凱歌行進，因為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須頒佈幾道法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中，變成爲在俄羅斯

國家內已奠定的法定形式，即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政權一下子就產生了，其所以產生得這樣容易，是因爲羣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甚至當任何政黨還沒有來得及宣佈這個口號以前，就已經創立了蘇維埃。受過一九〇五年苦辣經驗而更加有了鍛鍊的民衆創造力，就是這個無產階級政權形式底創造者。當時，戰勝國內敵人的任務，是極其容易的任務，建立政權的任務，也是極其容易的，因爲羣衆已給我們造成了這個政權底骨幹和基礎。蘇維埃共和國一下子就產生了。可是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按照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凱歌行進的道路來解決的，——當時我們沒有懷疑而且也不能懷疑，社會主義革命往後還要遇到一些極困難的任務。

第一，這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得不到這種現成關係，不過是有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而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實際上又祇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還極少觸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巨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整架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動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是不容許如我們從前解決國內戰爭任務時那樣用高呼『烏啦』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底實質不容許採用這樣的解決方式。如果說，我們很容易就戰勝了我國的卡列金匪徒，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而只遇到了一些甚至值不得嚴重注意的反抗；如果說，這種事變進程已爲以前整個客觀發展進程所預決，因此我們祇要來作出最後的結論，換招牌，去掉『蘇維埃是職工組織』的字樣，寫上『蘇維埃是唯一國家政權形式』的字樣，——那末在組織任務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我們遇着了莫

大的困難。每一個願意細心對待我國革命任務的人，馬上就知道：祇有用艱苦的長期的自守紀律的方法，才能克服戰爭給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那種腐化現象；只有經過非常長期的，艱苦的和頑強的道路，我們才能克服這種腐化現象並戰勝那些擴大這種現象的份子，因為這些人把革命看成只是一種解除舊桎梏的方法，而從革命中儘量攫取一切。在小資產階級國家內，在經濟極端破壞的時候，這種份子之大量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還須進行更加困難百倍的鬥爭來反對他們，這個鬥爭不能預期任何輕易的成效，——這個鬥爭，我們還剛剛開始進行。我們現時正處在這個鬥爭底第一階段。這裏我們還要遇到極艱難的考驗。這裏由於客觀情勢的關係，我們絕對不能限於高舉旗幟凱歌行進的方式，如像我們過去反對卡列金匪徒時那樣。誰要企圖將這種鬥爭方式拿來解決革命進程上的組織任務，那他就必然會遭受完全破產，而不成其為政治家，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不成其為社會主義革命底活動家了。

當革命前面具體出現了落在革命肩上的第二個極大困難，即國際問題時，我們有些迷戀於革命最初期間那種凱歌行進情形的青年同志，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如果說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股，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我們毫未費力就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工人監督制的法令，——如果說我們很容易就獲得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為當時僥倖湊成的條件，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擁有全部資本勢力，擁有組織得極其完備而成為國際資本之真正實力和真正堡壘的軍事技術，——它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底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來說，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的，——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務聯繫，是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

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實現由狹隘的、一國範圍的我國革命進到世界革命的這個過渡。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一任務，真是困難到了極點。我重複說一遍，很多自稱為左派的青年朋友們却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在十月革命後偉大勝利的幾星期和幾個月當中，我們之所以能如此容易一勝再勝的原因安在。其實這祇是因為當時的特殊國際情形，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當時無暇來對付我們。而我們當時覺得，我們也無暇去對付帝國主義。而單個個的帝國主義者當時之所以無暇來對付我們，祇是因為現代世界帝國主義全部極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在那時已被內鬨分裂成了兩個集團。捲入這個鬥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已走到極端，走到殊死戰，以致無論哪一集團，都不能集中幾許嚴重力量來反對俄國革命。在十月間，我們恰巧碰着這樣的時機：我國革命，恰巧碰着了良機——說來好像奇怪，實則是很正當的，——那時絕大多數的帝國主義國家，都遭受着空前的災禍，有幾百萬人的性命被殲滅了，那時戰爭所造成的空前災難正使民衆困苦不堪，那時在大戰第四年度中，交戰各國都陷於絕境，都處在進退維谷的歧路上，那時客觀上已提出一個問題：陷於此種境地的各國人民，能否繼續戰爭下去呢？祇是由於我國革命碰着了這樣的良機，那時兩個巨大的強盜集團中，無論哪一個都不能立即撲滅對方，也不能聯合起來反對我們，——我國革命祇是由於能夠利用而且利用了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中的這種時機，才能在歐俄完成自己燦爛的凱歌行進，且蔓延於芬蘭，並開始氾濫到高加索和羅馬尼亞去。只有這一點，才能說明為什麼在我黨先進份子中間，出現了一種超人的智識份子，黨工作者，他們迷於這種凱歌行進的情形，而倡言說：國際帝國主義，我們會對付得了的；那裏也會是凱歌行進的，那裏並沒有真正的困難。俄國革命客觀情勢底特點也就在這裏，它祇是暫時利用了國際帝國主義底難關，因為要開來反對我們

的那架機器，正像火車壓碎路軌上搖車一樣開來反對我們的那架機器，暫時發生了停滯，——而這架機器之所以停滯，是因為兩個強盜集團衝突起來了。當時革命運動到處都在增長着，可是在一切毫無例外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革命運動大半都還處在開始的階段上。其發展速度，完全不像在我國這樣。每一個細心思索過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底經濟前提的人，都不會不明白：要開始革命，在歐洲是難得多，而在我國却容易得多，可是要繼續革命，在我國却比在歐洲要困難些。這種客觀情勢，也就使我們要遇着歷史上非常困難而陡峭的轉折關頭。我們由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間在國內戰綫上反對本國反革命派和蘇維埃政權之敵的凱歌行進，轉到與真正敵對我們的真正國際帝國主義接觸。我們當時要由凱歌行進的時期，轉到情形非常困難艱苦的時期，而這種情形當然不是用空話和漂亮口號所能搪塞得了的，——雖然這樣做法是很痛快的，——因為在我們這個殘破國家內的民衆已疲憊至極，他們已達到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戰下去的境地，三年的苦戰使他們元氣喪盡，陷於完全無戰鬥力的狀況。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已有一些並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兵士羣衆代表，當着全體資產階級面前大胆地說出這樣的實話：俄國軍隊是不會去打仗的。軍隊底這種狀況，造成了巨大的危機。一個按居民成份說來是小農的國家，被戰爭破壞得已呈空前危急的狀態，已陷於非常嚴重的境地：我們既沒有軍隊，却不能不繼續同強盜比鄰相處，這個全副武裝的強盜直到現在始終還是強盜，而要用一種主張不兼併不賠款和平的鼓吹去感動他，當然是不行的。這就好像一隻馴良家畜同猛虎臥在一塊，却去勸導猛虎，以求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一樣。其實這種和平是祇有用襲擊猛虎的方法才能達到。而我們黨底一些上層份子——智識份子和一部份工人組織，則企圖首先用空話和遁辭來搪塞這種前途，他們說：這是不會有的事。這種和平是太不近情理的前途；我們至今都是高舉義旗，直接作戰，振臂

一呼，即可摧毀一切敵人，現在却要我們讓步，接受恥辱的條件，——這絕對不行！我們是過於自傲的革命家，我們首先就申明說：『德國人決不能進攻的』。

這就是這些人所引以自慰的第一個遁詞。歷史現在已使我們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我們要用空前困難的組織工作來渡過許多沉痛的失敗。若從全世界歷史範圍內看來，那就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國革命始終是孤立的革命，如果在其他各國不發生革命運動，則我國革命底最終勝利便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已將全部事業拿到唯一布爾什維克黨手裏，我們之所以負起這個事業，是因為我們深信各國革命正在成熟着，不管我們會經受怎樣的困難，不管我們會遭到怎樣的失敗，但歸根到底，——而不是立刻，——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總會來到的，因為它正在走來；它定會完全成熟的，因為它正在成熟着，而且快要成熟了。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這一切困難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全歐革命。我們從這個真理出發，從這個完全抽象的真理出發，並以這個真理為指南時，我們應該留心，不要使這個真理以後變成空談，因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你不加以任何分析就來應用它的時候，都會變成空談的。如果你們說，每一個罷工中都含有革命怪物，誰要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對的。的確，每個罷工中，都含有社會主義革命底因素。可是如果你們說，每一個現有的罷工都是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步驟，——那你們講的就是空洞至極的廢話。我們聽見這種說法已是千番百次了，大家聽得討厭，以致工人們都將這一切無政府主義者的空話拋開不理了，因為毫無疑義，每個罷工是都含有社會主義革命怪物，但同樣明顯的：若說每個罷工都能轉為革命，這便是廢話。我國革命底一切困難，祇有在現時到處都在成熟着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成熟的時候才能免除，——這種說法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但是要像以下這樣設想的人便是荒謬絕倫的了，這些人認為我

們應該隱藏我國革命現有的一切具體困難，而說『我專指望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我可以作任何蠢事』。『李卜克內西定會拯救我們，因為他橫豎是要勝利的』。他將作出這樣完美的組織，把一切事都預計妥當，好使我們坐享現成的形式，正如我們坐享了西歐現成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一樣，——正是由於這樣，所以這個學說在我國，也許祇在幾月內就獲得了勝利，而它在西歐的勝利，却花費了好幾十年工夫。總之，如果把那用凱歌行進來解決鬥爭問題的舊方式移用於新的歷史時期，就是毫無意味的冒險政策；這個歷史時期已經到來，其中我們所遇到的，並不是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一類的朽木，而是國際的強盜，即德帝國主義，至於德國革命，只是在成熟着，但顯然還沒有完全成熟。斷言敵人不敢向革命進攻，便是這樣的冒險政策。布列斯特談判，還不是我們應該接受任何和平條件的時機。當時客觀的力量對比表明，我們祇得到暫息時間還是不夠的。布列斯特談判顯然表明了：德國人定會進攻，德國社會內革命底醞釀，還沒有達到立刻爆發的程度；絕不能歸咎於德帝國主義者，說他們的行動還沒有促成這個爆發，或是說，還沒有造成使德國人不能進攻的那種情況，我們那些自稱為左派的青年朋友們就是這樣說的。當人們告訴他們說，我們沒有軍隊，我們不得已才遣散了軍隊——雖然我們絕對沒有忘記在我們的馴良家畜旁邊臥着一隻猛虎，——而他們却不願意了解這點。雖然我們不得已才遣散了軍隊，但這絕對不是說我們忘記了：祇有單方面發出放下武器的命令，是不能結束戰爭的。

一般說來，為什麼我們黨內任何一個思潮，任何一個派別，任何一個組織，都沒有反對過遣散軍隊呢？難道我們完全發了瘋嗎？絕對不是。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並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軍官們就已說過：軍隊再不能作戰了，要使它在戰綫上再留下幾個星期都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以後，這種情形已更加明顯，凡是願意觀察事實，

願意看清不堪入目的慘狀，並不逃避實情或故意蒙着眼睛而用驕矜的空話來敷衍了事的人，都已一日瞭然。沒有軍隊，無法維繫軍隊。比較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遣散軍隊。這是我國機體上一個備受空前痛苦，備受戰災折磨的病痛部分；它在加入戰爭時，技術上原來就沒有準備，而在退出戰爭時，它的狀況又是如此惡劣，以致一遇到敵人進攻，就會狼狽失措的。這並不能歸罪於那些飽嘗空前痛苦的人們。我們在幾百次的決議案中，甚至在俄國革命初期的時候，就已完全公開地說過：「我們已沉淪在血海之中，我們再不能作戰了」。本來也可以用人工方法來遷延戰爭的結束，本來也可以幹幹克倫斯基那樣的欺騙勾當，本來也可以把這結束遷延幾個星期，可是客觀事實依然遵循着自己的道路。俄羅斯國家機體上的這個病痛部分再也經受不了這個戰爭的重担了。我們愈快地把它遣散，使這個病痛部分愈快地從那受病還不如如此深重的其他部分中消散掉，則我國便能更迅速地準備起來，應付新的嚴重的考驗。當我們沒有遇到絲毫反對而一致通過遣散軍隊的決議，通過這個從國外事變上看來好像是荒誕的決議時，也就是因為我們感覺到了這點。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我們講過：企圖維繫軍隊，是一個輕浮的幻想。軍隊遣散得愈快，則整個社會機體也就會愈快地開始恢復康健。所以說什麼「德國人不能進攻」的這種革命空話，是多麼深刻的錯誤，是多麼很可痛惜的過分估計事變，而從這個空話中又產生了另一種空談：「我們可以宣佈戰爭已經停止了。既不戰爭，也不媾和」。可是，如果德國人進攻，又怎樣呢？「那決不會，德國人是不能進攻的」。你們有權拿去孤注一擲的，並不是世界革命底命運，而是一個具體的問題：如果德國人進攻的時期一旦到來，那你們豈不是成了德帝國主義底幫手嗎？可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都成了護國派，都承認保護祖國，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同帝國主義者決裂了；我們廢除了祕約，戰勝了本國資產階級，

並提議了公開的誠實的和平，所以各國人民都能在事實上知道我們的一切意圖。試問認真主張保護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怎樣能夠採取這個已經產生了惡果的冒險政策呢？而這惡果却是事實，因為我們的黨由於黨內有左傾反對派形成而遇到的這個嚴重危機，乃是俄國革命所遭遇的最大危機之一。

這個危機定會消除的。我們的黨以及我國革命，無論如何都不會因這個危機而陷於滅亡，——雖然這個情形在現時是已非常接近，已非常可能的。担保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會陷於滅亡的，有下面的一個事實：事變已給人們提供了學習的新方法，來代替那解決黨內派別間意見分歧的舊方法，這種舊方法便是無數的著作和討論，以及數量足夠的分裂。而這個新方法，却是用全世界歷史事實，事變和教訓來審查一切。你們說：德國人不能進攻。根據你們的策略就得出了可以宣佈戰爭已經停止的結論。而歷史却懲戒過你們，歷史推翻了這個幻想。不錯，德國革命正在發展，可是它發展得並非如我們所願望的那樣，並非如俄國智識份子們所快意的那樣迅速，並不是像俄國歷史在十月時所造成的那種速度，——在十月時，我們無論走到哪個城市裏去宣佈蘇維埃政權，幾天之內，十分之九的工人便都站到我們方面來了。德國革命不幸還沒有這種速度。可是誰應該顧及誰：是我們應顧及德國革命，還是德國革命應顧及我們呢？你們曾希望德國革命顧及你們，可是歷史却懲戒過你們。這是教訓，因為真理是絕對的，沒有德國革命，我們便會滅亡，——我們底滅亡，也許不在彼得城，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參崴，而在我們將來也許會要遷往的更遠的地方，我們遷往的地方，也許比彼得格拉到莫斯科的距離還要遠些，可是，無論如何，在一切可能想像到的事變之下，如果德國革命不發生，我們定會滅亡的。但是這種說法，絲毫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念：我們應善於毫不裝威作勢地渡過最困難的關頭。

革命之到來，並不會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歷史已證明了這一點，應該善於把這一點看作事實，要善於估計到：各先進國家中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決不能像俄國革命那樣容易開始，俄國當時是尼古拉和拉斯普庭⁵²統治的國家，在這裏，最大部分的人民完全不關心住在各邊疆的是哪些民族，那裏發生着什麼事變。在這樣的國家內，革命是容易開始的，——這不過是一舉手之勞而已。

而在資本主義已很發展，每個居民都獲有民主素養和組織性的國家裏，若沒有準備就去開始革命，便是不正確的，便是荒謬的。這裏我們還祇接近到各國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底痛苦時期。這是事實。我們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也許社會主義革命在幾星期後，甚或幾天之後，就會勝利，——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我們終不能拿這來作孤注一擲。我們應該準備應付非常大的困難，應付那些非常嚴重而不可避免的失敗，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歐洲革命那怕明天就可以開始，可是畢竟還沒有開始；而在歐洲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那末我們的疑慮，當然也就不會苦惱我們，那時的問題，將不是什麼革命戰爭，而會是全盤的凱歌行進。這樣的情形定會到來，且必然會到來，但是現在還沒有到來。這是歷史教訓了我們，並用來沉痛地打擊了我們的一個簡單事實，——而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所以我認為，當歷史因為我們希望德國人不能進攻，於是以高呼『烏啦』了事，而沉痛地打擊了我們之後，這個教訓，會因我們有蘇維埃組織而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全蘇俄羣衆底意識中去。羣衆已活動起來，已在集合着，已在準備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攷慮已發生的事變。我們現在所進行的，並不是像革命前始終不出乎黨內狹隘範圍以外的舊式爭論，現在一切決議案都要提交羣衆去討論，羣衆是要用經驗和事實來檢查這些決議的，他們從來也不為輕浮演說所迷誤，從來也不肯被人誘惑而離開事變客觀進程所指定的道路。某個智識份子或左派布爾什維克，當然能

夠託詞推開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當然能夠託詞推開我們沒有軍隊的事實，推開德國革命尚未發生的事實。羣衆底人數是千百萬的，——而政策正是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不是幾千人所在的地方，而是千百萬人所在的地方，才能開始嚴重的政策，——千百萬羣衆見過從前線上回來的兵士，他們知道軍隊成了什麼樣子。羣衆知道——如果不拿單個人，而拿真正的羣衆來說——我們不能作戰，知道前線上每一個人人都備嘗過凡是可以想像到的痛苦。羣衆懂得了這個真理：你既沒有軍隊而又與強盜爲隣，這時你就不能不簽訂極苛刻極恥辱的和約。在革命尚未產生以前，在你們還沒有整頓好自己的軍隊以前，在軍隊還沒有遣散回家以前，這是必不可免的事。際此以前，病體是不會恢復康健的。我們靠高喊『烏啦』，是不能打敗德國強盜的，我們不能像打倒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一樣來打倒德國強盜。這就是羣衆所明確領會了的教訓，他們並不聽那些想撇開痛苦實況的人所企圖用以款待他們的各種遁詞。

俄國革命起初在十月、十一月的時候是全盤的凱歌行進，此後，它忽然在幾星期內爲德國強盜所擊破，而決意接受掠奪性的媾和條件。不錯，歷史底這種轉折是非常難受的，對於我們，所有這樣的轉折都是難受已極。一九〇七年，當我們同斯托雷平訂立空前恥辱的內部條約時，當我們不得已要經過斯托雷平杜馬這種豬欄走去時，當我們承擔某些義務署名於君主制度的文件上⁵³時，我們也經受過了同樣的痛苦，不過這痛苦的規模比現在的要小些罷了。當時有些屬於革命優秀先鋒隊的人們說（他們也是絕對確信自己正確有理的）：「我們是高傲的革命家，我們相信俄國革命，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去參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機關」。你們會參加的。羣衆的生活，歷史，比你們的信念更強有力些。你們不參加嗎，那末歷史就會強迫你們去參加的。這班人是非常左的，可是當歷史初一轉折的時候，他們這個政派就如一陣煙似的消散了。如果過去我們能夠依然不失爲革

命家，在痛苦的條件之下工作，並重新走出這種苦境，那末現在也會能走出這種境況的，因為這並不是我們異想天開，這是客觀的必然性，而在我們這個破壞不堪的國家內，其所以造成了這種必然性的原因，是由於歐洲革命竟敢違反我們的願望而遲滯未到，而德帝國主義竟敢違反我們的願望而實行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善於退守。空洞詞句終不能掩住極端苦惱悲痛的現實，應該說：讓我們一半有秩序地退却吧。我們要做到完全有秩序地退却是不可能的，——就讓我們一半有秩序地退却也好，以便贏得一個短短的時間，來使我們軀體中的病痛部分可以稍得消散一些。軀體整個說來是健康的：它能克服病痛。可是不可要求它在一瞬間立刻就把病痛完全克服掉，要想制止潰逃的軍隊是辦不到的。我曾向一個願意做左派的青年朋友說過：同志！請你到前綫上去看一看，看看那裏軍隊中的情形怎樣。可是他却把這當做是個惡意的提議，以為『他們想拿我們去充軍，免得我們在這裏宣傳進行革命戰爭底偉大原則』。我之所以這樣提議，確實不是打算把派別敵人拿去充軍：這不過是向他們提議，去看一看軍隊已在大開小差的情形。我們早已知道這種情形，我們早已不能不見那裏的解體現象已經造成駭人聽聞的事實，弄得把我們的大砲因換得幾文錢就賣給德國人。我們知道了這種事實，同樣我們也就知道：軍隊是無法維繫的，說德國人不會進攻的這種遁詞，是個莫大的冒險政策。如果歐洲革命遲延發生，我們就會遇到極嚴重的慘敗，因為我們沒有軍隊，因為我們沒有組織，因為這兩個任務都不能立刻解決。如果你不會適應環境，不願意在污泥中爬行，那你就不是革命家，而祇是空談家；我之所以提議爬行，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這樣做，而是因為除此之外則無路可走，而是因為歷史並沒有安排得這樣愜意，致使各處革命都能同時成熟起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國內戰爭之開始是實行與帝國主義衝突的

一個企圖，這個企圖證明帝國主義已完全腐朽，證明每個軍隊以內都有無產階級份子發動起來。是的，我們會看見世界革命的，可是暫時這還不過是一種非常好聽的童話，非常美妙的童話，——我完全懂得，兒童底本性是愛聽美妙童話的。可是我要問一問：真正的革命家底本性，是不是在於相信童話呢？任何童話中都有它的現實成份：如果你給兒童們講童話時，其中雞兒貓兒若不是說的人話，那兒童們便不會對它發生興趣。現在也是一樣，如果你們對民衆說，德國國內戰爭定將到來，你們就担保說，不會有與帝國主義的衝突，祇會有戰地上的國際革命，那末，民衆會說你們欺騙他們。你們祇是在自己的見解中，在自己的願望中，藉此去跳過歷史造成的那些困難。如果德國無產階級能發動起來，這是很好的。可是你們是否測量過，你們是否已經找得一種儀器來測定，德國革命會在哪一天發生呢？不，這點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把一切都拿去作孤注一擲。如果革命發生了，則一切都會得救。這是當然的！但如果革命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發動起來，如果革命那天還不會勝利，——那時又怎樣呢？那時羣衆會向你們說：你們的行動和冒險主義者一樣，——你們把孤注下在事變底這個幸運進程上，而這個進程竟沒有到來，結果你們就成了完全不能適應於沒有世界革命的那種狀況的人，世界革命必然會到來的，可是目前它還沒有完全成熟。

我們已進到被全副武裝的帝國主義給了我國以最嚴重失敗的一個時期，我國已經遣散了自己的軍隊，並且是不得已才遣散的。我從前的預言已完全證實了：我們所得到的，已不是布列斯特和約，而是更加恥辱的和約，這是那些拒絕了前次和約的人應負其咎的。我們知道，我們是因為軍隊解體才同帝國主義媾和。當時我們是同郭福曼⁶⁴談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內西談判；——我們也就以此幫助了德國革命。現在你們却幫助德帝國主義，因為你們把自己數百萬

的財富，——大炮和炮彈——讓給了它，而這種情形是每一個看到了軍隊中那種不堪設想的狀況的人，都會應預先料到的。如果德國人稍一進攻，我們就會必然而不可倖免地一敗塗地，——前線上每一個誠實的人都這樣說過。那時在幾天以內，我們就會成為敵人手上的鹵獲品。

既得到了這個教訓以後，我們定能消除我們的分裂，我們的危機，不管這個病症是如何沉重，因為一個更可靠得多的同盟者——全世界革命——會來援助我們的。當人們說我們批准的這個條約是空前屈辱的提里齊特式條約，是比布列斯特條約更其恥辱的掠奪條約時，我就回答道：當然是的。我們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是站在羣衆底觀點上觀察問題。企圖把十月到十一月間在一個國家內部運用過的策略，企圖把這一革命凱歌行進時期運用過的策略，就根據自己的幻想而搬到世界革命事變進程上去，——這種企圖是會必遭失敗的。當人們說獲得暫息乃是幻想的時候，當名為共產主義者的報紙——這名稱想必是從「公社」這個字來的——連篇滿幅地企圖推翻暫息論的時候，我就說道：我既已經歷過許多派別組織的衝突和分裂，我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實際經驗，所以我應該說：我看得很清楚，這個病症是不會由舊方法——黨內派別的分裂方法——來醫治好的，因為實際生活是會先把它醫治好的。實際生活進展得非常迅速。在這一點上，它的作用是妙不可言的。歷史將生活底火車頭推進得如此迅速，以致在共產主義者報編輯部還未來得及出版最近一期以前，彼得城的大多數工人，就會開始對該報底主張表示失望，因為實際生活證明，暫息已是事實。你看，現在我們簽訂和約，我們就得着一個暫息時機，我們利用這個暫息機會來更好地保衛祖國，——因為如果我們進行戰爭，我們就會遇到軍隊狼狽逃竄的情形，這種軍隊是必須加以遏止的，可是我們的同志，無論過去和現在都無法遏止它，因為戰爭比較宣傳，比較成千成萬的議論，是更強有

力的東西。既然他們沒有瞭解客觀的情況，他們無法遏止軍隊的逃竄，他們當然不會把它遏止住的。這個病態的軍隊，傳染到全部軀體，於是我們就受到了新的空前失敗，受到了德帝國主義給予革命的新打擊，——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我們輕浮地弄到使自己處在帝國主義打擊之下而沒有機關槍。可是我們現在却能利用這個暫息機會來說服民衆，教他們聯合起來，進行撕殺，同時又告訴俄國工農說：『要造成自我紀律，嚴格的紀律，否則你們將來也會遭受德帝國主義鈇蹄底蹂躪，如像現在所遭受的蹂躪一樣，在民衆還沒有學會鬥爭，還沒有造成能夠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軍隊以前，你們必然會遭受這種蹂躪的』。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為德國革命還沒有發生，並且不能保證說，它明天就會發生。

因此，共產主義者報上用連篇累牘的論文想來根本推翻的暫息論，乃是由實際生活本身提出的。大家都看見，暫息已是事實，大家都在利用暫息的機會。我們曾預料我們會在幾天之內失去彼得格拉，因為在當時向我們進攻的德國軍隊離彼得格拉不過幾天行程的距離，而優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不管其熱忱如何巨大，終究是孤立無援，當時發生了空前的混亂和狼狽狀態，使軍隊一直潰退到了加琴納，而當時我們竟有過佔回並未失去的土地的事實，而且這一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個電報生跑到火車站，坐在發報機旁邊發出電報說：『這裏一個德軍也沒有。火車站已由我們佔領』。經過幾點鐘以後，交通部給我打電話說：『下一火車站已由我們佔領，我們快達到雅姆堡格地方。一個德軍都沒有。電報生照常工作』。這就是我們當時所經歷過的情形。這就是十一天戰爭底實際歷史。這乃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們告訴我們的實況，應請這些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廠工人來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讓他們講出真情。這是極辛酸，極恥辱和極苦痛的真情。但它的益處要大過百倍，俄國民衆是會懂得這種真情的。

我讓人們去迷戀戰地上的國際革命，是因為它定會到來的。時候一到，一切都會到來的，可是現時却應從事整飭自我紀律，無論如何都應該服從節制，以造成優良的秩序，使工人們學習戰鬥，——那怕一天只學習一小時也好。這件事情要比描繪美妙的童話困難一些。這是現時已在進行的，你們就以此幫助着德國革命，幫助着國際革命。暫息究竟能夠延長多少時日，——我們不得而知，可是我們已經得到了暫息。應該趕快遣散軍隊，因為這是一個有病的器官，而現時我們就來幫助芬蘭革命。

當然，我們是違背着條約，我們違背條約已經三四十次了。祇有小孩子才會不懂得：我們是處在長期痛苦的解放鬥爭時期，——這個解放鬥爭剛才創立了蘇維埃政權，還只把它提昇到其本身發展底初步階段，——在這種時代，一定要進行長期慎重的鬥爭。恥辱的和約激起反抗運動，可是，共產主義者報方面的同志，在議論戰爭問題的時候，却訴之於人們底情感，而忘掉人們當時是握緊拳頭而痛心忍辱。這些同志怎樣講呢？他們說：『有覺悟的革命家，無論如何都不會忍受這種恥辱，都不會接受這種恥辱的』。他們的報紙名叫『共產主義者』，實則應該命名為『貴族』，因為它正是以貴族底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個貴族擺出美妙姿勢仗劍而死的時候，說道：『媾和是恥辱，戰爭是光榮』。他們用貴族底觀點來談論問題，我却以農民底觀點來談論問題。

如果當軍隊潰竄，而且是不能不潰竄，否則就會損失成千成萬生命的時候，那末，我接受此項和約，是免得把事體弄得更糟。難道締結和約是恥辱嗎？每一個認真處事的農民和工人，都會為我辯護，因為他們懂得：媾和是積聚力量的手段。歷史上有過——這點我已經講過多次，——德國人在締結提里齊特和約以後，擺脫了拿破崙底桎梏而獲得解放的事實；我故意把我們的和約稱為提里齊特和約，雖然我們並沒有簽訂提里齊特和約上所有的那種條件，即必

須派遣我國軍隊去幫助勝利者征服其他民族的義務；可是，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專於指望戰地上的國際革命，那我們就會陷於這種境地。你們留心吧，不要讓歷史把你們也推落到這樣的軍事奴隸地位啊。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各國獲得勝利時，蘇維埃共和國有淪於奴隸境地的可能。拿破崙在提里齊特強迫德國人接受了空前恥辱的媾和條件。那裏的情形，弄到簽訂過幾次和約。當時的郭祿曼——拿破崙——曾藉口德國人違背和約來捉住他們，現在的郭祿曼也會這樣來捉捕我們的。不過我們定要努力設法使他不致於迅速捉住我們。

最近一次戰爭給了俄國人民一個辛酸、苦痛而又嚴重的教訓：教他們組織起來，紀律化，服從節制而造成一種模範的紀律。我們要向德國人學習紀律，否則我們就會是不可救藥的人民，而將永遠處於奴隸地位。

歷史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演進的。歷史提示我們：和平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一種暫息方式，戰爭是獲得某種較好或較壞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談判時的力量對比，使我們要締結戰敗國底和約，但還不是屈辱的和約。在普斯可夫時的力量對比，已使我們要締結恥辱的和約，要締結較屈辱的和約，而在往後的階段上，要是在彼得城和莫斯科的話，那我們就會不得不簽訂更屈辱數倍的和約。我們不會說蘇維埃政權祇是形式，——如莫斯科的青年朋友們向我們說過的一樣；——我們不會說，爲挽救某種革命原則起見，可以犧牲內容；我們要說：讓俄國人民懂得，應當紀律化，應當組織起來，那時他們才能夠渡過一切提里齊特和約的苦痛。解放戰爭底全部歷史告訴我們：當這種戰爭有廣大羣衆參加時，解放本身總是來得迅速的。我們說：如果歷史是這樣演進着，那我們就會要拋開和平，再來作戰，而且這也許是在近幾天以內的事。每個人都應該準備起來。在我看來，德國人毫無疑義是正在納

爾瓦城那邊準備一切——如果各報所載屬實，納爾瓦城還未被佔領的話；他們不是在納爾瓦城裏，而是在納爾瓦城附近，不是在普斯可夫城裏，而是在普斯可夫城附近，集中自己的正規軍，整理自己的鐵路，以便隨後一躍就奪下彼得格拉。這個野獸是很會跳躍的。它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它將再跳一次。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們應該準備起來，要善於不裝威作勢，而取得暫息時間，那怕祇是暫息一天也好，因為甚至這一天我們都可以利用來從彼得城撤退，如果彼得城竟被佔領，則我們的幾十萬無產者就會受到空前的苦痛。我再一次申明，我決意簽訂和約，我認定爲了取得幾天工夫來撤退彼得城，就是簽訂更加恥辱幾十倍以至於一百倍的條約都是應該的，因為這樣我就能夠減輕工人們底苦痛，否則這些工人就會淪於德國人底鐵蹄之下；我可以使我們所需要的那些材料和火藥等等易於從彼得城運出，因為我是護國派，因為我主張準備軍隊，那怕就是在極遼遠的後方去準備軍隊，而那裏此刻却正在整頓現已遣散的病態軍隊。

我們不知道，這個暫息將是多久的暫息，——我們要試圖來抓住時機。這個暫息時間也許比較長，也許祇有幾天。一切變化都是可能的，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事，其所以不得而知，是因爲一切最強大的國家都被束縛着，被纏繞着，被強迫着在幾個戰場上作戰。郭福曼底行動決定於幾方面：一方面是要撲滅蘇維埃共和國，另一方面是他正在幾個戰場上作戰，第三方面，是德國革命在成熟着和發展着，郭福曼也知道這點，所以他不能立即奪取彼得城，奪取莫斯科，正像人們所斷言的那樣。可是他明天就會這樣幹，——這是完全可能的。我要重說一遍：當軍隊解體已是眼前事實的時候，當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利用每一時機，那怕祇取得一天暫息的時機，在這種關頭，我們認爲：每一個與羣衆有聯繫，知道戰爭是什麼和羣衆是什麼的莊重的革命家，都應該使羣衆紀律化，都應該整頓羣衆，努力鼓起羣衆來進行新的戰爭，——每一個這樣的革命家都會

替我們辯護，認為訂立任何恥辱條約都是正確的，因為這乃是爲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利益，是爲了革新俄國並解除俄國底病痛部分。每個思想健全的人都會懂得，我們簽訂這個和約，並不停止我們的工人革命；誰都懂得，我們同德國人簽訂和約，我們並不停止對革命的軍事援助：我們給芬蘭人送去的是軍械，而不是失去戰鬥力的部隊。

也許我們會出而應戰；也許明天我們會退出莫斯科，然後轉取攻勢：如果我們在民衆心理中造成一個轉變，——這個轉變已在成熟，也許爲了這點，需要很多時間，可是它定會到來的，——那時廣大羣衆所講的就會不是他們現時所講的這種話了，——那時我們便將調遣我們的軍隊向敵軍進攻。我之所以不能不接受甚至最苛刻的和約，是因爲現時我不能自信這種時機已經到來。當氣象更新的時刻到來時，大家都會感覺到這一點，都會知道，俄國人不是傻子；他們看到，他們懂得：應該慎重從事，這個口號應該實行，而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底主要任務，也就在這裏。

應該善於在新的道路上工作，這是困難得無可計量的事情，但這決不是沒有希望的事情。這件事情決不會破壞蘇維埃政權，只要我們自己不用最蠢笨的冒險政策來破壞它。時機一到，民衆就會說：我再不能讓人苦惱我了。而這樣的時機定會到來的，只要我們不採取這種冒險政策，而善於在困苦的條件下，在我們日前簽訂了的那個空前恥辱條件下進行工作，因爲這樣的歷史危機，決不是一次戰爭，一個和約所能解決的。德國人民經過幾次恥辱和約——其中每一次恥辱條約都不過是重新受辱和重新毀約的暫息——以後，而於一八〇七年簽訂提里齊特和約時，是由於受了本國帝制組織的束縛；而我國羣衆底蘇維埃組織，却能使我們的任務易於完成。

我們的口號應該只有一個：切實學習軍事，整頓鐵路上的秩序。沒有鐵路而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便是最有害的叛賣行

爲。應該建立秩序，應該造成那種能創造革命最好果實的全部毅力和實力。

要極力抓住你們所已獲得的暫息時機，那怕是一小時的暫息時機也好，以便同遼遠的後方建立聯繫，在那裏去建立新軍隊。要拋掉幻想，你們因懷有這種幻想，已受到了實際生活的懲治，你們若不把這幻想從掉，還會受到更嚴重懲治的。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個極慘痛失敗的時代，這個時代已擺在眼前，要善於顧到這個時代，應該有決心去在祕密條件下，在顯然被德國人奴役的條件下，作堅忍的工作：這是用不着掩飾的；這真是提里齊特和約。如果我們能夠這樣行動，那末，雖然遭了失敗，我們還能絕對有把握地說：我們是定會勝利的。

一九二三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
(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一八年
三月六日至八日)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一三至三三〇頁。

現時主要任務

俄國媽媽呵！

你又豐富，你又單薄，

你又強大，你又軟弱。

人類歷史現時正經歷着一個最大而最困難的轉變，這個轉變，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具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義。這個轉變是由戰爭進到和平；是由兩夥強盜間爲規定瓜分頭號強盜所已掠奪之贓物的新程序，而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趕到屠殺場上去的戰爭，轉到被壓迫者爲擺脫資本桎梏而反抗壓迫者的戰爭；是由痛苦、災難、飢荒、野蠻化的黑暗地獄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走向共同福利與堅固和平的光明未來；——無怪乎在這急劇轉變的陡峭關頭，舊制度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來，同時新社會又在難以筆墨形容的痛苦中產生着的時候，有的人頭暈目眩，有的人陷於絕望，有的人則想用美妙動聽詞句來尋找出路，以求逃出那往往是令人過份苦惱的現實。

俄國曾特別明顯地閱歷過，特別緊張而痛苦地經歷過由帝國主義轉向共產主義革命這歷史進程上的一些最急劇的轉變。我們在幾天內就破壞了一個最老大，最雄強，最野蠻和最殘暴的君主制度。我們在幾個月中就經過了同資產階級妥協和消泯小資產階級幻想的許多階段，而別的国家走過這些階段却花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我們在幾個星期內就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在國內戰爭中戰勝了資產階級

的公開反抗。我們以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行進在這個龐大國家中各處各地獲得了勝利。我們喚起了那些受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壓迫的最下層勞動羣衆，把他們引向了自由與獨立的生活。我們創立並鞏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是比最完善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更高越得多，更民主得多的新式國家。我們建立了爲貧苦農民所擁護的無產階級專政，並已開始實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我們在全世界千百萬工人中喚起了他們的自信力，燃起了他們的熱情火焰。我們到處發出了國際工人革命的號召。我們向世界各帝國主義強盜們宣戰了。

而在幾天內，那個乘我們手無寸鐵的機會來實行襲擊的帝國主義強盜，竟把我們打得跌倒下去了。它強迫我們簽訂了極苛刻極恥辱的和約，這是因爲我們擅敢從帝國主義戰爭的鉄鉗中掙脫出來——那怕只在一個極短時間內掙脫出來——所付出的代價。這個強盜憤怒若狂，就極力打擊俄國，窒息俄國，把俄國撕成碎塊，而當他本國工人革命的怪影愈加可怕地顯現出來的時候，則他的憤怒也就愈加厲害。

我們不得已才簽訂了『提里齊特』和約。不要自欺，而要有勇氣來正視着赤裸裸的沈痛真象。要全盤地，澈底地認清我們現在所陷入的慘重失敗、分割、奴役、恥辱底深淵。我們對於這種情形愈是明瞭，則我們爭取解放的意志，我們從奴役境地重新達到獨立地位的意向，以及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使俄羅斯從貧弱國變成真正富強國的堅決意志，就會愈加堅牢，愈加鍛鍊得像鋼鉄一般。

俄羅斯能夠成爲這樣的國家，因爲我們還剩下有廣大的國土和天然財富，足可供給所有一切人底生活資料，若不是很豐富的話，至少是有足夠的數量。我們在天然財富方面，在人力後備方面，在偉大革命發揚起來的大規模的民衆創造力方面——都有足夠的材料來建立真正富強的俄羅斯。

俄羅斯定將成爲這樣的國家，只要它能拋掉一切頹喪情緒和空談，只要它能咬緊牙關，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只要它能緊張起每根神經，每條筋絡，只要它能明白只有走我們已經走上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才能得救。按照這條道路邁進，絕不因失敗而氣餒，要一磚一石地去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底強固基礎，爲樹立紀律與自我紀律，爲在到處鞏固組織性，鞏固秩序和務實精神，鞏固全民力量底整齊合作，鞏固對產品之生產和分配的全盤統計與監督制，而毫不鬆懈地工作，——這就是達到造成軍事實力與社會主義實力的道路。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受了嚴重失敗之後，既不應裝威作勢，也不應悲觀失望。若以爲我們只有二中取一：或者是締結極苛刻的和約而「不光榮地」（從貴族觀點看來）死掉，或者是進行絕望戰鬥而「英勇地」死掉，此外別無出路，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認爲我們簽訂「提里齊特」和約，似乎就是叛變了自己的理想或叛變了自己的朋友，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我們沒有叛變過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我們沒有辯護和掩飾過任何一句假話，我們對於任何患難朋友和同志都沒有拒絕過幫助，都是竭其所能，儘其所有去幫助了的。若是一個統帥把被打敗了的或染上了狼狽奔逃病的殘餘部隊，撤退到國境內地，他在萬不得已時才接受極苛刻恥辱的和約，藉以掩護這種退却行動，那末他對於他所無力援助以及被敵人截斷了的那部分軍隊是絲毫也沒有背叛行爲的。這個統帥選擇了救出那尚可挽救的東西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作冒險舉動，不在人民面前掩飾痛苦的真理：「讓出空間以便贏得時間」，而利用任何暫息機會，那怕是最短期的暫息機會，以便聚集力量，以便使軍隊喘息喘息，或醫治醫治它所患的瓦解病和頹喪病，——這樣的統帥是盡了自己的天職的。

我們簽訂了「提里齊特」和約。當拿破崙第一在一八〇七年強迫普魯士簽訂提里齊特和約時，侵略者把德國人底全部軍隊都打潰

了，佔據了國都及一切大城市，設置了自己的警察，強迫失敗者派出輔助軍團去幫助侵略者進行新的掠奪戰爭，把德國分裂成許多小國，實行與這些德國人的國家聯盟而反對另一些德國人的國家。雖然如此；可是德國人民甚至在簽訂了這樣的和約之後仍能自立，仍能聚集力量，仍能奮起爭得本身自由與獨立的權利。

凡是願意思索或善於思索的人，都可從提里齊特和約（這不過是該時代中強迫德國人簽訂的許多苛刻恥辱和約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顯看出，那種以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簽訂極苛刻的和約都是陷入滅亡的深淵，而進行戰爭則是英勇行為與得救之路的，這種想法是如何幼稚可笑。各個戰爭時代都教訓我們，和約在歷史上起過不少藉以獲得暫息和聚集力量來準備新搏戰的作用。提里齊特和約對於德國曾是極大的恥辱，而同時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復興的轉變。當時歷史環境除走向資產階級國家的出路之外，沒有達到民族復興的別種出路。當時，在一百多年以前，創造歷史的是極少幾個貴族和小羣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而工農羣衆則尚在沈寐不醒的狀態中。因此，當時歷史的進展也是緩慢得可怕的。

現在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羣衆底文化。戰爭震醒了羣衆，以空前未聞的慘禍和痛苦把他們驚醒起來了。戰爭推進了歷史，於是歷史在現時就以火車頭般的速度飛快前進。現在歷史是由千百萬人獨立創造的。資本主義現在已發展到社會主義底門前了。

因此，俄國現在如果要從「提里齊特」和約走向——無可爭論地是在走向——民族興盛，走向偉大衛國戰爭的話，那末達到這一興盛的道路，就不是走向資產階級國家的道路，而是走向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已是護國派了。我們變成「保衛祖國」，不過我們準備進行的衛國戰爭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戰爭，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保衛

祖國，保衛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保衛世界社會主義軍隊底一支隊伍。

「仇恨德國人，打死德國人」——始終是通常愛國主義的口號，即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口號。我們却說：『仇恨帝國主義強盜，仇恨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同時又說：『要向德國人學習！照舊忠實於與德國工人的兄弟聯盟。他們對我們的援助來遲了。我們要贏得時間，我們會等得到他們的，他們一定會來援助我們』。

是的，要向德國人學習！歷史正沿着曲線，繞着圈子前進。事實正是這樣：德國人除了體現殘暴的帝國主義而外，同時還體現了紀律、組織和在最新機器工業基礎上的整齊合作以及極嚴格的統計與監督的原則。

而這正是我們所缺乏的。這正是我們所要學會的。這正是我們偉大革命為要由勝利的開始，經過許多嚴重考驗而走向勝利的終結所缺少的東西。這正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要停止其為貧弱國家，而永遠成為富強國家所需要的東西。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刊載於全俄中
央執委新聞報第四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
第三七五至三七八頁。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 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由於達到了和平，——雖然是極其苛刻和極不堅固的和平，——就能夠在相當期間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方面，即集中到組織任務上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⁵⁵第四段（或第四部）中，——即在論勞動者底自我紀律，以及無情地反對混亂現象和搗亂組織現象的這一段（或這一部）中，已經將這個任務向一切被壓迫勞動羣衆明顯而確定地提出來了。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已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穩固，自然不是由於這共和國現在彷彿圖謀恢復軍事行動；——除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及其應聲虫（孟什維克等等）外，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政治家會想到這種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穩固，是由於在東西兩方與俄國接壤的，擁有強大軍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主戰黨，隨時能佔得上風，這些主戰黨因看見俄國暫時衰弱而垂涎，並且是受着仇視社會主義和酷嗜搶劫的資本家們所慫恿的。

在這種情勢下，對於我們說來，和平之真實的而不是紙上的保證，只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有已達到最高限度的爭執，其表現，

一方面是西方國家間帝國主義戰爭之重新繼續進行，另一方面是日美互爭太平洋及其沿岸統治權之極端尖銳的帝國主義競爭。

很明顯的，防禦力如此薄弱的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處於非常不穩固而絕對危急的國際狀況中。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極度緊張起來；以利用全部客觀情勢所給予我們的這個暫息期間，來醫治戰爭所禍及俄國整個社會機體的極重創傷，來達到國家底經濟高漲，沒有這個條件，則國防力之多少嚴重的增高，都簡直無從說起。

同樣很明顯的：我們對於西歐那因為種種原因而遲遲尚未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究能給予何種嚴重協助，這就全看我們解決我們面前組織任務的程度如何而定。

使我們當前首要的組織任務得以順利解決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民衆底政治領導者，即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員們，其次是勞動羣衆中一切有覺悟的份子，能夠完全理解以前各資產階級革命和現在社會主義革命間在這一方面的根本區別。

在以前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羣衆底主要任務，是在於實行消滅封建制度、帝制政體和中世紀關係這種消極的或破壞的工作。而組織新社會之積極的或建設的工作，則是由佔人口少數的有產者或資產者來執行的。他們之所以能夠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執行此種任務，這不僅因為當時受資本剝削的羣衆所作的反抗，由於其自身的散漫性和不開通而表現得極其微弱，而且也因為那建築在無政府狀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是自發發展着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為其基本的組織力量。

反之，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已由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要任務，却是積極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包括千百萬人生存必需品之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這一極繁雜而

極精密的新組織系統辦理就緒。這種革命，只有當人民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羣衆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夠表現充分的自覺性，理智性，犧牲精神和堅定精神的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然後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羣衆能夠積極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事業的新式國家，即蘇維埃式的國家，但這還只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即對產品底生產與分配上實行普及全國的最嚴格的統計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 * *

現時已在俄國執掌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底發展過程，特別明顯地表明構成目前政局特點的現時歷史轉變究竟何在；這個歷史轉變，使蘇維埃政權必須抱定新的方針，即是要以新的方式來提出新的任務。

任何負有遠大使命政黨底第一個任務，原是說服大多數民衆，使他們相信這個黨底綱領和策略正確。無論在沙皇制度時代或在切爾諾夫輩和策烈鐵里輩與克倫斯基和基什慶妥協的時期中，這個任務都會佔着首要地位。現時這個任務雖顯然還遠未完成，而且無論何時都不會澈底完成的，但它大體上是已經解決了，因為在莫斯科舉行的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無可置辯地證明：俄國大多數工農顯然是站在布爾什維克黨方面的。

我們黨底第二個任務，原是奪取政權並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這個任務也還沒有澈底完成，並且不能加以漠視，因為帝制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及其應聲蟲和走卒孟什維克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仍然繼續在企圖聯合起來，以求推翻蘇維埃政權。可是，鎮壓剝削者反抗的這個任務，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大約說來）一九一八年二月間，或是到博加也夫斯基⁵⁶投降的時期內，便大體解決了。

現時提到了日程上而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有第三個迫切任務，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當然，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底第二天，就已提出並努力解決過這個任務，可是直至剝削者底反抗還採取公開的國內戰爭形式的時候，這個任務，曾不能成爲主要中心任務。

現在它已成爲這樣的任務了。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我們奪得了俄國——從富人手中奪給窮人，從剝削者手中奪給勞動者。現在我們應當管理俄國。目前時局底全部特點，全部困難，就在於要明瞭由說服民衆和用武力鎮壓剝削者的主要任務轉到管理的主要任務這一過渡底特徵。

社會主義黨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得以大體完成了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這一事業，得以緊緊接近到管理的任務。我們務須成爲確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底這個最困難（而且是最高尚的）任務的人。應該澈底想清：要有成效地實行管理，除了善於說服民衆以外，除了善於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以外，還須善於實際地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因爲這裏是要用新方式去組織千百萬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濟基礎。而且這是一個最高尚的任務，因爲只有在解決這個任務以後（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決以後），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現時的總口號

由於極端苛刻而不穩固的和約，由於戰爭和資產階級底統治（其代表爲克倫斯基和維護他的孟什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遺留給我們的極痛苦的經濟破壞、失業和飢荒，——由於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觀情勢，便必然產生出廣大勞動羣衆底極端疲憊，甚至精疲力竭的現象。他們極力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當的休息。現時擺在日程上的任務，就是要：恢復被戰爭和資產階級統治

所破壞的生產力；醫治由戰爭、軍事失敗、投機業和資產階級企圖恢復已被推翻的剝削者政權等所造成的創傷；復興國內經濟；牢固地維持起碼的秩序。蘇維埃政權現時也只有不顧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反抗，而在實踐上正是解決維持社會制度的這些初步和最初步的任務，才能使俄國穩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點，看來好像是很奇怪的，而其實因為上述種種客觀條件，成為毫無疑義的了。由於現時情勢中具體的特點，由於蘇維埃政權及其關於土地社會化與工人監督生產等等法令存在的情形下，實際解決這些最初步的任務與克服走向社會主義之初步工作中組織上的困難，這在現時乃是一物底兩面。

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懈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正是這些口號，從前被資產階級用來掩飾自己這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時，曾為革命的無產者所正當譏笑過的，而現時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却已變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號了。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們（以克倫斯基為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一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澈底勝利所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那班藐然拒絕將這些似乎是極其「陳腐」和極其「庸俗」的口號當作首要任務的人，正是不善於瞭解這層道理。我們這個小農國家僅在一年以前才推翻沙皇制度，僅在不上半年以前才肅清克倫斯基之流，當然遺留下了不少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而與每一長期反動戰爭相伴隨的殘忍行動和野蠻行為更把這種無政府主義加強了，同時還發生有不少的失望情緒和無端憤恨情緒；如果再加上資產階級走狗們（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底挑撥政策，那末，非常明顯，優秀的和最有覺悟的工農要使羣衆底情緒完全轉變，並引導他們過渡到正確的、堅韌的、有紀律的勞動，

就必須有如何長期堅強的努力。只有由貧民羣衆（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實現的這種過渡，才能完成對資產階級，尤其是對最頑強和人數衆多的農民資產階級的勝利。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於還沒有澈底摧破。因此，在日程上便提出反資產階級鬥爭底新的更高形式，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再不能產生的條件。很明顯的，這個任務是要高得不可測量，如不解決這個任務，那也就是說，還沒有社會主義。

拿西歐革命底規模來比較看，我們現時大約處在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七一年所達到了的水準。我們完全有權來以達到了的這種水準而自豪，並且在一方面，我們毫無疑義還走得更遠一些，這就是：我們在全俄境內宣告並成立了最高式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因已得的成績而自滿，因為我們僅僅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做到什麼有決定意義的事情。

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就是對產品底生產和分配上建立最嚴格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然而，在我們已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的那些企業和經濟部門中，我們還沒有實行統計和監督，若不做到這一點，便絕對談不到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同等重大的物質條件，即在全國範圍內提高勞動生產率。

因此，決不能以繼續向資本進攻這個簡單公式來決定現時的任務。資本雖顯然還沒有被我們澈底擊敗，還無條件地必須向勞動者底這個敵人繼續進攻；可是這樣來決定任務會是不精確的，不具體的，其中並沒有估計到現在時局底特點，即是為了保障往後的進攻能取得勝利起見，便應當在目前「停止」進攻。

關於這點，可以拿我們在反資本戰爭中的狀況與一個常勝軍隊底狀況作一比較來加以說明，譬如這個常勝軍隊，已奪取了敵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領土，此時它却不能不停止進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彈藥儲藏，修理並鞏固交通線，建築新的軍需庫，調集新的後備軍等等。在這種條件之下，停止進攻，正是常勝軍隊爲了奪取敵人其餘的領土，即是爲了取得完全勝利所必需的。現時客觀情勢所要求於我們的，正是要這樣「停止」向資本進攻，誰不懂得這一點，那他就完全不了解現時的攻局。

當然，只有加上括弧，即只是用比喻的說法，才能講到「停止」向資本進攻。在通常的戰爭中，可以下停止進攻的總命令，可以真正停止前進。而在反資本的戰爭中，却不能停止前進；要我們放棄繼續剝奪資本，這是決然談不到的。這裏所講的，是改變我們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底重心。迄今以前，是直接剝奪剝奪者的設施佔着首要地位。現時佔着首要地位的，則是在資本家已被剝奪的那些企業和其餘一切企業中組織統計和監督。

如果我們在現時，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就一定會遭受失敗，因爲每一個肯費心思索的人都明白知道，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統計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後於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我們現在只有用一切力量去辦好組織統計和監督的工作，我們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才能彌補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才能在反資本的「戰役」中獲得勝利。

我們承認應該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但這是否就等於承認以前犯了某種錯誤呢？絕對不是的。我們再拿戰爭作比喻吧。如果能夠單用輕騎隊擊潰並壓退敵人，那就應該這樣幹去。但如果這個動作祇能在相當限度內獲得戰果，那末，在這個限度以外，自然要調來重砲隊。我們承認現在「彌補」以前沒有作的調來重砲一事，這絕對不是承認輕騎隊底勝利攻擊是一個錯誤。

資產階級底奴僕們常常責罵我們採用了「赤衛隊」來攻擊資本。這種責罵是荒謬絕倫的，祇有財庫守門狗才說得出口。因為用「赤衛隊」攻擊資本，是當時各種情況所絕對要求的：第一，當時資本曾以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沙溫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博加也夫斯基等人為代表，實行軍事反抗（而黑格啓科利現時仍在作這種反抗）。要打破軍事反抗，除了用軍事手段以外，別無他法，赤衛隊正是作了這一使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擺脫剝削者壓迫而得到解放之最高尚最偉大的歷史事業。

第二，當時我們之所以不能將管理方法擺在首要地位來代替鎮壓方法，還因為管理的藝術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要從經驗中得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這樣的經驗。現在却已經有了。第三，當時，我們還未能使具有各種知識和技術的專門家受着我們的支配，因為他們或者參加在博加也夫斯基之流底隊伍中作戰，或者還能用怠工方法進行有系統的頑強的消極反抗。現在我們已經把怠工打破了。「赤衛隊」對資本的攻擊收到了成效，獲得了勝利，因為我們既戰勝了資本底軍事反抗，又戰勝了資本底怠工反抗。

這是不是說用「赤衛隊」攻擊資本在任何時候都是適當的，在任何情勢之下都是適當的，此外我們再沒有別種同資本作鬥爭的方法呢？如果這樣設想，那就是幼稚病。我們雖用輕騎隊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有重砲隊。我們雖用鎮壓方法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能夠用管理方法來取得勝利。當情勢改變的時候，應該善於改變反對敵人的鬥爭方法。我們連一分鐘都不會拒絕用「赤衛隊」方式去鎮壓沙溫可夫輩和黑格啓科利輩先生們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派。可是我們並不會如此蠢笨，竟在須用「赤衛隊」攻擊的時代大體已告結束（而且勝利地結束了）的時候，在由無產階級國家及權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精耕土壤，使這土壤上絕不能再生

長出任何資產階級來的這種時代已經到臨的時候，還將『赤衛隊』的攻擊手段擺在首要地位。

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時代，或者更確當些說，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階段，所以爲了澈底戰勝資本起見，就要善於使我們的鬥爭形式適合於這種階段底特別條件。

沒有具有各種知識、技術和經驗的專家們指導，便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需要有廣大羣衆自覺地在資本主義已達到的成績基礎上前進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應該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這種前進步驟。而專門家，因爲受了過去培養他們成爲專門家的那種社會生活底全部環境的影響，其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在已奪取政權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統計、監督和組織的任務（當時由於戰爭和俄國落後底緣故，這是無法實現的），那末，我們在打破了怠工以後，就能用全盤統計和監督的方法，而使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完全服從我們。由於一般統計和監督工作，相當『遲延』未作，所以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那種使資產階級專門家受到我們支配的環境；大多數怠工者雖『到職服務』，但國家要利用優秀的組織者和極高明的專門家却祇有兩種方式：或是按照舊的方式，資產階級的方式（即付給高額薪俸），或是按照新的方式，無產階級的方式（即造成自下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能必然和自然使這些專門家服從，並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現時我們却不得不來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極高明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以很高的『酬』金。一切熟悉情形的人們，都知道這點，可是並不是大家都仔細思考到了無產階級國家採用這種辦法有什麼意義。顯然，這個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底原則的，這些原則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

人工資的水準，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陞官發財思想作鬥爭。

不僅如此。這種辦法，顯然不只是停止在相當部門內，在相當程度內向資本進攻（須知資本並不是一批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政權向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佈過並實行過把高額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準的政策。

自然，資產階級底走卒，尤其是像孟什維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班下賤奴僕，會因我們承認後退一步而來幸災樂禍地譏笑我們。可是我們絕對用不着去理會這種譏笑。我們應該研究走向社會主義這一極端困難的新道路底特點，不要掩蔽我們的錯誤和弱點，而努力及時地彌補尚未做到的事情。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門家一事是離開公社原則，如果我們對羣衆隱瞞這點，那就無異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客的水準，並欺騙羣衆。公開宣佈我們怎樣和爲什麼後退了一步，然後公開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彌補沒有作到的事情，——這就是教育羣衆，並在實際經驗上同他們一塊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勝利的戰役中，勝利者未必沒有犯過個別的錯誤，未必沒有遭過局部的失敗，未必沒有在某某方面在某某地方暫時退守過的。而我們所舉行的進攻資本主義的『戰役』，比較最困難的戰役還要困難一百萬倍，如果因爲部分和局部的退守就垂頭喪氣，那便是愚蠢而可恥了。

現在從實踐方面來考察問題吧。假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需要一千個具有各種知識、技術和實際經驗的頭等學者和專門家來指導國民勞動，以謀國內經濟儘可能迅速地高漲起來。假設這些『頭等明星』——自然，其中大多數，愈是狂烈地叫喊工人們腐化，則他們受資產階級道德的腐化也就愈深——每人每年應付以二萬五千盧布。假設這個薪金總額（二千五百萬盧布）還要加多一倍

(假定因成績特別優良和特別迅速地完成了組織上和技術上最重要的任務，還要給以獎金)，或者甚至再加多三倍(假定還要聘請幾百個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國專門家)。試問每年花費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來根據最新技術和科學改組國民勞動，能不能說這項費用對於蘇維埃共和國是過多的或擔負不起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絕大多數覺悟的工農會贊成這種費用，因為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知道：我們底落後性使我們不能不受到千百萬盧布的損失，然而我們在組織、統計和監督方面，則還沒有達到能引起資產階級智識界『明星』全體自願來參加我們工作的那種程度。

當然，問題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額薪金底腐化作用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因革命迅速成功時，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野心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連同各種委員當中那些庸碌之輩或毫無良心的人，是會甘願去充當盜竊國庫的『明星』…的)，影響到工人羣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可是，工人和貧苦農民中一切善於思考和居心誠實的人們，都會同意我們，都會承認：我們無力一舉擺脫資本主義底遺毒，要使蘇維埃共和國免除每年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貢款』的負擔(這是因為我們自己在組織全民統計和實行自下監督這事業上落後之故所付出的貢款)，除了自己組織起來，在自身隊伍內整頓紀律，消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資本主義遺傳』，『遵守資本主義傳統』的人們，即是清除一切懶漢、寄生蟲、盜竊國庫者(現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廠、一切鐵路，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庫』)以外，別無辦法。如果有覺悟的先進工人和貧苦農民能在一年以內，在蘇維埃機關幫助之下，自動組織起來，紀律化起來，振奮起來，並建立起強固的勞動紀律，那末，一年以後，我們便能擺脫這項『貢款』，而且正是隨着我們工農勞動紀律和組織性所達到的程度，甚至還能更早地…縮減這種『貢款』。我們工農自己能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愈快地學會優良的勞動紀律和極高

的勞動技術，則我們就能愈加迅速地免除繳給這些專門家的一切『貢款』。

我們組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對產品生產與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我們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這種情形是瞭解目前時局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各種任務的基本關鍵。反資產階級鬥爭底重心，要移到組織這種統計和監督的工作上來。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在實行銀行國有、壟斷對外貿易、由國家監督金融流通方面，在舉辦從無產階級觀點看來是足可滿意的財產稅和所得稅方面，以及在實行勞動義務制方面，正確決定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底當前任務。

在這些部門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上，我們還極爲落後（而這都是極關緊要的部門），其所以落後，正因爲統計和監督一般地就沒有充分組織好。自然，這個任務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情形下，祇有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這一任務；可是不能忘記，資產階級，尤其是人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恰恰是在這方面向我們進行最嚴重的戰鬥，他們破壞正在整頓中的監督辦法，例如破壞糧食壟斷，奪取障地來作投機事業和投機買賣。我們所已頒佈的法令，還遠沒有充分實施，而現時主要任務，正在於集中一切力量，切實地實現那些已經定爲法令，可是還沒有見諸實施的改造事業的各原則。

爲要繼續向前實行銀行國有，並不屈不撓地去把銀行變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簿計底樞紐，首先就要極力在下列各事中達到實際成效：增加國民銀行分行底數量，吸收存款，改善存款取款的手續，使之便利於人民，消除那裏的『排隊』現象，捉拿並槍斃受賄者和騙子等等。起初把最簡單的事情切實執行，把現有的事情好好組織起來，然後再準備作比較複雜的事情。

將那些已經施行的國家壟斷（如糧食壟斷、皮革壟斷等等）加

以鞏固，加以整理，藉此準備實行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若不實行這種壟斷，那末專靠繳納「貢款」，我們就不能擺脫外國資本的羈絆。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能，就全看我們能否在相當的過渡時期內，用向外國資本繳納某些貢款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國內經濟獨立性這點為轉移。

在徵收一般的國稅，尤其是財產稅和所得稅的工作上，我們也非常落後。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在原則上雖是絕對容許並值得無產階級贊同的辦法，但它表明我們在這一方面所採用的，多半像是從富人手裏（將俄國）奪來交給窮人的方法，而很少像是實行管理的方法。可是，要加強自己的力量和鞏固自己的地位，我們就應該轉而採用這第二種方法，就應該用經常正確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的辦法來代替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的辦法。這種稅收辦法，能給無產階級國家更多的好處，並要求我們有更大的組織性，有更完善的統計和監督。

我們實施勞動義務制過遲，這就再一次地表明，準備工作與組織工作成了當前的迫切任務；這種工作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爲了澈底鞏固已得的勝利，另一方面是爲了準備「包圍」資本並強迫它「投降」。我們本該馬上開始實施勞動義務制，可是，我們在實施這個制度時，應當極其審慎，逐漸進行，用實際經驗來審查每一步驟，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對富人們實施勞動義務制。對於每個資產者——鄉村資產者也在內——施行工作與消費籌制，將是進到完全「包圍」敵人和建立對產品生產與分配上之真正全民統計和監督的一個嚴重步驟。

爲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千百年來，國家都是壓迫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機關，它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羣衆對一切國政之極端仇視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這種心理，乃是個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任務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

勝任，然而就連蘇維埃政權也須花費長久的時間和表現極大的堅毅精神才能完成這一任務。這個『遺產』底影響，在統計和監督問題上，即在推翻資產階級後第二天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之根本問題上，表現得特別厲害。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之後第一次覺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羣衆，必然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不是根據書本，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蘇維埃的經驗，才能瞭解並感覺到：如果對於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不實行極周到的國家統計和監督，則勞動者底政權，勞動者底自由，便不能維持下去，則資本主義壓迫制度底復辟，便是無可避免的。

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底一切習慣與傳統，也是反對國家監督，而要求『神聖私有財產制』和『神聖』私有企業底不可侵犯性。現在我們特別明顯地見到，馬克思主義該是如何正確地說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係資產階級的思潮，說它們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是處於如何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力求將蘇維埃的，即由國家實行統計和監督的思想灌注到羣衆底意識中，力求實現這種思想，力求打破養成人們把獲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買賣看作『祇是與我有關』的這種舊時惡習，——這便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鬥爭，這便是社會主義自覺勢力反對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鬥爭。我們已將工人監督制定為法律，可是這種制度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生活中，甚至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底意識中去。至於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不實行清算清報制，便會使社會主義幼芽陷于滅亡，便是盜竊國庫，——因為現在一切財產都是屬於國庫的，而國庫也就是蘇維埃政權，即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政權；至於在統計和監督上表現疏忽，便是直接幫助德國的和俄國的科爾尼洛夫派，——這些敵人只要我們一不執行統計與監督的任務，便能乘機推翻勞動者底政權，他們現時正在農民資產階級全體幫助之下，在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

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之下，『窺伺』着我們，待機而動，——關於這一切，我們在鼓動工作中沒有充分地說明，先進的工農份子沒有充分地加以思索，加以討論。可是在工人監督還沒有成爲事實以前，在先進工人還沒有辦好監督事宜，沒有實行勝利的和無情的進攻動作去反對破壞這種監督或不關心這種監督的人們以前，便不能由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即工人監督）進到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二步，即實行由工人調節生產。

社會主義國家，祇有當它是作爲由許多生產消費公社構成的體系，而這些公社都誠實計算自己的生產和消費，節省勞動，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因而能夠減少每日勞動時間到七小時或六小時以至於更少的時間，——只有在這種情形下，它才能產生。在這裏，若不辦妥對糧食和糧食生產（隨後，再對一切其他必需品）實行最嚴格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統計和監督，是不行的。資本主義遺給了我們一種羣衆組織，能便於我們對產品分配實行廣泛的統計和監督，——這就是消費協社。在俄國，這種組織比之先進國家裏發展得微弱些，可是它們還是包括有一千萬以上的社員。日前頒佈的關於消費協社的法令，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它鮮明地表明出現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狀況底特點和任務。

這個法令，是對資產階級合作社以及仍舊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的工人合作社的一種協定。 這個協定或妥協就是：第一，上述這些組織底代表不僅參加了該法令的討論，而且實際上還取得了表決權，因爲法令中有遇到這些組織堅決反對的一部份條文，是被刪掉了的。第二，這種妥協，實際上就是蘇維埃政權放棄了免費加入合作社的原則（這是唯一澈底的無產階級原則），同樣放棄了某地全體居民都要加入一個合作社的原則。我們放棄這個與消滅階級任務相適合的唯一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允許了『工人的階級合作社』（這些合作社之所以稱爲『階級合作社』，祇是因爲它們服從

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仍舊存在。最後，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要把資產階級完全從合作社管理處內摒除出去的條文，也大大放鬆了，祇有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主，才被禁止參加到合作社管理處內。

假使無產階級經過蘇維埃政權而行動，已經辦妥了全國範圍內的統計和監督，或者至少是辦妥了這種監督底基礎，那也就決不會有作這種妥協的必要。那時我們就能經過各地蘇維埃底糧食部，經過各地蘇維埃附設下的供給機關，將居民聯合為統一的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合作社，而不要資產階級合作社底協助，不要對純粹資產階級的原則實行讓步，這種原則，促使工人合作社仍舊是與資產階級合作社同時並存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把兩種合作社合併起來，以便由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權，由自己監視富人底消費，這樣來使資產階級的合作社，完全服從自己。

蘇維埃政權同資產階級合作社成立這種協定時，具體確定了自己在現今發展階段上的策略任務和特殊行動方法，這就是說：領導資產階級份子，利用他們，對他們作某些局部的讓步，這樣來造成向前進展的條件，此種進展雖比我們最初預定的要慢些，但同時會是切實些，它能比較可靠地保證我們的根據地和交通綫，比較完善地鞏固我們已經奪得的障地。蘇維埃現在能夠(而且應該)用非常明顯、簡單而實際的設施尺度來測量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勝利。就是要看有多少地方(公社或村落、街坊等等)並在任何程度上，合作社底發展已接近於包括全體居民的地步。

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已經解決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以後，隨着剝奪剝奪者的任務在大體上和基本上得到解決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制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

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並且爲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我們蘇維埃政權現時正處於這種狀態中，它因爲戰勝了剝削者，——由克倫斯基起到科爾尼洛夫止，——就已經獲得有直接從事解決這個任務，直接着手執行這個任務的可能。這裏馬上就可以明白看出，我們曾在幾天內就能奪得國家中央政權，在幾個星期內就能在一個龐大國度內到處去壓服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現在要切實解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務時，那就至少（尤其是在極其痛苦的和帶有極端破壞性的戰爭以後）也需要幾年的工夫。這工作底長期性質，無條件地是客觀環境所預決了的。

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就要保證大工業底物質基礎：提高燃料、鐵、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等的生產。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非常優越，因爲它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還擁有極大的富源：鐵礦（烏拉爾一帶），燃料（西伯利亞西部的石炭，高加索和俄國東南部的煤油以及中部的泥炭），極豐富的森林，水力，化學原料（加拉步格茲灣）等等。用最新技術來開採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產力空前發展底基礎。

另一種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第一，就是民衆文化教育程度底高漲。這種高漲，現時正在突飛猛進，這是那些被資產階級陳腐習慣蒙住了眼睛的人們所看不到的，這些人不能瞭解，現在因有蘇維埃的組織，民衆『下層』中的求知熱潮和首創精神，該是如何廣濶地發展着。第二，就是提高勞動者底紀律，提高工作藝能，提高勞動技巧和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這也是經濟高漲底條件。

在這一方面，我們的情形特別不好，而據那些甘受資產階級恐嚇，或貪圖私利而替資產階級服務的人們說，甚至是沒有希望的。這些人不懂得：世界上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不被舊社會擁護者罵爲崩潰現象和無政府狀態等等的革命。自然，剛才脫離空

前殘酷壓迫的羣衆，是充滿着深刻而廣泛的狂放熱潮和激暴心情，自然，造成勞動紀律底新基礎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在沒有完全戰勝地主和資產階級以前，這種造成勞動紀律新基礎的工作，甚至是不能開始的。

我們固然絕對不要被資產者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已經喪盡保持舊有特權希望的人）所散佈的那種往往是假裝的絕望情緒所迷惑，但同時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掩蔽顯係惡劣的現象。恰恰相反，我們要揭發這種惡劣現象，並加強反對這些現象的蘇維埃鬥爭方法，因為如果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性沒有戰勝那真正保證克倫斯基派和科爾尼洛夫派有復辟可能的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則社會主義底勝利便無從設想。

俄國無產階級最有覺悟的先鋒隊，已經抱定目的，要求提高勞動紀律。例如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國總工會中央局，已在開始製定相當的辦法和法令草案。這種工作，應該加以贊助，應該用全力去推進它。應該把實際採用和試行按件工資制，採用太羅利制中許多合乎科學的進步方法，以及根據各工廠製出的產品總量，或鐵路運輸業及水道運輸業底運載結果來決定工資之多寡等等，作為當前的急務。

同先進民族比較起來，俄國人是較劣的工作者。而在沙皇制度統治下和農奴制殘餘存在的時候，是不會不這樣的。學習作工，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向民衆盡量提出的一個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即太羅利制——也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一樣——包含着兩種成分，一種是資產階級剝削底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種是許多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勞動中的體力動作，消除多餘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制等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的一切有價值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

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相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應該在俄國研究與教授太羅制度，有系統地試行這個制度並使它適應於我國條件。同時，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時候，還須注意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這些特點，一方面，要求奠定組織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求採取強迫手段，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不致為無產階級政權軟弱狀態的實踐所玷污。

組織競賽

說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底意義，這是資產階級所樂意散佈來誣蔑社會主義的妄談之一。其實，社會主義既然消滅階級，因之也消滅對羣衆的奴役，也祇有它才第一次開闢真正大規模競賽的坦途。正是這由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形式民主制過渡到勞動羣衆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蘇維埃組織，才第一次廣泛地提出競賽。在政治方面實行競賽，比在經濟方面容易得多，可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重要的正是在經濟方面實行競賽。

我們拿組織競賽的一個方法，如公佈法來講吧。資產階級共和國祇是在形式上保證此種方法的實行，實際上，它使報紙刊物受資本的節制，用引人入趣的政治瑣談來玩弄『老百姓』，以保護『神聖私有財產制』的『營業祕密』來掩蔽作坊裏，商業契約裏，交貨手續裏及其他等等中所有的黑幕。蘇維埃政權已經取消營業祕密，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利用公佈法去進行經濟競賽，我們還幾乎是毫無成就。應該有系統地從事工作，以便除了無情撲滅純係欺騙和無恥造謠的資產階級刊物之外，還要努力去創辦這樣一種刊物，它不以政治趣語和瑣談來玩弄和愚弄羣衆，而正是將日常經濟問題，提交羣衆裁判，幫助他們認真來研究這些問題。每個工廠，每個鄉村，都是生產消費公社，都有權並應該照自己的方法去施行

一般的蘇維埃法規（所謂『照自己的方法』，並不是說破壞法規，而是說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實施這些法規），照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產品生產和分配底統計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個別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私事』。而在蘇維埃政權下，這不是私事，而是國家大事。

我們差不多還沒有着手進行這種巨大而困難的，但同時又是富有結果的工作，即組織各公社間的競賽，將工作報告制和公佈法實行到出產衣服糧食等等的生產過程中去，把乾燥的，死板的官僚主義的工作報告變成活的榜樣，——壞的使人討厭，好的使人羨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別榜樣底意義，比如說，某個生產組合榜樣底意義，必然是極其有限的；祇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能夠夢想以慈善機關榜樣的影響來『糾正』資本主義。在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以後，在剝奪者已被剝奪以後，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榜樣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所多次指示過的那樣，——第一次有可能來表現自己的廣大影響。模範公社應該成為，而且必將成為落後公社的訓導人，教師和提攜者。報章刊物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介紹模範公社所獲成績的一切詳情，研究它們成功底原因以及它們經營的方法；另一方面，將那些堅決保持『資本主義傳統』，即無政府狀態，偷懶，亂無秩序，投機行動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板』。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統計純粹是『公務人』或本行專家底事務，我們却應該將它灌輸到羣衆中去，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羣衆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各個公社間經濟成績底比較，成為大家注意和研究底對象，使優良的公社立即得到獎賞（如在相當時期內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獎賞大量文化品或美術品等等）。

當新階級以社會首領和指導人的資格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從來不會不經過最強烈的『簸盪』，震撼，鬥爭和風浪時期的，這是

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選擇適合新客觀環境的方法上，又不會不經過無把握的步驟，試驗，動搖和猶豫時期。以前，趨於滅亡的封建貴族，當報復那些排擠自己並已在獲勝的資產階級時，不祇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企圖暴動與復辟，而且還滔滔不絕地譏笑『暴發戶』『無恥漢』底笨拙、魯鈍和錯誤，說這些人既沒有王候、貴族、世家所有過的長期執政訓練，竟膽敢執掌國家『神聖大權』——現在，科爾尼洛夫輩和克倫斯基輩，郭茨輩和馬爾托夫輩，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滑頭主義或資產階級懷疑主義的英雄們，對於那『胆敢』企圖奪取政權的俄國工人階級，也正是採用這種報復手段。

當然，新社會階級，而且是迄今以前受壓迫的，被貧困與黑暗所高壓過的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年月，——而不是經過幾個星期，——才能夠把握新的情勢，看清環境，辦妥自己的工作，造就出自己的組織者。當然，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過去是不能造成從事大規模的，預計到包括千百萬公民的組織設施底經驗和技能，而要把舊的，差不多純係鼓動家的技能改造過來，這是一件很長久的事。可是這裏並沒有什麼絕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們會明知轉變底必要，並有實現轉變的堅決心，並有達到偉大而困難目的的毅力，——那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這個轉變。『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大眾中，有極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把這樣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滅和拋棄，而我們呢，却還不會把他們發現出來，鼓勵起來，扶持起來，提拔出來。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熱忱——沒有這種革命熱忱，便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着手學習這種工作，那我們就一定學會這種工作。

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深刻強大的民衆運動都不免帶有污濁的泡沫——都不免有黏附於經驗缺少的革新家方面的野心家和騙子，大言不慚和誇口吹牛份子，不免有荒謬的混亂，無謂的舉動，徒然的忙碌，不免有個別『領袖』企圖百事承當而一事無成的現象。讓資產

階級社會底哈巴狗——由別洛魯梭夫起到馬爾托夫止，在我們砍伐古木老林的時候，對每一塊多餘砍去的木屑去嘶聲狂吠吧！既是些哈巴狗，也就祇能向無產階級這巨象狂吠。讓他們去狂吠吧！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力求盡量謹慎，盡量耐心地去試驗並辨識真正的組織家，即那些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本領的人才，他們既忠實於社會主義，而又能毫不喧嘩地（並不顧別人的忙亂和喧嘩）做到使蘇維埃組織範圍內的大批人衆都能團結堅牢，和衷共濟地工作。祇有這種人才，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才應該提拔起來，由最簡單的任務進到最困難的任務，使之擔負要職，充當民衆勞動底領導者，管理工作的領導者。我們還沒有學會這點。我們定能學會這點的。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最近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提出建立『嚴整的組織』與提高紀律，作為現時最主要的任務。現在，大家都樂意『表決』和『簽署』這樣的決議案，可是關於實施這些決議案需要採用強迫手段，而且正是要採用專政形式的強迫手段，——這一點，人們通常却不去思索一下。其實，如果認為不用強迫手段，不用專政手段，便可以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是絕頂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馬克思底理論在很久以前，就已十分確定地反對過這種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妄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事變，已經非常明顯、觸目、動人地證實了馬克思這種理論，祇有絕頂愚鈍或硬不承認真理的人，才能在這方面依然執迷不悟。或者是科爾尼洛夫專政（如果把科爾尼洛夫看作為俄國式資產階級的卡芬雅克的話），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經過了幾次非常急劇轉變而非常迅速發展的國家裏，在由最痛苦的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絕頂破壞情形下，別種出路簡

直是談不到的。一切中間的解決辦法，若非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資產階級不能講真話，不能說出他們需要科爾尼洛夫，——便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切爾諾夫輩，策烈迭基輩，馬爾托夫輩（他們高談什麼民主派的統一，民主派專政，民主聯合戰綫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底愚蠢想法。誰要是經過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革命事變，却還沒有懂得決不能有中間的解決辦法，那麼對於這樣的人，就只好置之一笑。

另一方面，不覺瞭解，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由於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制度。第一，若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便不能戰勝和剷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剷奪掉，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會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比之對外戰爭會造成更大的經濟破壞，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種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極不確定、極不穩定和混亂的狀態。而舊社會中的一切腐敗份子，其數量必然極多，大半都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繫（因為一切戰爭和一切危機，首先就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就是摧殘他們），這些份子，在這種深刻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顯露頭角』。而除了增多犯罪行爲，流氓行爲，賄賂，投機及作出各種壞事以外，這些腐敗份子是不能以別種方法來『顯露頭角』的。爲要消除這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需有鐵的手腕。

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衆沒有不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決心而把盜賊就地槍決的。從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於使羣衆保持緊張心情而能無情鎮壓腐化份子的那種革命熱忱，未曾長久支持下去。當時羣衆革命熱忱之所以這樣不穩固，其社會原因，即階級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本身上薄弱，而祇有

無產階級（如果它已經有充分的數量，充分的覺悟和充分的紀律），才是唯一能夠將大多數被剝削勞動者（如果更簡單更通俗些說，就是大多數窮人）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能夠充分長期地執掌政權來完全壓服一切剝削者和一切腐敗份子。

歷次革命中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經驗，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教訓也就爲馬克思所確認了，他給了一個簡單、嚴格、精確、明顯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俄國革命之正確地實現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這是蘇維埃組織在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勝利傳佈所證明了的。因爲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先進階級專政底組織形式，這個先進階級，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提高到實行新民主制，提高到獨立參加國家底管理，而他們大家根據自身經驗正在學習認定這一有紀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爲自己最可靠的領袖。

然而專政是一個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的和行動敏捷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鐵，却很像漿糊。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兩方面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一方面，是從外部來動作，其方法爲沙溫可夫輩，郭茨輩，黑格啓科利輩，科爾尼洛夫輩所採用的陰謀和暴動手段及其在立憲民主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刊物上的醜態『思想』反映，不斷的造謠誣蔑；另一方面，是這種自發勢力從內部來動作，利用各種腐敗成份，利用一切弱點來實行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現象。我們愈是用軍事辦法完全壓服資產階級，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對於我們也就愈加危險。要與這種自發勢力作鬥爭，決不能祇靠宣傳和鼓動，祇靠組織競賽，祇靠選拔組織者，——還必須用強迫手段來進行這個鬥爭。

當政權底基本任務已逐漸由軍事鎮壓轉為管理工作時，鎮壓和強迫手段底標本表現，也會逐漸由法庭審判來代替就地槍決。在這一方面，革命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就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並證明出革命底生命力，他們在尙未頒佈解散資產階級官僚司法機關的任何法令以前，就已開始組織自己的，即工農的法庭。可是我們的人民革命法庭還極端軟弱。還可以感覺到，民衆把法庭看作是一種異己的官場東西，這種由地主資產階級壓迫所遺傳下來的觀點，還沒有澈底打破。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機關（因為司法事務是國家管理機能之一），法庭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底政權機關，法庭是訓練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明顯的事實：俄國底主要不幸既在於飢荒和失業，那末要戰勝這些苦難，便不是用任何一時的熱情所能奏效，而祇有用各方面的，包羅一切的，全民的組織和紀律來增加生產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要的燃料，及時運輸並正確地加以分配，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無論在哪種經濟中，無論在哪件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提交法庭，嚴懲無貸。我們現在要與之作最堅決鬥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表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飢荒和失業現象是與一切人和每個人在組織上紀律上所犯的放蕩行爲，有着國民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聯繫，——人們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觀點：只要我能多抓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鐵路事業，可說是最顯明地體現着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機體之經濟的聯繫，在這裏，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自發勢力反對無產階級組織性的這個鬥爭，表現得特別鮮明。『管理』份子中產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賄人；優秀的無產階級份子却在爲遵守紀律而鬥爭；可是，在前後兩種份子當中，自然有很多動搖的，『軟弱的』人，

他們無力抵抗投機、賄賂和私人利益的誘惑，而以敗壞整個機關作為取得此種個人利益的代價；但要消除飢荒和失業現象，則恰恰有賴於這個機關底正確工作。

在最近頒佈的關於鐵路管理的法令，即賦與個別領導人以獨裁全權（或「無限」全權）的法令問題周圍所開展起來的鬥爭，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這個鬥爭很可表明一切。自覺表現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份子（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覺的），當時想把賦與個別人員以「無限」（即獨裁的）全權的法令，看作是離開委員制原則，離開民主制以及蘇維埃政權底其他原則。有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正進行着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即是利用惡劣天性，利用小私有者「撈一把」的慾望來進行煽動，反對關於獨裁制的法令。這裏發生了具有真正巨大意義的問題：第一，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一般講來，委任負有獨裁者無限全權的個別人員的辦法是否與蘇維埃政權底根本原則相容；第二，這件事情，——也可說是這個先例，——對於目前政權底特殊任務，有什麼關係。我們對於前一問題和後一問題，都應該非常細心來加以研究。

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之成為革命階級專政底表現者、代表人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個人獨裁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毫無疑義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這一點上，咒罵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份子，以及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應聲虫總是表演圓滑手腕：一方面，他們宣佈蘇維埃政權不過是一種荒謬的，無政府式的粗野東西，而極力漠視我們為證明蘇維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甚至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底開端所引用的一切歷史上的比擬和理論上的證據；另一方面，他們却向我們提出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要求，而說：個人獨裁是與你們布爾什維克的（即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民主制絕不相容的。

這種議論簡直壞透了。如果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必須有國家，即是承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採用強迫手段。強迫手段底形式，是取決於當時革命階級發展底程度，其次是取決於某些特別情況，例如長期反動戰爭底遺毒，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反抗底形式。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上的矛盾。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區別，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打擊佔少數的剝削者以謀佔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底利益，其次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由被剝削勞動羣衆——也是經過個人——來實現，而且是由一種組織來實現，這種組織之構成，正是便於喚醒和喚起這種羣衆去從事具有歷史意義的創造工作（蘇維埃的組織就是這類的組織）。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從現時特殊任務看來，個人獨裁制有何意義的問題，我們應該說，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之物質的與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無條件的必須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來指揮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底共同工作。這一點的必要，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非常明顯的，——一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底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可以保證意志之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底意志服從於一個人底意志。

在參加公共工作的人們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情形下，這種管制就會很像音樂指導人底柔和領導一樣。如果至沒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時候，這管制可以具有嚴厲的獨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樣，爲要使這種按照大機器工業式樣組成的工作過程獲得成效，則無條件地服從統一意志，便是絕對必要的了。在鐵路業上，此種服從，更是加倍必要的。這種由一個政治任務轉到另一個政治任務的過渡，——在表面上看來，後一種任務與前一種任務

是全不相像的，——就是現在時局底特點。革命剛剛才打破了使羣衆在鞭笞威嚇之下受其管制的那種最陳舊、最堅牢、最沉重的鐐銬。這是昨天的事，而在今天，同樣是這個革命，而且正是爲着社會主義底利益，却要求羣衆無條件地服從勞動過程指導者底統一意志。當然，這個過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只有經過極大的動盪、震撼、復舊以及那領導民衆建設新生活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極度緊張自己的精力，這個過渡才會實現。那些沾染了新生活、前進、人民事業和我們時代各報⁵⁷底庸俗瘋狂病的人們，是不肯思索這層道理的。

且拿被剝削勞動羣衆中普通份子底心理來看，並將這種心理來同他們的社會生活客觀物質條件作一對照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在事實上還沒有看見過有產者、剝削者階級會真正作出什麼嚴重犧牲來施捨給他。他還沒有看見有產者、剝削者階級會給他以多次約許過的土地和自由，給他以和平，會犧牲『大強國主義』底利益和大強國密約底利益，會犧牲資本和利潤。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當他自己用強力取得了這種東西，並且不得不用強力來捍衛已獲得的勝利品，使之免遭克倫斯基輩，郭茨輩，黑格啓科利輩，杜托夫輩，科爾尼洛夫輩侵犯的時候，他才看見了這種情形。當然，在相當時間以內，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祇求來舒舒氣，伸伸腰和展展軀體，取得一切可以取得而爲現已推翻了的剝削者所沒有給予過他的那種眼前生活上的福利。當然，需要經過相當時期，羣衆中的普通份子才能不僅親眼看見，不僅切實相信，而且還會親身感覺到：這樣隨便地『取得』、奪得、撈得是不行的，這樣做去，會助長經濟破壞，招致滅亡，會引起科爾尼洛夫輩復辟。普通勞動羣衆生活條件上（因之也是心理上）相當的轉變，剛剛開始。而我們的全部任務，被剝削羣衆解放要求之自覺代表者，即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底任務，就在於領會到這個轉

變，瞭解這種轉變的必然性，起來領導這些困倦的和疲於尋求出路的羣衆，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走上勞動紀律的道路，走上這種把經常開羣衆大會討論工作條件的任務與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獨裁者——底意志的任務協調起來的道路。

資產者、孟什維克和新生活派嘲笑「開羣衆大會」的辦法，更常常惡意地指謫「羣衆大會」，認爲這裏祇是混亂現象，無謂之舉和小私有者利己主義的衝動。可是，不舉行羣衆大會，則被壓迫羣衆永遠也不能由剝削者強制他們遵守的紀律，轉到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羣衆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羣衆底真正民主制，這是他們揚眉吐氣之際，這是他們向新生活醒覺起來，這是他們在親自既已掃除毒物（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地主、資本家）的活動場所中的初步行動，現在他們又想親自本着這個不是別人的，不是貴族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底原則，按自己的方式，爲自己的利益，去學會整頓這個活動場所。正需要有勞動羣衆戰勝剝削者的十月革命勝利，需要有勞動羣衆自己初期討論新生活條件和新任務的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夠穩固地過渡到更高形式的勞動紀律，過渡到自覺地領會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的思想，過渡到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政權代表底獨斷命令。

這個過渡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有成效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看見過勞動羣衆怎樣在自己隊伍中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及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有成效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喚醒和喚起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抑壓下去了的社會「下層人」，他們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才得到完全的自由來推翻剝削者，並開始認清環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生活。這些最受壓迫、最遭

抑壓、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之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他們到處建立起自己的蘇維埃組織，——這便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階段。

現時正在開始第三個階段。必須把我們所業已奪得的東西，把我們所已經下過明令，已經定爲法規，已經討論過，已經擬定了的東西鞏固起來，——必須把這些東西鞏固成爲日常勞動紀律底堅固形式。這是一個最困難而又最有成果的任務，因爲祇有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才能樹立起社會主義的秩序。應該學會將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的這種洶湧澎湃有如春潮汎濫一切隕障的民主精神，與在工作時間內實行铁的紀律，及在工作中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個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把它學會的。

昨天，我們會遇到資產階級剝削制復辟的危險，其表現就是科爾尼洛夫、郭茨、杜托夫、黑格啓科利、博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動。我們戰勝了他們。今天，這個復辟，同樣是這個復辟的危險，又表現於別種形式上，表現於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和無政府主義底自發勢力以及小私有者這『與我無關』心理底自發勢力，表現於這個自發勢力對無產階級紀律性所進行的日常的，細小的，可是爲數極多的進攻和襲擊。我們應該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而且我們一定會戰勝它的。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爲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而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列；第二，廢除了選舉上一切官僚主義的形式手續和限制，羣衆自己決定選舉手續和期限，選舉人有召回被選舉人的完全自由；

第三，建成勞動者先鋒隊，即大工業無產階級底最優良的羣衆組織，此種組織，使這先鋒隊能夠領導最廣大的被剝削羣衆，吸收他們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給他們以政治訓練，——因而是空前第一次着手來使真正全體人民都學習管理國家，並開始管理國家。

這就是已在俄國實施的民主制底主要特徵，這種民主制是更高式樣的民主制，是與資產階級對民主制之曲解完全背馳，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制，過渡到使國家能開始消亡的條件。

當然，小資產階級反組織性底自發勢力（在任何無產階級革命中，這種自發勢力都必然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來，而在我國革命中，因為我國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因為我國落後以及由於反動戰爭所造成的惡果，更表現得特別厲害），也不能不影響到蘇維埃方面。

必須毫不鬆懈地去努力發展各地蘇維埃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組織的工作。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代表變為『國會議員』，或在另一方面變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必須用吸收全體蘇維埃代表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方法來同這種趨勢作鬥爭。在許多地方，蘇維埃底各部變成逐漸與各理事局融合在一塊的機關。我們的目的，是要吸收全體貧民來參加管理工作，而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切步驟，——其形式愈多愈好，——應該詳細地登記起來，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以更廣泛的經驗來從事審查，並定為法規。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個勞動者，除作完八小時生產工作的『功課』以外，無報酬地執行國家義務。過渡到這個制度，是特別困難的，可是只有實現這種過渡才可保證社會主義徹底鞏固起來。這種過渡乃是一種創舉，是一件難事，這當然要引起許多所謂摸索行進的步驟，許多錯誤和動搖，——不經過這種現象，決不會有任何急劇的前進。在許多願意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看來，目前情況底全部特點就是人們已

慣於抽象地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而在兩者之間安上一個意味深沉的名詞：『躍進』（有些記得恩格斯著作底片段的人，還補上一句意味更深沉的話語：『由必然界躍進到自由界』）。可是大多數所謂社會主義者，即祇『在書本上讀過』社會主義而從來沒有認真領會過問題的人們，都不善於想到：社會主義底這位導師所說的『躍進』，是指全世界歷史變遷上的轉變關頭，並且這種躍進，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自然，在這樣的時期，在鼎鼎大名的『智識界』中，會出現無數的哭喪婦：有的哭立憲會議，有的哭資產階級紀律，有的哭資本主義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國主義的大強國精神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偉大躍進時代底真正足以注意的地方，就在於舊制度底碎片極多，並且有時比新制度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底數量還積累得更快些，這就使我們要善於從發展路線或鏈條中抽出最重要的環節。有這樣的歷史時機，這時為謀革命底勝利，最重要的是在多積累些碎片，即是多破壞些舊機關；也有另一種時機，即在破壞已經足夠的時候，當前的事情是一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看來，是『枯燥無味』的工作），即清除地基上碎片的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時機，這時在瓦礫還沒有清除淨盡的基地上，懇懇地看護着從碎片下生長出來的新制度底幼芽，是最為重要。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為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變發展的歷史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那樣笨拙。

蘇維埃與『人民』，即是與被剝削勞動者之間有鞏固的聯繫，有着靈活的和伸縮自如的聯繫，這就足以防止官僚主義惡化蘇維埃組

織的現象。貧民無論何時都不把資產階級的國會，那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按民主制說來——資本主義共和國底資產階級國會，認為是『自己的』機關。而蘇維埃在工農羣衆看來，則是『自己的』，而不是異己的東西。無論是謝德曼式的，或幾乎是同爲一邱之貉的馬爾托夫式的現代『社會民主派』之厭惡蘇維埃，他們之羨慕威儀十足的資產階級國會或立憲會議，正和六十年前屠格涅夫之羨慕溫和的、帝制的和貴族的立憲制，而厭惡多布洛留波夫和契爾內舍夫斯基所主張的農夫民主主義一樣。

正是由於蘇維埃與勞動『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種特別式的召回制和另一種的自下監督制，現在應該極力使這些形式發展起來。例如，國民教育委員會是蘇維埃選民及其代表爲討論並監督蘇維埃政權在這方面的活動而舉行的定期代表會議，這種委員會是值得完全贊同和擁護的。若是把蘇維埃變爲一種凝固的和孤獨自在的東西，那就再愚蠢不過了。現在，我們愈堅決主張無情強硬的政權，愈堅決主張在某種工作過程中，在某種純粹執行的職能方面實行個人獨裁制，則我們便應該有愈加紛繁的自下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杜絕惡化蘇維埃政權的任何可能性，以便再三不倦地剷除官僚主義的莠草。

結 論

國際方面的情形，是非常嚴重、困難而危險的；必須隨機應變和實行退守；等候西歐革命新爆發的時期，這個革命底成熟過程竟長久得令人難耐；在國內，是緩慢建設和無情『督促』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森嚴紀律性與那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及無政府狀態之險惡自發勢力作長期堅決鬥爭的時期；——簡略說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現今特殊階段底特點。這就是歷史事變鏈條中現時我們必須用

全力抓住，以便在過渡到下一環節之前而能於順利解決任務的這個環節，至於下一環節，却正以特別的光輝，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光輝，引人注目。

試將『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與根據現今階段底特點而產生的口號也就是：隨機應變，退守，等候，緩慢建設，無情督促，森嚴紀律，撲滅放蕩性等口號比較一下吧。有些『革命家』聽到這些口號以後，不覺義憤填膺，開始『痛斥』我們，說我們忘掉了十月革命底傳統，說我們主張與資產階級專門家妥協，與資產階級調和，說我們贊成什麼小資產階級性，改良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這是不足驚奇的。

這些可憐的革命家底不幸，就在於他們中間連那些抱有世界上最高尚動機而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絕對忠誠的人們，都不能了解一個落後的國家，為險惡的反動戰爭所毀壞的國家，遠在先進國以前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所應該經過的這種特別的和『特別不愜意的』狀況，都沒有堅毅力經受住困難過渡中的困難關頭。自然，對我們黨持這種『正式』反對態度的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集團代表人物和階級代表人物中，個人的例外當然是有的，而且永遠會有的。可是社會代表人物始終還是社會代表人物。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純粹無產階級人口佔有莫大優勢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家與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差別，必然會顯露出來，而且有時會極端劇烈地顯露出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在事變底每一轉變關頭都動搖着，游移着，由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激烈革命態度，轉到五月間的頌揚『聯合政府』，轉到七月間的仇視布爾什維克（或者說，轉到嘆惜布爾什維克底『冒險主義』），又轉到十月末的竭力迴避布爾什維克，再轉到十二月間贊助布爾什維克，最後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間，這種人物，最愛做出目中無人的樣子：並說『我並不是歌頌『機構』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精神的人』。

這種人物底社會根源就是小業主，他們因戰爭慘禍、突然破產以及飢荒與破壞的空前痛苦而憤激發狂，他們瘋狂地東奔西竄，尋求出路和救星，動搖不定：一方面想信任和幫助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又時而爆發絕望情緒。應該明確了解和牢實認清：在這種社會基礎上面，任何社會主義都是建設不成功的。祇有毫不動搖地遵循自己道路前進，在最困難、最嚴重、最危險的過渡期間不灰心不失望的階級，才能領導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不需要瘋狂般的熱潮。我們需要有無產階級鐵軍底整齊步伐。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刊載於全俄中央執
委新報第八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三
五至四六八頁。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
戰爭時期

論飢荒

致彼得城工人的信

同志們！日前有你們的一個代表來見過我，他是普梯洛夫工廠底工人，我黨黨員。這個同志把彼得城內極端嚴重的飢荒情形詳細講給我聽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許多工業省區裏，糧食問題也同樣尖銳，工人和一般貧民也是同樣瀕臨於痛苦的飢荒綫上。

同時我們却看見拿糧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機的情形。飢荒並不是由於俄國沒有糧食，而是由於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銳的糧食問題上，對勞動者底統治，即工人國家這蘇維埃政權作最後的決戰。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有鄉村的富豪和富農，破壞糧食壟斷事宜，破壞國家的糧食分配辦法，這種辦法，正是利於和爲了把糧食供給全體人民，首先是供給工人、勞動者和貧民。資產階級破壞固定價格，藉糧食投機發財，每普特糧食賺得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盧布，破壞糧食壟斷事宜和正確分配糧食的辦法，它所用的破壞手段，就是賄賂，收買和惡意贊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權的一切罪行，而這工人政權是在力求實現社會主義底第一個主要根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懂得的。這是所有一切工人，所有一切貧農以至中農，所有度過貧苦生涯的人，所有靠工錢生活過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國居民贊成這個真理。社會主義底基礎，社會主義力量之不可湮沒的泉源，社會主義

最終勝利之不可摧毀的保障，也就在這個簡單的，十分簡單和再明顯不過的真理中。

但問題的實質却在於：甘心同意這個真理，發誓贊成這個真理，口頭上承認這個真理，是一回事，而善於把這個真理實現起來，却是另一回事。當在自稱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中，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人遭受飢餓痛苦（在彼得城，在非農業省區，在莫斯科），而那些富人，富農和投機者却把千百萬普特糧食匿藏起來的時候，每個有覺悟的工農都須認真仔細地思考一番。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原則，怎樣才可以實現呢？萬分顯然的，爲要實現這個原則，第一，就必須實行國家的糧食壟斷制，即絕對禁止任何私人的糧食貿易，務須把所有剩餘糧食按照固定價格通統繳給國家，絕對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隱藏餘糧。第二，就必須最嚴格統計一切餘糧，以及有條不紊地把糧食從多餘的區域運往缺糧的地方，還要定購供消費，供製造，供播種的存糧。第三，就必須在工人的，即無產階級的國家監督之下，實行正確和公道分配糧食的辦法，按國內全體公民來分配糧食，不給富人以任何的特權和優越地位。

只要把這些克服飢荒的條件稍微想想，便可懂得那班否認爲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爲了使勞動者擺脫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而必須有國家政權（並且要是對資產階級極端嚴酷，對向政府搗亂者鐵面無情的政權）的無政府主義底可鄙空談家，真是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正是現在，當我國革命已緊接着在實際上具體實現——這也就是這革命不可磨滅的功績——社會主義的任務時，正是現在，並且恰恰是在當前主要問題，即糧食問題上，可以最明顯地看見，必須有鋼鐵般的革命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在全國廣大範圍內，組織收集食品，運輸和分配食品的事業，並且要統計幾千萬以至一兩萬萬人的消費，要估計到往後一年以至若干年內的生產條

件和結果（因為要預防歉收的年份，要預計到爲了增加糧食收成，常常要有多年的工作來改良土壤等等）。

羅曼諾夫和克倫斯基遺留給工人階級的國家，是一個被他們所進行的劫掠、犯罪、創深痛鉅戰爭弄到極端破產的國家，是一個被俄國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搶劫一空的國家。只有最嚴格地計算每一普特糧食，只有絕對勻調地分配每一磅糧食，才能使糧食夠一切人吃。供機器用的『糧食』，即燃料，也是極端缺乏的：如果不用全力來嚴格無情地節省消費和實行正確分配，那末鐵路和工廠都會停頓起來，全國人民都會受到失業和飢荒現象的危害。災禍就在眼前，它已經逼近到我們頭上。在萬分困難的五月以後，還有更困難的六月，七月和八月。

國家糧食壟斷制，在我國已由法律明文規定，可是實際上它隨時隨地都被資產階級破壞着。鄉村中的富人，富農，土豪，這些把四周鄉里搶劫了好幾十年的人們，寧願藉投機業，藉造私酒來營利，須知這可以使他們自飽私囊，至於造成飢荒的罪過，那他們就推到蘇維埃政權身上。那些在政治上保衛富農的人，如立憲民主黨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也是同樣的作法，他們又公開又秘密地爲反對糧食壟斷制，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工作着』。無氣節者的黨，即左派社會革命黨，在這裏也表現自己的毫無氣節性：它甘受資產階級那種自私的叫喊號泣所蠱惑，它大叫反對糧食壟斷制，它提出『抗議』反對糧食獨裁，它甘受資產階級的恐嚇，它害怕反對富農，而瘋狂地東奔西竄，提議抬高固定價格，允許私人貿易等等。

這個無氣節者的黨在政策上反映着某種實際生活中所常有的情形：當富農挑唆貧農去反對蘇維埃的時候，就設法收買貧農，譬如給某個貧農一普特糧食，不要他付六個盧布的價錢，而只要他付三個盧布，好使這個被腐化了的貧農也去『享受』投機利益，也去以

一百五十個盧布，賣出這一普特糧食，「發發小財」，讓他也變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對那禁止私人糧食貿易的蘇維埃。

凡是能夠思索的人，凡是願意去那怕稍加思索的人，都會明白，究竟鬥爭是按那條路綫進行着：

或者是有覺悟的先進工人把貧民羣衆團結到自己周圍，建立鐵一般的秩序，建立嚴厲無情的政權，即真正無產階級專政，而獲得勝利來強迫富農服從，並在全國範圍內樹立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的辦法；或者是資產階級得着富農幫助，得着無氣節和昏頭昏腦之輩（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間接贊助，而把蘇維埃政權推翻，來擁立一個親德的或親日的科爾尼洛夫，這個科爾尼洛夫就會強迫人民每日作十六小時的工作，每星期領得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槍殺工人羣衆，在審訊室裏實行拷打，如在芬蘭和烏克蘭一樣。

或者就是那樣，或者就是這樣。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國內狀況危急到了極點。

凡是細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會不看見，立憲民主黨人正在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互相協商：究竟是親德的科爾尼洛夫，還是親日的科爾尼洛夫『較為愜意一些』；究竟是帝制的科爾尼洛夫，還是共和制的科爾尼洛夫，對於鎮壓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現在已是一切覺悟工人，一切先進工人應該協商的時候了；他們應該即時振奮起來，懂得每一分鐘的遲延，都有使國家陷于淪亡，使革命陷于覆滅的危險。

彌補的辦法是無濟於事的。訴苦是會毫無結果的。各人企圖為自己，即是爲『自己的』工廠，爲『自己的』企業，『零星』去找得糧食和燃料的辦法，只會助長混亂狀態，只會方便投機者所幹的自私自利和黑暗醜惡的勾當。

彼得城工人同志們！我之所以要寫這封信給你們，原因就在這

裏。彼得城不是全俄國。彼得城的工人只是俄國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彼得城的工人是俄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羣衆中一支優秀的，先進的，最有覺悟的，最革命的，最堅決的，最少受空洞辭句誘惑，最少受無氣節的絕望情緒影響，最少受資產階級威嚇的隊伍。在各國歷史中，當危急關頭，甚至人數不多的先進階級底先進隊伍，竟能把全國人民吸引到自己周圍，燃起了羣衆革命熱情底火焰，而實現了偉大歷史功勳，這乃是常見不鮮的事。

彼得城底工人代表向我說：在他們普梯洛夫工廠裏原來有四萬工人，但其中大多數都是『臨時』工人，不是無產者，而是不可靠和軟弱的人們。現在只剩下一萬五千人了，但這都是無產者，都是經過鬥爭考驗和鍛鍊的人。

正是這樣的革命先鋒隊——在彼得城的以及在全國的——應當大聲號召，應當一齊奮起，應當認清，國家命運就操在他們自己手中，他們必須表現出與一九〇五年一月和十月，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時同樣的英勇精神，他們應當起來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反對糧食投機者，反對富農、土豪、破壞份子、貪贓受賄的人，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來反對在收集、運輸和分配糧食與燃料事宜上一切破壞國家嚴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進工人大衆熱情底高漲，才能挽救國家和革命。需要有幾萬先進工人，即受過鍛鍊的無產者，他們要具有這樣高的覺悟程度，能夠向全國各地千百萬貧民說明真象，並成爲這千百萬人的領袖，他們要具有這樣大的堅毅精神，能夠無情地摒棄和無情地槍斃一切甘受投機利益『誘惑』，——這是常有的事，——甘願從爲人民事業奮鬥的戰士而墮落爲劫掠者的人；他們要具有這樣堅定這樣忠於革命的赤忱，能夠有組織地把應在全國各地進行征伐的一切重荷，担負到底，來樹立秩序，鞏固各地方蘇維埃機關，在各地監督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燃料的消費。

相較之那在幾天之內表現英勇精神，既不要離開久居之地，也不要作長途征戰，而只限於奮發熱情，舉行起義去反對惡魔和白痴的羅曼諾夫，或反對又愚蠢又自誇的克倫斯基的事情，要困難得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長期堅毅的組織工作上表現英勇精神，是比在起義中表現英勇精神要困難得無比的，可是也就高尚得無比了。然而工人政黨和工人階級底力量始終是由於它們能大胆公開地正視危險，而不害怕承認危險，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勢力是站在『自己』營壘方面，哪些勢力是站在『外人』，即剝削者底營壘方面。革命正在向前發展着，增長着。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也就增長起來。鬥爭也就擴大和加深起來。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加緊設法獲得糧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國範圍內最嚴格統計和監督這些事情，這就是進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和主要的門徑。這已經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務，而是共產主義的任務，正是在這個任務上，勞動者和貧民應當向資本主義作堅決的戰鬥。

爲了這個戰鬥值得獻出一切力量：這個戰鬥底困難是巨大的，然而我們所奮鬥的事業，即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事業也是巨大的。

當人民忍飢受餓，當失業現象日益猖獗的時候，凡是在家裏隱藏一普特餘糧的人，凡是使國家損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窮兇極惡的罪犯。

在這樣的時光，——而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則會永遠如此，——每一普特糧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聖物，比神父們用來愚弄蠢人的聖物還要高尚得多，因爲神父們素來是以昇登天堂來安慰在地上過着奴隸生活的人們的。爲要從這種真正聖物上把神父們所認爲的『神聖性』拋棄無餘，那就必須實際掌握這種聖物，必須做到在實際上正確分配這些聖物，必須把所有的餘糧一無例外地搜集盡淨，作爲全國存糧，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肅清隱藏餘糧和餘糧尚未收

集的現象，必須用工人底堅決手腕做到使人們用最大的努力，來增加燃料採掘量，大大節省燃料，在燃料運輸和消費方面建立極端嚴格的秩序。

須要有先進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到所有一切生產糧食和燃料的區域去，到所有一切運輸和分配糧食燃料的重要地點去，來提高工作的毅力，使工作毅力增加十倍，以便在實行統計和監督事業上幫助各地蘇維埃政權機關，以使用武力消滅那些投機，受賄和疏忽大意的現象。這個任務並不是新的。老實說，歷史並沒有提出新的任務，只是隨着革命規模的增大，革命困難的增長及其全世界歷史任務之意義的增高，而使舊任務底範圍和規模擴大起來。

十月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大而不可摧毀的創舉，就是先進工人以貧民領導者底資格，以鄉村勞動羣衆領袖底資格，以勞動國家建設者底資格，到『民間』去了。彼得城派出了成千成萬的優秀工人到鄉村裏去，其他無產階級中心區也派出了許多優秀工人。爲了同卡列金和杜托夫作鬥爭而組織的戰鬥隊，以及徵糧隊並不是什麼新奇事情。任務只是，由於災禍逼近，情況艱難，而使我們必須作出比以前更增多十倍的工作。

工人成了貧民底領袖，並不就成了聖人。他領導了人民前進，可是他也就染上了小資產階級的腐化病。工人隊伍中最有組織、最有覺悟、最有紀律和最堅決的工人愈益減少，則這隊伍也就愈易腐化，而代表舊時的小私有者自發勢力，也就愈易戰勝代表將來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覺悟性。

工人階級開始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後，並不能一下子就把自身的弱點和毛病拋棄掉。這些東西都是從地主資本家社會，從剝削者和土豪社會，從少數人醜態地營私致富而使多數人遭受貧困的社會中所繼承下來的。可是工人階級是能夠戰勝——並且歸根到底必然會戰

勝——舊世界，能夠戰勝它的弊病及其弱點的，只要工人階級不斷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數日增，經驗日富，在困難鬥爭中所受鍛鍊日多的工人隊伍就行了。

現在俄國底情形正是這樣。單獨奮鬥，分散作戰，決不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必須有先進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出發到幅員廣大的全國各地去。必須增加十倍地派出由有覺悟而矢忠於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所組成的鋼鐵般的隊伍。那時我們就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那時我們就能把革命直接引昇到社會主義的門徑。那時我們也就能於進行勝利的防衛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強盜。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一〇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
第二六至三一頁。

致各省縣蘇維埃電

萬一敵人向顯示力求和平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侵犯時，究竟應當怎樣行動。

（給各地蘇維埃和全體居民的指令）

在烏克蘭常常有過農民和工人反抗把財物運走或就地毀滅的事情，而希圖把這些財物替自己保存起來。結果他們受到了極殘酷的懲罰。外寇一到，便把所有糧食、牲畜、煤炭、五金和機器概行搶走，運回本國去了。烏克蘭底例子應成爲全俄人民的慘痛教訓。

所以，當敵人企圖轉爲進攻時，該地居民務須在自己的蘇維埃領導下，最嚴格遵行下列指令：

首先要將軍用儲存品運走。凡是無法運走的，概應焚燒或炸毀。

穀類和麵粉務須運走或埋藏在地裏。凡不能埋藏的食物，盡行消滅。

牲畜一律趕走。

機器要或整或零運走。不然，便毀滅之。

無法運走的五金，應埋藏起來。

車頭和車箱務必開走。

鐵軌務必拆除。

橋樑要埋上地雷，將其炸斷。

敵後森林和禾稼概行焚燬。

竭力設法阻礙敵人前進。安設埋伏。用刀槍火器與敵人作戰。

保障自己的後方。爲了這個目的，必須把直接間接幫助敵人的一切偵探、奸細、白匪份子、反革命叛徒，概行槍斃。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

人民委員會

人民委員會主席烏里揚諾夫（列寧）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刊載於

真理報第五十四期。

工人同志們！我們去作 最後的決戰呵！

蘇維埃共和國被敵人包圍了。可是它定會戰勝國內和國外的一切敵人。工人羣衆中已顯現出熱情的高漲，這便是勝利的保障。在西歐，革命底火花和革命底爆發已日益頻繁起來，這就使我們相信國際工人革命底勝利已經不遠了。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外的敵人，在目前就是英法和日美帝國主義。這個敵人現時正向俄國進攻，搶掠我國土地，它侵佔了阿爾漢格爾斯克，並已從海參崴前進（如法國報紙所載喬實的話）到烏蘇里江岸尼古拉斯克。這個敵人收買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⁶⁸底將領和軍官。這個敵人向愛好和平的俄國進攻，其殘暴掠奪行爲正如德國人在二月進攻時一樣，但其區別，祇是英日兩國不僅要侵佔和劫洗俄國領土，而且要推翻蘇維埃政權，以便「恢復戰綫」，即迫使俄國再行捲入英德間的帝國主義（簡言之，即強盜）戰爭漩渦中去。

英日資本家想在俄國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好來共同瓜分在戰爭中掠奪的贓物，好使俄國工農去備受英法資本的盤剝，好從他們身上刮得幾十萬萬國債的利息，好來撲滅這已在我國爆發，烽焰騰騰，行將燃燒到全世界去的社會主義革命巨火。

英日帝國主義野獸的力量決不足以佔領和征服俄國。甚至連我們的隣國——德國的力量，都不夠這樣來作，這是德國進攻烏克蘭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的。英日帝國主義者本打算弄得我們措手不及。這種打算沒有成功。首先奮起的是彼得城底工人，接踵而起的有莫斯科工人，繼莫斯科之後又有全中部工業省區底工人，他們

都愈益齊心，愈益堅毅，人數日益衆多，精神日益奮發起來了。這就是我們勝利底保證。

英日資本主義匪寇進攻愛好和平的俄國時，還打算與蘇維埃政權底內部敵人結成聯盟。我們熟知這內部敵人是誰。這就是資本家、地主、富農、他們的子弟，這些都是仇視工人和勞動農民（即不肯殘殺自己同鄉的勞動農民）政權的人。

富農的暴動蔓延於全俄各地。富農對蘇維埃政權憤恨若狂，恨不得把千千萬萬的工人斬盡殺絕。我們明白知道，如果富農獲得了勝利，那他們就會加入地主資本家的聯盟，來無情地屠殺千千萬萬的工人，恢復禁錮工人的苦工牢獄，取消八小時工作制，把工廠重新放到資本家底桎梏之下去。

以前歐洲各次革命中，一當富農利用工人底薄弱性，得以使共和政體退回到君主政體，從勞動者政權又退回到剝削者、富人、寄生虫底專政時，其情形都是如此。在拉脫維亞，在芬蘭，在烏克蘭，在格魯吉亞，我們親眼見過的情形也是如此。到處都是貪婪殘暴的富農與地主資本家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反對一般貧民。到處都是富農以空前血腥手段摧殘工人階級。到處都是富農與外國資本家聯盟來反對本國工人。立憲民主黨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等以前這樣幹過，現在還是這樣幹着；只須回顧一下他們在『捷克斯拉伐克軍團』事件中的勞績就足夠證明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極端愚蠢和毫無氣節，也在這樣行動，他們在莫斯科舉行的叛亂幫助了雅羅斯拉夫里的白軍，幫助了嘉桑城的捷克斯拉伐克軍和白匪；無怪乎這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能博得克倫斯基及其朋友法帝國主義者的稱讚。

毫無疑義，富農是蘇維埃政權底死敵。或者是讓富農來殘殺無數的工人，或者就是工人無情地鎮壓那些佔人口少數的強盜式富農所舉行的反對勞動者政權的暴動。這裏決不能有中間的道路。和平共

處是談不到的：富農可以而且容易與地主、沙皇、神父講和，那怕他們真是吵了嘴的話；可是富農同工人階級是任何時候也不會講和的。

所以我們把反富農的戰鬥叫做最後的決戰。這決不是說，富農不可能舉行多次的暴動，也不是說，外國資本主義不可能進行多次反蘇維埃政權的進攻。「最後」戰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剝削階級中最後的一個階級，而且是其中人數衆多的一個階級，在我國暴動起來反對我們了。

富農是最殘忍，最橫暴，最野蠻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歷史上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和資本家底政權。富農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些。但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是佔少數。

譬如，按以前俄國來說，即是強盜們還沒有把烏克蘭等等地方從俄國奪去以前的時候來說，在我國約有一千五百萬農戶。在這一千五百萬農戶中，大概有一千萬戶是靠出賣勞動力生活，或受富人盤剝，或沒有剩餘糧食，特別是被戰禍弄到破產境地的貧農。中農大約有三百萬戶，而富農，財主和糧食投機者恐怕不會多過兩百萬戶。這些吸血鬼在戰時利用民衆生活困苦而發了大財，他們用提高糧食及其他農產物價格的手段刮得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吸取戰時破產農民底脂膏，專靠吸取飢餓工人底脂膏養肥了。這些吸血鬼吮吸了勞動羣衆底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飢餓，他們也就越加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

舉行無情的戰爭來反對這些富農吧！殲滅他們！痛恨和鄙棄那些保護富農的政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現在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吧！工人們應當用鉄的手腕來撲滅那些與外國資本家聯盟反對本國勞動者的富農所舉行的暴動。

富農利用貧農的愚昧無知和零碎分散的狀況，挑唆他們來反對工人，有時使用收買手段，讓他們去作糧食投機生意，賺百把盧布

『發發小財』（同時又搶劫貧農們成千累萬的金錢）。富農力圖把中農吸收到自己方面，而且這點有時他們也竟如願以償。

但工人階級並不一定要和中農分離。工人階級決不能同富農調和，可是它與中農是可以而且正在設法謀妥協的。工人政府，即布爾什維克政府，已經不是用空話而是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用來證明這點的，是已經通過並在嚴格執行的『土地社會化』法令；在這個法令裏，向中農底利益和觀點作了許多讓步。

我們用來證明這點的，是把糧食價格增加了兩三倍（這是日前的事情），因為我們完全承認，中農所賺得的錢常常與現時工業品價格懸殊，所以應當提高中農這一收入。

每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會向中農解釋這點，並耐心地、堅持地、再三再四地向他們說明，對於中農說來，社會主義是比沙皇、地主、資本家政權有利萬分的。

工人政權從來沒有欺侮過中農，而且決不會欺侮中農。而沙皇、地主、資本家底政權對中農就不僅隨時欺侮而已，簡直是窒息他們，搶劫他們，使他們破產，這種情形，在全世界各國毫無例外，俄國也是一樣。

要與貧農結成極親密的聯盟，與他們完全溶合起來；要對中農讓步和妥協；要無情鎮壓富農，鎮壓這些吸血鬼，惡魔，搶劫人民的強盜，利用飢荒發財的投機者；——這就是覺悟工人底綱領。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政策。

寫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上半月。

一九二五年初次刊載於列寧研究院特刊上。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八頁。

在「紅色軍官日」的演說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代表各人民委員向你們致賀，——列寧說。——當我想到我國軍隊和紅色軍官底任務時，我記起了不久前我在芬蘭鐵路火車箱裏遇見的一件事情。

我看見有羣人聽到一個老太婆說話時都在微笑什麼，就請人把她的話譯給我聽。這個芬蘭老太婆把舊軍隊兵士與革命兵士加以比較，說舊軍隊的兵士是保護地主資本家的，革命兵士却保護窮人。『從前窮人在林子裏拿了一根樹枝，若沒有問過主人的話，就要受到毒打。現在呢，——這個老太婆說，——要是你在林子裏遇見了一個兵士，他還幫忙你把一捆劈柴搬走哩』。她說：『現在用不着害怕帶槍的人了』。

我認爲——列寧說，——對於紅軍說來，再也難想出比這更高貴的獎譽了。

列寧又繼續說，舊軍官多半是嬌養腐化了的資本家子弟，他們與普通兵士是格格不相入的。所以現在建立新軍隊時，我們應當只用從民衆出身的人充任軍官。只有紅色軍官才會在兵士中享有威信，才能夠在我們軍隊中鞏固社會主義。這樣的軍隊定會是不可戰勝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載於全俄中央執委新聞報第二百五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二九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了考茨基著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 (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六三頁)，這本小冊子乃是最明顯不過地證明各國一切忠誠的社會主義者所老早就指出的第二國際已遭到最可恥與最澈底破產的實例。現在，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底叛徒詭辯及其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加以分析，是很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提到，從歐戰剛一開始時起，本書作者就已屢次指出過考茨基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國外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與共產主義者雜誌上，已有過多篇論文講到這點。這些文章，曾由彼得格拉蘇維埃彙刊成書，標名為反潮流，季諾維也夫與列寧合著，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出版（共五五〇頁）。我於一九一五年在日內瓦出版的當時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一本小冊子上，關於「考茨基主義」曾這樣寫道：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乃是一種最標本和最顯著的例證，表明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如何弄到在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為「司徒盧威主義」或「布連坦諾主義」」（即變為承認無產階級底非革命「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而將這

種學說表現得特別明顯的，就是俄國作家司徒盧威與德國經濟學家布連坦諾）。『我們從普列漢諾夫的例子也可以看到這點。他們用彰明較著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生動精神，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當中的一切，除了革命的鬥爭手段而外，除了鼓吹和準備這些手段以及用這種精神去教育羣衆而外，其他都加以承認。考茨基無原則地把此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這一社會沙文主義基本思想，與在表決軍事預算時投棄權票及在口頭上表示其反對黨姿態等等而向左派所作外交式外表上的讓步『調和』起來。一九〇九年，考茨基著有論述革命時代逼近以及戰爭與革命有聯繫的專書；一九一二年，考茨基簽名贊成過主張利用即將到來的戰爭以進行革命的巴塞爾宣言，現在他却百般辯護和粉飾社會沙文主義，並且也同普列漢諾夫一樣，甘願附和資產階級，譏笑一切革命意圖以及進行直接革命鬥爭底任何步驟。

工人階級若不無情反對這種叛徒立場、無氣節性、對機會主義獻媚以及在理論上空前俗化馬克思主義的行爲，便不能實現其全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決非偶然現象，而是第二國際矛盾底社會產物，即口頭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和實際上屈服於機會主義的社會產物』（見季諾維也夫與列寧合著：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一九一五年，日內瓦出版，第一三至一四頁）。

其次，我在一九一六年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一九一七年彼得格拉出版）一書中，曾詳細地批判了考茨基關於帝國主義的一切議論在理論上的荒謬性。當時我引用過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我曾指明出，這個定義是完全不正確的，其目的是『適應』於抹煞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以及同機會主義調和。我提出了我

自己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業已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業已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業已完結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我曾指出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甚至還不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它的批評。

最後，我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即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前夕，著有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一九一八年初在彼得格拉出版），在該書第六章，即論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一章中，我曾特別提到考茨基，證明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馬克思學說，將其贗造成為機會主義，我說『他在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却背棄了革命』。

其實，考茨基在其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也就是他對於馬克思底國家學說所作的機會主義曲解，這種曲解已被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揭露出來了。

這幾句卷頭語，我認為是必要的，因為從這裏可以看出：還在布爾什維克尚未奪得政權和考茨基尚未以此責備布爾什維克以前很久，我就已公開斥責過考茨基為叛徒了。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 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冊子中所講到的基本問題，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於各先進國，尤其是對於各交戰國，尤其是在目前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全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加以仔細說明。

考茨基曾這樣提出問題：「這兩個社會主義派別（即布爾什維克與非布爾什維克）的對立，乃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即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的對立」（第三頁）。

這裏我們要順便說明一句，考茨基把俄國的非布爾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稱為社會主義者，是只以他們的名稱，即只以他們的空話，而不以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所佔的實際地位為根據。這是何等高明地來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啊！但關於這一點，讓我往下再比較詳細的去說吧。

現在應當說明的是主要之點，即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根本對立」這個偉大發現。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考茨基那本小冊子底全部實質就在這裏。這真是怪誕絕倫的糊塗理論，這真是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所以必得承認說，考茨基是遠遠超過伯恩施坦之上了。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國家對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係問題。看起來這已是明如皎日了。

然而考茨基好像專門背誦歷史教科書的中學教員似的，固執地把背對着二十世紀，把面朝着十八世紀，第一百次乾燥無味地在該書許多篇章中反復咀嚼着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君主專制與中世紀制關係的爛調！

真像在大夢裏咀嚼樹皮哩！

這根本是文不對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的這種企圖，祇能令人發笑而已。考茨基之所以必須用這種空話來抹煞並混淆問題，是因為他按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問題，祇是說什麼一般的民主制，而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他甚至避開這個確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講什麼「社會主義前期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在全書六十三頁中佔了二十頁）篇幅的這位空談家底空談，是資產階級所非常樂聞的，因為這套空談等於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考茨基所標榜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華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空話之後，也只好引出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話來。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怎樣做了這件事，這簡直是一齣大滑稽劇！聽呵：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宣稱為蔑視民主制的見解）「所根據的，祇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字」。——考茨基在該小冊子第二〇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六〇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爲（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字眼」（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ch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個「字眼」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議論稱爲一個「字」，甚至稱爲一個「字眼」，——這簡直是污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把馬克思著作讀得幾乎能橫流倒背的一個人；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裏或腦袋裏定是藏有許多木箱，其中把馬克思底全部著作都擺列得極有條理，極便於隨時引證。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在通信中或刊印的著作中，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過許多許多次，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前後這個時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公式不過是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任務在歷史上更具體的和科學上更確切的說明而已；關於這個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從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這四十年過程中，都是時常說到的。

爲什麼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竟會如此怪誕絕倫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呢？如果說到這種現象底哲學基礎，那這就是用折衷論與詭辯說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原是最會耍這套偷換把戲的能手。如果從政治與實際內容來看，那這就是効忠於機會主義者，即歸根到底是効忠於資產階級。自歐戰開始時起，考茨基在這口頭上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做資產階級奴僕的藝術方面，真是突飛猛進，巧奪天工了。

當你去考察考茨基如何巧妙地「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字眼」的時候，你就會更加相信這一點。聽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較爲詳細地指示出，他究竟怎樣了解這個專政」…（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談，因爲馬克思與恩格斯恰

恰有過許多極詳細的指示，不過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故意加以抹煞罷了。) …「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獨裁與君主專制的區別，就是前者不是一種經常的國家機關，而是一種暫時的極端辦法。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既然不是說個人專政，而是說一個階級專政，就可見馬克思說到專政時決不是指該字底本義而言。

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指凡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地方所必然出現的那種狀態。單就馬克思認為蘇美可以和平地實現過渡，即用民主方法來實現過渡的這個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專政並不是指管理形式而言了」（第二〇頁）。

我故意把考茨基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好使讀者能夠明顯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所運用的是怎樣的一種手法。

考茨基想先從專政這「字」底定義來着手觀察問題。

好極了。觀察問題時採取任何一種方法本是每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要把觀察問題的真誠態度與不誠意態度分別清楚。誰想用這種方法去認真觀察問題，他就必須作出他自己對於這個「字」的定義。那時，問題就會提得清楚而直爽。考茨基却不這樣做。他說：「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

第一，這不是定義。既然考茨基不願意對於專政這一概念下個定義，那末他為什麼又採取這種方法來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不正確。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會講到一般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忘記提出究竟「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問題。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

代奴隸底起義或激烈的騷動，立刻就暴露出古代國家底實質是奴隸主底專政。試問這個專政毀滅了奴隸主中的民主，即供奴隸主享受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是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講出這種怪誕絕倫的謊言爛語，是因為他「忘掉了」階級鬥爭…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義的虛假論斷變為馬克思主義的和合乎真理的論斷，那就必須說：專政的意思不一定要毀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但它一定是要毀滅（或加以極重大的限制，這也就是毀滅底形式之一）受專政所制壓或受專政所反對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怎樣真確，然而它並沒有作出一個專政底定義。

我們且來考察考茨基其次的話吧：

…「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兒用鼻子隨便東嗅西嗅，偶然在這裏嗅到了一種真確的意思（就是說，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還是沒有作出專政底定義來；此外他又說出了歷史上明明不正確的議論，彷彿專政就是個人獨裁。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行專政的也可能是一小羣人，或是寡頭，或是一個階級等等。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專政與君主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解說顯然是不正確，但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所研討的問題完全無關。考茨基愛把自己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時代，他的這種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的無產階級達到專政之後，會估計到考茨基底這種嗜好，譬如說，要叫他到中學裏去充當古代史教員吧。用關於君主專制的機智推論來

避免作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這若不是極端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拙笨的欺詐伎倆。

總之，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的時候，講了一大堆顯然不正確的廢話，却沒有作出任何定義來！他本來可以不依靠本人的才智，祇憑自己的記憶力，從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述專政的一切語句來。要是這樣，他就一定能得到下面這個定義或實質上與此相符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藉於強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所獲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這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即羣衆底代表，而不是如像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這班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僧混蛋底上層份子）都明如皎日的真理，這對於每個爲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這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無待爭辯的真理，我們竟必須『用戰爭手段』才能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裏把它『解救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可鄙諂媚者，即第二國際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始而玩弄了一套偷換把戲，公然胡說八道，硬說『專政』底本義是表示個人獨裁，隨後他——根據這種偷換把戲！——就聲明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沒含有該字底本義（而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的強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制度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與『管理底形式』區別開來。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像我們竟把一個拙於推論的人底愚蠢『狀態』與其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爲『統治底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二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爲那時就能使革命

的強力化爲烏有，使強力的革命化爲烏有。「統治底狀態」就是一種在…「民主制度」下可以有任何一種大多數的狀態。運用這樣一套詐術，就能安然無事地使革命化爲烏有了。

但這套詐術實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專政底前提和意思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採用叛徒們所不高興的那種革命強力底「狀態」，這是誰也隱瞞不了的真理。所謂「狀態」與「管理形式」有區別，這種議論之荒謬可笑，是顯而易見的事。在這裏談什麼管理形式便是加倍愚蠢，因爲連三尺之童也知道君主國與共和國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解釋，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底各種變態而已。

末了，談論什麼管理形式，就不但是愚蠢，並且是粗魯地偽造馬克思底意思，因爲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分明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機器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種新的機器，如恩格斯所說：「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與歪曲，因爲他那叛徒的立場使他非這樣作不可。

試看他所運用的是怎樣卑鄙無聊的遁詞吧。

遁詞一：「單就馬克思認爲英美可能有和平的變革，即用民主方法實現的變革這一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不是指管理底形式而言了」…

這裏絕對談不到什麼管理底形式，因爲例如有些並非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君主國並沒有軍閥機關，而例如有些本是標本式資產階級國家的共和國却具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這是大家知道的歷史上與政治上的事實，是考茨基所無法偽造的。

若是考茨基肯認真地誠意地談論問題，那他就會要自問一下：有沒有關係於革命而絕無例外情形的歷史規律呢？那時他的回答便是：這樣的規律是沒有的。這樣的規律所指的祇是標本式的現象，即『理想式的』現象，如像馬克思有一次把中等的、常態的、標本式的資本主義稱爲『理想式的』資本主義。

其次，就我們現在所探討的這點來說，在前世紀七十年代是否有使英美成爲例外的因素呢？凡屬稍有歷史科學常識的人，都顯然知道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的。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偽造科學，就是玩弄詭辯。但一提出這個問題，便無疑地要得出下面這個回答：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乃是用強力手段反對資產階級；這種強力手段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爲存在有軍閥機關與官僚制度，關於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屢次極詳盡地說明過（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序言上）。但是，恰恰當馬克思說出這個意見時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兩國恰恰沒有存在這些機關（而現在，這樣的機關在英美也有了）。

考茨基爲要遮掩他的叛徒立場，所以處處只好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這裏如何偶然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是用民主的方法！！

在作專政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曾拚命向讀者隱瞞專政這個概念底基本標誌，即革命的強力。可是現在真相畢露了：問題正是關於和平變革與使用強力的變革二者間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考茨基之所以要運用一切遁詞、強辯和贗造，爲的是要避開強力革命，爲的是要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爲，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去，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爲。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

『歷史家』考茨基這樣無恥地假造歷史，以致忘掉了一件基本

事實：壟斷制前期的資本主義（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也就是這種資本主義底極盛時期），由於它在英美表現得特別標本化的那些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比較最愛和平、最愛好自由的特徵。但是帝國主義，即僅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也是由於自己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最不愛好和平，最不愛好自由，軍閥機關最爲發展且到處發展的特徵。在談論和平變革或是強力變革怎樣標本和怎樣可靠的問題時，竟『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無異是墮落爲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奴僕了。

通詞二：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未曾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純粹民主制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如果無產階級佔有大多數的話』（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S. 21）。

考茨基底這種論據，荒謬絕倫，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底精華、大本營和上層份子，都從巴黎逃亡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這又表明考茨基所謂在公社中有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參加的說法完全是造謠。把當時巴黎居民分成了兩個交戰營壘而其一方集中有一切鬥爭頑強與政治積極的資產階級份子的這種情形，說成爲『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制』，這豈不是太可笑了麼？

第二，公社同凡爾賽的鬥爭乃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既然巴黎當時決定着法蘭西底命運，試問那裏怎樣談得上『純粹民主』與『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爲公社因沒有奪取屬於全法蘭西的銀行以致籌成大錯的時候，難道他是根據『純粹民主』的原則與實踐來出發的麼？

幸而考茨基著書立說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們『成羣結隊』發笑的國家，不然考茨基真會被人笑死呵。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請熟讀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回憶一下恩格斯從…『純粹民主』的觀點上對於公社所作的如下估計：

『這些先生』（指反威權主義者）『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砲，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為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

你們看，這就是『純粹民主制』！一個異想天開，竟在階級社會中一般地講什麼『純粹民主制』的卑鄙市儈『社會民主黨人』（是指此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國的用法，以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在全歐洲的用法而言），該會怎樣受到恩格斯底嘲笑呵！

夠了，要想把考茨基所說的一切無稽之談盡行列舉出來，當然是做不到的事，因為在他的每一字句中間都充滿了絕頂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與恩格斯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就在於毀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嘗試。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所以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陳舊了的』（有些部份）綱領祇作了這樣一個修改。馬克思與恩格斯特別指明公社實行消滅了軍隊和官僚制，消滅了國會制，破壞了『寄生的贅瘤，即國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居然傻頭傻腦，安閑自得地重複着自由主義教授們所千番百次說過的東西，即關於什麼『純粹民主制』的童話。

難怪盧森堡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已是一具臭屍了！

遁詞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那我們就不能說是階級專政。因為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過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祇有「組織」或「政黨」。

「糊塗顧問」先生，你真弄糊塗了，糊塗到了萬分！專政當然不是「管理底形式」，這樣胡扯是很可笑的。馬克思所講的也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這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是那回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全然不對的；這種廢話祇有那些除了資產階級國會外什麼也看不見，除了「當權政黨」外什麼也不注意的「國會迷」，才說得出來。考茨基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中都可看見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這樣，雖然他們的組織性是不充分的。

結論：考茨基簡直是空前未聞地曲解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概念，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了自由主義者的地步，祇有自由主義者才妄談什麼「純粹民主制」的鄙陋言論，掩飾並抹煞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階級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所採用的革命強力手段。當考茨基這樣「解釋」「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底概念而竟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施行的革命強力化為烏有時，他就在用自由主義態度來曲解馬克思的事業上打破了全世界的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後生小子了。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考茨基弄得一場糊塗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樣。

若不嘲弄健全思想和歷史，那問題就很明顯：當有各種階級存在的時候，決不能說什麼「純粹民主制」，而祇能說階級的民

主制。(附帶說說，『純粹民主制』不但是暴露出既不懂階級鬥爭，也不懂國家實質的愚昧之論，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為習慣而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民主制)。

『純粹民主制』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既有代替封建制而起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起的無產階級民主制。

考茨基幾乎花費了幾十頁篇幅來『證明』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制度是進步的，又說無產階級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制，這類的話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空談。須知這不但在文明的德國，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國，也是盡人皆知的真理。考茨基擺起一副尊嚴十足面孔來談論惠特林，談到巴拉圭的耶穌教士，還談到許許多多別的東西，都不過是用那套『學者』謊話來蒙哄工人，為的是迴避現代民主制，即資本主義民主制之資產階級的實質。

考茨基從馬克思主義中僅擇取那些對於自由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是可能接受的東西（如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一般是資本主義和局部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底歷史進步作用），而把馬克思主義中對於資產階級是不能接受的東西（如無產階級為了消滅資產階級而採用革命強力手段反對資產階級）拋棄掉，抹煞掉和隱瞞起來。所以，不管考茨基底主觀信念怎樣，但其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為資產階級的奴僕。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制度雖有偉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之下不能不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民主，對於富者為天堂，對於貧人和被剝削者為陷窄為騙局。正是這個為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最重要組成部分的真理，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所不了解的。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用科學批判態度去揭露出那些使一切資產階

級民主制變為專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的條件，反而一味去博取資產階級底「歡心」。

我們首先要向博學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馬克思與恩格斯那些竟被我們這位熟讀死記的學究可恥「遺忘了的」（為逢迎資產階級而遺忘了的）理論主張，然後再來作一最通俗的說明。

不僅古代的和封建時代的國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⁵⁹）。「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利用來以強力鎮壓自己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為着自由，而是為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恩格斯給伯伯爾的信）。「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恩格斯為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普選制是「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的東西」（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考茨基先生把這個論點中，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前半段不怕令人厭惡地再三加以咀嚼。對於我們加上了着重點而為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後半段，叛徒考茨基却隱瞞不說了！

「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這裏，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 und zertreten），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使其能為自己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員，正好似個人選舉權為了同一目的服務於任何一個工廠主一樣」（見馬克思論巴黎公社的著作法蘭西內戰一書）。

這些原理是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所熟聞深知的，其中每一點

都在痛擊他的臉嘴，揭發他的全部叛徒立場。在考茨基底整本小冊子中，連瞭解這些真理的影子都是沒有的。他這一小冊子底整個內容都是在揶揄馬克思主義！

試看現代國家底基本法律，試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制，試看集會自由或出版自由，試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你處處都能看見每個誠實而有覺悟的工人所熟知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虛偽性。世界上無論哪一個國家，那怕是最民主的國家也好，在它們的憲法上總有許多漏隙或限語，以保證資產階級『在有人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壓迫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狀態和企圖不像奴隸那樣俯首聽命時，有可能調遣軍隊來鎮壓工人與施行軍事戒嚴等等。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而對於像美國或瑞士最民主與最帶共和派色彩的資產者之反對罷工工人的這種行動，則緘默不言。

呵，聰明而博學的考茨基，關於這一點，是保持緘默的！他，這位博學的政治活動家殊不知對這點表示緘默，就是卑鄙齷齪。他寧願向工人們講一些什麼民主是意味着『保護少數』這類的童話。這真妄誕得難於令人置信，但這是事實！在耶穌降生後第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第五年度，在一切『民主國』中迫害國際主義者（即那些不像倫諾德爾和龍格輩，不像謝德曼和考茨基輩，不像亨德孫和維伯輩那樣無恥叛變社會主義的人們）少數的第五年度，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他那甜蜜蜜的歌喉頌揚着『保護少數』。誰願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去讀讀考茨基這小冊子的第一五頁。而在同書第一六頁上，這位博學先生還會把十八世紀英國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說給你聽哩！

唔，好一個博學精神！唔，好一個向資產階級纖巧獻媚的奴僕態度！唔，好一個卑躬屈膝替資本家舐皮靴的文明樣子！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勒孟梭或倫諾德爾，那我就要用百萬黃金來

報酬考茨基，用猶渥大底接吻來獎賞他，在工人面前稱讚他，勸他們去與考茨基這樣『可敬的』人們保持『社會主義底統一』。著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侈談十八世紀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硬說民主是意味着『保護少數』，而把『民主』共和制美國之摧殘國際主義者的事實隱諱不談，難道這不是奴顏婢膝地効忠於資產階級嗎？

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統治黨僅僅對於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才實行保護少數，而對於無產階級則在一切嚴重、深刻和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實行『保護少數』，反而橫施軍事戒嚴或摧殘蹂躪。民主制愈是發達，則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政治分歧時，摧殘或內戰也就愈加容易發生。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這個『規律』，原是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國法蘭西的德來福斯事件中，在民主共和制的美國所施及黑人與國際主義者的私刑中，在民主制的英國對於愛爾蘭與烏爾斯脫的實例中，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民主共和國俄羅斯對布爾什維克的壓迫與摧殘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但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和平時期的例子。甘言蜜語的考茨基先生寧願閉眼不看二十世紀的這些事實，却來向工人叙說一些關於十八世紀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非常新鮮，極端有趣，特別值得注意，格外重要的故事。

且拿資產階級的國會來看吧。能不能說博學的考茨基從來不曾聽見過民主制發展得愈厲害，則交易所和銀行家就愈加能操縱資產階級國會的事實呢？從這裏當然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布爾什維克之利用國會制，可說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更有成效，因為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內，我們在第四屆杜馬中獲得了全部工人代表議席）。但從這裏應當得出結論說，祇有自由派才會像考茨基一樣忘記資產階級國會制在歷史上的局限性與條件性。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內，被壓迫羣衆隨時隨

地都可遇見資本家「民主制」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與千百種使無產者成爲僱傭奴隸之事實上的限制和排斥辦法間極相矛盾的情形。正是這種矛盾使羣衆認清了資本主義底腐敗、欺騙和虛偽。正是這種矛盾係由社會主義底宣傳家與鼓動家在羣衆面前不斷地加以揭露，以便準備這些羣衆去進行革命！然而當革命的新紀元已經開始之際，考茨基却立刻搖身一轉把背對着革命，來讚美垂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妙處。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形式之一即蘇維埃政權，正是爲絕大多數民衆，即爲被剝削勞動羣衆把民主制發展與擴大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如像考茨基那樣寫出一整本論民主制的書，其中有兩頁說到專政，有幾十頁說到什麼「純粹的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等於是用自由主義的態度來完全曲解問題。

拿對外政策來說吧。無論在哪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內，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都是欺騙羣衆，而在民主制的法國、瑞士、美國、英國，這樣的欺騙比其他國家更廣泛百倍，巧妙百倍。蘇維埃政權用革命手段揭破了對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對於這一點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對於這一點默而不言，雖則這點在進行掠奪戰爭與簽訂「分割勢力範圍」（即由資本家強盜分割世界）的祕密條約時代，是有根本重大的意義，因爲和平問題即千百萬人的生死問題，都是以此爲轉移的。

拿國家底結構來看吧。考茨基極力抓住一些「小事情」，運選舉係「非直接的」（在蘇維埃憲法內）這點也說到了，但問題的本質，他却沒有看見。國家機關，國家機器底階級實質，他却沒有注意到。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資本家用千百種詭計（「純粹的」民主愈是發達，則這種詭計愈加巧妙，愈有效力）來排除羣衆，使其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

第一個（嚴格說來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過）吸引羣衆，即被剝削羣衆來參加管理的政權。勞動羣衆之參加資產階級國會（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國會從來沒有解決過有最嚴重意義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明白知道而且覺得，都看見而且感觸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人階級即少數剝削者底機關。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羣衆自己的直接組織，它使他們易於盡量由自己來建立國家，在各方面管理國家。這裏，恰恰是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即城市無產階級享有由各大企業把自己極好地聯合起來了的優勢；並且他們最容易實行選舉與監視選舉。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地使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易於聯合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周圍。舊的資產階級機關——官僚制度，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和交情等等特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愈是發達，則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加紛繁）——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都消除了。出版自由不再是虛偽的了，因為印刷所與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裏拿過來了。對於最好的建築物、宮室、公館、地主邸宅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累萬這種最好的房屋都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裏奪過來了，這就使羣衆享有的集會自由權更加「民主」一百萬倍，沒有這種集會自由權，則民主制不過是欺人之談。對於非地方性的蘇維埃採用非直接的選舉制，就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於舉行，使全部機關更加便宜和更加靈活，使其在生活緊張與需要能急速召回自己地方代表或派遣他們去參加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時期，更加接近工農。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制都要更民主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要更民主幾百萬倍。

祇有自覺的資產階級奴僕，或是政治生命已經完全斷送，因受陳腐資產階級書籍所蒙蔽而看不見生動實際生活，腦子裏充滿了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了資產階級走狗的人，才能看不見這一點。

祇有那些不會從被壓迫階級底觀點上提出問題的人，才能看不見這一點。

試問在全世界上哪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裏，其中中等的普通的工人，中等的普通的僱農，或一般的鄉村半無產者（即被壓迫羣衆中的份子，絕大多數民衆中的份子），能夠多少像在蘇維埃俄羅斯一樣，享有在最優良大廈內開會的這種自由，享有利用最大印刷所與最好紙張貯藏室來表示自己思想、保護自身利益的這種自由，享有提出正是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去「建設」國家的這種自由呢？

在任何一國內，考茨基先生要想從一千個略知時務的工人與僱農中間，那怕找到一個在回答這問題時表示懷疑的人，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全世界的工人們從資產階級報紙上聽到一些承認真理的片斷消息，就本能地同情於蘇維埃共和國，正因為他們認定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是供貧人享受的民主制，決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甚至最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實際上都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

管理我們的（以及「建設」我們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在內），被壓迫階級中千百萬人們從自己生活經驗中所知道的，每日感覺到和接觸到的，簡單明顯而無可爭辯的真理。

至於在俄國，却已經完全打毀了官僚機關，澈底打毀了這種機關，把一切舊的法官完全趕走了，把資產階級的國會解散了，而建

立了恰恰是使工農容易參加得多的代議機關，用他們的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是由他們的蘇維埃監督着官吏，使他們的蘇維埃變成了法官的選舉者。單是這件事實，已足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即現有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要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民主一百萬倍。

考茨基不了解這個爲一切工人所了解的顯明真理，因爲他『忘記了』或『已不會』提出下面這個問題：究竟是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民主？他是從『純粹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制觀點去推論。他所持的論據正像施洛克的論據一樣：只是『一磅肉』，再不管別的東西了。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就只好對博學的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考茨基，提出如下的問題：

被剝削者能與剝削者平等麼？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領袖底著作時竟必得提出這樣的問題來，這真是怪誕萬分，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已動手論到考茨基，就必須向這位博學之士說明，爲什麼剝削者不能與被剝削者平等。

被剝削者能與剝削者平等麼？

考茨基這樣推論道：

（一）『剝削者總是祇佔人口中的極少數』（考茨基底小冊子第一四頁）。

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從這一真理出發，究竟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按馬克思主義觀點，即按社會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關係爲基礎。也可以按自由主義，即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多數人對少數人的關係爲基礎。

若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推論，就應該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這裏所說的是民主制，即是說國家底形式之一）變成他們剝削者階級統治被剝削者的工具。所以當統治着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剝削者還存在的時候，民主國家必然是供剝削者享受的民主制。被剝削者的國家，應當同這種國家根本不同，它應該是供被剝削者享受的民主制和對剝削者實行的鎮壓，而一個階級之被鎮壓，就是表示這個階級不能享受平等權，表示它是被排除於『民主』之外。

若按自由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不服從者則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了。無論是一般國家底階級性或局部地『純粹民主制』底階級性，都用不着去講了；這與問題毫不相干，因為多數就是多數，少數就是少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再沒有別的了。

考茨基恰恰是這樣推論的：

（二）『爲什麼無產階級底統治要採取而且必然要採取同民主制不相容的形式呢？』（第二一頁）。接着他就極詳細而極冗長地說明無產階級方面擁有大多數，並引出馬克思底話以及巴黎公社底選舉票數來加以證明。結論就是：『在羣衆中這樣根深蒂固的制度，沒有絲毫理由要去危害民主制。有時，當有人用強力來壓倒民主的時候，這個制度也不免要採用強力。對於強力，也祇有用強力來回答。但這知道自己係享有羣衆擁護的制度之所以運用強力，祇是爲了保護民主制，而不是爲了消滅民主制。如果它想消滅自己最可靠的基礎，即自己偉大道德權威之深刻泉源的普選制，那它就簡直是自殺了』（第二二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關係，在考茨基的論據中是消失不見了。所剩下的，祇是一般的多數，一般的少數，一般的民主制，以及我們所熟知的『純粹民主制』。

請注意，這些話還是論到巴黎公社時所說的哩！爲了使問題明顯起見，我們且來引用馬克思與恩格斯論到巴黎公社時關於專政所說的話：

馬克思說：

「如果工人…爲要打破資產階級底抵抗，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是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恩格斯說：

「獲得勝利（在革命中）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

恩格斯又說：

「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利用來以強力鎮壓自己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

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間，卽自由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者間，實有天淵之別。考茨基所說的純粹民主制和一般「民主制」不過是「自由人民國家」的另一說法，亦卽純粹無稽之談。考茨基帶着飽有學識，埋頭窗案的書呆子態度，或十歲女孩底天真爛漫神情問道：既然擁有了大多數，那還要專政幹麼呢？但馬克思與恩格斯解釋說：

——爲的是要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

——爲的是要使反動派畏懼。

——爲的是要維持武裝民衆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

——爲的是要使無產階級能夠運用強力去鎮壓它的敵人。

這些解釋是考茨基所全不了解的。他迷戀於民主制底「純粹性」而看不見它的資產階級性，所以他「一貫」認定多數既是多數，就用不着「打破」少數底「反抗」，也用不着運用「強力鎮壓」少數，——只要鎮壓那些破壞民主制的情事就夠了。考茨基迷戀於民主制底「純粹性」，就在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常犯的那個小小的錯誤：亦即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十足欺騙和十足虛偽的平等）看做是實際上的平等！小事情呵！

剝削者決不能與被剝削者平等。

這個真理是考茨基很不喜歡的，但它却是社會主義底最重要內容。

另一個真理：在沒有完全消滅一個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一切可能時，決不能有真正的，實際上的平等。

在首都發生順利的起義或是軍隊騷動時，可以一下子就把剝削者打倒。然而除了完全稀罕的特殊場合外，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子就被消滅的。在一個相當大的國家裏，決不能一舉而剝奪所有一切的地主與資本家。再則，祇是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剝奪，還遠不能解決問題，因爲還需要在事實上剷除地主與資本家，需要在事實上用另一種即由工人管理工廠與田莊的辦法來代替地主與資本家。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決不能有平等，因爲剝削者在多代以來享有教育特權、富裕生活條件和具備各種經驗閱歷，而被剝削者大多數甚至在最先進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也是遭受抑壓、愚昧無知、被恐嚇和被分散了的。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

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祕訣』（習俗，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因為剝削者底國際聯繫是非常大的。至於一部份被剝削者或一部份最無知識的中農和手工業者等等跟着和能夠跟着剝削者走的事實，這已由過去的一切革命所證明，巴黎公社也在其內（因為凡爾賽軍隊中也有過無產者，這是鮑學的考茨基所『忘記』了的）。

在這種實際情況下，若以為在多少深刻的和嚴重的革命中，可能簡單由多數對少數的關係來解決問題，那便是絕大的愚蠢，便是庸俗自由主義者底最蠢笨的偏見，便是欺騙羣衆，向羣衆隱瞞顯明的歷史真理。這個歷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剝削者照例總是進行長久的、堅決的、拚命的抵抗，因為他們比起被剝削者來，在多年內還保持着巨大的實際優勢。剝削者在沒有利用自己的優勢作一次或多次最後的、拚命的戰鬥以前，是決不會像甜蜜蜜的傻子考茨基所甜蜜蜜幻想的那樣，來服從被剝削者大多數底決議的。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為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曾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

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如像我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在這種實際情況下，在進行拚命的激烈戰爭時代，當歷史已提出了千百年特權底生死存亡問題的時候，竟說什麼多數與少數，什麼純粹的民主制，什麼專政沒有必要，什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平等！該要何等愚蠢，何等庸俗，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啊！

但是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止這幾十年的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時代，却使極力遷就機會主義的各國社會黨內，積滿了庸俗，近視，叛變思想的穢物…。

* * *

讀者大概已覺察到，考茨基在以上我們從他那本書中所摘引來的一段話內，說到什麼侵害普選制（在這裏，我們要附帶說說：考茨基稱普選制爲偉大道德威權底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時候，却說的是憑藉武裝民衆威權反對資產階級；把庸人與革命者雙方對於『威權』的見解來作一比較，是很值得注意的…）。

必須指明一下，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是假仁假義，硬把他的小冊子標題爲反布爾什維克，那末這本小冊子就會名符其實，而考茨基也就有權直接說到選舉權了。但是考茨基首先想以『理論家』資格來寫文章。他却把自己的小冊子標名爲一般論無產階級專政。他祇在該小冊子後半部中，從第五節起，才特別說到蘇維埃與俄羅斯。在前半部中（我所引證的話也就是從這半部中摘出的）却說的是一般的民主與一般的專政。考茨基既然講到選舉

制，他便暴露了自己是爲反對布爾什維克而進行論戰，而這種論戰也就沒有絲毫理論的氣味了。原來理論，即說明民主與專政底一般的（而不是民族特殊的）階級基礎的論斷，不應該去談如像選舉權那樣的特殊問題，而應該談一般的問題：即在推倒剝削者而用被剝削者底國家來代替剝削者國家的歷史時期，民主制是否能也爲富人，即爲剝削者保持起來呢？

理論家就是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底實例，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巴黎公社以及論到巴黎公社時所發出的一切議論。我根據這種材料，例如，已經在十月革命前所寫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上，分析了民主與專政的問題。至於限制選舉權這點，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現在應該說，限制選舉權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特殊國家中的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論到限制選舉權問題時，就應該研究俄國革命底特殊條件及其發展底特殊道路。這點是我在以後的敘述中要加以說明的。但如果預先担保說，歐洲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是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限制資產階級底選舉權，那就會是錯誤的了。這種限制也許是可能的。在大戰之後，在有了俄國革命經驗之後，這種限制想必會是的，但它並非爲實現專政所必需，它並不是專政這一邏輯概念底必要標誌，它並不是專政這一歷史概念與階級概念底必備條件。

專政底必要標誌與必備條件，就是用強力壓倒剝削者這個階級，因而也就是破壞「純粹民主制」，即是說，破壞對於這個階級的平等與自由。

理論上應該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考茨基既沒有這樣提出問題，就證明他不是以理論家的資格，而是以向機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資格來反對布爾什維克。

究竟在哪些國家裏，在某種資本主義底哪些民族特點上，將對剝削者底民主權利採取（完全地或大半地）某種限制和破壞手段，

這是某種資本主義和某種革命底民族特點問題。理論問題並不在這裏，而是在於：若不破壞對於剝削者階級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恰恰把這個在理論上唯一重要而有實際意義的問題迴避不說。考茨基從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各種各樣的話，恰恰沒有引用與本題有關，亦即我在上面所引證過的話。

考茨基講盡了一切，講盡了為自由主義者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能接受而不出乎他們思想範圍之外的一切，所沒有講到的恰恰就是主要的東西，即無產階級若不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若不用強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而凡是在採用「強力鎮壓」手段的地方，在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這是考茨基所沒有了解的。

* * *

現在我們就要講到俄國革命底經驗，講到蘇維埃與立憲會議之間致使必須解散立憲會議和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那種分歧。

蘇維埃不可以變為國家組織嗎

蘇維埃乃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如果著書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真正研究過這種現象（而不是如像考茨基附和孟什維克曲調那樣來重複小資產階級反對專政的悲嘆），那末這樣的理論家就會先作出專政底一般定義，然後再來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即蘇維埃，並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之一來加以批判。

當然，在考茨基用自由派手法來「修琢」了馬克思關於專政的學說之後，希望他再說出什麼有嚴重意義的東西，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考茨基如何研究什麼是蘇維埃的問題以及他怎樣解決了這個問題，倒是十分有趣的事。

他回憶到一九〇五年蘇維埃底產生時寫道：蘇維埃造成了『無產階級組織中最能包羅一切的（umfassendste）一種組織形式，因為它把一切僱傭工人都包括進去了』（第三一頁）。在一九〇五年，蘇維埃不過是地方的團體，而在一九一七年間，却變成了全俄的聯合。

考茨基又繼續說：

『蘇維埃的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偉大光榮的歷史。它的未來歷史一定還更加偉大，而且不祇限於俄國而已。到處可以看到，要抵抗財政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所擁有的雄厚勢力，無產階級用以進行經濟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是不夠的了』（原文為 versagen；這個德文字比『不夠』一語的意思稍強，而比『無力』一語的意思又稍弱）。『這些舊方法是不能拋棄的，在平常的時候，它們還是必要的；但是有時會發生一些為這種方法所不能解決的任務，此種任務祇有當工人階級集中一切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工具時，才能順利解決』（第三二頁）。

接着他就說到羣衆罷工，說到『工會官僚』也同工會一樣是必要的，但『它不適用於領導那些日益成爲時代特徵的強大羣衆戰鬥』…

考茨基得出結論說：

…『這樣看來，蘇維埃組織乃是現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在行將到來的勞資間最後的諸大決戰中，蘇維埃組織將起決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可否向蘇維埃要求更多的東西呢？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指新曆說，若照我國舊曆卽爲十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佔得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在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後，竟把向來是一個階級底

戰鬥組織的蘇維埃，變成爲國家組織。他們毀滅了俄國人民在三月革命（指新曆說，若照我國舊曆卽爲二月革命）中所獲得的民主制。由是布爾什維克也就不再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而稱自己爲共產黨人了』（第三三頁，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

凡屬讀過俄國孟什維克著作的人，立刻就會看到考茨基如何盲目地抄襲了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與史騰之流的言論。真正是『盲目』抄襲，因爲考茨基簡直可笑地曲解事實去適應孟什維克的偏見。例如，考茨基竟未顧到要去問問他的通訊員，如在柏林的史騰或在斯托哥爾摩的阿克雪里羅得，關於布爾什維克改名爲共產黨人以及蘇維埃應成爲國家組織的問題，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作了這種簡單的查訪，那他就不會寫出這段令人可笑的話來，因爲布爾什維克提出這兩個問題都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例如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寫的『提綱』中，即遠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的時候（更不必說是遠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以前的時候了）。

但我所完全引來的考茨基這段議論，便是蘇維埃全部問題底關鍵。關鍵就在於蘇維埃應否力圖變爲國家組織（布爾什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已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布爾什維克黨底代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又聲明他們不以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爲滿足，他們要求巴黎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工農共和國）；——或是蘇維埃不應該力圖這樣做去，不應該奪取政權，不應該變爲國家組織，而應該保留爲一個『階級』底『戰鬥組織』（如馬爾托夫所說的那樣，他說這話的目的，是想用純樸幼稚的願望來掩飾蘇維埃在孟什維克領導下曾是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工具這一事實）。

考茨基盲目地重複了馬爾托夫底話，截取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作理論爭辯中的一些片斷，且毫無批評，毫無意義地將這些片

斷議論移植到一般理論的，一般歐洲的基地上去。結果弄成這樣一團糟，使每一個俄國覺悟工人看到上述考茨基底這段議論時，不免要捧腹大笑。

當我們向一切歐洲工人來說明事實真相時，那末，考茨基也定會受到他們（除了極少數頑梗不化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外）同樣的嘲笑。

考茨基本想幫馬爾托夫的忙，結果反而害了他，因為他把馬爾托夫的錯誤十分明顯地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試看看從考茨基底論據中所得出的結論吧。

蘇維埃包括一切僱傭工人。用無產階級進行經濟與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去反對財政資本已是不夠的了。蘇維埃不僅在俄國將起偉大的作用。它們在歐洲勞資間的諸大決戰中，將起着決定的作用。這都是考茨基所說的話。

好極了。「勞資間的決戰」是不是要解決這兩個階級中哪一階級將獲得國家政權的問題呢？

決不是啊！

在「決」戰中，包括一切僱傭工人的組織，是不應該變為國家組織的！

究竟什麼是國家呢？

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

總之，被壓迫階級，現代社會中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應該努力去進行「勞資間的決戰」，但不應該去觸犯資本所用以鎮壓勞動的機器！不應該破壞這個機器！不應該利用自己那包羅一切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極了，妙極了！「我們」承認階級鬥爭，——也如一切自由派承認它那樣，即是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由此就可明白看出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完全脫離

的事實。這是實際上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因為資產階級除了它所壓迫的那個階級底組織變成為國家組織這點以外，是什麼都可以容許的。這裏，考茨基已是絕對無法挽救他那調和一切、用空話搪塞一切深刻矛盾的立場了。

或者是考茨基根本反對國家政權轉歸工人階級手中，或者就是他容許工人階級取得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但無論如何不容許它破壞和打碎這個機器而代之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論是這樣或那樣來『解釋』和『說明』考茨基底議論，而考茨基之脫離馬克思主義與投降資產階級的事實，總是十分明顯的。

馬克思還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勝利的工人階級需要何種國家時就寫過：『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現在居然有一個自命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起來聲明，說全體已組織起來並同資本實行『決戰』的無產階級，不應該把自己的階級組織變為國家組織。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說『在德國已經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的『國家迷信』，便是考茨基在這裏所暴露出來的東西。我們的這位庸人『同意』說：工人們！你們鬥爭吧！（這是資產者也『同意』的，既然，工人橫豎是要鬥爭的，那就只好想到怎樣去挫折他們的劍鋒罷了）——鬥爭吧，但是你們決不要取得勝利呵！不要破壞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不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正同意馬克思主義認定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的觀點，誰對於這個真理多少經過思考，那他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荒唐話，說什麼能夠戰勝財政資本的無產階級組織不應該變為國家組織。小資產者底立場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來了，因為在小資產者看來，國家『總歸是』一種什麼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究竟為什麼無產階級可以『獨自一個階級』去同那不僅統治無

產階級而且統治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實行決鬥，却不可以『獨自一個階級』把自己的組織變為國家組織呢？因為小資產者懼怕階級鬥爭，不能把這種鬥爭進行到底，進行到最主要的地步。

考茨基完全弄糊塗了，他把自己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來了。你們看，他親口承認歐洲現在正走向勞資間的決戰，承認無產階級用以進行經濟與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用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那麼？..

考茨基害怕再進一步去推想從這裏究應得出什麼結論。

…那麼，祇有反動派，祇有工人階級底敵人，祇有資產階級底走狗，才能在現時去粉飾資產階級民主制底姿態，空談什麼純粹民主制，把面孔轉對着已過時的往昔。資產階級民主制同中世紀制度比較，曾經是進步的，而且那時是應該加以利用的。但現在，它對於工人階級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不應該向後望，而應該向前看，應該拿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如果說，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即教練與編制無產階級隊伍的工作，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範圍內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那末到了應該實行『決戰』的時候，還把無產階級限制在這種範圍內，這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這就是叛徒行爲了。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境地，因為他重複了馬爾托夫底論據，却没有覺察到馬爾托夫所持的這個論據是憑藉於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個論據上的！馬爾托夫說（而考茨基則跟着他重複說），俄國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由此自然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蘇維埃從鬥爭的機關變為國家的組織，為時尚早（請讀作：在孟什維克領袖們幫助下，把蘇維埃變成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機關，倒是適時的）。而考茨基却不能公開斷定說，歐洲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考茨基在一九〇九年間，當他還不是叛徒的時候，曾寫道：

現在懼怕過早的革命是不行的，誰因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公開否棄此種思想，考茨基還不敢這樣作。結果，就得出了把小資產者底全部怯懦與愚蠢澈底暴露出來的荒誕無稽之談：一方面，歐洲已成熟到社會主義，並正走向勞資間的決戰；而另一方面，戰鬥的組織（即在鬥爭中形成，發展和鞏固起來的組織），無產階級底組織，被壓迫者底先鋒隊、組織者及領袖底組織，却又不可變為國家的組織！

* * *

在實際的政治方面，這一認為蘇維埃之為鬥爭組織是有必要但不應該變為國家組織的思想，比在理論方面顯得更加荒謬得多。甚至在和平時期，當還沒有革命形勢存在的時候，工人反資本家的羣衆鬥爭，如羣衆罷工，也要引起雙方極大的憤恨，激起迥非尋常的鬥爭熱情，使得資產階級開口閉口都聲說它仍要保持，而且很想保持其為『家主』的地位等等。但在革命時期，當政治生活緊張沸騰的時候，如像蘇維埃這種包括一切工業部門底全體工人，以至全體兵士，全體勞動者和貧苦農民的組織，由於鬥爭底進程，由於攻守底簡單『邏輯』，必然要直截痛快地來提出問題。妄想站在中間地位來『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種企圖不僅是愚蠢，而且定要遭到慘敗：在俄國，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底宣傳已遭到失敗，在德國及其他各國，如果蘇維埃發展得稍為廣泛並能聯合與鞏固起來，那末這樣的宣傳也必然要遭到同樣的失敗的。對蘇維埃說：鬥爭呀，但不要把全部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不要把自己變為國家組織，這就是宣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和『社會和平』。此種立場，在劇烈的鬥爭中間，除了遭到可恥破產之外決不能達到什麼別的結果。騎牆態度是考茨基底畢生命運。他裝腔作勢地說，他在理論上完全不同意機會主義者，而其實，他關於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問題）都是在實踐上同意機會主義者。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關於立憲會議及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全部小冊子底中心問題。他經常回復到這個問題上來。第二國際思想領袖底這部著作滿篇都是指責布爾什維克『毀滅了民主』（見上面我們從考茨基那裏引來的一段話）。的確，這是一個很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因為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相互關係已經在實踐上擺在革命面前了。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究竟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何觀察這個問題。

他引用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報上發表的我那篇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這似乎是考茨基握有真憑確據，而以莊重態度來討論問題的最好證明了。但是不然，試看考茨基如何引用我的話吧。他既不說這個提綱共有十九條，也沒有說在這些提綱中提出了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又不說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革命中分歧底經過情形。所有這些，考茨基都避開不談，他祇簡單地對讀者聲言，『其中（在這提綱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社會革命黨發生分裂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但在立憲會議召集之前（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五條）；二，一般說來，蘇維埃共和國較之立憲會議乃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三條）。

祇是從這提綱第三條上，考茨基才完全引用了其中的一部份，即如下的一段話：

『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與具有立憲會議這一花冠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較），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 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考茨基在這裏省略了『普通』

* 附帶說說，考茨基多次引用了『最無痛苦地』過渡這幾個字，大概，他想借此來表示諷刺。可是因為他所用的方法既不中用，所以在幾頁之後，他就實行偽

字樣，並且把提綱本條開頭的一句話：『在由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時期，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也省去了）。

引來這幾句話之後，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諷刺口吻驚嘆道：

『唯一可惜的，這種結論只是當他們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才作出來。從前誰也沒有像列寧那樣激烈要求過召集立憲會議』。

這是考茨基書上第三一頁中一字不差的話！

這是何等的奇談妙論呵！祇有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才能這樣說說，好使讀者得到一種印象，彷彿布爾什維克關於國家更高形式的一切議論，都是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才憑空想出來的東西！！祇有那已經賣身於資產階級，或者——這完全是一樣的——相信了阿克雪里羅得而又把自己通訊員隱瞞不說的無賴之徒，才能說出這種卑鄙齷齪的說話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回到俄國的第一天，即當衆宣讀了我的提綱，其中就聲明過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要優越於資產階級國會制的共和國。後來我又屢次在刊物上，例如在我那論各政黨的小冊子上（這小冊子曾譯成英文，並轉載於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紐約晚郵報上）也說過這點。況且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末布爾什維克黨底代表會議上通過了決議，說工農共和國要高於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說我們黨不能以後者為滿足，說黨綱應該作相當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末考茨基硬向德國讀者武斷地說，彷彿我會激烈要求過召集立憲會議，而祇是到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

作，假造引文僅僅為『無痛苦地』過渡！當然，用這種方法來把無意識的話加到論敵身上是不困難的。作偽也能幫助迴避問題底實質：即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祇有在把全體貧農組織起來（成為蘇維埃）的時候，祇有在國家政權中堅（即無產階級）對這種組織予以幫助之下，才有可能。

了少數之後，我才『詆譏』立憲會議底榮譽和聲望——試問對於這種胡言暴語，應當如何稱呼呢？試問這種胡言暴語，怎樣可以原諒呢？* 難道可以說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實麼？如果真是這樣，那他爲什麼對這個問題大發議論呢？那他爲什麼不老老實實說：我，考茨基，所寫的文章是根據孟什維克史騰和阿克雪里羅得這班人的消息呢？考茨基是想用冒充客觀態度的幌子來掩蓋他替那些因失敗而懷恨在心的孟什維克充當奴僕的事實而已。

但這不過是小小的花朵。果實還在前面咧。

我們就假定說，考茨基當時不願或不能（??）從他的通訊員那裏得到布爾什維克關於是否滿意資產階級國會制民主共和國這問題的決議案和聲明書底譯文吧。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雖則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我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寫的提綱，考茨基在他這本著作第三〇頁上是直接提到過的。

究竟考茨基是完全知道這些提綱，還是只知道史騰、阿克雪里羅得諸人所譯給他的部分呢？考茨基引用了關於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曾否意識到和曾否向民衆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基本問題的第三條。但考茨基對第二條却緘口不言。

而第二條上却說：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最初之日起，便屢次着重指出過，蘇維埃共和國較之具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更高形式的民主制」（着重點是我加的）。

爲要把布爾什維克描寫爲沒有原則的人，描寫爲『革命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在他的著作中有個地方用過這一術語，但我不記得

* 附帶說說：在考茨基底小冊子中，這種孟什維克式的謊話非常之多！這是心懷憤恨的孟什維克底惡謔書。

他是講什麼問題時說到的)，考茨基先生就把這在提綱上直接引證過的『屢次』聲明，都在德國讀者面前隱瞞不說！

考茨基先生所運用的渺小可憐而又可鄙的方法，便是如此。他這樣就迴避開了理論問題。

說資產階級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比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共和國要低些，這是否對呢？這就是問題底中心，而考茨基却恰恰避開這點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話，考茨基都『忘記了』。他還『忘記了』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寫給伯伯爾的信，其中特別顯而易解地表達了馬克思底意思：『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請看，這位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書上，專門論到那曾屢次公開提出了比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問題的俄國時，却對於這一點緘口不言。試問這在實際上又與投降資產階級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附帶說明一下：在這裏，考茨基也跟在俄國孟什維克後面當尾巴。孟什維克中知道從馬恩著作內摘來的『一切引證』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然而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再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間，竟沒有一個孟什維克曾作過一次嘗試去研究公社式的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也迴避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只好閉口不談吧）。

很明顯的，同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但實際上關於主要問題即公社式國家問題却滾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們，來談論解散立憲會議，這真是對牛彈琴。我只要在本書底附錄中把我的立憲會議問題提綱完全登載出來就夠了。從這一提綱中間，讀者會看到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已經根據理論、歷史以及政治實踐觀點提出過了。

既然理論家的考茨基已經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那末他也許

可以用歷史家的資格來考察蘇維埃同立憲會議鬥爭的問題吧。我們從考茨基底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曾能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他的這些著作，始終是無產階級穩固的財產，雖然他後來變成了叛徒。但對於這一問題，歷史家的考茨基也離開了真理，抹煞了人所共知的事實，變成了一個逢迎諂媚的奴才。他力圖把布爾什維克描寫為沒有原則的人，所以他就叙說布爾什維克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曾如何設法緩和與立憲會議的衝突。其實這裏並沒有絲毫不好的地方，我們根本沒有否認的必要；現在我把我的提綱全部印出，其中再明顯不過地寫着：盤據在立憲會議中動搖不定的小資產者先生們，或者是你們聽從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我們「用革命手段」來戰勝你們（提綱第十八及第十九條）。

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待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向來是這樣，而且將來還永遠會是這樣。

考茨基對於立憲會議問題，是持着形式上的觀點。在我的提綱內屢次明顯說過，革命底利益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限（見提綱第十六及第十七條）。形式的民主觀點，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承認無產階級底利益與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是高於其他利益的。歷史家的考茨基也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的國會是某一階級底機關。但現在考茨基需要（是爲了要幹背棄革命的齷齪勾當）忘記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就不提出俄國立憲會議是哪個階級底機關的問題。考茨基不去分析具體的環境，他不願意考察事實，他連一個字也不告訴德國讀者說，在我的提綱中，不但理論上解釋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狹隘性問題（提綱第一條至第三條），不但說到了使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各黨派名單與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實際情形不相符合的具體條件（提綱第四條至第六條），並且說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二月間階級鬥爭與國內戰爭底經過（提綱第七條至第十五條）。從這種具體經過中，我們得出了結論

(提綱第十四條)：「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已經變成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派及其幫手們底口號了。

歷史家的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歷史家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見過，普選權有時產生出小資產階級的國會，有時產生出反動的與反革命的國會。馬克思主義歷史家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選舉底形式，民主底形式是一回事，這個機關底階級內容却是另一回事。關於立憲會議底階級內容問題，在我的提綱中已經直接提出而且解決了。也許我解決得不對。假使旁人對於我們的分析能夠加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那我們是再願意不過的了。考茨基本來不應該寫些似乎有人阻得批評布爾什維主義的這類十足的蠢話（這種話在考茨基著作中很多），而應該去從事於這樣的批評。可是問題正在於考茨基沒有進行這種批評。他甚至沒有提出關於要對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雙方加以階級分析的問題。所以我們實在無法同考茨基來爭論或辯論，而祇好告訴讀者說，為什麼除了把考茨基稱為叛徒外，再沒有其他適當的稱呼了。

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的分歧，有它分歧的歷史，對於這種歷史事實，甚至那些不站在階級鬥爭觀點上觀察問題的歷史家，也是不能避開不管的。考茨基就連這種實際的歷史，都不願意論及。他向德國讀者隱瞞了衆所共知（現在只有頑固不化的孟什維克才能加以隱瞞）的事實：蘇維埃就在孟什維克統治的時候，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至十月間，也是同「全國家的」機關（即資產階級的機關）分歧的。實際上，考茨基是主張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實行調和、妥協和合作的；不管考茨基怎樣否認這一點，但他的這種觀點終究是他的全部小冊子所已證實了的事實。說本來不應該解散立憲會議，這就等於說：本來不應該把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不應該推翻資產階級，而應該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起來。

為什麼考茨基對於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幹過這種不體面的事情且毫無成就這點，竟默而不言呢？如果把資產階級

和無產階級調和起來是可能的話，那末，爲什麼在孟什維克統治下，這種調和竟未成功，資產階級置身蘇維埃之外，蘇維埃被稱爲（被孟什維克稱爲）『革命民主』機關，而資產階級則被稱爲『有法定資格的份子』呢？

考茨基向德國讀者隱瞞了一件事實，即正是孟什維克在自己統治的『時代』（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稱蘇維埃爲革命民主機關，這樣他們也就是承認蘇維埃優於其他的一切機關。也正由於隱瞞了這件事實，所以在歷史家的考茨基看來，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分歧並沒有其分歧的歷史，而是因爲布爾什維克舉動錯誤、無緣無故、一下子突然發生的。其實，正是孟什維克在半年以上（對於革命，這是很長的時間）實行妥協政策，企圖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的經驗，才使民衆相信到這些企圖之徒勞無功，才使無產階級離開了孟什維克。

考茨基承認說，蘇維埃是無產階級之具有偉大前途的，極好的，戰鬥的組織。既然如此，那末考茨基底整個立場，也就像紙房子，或像指望避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劇烈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一樣坍塌下去。因爲全部革命都是連續不斷並且竭盡全力的鬥爭過程，而無產階級乃是一切被壓迫階級中的先進階級，是一切被壓迫者力求自身解放的一切願望底中心和焦點。蘇維埃既是被壓迫羣衆底鬥爭機關，所以它在反映與表現這些羣衆底情緒及其觀點底變動上，自然要比其他任何機關迅速得多，完滿得多，正確得多（這也就是蘇維埃民主制所以成爲民主制最高形式的原因之一）。

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舊曆二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五日這期間內，召集了兩次代表俄國絕大多數民衆，即代表全體工人和全體兵士以及十分之七八的農民的全國代表大會，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的縣市省和省區的地方代表大會了。在這期間內，資產階級沒有能夠召集一次代表大多數民衆的機關（除了那個顯然僞造的，侮辱無產階級而使其憤恨的『民主會議』之外）。立憲會議所反映的民衆情緒和

30—TOM II

政治派別分化，與第一次（六月）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反映的完全一樣。在立憲會議召集（一九一八年一月）以前，舉行了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月）及第三次（一九一八年一月）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都十二分明顯地表露出：羣衆已經左傾，他們已經革命化，已經離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而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這就是說，他們已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拋棄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已轉到力求推倒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方面來了。

所以，單是蘇維埃外表上的歷史，就已證明立憲會議不免要被解散以及立憲會議底反動性。但考茨基還是堅持着他的『口號』：就讓革命死亡吧，就讓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吧，只要『純粹民主制』繁榮昌盛就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下面就是俄國革命史上各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簡短總結：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代表人數	布爾什維克所佔人數	布爾什維克所佔的百分比
第一次（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	790	103	13
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675	343	51
第三次（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710	434	61
第四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1,232	795	64
第五次（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	1,164	773	66

*意思是：『只要實行裁判，那怕世界沈淪！！』。——譯者。

只要看看這些數目字，就能明白，何以辯護立憲會議，或者說（如像考茨基之流所說）布爾什維克沒有大多數民衆擁護，都祇能引起我國人士一笑而已。

蘇維埃憲法

我已經說過，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的和必然的標誌。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雖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已提出了這種專政的口號，可是他們並沒有預先說要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專政底這個組成部份並不是依照某個政黨底『計劃』出現的，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長成的。歷史家的考茨基當然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不了解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中佔統治地位時，資產階級自己就已經同蘇維埃分立，抵制它，對峙它，運用種種陰謀來反對它。蘇維埃底產生，並沒有根據任何憲法，而且它在成立後一年以上的時間內（一九一七年春至一九一八年夏），也沒有過任何憲法。祇是由於資產階級對於被壓迫者底這種獨立與萬能（因為它是包括全體人的）組織表示仇恨，由於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是毫無顧忌、自私自利、卑鄙齷齪地進行鬥爭反對蘇維埃，以及由於資產階級（從立憲民主黨人直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米留可夫直到克倫斯基）公開參加科爾尼洛夫叛亂——才造成了從蘇維埃中正式排除資產階級的情形。

考茨基聽說過科爾尼洛夫叛亂，但是他竟昂然鄙視歷史事實，以及決定專政形式的鬥爭形式和進程：的確，既然講的是『純粹』民主制，那末這些事實又有何關係呢？因此考茨基關於反對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批評』，帶有一種…甜膩膩的天真爛漫的腔調，如果這話是三歲小孩說的，倒很令人可愛，但是一個尚未被公認為蠢材的人竟說出這種話來，却就不免令人憎惡了。考茨基說：

『…如果資本家在普選制之下，落到區區少數地位，那他們就會

較易安分守己了』（第三三頁）…。妙哉奇也！聰明的考茨基在歷史中多次看見，並且從實際生活的觀察中明白知道，竟有這樣尊重大多數被壓迫者意志的資本家和地主哩。聰明的考茨基堅定不移地站在『在野黨』底觀點上，即是站在國會內部鬥爭的觀點上。他真是這樣寫着：『在野黨』（第三四頁及其他許多地方）。

唔，好一個博學的歷史家兼政治家！你該知道，『在野黨』是一種和平鬥爭並且祇是國會鬥爭的概念，亦即適合於非革命形勢的概念，適合於沒有革命時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國內戰爭中無情的敵人，——無論那些正如考茨基一樣懼怕這種戰爭的小資產者發出怎樣的反動悲嘆，都不能變更這個事實。當資產階級不惜採取一切罪惡手段時（凡爾賽派及其同俾斯麥勾結的例子，對於凡是不以戈果里小說中的彼特魯什卡⁶⁹底態度去看待歷史的人，都是多少有些教益的），當資產階級求助於外國並與它們同謀反對革命時，却來如此觀察殘酷國內戰爭底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也像『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傻頭傻腦安閑自得地把組織杜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軍團等反革命暴動以及拿出千百萬金錢付給怠工者的資產階級，看做是合法的『在野黨』。唔，這真是何等深奧的思想呵！

考茨基感到興趣的只是形式法律方面的問題，所以當你讀到他關於蘇維埃憲法的議論時，就會不由地回憶起伯伯爾底話：『法律家是澈頭澈尾的反動者』。考茨基說：『實際上，單單把資本家變為無權的人是不行的。從法律意義上講來，什麼是資本家呢？有產者嗎？甚至在德國這樣經濟非常進步、無產階級數量極多的國家中，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就會使大量的羣衆成為政治上沒有權利的人。譬如在一九〇七年德意志帝國內，在三大產業部門——農業、工業、商業——中謀生的人及其家屬，約有三千五百萬人是屬於僱傭工人和職員一類，有一千七百萬人是屬於獨立生產者一類。

這樣看來，黨在僱傭工人中間，儘可成爲多數，但在全體人民中，則佔少數』（第三三頁）。

這就是考茨基底標本議論之一。看呵，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號泣嗎？考茨基先生，你明明知道，俄國極大多數農民都不使用僱傭勞動，因而也就是沒有被剝奪權利的，爲什麼你把一切『獨立生產者』都算做無權利的人呢？難道這不是捏造事實嗎？

爲什麼你這個博學的經濟學家不引用你所熟悉、而在一九〇七年德國統計中也載有的關於農業中各類農戶使用僱傭勞動的數目字呢？爲什麼你不把這些統計，即從中可以看出究有多少剝削者以及剝削者在『農業主』總數中佔着很少數的德國統計，給你那小冊子的讀者德國工人看看呢？

這是因爲你的叛徒立場把你變成了一味向資產階級諂媚的奴才。

你看，資本家原來是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於是考茨基便好在好幾頁中，攻擊蘇維埃憲法底『專橫』。這位『莊嚴的學者』容許英國資產階級在數世紀內去編製和規訂新的（對中世紀而言是新的）資產階級憲法，但對於我們俄國工人與農民，這位奴僕科學底代表却不願給予任何期限。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內就製定出無微不至的憲法…

…『專橫』！試想一想，這種責難該是暴露出他怎樣卑鄙醜態地在資產階級面前獻媚，他的迂腐觀念怎樣愚鈍萬分呵。資本主義國家內那班十足資產階級的與大部分是反動的法律家們，在幾百年或幾十年內，製定出無微不至的規則，寫下有幾十幾百本用以約束工人、束縛貧人、對民衆中任何一個普通勞動者都加以無數障礙的法律與法律解釋，——但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以及考茨基先生却不認爲這是『專橫』！這裏乃是『秩序』與『法制』！這裏一切，都是想得周到，規定得完備，目的是要儘量把窮人『壓榨

到底』。這裏有成千累萬的資產階級的律師與官僚（關於他們，考茨基根本就默而不言，想必是正因為馬克思非常重視破壞官僚機器的意義吧…）——他們能把法律解釋得使工人與中農永遠不會跳出這種鐵的法網。這不是資產階級底『專橫』，這不是自私自利、骯髒醜惡、吮吸民脂民膏的剝削者底專政。絕對不是。這是『純粹民主制』，一天比一天更加純粹的民主制。

但是當被剝削的勞動階級，這些因帝國主義戰爭而與國外兄弟們隔絕開了的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號召了被資產階級壓迫、摧殘、愚弄的那些羣衆起來進行政治的建設，並已親自着手創造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在瘋狂鬥爭底火焰中，在國內戰爭底烽煙中，開始規劃出關於沒有剝削者的國家底基本原則的時候，——於是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底混蛋，一切貪嗜人血的強盜，以及他們的謳歌者考茨基，就跑出來狂吠什麼『專橫』了！的確，這些無知之輩，工人與農民，這班『小百姓』，哪裏會有本事來解釋他們自己的法律呢？這些普通的勞動者不聽信學識豐富的律師們底忠告，不聽信資產階級作家底忠告，又不聽信考茨基之流以及聰明的老官僚們底忠告，哪裏會有正義感呢？

考茨基先生從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的演說中引出下面一句話：…『羣衆自己決定選舉底程序與時期』…。於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考茨基就推論道：

『…可見，大概，每個選民會議上，都可以隨意規定出選舉底程序，於是專橫手段與排除無產階級內部那些不利於己的反對分子的可能性，也就登峯造極』（第三七頁）。

哼，這些話頭，同資本家所僱用的文墨苦力，一看見罷工羣衆壓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時，就大呼大叫的語句，有什麼區別呢？為什麼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下，由資產階級官僚來決定選舉程序，就不是專橫呢？為什麼毅然奮起同歷來剝削者作鬥爭的

羣衆，在這個激烈鬥爭中受到教育鍛鍊的羣衆，其正義感竟會比那班由資產階級偏見所教養出來的寥寥無幾的官僚、知識份子和律師要低些呢？

考茨基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不要擅自懷疑這位最可尊敬的家長，這位最純潔公民底真誠性。他是工人勝利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最熱烈與最堅信的擁護者啊。他只是希望這些甜蜜蜜的知識界中的市儈和饅頭傻腦安閑自得的庸人，在羣衆運動以前，在他們同剝削者作殊死鬥爭以前，並絕對不要進行國內戰爭，而首先去製定溫溫和和規規矩矩的革命發展章程…

我們這位飽學的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⁶¹滿胸義憤地對德國工人敘說道，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要把蘇維埃中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代表們開除出去。「這種辦法——悲憤填膺的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式的考茨基寫道，——不是用以反對犯了某種罪行的某些個人… 蘇維埃共和國底憲法根本就沒說到蘇維埃代表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這裏，從蘇維埃中間開除出去的，不是某些個人，而是一定的政黨」（第三七頁）。

這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這實在是不可容忍地離開了純粹民主制，而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式的革命家考茨基就是要依照這種民主制底規則來幹革命。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本來應該首先向沙溫可夫之流，李伯爾唐恩及波特列索夫（『積極份子』）之輩⁶²約許不可侵犯權，然後則製定刑法，宣佈凡參加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反革命戰爭或在烏克蘭及格魯吉亞同德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本國工人者，均『應受懲治』，只有這樣作過之後，我們才有權依據這種刑法，依照『純粹民主制』，從蘇維埃中開除『某些個人』。同時不言而喻，經過沙溫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爾唐恩之流，或因受他們鼓動而從英法資本家手裏領取金錢的

捷克斯拉伐克軍隊，以及在烏克蘭與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幫助之下從德國人那裏得到槍械的克拉斯諾夫軍隊，定會安然坐在那裏靜候我們製好正確的刑法，並且會像最純粹的民主派那樣，僅限於幹『在野黨』的活動…

蘇維埃憲法剝奪『凡以取得利潤為目的而使用傭工』的人們底選舉權，這也引起了考茨基方面同樣大的義憤。他寫道：『使用一個藝徒的家庭手工業者或小僱主，其生活和感覺可能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但他們却沒有選舉權』（第三六頁）。

這該多麼違反『純粹民主制』呵！這該多麼不公平呵！固然，直到現在，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並且有無數事實都證明小僱主是最沒良心和最貪吝剝削傭工的人，但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式的考茨基所指的，當然不是小僱主階級（究竟是誰憑空臆造出階級鬥爭這個有害的理論？），而是某些個人，即那些『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剝削者。人們認為早已死去的著名『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底筆鋒之下復活了。這位節儉的阿格尼斯，是幾十年前『純粹』民主派資產者李赫特所臆造出來而傳播於德國文藝中的。他曾預言過無產階級專政和沒收剝削者資本辦法將引起無可形容的不幸情事，他假裝忠厚的樣子問道，從法律意義上講來，什麼叫做資本家呢？他舉出了那被兇惡的『無產階級專政者』剝奪了最後一文錢的可憐的節儉女縫工（『節儉的阿格尼斯』）為例。有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全體都把純粹民主派李赫特底這個『節儉的阿格尼斯』引為笑談。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時伯伯爾還活着，他曾公開直爽地說：我們黨內存在着許多民族自由主義者；這是考茨基還沒有當叛徒時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現在『節儉的阿格尼斯』，在『使用一個藝徒，其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小僱主』身上復活了。兇惡的布爾什維克竟欺侮他，剝奪他的選舉權。固然，在蘇維埃共和國內，『一切選舉

大會』，像仍是這個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可以允許譬如同某一工廠有關係的貧苦工匠來參加，只要這個工匠是種例外，不是剝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但試問，怎可信任簡單工人們所舉行的既無秩序，又不按章程行動的（噯呀，何等可怕呵！）工廠大會能有人生知識和正義感呢？與其去冒險讓工人有可能欺侮『節儉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覺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工匠』，倒不如把選舉權給予一切剝削者，給予一切使用傭工的僱主，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 * *

讓受資產階級與社會沙文主義者* 歡迎的那些可鄙的叛徒混蛋們去誹謗我們這剝奪剝削者選舉權的蘇維埃憲法吧。這樣很好，因為這會使歐洲革命工人同謝德曼和考茨基輩，倫諾德爾和龍格輩，亨德孫和麥克唐納爾輩之間，同老的領袖與老的社會主義叛徒之間的分裂加速和加深起來。

被壓迫階級底羣衆，革命無產者中覺悟忠實的領袖，定會贊成我們。只要把我們的蘇維埃憲法給這些無產者和這些羣衆知道，那他們立刻就會說：這才是真正我們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真正的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用改良的空談來欺騙工人，如像上述一切領袖們曾欺騙了我們那樣，它真正同剝削者鬥爭，真正實行革命，真正爲工人底完全解放而鬥爭。

既然在蘇維埃一年的『實際工作』之後，剝削者底選舉權被蘇維埃所剝奪了，那就是說，這些蘇維埃不是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底組織，而是真正被壓迫羣衆底組織。既然這些蘇維埃剝奪了剝削者底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同資本家妥協的小資產階級底機關，不是作國會空談（如考茨基

* 我剛才讀了法蘭克福報（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二九三期）底社論，這篇社論歡天喜地的轉述了考茨基這本小冊子底內容。交易所主人底報紙十分滿

輩，龍格輩和麥克唐納爾輩之空談)的機關，而是同剝削者作殊死鬥爭的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機關。

有一位消息靈通的同志，幾天前(今天是十月三十日)從柏林寫來了一封信給我，他說『考茨基底小冊子這裏幾乎無人知道』。我很想勸駐德國與瑞士的蘇俄大使們不吝重價，把他這本書買來，分贈給覺悟的工人，好將這個早已變為『臭屍』的『歐洲的』(請讀作：帝國主義的與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踐踏到爛泥坑裏去吧！

* * *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著作末尾(第六一頁與第六三頁)痛哭流涕地說，『新的理論』(他這樣稱呼布爾什維主義，却害怕說及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如像瑞士這樣的老民主國內，也找到了同情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也接受這個理論』，這在考茨基看來乃是『不可了解』的。

其實不然，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因為在受到戰爭底嚴重教訓之後，革命的羣衆無論對於謝德曼輩或考茨基輩都感覺討厭了。

考茨基寫道，『我們』向來都是主張民主的，而現在我們却忽然要拒絕它！

『我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向來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科爾布一流人早已公開表示過這點。考茨基分明知道這一點，但他却妄想蒙蔽讀者，使其看不見他已『回到』伯恩施坦輩與科爾布輩『懷抱中』去的明顯事實。

『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純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看做神聖的東西。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三年，當普列漢諾夫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尚未可悲地轉到俄國謝

意。這是理所當然的！有一位同志從柏林寫信給我說，謝德曼輩底前進報在一篇專論上聲稱，它對於考茨基底每一字句幾乎都可以簽字贊同。恭喜！恭喜！

德曼立場上去之前)的時候，他在通過黨綱的黨代表大會上說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要時，將剝奪資本家底選舉權，將解散任何國會，如果這個國會竟成了反革命的話。至於這種觀點唯一合乎馬克思主義，這是大家從我在前面引用的馬恩言論中，也可以看到的，這分明是出自於馬克思主義底一切基本原理的。

『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向民衆說過那種爲各國考茨基主義者所愛說的言論，他們諂媚資產階級，迎合資產階級國會制，抹煞現代民主制底資產階級性質，祇是要求擴大這種民主制，把這種民主制貫徹到底。

『我們』對資產階級說過：『你們這些剝削者和僞君子，口裏高談着民主，同時却到處百般地阻碍被壓迫羣衆參加政治。我們就利用你們自己的話，爲了這些羣衆底利益來要求擴大你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以便準備羣衆去幹革命來推倒你們這些剝削者。如果你們剝削者妄想抵抗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那我們就會毫不留情地鎮壓你們，把你們變成無權利的人，而且我們會不拿糧食給你們吃，因爲在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中，剝削者將沒有權利，他們將得不到飲食，因爲我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謝德曼式的，也不是考茨基式的社會主義者』。

這就是『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說過和將來還要說的話，這也就是被壓迫羣衆將一定會贊助我們、同我們携手、而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却一定會落到叛徒們底泥坑中去的原因。

什麼是國際主義？

考茨基極端自信地認爲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並自稱爲國際主義者。他宣佈謝德曼輩爲『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迨至考茨基擁護孟什維克時（他並沒有公開說自己同情他們，但他却完全宣揚他們的見解），已經很明顯表現出他的『國際主義』究竟是哪一類的

貨色了。既然考茨基不是孤單一人，而是在第二國際底環境中必然產生的一種派別（法國的龍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與格里姆，格拉貝爾與寧恩，英國的麥克唐納爾等）底代表，所以我們來研究研究考茨基底『國際主義』，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考茨基強調地說，孟什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無疑地是一張文憑，但…這是一張已經陳腐的文憑），他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克觀點描寫如下：

…『孟什維克曾想實現總的和平。他們想要各交戰國都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依照這個觀點，在這一目的尚未達到以前，俄國軍隊應保持備戰狀態。而布爾什維克則要求立刻無條件地媾和，必要時同意單獨媾和，他們力圖用強力強迫實現這一點，來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第二七頁）。據考茨基的意見，布爾什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而應該以立憲會議為滿足。

總之，考茨基與孟什維克底國際主義就是：向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要求改良，但在一切交戰國尚未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之前，必須繼續擁護這種政府，繼續擁護它所進行的戰爭。這種觀點無論屠拉梯也好，考茨基主義者（哈阿茲等）也好，龍格之流也好，都已經屢次表示過了，他們都宣稱他們是主張『保護祖國』的。

在理論上說來，這是完全不善於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區別開來，這是在保護祖國問題上十足的糊塗觀念。在政治上說來，這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國際主義，這是轉到改良主義方面，背棄革命。

從無產階級觀點上看來，承認『保護祖國』，就是替現在的戰爭辯護，就是承認它的合理性。但既然戰爭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論在君主制下或在共和制下），——不論此刻敵軍是在我國境內或在他國境內，都是一樣，——那末承認保護祖國，實際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強盜資產階級，就是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在俄國，

即令是在克倫斯基時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時代，戰爭也還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為進行這一戰爭的，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須知戰爭是「政策底繼續」）；從前的沙皇同英法資本家所訂立的關於瓜分世界與掠奪他國的祕密條約，把這一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表現得特別明顯。

孟什維克把這種戰爭稱為防禦的或革命的戰爭，就是厚顏無恥地欺騙民衆，而考茨基之讚揚孟什維克的政策，也就是讚揚欺騙民衆的政策，讚揚那班愚弄工人並使工人備受帝國主義者束縛，以此來効勞於資本的小資產者底作用。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為（並以這種荒謬思想去誘惑羣衆）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為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哪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為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為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不是用騙子，空談家或市儈庸人所提出來的一些甜蜜「口號」可以辦到的，而祇是當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以及與這種戰爭有無數經濟聯繫（甚至有更堅固得多的聯繫）的那個階級實際上已被推倒，而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起而代之掌握政權的時候，才可以辦到。不然就無法跳出帝國主義的戰爭，同樣也無法跳出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底對外政策，宣佈這個政策為國際主義的與齊美爾瓦爾得派的政策，這樣他第一，就是表露出齊美爾瓦爾得機會主義派多數之腐敗不堪（難怪，我們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立刻就同這多數分開了！）；第二，——而且這是最重要的，——這是表露出他考茨基從無產階級底立場轉到小資產階級底立場上，從革命的立場轉到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無產階級是爲要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鬥爭，小資產階級是爲要用改良主義手段『完善』帝國主義，是爲要在服從帝國主義條件下適應帝國主義而鬥爭。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例如當他在一九〇九年間著作到政權之路的時候，他正是堅持過有戰爭就必然發生革命的思想，說過革命時代的逼近。一九一二年的巴塞爾宣言，公開而確切地說到英德兩大集團間行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將引起無產階級革命，而這次戰爭果然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可是當一九一八年因有戰爭而革命業已開始了的時候，考茨基却不去說明這些革命底必然性，不去周詳思考澈底革命的策略與準備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反而把孟什維克底改良主義策略叫作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變行爲麼？

考茨基因孟什維克主張保持軍隊備戰狀態而加以讚揚。他因布爾什維克加緊『破壞』本已殘破不堪的軍隊而加以責難。這也就是讚揚改良主義和讚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責備革命，而背棄革命。因爲在克倫斯基政府之下保持備戰狀態，就無異是並且果然是保持資產階級所指揮（雖然是共和派資產階級所指揮）的軍隊。大家知道，——而且事變底進程也顯然證實了，——這個共和派軍隊由於保留了科爾尼洛夫派軍官而保持了科爾尼洛夫的精神。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不是科爾尼洛夫派的，不能不趨向於帝國主義方面，不能不趨向於用武力來鎮壓無產階級。照舊保持着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切基礎，保持着資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基礎，而祇是修補細節，粉飾小事（『改良』）——這就是孟什維克策略底實際內容。

反之，任何一個大革命，沒有不『破壞』軍隊的，而且不能不『破壞』軍隊。因爲軍隊是保護舊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擁護資本統治、保持並教育勞動者去奴服於資本的最堅硬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沒有容忍過，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與軍

隊同時並存的事實。恩格斯說過，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⁶³。武裝工人曾是新軍隊底萌芽，曾是新社會制度底組織胚芽。摧折這個胚芽，不使它發展起來——這乃是資產階級底第一條金科玉律。而一切勝利革命底第一條金科玉律——馬克思與恩格斯屢次着重說過，——就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來代替它。升到統治地位的新社會階級，若不完全瓦解舊軍隊（即反動的或簡單是怯懦的市儈叫喊着的所謂『破壞』），若不經歷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法國大革命也曾經歷過這樣最苦痛的時期），若不逐漸在艱苦國內戰爭中，創造出新階級底新軍隊、新紀律、新軍事組織，——那它始終也不能達到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歷史家考茨基從前懂得了這一點。叛徒考茨基却忘記了這一點。

如果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那他有什麼權利來稱謝德曼輩為『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呢？孟什維克既擁護克倫斯基，又加入他的內閣，也就同樣是政府派的社會主義者了。考茨基一旦試試提出關於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就絕對逃避不掉這個結論。然而考茨基却極力避免提出這一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關於統治階級的問題，因為只要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揭破這叛徒底真面目。

德國的考茨基派，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都發出議論：說社會主義是主張民族平等與自由，主張民族自決的，所以當人家向我國進攻，或敵軍侵入我國領土時，社會黨人有權而且定要起來保護祖國。但是，從理論方面說來，這種議論不是完全污辱社會主義，便是騙世欺人的遁辭，而在政治實踐方面說來，這種議論是與那些甚至從來不考慮戰爭底社會性與階級性以及革命政黨在反動戰爭時任務的愚夫俗子之談，完全相合的。

社會主義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手段，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可是社會主義是一般地反對對人施行強力手段的。然而，除了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與托爾斯泰主義者之外，誰也不會從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強力。可見，只說一般的「強力」，而不分析那區別反動強力與革命強力的條件，這就是持背棄革命的市儈立場，或簡單是用詭辯來自欺欺人。

對民族使用強力的問題也是如此。一切戰爭都是對民族使用強力，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者去贊成革命戰爭。在社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來，基本問題就是戰爭的階級性。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兩大集團間爲了瓜分世界，爲了分贓，爲了掠奪與征服弱小民族而進行的戰爭。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就是這樣估計戰爭的，而且這種估計已爲事實所證實了。誰離開這種對於戰爭的觀點，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在威廉統治下的德國人，或克勒孟梭統治下的法國人說，既然敵人已侵入我國，我這個社會黨人可以而且應該起來保護祖國，那末，這種議論便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不是國際主義者的，不是革命無產者的，而是民族主義市儈們的議論。因爲在這個議論中，根本沒有工人反資本的革命階級鬥爭觀，根本沒有從世界資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方面着眼來估計整個戰爭，也就是說根本沒有國際主義，而只有一種偏狹的頑固的民族主義。祇是我國被人侵凌，其他一切我都不管——這就是這種議論的結論，這就是這種議論所包含的市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這正像有人看見個人對個人使用的強力時，就發議論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強力的，所以我與其坐在監獄內，倒不如出賣階級好了。

假如法國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對民族使用強力的，所以當敵人侵入我國時，我要起來自衛，那末，他們就是叛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因爲這種人祇看見自己的「國家」，把

『自己的』…『資產階級』看得高於一切，而絲毫也不去想到使戰爭變為帝國主義戰爭，使他的資產階級成為帝國主義掠奪鎖鏈中之一環的那種國際聯繫。

一切市僧和一切愚夫魯漢都像考茨基派、龍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們那樣推論，就是說：敵人進到了我國境內，其餘一切我都不管*。

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的推論，則是另一樣的：戰爭底性質（反動戰爭或是革命戰爭），不是以誰先進攻和『敵人』在誰國境內來決定，而是要看哪一階級進行這一戰爭，以及這戰爭所繼續的是哪一種政策來決定的。如果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由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底兩個世界集團所進行的戰爭，那末一切資產階級（連小國資產階級也在內）都變成了掠奪底參加人，而我這個革命無產階級代表者底任務，就是要準備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戰爭慘禍的唯一救星。當我推論時，我不應該從『自己』國家底觀點出發（因為這是民族主義市僧這類可憐愚人底議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而應該從我之參加準備，宣傳與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

這才是國際主義，這才是國際主義者、革命工人、真正社會主義者底任務。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所『遺忘了』的起碼知識。當考茨基從讚許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法國的

* 社會沙文主義者（謝德曼輩、倫諾德爾輩、亨德孫輩、葛培爾茲輩等等）在戰爭時拒絕一切關於國際的言論。他們認為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底侵略政策。社會和平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市僧和平主義者）表示一切『國際主義的』感覺，奮起反對兼併政策等等，但是實際上他們繼續擁護本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兩派人之間的差別很小，正如兇言惡語的資本家與花言巧語的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一樣。

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國的哈阿茲派之流）底策略，轉到批評布爾什維克底策略時，他的叛變立場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了。請看他的批評吧：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是建築在一種假定之上，即認為這次革命將是全歐革命底出發點；俄國大胆的倡首將喚醒全歐無產者一致奮起。

在這種假定下，俄國的單獨媾和將採取何種形式，這種媾和將使俄國人民受到何種苦難和領土損失（原文為Verstümmelungen即殘缺或割裂的意思）以及如何來解釋民族自決，當然都可以置之不問。那時俄國是否能夠自衛，也是沒有關係的。照這種觀點看來，歐洲革命能最好地捍衛俄國革命，歐洲革命將給予舊俄境內各民族以完全的和真正的自決。

將在歐洲實現社會主義與鞏固社會主義的歐洲革命，也應該幫助俄國消除那些因國內經濟落後以致阻碍實行社會主義生產的障礙物。

所有這些都很合邏輯，很有根據，只要俄國革命必然引起歐洲革命這個基本假定能夠成立。但是，如果歐洲革命不發生，那又怎樣辦呢？

直到現在，這種假定還沒有證實。於是人們現在就來責備歐洲無產者，說他們拋棄並叛賣了俄國革命。這種責備簡直是無的放矢，因為誰又能對歐洲無產階級底行動負責呢？」（第二八頁）。

往下考茨基還再三再四地補充說，馬克思、恩格斯、伯伯爾關於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之到來，也曾不止一次發生過錯誤，但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築在期待革命於『一定期內』發生這點上（第二九頁），而布爾什維克却『把一切都放在全歐革命這一孤注上面』。

我們故意摘錄這樣冗長的一段，好使讀者明白看見，考茨基如

何「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用卑鄙的與反動的市儈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第一，把顯然的愚蠢思想加到他的論敵身上，然後來加以駁斥，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所慣用的手法。如果布爾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築於期待其他各國在一定期內發生革命，那當然是很愚蠢的。但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做過這樣的蠢事：我在致美國工人的一封信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曾直接迴避過這種愚蠢思想，我說，我們雖指望美國革命，但並不指望它會在一定期內發生。在我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的時候（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三月），我曾屢次發揮過這樣的意見。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 很小的偽造他人意見的把戲，他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就是建築在這種把戲上的。考茨基把指望歐洲革命會在較近期內發生，但不是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而與指望它將在一定期內發生的策略，混為一談了。這是一個小小的，正是小小的騙局！

後一種策略是蠢舉。前一種策略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採取，一切革命的無產者和國際主義者所應該採取的策略，因為祇有這種策略才從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估計到歐洲各國因戰爭而發生的客觀狀況，祇有這種策略才符合無產階級底國際任務。

考茨基拿關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可能犯而沒有犯過的一種錯誤的小問題，來代替了關於一般革命策略基礎的大問題，這樣他也就很巧妙地背棄了一般的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底客觀前提的問題。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第二點了。

第二，如果歐洲有革命形勢存在，那末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指望到歐洲革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與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能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底起碼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這個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問題，那他就會看到，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的時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認爲歐洲戰爭定將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在一九〇二年（社會革命一書中）和一九〇九年（到政權之路一書中）都明確地承認過這點。用第二國際全體名義發出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無怪乎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與考茨基主義者（即動搖於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之間的『中派』），其懼怕巴塞爾宣言上關於這點的聲明，好像害怕惡魔一般！

可見期待歐洲革命形勢，這不是布爾什維克底貪圖，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底公意。既然考茨基說出布爾什維克「向來都相信強力與意志萬能」，藉此來搪塞這個無庸爭論的真理，那這就無異是空談，就是用以遮蓋他自己逃避提出革命形勢問題的可恥行爲。

其次，革命形勢是否已真正到來？這個問題也是考茨基所不善於提出的。經濟事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到處都有戰爭造成的飢荒與破壞，這就是革命形勢。政治事實也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從一九一五年起，在所有各國內就已顯然暴露出舊的，腐朽的社會黨的分裂過程，無產階級羣衆離開社會沙文主義領袖，而左傾到革命思想與革命情緒以及革命領袖方面來的過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當考茨基寫他這本小冊子時，祇有懼怕革命叛變革命的人才會看不見這些事實。現在呢，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歐洲許多國家內的革命已經在大衆面前很迅速地發展着。希望人家還像從前一樣認爲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是如此近視的庸人（正像一八四七年爲馬克思所譏笑的庸人一樣），以致看不見日益迫近的革命！！

我們要說到第三點了。

第三，在歐洲已經有了革命形勢的條件下，革命策略應有什麼特點呢？變成了叛徒的考茨基曾害怕提出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這個問題。考茨基正像一個標本式的庸俗市僧或愚昧農夫那樣推論：『全歐洲革命』來到了沒有？如果已經來到，那末他也願意做一個革命者！但那時——我們可以說——一切的混蛋（如像現在有時混入到已獲得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隊伍裏來的混蛋一樣），都會宣佈自己是革命者了！

如果沒有到來，那時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考茨基絲毫也不懂得這樣一個真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與庸夫俗子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有本領向蒙昧無知的羣衆宣傳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來，證明它的不可避免，說明它對於民衆的利益，準備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去進行革命。

考茨基把毫無意識的思想加到布爾什維克身上，似乎他們指望歐洲革命將在一定期內到來，而把一切都放在這一孤注之上。這種毫無意識的思想，正是反對考茨基自己的，因爲從他的話裏正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歐洲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這天前到來的話，那末布爾什維克底策略就對了！（考茨基所指出的正是他寫這本小冊子的日子），而在八月五日這天後，經過幾星期已經可以顯然看出，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革命已在到來，於是考茨基底全部叛徒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假造，他不善於用革命精神去推論問題，甚至不善於用革命精神提出問題的全部毛病，都澈頭澈尾地暴露出來了！

考茨基寫道：人們責備歐洲的無產者爲叛變，這簡直是無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錯了！請你拿鏡子照一照吧，那你就會看到，這一責備之矢，究竟是向什麼人放的。考茨基裝做怪天真爛漫的樣子，似乎他不知道是誰發出了這種責備言論，這種責備有什麼意思。

其實，考茨基明明知道，這種責備是德國的「左派」，斯巴達克派，即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所發出的，而且現時他們還在這樣責備着。這種責備表示一種明確的意識：當德國無產階級窒息芬蘭、烏克蘭、拉脫維亞、愛斯特蘭時，這就是表明它叛變了俄國（與世界）革命。這一責備所首先反對所主要反對的，並不是素遭抑壓的羣衆，而是像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一類的領袖，因為這些領袖沒有執行自己的天職，不到羣衆中去進行革命鼓動、革命宣傳與革命工作以反對羣衆底因循慣習，這些領袖的活動實際上都是違反被壓迫階級羣衆中所隨時蘊蓄着的革命本能與志向。謝德曼輩公開地、粗暴無恥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賣了無產階級，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考茨基派與龍格派也是這樣幹的，不過他們動搖猶豫、徘徊不定、畏畏縮縮地望着此刻較強有力的那些人。考茨基在戰時的一切著作都不是用來鼓勵與發展革命精神，而是消滅這種精神。

考茨基甚至不了解，關於歐洲無產者出賣了俄國革命的這種「責備」，該有何等偉大的理論意義，尤其有何等更大的宣傳與鼓動意義，這種不了解簡直會成爲德國正式社會民主黨「中派」領袖之市僧愚鈍性底歷史紀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這種「責備」，在德意志「帝國」出版檢查條件下，乃是那些沒有叛賣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即李卜克內西與其朋友們所能採用的唯一方式，藉以表示自己向德國工人號召，號召他們起來打倒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拋棄這類「領袖」，擺脫他們那種使人愚鈍，使人俗化的鼓動，違反他們的願望，不去理會他們，越過他們，而走向革命，實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這一點。試問他又怎能了解布爾什維克底策略呢？我們是否能希望一個根本背棄革命的人來計較與估量在一種最「困難」情形下的革命發展條件呢？

布爾什維克底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不是根據於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是根據於『不信任』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不是根據於那祇保護『自己』祖國（自家資產階級底祖國）而『唾棄』其餘一切的狹隘民族主義願望，而是根據於對歐洲革命形勢所作之正確的（在戰爭以前，在社會沙文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為大家所公認的）估量。這個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這種策略已由大量成就所證實，因為布爾什維主義（這並不是俄國布爾什維克底功勞，而是由於民衆到處對於真正革命策略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已經成了世界的布爾什維主義，它提供了在實踐上與社會沙文主義及社會和平主義具體不同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布爾什維主義把謝德曼與考茨基輩、倫諾德爾與龍格輩、亨德孫與麥克唐納爾輩底腐敗的舊『國際』完全打倒了，這些人現在夢想着『統一』和復活死屍，而定會來互相傾軋阻難的。布爾什維主義創造了第三國際底思想上與策略上的基礎，這個國際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國際，它既估計到和平時代所獲得的勝利品，同時又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底經驗。

布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通俗化了，它把這幾個字起初從拉丁文譯成俄文，然後又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並且拿蘇維埃政權底實例指明出了：甚至在落後國家中，甚至是最缺少經驗、最缺少教育與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與貧苦農民，都能夠在整整一年內，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在同剝削者（為全世界資產階級所援助的剝削者）的鬥爭中，保持着勞動者底政權，建立比世界上所有一切舊民主制都更高更廣得不可計量的民主制，開始發揮千百萬工農在具體實現社會主義方面的創造性。

布爾什維主義極強有力地實際幫助了歐美無產階級革命底發

展，這是迄今以前任何一國底任何一個政黨所未能做到過的。全世界底工人日益明顯地看到，謝德曼與考茨基之流底策略沒有使他們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僱傭奴隸制，這種策略不能成爲供世界各國做法的模範，——同時，全世界無產者羣衆却又日益明顯地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指出了擺脫戰爭和帝國主義慘禍的正確道路，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做法的策略模範。

不但全歐洲的而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有目共觀地成熟着，而俄國無產階級底勝利就是幫助了這一革命，加速了這一革命，維護了這一革命。這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還不夠麼？當然不夠。單只一個國家是不能作出更多的事情來的。但這一個國家，由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還是作出了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就假設世界帝國主義，例如由德帝國主義與英法帝國主義協定的方法，能夠在明天壓倒了俄國蘇維埃政權，甚至就假設會有這種最壞最壞的情形，布爾什維克底策略還是對於社會主義有了莫大的貢獻，對於不可征服的世界革命底發展有了極大的幫助。

在所謂「經濟分析」的幌子下 替資產階級劬勞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考茨基底書爲要名符其實，就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稱爲附和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

孟什維克關於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舊『理論』，就是說，孟什維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舊曲解（即在一九〇五年被考茨基所駁倒了的曲解！），現在又被這個理論家重新恢復起來了。雖然這問題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枯燥無味，我們還是不得不把它說明一下。

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在一九〇五年前俄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這樣說的。孟什維克既以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就由此得出結論說：所以，無產階級不應超出於資產階級所可容許的範圍，而應該採取同資產階級協定的政策。布爾什維克當時說道，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力圖照資產階級方式，用改良主義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儘可能保持君主政體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等等。無產階級應該不讓資產階級用改良主義來『束縛』它，而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布爾什維克曾將資產階級革命時的階級力量對比，歸納成如下一個公式：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以澈底破壞君主制度，中世紀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無產階級同一般農民聯合，也就是表明革命帶有資產階級性，因為一般農民就是基於商品生產的小生產者。接着，布爾什維克當時又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全體半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勞苦羣衆），使中農中立，以推倒資產階級：這就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底特徵（見我在一九〇五年著的兩個策略一書，在一九〇七年出版於彼得堡的十二年來文集中又重刊出來了）。

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曾間接參加過這次爭論，他因當時的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寫信詢問曾表示過意見，實際上他是發表了反對普列漢諾夫的意見，結果引起了那時布爾什維克刊物上的特別譏笑。現在考茨基對於那時的爭論竟一字不提（害怕別人拿他自己的話來揭破他！），致使德國的讀者無法了解問題底真相。考茨基先生於一九一八年不能給德國工人說明：他在一九〇五年，曾怎樣主張過工人同農民聯合，而不是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他當時根據什麼條件擁護過這種聯合，他關於這個聯合提出過什麼綱領。

現時開了倒車的考茨基，却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用談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傲慢詞句辯護要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主張，引證

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⁰⁴底言論，來咀嚼孟什維克那陳舊的自由派觀點；同時，他又用引證來證明關於俄國落後的新意見，而從這種新意見上得出的結論却仍是那一老套，說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不應比資產階級走得更遠！這根本違反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把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相比擬時所說的話！

在向未講到考茨基所作『經濟分析』底主要「論據」與主要內容之前，我們要指出，他的頭幾句話就表現出作者底思想是糊塗得可笑或者是淺薄輕率。

「直到現在，——我們的這位『理論家』寓意深長地說——俄國底經濟基礎還是農業，而且正是小農業。農民佔全體人口五分之四，也許，甚至佔六分之五」（第四五頁）。第一，可敬愛的理論家，你想過沒有，在這大批的小生產者中間，有多少剝削者呢？當然，不過總數十分之一，至於在城市中，他們的數量更小，因為那裏的大生產較發達。就拿極少可能的最高數目字說吧，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產者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剝削者，那你就可以看到，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佔百分之六十六的布爾什維克，是代表大多數民衆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間往往有極大部分人擁護蘇維埃政權，即在原則上全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原來都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迨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起來幹冒險暴動時，他們過去的黨中發生分裂，另組成了兩個新的政黨——『人民共產黨』與『革命共產黨』（組成這兩個新黨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曾經由舊黨提出來擔任最重要的國家職位，例如屬於前一黨的有查克思，屬於後一黨的有考里加也夫）。可見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無意中推翻了！——自己那種硬說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似乎只佔人民中少數的可笑說法。

第二，可敬愛的理論家，你是否想過小農生產者是必然要動搖

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呢？這一為歐洲全部近代史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考茨基恰巧把它「忘記了」，因為這真理把他所重複的孟什維克的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沒有「忘記」這一點，那他就不能否認在小農生產者佔優勢的國度裏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來考查我們這位理論家所作「經濟分析」底主要內容吧。

考茨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專政，這是無可爭論的。「但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呢？」（第三四頁）。

「按照蘇維埃的憲法，在有權參加立法與管理的人民中，農民佔大多數。如果人家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東西澈底實行下去，如果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真是能夠直接實現本來只有政黨才能實現的專政的話，那它就不過是農民專政而已」（第三五頁）。

良善的考茨基非常滿意這一如此深微，如此聰明的議論，於是就企圖譏諷地說道：「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最無痛苦的實現，似乎只有由農民主持的時候，才有保證」（第三五頁）。

我們這位理論家從半自由主義的普、馬斯洛夫那裏引用了許多非常淵博的話，極詳盡地來證明農民是利於糧食價格高漲和城市工人工資低廉等等的新思想。附帶說說，這種新思想，對於戰後時期的真正新現象注意得愈少，所以也就敘述得愈是乾燥無味；這些現象就是：例如農民出賣糧食時，他們所要求的代價，不是金錢而是消費品，農民所缺乏的是無論用多少錢都不能充分買到的農具。關於這一點，下面我們還要特別講到。

總之，考茨基責備布爾什維克，責備無產階級底政黨，說它把專政，把實現社會主義的事業，交給到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手裏。考茨基先生，妙極了！據你的高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究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論家想必是記起了「開口如銀，閉口如金」的格言，覺得還是閉口不說為妙。但考茨基在下面的議論中却露出了自己的馬脚：

「在蘇維埃共和國開始時期，農民蘇維埃曾是全體農民底組織。現在這個共和國宣稱，蘇維埃為無產者與貧農底組織。殷實農民失去了蘇維埃的選舉權。在這裏，貧農被認為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社會主義土地改革時的經常的與大批的產物」（第四八頁）。

何等厲害的諷刺啊！在俄國，這種諷刺從任何一個資產者口裏都可以聽到：他們都幸災樂禍地嘲笑說，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承認貧農底存在。他們譏笑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因我國在四年大破壞的戰爭後有貧農存在，而且在長時期內還將存在而表示譏笑，那末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就只有在叛變之風盛行的環境中才能產生了出來。

請再聽下去吧：

…「蘇維埃共和國干涉富農與貧農間的關係，不過不是用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為要消除城市居民的糧荒，遂把武裝工人隊伍派到鄉村中去，奪取富農底剩餘糧食。這糧食底一部份交給市民，另一部份則分給貧農」（第四八頁）。

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一想到這種辦法會有擴張到大城市近郊以外的可能（而這種辦法在我國現在已擴張到全國了），自然是憤激不平。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帶着庸人底蓋世無雙的、令人傾服的冷淡（或癡愚）態度，並用教訓口吻說道：…「這些辦法（剝奪富農的糧食）使生產過程中添加了紊亂不安與國內戰爭底新因素…」（添加到「生產過程」中的國內戰爭，這已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啊！）…「其實生產過程要健全起來，是非常需要安定與安全的」（第四九頁）。

對啊！對啊！對於那些私藏餘糧，破壞糧食壟斷法律，使城市居民發生飢荒的剝削者與糧食投機者底安定與安全，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當然是應該歎息流淚。考茨基，維伯爾（在維也納），龍格（在巴黎）和麥克唐納爾（在倫敦）等等一流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都主張工人階級革命，祇是… 祇是不要擾害糧食投機者底安定與安全！而這種替資本家服役的卑鄙齷齪行爲，却又用援引『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據遮蓋着… 如果這是馬克思主義，那末什麼才叫做向資產階級卑躬獻媚呢？

請看我們這位理論家怎樣胡說八道。他一方面責備布爾什維克，說我們把農民專政冒充爲無產階級專政。但同時他又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該把國內戰爭引進到鄉村中去（我們認爲這是我們的功績），不該派遣武裝工人隊伍到鄉間去，這些隊伍公開宣稱實行『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幫助貧農，剝奪富農與投機商人違反糧食壟斷法律所隱藏起來的餘糧。

一方面，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張純粹的民主制，主張使革命階級，即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服從大多數人民（自然也包括剝削者在內）。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我們而說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整個說來，農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基礎之上，而同時他又自命爲是擁護無產者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不是『經濟分析』，這是超等的一場糊塗。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自由主義學說底斷片，這是鼓吹向資產階級和富農逢迎獻媚的言論。

被考茨基弄成一團糟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早在一九〇五年就已完全說明了。是的，當我們還協同全體農民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我們十分明白認識到了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

年起已說過數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的這個必經的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想在這一點上來『揭破』我們，結果不過是揭破他自己的糊塗觀點，揭破他自己害怕回憶起他在一九〇五年當他還不是叛徒時所寫的東西。

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很久以前，當我們奪取政權很久以前，我們就已公開說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向前發展了，資本主義已向前發展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程度，要求（不管誰願意與否）採取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否則便不能前進，便不能挽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便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底痛苦。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築一座人工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這就是冒充學者態度，援引資本主義制度比中世紀制度進步這點來暗中對資產階級作反動的祖護，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順便說說，蘇維埃之所以是更高得無比的民主制度形式，正因為它把工農羣衆聯合起來，引進到政治生活中去，它是最接近於『人民』的（即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說到真正人民革命時使用『人民』一語所含的意思），是最能確切反映羣衆之政治和階級成熟程度及其發展程度的測量表。蘇維埃憲法並不是依照什麼『計劃』寫下來的，不是在書房內擬定出來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家強迫勞動

羣衆接受的東西。不，這憲法是從階級鬥爭發展進程中，隨着階級矛盾成熟程度而成長起來的。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認的那些事實，正是證明了這一點。

起初蘇維埃包括有全體農民。正因貧農不開通，落後，無知識，才使領導權落到了富農、有錢人、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手中。這會是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有考茨基那樣的傻瓜或叛徒，才會認爲這兩種人是社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小資產階級必然而不可免地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沙溫可夫）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因爲小資產階級由於它那經濟地位底根本特性，決不能從事獨立的行動。順便說說，考茨基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因爲他分析俄國革命時公然用『民主制』在法律上形式上的概念，即限於替資產階級効勞，遮掩這階級統治以資欺騙羣衆的概念來搪塞敷衍，却忘記了『民主制』實際上有時是表現資產階級專政，有時是表現服從這專政的小資產階級之軟弱無力的改良主義等等。照考茨基說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有過資產階級的政黨，有過領導無產階級大多數羣衆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而並沒有過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過階級的根源，即小資產階級的根源！

小資產階級——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動搖，啓發了羣衆，使他們的絕大多數，一切『下層羣衆』，一切無產者與半無產者離開了這類『領袖』。

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在彼得城與莫斯科）佔了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內部的分裂加強了。

布爾什維主義革命之勝利完成，就是意味着動搖底終結，就是意味着君主政體與地主土地佔有制底完全破壞（這土地制在十月革命以前還沒有被破壞）。資產階級革命由我們進行到底了。全體

農民是跟着我們走了的。他們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間的對抗性，一時還不能顯現出來。蘇維埃曾包括全體農民。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沒有顯露出來。

這個過程在一九一八年夏秋兩季展開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反革命暴動喚醒了富農。俄國各處都發生了富農暴動。貧農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報紙上，而是從實際生活中知道他們的利益是不能同富農、有錢人、鄉村資產階級底利益相調和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一切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反映出羣衆底動搖，並且他們恰恰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同捷克斯拉伐克叛軍聯合（在莫斯科舉行暴動，當時普洛施洋佔據了——一小時！——電報局，昭告全俄國說布爾什維克已被推倒；後來又有派去抵抗捷克斯拉伐克叛軍的軍隊總司令穆拉維也夫底叛變等等）；另一部分人，即上面已經講過的那一部分人，還是同布爾什維克在一起。

城市中缺乏食品的情形加緊，就日益銳利地提出了糧食壟斷問題（理論家考茨基在他重複十年前普、馬斯洛夫所講過的經濟分析中，「忘記了」糧食壟斷這件事！）。

那個舊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甚至是民主共和的國家，常常把實際上受資產階級支配的武裝隊伍派到鄉村中去。這是考茨基先生所不知道的！他並不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專政」，絕對不是呀！這是「純粹民主制」，尤其是當這種行動為資產階級的國會所贊同了的時候！亞甫克森鉄夫與斯、馬斯洛夫⁶⁵同克倫斯基輩與策烈鉄里等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於一九一七年夏秋逮捕過土地委員會委員這一事實，考茨基簡直「沒有聽到」，關於這一點他簡直一字不提！

全部問題就在於經過民主共和制度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不能在人民前面承認，說這個國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不能對人民說真話，不能不戴假面具。

而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蘇維埃的國家，則坦直公開地對民衆說真話，聲明它是無產階級與貧苦農民底專政，並且正是用這樣的真話把千百萬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這些公民在任何民主共和制度下都備受壓制，而現在則由蘇維埃吸收來參加政治，參加民主制，參加國家管理。蘇維埃共和國把武裝的工人隊伍，首先是把兩京都中最覺悟的工人隊伍，派到鄉下去。這些工人把社會主義帶到鄉村裏，將貧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去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

凡是明白情形並到過鄉村裏的人都說，我國鄉村祇在一九一八年夏秋才經歷着自己的「十月」（即無產階級的）「革命」。轉變關頭到了。富農暴動的風潮，已由貧農底奮起，已由「貧農委員會」底發展所代替。在軍隊內，由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員，由工人出身的軍官，師長和軍長增多起來了。正當考茨基爲七月危機（一九一八年）和資產階級底狂吠所嚇倒，而像「小公雞」一樣跟着資產階級跑，並著了一整本深信布爾什維克必爲農民所推倒的小冊子之際，正當考茨基把左派社會革命黨之退出認作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數「縮小了」（第三七頁）的時候，布爾什維主義同情者的真正數目却擴大得不可測量，因爲正是這時，有幾千百萬鄉村貧民從富農和鄉村資產階級底影響與監督下解脫出來，都覺醒起來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了。

我們失去了幾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氣節的知識份子與農民中的富農，同時我們却獲得了數百萬貧民份子*。

當無產階級革命在兩京都內已經實現了一年以後，窮鄉僻壤方面才在它的影響和幫助下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就最終地鞏

* 在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九日）上，有表決權的代表爲九百六十七人，其中布爾什維克佔九百五十八人，有發言權的代表爲三百

固了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最終地證明國內已經沒有一種能夠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了。

俄國無產階級既已同全體農民一起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最終地過渡到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此時它分裂了鄉村，把鄉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把他們統一起來，去反對富農與資產階級，也包括農民資產階級在內。

假如兩京都與大工業中心內的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沒能把鄉村貧民團結到自己周圍來反對富農，那就會是證明俄國「尚未成熟」到社會主義革命，那末農民就會仍舊是「整個的」，即仍舊是在富農、有錢人、資產階級底經濟、政治和精神的領導之下，那末革命就會是沒有超出资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但是，要附帶說明一句，即使如此，也不會證明無產階級曾不應奪取政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真正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貫徹到底了，只有無產階級才作了一些認真的事情來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它是繼巴黎公社之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與十一月，沒能等待鄉村中的階級分化，沒能準備和實行這種分化，就立刻試圖「命令」在鄉村中進行國內戰爭或「施行社會主義」，就試圖不同一般農民作臨時的聯合，不肯對中農作一些讓步等等，——那就會是用布朗基主義式的精神來曲解馬克思主義，那就會是少數人強制多數人接受自己意志的企圖，那就會是理論上的荒謬思想，不了解全體農民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了解在落後國內不經過許多過渡，不經過許多過渡階段，便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五十一人，其中布爾什維克佔三百三十五人。總計布爾什維克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七。

考茨基在這個最重要的理論與政治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而在實際行動上簡單成了資產階級手下高聲叫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奴僕。

* * *

對於另一個極有趣味與極關重要的問題，考茨基也是弄得同樣糊塗，也許更加糊塗，這問題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在土地改革這一極困難同時又極重要的社會主義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動，是否在原則上規定得正確，以及是否實施得適當？西歐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祇要看過最重要文件之後，能對我們的政策加以批評，那我們是感激不已的，因為這不但對於我們，而且對於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均能有非常大的幫助。但考茨基所作出的並不是什麼批評，而是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的一種極端糊塗的觀念，而在實際上便是反布爾什維克的一些空洞的、惡毒的、庸俗的攻擊。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大土地所有制是不能保持下去了。這是革命造成的結果。這是馬上就很明顯的事情。不能不把它交給農民了」…（考茨基先生，這是不對的：你把你認為是「很明顯的事情」混作為各階級對於這問題的態度；革命歷史證明了資產者同小資產者，即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執行過保持大土地所有制的政策。斯、馬斯洛夫底法律以及各地土地委員會委員之被捕的事實，特別證明了這一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就戰勝不了與資本家聯合的地主）。

…「但是關於這點究應在什麼形式下來實現的問題，却沒有一致的意見。可能想像出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考茨基所最關心的，是「社會主義者」底「一致」，而不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是誰。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各基本階級對這問題必然有不同的

解決辦法，這一點他却忘記了) …『從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最合理的辦法是將大田場收爲國有，然後交給向來在這些田場上充當僱工的農民，由他們用共耕社的形式來耕種這些大田莊。但這種解決辦法，應預計到有農業工人存在，而這樣的農業工人是俄國所沒有的。還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將大地產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分成小塊，租給地少的農民。那時也許還會多少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份吧』…

考茨基在這裏也是用他的那套老辦法來加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認識，另一方面却應該承認。他把各種解決辦法排列在一起，而毫不設想——唯一切實地，唯一按馬克思主義設想——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究竟應該怎樣。俄國是有農業僱工的，但人數不多，至於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如何使土地過渡到公社制與共耕制問題，考茨基竟一字不提。然而最荒謬可笑的，則是考茨基想把小塊土地的出租辦法看作爲『多少有些社會主義成份』。其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其中絲毫也沒有『社會主義成份』。如果出租土地的『國家』不是公社式的國家，而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考茨基底經常假定恰恰是這樣的國家），那末出租小塊土地，就會是一種標本式的自由主義的改良。

至於蘇維埃政權之廢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考茨基則對此緘口不言。不但如此，他還玩弄出不可思議的偽造手段，在摘引蘇維埃政權底法令時，將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故意丟掉。

考茨基聲明說『小生產是趨向於生產資料完全私有』，說立憲會議是能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權威機關』（這種論斷在俄國只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爲大家知道，工農認爲有權威的只是蘇維埃，而立憲會議則已經成了捷克斯拉伐克叛軍與地主底口號），然後他繼續說道：

『蘇維埃政府頒佈的第一批法令內，有一道法令規定：

（一）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二）地主的田

莊以及一切皇室和寺觀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都一律轉交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土地問題時為止」。

僅僅摘引了這兩條之後，考茨基就作出結論說：

「關於立憲會議字樣，始終不過是紙上空文。實際上各鄉農民已能任意處置土地」（第四七頁）。

請看，這就是考茨基『批評』方法底標本！這就是十分近乎贗造的『科學』作品。他向德國讀者示意說：布爾什維克在土地私有制問題上向農民投降了！布爾什維克讓農民各自為政的（『各鄉』）任意處置土地！

其實，考茨基所摘引的法令，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舊曆）頒佈的第一道法令，其中不止兩條，而是有五條，還加上有八條『委託書』⁶⁶，並且該法令上說這委託書『應作為指南』。

在法令第三條上說，一切農莊轉歸『人民』，必須編造『全部被沒收財產的確切冊據』，並要『用革命手段極嚴格保護』。而在委託書中又說，『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具有高度技術的農場』『不得分割』，『所有已被沒收土地上的耕畜與農具，視其大小和意義如何，概無報償一律轉歸國家或村社使用』，『全部土地劃入全民公有地產總額中』。

其次，在解散立憲會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時舉行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現在已包括在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中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在這宣言第二條第一項中說『廢除土地私有制』，『一切模範田莊與模範農業企業均宣佈為國家財產』。

可見，關於立憲會議字樣，並沒有成為紙上空文，因為另一種在農民看來，其權威更是大得不可計量的全民代表機關，已經負起了解決土地問題的責任。

其次，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六日（新曆十九日）公佈了土地社會化的法令，再次確認一切土地私有制之廢除，把土地與全部私有農具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處理，由聯邦蘇維埃政權監督之，該法律指出處理土地的任務如下：

「在農業方面用減少個體經濟的手段去發展在節省勞動與資料方面說來是更有利益的集體經濟，以期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第一一條，第五項）。

這個法律規定土地平均使用制，同時對於「誰有權使用土地」這一基本問題回答說：

「第二〇條。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境內的土地，為供社會與個人需要而有權使用者為：（甲）以文化教育為目的者：（一）以蘇維埃政權機關（聯邦的、省區的、省的、縣的、鄉的與村的）為代表的國家。（二）社會團體（應受地方蘇維埃政權監督並須經其允許）。（乙）以經營農業為目的者：（三）農業公社。（四）共耕社。（五）鄉村團體。（六）單個家庭與個人」…

讀者可以看見，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實，並且在德國讀者面前，絕對捏造了俄國無產階級國家底土地政策與土地法令。

考茨基甚至沒能提出在理論上重要的基本問題！

這些問題如下：

（一）土地平均使用制以及

（二）土地國有，——前後兩種辦法一般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局部對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的關係。

（三）共耕制是從零散小農業進到公共大農業的一種過渡形式。蘇維埃法令中對於這個問題底提法，是否能滿足社會主義底要求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以下兩個基本事實：（甲）布爾什維克在估計一九〇五年的經驗時（例如我論第一次俄國革命中土地問題的著作），曾指出土地平均使用的口號具有民主進步意義，具有民主革命意義，並且在一九一七年，即十月革命前也很確定地說過這點。（乙）布爾什維克在施行土地社會化的法令時——而土地平均使用口號便是這法令底『靈魂』——萬分確定地聲明過：這並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是不同意這一口號的；但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施行這個口號，因為這是絕大多數農民底要求。而大多數勞動者底主張和要求，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捐棄：這種要求是既不能『取締』，也不能『跳過』的。我們布爾什維克要幫助農民去捐棄小資產階級的口號，使他們能儘量迅速儘量容易地從這些口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口號。

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想用自己的科學分析來幫助工人革命，那他就應該回答如下的問題：第一，土地平均使用的思想是否真有民主革命意義，真有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意義呢？第二，布爾什維克自己投票來通過（並十二分誠實地遵守着）施行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小資產階級法令是否作得正確呢？

考茨基甚至不能看出問題底理論關鍵何在！

考茨基絕對無法否認平均思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這個革命不能比這走得更遠。當這個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它就將更加明顯地、更加迅速地、更加容易地在民衆前面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解決辦法之不足，有超出這種辦法範圍而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必要。

推倒了沙皇與地主的農民渴望實行平均制，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止這擺脫了地主和擺脫了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的農民去實現這種理想。無產者對農民說：我們來幫助你們達到『理想的』資本主義，因為土地平均使用是根據小生產者底觀點來把資本主義理想

化。同時，我們將給你們指出這種辦法之不足，以及進到共耕制的必要。

看看考茨基怎樣來否認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鬥爭的這種領導底正確性，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考茨基却寧願迴避了這問題…

其次，考茨基簡直欺騙德國的讀者，向他們隱瞞着蘇維埃政權在土地法令上把農業公社和共耕社放到第一位，而給了它們直接優先權的事實。

同農民一起，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貧苦農民，即同農民中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起，前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底政策，而這也就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却弄糊塗了，連一個問題也不能提出！一方面，他不敢說無產階級在平均使用土地問題上應該同農民分離，因為他覺得這種分離是荒謬的（而且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年間，當他還沒有成為叛徒的時候，曾爽直而明白地主張過工農聯合是革命勝利底條件）。另一方面，他又深表同情地摘引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底自由主義的鄙俗議論，而普、馬斯洛夫只『證明』從社會主義底觀點看來，小資產階級的平等是空想的與反動的，但却不說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看來，小資產階級為平等、為平均制鬥爭是進步的與革命的。

考茨基真是糊塗得沒有止境：請注意吧，他堅持說（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他要求（一九一八年）大家不要超越這個界限！同時這個考茨基却又認為小資產階級性的改革，把小塊土地租給貧農的辦法（即近於平均制的辦法）含有『某些社會主義成份』（對於資產階級革命說來）！！

這是誰也不能了解的！

此外，考茨基又暴露出他那不善於估計到一定政黨底實際政策的庸俗氣。他摘引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底言論，却不願意看到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黨底實際政策：當時該黨與地主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實際上主張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和同地主妥協（證據就是各地土地委員會委員之被捕以及斯、馬斯洛夫底法律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見，普、馬斯洛夫關於小資產階級平等底反動性與空想性的說法，實際上是掩蓋孟什維克主張農民同地主妥協（即讓地主欺騙農民）而不許農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那種政策。

好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

只有布爾什維克才嚴格估計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他們把前者進行到底時，就打開了進入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考茨基枉費心機地重複着自由派的譏刺話：『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底影響下轉到過集體的生產』（第五〇頁）。

該多麼機智啊！

無論何時何地，都還沒有一個大國底小農受到過無產階級國家底影響。

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用宣傳、政治、經濟和軍事方法援助貧苦農民的條件下，進到過貧農與富農間公開的階級鬥爭，直至他們間的國內戰爭。

無論何時何地，投機者與有錢人都還沒有因戰爭這樣大發其財，而農民羣衆則遭受這樣的破產。

考茨基只是重彈老調，咀嚼陳舊的東西，甚至害怕思索一下無產階級專政底新任務。

要請問可敬愛的考茨基，如果農民缺乏工具經營小生產，而無產階級國家却幫助他們取得機器來集體耕種土地，這難道是『理論上的說服』麼？

現在來講土地國有問題。我國的民粹派，一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在內，都否認我們所施行的辦法是土地國有。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還留在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底範圍之內，那末廢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土地國有。『社會化』這個名詞不過是表示轉到社會主義的趨向、願望與準備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土地國有，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考茨基在這裏也是甚至不能提出理論問題，或者——更壞地——故意逃避這個問題，雖則從俄國出版物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老早就有關於土地國有，土地市有（將大地產交給地方自治機關）與分配土地的爭論。

考茨基斷定說，將大地產交給國家然後把它分成小塊租給地少農民的辦法，就會實現『某些社會主義的成份』，這簡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揶揄。我們已經說過，這裏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這裏也沒有澈底完成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考茨基聽信了孟什維克的話，這真是他的大不幸。由此就弄出了這樣的笑話：考茨基擁護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意見，責備布爾什維克不該妄想走到社會主義去，但同時他自己却提出自由主義的改良來冒充社會主義，而不把這種改良貫徹到完全肅清土地私有制上一切中世紀制度的殘餘！結果，考茨基也像他那孟什維克顧問們一樣，並不是擁護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擁護懼怕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

究其實，爲什麼祇要把大地產收歸國有，而不是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呢？因爲自由資產階級用這樣的辦法可能保持最多的舊東西（這是革命中最不澈底的路綫），並且最容易回復到舊制度去。急

進派資產階級，即主張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就是土地國有口號。

考茨基在老早以前，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曾寫過一本論土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傑作，所以他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底話：土地國有正是澈底的資產階級口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同洛貝爾圖的論戰以及他在剩餘價值論一書中的精彩說明，在該書內馬克思特別明顯地指出了土地國有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意思上的革命意義。

考茨基所如此不恰當地挑選爲自己顧問的孟什維克普、馬斯洛夫，曾否認俄國農民可能贊成一切土地(包括農民土地在內)國有。普、馬斯洛夫底這種觀點，在相當程度內可能是與他的『新奇』理論(重複那些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意見的理論)，即否認絕對地租，而承認『地力遞減律』(或如普、馬斯洛夫所說：『地力遞減事實』)的觀點相聯繫的。

實際上早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就已經表露出了，俄國的大多數農民，無論村社社員或單獨農戶，都贊成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一九一七年革命證實了這一點，而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之後，就把這一點實現了。始終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並沒有企圖(恰與考茨基憑空責備我們的話相反)『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首先幫助了農民中最急進、最革命和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家，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現了實際上是土地國有的辦法。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第一天起，俄國土地私有制即被廢除了。

這樣就造成了從發展資本主義看來是最完善的基礎(考茨基若不背棄馬克思學說，就不能否認這一點)，同時也就造成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是最靈活的土地制度。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來說，俄國的革命農民已經走到了盡頭：從這種觀點看來，

決不能比土地國有，土地平均使用制『更合理的』了，從這種觀點看來，決不能比這『更急進的』了。正是布爾什維克，只有布爾什維克，只是因為有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才幫助農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而且也只有這樣，布爾什維克才儘量促進和加速了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

由此可見，考茨基該是向讀者提供了多麼糊塗的思想，他公然責備布爾什維克不了解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而自己却表現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不談土地國有，却把革命性最少的（就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冒充為含有『某些社會主義成份』的東西！

這裏我們說到了上面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即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怎樣估計到了必須實行共耕制的問題。考茨基在這裏又玩弄了一套極近乎欺詐的手法：他祇引證了一個布爾什維克論過渡到集體耕種土地任務的『提綱』！我們的『理論家』摘引了其中一項『提綱』之後，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祇是把人所共知的東西宣佈為任務，任務並因此得以解決。在俄國，集體農業，現在還祇會是一紙空文。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底影響下轉到過集體的生產。」（第五〇頁）。

無論何時何地，都還沒有過像考茨基自甘墮落所幹出的這種文字上的欺騙伎倆。他摘引『提綱』，却故意不提蘇維埃政權底法令。他講到『理論上的說服』，却故意不提握有工廠和商品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所著土地問題一書上關於無產階級國家擁有使小農漸漸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工具這一切意見，都在一九一八年時被叛徒考茨基完全遺忘了。

誠然，幾百個由國家維持的農業公社和蘇維埃農莊（即由國家出資由工人共耕社經營的大農莊），是很不夠的。可是考茨基迴避這一事實，難道可以稱為『批評』麼？

在俄國，已由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的土地國有，儘可能地保證了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怕反革命勝利又會使土地國有退到分配土地（關於這點，我在論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馬克思主義者土地綱領一文內已特別分析過）。此外，土地國有使無產階級國家有最大可能在農業中過渡到社會主義。

總結：考茨基在理論方面真是一場糊塗，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在實踐方面，則一味做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的奴僕。看，他這種批評該是多麼漂亮啊！

* * *

考茨基關於工業的『經濟分析』，是以下面這段絕妙的議論開場的：

俄國有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在這基礎上，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呢？『如果社會主義就是由各工廠各鑛山底工人把這些工廠鑛山拿來當作自己的私產（直譯是佔為己有），在每個工廠中單獨地經營生產，那末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設想。』（第五二頁）。考茨基又補充說：『正在今天，八月五日，當我寫這些話時，從莫斯科傳來了列寧在八月二日發表的一個演說詞，據說列寧在這演說中講過：『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廠，農民決不會把土地交還地主』。『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令，迄今以前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口令，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令。』（第五二至五三頁）。

我們把這段議論全部摘引出來，為的要使從前尊敬過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國工人，能親自看見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叛徒所使用的伎倆。

祇要想想：八月五日，當時俄國已頒佈了關於工廠國有的很多法令，並且沒有一個工廠是被工人『佔爲己有』，而是所有一切工廠都轉爲共和國所有，可是在這個八月五日，考茨基竟把我演說詞中的一句話用顯然的欺詐手段加以曲解，來誘導德國的讀者，似乎在俄國是把工廠交給了個別工人！考茨基這樣說了之後，就在好幾十行字內把工廠不能交給個別工人等語，三反四覆地咀嚼得津津有味！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僱來捏造謠言污蔑工人革命的那資產階級奴僕所慣用的手段。

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交給公社，或交給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再四這樣說，最後便補充說道：

『俄國現在也就是企圖走上這條道路』… 現在!! 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指八月說的嗎？難道考茨基就不能請他的史騰，阿克雪里羅得或其他俄國資產階級朋友們至少譯出一道關於工廠的法令嗎？

…『這事情究已進展了多遠，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對於我們是最有興趣的，但是這種工作現在還完全處在昏暗朦朧的狀態中。法令是多極了』…（因此考茨基就忽視其中的內容，或把這些內容向他的讀者隱瞞起來！），『可是關於這些法令實施的情形却缺乏可靠的消息。若沒有各方面詳盡可靠與迅速報導的統計，社會主義生產便是不可能進行的。蘇維埃共和國至今還不能做出這樣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它在經濟方面活動的消息，本身極爲矛盾，而且根本無從考證。這也是專政與鎮壓民主制的結果之一。沒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第五三頁）。

看呵！歷史就是這樣寫法的！從資本家與杜多夫派底『自由』出版物那裏，考茨基就會得到關於轉歸工人那些工廠的消息…這個超階級的『莊重學者』真是妙不可言了！有無數的事實證明工廠祇是

轉歸共和國，證明工廠是由蘇維埃政權設立而由職工會代表佔多數的機關，即『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支配，——這些事實，考茨基一件也不願意提起。他以『囊中人』⁶⁷底頑固態度，開口閉口都說：拿出和平的民主——不要國內戰爭，不要專政——加上很好的統計（蘇維埃共和國已創立了統計局，並任用了俄國所有一切最出色的統計人員，但要立刻得到完善的統計，當然做不到）給我看吧。總而言之，考茨基所要求的，是不要革命、不要猛烈鬥爭、不要使用強力的革命。這正像要求在罷工時工人與僱主雙方都不要有狂熱的衝動一樣。試問這種『社會主義者』究竟與庸俗的自由主義官僚有何區別！

考茨基根據這類『實際材料』，亦即帶着極端蔑視態度來故意避開無數的事實，便得出『結論』說：

『很可懷疑的是，俄國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中所獲得的真正實際成果而不是一紙法令的東西，未必會比它能從立憲會議方面——其中大多數代表也同蘇維埃一樣是社會主義者，不過色彩不同一些——得到的東西要多』（第五八頁）。

這豈不是奇談妙論嗎？我們奉勸考茨基底信徒們把這一段話更廣泛地散佈到俄國工人中去吧，因為這是考茨基所提供出來作為人們估計其政治墮落性的最好不過的材料了。工人同志們，聽啊，克倫斯基也曾是個『社會主義者』，不過『色彩不同一些』罷了！歷史家考茨基專以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自命』的稱呼與稱號為滿足。至於證明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克倫斯基時代曾擁護過帝國主義政策和資產階級搶劫行為的事實，歷史家的考茨基是連聽也不願意聽的；至於正是這些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與資產階級專政的英雄們在立憲會議中佔居多數的事實，考茨基則很客氣地隱諱不談了。而這還叫做『經濟分析』哩！

最後還要舉一個『經濟分析』底模範例子：

…『蘇維埃共和國在其存在了九個月之後，不但不能推廣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去說明發生普遍貧困的原因』（第四一頁）。

這種議論，我們從立憲民主黨人那裏已經聽得夠多了。俄國資產階級底一切走狗都這樣議論着：已經過了九個月，你們應該拿出普遍福利來了，——而這種議論是在經過了四年破壞不堪的戰爭之後，在外國資本從各方面幫助俄國資產階級底怠工與暴動的時候發出的哩。考茨基與反革命的資產者之間實際上已沒有絲毫差別，連一點差別的影子都沒有了。用『社會主義』做招牌的甜言蜜語，不過是重復俄國科爾尼洛夫派，杜托夫派與克拉斯諾夫派所毫不粉飾，毫無忌憚，爽爽直直說出的話罷了。

* * *

上面這些話，是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寫的。當天夜裏得到了從德國傳來的消息，說那裏已經開始了勝利的革命，說革命首先是在基爾和北方與沿海一帶其他各城市開始，那裏的政權已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隨後又蔓延到柏林，那裏的政權也歸蘇維埃所掌握了。

因此，我對於這本論考茨基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小冊子所應作的結論，也就沒有什麼必要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附錄一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附錄二

王德威爾得論國家的新書

我只在讀過考茨基底這一著作之後，才看到了王德威爾得著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一書（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巴黎）。令人不由地要把這兩本書拿來比較一下。考茨基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思想領袖；王德威爾得是社會主義國際局主席，也就是第二國際底正式代表。他們兩人都代表第二國際底完全破產，他們兩人都『精巧地』，以其老成練達的新聞記者手腕，用馬克思主義的辭句來掩飾這種破產，掩飾自己本身的破產及其投降資產階級的事實。前者特別明顯地表露出德國機會主義中的標本特徵，即用呆笨的，抽象的，肆意臆造馬克思主義的手段，把馬克思主義中凡是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東西概行截去。後者是在拉丁語系諸國中——在相當程度內可以說：是在西歐一帶（就是說：德國以西一帶）——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底標本人物，這種機會主義較為圓滑，不那樣呆笨，更為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其所用的基本手段則與前者相同。

* 見本卷第二九五至二九九頁。

他們兩人都根本曲解了馬克思底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可是王德威爾得多說到第一個問題，而考茨基則多說到第二個問題。他們兩人都抹煞這兩個問題之間極端密切而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兩人都在口頭上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是叛徒，都是用全力找出各種遁詞來避開革命。他們兩人底書中都絲毫沒有那貫徹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切著作中的東西，絲毫沒有那使真正社會主義區別於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所作揶揄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絲毫沒有說明革命任務與改良任務的區別，絲毫沒有說明革命策略與改良主義策略的區別，絲毫沒有說明無產階級在消滅僱傭奴隸制度或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與『大』國內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瓜分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之極小部份額外利潤和額外贓物中所起的作用這兩者間的差別。

現在我們舉出王德威爾得幾個最重要的議論來證實這種估計。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非常熱心地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言論。他也如考茨基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言論中，除了資產階級所完全不能接受的言論而外，除了區別革命者與改良主義者的言論而外，是什麼都援引的。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話，他說過不知多少，因為這一點已由實際活動引進到純粹的國會鬥爭範圍內去了。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經驗之後，認為共產黨宣言有一部分已經陳舊必須用說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國家機器而應當將其打碎的這一真理加以補充的事實，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竟不約而同地完全隱瞞了恰恰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中最重要東西，恰恰是區別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改良的東西。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他之所以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只是為要拒絕這個專政。考茨基以粗笨的捏造手段來作到這點。

王德威爾得也是幹的這種勾當，不過手段要巧妙一些。他在自己那本書中第四章，即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章內專用«b»節論到『無產階級底集體專政』問題，他『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我重說一遍：他恰恰是把那些最主要的地方，即關於打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地方通通丟掉了），就作出結論說：

「…在社會主義者中間，人們通常都是這樣來想像社會革命：建立新巴黎公社，但這次將是獲得勝利的公社，並且不是在一個地方勝利，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個主要中心裏獲得勝利。

這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因為目前已經看得很明顯，戰後時期在許多國家內，將有空前未聞的階級衝突和社會動盪。

不過，如果說巴黎公社底失敗——更不用說俄國革命底困難了，——真是證明出什麼，那末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在尚未充分準備來利用那可能由於情勢所趨而落到自己手裏的政權以前，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第七三頁）。

關於問題實質的話，不過如此而已！

請看，這就是第二國際底領袖和代表人物！在一九一二年，他們簽字擁護過巴塞爾宣言，其中逕直講到正是後來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的那次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聯繫，他們直接威嚇說要實行這種革命。但當戰爭已經發生而革命形勢已經造成了的時候，他們這些考茨基輩與王德威爾得輩，便開始用遁詞來否棄革命了。據說：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只是一種並非不可思議的假設！這同考茨基關於蘇維埃在歐洲可能發生作用的議論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要知道任何一個有學識的自由派份子都是這樣議論的，這些自由派份子現在一定會同意說：新巴黎公社『並非不可思議

的』蘇維埃將有很大的作用等等。無產階級革命家與自由派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作為一個理論家，應該從理論上分析巴黎公社與蘇維埃底新國家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於這個問題有過詳細的說明，而王德威爾得却把這一切完全抹煞了。

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實行家和政治家，應當說明，現在只有社會主義底叛徒才會拒絕下列的任務：闡明必定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式的、蘇維埃式的、或假定還有什麼第三種形式的革命），說明必須準備這種革命，必須在羣衆中宣傳革命，駁斥反對革命的市儈偏見等等。

考茨基或王德威爾得之所以都根本不來作這件事情，正因為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是希圖在工人中間保持其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底聲譽的叛徒。

試從理論上來提出這個問題吧。

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也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考茨基知道這個真理，承認這個真理，贊成這個真理——但是…但是他避開了最根本的問題：當無產階級奪得無產階級國家時，它究竟應當鎮壓哪一階級，為什麼要鎮壓這一階級，以及用什麼手段去鎮壓。

王德威爾得知道馬克思主義底這個基本原理，並承認、贊成和引證這個原理（見他的書中第七二頁），但是…他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關於鎮壓剝削者底反抗這一（在資本家先生們看來）是「不愜意的」問題！！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完全迴避了這個「不愜意的」問題。他們的叛徒立場也就在這裏。

王德威爾得也如考茨基一樣，是用折衷論來代替辯證法的巧手：一方面，不能不認識，另一方面，應該承認。一方面，國家可

以了解爲「民族底總和」（見李特列編的字典——不待說是博學的著作！——參看王德威爾得書中第八七頁），另一方面，國家可以了解爲「政府」（同書同頁）。王德威爾得抄襲這個學者的庸俗論調，稱讚這種論調，把這種論調和馬克思底言論列在一起。

王德威爾得說：

「『國家』一語底馬克思主義的含意與通常的含意不同。因此就可能發生「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國家，並不是廣義的國家，不是作爲管理機關，作爲社會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代表的國家，而是國家政權，是威權機關，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王德威爾得書中第七五至七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滅國家時，只是就後一種意義的國家而言…「過於絕對的論斷，未免有不確切的危險。在建築於單祇一個階級統治的資本家國家，與以消滅階級爲目的的無產階級國家之間，有許多過渡的階段。」（第一五六頁）。

請看，這就是王德威爾得底「手法」，它與考茨基所用的手法，只有微小的差別，其實是一邱之貉。辯證法否認絕對真理，而闡明歷史上對立物底更迭與危機底意義。折衷論者不願意「過於絕對的」論斷，爲的是要暗中貫徹其市僧庸人的希望：以「過渡的階段」去代替革命。

至於資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之間的過渡階段，恰恰就是那推倒資產階級、打碎和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所隱瞞不說的。

至於資產階級專政應由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專政來代替，至於革命底各「過渡階段」之後，接着就是無產階級國家逐漸

消亡的各「過渡階段」，——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所一概抹煞的。

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立場。

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學上，用折衷論和詭辯說去代替辯證法。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它把由一個階級專政轉到另一個階級專政的「過渡」，與由無產階級民主國家轉到非國家（「國家底消亡」）的「過渡」這兩者區分開來。考茨基輩和王德威爾得輩底折衷論與詭辯說，却爲了迎合資產階級而抹煞階級鬥爭中一切具體的與確切的東西，提出所謂「過渡」這個一般概念來掩蓋（現今十分之九的正式社會民主黨人都藉此掩蓋）其背棄革命的行為！

王德威爾得在運用折衷論和詭辯說方面，要比考茨基巧妙些，精細些，因爲用「由狹義國家轉到廣義國家的過渡」一語，可以避開任何一個革命問題，可以避開革命與改良之間的一切區別，甚至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因爲試問哪一個受過歐式教育的資產者竟會想來「一般」否認這種「一般」意義的「過渡階段」呢？

王德威爾得寫道：

「我同意黑得底意見，若不預先執行下列兩個條件，就不能把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社會化，這兩個條件就是：

（一）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手段，把現在的國家，即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變成孟格爾所稱的勞動人民國家。

（二）把威權機關的國家和主管機關的國家分開，或如聖西門所說的，把對人的管理和對物的支配分開」（第八九頁）。

王德威爾得把這段話加上了着重點，表示特別強調這些論點底意義。須知這是純粹折衷主義的糊塗觀念，是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須知「勞動人民國家」一語，不過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派所標榜，而為恩格斯所責斥為無稽之談的「自由人民國家」的舊調重彈而已。「勞動人民國家」一語乃是合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身份的辭句，乃是以非階級概念去代替階級概念的辭句。王德威爾得把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奪得國家政權與「人民」國家放在一起，殊不知由此只得出糊塗觀念。從考茨基底「純粹民主制」中，也得出同樣的糊塗觀念，得出忽視階級革命底任務，忽視無產階級階級專政底任務，忽視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國家）底任務等等同樣的市僧反革命立場。

其次，只有在國家完全消亡的時候，對人的管理才會消逝無餘而讓位於對物的支配。王德威爾得用這種較為遙遠的未來，去搪塞和蒙蔽最近將來的任務，即推倒資產階級的任務。

這種伎倆又是等於替自由資產階級効勞。自由派是同意談談在用不着對人施行管理的時候，將會是怎樣的。試問談論這種無害的空想又有何妨呢？至於無產階級因資產階級反抗剝奪其財產而加以鎮壓一事，那就最好閉口不談了。這是資產階級利益所要求的。

「社會主義反對國家」。這是王德威爾得在恭維無產階級。恭維是不難的，任何一個「民主主義」政治家都是善於向自己的選民說恭維話。但在「恭維話」的掩蓋之下，却包含着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內容。

王德威爾得詳細地轉述了阿斯特羅夫斯基的議論，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文明、溫柔、美觀的外表之下，該掩藏着多少欺騙、強暴、收買、造謠、說謊、壓制貧民等等的把戲。但是，

王德威爾得並不從這裏做出應有的結論來。資產階級民主制鎮壓被剝削勞動羣衆，而無產階級民主制應當要鎮壓資產階級，這一點他絲毫沒有看出。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對於這一點都是瞎子。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小資產階級叛徒們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而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則要求他們避開這個問題，隱瞞這個問題，或直接否認必須實行這種鎮壓。

市僧折衷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詭辯論反對辯證法，庸俗改良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王德威爾得底書所應有的標題。

寫於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

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一至四一二頁。

奪得了與記載了的東西

在革命中，只有無產階級羣衆奪得了的東西才是牢固的。只有真正牢固奪得了的東西才值得記載下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這不僅是俄羅斯人，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羣衆奪得了的勝利品底記載，而且是德國的，奧國的，匈牙利的，芬蘭的，瑞士的，——一言以蔽之，是國際的無產階級羣衆所奪得了的勝利品底記載。

正因為如此，所以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成立是牢不可破的事業。

僅在四個月前，還不能說，蘇維埃政權，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是國際的勝利品。在蘇維埃政權中，本來有一些東西，而且是很重要的東西，是不僅屬於俄國的，而且是屬於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可是，在未經事實檢查以前，還不能說，世界革命之繼續發展會引起何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底深刻程度和重要性如何。

德國革命作了這樣一種檢查。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步着最落後國家之一的後塵，在很短的期間內，在不過百餘日的時間內，向全世界不僅表明了相同的革命基本力量，不僅表明了相同的革命基本方向，而且表明了相同的新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基本形式：蘇維埃。

除此以外，在英國，在這個戰勝國，在這個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在這個以「社會和平」聞名最久的國家，在這個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看見有蘇維埃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羣衆鬥爭底蘇維埃新形式 „Shop Stewards Committees”，即工廠代表委員會之廣泛強大、沸騰而不可遏阻的增長現象。

在美國，在這個最富強最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羣衆對蘇維埃表示莫大的同情。

堅冰開始融解了。

蘇維埃在全世界獲得了勝利。

蘇維埃獲得了勝利，首先而且最多是指在奪得無產階級羣衆對自己的同情這一方面。這是最主要的。不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採用何種殘暴手段，不管對布爾什維克採用何種追究和屠殺手段，都是不能把這個勝利品從羣衆手上奪去的。而且「民主派」資產階級愈加兇殘，則這種勝利品在無產階級羣衆底心靈中，情緒中，意識中以及在他們進行鬥爭的英勇決心方面，就會愈加牢固。

堅冰開始融解了。

於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創立了第三國際的共產黨人國際代表會議，也就這樣容易，這樣順利，這樣安穩而堅決地進行了自己的工作。

我們所記載了的，都是已經奪得了的東西。我們寫到了紙上的，都是在羣衆意識中已經鞏固了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了，並且各人根據本國的經驗都看見了，覺得了，觸到了：新的，按力量與深度說來是世界上所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運動已在沸騰起來，這個運動不是任何陳舊框子所能拘限，也決不是那些慣耍小政治把戲的名角，那些英美「民主」資本主義代表人，具有全世界政治經驗的老奸巨猾如路易、喬治輩和威爾遜輩，那些久經水火厚顏無恥的亨德孫、倫諾德爾與布蘭亭之流，以及一切其他社會沙文主義的英雄們所能加以遏阻的。

這個新運動正走向於無產階級專政，不管有着各種動搖，不管迭遭嚴重失敗，不管發生空前未有和無可形容的『俄國式的』混亂（如果從旁按其外表來看），但它正以千百萬無產者底洪流之沖毀沿途一切障礙的雄力，向着蘇維埃政權邁進。

我們已把這記載下來了。在我們的決議案中，提綱中，報告中和演說中，都把已經奪得的東西反映出來了。

被全世界革命工人之豐富嶄新經驗底萬丈光芒所照耀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了我們瞭解當前事變底全部規律性。它會幫助那些爲剷除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而奮鬥的全世界無產者去更加明白瞭解到自己鬥爭底目的，更堅決地按照已經規定的道路前進，更可靠地，更牢固地取得勝利和鞏固勝利。

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這就是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底前階，就是共產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底前階。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五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五至二六頁。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 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鼓掌)。同志們，根據我們和布哈林同志商定的分工報告辦法，我負責來說明委員會對於許多具體而最引起爭論或使黨現時最爲關心的諸條文的觀點。

我首先把布哈林同志在他報告末尾說到我們委員會內部發生爭論的一些條款，作一簡單說明。第一，這就是綱領總論部分結構底性質。我覺得布哈林同志在這裏把委員會大多數爲什麼絕不同意從黨綱內勾去所有關於舊資本主義條文的理由，敘述得不完全正確。照布哈林同志的說法，有時令人覺得，似乎委員會大多數害怕人們非難這點，害怕人們責備委員會大多數不夠尊敬往事。毫無疑義，這樣來敘述委員會大多數人的立場，那末這種立場就很可笑了。但這與事實遠遠不相符合。委員會大多數之所以否決這種企圖，是因爲這種企圖不正確，因爲這種企圖不適合於實際情況。不帶資本主義主要基礎的純粹帝國主義從來都沒有過，現在任何地方沒有，將來也是決不會有的。把財政資本主義描寫爲似乎沒有絲毫舊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是關於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財政資本主義所得出的不正確的總和。

這是不正確的。這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時代，是特別不正確的。以前恩格斯在一篇論到未來戰爭的文章中就已寫過，他說，未來戰爭比之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將要破壞得更加殘暴得多，人類將要大大退化，人工造成的工商業機構將要遭到破產。戰爭開始時，社會主義叛徒和機會主義者曾誇揚資本主義底生命力，而把我們稱爲「狂信家或半無政府主義者」來加以嘲笑。他們說：「看呵，這種預言並沒有實現。事變證明，這僅僅對於很少幾個國家並且是在很短時期內才是正確的！」那知現在，不僅在俄國，不僅在德國，並且在各戰勝國中也開始了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破壞，其表現往往是取消着這類人工造成的機構，恢復舊的資本主義。

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說可以來試試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破壞情景作一完整的描寫，那時我們反駁過他，在這裏我也來駁斥他的這種意見，說：你去試試看，你也就會知道這是不會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曾作過一次這樣的嘗試，結果他也只好自行放棄。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作到這點，那末布哈林同志便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因爲他對這個問題研究得非常多，又研究得非常詳細。我敢斷言，這樣的嘗試決不會成功，因爲這裏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我們俄國此刻正經歷着帝國主義戰爭後果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情景。同時在俄國許多彼此較前更加隔絕的省區內，我們往往遭逢着資本主義底復活及資本主義最初階段的發展。要想跳出這種狀況是不行的。若照布哈林的心願來寫成黨綱，那末這樣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這樣的黨綱至多也不過是把關於財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最好的描寫重述一遍，但決不是現實的描寫，因爲在我們的現實中，恰巧沒有這種完整性。由性質不同的部分所構成的黨綱，是不漂亮的（但這當然不重要），可是另一樣的黨綱，簡直會是不正確的。不管這種龐雜性，不管這種由不同材料所組成的結

構是如何不令人快意，如何不夠整齊，但我們在很長時期內還是跳不出這種狀況。當我們跳出了這種狀況的時候，我們就會製定出另一個黨綱。可是那時我們已經是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了。而硬說在那時也會像在現時一樣，那就是太可笑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資本主義底許多最原始的基本現象都復活了的時候。就拿運輸業的破產情形來說吧，這是我們切身所極感痛苦的事。這是在其他國家，甚至連戰勝國裏都有的現象。而在帝國主義制度下，運輸業破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等於退回到商品生產底最原始形式上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究竟什麼是投機小販。這個名詞外國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至於現在呢？你們去和出席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談談吧。你們就會知道，原來在德國，在瑞士也有與此相似的名詞發生着。這個名詞是決不能歸納到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範疇中去的，而一定要把它歸返到最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最低級的商品生產時期中去。

用製定漂亮完整黨綱的辦法來跳出這個可悲的現實，就無異跳上九霄雲外，無異製定不正確的黨綱。決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客氣暗示的那樣，由於尊敬往事，才迫使我們不得不把舊黨綱中的一些條文插進這裏來。結論就是：一九〇三年在列寧參加下所寫的黨綱，無疑義地是不好的黨綱，但因老年人最愛回憶過去，所以爲了尊敬往事，他們也就在新時代製定的新黨綱中重復着舊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這樣的傻子本可以拿來譏笑一頓。我敢斷言，並不是這樣一回事。一九〇三年所描寫的那個資本主義，到現今一九一九年時在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中，恰巧由於帝國主義底瓦解，由於帝國主義底破產而繼續存在着。例如，這樣的資本主義在離莫斯科並不很遠的薩馬拉省和維亞得卡省內都可以找到。當內戰把國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時候，我們決不會很快就能脫出這種投機小販現象。因此把黨綱構成另一樣式，便不正確。黨綱上應當說到

真實的情形，黨綱內所包括的應當是絕對不容置辯和事實確鑿的東西，只有這樣的黨綱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綱。

布哈林同志在理論上完全瞭解這點，他說，黨綱應該具體。但瞭解是一回事，實行却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同志底具體性是對財政資本主義的書本上的敘述。而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看見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在每個農業省區內，我們都看見自由競爭與壟斷工業同時並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不與許多部門內的自由競爭同時並存的壟斷資本主義，從來未曾有過，而且也決不會有的。寫出這樣的制度，就是寫出脫離實際生活的不正確的制度。既然馬克思說，手工工場制是普遍小生產底上層建築物，那末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主義便是舊資本主義底上層建築物。把這個上層物一破壞，就會暴露出舊資本主義來。認為彷彿有不包含舊資本主義的完整帝國主義，這種觀點便是把願望當作現實。

這是容易犯到的一種很自然的錯誤。假如在我們面前真的存在有把資本主義完全改造了的完整帝國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會輕易千百萬倍了。這就會構成這樣一種制度，那時一切都會唯一服從於財政資本主義。那時就只須把上層拆除，而把其餘一切交給無產階級就行了。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這是實際生活中所沒有的。按照現實發展的情形，必須完全作另一種看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物。當帝國主義崩潰着時，便發生上層物的破壞和根基的暴露。所以如果想使我們的黨綱成為正確的黨綱，就應在黨綱中寫出真情實況。存在有舊的資本主義，它在許多部門中成長到了帝國主義。它的趨向只是帝國主義的。對於各種根本問題只能從存在有帝國主義的這觀點來觀察。沒有一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可以不根據因存在有此種趨向這點來解決的。此刻黨綱上所說的不是這一點。在現實中存在有舊資本主義莫大的基地。存在有帝國主義上層建築物，這上層建築物引起了戰爭，而從這戰爭中產生

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始基。要想跳出這個階段是辦不到的。這一事實也就表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的本身，並且在許多年中仍然會是事實的。

西歐革命也許會經過得順利一些，可是爲了改造全世界，爲了改造大多數國家，畢竟還需要很多很多年。而這就是說，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過渡時期中，也無法跳出這種龐雜紛繁的現實。儘管這個由各種不同部分組成的現實是如何不漂亮，但要一棄了之是決不行的。用另一種方式製成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黨綱。

我們說，我們走到了專政。這是很瞭然的。可是應當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了的。舊的事物千頭萬緒地拖住我們，纏住我們，不讓我們前進一步，或者迫使我們前進得壞，正像我們現時的情形一樣。所以我們說，爲了使人瞭解我們究竟落到了什麼境況中，就必須說出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引我們來的，是原始商品經濟形式的資本主義。必須認清這一切，因爲只有估計現實，我們才能解決例如對中農態度這樣的問題。的確，試問在純粹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怎樣能有中農的呢？須知甚至在普通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沒有過中農哩。如果我們唯一站在存在有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這觀點上來解決我們對這個幾乎是中世紀現象（即對中農）態度的問題，那我們便絕對不能自圓其說，並且還會碰很多釘子。如果我們要改變對中農的態度，——那就也請在理論部分費心說說，中農是從何處產生的，以及什麼是中農。中農是小商品生產者。這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初步常識，而必須直接說出它，因爲我們終究還沒有了解這初步常識。如果藐視這一點，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財政資本主義，爲什麼還要來研究這種初步常識！』——那麼這種態度就極不莊重了。

至於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我也要這樣說。布哈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把願望當作現實。他說，承認民族自決權是不可以的。民族

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一起。我們，無產者，竟要來承認某一可鄙的資產階級底自決權！這真豈有此理！不對，請原諒，這是真情實理。如果勾去這一條，結果你那裏就只會是幻想。你所藉口的，是民族內部發生的分化過程，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可是我們且來看看這分化的經過情形究竟怎樣吧。

例如德國是模範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它在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曾超過美國。它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都比美國低些，可是在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在把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方面，曾高於美國。看來這可稱為模範。但其實那裏的情形又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與資產階級分化了呢？沒有！僅僅有關於幾個大城市的消息，說那裏多數的工人反對謝德曼派。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由斯巴達克團與德國那些可惡至極的孟什維克式的獨立黨人結成聯盟才達到的，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糟成一團，想使蘇維埃制度和所謂立憲會議結合起來！你看，這就是在這德國發生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個先進的國家哩。

布哈林同志說：『我們幹麼要民族自決權？』。我應當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夏季提議取消最低限度綱領而只留下最高限度綱領時我所駁斥過他的話，拿來重複一遍。我當時回答他說：『上戰場別吹，下戰場再吹吧』。我們首先要奪得政權，再稍微等等，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做的。果然，我們奪得了政權，也稍微等了一些時候，現在我同意來這樣做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全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已經打退了威脅我們的第一次逼攻，現在這樣來做是適宜的了。關於民族自決權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說：『我只願意承認各勞動階級底自決權』。這就是說，你所願意承認的，是除俄國以外，實際上在任何一國都還沒有達到的東西。這是很可笑的。

請看芬蘭的情形吧：芬蘭是民主國家，是比我們發達一些，文

明一些的国家。那裏正在發生無產階級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進展情形是很特殊的，是比在我國困苦得多。芬蘭人受過了德國專政的壓迫，現在又受着協約國專政的壓迫，由於我們承認民族自決權，而使那裏的分化過程容易進展一些了。我當時在斯草爾雷必須把正式文書交給那個起過劊子手作用的芬蘭資產階級代表斯潤胡德——意譯就是「豬頭」——時的這番情景，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很客氣地握了我的手，我們互相恭維了幾句。這是多麼不好呵！但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因為當時這資產階級欺騙人民，欺騙勞動羣衆，藉口說是大莫斯科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撲滅芬蘭人。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

昨天我們對於巴什基爾共和國不也是必須這樣做的嗎？當布哈林同志說：「對於某些民族是可以承認這種權利的」，我甚至記下來了，在他所說的這張名單中，包括有霍屯督人，布西門人，印度人。當我聽到他所例舉的這張名單時，我就想到：布哈林同志怎麼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記了巴什基爾民族呢？布西門人在俄國境內是沒有的，說到霍屯督人，我也沒有聽見過說他們冀望成立自治共和國，但是在我國有巴什基爾人，基爾吉茲人及其他許多民族，這些民族的自決權，我們是不能拒絕承認的。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居住在舊俄帝國境內的民族都不能拒絕這點。就假令巴什基爾人在我們幫助下會推翻他們底剝削者，但這只是在革命已經完全成熟了的地方才能做到。並且要做得很謹慎，以免我們的干涉會阻礙我們所應當促進的無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試問我們對於那些至今還處在阿洪影響之下的基爾吉茲人，薩爾特人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俄國，居民有過與牧師周旋的長期經驗，所以前者才幫助我們把這些牧師趕掉。但你們知道，新婚姻法至今還執行得很壞。我們是否可以走到這些薩爾特人跟前，向他們說：「我們要打倒你們的剝削者」？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們還是完全服從自己的阿洪。這裏

必須等待這一民族的發展，等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成份分化開來，而這種發展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布哈林同志却不願意等待。他急不可耐地說：『爲什麼要等待？既然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我們還要這樣做呢？』。這是帶鼓舞性的號召，並含有對我們道路的指示，但如果我們在黨綱中只宣佈這樣一點，結果便會不是黨綱，而是一張宣言了。我們可以宣佈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宣佈完全鄙視那些值得加以千百次鄙視的資產階級，可是在黨綱中應當絕對確切地寫出真情實況。只有這樣，我們的黨綱才會是無可爭辯的黨綱。

我們是站在嚴格的階級觀點上。我們在黨綱裏所寫的東西，也就是承認在我們寫過一般民族自決權的時代以後所實際發生了的事情。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共和國。當這類共和國已經出現之後，也祇有按它們出現的程度，我們才能寫出像我們寫在這裏的此種條文：『按蘇維埃式樣組織起來的聯邦國家』。蘇維埃式樣還不就是如在俄國已經存在着的蘇維埃，但是蘇維埃式樣已在成爲國際性的式樣。我們所能說到的，僅僅到這裏爲止。再往前去，那怕是再多進一步，再進一寸一分，就已會是不正確的了，所以在黨綱裏也就不能這樣規定。

我們說：必須顧計到這個民族是處在從中世紀制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的哪一個階段。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切民族都有權自決，不值得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門人特別提出來說。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至少十分之九，也許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適合於這種論斷。因爲所有一切國家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道路上。這是必經的道路。再說多一點便不行了，因爲再多說，便會是不正確，便會是不合乎實際情形。勾去民

族自決字樣而寫上勞動者自決字樣，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這樣的提法便是不顧計各民族內部的分化經過着如何困難，如何曲折的道路。在德國，這種分化的進展情形是與俄國不同的：在某些方面進展的快些，而在另一些方面則進展得慢些，並且還是經過流血的道路。在我國，如像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的這種怪誕思想，是任何一個政黨也沒有接受過的。須知我們還得與這些民族比隣而居。現在謝德曼派已經在說我們想佔領德國。這當然是很可笑的無稽之談。但是資產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發行有千百萬份的報章雜誌，向全世界大聲宣傳這一點，而威爾遜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擁護這一點。他們說，布爾什維克擁有很大的軍隊，想用佔領的手段來在德國培植布爾什維主義。德國的優秀人物——斯巴達克團員——告訴我們，人們挑撥德國工人反對共產黨員說：你們看，布爾什維克那裏的情形是多麼壞啊！而我們現在也不能說我們這裏的情況是很好的。於是在德國，他們就用這種理由去影響羣衆說，在德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就會是造成與俄國一樣的混亂狀態。我們的混亂狀態是我們綿延不癒的疾病。我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必得來克服極大的困難。當德國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雖是一部份工人，還受着那種說『布爾什維克想用強力手段建立自己制度』的騙語威嚇時，『勞動者自決』的公式是不會使現狀好轉的。我們應當做到，使德國社會主義叛徒們無法來說布爾什維克強制人家接受他們的萬有制度，似乎這種制度可以由紅軍的刺刀帶到柏林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自決的原則，那人家就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

我們的黨綱不應當說勞動者自決，因為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的黨綱應當說現有的實在情形。既然各個民族還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中不同的階段上，那末我們黨綱中所寫的這個原則便是絕對正確的。我國在這條道路上有過許許多多迂迴曲折。每個民族都應當獲得自決權，

這也就會促進勞動者底自決。在芬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是進展得非常顯明，強而有力，並且是很深刻的。那裏的全部過程定會與我國有過的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說不承認什麼芬蘭民族，而只承認勞動羣衆，這就是空洞至極的廢話。不承認實在情形是不行的：這種實在情形會強迫你承認它的。在不同的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離是各自走着特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的動作應當極端謹慎。尤其是對於各個不同的民族要特別謹慎，因為對民族懷着不信任的心理，是最壞不過的事情。在波蘭，無產階級正進行自決。以下便是華沙工人代表蘇維埃成份最終的數字：波蘭社會主義叛徒三百三十三人，共產黨員二百九十七人。這就表明，照我們的革命年曆看來，那裏很快就到『十月』了。這已經是一九一七年的八月或九月。但是第一，還沒有頒佈過法令，要所有一切國家都遵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日曆，就即令頒佈了這樣的法令，也是不會執行的。第二，現在的情形，乃是比我國工人先進，文化程度較高的波蘭大多數工人，都持着社會護國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觀點。必須等待一下。這裏決不能說什麼勞動羣衆自決。我們應當宣傳這種分化。這點我們已經在作，但毫無疑義，現在決不能不承認波蘭民族自決。這是十分顯然的。波蘭無產階級運動是與我國無產階級運動走的同樣的道路，即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前進，可是前進的方式却與俄國的不同。而在那裏，人們用下面的話來恐嚇工人：向來壓迫波蘭人的大莫斯科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在共產主義名稱掩蓋之下把他們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移植到波蘭來。共產主義是不能用強力手段來移植的。有一個優秀的波蘭共產黨員同志聽見我向他說：『你們要用另一個樣式做去』，他便回答我說：『不，我們將做到同樣的事，不過要比你們做得好一些』。對於這種說法，我絕對無法反駁。應當讓他們有可能實現這個謙虛的願望：把蘇維埃政權建立得比我們的好一些。不能不顧計到那裏所走的道路帶有特殊性，

決不能說：「打倒民族自決權！我們只讓勞動羣衆有權自決」。這種自決過程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現時除俄國以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自決，必須預先見到其他各國發展的種種階段，決不要從莫斯科發出任何指令。所以這個提議在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根據我們擬定的計劃，我來說到我應當說明的以下各點。我把小私有者和中農問題提在第一位。關於這一點在黨綱第四十七條上說：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有計劃地逐漸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的任務是要使中農和富農分離，用仔細關心中農需要的辦法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同時用從思想上影響的手段，決不是用高壓手段去和他們的落後性作鬥爭，凡是觸犯到他們生活利益的地方，都必須力求同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上要向他們讓步」。

我覺得我們這裏所構成的語句是社會主義創始人對中農問題也說過多次的話。這個條文的缺點只是不夠具體。在黨綱內，我們未必能寫得更具體一些。但是在代表大會上必須提出的，不僅屬於黨綱的問題，關於中農問題，我們也應當加倍地，再三再四地加以注意。恰巧此刻我們得到消息，說在已開始氾濫於俄國諸農業區的暴動中，顯見有一個總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是與原已決定在三月間舉行總進攻並組織多處暴動的白黨底軍事計劃，顯然有着聯繫。代表大會主席團擬定有一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不久會報告給你們聽的。這些暴動再明顯不過地向我們表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份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曾在布良斯克組織暴動——充當白黨的直接奸細。白黨的總進攻，農村暴動，鐵路交通斷絕：難道這樣還不能把布爾什維克推翻麼？這裏，中農所起的作用特別重要，特別生命攸關。在代表大會上，我們不僅應當強調我們對中農的讓步

態度，而且要想出許多可以直接給中農某些利益的盡量具體的辦法。這是爲了自衛起見，爲了反對我們的一切敵人起見所迫切要求的辦法，這些敵人知道中農是動搖於我們與他們之間，而極力企圖引誘中農離開我們。就我們的現狀看來，我們擁有巨大的後備力量。我們知道，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發展着，並且發展得很快。這些革命會給我們以無產階級後備力量，會減輕我們的困難而大大鞏固我國無產階級的基地，這種基地此刻在我們這裏原是薄弱的。這是在最近幾月內發生的事變，可是我們不知道這事變究竟會在哪一天發生。你們知道，現在進到了非常緊張的關頭，所以現在中農的問題也就獲得了極大的實踐意義。

往下我想說到合作社問題，——這就是我們黨綱第四十八條。這條黨綱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陳舊了。當我們在委員會裏起草這條黨綱時，我國只存在有合作社，可是還沒有消費公社，但幾天之後便通過了把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合併爲統一的消費公社的法令。我不知道這個法令會否公佈，在這裏出席的大多數人是否已見過這個法令。如果沒有公佈的話，那末，這法令明天或後天定會公佈的。這條黨綱在這一方面是已經陳舊了，但是我覺得這條黨綱仍然需要，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從頒佈法令到執行法令，其中的距離是相當遠的。關於合作社的事情，從一九一八年四月起我們就已費盡心力來料理，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但這還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成就。把居民聯合在合作社裏的事業，有時我們達到了這樣大的範圍，就是在許多縣份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農村居民已經聯合起來了。但這些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就已存在了的合作社，澈頭澈尾地浸透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精神，而領導這些合作社的，又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資產階級專門家。我們還無法使這些合作社服從我們，在這方面，我們的任務仍是沒有解決的。我們的法令，在建立消費公社的意義上說，是前進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俄所有各

種形式的合作社都必須合併起來。但是這個法令，即令我們把它完全執行，也還是會把工人合作社保留為將來消費公社中自主的部份，因為熟悉底細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們證明說，工人合作社這較為發展的組織，應當保存起來，因為它的活動是客觀上所必須的。我們黨內關於合作社問題有過不少的分歧和爭論，合作社裏的布爾什維克工作人與蘇維埃裏的布爾什維克工作人之間，發生過磨擦。我想在原則上，這個問題無疑是應當按這樣的意思來解決：既然這種組織是資本主義在羣衆中準備起來了的唯一組織，是在還處於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農村羣衆中從事活動的唯一組織，所以這個組織無論如何都應當保存和發展起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拋棄它。在這裏，任務是很困難的，因為充當合作社領袖的人，大半都是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往往還是真正的白黨份子。由此也就發生了對他們的仇恨心理，正當的仇恨心理，由此也就發生了反對他們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當然應該進行得很巧妙：要斬斷合作社工作人員中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可是這不應成為是同合作社組織作鬥爭。我們一面要排除這些反革命的活動份子，同時應當使合作社組織本身都服從我們。在這裏的任務是與對待資產階級專門家的態度一樣，後者已是我所指出的另一個問題了。

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磨擦和意見上的分歧。日前我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作報告時，寫來問我的問題中有幾個是關於薪資定額的問題。有人問我：難道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裏，薪資可以達三千盧布之多麼？實際上我們在黨綱裏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在這一點上發生的不滿已經是很厲害的了。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在軍隊裏，在工業裏，在合作社裏都發生着，到處都發生着。這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只有利用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來把共產主義變成爲大衆所容易接近的東西時，才能建成共產主義。想用別一種方法來建成共

產主義社會是不行的。而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建成共產主義，就必須把機關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就要吸收所有這些專門家來參加工作。我們在黨綱中故意把這個問題發揮得很詳細，以便用急進方法來解決它。我們明白知道，俄國文化落後是什麼意思，這種落後性對蘇維埃政權發生怎樣壞的影響；蘇維埃政權雖在原則上給予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對全世界作出了這種民主制的模範，可是這種文化落後性却玷辱蘇維埃政權並復活着官僚制。蘇維埃機關在口頭上是全體勞動羣衆都能接近的，而在實際上却遠不是他們全體所能接近，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根本不是法律妨礙了這一點，如像在資產階級時代那樣；恰恰相反，法律並且促進這點。但是這裏單有法律還不夠。必須有廣大的教育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而這需要有長期的巨大工作，決不是法律所能迅速作成的。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問題在本屆代表大會上應當有極肯定的解決。這樣的決議就會使那些無疑義是在傾心諦聽這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有可能憑藉代表大會的威信來進行工作，並親眼看見我們遇到了怎樣的困難。這樣的決議會幫助那些隨時隨刻都碰到這個問題的同志們至少是來參加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到莫斯科來出席代表大會的斯巴達克團代表同志們告訴我們說，在德國西部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即斯巴達克團在工人中影響最大的區域，雖然斯巴達克團在那裏還沒有獲得勝利，可是在許多極大企業裏的工程師和經理們到斯巴達克團員那裏來說：『我們要跟你們一塊走』。我們這裏沒有過這樣的情形。顯然那裏由於工人的文化水準高些，技術人員更無產階級化些，也許還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便造成了這種與我國情形多少不同的關係。

無論如何，這裏正是我們繼續前進中的主要阻碍之一。我們應當立刻，不等待其他國家的援助，馬上提高生產力。要做到這點，沒有資產階級專門家參加是不行的。應該這樣肯定不移地說。當

然，這些專門家中大多數人都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必須由工人政治委員們和共產黨支部造成同志合作的氣氛，來包圍他們，要使他們無法脫走，但同時應當讓他們有可能獲得比在資本主義下更好的工作條件，因為不如此，則這個由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階層就不會替我們工作。想用強迫手段迫使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行的，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可以迫使他們不去積極參加反革命陰謀，可以恐嚇他們，使他們害怕伸手去拾起白黨的宣言。在這一方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動作得很積極的。這是可以作到的事情，這也是我們作得很充分的事情。我們大家都學會了這樣作。但是，要用這樣手段來強迫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批人慣於文化工作，他們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推進過文化工作，就是說，使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無產階級所分受的份量却渺小得不足道了，——但是他們總算推進了文化，這也就是他們的職業。當他們看見工人階級中湧現出有組織的先進階層，這些階層不但重視文化，而且在羣衆中幫助推行文化工作，那時他們就會改變對我們的態度。當醫生看見無產階級喚起勞動羣衆自動來進行防疫事宜時，他就會用完全另一樣態度來對待我們了。在我國這種由資產階級的醫生，工程師，農業技師，合作社手所組成的階層是很廣大的，當他們在實踐上看見無產階級吸引愈益增多的廣大羣衆參加這種事業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僅在政治上斬斷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而已。那時我們的任務就會容易些了。那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的被吸收到我們機關中來，而成爲它的組成部份。爲了這點，必須作相當犧牲。爲了這點，那怕付去二十萬萬盧布都是渺小不足道的。害怕這種犧牲便是幼稚氣，因爲這就是不懂得擺在我們面前的那些任務。

運輸業解體，工業和農業解體就破壞着蘇維埃共和國的整個生存。這裏我們應當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使全國所有一切力量都極度

緊張起來。對專門家，我們不應當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門家不是剝削者的傭僕，而是文化工作者，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會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全世界社會主義者都曾說，這些人在無產階級社會裏是會向我們服務的。在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應當盡可能給他們較好的生活條件。這將是頂好的政策，這將是最合理的經營辦法。否則我們節省了幾萬萬盧布，却可能喪失甚至幾千萬萬盧布所不能恢復的東西。

當我們和勞動人民委員施米特同志討論薪資定額問題時，他舉出了以下的事實。他說，我們在平衡工資水準方面作了很多工作，這種工作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作過，並且是它們在今後幾十年中所不能作到的。例如戰前的薪資定額：粗工每天一個盧布，每月二十五盧布，而專門家的薪資每月是五百盧布，更不待說那些領得幾十萬盧布薪資的人了。專門家領的薪資比工人多到二十倍。我們現在的薪資定額，是從六百盧布起到三千盧布止，高低相差只到五倍。關於平衡工資一層我們作過很多的事。不錯，我們現在是對專門家付給過度的薪資，但爲了受到教益才付給他們多餘的薪資，這不僅值得，而且是應當的，在理論上是必須的。我以爲這個問題在黨綱上規定得充分詳細。必須加倍着重指出這個問題。在這裏，不僅要在原則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要使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回到各地去時，在向自己組織作報告和在各人的全部活動中，都能把這一點加以實現。

我們已經在動搖不定的知識份子中獲得了巨大的轉變。如果我們昨天說過使小資產階級政黨合法化，而今天却逮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末，在這種擺動中我們是執行着完全肯定的路綫。這種擺動裏貫徹有一條最堅決的路綫，就是斬斷反革命活動，以及利用資產階級文化機關。孟什維克是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因爲他們披上了一層無產階級的外皮，但實際上是個非無產階級的階

層。在這個階層中只有極少數上層份子是无產階級出身，而這個階層本身却是由小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這個階層已在趨向於我們。我們要把這整個階層都爭取過來。每當他們趨向於我們時，我們都說：『請你們來吧』。每一次這樣的擺動，都有這個階層中的一部份人走到我們這方來。孟什維克和新生活派的情形曾是這樣，社會革命黨人的情形也曾是這樣，所有這些動搖份子的情形，也將是這樣，這些份子還會在很長時期內，東搖西擺，垂頭喪氣，從一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對於他們這些人是無法可想的。但是我們會從這一切擺動中得到文化知識份子階層來參加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隊伍，而摒除那些繼續擁護白黨的份子。

按照分工報告辦法我所要說明的下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官僚主義以及吸引廣大羣衆參加蘇維埃工作的問題。老早以前就聽見過對官僚主義的怨聲，這種怨聲無疑是有根據的。我們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作到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作到的事情。那種澈頭澈尾都是官僚主義的和帶資產階級壓迫性的機關，甚至在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都仍舊是這種性質的機關，已經被我們連根帶蒂剷除了。單就法庭來說吧。自然在這裏的任務是比較輕易一些，在這裏曾不須建立新的機關，因為根據勞動階級的革命法權意識來裁判，這是誰都會作的事情。我們在這方面還遠沒有把一切貫徹到底，可是在許多方面，我們已把法庭照應有的那樣建成起來了。我們建立了這樣的機關，它們能夠吸收每一個人，不僅男子，而且婦女，即最落後和最不靈便的份子，人人都來參加。

在另一些管理部門中的職員，是更加守舊的官僚。在這裏，任務是要困難些。沒有這種機關便行不通，所有一切管理部門都需要有這種機關。在這裏，我們正受着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在德國，大概這種痛苦要輕微一些，因為德國的官僚機關經過了很大的考驗，官僚們在那裏絞盡腦汁，可是那裏也強迫他們工作，而

不像在我國辦公室的那些人，專門坐在安樂椅上安閑度日。我們已經把這種舊官僚主義份子趕走掉，檢舉過，然後又開始委派他們擔任新的職務。沙皇時代的官僚漸漸轉入蘇維埃機關，實行官僚主義，裝扮為共產主義者，並且爲了鑽營陞遷起見，設法取得俄國共產黨的黨證。所以剛剛把他們趕出大門之後，他們又從窗戶裏鑽進來了！這裏主要是由於文化工作人材不夠。這些官僚本來可以驅散，但是決不能一下子把他們改造過來。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就是組織任務，文化任務和教育任務。

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澈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不僅不可能，並且法律本身也妨礙這樣作去。那怕在最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儘管那裏底民主制如何發展，還是有無數法律上的障礙，阻礙着勞動羣衆去參加管理工作。我們已經澈底掃除了這些障礙，可是我們至今還沒有達到使勞動羣衆能夠參加管理工作的地步，——因爲除了法律之外，還有文化水準，而這你是不能使之服從任何法律的。這種低度的文化水準遂使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經過勞動羣衆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在實際上，却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爲勞動羣衆而實行管理的機關，但不是經過勞動羣衆本身來從事管理。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只有用長期教育工作才能解決。目前這個任務對於我們是困難到了極點，我已屢次指出過，這是因爲担任管理的工人幹部還異常缺乏。我們應當獲得後援。照各種情形看來，國內的這種後備力量正在增長着。莫大的求知慾望以及往往是由校外學習辦法所達到的莫大教育成績，亦即勞動羣衆在教育方面所獲得的巨大成績，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種成績雖非任何學校範圍所能包括，但它確是非常巨大。一切標誌都表明在最近將來就可獲得巨大的後備力量，來代替很感缺乏的無產階級幹部中那些勞累過度的人們。然而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況是非

常困難的。官僚已被打敗了。剝削者已被剷除了。但是文化水準還沒有提高，所以官僚們又佔據了舊有的位置。要把他們排擠出去，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比迄今以前更大規模地組織起來，同時真正實行吸引工人來參加管理的種種辦法才能作到。這些辦法，你們在每個人民委員部方面都很知道，我也就不來詳細說明了。

我必須講到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剝奪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的憲法承認無產階級比農民佔有優越地位，承認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西歐方面的純粹民主主義者攻擊我們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我們回答過他們，而且現在還回答他們說，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忘記了他們那裏所說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我們却已進到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在吸收工人和貧苦農民參加國家管理這點上，蘇維埃共和國過去幾個月來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一個國家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做到的。這是絕對的真理。誰也不會否認：我們對於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民主制，對於吸收工農參加管理方面所已經做了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國在幾百年內所未會做到，而且也是它們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決定了蘇維埃的意義，正由於這一點，蘇維埃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口號。

但是這絲毫也不能使我們擺脫因為羣衆文化程度不夠所碰到的困難。關於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絲毫也不是從絕對的觀點來出發，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隨時隨地都還要鎮壓資產階級，但可以不必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這在理論上是完全允許的。這是理論上完全可以想像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就不把我們的憲法提作為其他國家的模範。我們只是說，誰認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無須鎮壓資產階級，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鎮壓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必要的，但剝奪它的選舉權與平等權却不是必要的了。我們不願意給資產階級以自由，我們不承認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可是我們在黨綱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認為如像工人與農民不平等這類的辦

法，就根本不是憲法上所必須載定的。憲法是在這些辦法業已實現以後，才把它們明文規定下來。蘇維埃的憲法甚至不是布爾什維克擬訂的，而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就擬訂出來，實則是反對他們自己的。他們是按照實際生活所擬訂的那樣來擬訂了這憲法。無產階級組織的發展比農民組織的發展快得多，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而給了工人實際上的優越地位。往後的任務就是要從這種優越地位逐漸過渡到工農間的平等地位。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以後，誰也沒有把資產階級趕出蘇維埃去。是資產階級自己遠遠離開了蘇維埃。

關於資產階級選舉權問題，情形就是這樣。我們的任務，便是要把問題提得十分明顯。我們絲毫不會說我們的行動不對，但要完全確切地列舉出真正的事實。我們的憲法，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會不得已才把這種不平等載入進去，因為文化水準低，因為我們的組織弱。可是我們並不把這點看成是理想，恰恰相反，按照黨綱，我們黨定要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來消滅這種在較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不平等，一到我們提高了文化水準，我們就要把這種不平等現象消除掉的。那時我們就可以不要這種限制了。這種限制就在革命勝利後不過十七個月的現時，其實踐意義已經是很微小的了。

同志們，這就是我認為在討論黨綱時所必須說到以供大家今後討論的主要幾點。（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三一至一四七頁。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 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長時間的鼓掌)。同志們，我要向你們道歉，我沒有可能參加本代表大會所選出的農村工作副委員會的一切會議。所以從開始就參加了該副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們底發言，會來補充我的報告。副委員會終於擬定了提綱，並交給了委員會，這個提綱，以後還會有人向你們報告的。我祇想來說說這問題底一般意義，這個問題在副委員會工作結束後怎樣提到了我們面前，以及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現在怎樣提到全黨面前的情形。

同志們，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每一階段上，我們必須把社會生活中某種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提到首位，這是完全自然的。革命總是觸動，而且不能不觸動最深刻的生活基礎和最廣泛的民衆，所以在革命時期，任何一個黨，任何一個甚至最接近羣衆的政府，也絕對不能一下子就顧計到生活各方面，這也是很自然的。我們此刻要來討論關於農村工作問題，並在這問題中特別注意到中農狀況的問題，這從無產階級革命一般發展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什麼奇怪失常的地方的。當然，無產階級革命會必須從解決兩個敵對階級，即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開始。其基本任務就是要使政權轉入工人階級手中，保證工人階級專政的實現，推翻資產階級，並剝奪資產階級政權底那種經濟策源地，即無條件是障礙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經濟策源地。我們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都深信這樣一個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這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的原因，能起着決定作用的，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現在我們却看見有許多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孟什維克營壘中的人——斷言說，似乎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決鬥期間可能有一般民主制底統治。百般應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孟什維克就是這樣說着。好像並不是資產階級依據切身利益來自行建立或取消民主制哩！既然如此，那末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就根本談不上什麼一般民主制。所令我們驚訝的，只是這類馬克思主義者或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我們的孟什維克，如何迅速地揭穿自己，如何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面目。

馬克思一生鬥爭得最多的，就是反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幻想。馬克思對於自由平等的空話譏笑得最爲厲害，因爲這些空話所掩護着的，是工人餓死的自由，或出賣勞動力者與那好像是在自由市場上自由而平權地購買工人勞動等等的資產者之間的平等。馬克思在其所有一切經濟著作中，都闡明了這點。可以說，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全書專係闡明這一真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設人，領導者，推動者；無產階級則是這個社會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夠代替它的力量。在馬克思底任何一部著作中，沒有一章不是闡明這個問題的。可以說，參加第二國際的全世界各國社會黨人都曾千番百次在工人面前賭咒發誓，說他們了解這個真理。但是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已進到爭奪政權的真正決鬥的時候，我們

却看見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全世界老社會黨的領袖都忘記了這個真理，而來純粹機械地重複着什麼一般民主制的庸俗詞句。

在我國，當人們說到什麼「民主派專政」時，便企圖使這些話表現得似乎更爲「有力」。這就簡直是荒謬無稽之談了。我們從歷史上明明知道，民主資產階級底專政不過是對起義工人所實行的鎮壓而已。從一八四八年起就是這樣，——無論如何也不遲些，但是個別的例子在這時以前也就可以找到。歷史告訴我們，正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才廣泛而自由地開展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之最尖銳的鬥爭。在實際經驗中，我們也見到了這個真理底正確。如果說，蘇維埃政府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所採取的一切步驟，都特別表現出在各種根本問題上的堅定性，這正是因爲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真理，從來也沒有忘記過這個真理。只有一個階級底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問題。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戰勝資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羣衆來反對資產階級。

但從此決不應得出結論說，當資產階級已被推翻，政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裏，而在往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似乎我們也可以不要中間份子參加；這種說法是極端錯誤的。

自然，在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時期，這革命活動家們底全部注意力都要放在解決主要的基本的問題上，就是放在解決無產階級底統治以及用戰勝資產階級來保證這個統治，——保證資產階級不能復辟的問題上。我們明明知道，資產階級至今還佔有這樣的優勢，即它在其他國家內還保存有自己的財富，或者，有時甚至在我國內它還握有巨量的金錢。我們很好地知道，還有許多比無產階級更有經驗的社會成份幫助着資產階級。我們又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沒有拋棄復辟的念頭，沒有停止恢復自己統治的企圖。

但是遠遠還不僅如此。資產階級所最重視的原則是：「哪裏好，那裏就是祖國」。從金錢意義上說來始終是國際主義的資產階級，它在世界範圍內此刻還是比我們強些。資產階級底統治是在迅速毀壞着，它看見有如匈牙利革命這樣的例子，——關於匈牙利革命我們昨天已很榮幸的通知了你們，今天又得到證實這點的消息，——它已經開始懂得它的統治是在動搖中。它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但是此刻如果估計到全世界範圍內的物質資財，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在物質方面，現在還是比我們強些。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實際活動，本來是而且不能不是放在解決這個基本問題上：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根除資產階級復辟的任何可能。這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必須的，而且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成效地作了許多事情。

現在就應當把關於其他階層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應當把有關中農的全部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我們大家在農村工作副委員會中所得出的結論，而且我們相信全黨工作人員都會同意這一點的，因為我們不過是把他們觀察所得的經驗作了一個總結而已。

當然，也許會有人不去思考我國革命進程如何，不去思考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什麼，反而利用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每一步驟來加以譏笑，來進行所謂批評，正如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老爺們所幹的那樣。這些人至今沒有了解，他們終究應當在我們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我們對於這些人表示了多番容忍態度，甚至是寬大態度，我們再一次地讓他們能來感受我們的這種寬大態度，但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要改變這種容忍和寬大態度了，而如果他們再不選定自己的立場，那我們就要絕對嚴重地向他們提議，叫他們到高爾察克那裏去。（鼓掌）。我們並不期望這批人會表現出什麼特別輝煌的本事。（笑聲）。但是可以期望，這批人親身嘗到高爾察克底殘暴滋味之後，定會懂得，我們有

權要求他們在我們與高爾察克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如果說，在十月革命後的頭幾月中有許多很幼稚的人抱着這類蠢想，以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偶然現象，那末現在甚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應當懂得，這乃是在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逼攻下所進行的鬥爭中一種合乎規律的現象。

實際上只樹立有兩種力量：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誰讀了馬克思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誰讀了所有一切偉大社會主義者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那他從來也不曾是社會主義者，絲毫也不懂得社會主義，只不過是自己冒稱為社會主義者罷了。對於這些人，我們給他們一個短短的考慮期限，要求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人，是因為他們現在說，或者將來會說：「布爾什維克提出了中農問題，就是想向他們頻送秋波」。我知道得很清楚，這類論據和更壞的論據在孟什維克刊物中是散佈得很廣的。我們唾棄這些論據，我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把我們敵人的空談胡說看作有什麼意義。這些至今擅長於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跑來跑去的人們，是可以隨便信口開河的。而我們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條道路。

決定我們道路的，首先是對階級力量的估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鬥爭經常發展着。當這個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前，我們就要把加倍的注意力，集中於將這個鬥爭進行到底。這個鬥爭現在還沒有結束。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成就。現在國際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之發生，便是最好不過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我們在鄉村中的建設事業，顯然已超出了那一切都服從於為政權而鬥爭的這基本要求範圍之外。

這一建設事業經歷過兩個主要階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同全體農民一塊去奪取政權。這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當時鄉

村中的階級鬥爭還沒有開展起來。我已經說過，鄉村中的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直到一九一八年夏季才開始。假使我們不曾善於發動這個革命，那我們的工作便是不完全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城市中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式的管理制。第二個階段是在鄉村中分出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成份，使之與城市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在鄉村中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點對一切社會主義者說來，都是主要的，不承認這點，則社會主義者便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了。這個階段基本上也已經完結了。我們最初為這個目的而建立的組織，即貧農委員會，已經非常鞏固，以致我們已有可能用正當選舉出的蘇維埃來代替它們，就是說，把鄉村蘇維埃加以改組，使其成為階級統治的機關，成為在鄉村中的無產階級政權機關。不久以前中央執委會所通過的，而且當然是大家週知的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以及關於轉到社會主義農業的過渡辦法的法令，乃是從我國無產階級革命觀點上對過去階段所做的一個總結。

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之首要基本任務的主要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正是因為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現時日程上便提出了更複雜的任務：對中農的關係。誰以為提出這個任務，就好像是削弱我們政權的性質，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就好像是改變我們基本的政策，那怕是部份的改變，那怕是稍微的改變，——誰這樣想，誰就是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的任務，共產主義變革的任務。我相信，在我們黨內不會有這樣的人。我只是想警告同志們一聲，要提防那些在工人黨外可以找到的這一種人，他們之所以會這樣說，並不因為這是從什麼世界觀裏產生出來的意見，而祇不過是為了損害我們的事業和幫助白匪，簡言之，就是想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中農始終是動搖的，他們不能不動搖，而且還會在很長時期內動搖不定的。這種人為了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便會說：『看吧，他們向你們頻送秋波了！可見他們重視了你們的暴動，可見他們動搖起來了』等等

等等。必須使我們所有一切同志在思想上都武裝起來反對這種煽動。我相信，我們現在若能從階級鬥爭觀點提出這個問題，那我們的同志才能在思想上武裝起來。

很顯然的，這個基本問題乃是更加複雜而又同樣迫切的任務，即怎樣確定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態度？同志們，這個問題，從理論上看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困難問題，因為這種理論已為極大多數工人所領會。你們總還記得，例如，在考茨基著的論土地問題一書中，那時他還是正確敘述馬克思學說並為大眾公認為土地問題上負有絕對權威的人，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點，他說道：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就是要中立農民，即是使農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守中立，使農民不能去積極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我們。

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很長時期內，農民總是擁護資產階級政權，總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祇要注意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及其統治底政治手段，那麼，這種原因是很清楚的。我們不能指望中農立刻會站到我們方面來。但是我們若能執行正確政策，經過一個時期，這種動搖就會停止，農民也就會站到我們這方面來。

恩格斯與馬克思共同奠定科學馬克思主義基礎，亦即我黨所經常作為南針，特別是在革命時期作為南針的學說，恩格斯就已確定了農民的分類，他把農民分為小農，中農和大農，這種分類直到現在對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恩格斯說：『或許甚至對大農也不是到處都定要用強力鎮壓』。至於說到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用強力來對待中農（小農是我們的朋友），這點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設想過。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即他逝世前一年，當土地問題已擺在日程上時所說的話。這個觀點所表明的真理有時為人們所遺忘，可是這在理論上我們大家都是同意的。對於地主和資本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完全剝奪他們。但是對

待中農，我們則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力手段。甚至對待富農，我們也不能像對待資產階級這樣肯定不移地說：要絕對剝奪富農。在我們黨綱中已載明了這種區分。我們說：鎮壓富農底反抗，鎮壓富農底反革命陰謀。這還不是完全剝奪富農。

我們對待資產階級和對待中農的基本區別，就是完全剝奪資產階級，而與不剝削他人的中農聯盟，這個基本路綫在理論上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對這一路綫並不一貫遵守，有些地方，人們還沒有學會遵守這個路綫。當無產階級已推翻資產階級並鞏固了自己政權而從各方面從事建立新社會的時候，中農問題就提到了第一位。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否認建設共產主義的情形在大農國與小農國是互不相同的。這是最初步的起碼的真理。從這個真理中就得出結論說，我們愈接近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我們的注意力在某種範圍內也就應當正是集中到中農問題上。

有許多事情都取決於我們如何確定對中農的態度。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已經解決了的。可是我們有過很好的經驗，我們根據自身經驗知道在理論上解決問題與實際上執行決定這兩者間的區別。我們已緊緊接近到了足以作為法國大革命特徵的那種區別，那時法國國民公會宣佈了許多規模浩繁的設施，但卻無應有的支柱來實現這些設施，它甚至不知道，為了執行某種辦法，究竟應該依靠哪一個階級。

我們所處的條件是幸運得無比的。由於有了整整一世紀的歷史發展，我們知道我們要依靠哪一個階級。但我們同樣也知道，這個階級的實際經驗還非常不夠。對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說來，基本任務是很明顯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把政權交給工人。但是要怎樣來實現這一點呢？大家都記得，我們從工人監督工業進到工人管理工業時經過了何種困難，作過了多少錯誤。而這還是我們隨時接觸的，我們階級內部，即無產階級內部的工作咧。現在我們却要

確定我們對新階級，對城市工人所不知道的那個階級的態度。我們必須確定對這個沒有一定穩固地位的階級的態度。無產階級大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眾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當我們進到對待中農這樣的階層時，就可見到這是一個動搖不定的階級。這個階級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它不剝削其他勞動份子。它曾須在幾十年內，經受千辛萬苦來保持自己的生活地位，它親身嘗到地主和資本家剝削的苦況，它經受住了一切苦難，而同時它又是私有者。所以在我們對待這個動搖階級的態度中，有着莫大的困難。根據我們一年多來的經驗，根據我們半年多在鄉村中進行的無產階級工作，根據鄉村中已經發生的階級分化情形，我們在這裏首先就要避免急性病，避免死板理論，避免強求把我們正在擬訂的東西，把我們還沒有擬訂出的東西，當作是已經規定好了的現成東西。在副委員會選出的委員會所向你們提出，並且以後還有個報告人會向你們宣讀的決議案中，你們就會看見對這一點已有充分的警告。

從經濟觀點上說來，我們顯然必須幫助中農。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我們實際的習慣中，在我們現有的文化水準下，在我們可以派到鄉村中去的具有文化和技術知識的幹部不夠的情形下，在我們對待鄉村工作常覺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我們的同志就常常使用強迫手段，因而損害着全部事業。就在昨天，有一個同志交給我一本由俄國共產黨（布）尼什哥羅得委員會印行的叫作尼什哥羅得省黨工作佈置手冊的小冊子；我在這本小冊子裏，例如在第四一頁上，看見有以下的語句：『關於非常稅的法令應當把全部重担加到鄉村富農、投機者以及一般中農身上』。請看，這真算是人們如何「瞭解了」！或者這是印錯了的字，但這樣的錯字是決不容許的！或者這是由於工作慌忙，在這種事業上稍一慌忙，該是如何危險。或者這裏簡單是由於不瞭解，而這是最壞的推測，我很不

願這樣來推測尼什哥羅得的同志。很有可能，這簡單是由於疏忽的原故。

有一個同志在委員會內敘述到實踐中常發生過的下列情形。有一次，許多農民圍繞着這個同志，每個農民都向他問道：『請你斷定斷定，我是不是中農？我有兩匹馬和一條奶牛。我有兩條奶牛和一匹馬』，諸如此類等等。你們看，這被派往各縣的鼓動員必須有一隻準確的溫度表，以便放到每個農民身上去測量一下，然後來斷定他究竟是不是中農。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知道每個農民經濟的全部歷史以及他對上層農民和下層農民的關係，而我們要確切知道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這裏需要有許多實踐才幹，要熟知地方情形。這種本領我們還沒有。承認這一點，根本沒有什麼慚愧；我們必須公開承認這點。我們從來都不是空想家，從來也沒有想像過：我們要用純粹共產主義社會中產生和教育出來的純粹共產主義者之純潔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這乃是童話。我們要用資本主義的殘磚碎瓦來建設共產主義，而且只有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那個階級才能做成這件事情。你們明白知道，無產階級並不是沒有沾染資本主義社會底缺點和弱點的。它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同時也反對本身方面的缺點。無產階級優秀的先進的部份，既然幾十年內在城市中進行了拚命的鬥爭，也就得以在這個鬥爭中接受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並且在相當程度內已經承受了這種文化。你們知道，甚至在各先進國中，鄉村都注定是黑暗無知的。當然，鄉村的的文化會由我們提高起來，但這是多年的事業。這就是我們同志往往忘記了的事情，這也就是據各地來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中特別明顯向我們表明的情形，他們不是此地的知識份子，也不是機關人員，——這些人的話，我們聽得很多，——而是在實踐上觀察過鄉村工作的人。正是他們所說的話，在土地問題副委員會內對我們特別有價值。我相信現在整個

黨代表大會上也會特別重視他們的話，因為這些話不是從書本上拿來，不是從法令中得來，而是從實際生活中學來的。

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們去研究如何儘量明顯地確定我們對中農的態度。這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為這種明顯性是實際生活中所沒有的。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要想立刻一下解決，那它還是無法解決的。有人說：『本來用不着頒佈這樣多的法令』，並責備蘇維埃政府，說它只會起草法令，但不知道如何去執行這些法令。實際上這些人沒有覺察到，他們如何滾到白匪方面去。假使我們曾希望頒佈百十個法令就可以改變鄉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真會是十足的呆子了。但假使我們拒絕用法令來指明道路，那我們就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這些在實踐上不能立刻完全執行的法令，本來也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以前我們是用一般的真理來作宣傳，現在我們却是用實際工作來作宣傳。這也是一種宣傳，但這是用行動作宣傳，不過不是某些暴發戶底單個行動，對於這種暴發戶，我們在無政府主義者和舊社會主義盛行的時代曾多番加以嘲笑過。我們的法令是一種號召，但不是按以前那種精神的號召：如『工人們，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啊！』。不是這樣的，而是對羣衆的號召，號召他們去作實際的事情。法令，這是一種號召人們去做廣泛實際事業的指令。這是最主要之點。就讓這些法令中有許多是不中用的，有許多是實際生活中行不通的。可是在這些法令中有供實際事業採用的材料，而法令底任務也就是要教會那些聽從蘇維埃政權的千百萬人去進行實際步驟。這是在鄉村中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之實際行動的試驗。如果我們這樣看法，那末從所有一切法令、命令和決議中，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益處。我們並不來把它們當作無論如何都要立刻一下執行的絕對的決議。

必須避免所有一切能在實踐上助長個別舞弊現象的事情。有些鑛營份子，野心家，已在某些地方混入了我們的隊伍內，這種人自稱

爲共產主義者來愚弄我們，他們之所以鑽進我們隊伍裏來，是因爲共產黨現在掌握政權，是因爲那些比較誠實的『公務人員』由於他們的思想落後，沒有來到我們這裏工作，而這班野心家却毫無思想，毫無良心。這種人只求陞遷拔擢，他們在各地實行強迫手段，並且以爲這是很好的辦法。在實際上這有時引起農民說：『蘇維埃政權萬歲，祇是打倒康姆尼！』（即共產主義）。這樣的事並不是誰捏造出來，而是由實際生活中，由各地同志報告中得來的實際情形。我們不應當忘記：任何放肆，任何急躁慌忙，都會造成莫大的害處。

以前我們是必須無論如何都要用拚命跳躍的手段，來趕急跳出帝國主義戰爭，因爲這個戰爭把我們弄到破產了，必須拚命努力來擊潰資產階級，擊潰那些想來壓倒我們的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不這樣，我們當時便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如果對待中農也採取同樣方式來行動，那就是十足的愚痴，十足的魯鈍，十足地足以顛覆我們的事業，祇有挑撥離間份子才能自覺地這樣做。現在的任務應當完全是另一樣的。現在的任務已不是打破那些顯然是剝削者的抵抗，戰勝他們，推翻他們，如像從前那樣。現在，我們既已解決了這個主要任務，於是在日程上就提出更複雜的任務了。這裏採用強力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西歐方面，雖然那裏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和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雖然該處本來最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哪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主張過用強力手段對待中農。

我們在奪取政權時，曾經依靠了全體農民。那時全體農民只抱有同一個任務，就是與地主作鬥爭。但是直到現在農民中還保存有反對大農莊的成見。農民想到：『如果有了大農莊，那我又要當僱農』。當然這是錯誤的。但農民對大農莊的這種觀念，是由於他們

仇恨和回想以前地主怎樣壓迫人民的事實。這種心理還存在着，這種心理還沒消除。

我們所應首先倚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物可以拆去，而只留下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的情事。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物，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有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康姆尼』是最好的東西。當然如果在鄉村裏出現了急忙從事的人，他們從城市裏飛跑而來，一度閒談，鬧了幾次知識份子的意氣，有時甚至非知識份子的意氣，然後吵鬧一頓，就走掉了，這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這是常有的情形。這班人不但不會引起敬意，反而會引起譏笑，而這種譏笑乃是完全合理的。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指出，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但應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以便奪得農民的信任。際此以前，我們還是農民的學生，而不是農民的教師。誰對農業及其特點一竅不通，跑到鄉村中去，只是因為聽說公營農莊有益，因為疲於城市生活才想到鄉村去工作，而自認為在各方面都是農民的教師，那他就是再蠢笨不過的了。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再愚昧不過的了。

這裏的任務不是剝奪中農，而是要顧計農民生活底特殊條件，要向農民學習過渡到優良組織的方法，決不可擅自發號施令！這就是我們為自己所定下的規章。（全場鼓掌）。這就是我們在決議草案中所力圖說明的規章，因為，同志們，我們在這一方面真正犯過不少的錯誤。承認這一點絲毫也不慚愧。過去我們沒有經驗。我們同剝削者鬥爭的方法本身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如果有時人們因我

們採取這種方法而責難我們，那我們就說：『資本家老爺們，這是你們自己的罪過。假使你們不是這樣野蠻地，這樣狂妄地，這樣厚顏無恥拚死命地抵抗，假使你們沒有去和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那末，革命也就會採取比較和平的形式』。現在我們打退了各方面的瘋狂逼攻之後，便可以轉到採用另一種方法了，因為我們不是什麼小組，而是領導千百萬人的政黨。千百萬人不能一下子就懂得方針改變，所以原本是用來給予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頭上。這是毫不足怪的。只是必須懂得，這是由於歷史條件所引起，這種歷史條件業已消失，而對於這個階級的新條件和新任務却要求有新的心理意識。

我們關於農民經濟的法令，基本上都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根據來拒絕或懊悔其中任何一個法令。但法令雖然是正確，但若用強力去強迫農民來接受，便是不正確的了。在任何一個法令中都沒有這樣說過。這些法令，作為指明出來的道路，作為進行實際設施的號召，是正確的。當我們說：『鼓勵建立組合吧』，這等於發出指令，這指令是應當經過多次試驗，以便找到實行這些指令的最終形式。既然說必須求得自願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這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勵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是不好的事情。假使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末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起初需要證明這樣的組合真是好些，把人們組合起來時，要使他們是真正被組合起來，而不是一鬧而散，要證明這樣組合是有利益的。農民是這樣提出問題，我們的法令也是這樣提出問題。如果我們以前還不善於這樣做，這並沒有絲毫可羞的地方，我們應當公開承認這一點。

我們已經解決了的，暫時還不過是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基本任務，即戰勝了資產階級。這個任務我們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雖然

現在開始了最困難的半年，這時全世界帝國主義者都在最後努力想來壓倒我們。現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他們自己已經懂得了，過了這半年後，他們的事情便會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或者他們現在利用我們疲憊不堪的時機，來戰勝我們這個國家，或者我們將成爲不僅專就我國一國而言的勝利者。在這半年中，當糧食危機和運輸危機都加厲起來，而帝國主義列強又想從幾條戰線上向我們進攻之際，我們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是最後的困難的半年。必須仍然緊張一切力量，去與侵襲我國的外部敵人作鬥爭。

但說到農村工作底任務時，不管一切困難，不管我們的全部經驗至今是用在直接鎮壓剝削者方面，——我們都應當記得，都不要忘記在鄉村中對於中農的任務乃是另一樣的。

在彼得城，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和莫斯科，所有到過鄉村裏的覺悟工人都向我們舉出若干例子，說有許多看來是無法解決的誤會，有許多看來是非常重大的衝突，可是一當有能幹的工人出來說話時，——這些工人所說的不是書本上的話，而是農民所懂得的話，不是像指揮官一樣擅自發號施令，（雖然他們不懂得農村生活），而是像同志一樣來解釋實際情形，來喚起農民們那種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情感，——一當這些工人發言以後，誤會和衝突就減弱下去，消除下去了。這種用同志態度去解釋問題所達到的結果，是成千累百儼然以指揮官或上司自居的人所不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現在向你們提出的全部決議案中所貫注的精神。

我在自己的簡短報告內，是想說明這個決議底原則方面和這個決議底一般政治意義。我想證明，——並且我希望是得以證明了，——從整個革命利益的觀點說來，我們路綫上沒有任何變動，沒有任何變更。白黨份子及其幫手們都在叫喊這點，或者將會叫喊這

點。讓他們去叫喊吧。我們是不得去理會他們的。我們要最澈底地發揚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從鎮壓資產階級的任務，移到安排中農生活的任務上去。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居。只有當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來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

農民需要有城市工業品的供給，沒有城市工業，農民是不能生存的，而城市工業是握在我們手裏。如果我們能正確地進事業，那末農民就會感謝我們從城市裏給了他們這些產品，這類工具和這種文化。把這些東西帶給他們的，不是剝削者，不是地主，而是與他們一樣的勞動同志，他們會非常深刻地珍視這些同志，而不是從實踐觀點上來珍視，只珍愛這些同志底實際幫助，却拒絕發號施令和自上而下的『指令』，而這種拒絕是完全公道的。

首先實行幫助，然後去奪得信任吧。如果這件事情能正確地進行下去，如果在縣裏，鄉裏，在徵糧隊裏，在任何組織裏，我們每個工作團底每一步驟都做得正確，如果我們的每一步驟都會從這個觀點來仔細加以檢查，那時我們定能奪得農民的信任，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繼續前進。現在我們應當給農民以幫助，給他們以忠告。這應當不是指揮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那時農民就會完全擁護我們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決議案的內容，據我看來，這也就應當成爲代表大會底決議。如果我們通過這個決議，如果這個決議將決定我

們全黨組織的一切工作，那末我們就能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第二個偉大任務。

怎樣推翻資產階級，怎樣鎮壓資產階級，這是我們已經學會了的，這是我們所足以自豪的。怎樣調整與千百萬中農的關係，用什麼方法去奪得他們的信任，這是我們還沒有學會的，這點我們應當公開說出。但是我們已經懂得了這個任務，我們已經提出了這個任務，並且帶着全部希望，全部智能和全部決心向自己說：這個任務我們定會完成，那時社會主義便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長時間的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訊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五八至一七一頁。

關於幫助東方戰線事致彼得格拉工人的信

告彼得格拉工人同志們

同志們！東方戰線上的情況非常惡化了。高爾察克今天佔領了沃特金工廠，布古里瑪會遭失陷，顯見高爾察克還會繼續前進。

這危險是很可怕的。

我們今天在人民委員會裏正要通過幫助東方戰線的一些緊急辦法，正在加強鼓動工作。

我們請彼得城工人，把一切都發動起來，動員一切力量去援助東方戰線。

東方戰線上的兵士——工人都將自籌給養並寄送糧食幫助自己家屬。而主要的是那裏在解決着革命的命運。

那裏若獲得了勝利，我們便可以結束戰爭，因為那時對白軍的外援再也不會有了。在南方，我們快獲得勝利。當南方沒有獲得完全勝利時是不能由那裏抽調兵力的。

所以大家都要幫助東方戰線！

蘇維埃和職工會應當緊張全力，發動一切，用各種方法去幫助東方戰線。

同志們，我相信彼得城工人定會成為全俄的表率。

謹致

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莫斯科。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刊載於彼得格拉真理報第八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二三頁。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有關東方戰線情況的提綱

高爾察克在東方戰線的勝利對於蘇維埃共和國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危險。必須最大限度地緊張一切力量來擊潰高爾察克。

所以中央委員會向全黨組織提議首先用一切力量去執行下列辦法，這些辦法應當由黨的組織，特別是由職工會來加以實現，以便吸引工人階級中更廣泛的階層來積極參加國防工作。

(一) 從各方面幫助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所宣佈的動員。

黨和職工會的一切力量都應立刻發動起來，以便在最近幾日內就能毫不遲延地對於人民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宣佈的動員令給與最積極的幫助。

必須立刻使被動員者看見職工會的積極參加，並感覺到工人階級方面對他們的援助。

特別應當使每個被動員者都明瞭，立刻派他們上前線去便會保證他們有較好的糧食供給：第一，因為兵士在臨近戰線的產糧地帶有較好的糧食條件；第二，因為領受運來飢荒省區糧食的人數便減少了；第三，因為正在廣泛組織從隣近戰綫地區寄送糧食給故鄉紅軍家屬的工作。

中央委員會要求每個黨組織和每個職工會組織，每星期作一次那怕是最簡短的報告，報告他們對於幫助動員和幫助被動員者所已作的事情。

（二）在臨近戰綫地區，特別是在窩爾加河流域，應當把全體職工會會員一律武裝起來，萬一武器不夠時，便動員他們個個來作各種幫助紅軍的工作，以及補充傷亡戰士等等。

在坡克洛夫斯克城，職工會自行決議立刻動員百分之五十的會員，這樣的舉動應當成爲我們的模範。兩京都和各最大工業中心不應當落在坡克洛夫斯克之後。

各職工會應當到處用自己的人力和財力將自己會員檢查登記一次，凡是沒有絕對必要留在本地的人，概行派往前綫上去，參加保衛窩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邊區的鬥爭。

（三）在加強特別是應被動員和已被動員者中以及紅軍兵士中的鼓動工作方面，應當加以最嚴重的注意。不要限於採用做報告開羣衆大會等等通常的鼓動方式，而要工人在紅軍兵士中分組地和單個地進行鼓動工作，把各兵營，各紅軍部隊和各工廠中的鼓動工作，分定給這些由普通工人和職工會會員所組成的鼓動組去擔任。各職工會應當舉行檢查，務使每個會員都參加挨戶鼓動，散發傳單和進行個別談話等工作。

（四）所有一切男職員均由婦女代替。爲了這層，必須舉行一次黨的和職工會的新登記。

對於全體職工會會員和所有一切職員，都頒發一種特別證書，記上每人親身參加幫助紅軍的工作。

（五）經過職工會，工廠委員會，黨組織及合作社等等，立刻建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援助紅軍委員會或後援會。這些機關的地址應當公佈。要把這些機關的情形最廣泛地通知所有居民。應使每個被

動員的人，每個紅軍兵士，每個願意出發到南方，到頓河，到烏克蘭去參加糧食工作的人，都要知道從這對每個工農易於接近的援助紅軍委員會或後援會中，他可以得到指示，得到忠告，他能容易和軍事機關發生聯繫等等。

應該特別責成這種委員會來担承幫助紅軍的供給事宜。如果我們能改善軍隊武器服裝等等的供給，那就可以大大擴張我們的軍隊。而在居民中還有不少藏着的或沒有交給軍隊使用的武器。在工廠內還有不少為軍隊所必需的各種儲存品，必須迅速找到這些東西，並把它送往軍隊中去。主管軍隊供給事宜的軍事機關應當獲得居民方面之立刻、廣泛和積極的幫助。必須用全力來執行這個任務。

(六) 必須經過職工會去廣泛吸收非農業省區中的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參加紅軍隊伍，並編成糧食隊和辦糧軍在頓河及烏克蘭區一帶去行動。

這種工作是可以而且應當大大擴展起來，它既可以幫助兩京都和非農業省區的飢民，同時又可以加強紅軍的力量。

(七) 在現時狀況下，我黨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採取的路綫是：凡屬自覺或不自覺地幫助高爾察克的人，都一律禁錮起來。我們在自己的勞動者共和國中，決不能容忍那些不實際幫助我們進行反高爾察克鬥爭的人。但是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間，也有人願意作這種幫助。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鼓勵，應給他們以實際工作，主要是讓他們在後方在技術上幫助紅軍，同時要嚴格地檢查這一工作。

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體黨組織和所有職工會都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決不要限於籠統呆板的陳舊辦法。

我們能夠戰勝高爾察克。我們能夠迅速並澈底地戰勝他，因為我們在南方的迭次勝利以及逐日好轉而有利於我們的國際狀況，能保證我們獲得最終勝利。

只要緊張一切力量，擴展革命毅力，就可以把高爾察克迅速擊潰。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是可以而且應當守住和奪回的。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七十九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二二四至二二六頁。

謹防奸細！

消滅奸細！

白軍向彼得格拉的進攻，顯然證明在全部臨近戰綫區域內，在每個大城市中，都有白黨所建立的廣大奸細組織，他們進行叛變活動，炸燬橋樑，在後方舉行暴動，暗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組織底優秀份子。

大家都應當站在各人的崗位上。

到處都要加倍提高警惕性，想出各種辦法，最嚴格地去偵查並捉拿一切暗探和白黨陰謀份子。

鐵路員工以及所有各部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特別必須加倍警惕。

所有覺悟的工農都應當挺身捍衛蘇維埃政權，都應當奮起與奸細和叛徒白黨作鬥爭。讓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崗位上，並與黨委員會，與肅反委員會，與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最可靠和最有經驗的同志們發生不斷的，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聯繫。

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內務人民委員捷爾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一百一十六期。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封鎖俄國，把蘇維埃共和國看成為傳染病的策源地，力圖將它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開來。這些誇耀自己國家制度『民主性』的人，這樣盲目地仇恨蘇維埃共和國，竟沒有覺察到他們自己落到如何可笑的地步。祇想想吧：這些先進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國家，擁有全副武裝，在軍事方面獨霸全世界，却像害怕烈火那樣，害怕從一個經濟破壞的，飢餓的，落後的，而據他們說來甚至是半野蠻的國家所流行出的思想傳染病！

單是這一個矛盾，就能使全世界勞動羣衆認清真象，並幫助我們揭破克勒孟梭，路易·喬治，威爾遜等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府底虛偽行爲了。

但幫助我們的，不僅有資本家仇恨蘇維埃的盲目病，而且也有他們相互間的糾紛，這種糾紛使他們互相掣肘。他們彼此間商定了一種十足的默然抵制陰謀，極端害怕傳播一般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真實消息，特別是害怕傳播它的正式文據。但是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刊物時報（«Le Temps»）却刊載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消息。

爲了這點，我們應向法國資產階級主要機關報，法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底這位領袖表示極崇高的謝忱。我們很想寫一封公函向時報鳴謝，感謝它這樣恰當，這樣巧妙地幫助我們。

從時報根據我們無線電訊編成自己消息的方式中，就可顯然看出這個金囊機關報的動機何在。它想向威爾遜放出一支暗箭，刺他一下：看，你是在同什麼樣的人談判！這些遵循金囊意旨來舞文弄墨的聰明角色却沒有覺察到：他們想用叫喊布爾什維克來恐嚇威爾遜，這在勞動羣衆看來，是等於替布爾什維克作廣告宣傳。再說一遍，我們應向法國百萬富翁們的機關報表示極崇高的謝忱！

第三國際成立時的國際環境，就是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如德國的謝德曼，奧國的倫勒爾這類資本主義奴僕們頒佈何種禁令，玩弄何種卑鄙手腕，都不能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阻碍關於這個國際消息的傳播以及對於這個國際的同情心的擴展。這種環境是到處顯然突飛猛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勞動羣衆中間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蘇維埃運動已發展成爲真正的國際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對資本舉行革命進攻的工人國際組織底基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底國際組織，當時這個運動，是向橫廣方向發展，以致革命水準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而終於使第二國際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當時，許多年來，特別是大戰時期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和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過程，已使許多國家中成立了共產黨。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個國際底主要特點和它的使命，就是要執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底遺訓，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的理想；第三國際底這個主要特點馬上就因此表現出來，即這個新的，第三屆的「國際工人協會」現時在相當範圍內已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符合了。

第一國際奠定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基礎。

第二國際是準備基地好在許多國家中廣泛發展運動的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工作底成果，排除了它那些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穢物，並且已經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上最革命的運動，即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的諸政黨所組成的國際聯合，現在有了空前鞏固的基礎：就是已經有了在國際範圍內體現着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對資本主義勝利的幾個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全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總結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發展經驗時所提出的最偉大口號，即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英明的預見，這個英明的理論，已經開始成爲現實了。

這個原來是拉丁語的名詞現在已經譯成現代歐洲各國語言，而且譯成了全世界各種語言。

全世界歷史底新時代開始了。

人類已在擺脫最後一種奴隸制：資本主義奴隸制或僱傭奴隸制。

人類擺脫這種奴隸制，就是破天荒第一次進到真正自由。

爲什麼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竟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呢？這種矛盾，一方面俄國是個落後國家，另一方面它又「飛躍」到了最高形式的民主制，即越過資產階級民主制而逕直進到了蘇維埃民主制或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這一矛盾，可以說正是使西歐人特別難於瞭解蘇維埃底作用，或瞭解得很緩慢的原因之一（除了大多數社會主義的領袖已爲機會主義積習和庸俗偏見所束縛的事實而外）。

全世界工人羣衆本能地領會到，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鬥爭底武器和無產階級國家底形式。但是爲機會主義所敗壞了的「領袖」

們，至今還在繼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一般的『民主制』。

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首先就表明出俄國落後性和它超過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飛躍』兩者間的『矛盾』，這是否值得驚訝呢？假使歷史讓我們實現新式民主制而不經過許多矛盾，那才真是可驚訝的了。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對現代一般科學有認識的人，如果有人問他說：『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平衡地或諧和勻稱地遞渡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那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過什麼平衡，什麼諧和，什麼勻稱。在每個國家中，都是時而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這一方面或這一特點或這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時而又又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底別一方面，或別一特點，或別些特性發展得特別突出。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實現其偉大資產階級革命，喚醒全歐陸趨向於歷史上的新生活時，資本主義比法國更發達得多的英國竟成了反革命同盟底首領。而當時的英國工人運動，却英明地預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裏的許多東西。

當英國發生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即憲章運動時，在歐陸國家中大都還只發生着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却已爆發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在各個國家中用各種不同手段把各國的無產階級隊伍分別擊破了。

英國，照恩格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一塊造成了最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上層份子的標本國家。從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意義上說來，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竟落後了幾十年。法國在工人階級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所舉行的兩次有全世界歷

史重大意義的反資產階級的英勇起義中，好像是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用盡了。隨後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中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轉到了德國，那時德國在經濟上比英法都落後。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德國在經濟上趕過了這兩國的時候，充當德國工人黨這一全世界模範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人，却已是一小羣十足的惡棍，賣身給資本家了的最卑鄙的混蛋，即由謝德曼和諾斯克起到達維德和列金止這些從工人出身而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資產階級効勞的最可惡的劊子手。

全世界歷史一往直前地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所走的遠不是平坦，簡單，筆直的道路。

當考茨基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因主張與謝德曼統一，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蘇維埃無產階級民主制而變成爲馬克思主義叛徒的時候，曾在二十世紀最初時期寫過一篇斯拉夫人與革命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敘述了那些使國際革命運動領導權可能轉到斯拉夫人手裏的歷史條件。

果然如此。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了俄國人手裏，正如這個領導權在十九世紀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起初操在英國人手裏，隨後操在法國人手裏，然後又操在德國人手裏一樣。

我已屢次說過：俄國與各先進國比較起來是易於開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但是繼續這個革命並使其達到最終勝利，即完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却就要困難些。

我們之所以較爲容易開始，是因爲，第一，沙皇帝制在政治上非常（對於二十世紀的歐洲說）落後，致使羣衆底革命攻擊力量非常巨大。第二，俄國的落後性使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地主的革命特殊地匯合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我們就是從此開始的，假使我們不是從此開始，那末我們當時便不會這樣容

易地獲得勝利。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有與農民戰爭特殊配合起來的可能。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五年初起，就堅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革命，在使工農羣衆先鋒隊認識西歐社會主義底「新發明」這一意義上，以及在羣衆革命行動的意義上，都使工農羣衆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訓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和十月無產階級革命都會是不可能的了。第四，俄國的地理條件使它在反對外部資本主義先進國底優勢力量時，能比其他國家支持得長久些。第五，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便利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者去影響鄉村半無產者的貧苦勞動階層。第六，長期罷工鬥爭的教育和歐洲廣大工人運動的經驗，使蘇維埃這種特殊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形式，易於在迅速而深刻尖銳化的革命形勢下產生出來。

以上所述，當然是不完備的，但暫時可以此爲限。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已在俄國產生出來了。它是巴黎公社之後所成就的第二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穩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這新式國家是已經不會死亡的了。它現在已經不是孤立的了。

爲要繼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爲要把這種工作貫徹到底，需要努力的地方還非常之多。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比重和影響較大的國家裏所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祇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那它們是有一切可能趕過俄國的。

破產了的第二國際現時正在死亡，而成了腐爛着的活屍。它實際上是替國際資產階級當奴僕。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它那些最大的思想領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稱爲一般的「民主制」，或者更愚蠢，更粗魯地稱之爲「純粹民主制」。

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過時了，正如先前必須在這個資產階級民

主制範圍內準備工人羣衆的時候，做過歷史上必要的有益工作的第二國際已經過時了一樣。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來都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資本鎮壓勞動者的機器，資本政權底武器，即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約許過政權屬於人民大多數，並宣告過這樣的政權，但它却因存在有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從來也未能實現這種政權。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自由』，在實際上只是富人享受的自由。無產者和勞動農民本來能夠而且應當運用這種自由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資本，戰勝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勞動羣衆照例是不能實際享受民主的。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供羣衆，供勞動者，供工人和小農享受的民主。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這種是大多數人民底國家政權，這種在事實上是大多數人民掌握的政權。

這個政權鎮壓剝削者及其幫手底『自由』，它剝奪他們實行剝削的『自由』，發飢荒財的『自由』，為恢復資本政權而鬥爭的『自由』，勾結外國資產階級來反對本國工農的『自由』。

讓考茨基輩去辯護這樣的自由吧。這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叛徒，社會主義叛徒才能作出的事情。

第二國際底思想領袖，如像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產，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他們完全不能了解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制底意義，不能了解這民主制與巴黎公社的關係，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必要性。

在『獨立』的（請讀作市僧庸俗小資產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機關刊物自由報（„Die Freiheit“）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七十四期上，登載了一篇告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篇宣言是由該黨中央及其在『國民會議』，即德國「立憲會議」中的黨團全體簽字發表的。

這篇宣言責斥謝德曼輩希圖取消蘇維埃，而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配合起來，給予蘇維埃以相當的國家權利，讓它在憲法中佔個相當的位置。

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合併起來，調和起來！這該是多麼簡單啊！這該是多麼英明的庸人思想啊！

所可惜的，只是這種思想在俄國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已經由聯合起來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試驗過了。

誰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每個尖銳的關頭，在每一次嚴重階級衝突發生時，都只能有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證明他對於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或政治學說，都是一竅不通。

但是爲要把二月十一日發表的這篇美妙絕倫、滑稽至極的宣言內所充滿的經濟政治荒謬論調盡行揭露，就非把希法亭和考茨基一流人主張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和平結合起來的這種英明庸人思想，專門分析一下不可。這點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去說吧。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莫斯科。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刊載於共產國際
雜誌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二四六至二五二頁。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同志們！我們從匈牙利蘇維埃活動家那裏得到的消息，使我們無限歡欣鼓舞。匈牙利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不過兩個多月，但在組織性方面說，匈牙利的無產階級似已經趕過我們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匈牙利人民的一般文化水準較高，再則產業工人在全體居民中的比重更是高得無比（在現時匈牙利八百萬人口中有三百萬是集中在布達佩斯城），末了，在匈牙利，過渡到蘇維埃制度，即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得比我國容易而且和平得多。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歐洲大多數社會黨領袖，無論是社會沙文主義派或考茨基派的領袖，都已完全沉溺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幾十年來較為「和平」發展所養成的純粹市儈偏見中，以致根本不懂得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若不把這些領袖從自己道路上排除出去，不把他們趕走，便不能完成自己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解放使命。這班人全部地或一半地相信了資產階級關於俄國蘇維埃政權所說的謊語，而不會辨別體現在蘇維埃政權中的新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供勞動者享受的民主制，即社會主義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之間本質上的區別，他們奴僕似的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把它叫做「純粹民主制」，或一般「民主制」。

這些沉醉於資產階級偏見的盲人們，不懂得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他們把俄國蘇維埃政權和俄國歷史底某些特點及其發展同蘇維埃政權底國際意義混為一談。

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見光明。匈牙利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形式完全與俄國的不同：資產階級政府自願辭職，工人階級底統一，社會主義底統一，立刻就在共產主義綱領基礎上恢復起來。蘇維埃政權底實質現今表現得更加明顯了：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有蘇維埃政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是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勞動者所擁護的政權。

這個專政必須要採用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強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抵抗。誰沒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應當被取銷其為無產階級領袖或顧問的資格。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質並不僅限於採用強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採用強力。無產階級專政底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遣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成員都成為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較為長久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方面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因為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第三方面因為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所以馬克思也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這整個過渡時期中，對這個改革實行反抗的，既有自覺實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知識份子中為數衆多的走卒，又有往往是不自覺

實行反抗的大批過份拘守小資產階級習慣和傳統，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份子。這些階層中的動搖現象乃是不可避免的。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趨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趨向於資產階級，趨向於自由貿易，即退轉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

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一個階級底政權，需要這個階級底組織性和紀律性，需要它那憑靠資本主義文化、科學、技術上一切成果所建立的集中權力，需要它那與任何勞動者心理相近的本性，需要它在鄉村中或小生產中那些渙散的，較不開通的，政治上較不穩定的勞動者面前的威信，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引導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階層前進。在這裏，空談什麼一般『民主制』，空談什麼『統一』或『勞動民主派底統一』，空談什麼一切『勞動者平權』等等等等，即從事於那些市儈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最習慣的空談，是無濟於事的。空談只能蒙蔽一般人的耳目，蒙蔽一般人的意識，而鞏固那種因循拘守資本主義，國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陳腐頑固習氣。

消滅階級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事情，這個階級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並不會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會變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爲更加殘酷的了。

無產階級應當進行階級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底抵抗，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因循守舊習氣和猶豫動搖天性，這樣來捍衛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組織影響，『中立』那些害怕離開資產階級而跟隨無產階級走又太不堅定的階層，鞏固新的紀律，即勞動者底同志紀律，鞏固勞動者與無產階級間的堅實聯繫，使他們在無產階級周圍團結起來，用這種新的紀律，用這種新的社會聯繫基礎去代替中世

37—TOM II

紀的農奴制紀律，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飢餓紀律，「自由」僱傭奴隸制紀律。

爲要消滅階級，就需要有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即被壓迫階級中這樣一個階級底專政時期，這個階級不僅能推翻剝削者，不僅能無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與全部資產階級民主觀，與任何妄說一般自由平等的市儈空談絕緣（其實正如馬克思所早已指出的，這種空談是意味着商品所有者間的「自由平等」，即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平等」）。

不僅如此。只有受過幾十年反資本的罷工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教育、培養、鍛鍊而團結起來的那個被壓迫階級——只有領會了城市的，工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並有決心和本領來捍衛這種文化，保存並繼續發展其一切成果，把這些成果變爲全人民，全勞動者都能享受的那個階級，——只有擔當得起歷史所必然加在堅決排除已往、大胆開拓將來新社會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難、考驗和巨大犧牲的那個階級，——只有其中優秀份子根本仇恨鄙棄一切市儈庸俗東西，根本仇恨鄙棄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份子」中間盛行的這種惡劣品性的那個階級，——只有「經過了勞動學校鍛鍊」而善於喚起一切勞動者和一切誠實人尊敬自己勞動能力的那個階級，才能用自己的階級專政來消滅階級。

匈牙利工人同志們！你們一下子就在真正無產階級專政綱領上，把一切社會主義者統一起來了，這樣就給全世界做出了比蘇維埃俄羅斯更好的榜樣。現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極高尚而極困難的任務，就是要在反協約國的艱苦戰爭中支持下去。希望你們堅定不拔。如果那些昨天加入到你們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的社會主義者中間，或小資產階級中間表現出動搖不定，那你們就要無情地鎮壓這種動搖。槍斃，這便是胆怯者在戰爭中應分遭受的命運。

你們進行着唯一合理的，正義的和真正革命的戰爭，即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戰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戰爭。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間所有一切忠誠份子都是站在你們方面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月比一月的接近起來了。

希望你們堅定不拔！勝利定會屬於你們的！

列寧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一百一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三一三至三一六頁。

偉大的創舉

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刊物上披露出紅軍兵士許多英勇奇蹟底例子。工農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以及地主和資本家的其他軍隊作鬥爭中，常常表現英勇和堅忍底奇蹟，捍衛着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品。根絕游擊主義殘餘，克服疲勞和廢弛現象，這一過程雖進展得緩慢，且有種種困難，但總在不顧一切地進展着。爲了社會主義事業勝利而自覺承受犧牲的這些勞動羣衆底英勇精神，就是紅軍中新的同志紀律基礎，就是紀律之復興，鞏固和增長底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勇精神，也值得同樣注意。在這方面，由工人自己倡首所組織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實有莫大的意義。顯然，這還祇是開端，但已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澈底，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底開端，因爲這是對自身的因循守舊，放蕩行爲，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對萬惡資本主義所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積習的勝利。當這一勝利已臻鞏固，那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那時，而且只有那時，回返到資本主義才成爲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成爲不可戰勝的。

五月十七日真理報登載了阿、熱同志那篇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文章。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完全引證出來：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一封信，給了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以強有力的推動。舉國奮起的高潮使許多鐵路員工共產黨員上了前綫，但其中大多數是不能放棄重要崗位不管，而去尋找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新方法的。根據各地來的消息，說動員工作緩慢，文案辦理手續遲延，遂使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不能不注意到鐵路業機構本身。原來，因為勞動力缺乏和勞動強度薄弱，以致緊急貨載和火速修理機車事宜延滯起來。五月七日，在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全體大會上，提出了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來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這提議上說：

「由於國內外的嚴重情況，爲要取得對階級敵人的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又應當猛力加鞭，從自己休息時間內再抽出一點鐘來，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時間總和起來，在星期六這天一次去作六點鐘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收到實際的效果。我們認爲，共產黨員爲保護革命的勝利品，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副區內施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

這個決議經過幾許猶豫後，就一致通過了。

五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鐘，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像兵士一樣，都到了場，排成隊伍，毫無擁擠，由工匠分派到各處工作。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立刻就有了成效。下表說明工作所在的部門和工作性質。

工作地點	工作名稱	工人 數目	工作時間		已進行的工作
			工作 小時	總數	
莫斯科。 機車總 修理廠	裝載通彼羅沃，木羅姆， 阿拉特爾和西茲蘭線上的 鋪路材料及修理機車 和車箱的裝備器材	48	5	240	裝了7,500普特貨物 卸了1,800普特貨物
		21	3	63	
		5	4	20	
莫斯科。 客車廠	機車的複雜臨時修理	26	5	130	總共修理了一個半 機車
莫斯科。 調車站	機車的臨時修理	24	6	144	修理好了兩個機車， 並拆卸了四個機車上 應修理的部份
莫斯科。 車箱部	旅客車箱的臨時修理	12	6	72	兩個三等車的車箱
「彼羅沃」 總車箱廠	星期六，星期日的車 箱修理和小修理	46	5	230	十二個普通貨車箱 和兩個敞車箱
		23	5	115	
	總共	205	—	1,014	總共修理好了四個 機車，十六個車 箱，裝卸了9,300 普特貨物

工作總值按定額工資計算為五百萬盧布，按額外工作的酬金要比這多百分之五十。

裝載工作的勞動強度，較普通工人高百分之一百七十。其餘工作的強度，大致也是如此。

消除了因缺乏勞動力和辦事遲緩而將貨載（緊急的）停滯七天至三個月的拖延現象。

工作進行時，因為工具損壞（本容易消除），以致單組工人被耽擱了三四十分鐘。

管理局派來指導工作的人員，幾乎來不及準備新的工作。一個老匠師說，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做的事等於不自覺的鬆懈工人整整一星期內所做的工作，這種說法也許不甚誇大。

因為蘇維埃政權普通的真誠擁護者也參加了工作，並可以指望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將來的義務星期六，以及其他各區也願意做法莫斯科、嘉桑鐵路共產黨員員工的先例，所以我就根據從各地得來的消息比較詳細地講講工作組織方面的問題。

參加工作的，約有百分之十的共產黨員是經常在該地工作的。其餘的則是鐵路政治委員直到單個部門政治委員這些負責者，以及由職工會，由鐵道管理局和鐵道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中提調出來的人。

工作中的熱忱和齊心協力精神是空前罕有的。當工人、事務員、管理局職員不出罵言，毫無爭論，抓着四十普特重的客車機車輪子，像酷愛勞動的螞蟻似的，滾到一定位置去的時候，心中便油然而發生了一種出自集體勞動的熱烈快感，並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決塞死不了勝利者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決等待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了這樣一幅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共產黨員雖然身體疲乏，但眼睛裏放出愉快的光芒，而以莊嚴的國際歌聲來歡祝事業的成功，儼如這凱旋

國歌的勝利聲浪湧出牆壁向工人的莫斯科流去，好像石頭所激起的水波向工人的俄羅斯盪去，掀動着困憊鬆懈的人們。

阿、熱

真理報於五月二十日在其所發表的恩、爾同志一篇標題為值得做法的例子的文章中，論及這個卓絕例子時寫道：

『共產黨員這種工作的實例並非罕見。我知道在電站上和各鐵路上也有這同樣的情形。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作了幾晚的額外工作，搬起陷在轉盤裏的機車；冬季在北方鐵路上，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者作了幾個星期日的工作，掃除鐵路上的雪堆；許多貨站上黨支部的全體黨員，爲了同竊貨行爲作鬥爭，乘夜沿站巡查，——但這種工作僅是偶然進行，並不是有系統地進行。嘉桑鐵路上的同志們却有了新的貢獻，把這一工作變成了有系統的經常工作。嘉桑鐵路同志們決議這樣作去，『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這也就是他們工作的全部意義。他們決定在整個軍事期間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的工作日延長一點鐘；同時他們又表明出了卓著成效的模範工作。

這個模範例子業已引起，而且應當引起今後大家來做法。在亞歷山大鐵路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大會上，討論軍事狀況和嘉桑鐵路同志們的決議之後，曾通過如下的決議案：（一）亞歷山大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者決定實行『義務星期六』。第一次義務星期六定於五月十七日舉行。（二）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組織成爲模範隊，它們應當表示給工人們看，應如何工作，以及在目前現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等情形之下，實際能夠作成一些什麼。

據嘉桑鐵路同志們所說，他們的模範例子在人們中引起了很大的印象，他們預料到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來參加工作。當我們寫這些話的時候，在亞歷山大鐵路修理廠中，共產黨員的額外工作還沒有開始，只有預定進行這種工作的傳聞，可是非黨羣衆就已開始激動起來，說『要是昨天我們知道的話，那我們也就準備好了，也就工作過了』，『下次星期六我一定來參加』——聽到到處都有人這樣說。這種工作所引起的印象，是很大的。

後方所有的共產黨員支部，都應當來做法嘉桑鐵路同志們的模範例子。不僅莫斯科這鐵路樞紐上的各共產黨支部，並且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做法這一例子。至於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就應當來組織替紅軍兵士代耕，幫助他們的家屬。

嘉桑鐵路同志們在結束自己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工作時，高唱着國際歌。如果全俄羅斯共產黨組織都做法這個模範例子，並毅然決然地加以具體實行，——那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全國所有勞動者的洪亮國際歌聲下，渡過臨近的困難月份……

共產黨員同志們，着手工作吧！！』。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真理報上寫道：

『五月十七日在亞歷山大鐵路上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共九十八人，根據大會決議作了五點鐘無報酬的額外工作，只享有由各人付錢吃第二次午飯的權利，並且在吃午飯時與一般體力勞動工人一樣，各人由自己付錢領到半磅麵包』。

雖然工作準備得不充分，組織得不甚好，但勞動生產率終究比平常的提高到兩三倍。

例如：

五個鐵匠在四點鐘內作了八十個轆輪。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二十個粗工在四點鐘內，收集了六百普特重的舊材料和七十個各重三普特半的車箱彈簧，總共收集了八百五十普特舊材料。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三百。

『同志們解釋這種情形時說，平時的工作作厭了，沒有趣味，而在這裏，人們工作起來都興奮熱烈。但現時在平常工作中，要是比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時作的少些，那才可恥哩』。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聲明願意參加義務星期六。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告奮勇要在義務星期六時，把蹬在『墳園』的廢機車拖出一架，把它修好使用。

接到消息，說在維亞茲瑪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義務星期六』。

阿、嘉靖科同志在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寫到關於這些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工作情形，現在我們就把他那篇標題為義務星期六短評的主要部份引錄如下：

『我和一個同志帶着極大的愉快心情，遵照鐵路副區黨委員會的決議，去參加義務星期六，暫時在幾點鐘內，讓腦子休息一下，讓臂膀來工作工作…我們被派往鐵路上的木工廠內。我們到達那裏，看見了自家人，彼此問過好，講了些笑話，點查人數共計祇有三十人…面前却躺着一個『怪物』——重約六、七百普特的大汽鍋，我們要把它『另移地方』，即差不多要滾半俄里或三分之一俄里遠，滾到敞車跟前。心裏疑慮起來…但我們已動手工作：同志們隨便往鍋爐下安上枕木，繫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了…鍋爐很不樂意移動，但終究還是把它滾動了。我們很高興，我們人雖是這樣少…要知道，這個鍋爐曾經有多

至我們三倍以上的非共產黨員工人，幾乎拖了兩個星期還沒有拖動，祇是當我們來到後，才把它拖動了…我們在頭目同志多次『一、二、三』的勻調口令下，使勁地齊力地工作了一點鐘，鍋爐也就一步步地移動着。驀地出了什麼事！許多同志突然可笑地往後面倒去，——這是我們手裏的繩子『變節了』…大約停歇了一分鐘：改用粗索子…天色已開始斷黑，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那時才會很快把工作完成。雙手酸痛，掌心發燒，周身溫暖起來，使盡全力拖着，——事情也就有了成效。站着的『管理人員』驚於這種成就，也不由地拉着索子：你早就該來幫幫忙的！一個紅軍兵士很入神地瞧看我們工作。他拿着手風琴。他在想什麼？也許他想：他們是些什麼人？當星期六大家都坐在家裏的時候，他們却要幹什麼呢？我打破他的疑團，就對他說道：『同志！給我們奏奏快樂的曲子吧，我們並不是什麼偷懶的工作人，而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我們做得多麼起勁，並不偷懶，而是努力地拖着』。於是紅軍兵士就小心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來抓住索子…

——『英國人是聰明的！』——武同志拉長宏亮美麗的高音唱着。我們都跟着應和起來，並高聲發出『唉嘿，棒子啊，唉嘿，拖吧，拖吧…』這一工人歌曲的辭句。

由於沒有習慣的關係，筋肉疲乏，肩背酸痛，但是…我們的閒空日子——休息日就在前面，還來得及飽睡一頓。目的快達到了，經過一些小小的周折後，我們的『怪物』就已差不多被拖在敞車跟前：擱下枕木，滾上敞車！讓這個鍋爐去作人們所久已期待於它的工作吧。然後我們囂嚷成羣地走進一間掛滿標語，架有步槍，燈光明亮的房子，也就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內，我們很好地唱完國際歌，然後喝過滲了『甜酒』的美茶，甚至吃了麵包。當地同志在我們做完繁重工作後，這樣來款待我們，真是再適當

沒有了。爾後我們和同志們親密地告了別，便排成一個小隊走去。夜闌人靜中，革命歌聲響澈着酣眠的街道，勻整的步伐應和着歌聲。『同志們，提高脚步』，『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於是大唱起勞動國際歌來。

過了一個星期。手臂都休息好了，現在我們要駛到九俄里以外去作『星期六』，修理車箱了。我們是到彼羅沃去。同志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箱頂上，洪亮而美妙地唱着國際歌。乘客們靜聽着，顯然，是帶些驚異神情。車輪有拍節地響着；我們沒來得及爬到上面去，就圍蹙在這『美國人』車箱的各踏板上，儼如『拚命搶上車』的乘客一樣。眼前就是車站。我們已到達目的地了，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就碰見那位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志。

——工作是有，但人來的太少！共三十個人，六點鐘內要把十三個須得進行中等修理的車箱修理好！面前就是做有記號的雙輪軸，不僅有空車箱，而且也有裝得滿滿的一輛火油車……但不要緊，同志們，我們是會『應付得來』的！

工作沸騰起來了。我和五位同志用槓桿作工。這些各重六七十普特的雙輪子，在我們肩膀和兩條槓桿推壓下，由『頭目』同志指揮着，迅速地從這道鐵軌上跳到另一道鐵軌上。這對輪子收拾好了，又來收拾另一對輪子。每對車輪都放到了一定的地方，我們就把這些陳舊了的東西，沿路軌迅速『發到』敞棚裏去……一、二、三，——它們就被一架轉動的起重機經空中抓走，軌道上再沒有這些雙輪子了。那裏，在黑暗中鉄錘聲大作，同志們已在自己的『病車』箱前像蜜蜂般的忙碌着。既作木工，又上油漆，也蓋車頂，工作熱烈得使我們和政治委員同志都高興起來。以後，鉄匠們也需要我們幫忙。在一座能移動的小熔爐上，放着一個燒紅了的『滑車柱』，即無意撞彎了的車鈎。這車鈎明晃晃的，帶着火花被措到鉄鏈上，憑着有經驗

同志的眼力，加上我們靈巧的錘擊，它就恢復了原狀。它還是明晃晃的，就被我們很快抬到自己位置上，並帶着火花被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便安置就緒了。我們爬到車箱底下。那裏這些車鈎和滑車柱的構造，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那裏有帶帽釘和旋簧的整個系統…工作沸騰着，天快斷黑了，火炬燃的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份同志『蹲靠』在一堆車輪邊緣上，並『慢吞』熱茶。清涼的五月之夜，美妙的新月當空。笑語，笑聲，辛辣的談諧。

——格同志，停工吧，你們修好了十三個車箱也就夠了！

但格同志却認這還不夠。

喝完了茶，我們就高唱着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不僅莫斯科開展了『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運動。六月六日，真理報載道：

『五月三十一日在特維爾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有一百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在鉄路上工作過。在三點半鐘內裝卸了十四個車箱，修好了三輛機車，鋸了十立方俄丈木柴，還作了許多旁的工作。熟練共產黨員工人的工作強度達到平常生產率的十三倍』。

爾後，六月八日真理報上又寫道：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薩拉托夫，六月五日訊。鉄路上的共產黨員工為回答莫斯科同志的號召，在全體黨員大會上議決：為幫助國民經濟起見，決於星期六無報酬地額外工作五小時』。

* * *

我極詳細和極完備地引證了關於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消息，因為這裏，我們顯然看得到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上極重要的一方面，對於這一方面，我們的刊物沒有充分注意到，而且我們大家都還沒有給以充分估計。

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從生活中取得，並為生活檢查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這個口號是我們全體，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員等所應該始終不倦地重複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第一個時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和基本的任務，即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戰勝剝削者，打破他們的陰謀（如黑幫派，立憲民主黨人以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律參加過的企圖讓出彼得城的『奴隸主底陰謀』），這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而外，同樣也不免要提出——愈往前去，便會愈加頻繁地提出——積極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這一更重要的任務。

無產階級專政，——我已屢次指出過，例如，我於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代表會議上講話時就指出過，——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種革命強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棍棒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勞動羣衆極端愚昧，備受抑壓而橫遭一小羣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飢餓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雖然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着長足的進步，但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仍舊是一羣愚昧無知，備遭一小羣資本家掠奪侮辱的僱傭奴隸或貧苦農民。共產主義（其初步為社會主義）

的社會勞動組織，則是靠那些既推翻了地主壓迫，又推翻了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羣衆本身底自由自覺紀律來維持的，而且愈往前去，便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既非從空而降，也不是出自善良願望，而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並且也只能從這種條件中成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便不會有這種新紀律。而這種物質條件底代表者或傳導人，便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啓發和鍛鍊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

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要在這括弧中指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成長出的新社會底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新社會底更高的，進一步的階段）。

伯恩國際⁶⁸，即黃色國際底錯誤，就是它的領袖們只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害怕澈底加以思索，恰巧害怕做出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爲資產階級絕對不能接受的那個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底一個時期，當階級尚未消滅之前，這個鬥爭是決不可免的，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並且在推翻資本後第一個時期，成爲更形殘酷和更形獨特的了。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着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爲止，——當然是另一種環境中，採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着。

「消滅階級」又是什麼意思呢？凡屬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

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思考到這個最終目的底意義。所謂各個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份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集團。所謂各階級，就是由於彼此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團能佔得另一集團勞動的各個集團。

顯然，爲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並且還要廢除對生產資料的任何私有制，還要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區別，以及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間的區別。這是需要很長的時期才可實現的事業。爲要完成這一事業，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小生產制無數殘餘底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和特別難於征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關連的極頑強的因循守舊習氣。

若認爲一切『勞動者』都能同樣進行這一工作，那便是最空洞的辭句或遠古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底幻想。因爲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並且只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只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之所以能夠實現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因爲它是文明社會中最強有力和最先進的階級；第二，因爲它在各個最發達的國家裏佔居民的大多數；第三，因爲在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半無產者份子，即照例是每年一部份時日度着無產者式的生活，照例是在某種程度內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僱傭勞動謀生的人。

誰想根據什麼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底平等這類的空泛辭句來解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如像考茨基，馬爾托夫及伯恩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作的那樣），誰就只是以此

來暴露他們那種在思想方面奴僕式地跟着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天性。只有具體研究已經奪得了政權的那個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與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特別關係，才能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並且這種關係不是在虛幻諧和的，「理想式的」環境中形成起來，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和多樣反抗的現實情況下形成起來的。

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極大多數的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都是連同自己的親屬千百次地經歷了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及其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即爲了解決是英國資本還是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這一問題，而屠殺數千萬人的戰爭，——把這種經歷異常加劇，擴大和加深了，使人們覺悟到這種經歷。所以極大多數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爲它用英勇的果敢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資本束縛，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闢出建設不容有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不管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民衆所表現的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倒退到資產階級「福蔭」下去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動搖遊離心理如何強大，如何不可避免，但他們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擁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威信，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不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還建設着嶄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繫，社會紀律，即自覺的和聯合起來了的工作者底紀律，這些工作者是不承認任何束縛的，除了自己聯合體底權力外，除了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底權力外，他們是不承認任何權力的。

爲了取得勝利，爲了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反資本的革命鬥爭底無限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鼓舞他們，組織他們，指導他

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底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以及所有小資產者階層引上新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設新社會聯繫、新勞動紀律、新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新勞動組織把科學以及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果拿來同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底普遍聯合制結合起來。

這第二個任務要比第一個任務更加艱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絕對不能靠零星奮發的英勇氣概，而是需要有廣泛日常工作中所表現的最長期、最頑強和最困難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同時又比第一個任務更加重要，因為歸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有爲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而起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才能成爲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那種力量底最大泉源，才能成爲這種勝利堅固不移的唯一保證。

* * *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就是我們從這中間可以看出工人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勞動紀律以及創造社會主義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方面所表現的自覺和自願的倡首精神。

受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教訓之後，未曾轉到沙文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方面而是轉到了社會主義方面的一位不可多得，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可比說過，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要比在薩多瓦附近的會戰⁶⁹，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是很公正的。薩多瓦附近的會戰所解決的，是建立德國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究應屬於普奧這兩個資產階級君主國中哪一個的問題。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是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達到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個小小的步驟。因而我們也可以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要比與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國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

主義大戰中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帝國主義者底勝利是爲了英美法三國富豪底利潤來屠殺千百萬工人，是垂死的，快脹死的和活活腐爛着的資本主義底殘暴行爲。而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却是爲使全世界各國人民解脫資本桎梏和戰爭慘禍的這種社會主義新社會底一個細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於自命爲「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底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盆裏栽大樹」，譏笑那些與盜竊公物、閑遊浪蕩、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等慣常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義務星期六底數目。我們回答這班老爺們說：如果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把自己的知識用來幫助勞動羣衆，而不是用去幫助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恢復他們的權力，那麼改革就會進行得更快而更和平。但這祇是空想而已，因爲問題是由階級鬥爭來解決的，而大多數智識份子則趨向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是藉這些智識份子底幫助，却是不管他們怎樣反抗（至少是在大多數場合下），摒除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同時改造和重新教育動搖份子，使之服從自己，漸漸地把動搖份子中的大多數奪到自己方面來，這樣才會獲得勝利。對於改革中的困難和挫折表示幸災樂禍，散佈張惶心理，宣傳開倒車——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甘受這種辦法欺騙的。

如果按實質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過某種新生產方式，不是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失敗、三反四覆的錯誤，而是一下子發育起來的麼？農奴制顛覆了半世紀後，俄國鄉村中仍保存有不少的農奴制殘餘。美國廢除黑奴制半世紀後，那裏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着他們替資本服務的本色，總是抱定他們那種完全虛偽的論據：

在無產階級革命前，他們責備我們爲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後，他們却要求我們用荒唐妄想的速度來剷除舊制度底遺跡！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底真實價值，也知道習俗方面舊事物底遺跡在革命後相當時期內還是必然會對新事物底萌芽佔着優勢的。當新事物剛剛誕生出來的時候，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幼芽底軟弱，表示輕浮智識份子底懷疑態度等等，——這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都是保護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底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慇懃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會死亡的。不能担保說，恰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才定會發生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要扶助各種各類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會把這些新幼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出來的。既然日本一位學者，爲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竟有耐心接連試驗了六百零五種藥品，直到製出了能夠滿足一定需要的第六〇六種藥品時止，可見，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更困難任務的人們，也就應該具有堅忍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鬥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至從中製定出最適當的辦法時止。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爲開始這個運動的，並不是境况特別優越的工人，而是具有各種專門手藝的工人，其中包括沒有專門手藝的工人，即處於通常最困難條件下的粗工。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現在不僅俄國一國，而且全世界各國都有的勞動生產率低落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破產和貧困，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忿恨心理和疲憊，疾病頻仍以及半飢半飽的現象。最後這點最關重要。飢餓——這就是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原因。爲了消滅飢餓現象，就必須提高農業、運輸業及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

就成了這樣一個循環圈：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飢餓，爲要消除飢餓，又得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家知道，諸如此類的矛盾在實踐上是以這個循環圈底中斷，羣衆情緒底轉變，個別集團底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這種轉變中往往起着決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鐵路員工（當然是大多數，而不是小羣投機家，管理局人員等等白黨份子）是生活絕頂困難的勞動羣衆。他們經常是食不飽腹，而在現時青黃不接和糧食狀況一般惡化的情形下，簡直是經常挨餓。請看，這些處在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革命惡意煽惑包圍中忍飢受餓的工人，雖然他們已經困乏不堪，因爲食不飽腹弄得精疲力竭，却來舉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從事不領任何報酬的額外工作，並且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勇精神麼？難道這不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底開端麼？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澈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澈底戰勝，是因爲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最主要之點就在這裏。既然那些熬過了四年艱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爾後又熬過了一年半更艱苦的國內戰爭的飢餓工人，終能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飢餓的莫斯科開始這件偉大的事業，那末，當我們在國內戰爭獲得勝利並爭得平時，繼續發展的情形又會是怎樣的呢？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着的工人所創造出來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異常寶貴，因爲它是共產主義底實際開端，而這乃是極罕見的事，因爲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上，『只是實行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公正地所說的那樣）。

當一般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增加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是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是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千百萬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又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人們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開始了的時候。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譏笑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大憲章」內的浮誇詞藻，譏笑了所有這些妄談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辭句，這些辭句是使各國市儈和庸人，直至現今卑鄙伯恩國際中一般卑鄙英雄們心嚮神往的。馬克思用來和這種華麗人權宣言相對立的，是無產階級一種平凡的，質樸的，務實的，日常的問題提法：由國家縮減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標本樣式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內容開展得愈強烈，馬克思意見底全部正確性和全部深刻性在我們面前也就暴露得愈明顯，愈透澈。真正共產主義底「公式」與考茨基輩、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伯恩國際中親愛「兄弟」們底華麗、機巧、堂皇辭藻不同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式」把一切都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等等的空話吧：現代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在這些誇大詞句裏，容易看出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欺詐手腕，也如像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望見「善良君子」極「光澤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確切斷定他「大概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炭吧！多設法使飢餓工人和襁褓農民所必需的這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炭，不是用投機買賣或資本主義方式，而是用莫斯科、嘉桑鐵路上粗工和鐵路員工一類普通勞動者之自覺、自願與奮不顧身的英勇工作來獲得吧。

我們大家應當承認，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空口對待革命問題的這

種態度底遺跡，是在在皆是，甚至我們隊伍裏也有。例如，我們刊物上很少向這些腐爛的，資產階級民主舊制度的這種腐朽殘餘開火，很少對真正共產主義制度底平凡的，質朴的，日常的，但却是活生生的幼芽加以扶助。

拿婦女狀況來看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來也沒有作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建立後第一年內所作到的百分之一。我們澈底剷除了關於婦女不平權地位、限制離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底父親等等卑劣法律，此種法律底殘餘，在各文明國內還留下得極多，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奇恥大辱。我們十二分有權以我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來自豪。可是，我們把地基上舊時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廢物掃除得愈乾淨，那我們就能愈益顯明地看出，這只是爲建築物掃清地基，但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雖然頒佈有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還是家庭奴隸，因爲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末的，勞神的，祇是愚鈍人、折磨人的工作來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底真正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只在反對這種煩瑣家務的普遍鬥爭（爲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只是在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爲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

試問我們在實踐中對這個理論上是每個共產黨員都無庸爭論的問題注意得充分麼？當然，是注意得不充分的。試問我們對目前在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萌芽關心得很夠麼？我再說一遍，是非常不夠的。公共飯堂，托兒所和幼稚園，便是這些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手段實際能夠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手段並不新奇，它們是由大資本主義

所產生出來的（也如社會主義所有一切物質前提那樣），但它們在資本主義下，第一，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是營業性的企業，不免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一切弊端，或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理應受到優秀工人們方面的憎惡和鄙視。

毫無疑義，在我國，這樣的機關却已經是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開始改變。毫無疑義，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有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許多倍的組織人才，她們善於舉辦這類有很多工作者參加以及有更多享受者參加的實際事業，但却沒有像往往自鳴萬能的『知識份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愛講空話，無謂忙碌，無聊爭吵以及空談計劃、體系等等的毛病。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來懇懇照護這些新事物的萌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吧。他們該是多麼會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啊！他們怎樣在自己發行的千百萬份報紙上讚揚資本家所視為『模範的』企業，怎樣把資產階級的『模範』組織當作民族的得意之作呵！而我們的刊物並不注意或幾乎全不注意來描述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來日常關心地把其中某些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並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下，能怎樣經濟人力，怎樣便利需求者，怎樣節省產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下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能夠做到，能夠通行到全社會，通行到全勞動羣衆中去的。

模範的生產工作，模範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模範的關懷和忠誠於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的精神，模範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街坊內模範的清潔衛生工作，——所有這些，就是我們刊物以及每個農工組織所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注意和關注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底幼芽，而關注這種幼芽乃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義務。不管糧食情形和生產狀況怎樣困難，但在布爾什維克執政這一

年半以來，情形畢竟無疑的是有全面的進展；糧食採辦量從三千萬普特（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到一萬萬普特（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園藝經濟增加了，未經播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雖然有燃料上的巨大困難，但鐵路運輸業已在開始改善以及其他等等。在這一般情景以及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贊助之下，共產主義底幼芽，不僅不會夭折，反而定會茁壯滋長並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

* * *

要好好地思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意義，以便從這個偉大創舉中得出一切由此產生並絕頂重要的實際教訓。

從各方面來贊助這一創舉，——這就是第一個主要的教訓。『公社』這名詞，我們這裏常常應用得太輕易了。凡是共產黨員或在他們參加下所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是一下子就被宣佈為『公社』；同時人們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以長期和頑強的勞動來爭得的，是要以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證實了的實際成效來爭得的。

因此，我以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決定廢除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公社』名稱的指令，是完全正確的。讓名稱簡單一些吧，那時新組織工作初步中的缺陷和缺點，就不會推往『公社』身上，而將落在（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好的共產黨員身上。最好是取締廣泛使用『公社』字樣，禁止隨便援用這個字眼，或者只承認那些在實踐中已真正證明（並由附近全體居民所一致公認）了有按共產主義方式辦理的能力和本領的真正公社，才有權援用這個名稱。你起初要證實自己有為社會利益和全體勞動羣衆利益從事無償勞動的能力，有『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能力，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作出模範事業的能力，然後你才有權取得『公社』這個光榮稱號！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是最寶貴的例外。因為這裏，莫斯科、嘉桑鐵路的粗工和鐵路工人起初在實際上證明了他們確實能像共產主義者一樣來工作，然後才稱呼自己的創舉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今後也要設法做到，並且一定做到，使一切和每個未經艱苦勞動及長期勞動底實際成效以及模範的真正共產主義的辦事方法加以證實，就把自己企業、機關或業務稱作公社的人，都應遭受無情的嘲笑，被人視為騙子或空談家而受到恥辱。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偉大創舉，在另一方面，即清黨事業中也應當實地運用。在革命後的初期，當時很多「誠實的」和居心庸俗的人特別存着戒心，當時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自然，是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全體怠工，並在資產階級面前趨炎附勢，於是野心家及其他危害份子便乘機混到執政黨裏來，成為完全是不能避免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任何革命中都沒有避免過，而且也不能避免的。全部問題在於依據着健全有力的先進階級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

在這方面我們早已開始工作。要堅毅不拔孜孜不倦地繼續這一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去作戰這件事曾幫助了我們：胆小漢和惡棍逃出黨了。聽便他們往哪裏滾去吧！黨員數量上這樣減少，是意味着黨的力量和比重之大大增加。要利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創舉繼續清黨：比方說，只有把那些經過了半年「檢查」或「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候補期」的份子接受入黨。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入黨而沒有以其特別勞作或功績證明其絕對可靠，對黨忠實和能於成為共產黨人的一切黨員，都應當經過這樣的檢查。

這樣以一貫提高黨對真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求為標準的清黨工作，定會改善國家政權機關，並大大促進農民最終轉變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也就把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機關底階級性表露得非常明顯。黨中央委員會寫過一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這便是擁有十萬至二十萬黨員（我預料在嚴格清黨後將留下這樣一個數目，而現在的黨員人數却要超過這個數目）的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主張。

這個主張獲得了職工會中工人們的響應。這樣的工人在我們俄羅斯和烏克蘭達四百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二十萬與四百萬，這就是「齒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對比。還有千百萬農民，他們分成三個基本集團：數量最多和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集團，即半無產者或貧農；其次是中農；末了，便是數量極少的集團，即富農或鄉村資產階級。

當還有可能買賣糧食和利用飢饉來作投機事業時，農民仍是（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相當一個時期內是不能避免的）半勞動者，半投機家。一方面，他們是投機家，所以他們仇視我們，仇視無產階級國家，總想去同資產階級及其主張糧食自由貿易的，直至孟什維克舍爾或社會革命黨人別、切爾寧可夫爲止的忠僕們謀妥協。但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國家底朋友，是工人們在反地主反資本家鬥爭中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爲勞動者的數千百萬農民大衆，是贊助一二十萬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並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者所組成的國家「機器」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比這更真正民主，更與被剝削勞動羣衆有緊密聯繫的國家。

正是這樣由「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所表示出來並用這種方式具體實現的無產階級工作，才能徹底鞏固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

* 見本卷第五六二至五六五頁，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有關東方問題情況的提綱。——譯者。

尊敬和愛戴。這種工作，而且只有這種工作，才會使農民最終相信我們正確，相信共產主義正確，才會使農民成爲我們無限忠實的擁護者，因而也就是把糧食困難完全克服，使共產主義在糧食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完全戰勝資本主義，無條件地鞏固共產主義。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三二五至三四九頁。

大家都去與鄧尼金鬥爭！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致黨組織的信

同志們！社會主義革命最危急關頭之一，也許甚至是最危急的關頭到了。剝削者，即地主與資本家之在俄國國內和國外（首先是英法）的擁護人，拚命想在俄國恢復人民勞動掠奪者、地主和剝削者底政權，以便鞏固他們在全世界上正崩潰着的政權。英法資本家單用自己軍隊來奪取烏克蘭的計劃破產了；它們在西伯利亞對高爾察克的援助也失敗了；紅軍在烏拉爾獲有全體起義的烏拉爾工人的支援，英勇地向前進展，正接近到西伯利亞，去把它從當地領主，資本家之空前壓迫和暴行下解放出來。末了，英法帝國主義者，想藉反革命陰謀奪得彼得格拉的計劃也破產了，參加這次陰謀的，有俄國的保皇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連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不是例外。

現在國外的資本家拚命想藉鄧尼金底進攻來恢復資本桎梏，他們也像過去幫助高爾察克那樣，以軍官，軍需品，砲彈，坦克等等來幫助鄧尼金。

工人農民的全部力量，蘇維埃共和國的全部力量都應當緊張起來，以便擊退鄧尼金底進犯，並戰勝它，同時不要停止紅軍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勝利進攻。這就是：

目前主要的任務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體共產黨員，他們的一切同情者，全體忠誠的工農，全體蘇維埃公務員，都應按戰時要求振奮起來，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和關心都儘量轉到直接的戰爭任務上，轉到爲了迅速擊退鄧尼金底進攻這一任務上，並把自己其餘的一切活動加以縮小與改造，以服從於這個任務。

蘇維埃共和國被敵人包圍了。它應當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成爲統一的軍營。

使所有機關的全部工作都適應於戰爭，並按戰時要求來加以改造！

爲了解決工農國家的政務，集體領導制是必要的。但對集體領導制的任何誇大，對集體領導制的每種曲解以致造成遲滯和不負責現象，將集體領導機關變爲空談場所的一切嘗試，都是極惡大罪，無論如何都要盡量迅速，不顧一切來根除這種惡毒。

無論在委員會委員數量方面，或在實地進行工作方面，集體領導制的權能，都不應超過絕對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外，禁止「長篇大論」，要最快地交換意見，把交換意見變爲彼此通報，並作出實際提議等等。

稍一有可能時，集體領導制祇應限於在最小範圍的委員會內，最簡短地來討論唯一最重要的問題，而實際處理本機關、企業、人事、任務的責任，則應委給一個素以剛毅堅決果敢見稱，長於處理實際問題，並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擔負。集體領導制無論如何而一無例外地都應與最確切規定每人對某一確定事務之個人負責制相輔

而行。藉集體領導制來掩蓋的無人負責現象，是最危險的禍害，這種禍害能威脅着一切在實際集體領導工作中沒有充分經驗的人，而在軍事上則往往必然釀成災害、混亂、慌張、權力分散和失敗的惡果。

組織上的紛忙或組織上的虛幻計劃是同樣有害的。爲了戰爭的必要來改造工作，這無論如何也不應弄成爲改造機關，更不應是匆忙建立新的機關。這樣是絕對不許可的，這只能造成紛亂現象。改造工作應該是暫時停止那些非絕對必要的機關，或將其縮小到相當限度。但一切能幫助戰爭的工作都應完全和唯一經過現存的軍事機關來進行，要整頓、鞏固、擴大和幫助這些機關。建立特別的『防衛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或『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這只能在例外的情形下；第二，這只有經過相當軍事機關或最高蘇維埃政權機關批准；第三，無條件地執行以上這個條件，才能准許。

向人民解釋關於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真象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和唯一的嚴重敵人。若是沒有協約國（英、法、美）的幫助，那他們早已便破產了。只因協約國的幫助才使他們成爲強有力的。但他們終究不得不來欺騙人民，有時假裝爲『民主』、『立憲會議』、『人民政權』等等的擁護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樂意地受他們欺騙。

現在關於高爾察克（而鄧尼金則是他的同胎兄弟）的真象已完全揭穿了。槍殺幾萬工人。甚至槍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鞭撻成縣成縣的農民。公開毒打婦女。這些地主子弟軍官之橫行無忌。沒有止境的掠奪。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真象便是如此。甚至就在那些原來是工人底叛徒，原來是站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方面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間，不得不承認這一真象的人，也愈加增多了。

全部鼓動和宣傳的中心就是要使人民知道這點。要向他們解

釋，或者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或者是蘇維埃政權，工人底政權（專政）；中間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不能有的。要特別利用那些不是布爾什維克方面的證據，即到過高爾察克或鄧尼金那裏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非黨份子的證據。讓每個工人和農民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來進行鬥爭，假若高爾察克或鄧尼金得勝的話，他們會遭遇到什麼。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

在被動員者中的工作，爲幫助動員而工作，和在已動員者中的工作，目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基本對象之一。在集中有已動員者或有駐防軍，尤其是有後備營等等一切地方的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應當全體積極參加工作。必須把他們一無例外地組織起來，幫助動員和在已動員者及地方防軍兵士中進行工作，某些人每天經常地工作，另些人每星期，比方說，做四小時或八小時的工作，當然，這工作是在由地方黨組織和軍事當局指定每人承擔相當任務的條件之下，嚴格而有組織地來進行的。

居民中的非共產黨員，或他黨黨員，當然不能進行思想上的反鄧尼金或高爾察克的工作。但根據這一理由而使他們不參加任何工作，這也是不允許的。應該找到各種方法來使全體居民（首先是城市和鄉村中較富裕的居民）在幫助動員或幫助已動員者方面，人人都必須有某種貢獻。

特種手段的幫助，應當是去促進最迅速地 and 最好地訓練已動員了的人們。蘇維埃政權要徵集所有先前的軍官軍士等等。共產黨以及全體同情者和全體工人都應來幫助工農國家：第一，千方百計地協助拿獲一切逃避報到的舊時軍官軍士等等；第二，在黨組織監督下並在黨組織管屬下，把那些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例如，參加過帝國主義大戰）受過軍事訓練而能有所貢獻的人組織成若干集團。

在逃兵中的工作

近來在反逃跑現象的鬥爭中，顯然有了轉變。許多省份裏逃兵已開始大批轉回到軍隊裏來，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逃兵已湧現到紅軍中來了。原因是：第一，黨的同志們進行過更巧妙和更有系統的工作；第二，農民日益悟解到，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是恢復比沙皇制度更壞的制度，即恢復工農的奴隸身份，恢復鞭笞、掠奪和軍官貴族底侮辱行為。

所以就要在各處用全力加緊在逃兵中工作，並使逃兵轉回到軍隊裏來。這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事情之一。

也得提到，能夠用說服來影響逃兵以及這種影響底成功都表明出工人國家對農民的特別關係，這與地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棍棒的壓迫或飢餓底壓迫，這便是後面這兩種國家之紀律底唯一泉源。至於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則能有另一種紀律底泉源：由工人來說服農民，工農間的友誼聯盟。當你聽到親眼見過的人講述說，在某某省（例如在梁贊省）有成千上萬的逃兵自願地轉回來，在各地羣衆大會上向『逃兵同志』的號召有時收到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成功，這時你才瞭解，在工農這一友誼聯盟中，該蘊藏有多少尚未被我們利用的力量啊。農民固然有種使自己贊成資本家，贊成社會革命黨人，贊成『自由貿易』的偏見，但同時他們也有種日益使自己去與工人結成聯盟的明見。

直接幫助軍隊

我們軍隊最需要衣服，靴鞋，武器和砲彈的供給。在遭到破壞的國家裏必須有巨大的努力才能供應軍隊底這種需求，而英、法、美資本家掠奪者所慷慨給予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那種幫助，才唯一拯救了他們由於缺乏軍需供給而必然遭到的崩潰。

不管俄國遭受了怎樣大的破壞，但國內終究還有很不少的資源，我們還沒有加以利用，而且往往是不善於利用。還有很多沒被尋獲或未經檢查的軍需庫，很多沒有利用的生產資源，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於官僚們故意怠工，一部分是由於遇事遲滯，機關主義，漫無條理和粗鹵笨拙，——所有這些『往昔的罪過』都這樣必然地殘酷地高壓着任何正向新社會制度『跳躍』的革命。

在這方面直接幫助軍隊是特別重要的。主管該事宜的機關，特別需要『煥然一新』，需要有旁的方面的協助，需要有當地工農之自願的，有力的，英勇的創舉。

要號召全體自覺的工農，全體蘇維埃活動家盡量廣泛地來參加這種創舉，要在各地和各工作部門內試行在這方面幫助軍隊底各種形式。這裏『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現象，比在旁的領域內要少得多，但這裏『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在居民中收集武器，也是這工作中的一部份。在經過了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爾後又經過兩次人民革命的國度內，農民和資產階級手裏暗藏有很多武器，這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現在既有鄧尼金岌岌進犯，就必須用全力來與這種現象作鬥爭。誰要暗藏武器或幫藏武器，誰就是反對工農的滔天罪犯，誰就應份遭到槍斃，因為他是使成千累萬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殞命疆場的優良紅軍兵士遭受犧牲的罪人。

彼得城同志當舉行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搜查時，就找到了成千上萬的槍枝。要使俄羅斯其餘地方也不落在彼得城之後，無論如何都要去趕上和超過它。

另一方面，毫無疑義，槍枝藏得最多的是農民，他們往往沒有任何惡意，不過是由於頑固地不相信任何『國家制度』等等。既然我們能以說服工作，巧妙鼓動，適當處置問題等辦法，在使逃兵自願轉回到紅軍中去這方面作出了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裏）事情，那末，

在爲了使人們自願歸還武器方面，毫無疑義也能夠而且應當作出同樣多的，也許還要更多的事情來。

工農們！尋找藏着的槍枝，並把這些槍枝交給軍隊吧！那你們就能以此拯救自己，免遭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毒刑，槍斃，大批鞭笞和劫掠哩！

縮小非軍事工作

爲了甚至是執行上面簡略規劃的工作中的一部份，就需要有很多新的工作人員，而且是最可靠，最忠實，最富有毅力的共產黨員。可是當到處都在訴述這種工作人員缺乏和他們過份疲勞等情形下，又從什麼地方能找到這樣的工作人員呢？

毫無疑義，這類訴苦的話在許多方面是公正的。如果有誰把近二十個月來，數目該是如何微末的先進工人和共產黨員，藉工農羣衆的贊助和同情管理着俄國這點，來精確地計算一下，那就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了。但是我們却管理得大有成績，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同時克服空前的困難，戰勝着那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有聯繫而在到處日益抬頭的敵人，並且除了協約國這一敵人外，即除掉維強一世的英法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外，我們已戰勝了一切敵人，何況我們已折斷了協約國這敵人的一隻手——高爾察克；現在威脅我們的，只剩下它的另一隻手——鄧尼金了。

爲管理國家，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新的工作力量，很快在成長起來，這便是這批青年工農；他們都在極誠實，極熱烈，極奮勇地學習着，吸受由新制度得來的新印象，拋掉舊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外殼，把自己鍛鍊成比他們的前輩人還更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可是，不管這新階層成長得如何之快，它如何在國內戰爭和資產階級瘋狂反抗的烈火中迅速地學習和成熟着，但在最近幾個月

內，它終究還不能給予我們以培養好了的國家管理人員。但問題正是在最近這幾個月，即在一九一九年的夏秋兩季內，因為我們與鄧尼金的鬥爭急需立刻解決，而且定會立刻解決的。

爲要獲得大量培養好了的工作人員來加強軍事工作，就要縮小許多非軍事的，或更確切點說，不是直接屬於軍事的蘇維埃工作底部門和機關，要按這個方針（即縮小的方針）來改造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和企業。

例如是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部。這是個極有用的，爲了完備地建設社會主義，爲了正確計算和分配一切科學技術力量所必須的機關。但這個機關是否絕對必要呢？當然不是。有些人能夠而且應當立即用作軍隊中的，並直接是爲了軍隊的這緊迫萬分的共產主義工作，如果把這些人交給這個機關，那在目前簡直是一種罪行。

我們這裏，像這樣的機關和機關部門，在中央和各地方都很少。我們力求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起初不能不立即着手成立這類機關。但如果現在當鄧尼金這大敵當前之際，我們竟不能這樣來改造隊伍，而使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東西都暫時停止和縮小起來，那我們就會是些蠢漢或罪人。

我們不應當陷於張惶失措和組織上的忙亂，不應當改造任何機關，不應當完全關閉它，不應當開始建設些新的機關，這在匆忙工作情形下是特別有害的。我們應當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和機關部門，暫時停閉三五個月，或者，當不能完全將其停閉時，那就把它們按上面這個（大概的）期限加以縮小，縮小到最大限度，即只留下最絕對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培養好了的，有經驗的，忠實的，受過考驗的共產黨員或同情社會主義的人來作軍事工作，因而我們就能這樣來冒一次險，使很多大大縮減的機關（或機關的某些部門）中，在相當時期內不留下一個共產黨員，而把這些

機關唯一交給資產階級的工作人員去料理。這並不是大的冒險，因為這只是指非絕對必要的機關而言，由於削弱這些機關（一半已停止了）底活動是會有損失的，但這種損失並不會很大，它無論如何也不能致我們於死命。而一旦沒有充分力量去加強軍事工作，並且是要立即和大大去加強軍事工作，那這就能致我們於死命。這點正要明白瞭解，並要由此作出全盤的結論。

如果在各省縣等等機關或機關部門底每個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支部，不喪失一分鐘的時機，向自己提出問題：某機關或某部門是否無條件地需要呢？若是暫時停止它的工作或將其工作縮小十分之九，讓那裏不留下一個共產黨員，這樣我們是否會招致滅亡呢？——如果這樣提出了問題，接着就迅速而堅決地縮減工作和調開共產黨員（以及他們在同情者和非黨員中無條件可靠的助手），那時我們就能夠在最短期間得到成百成千的人去到軍隊政治部中工作，去擔任政治委員等等職務。那時我們也就真有可能，像戰勝了更強大的高爾察克那樣，來戰勝鄧尼金。

臨近戰線地區的工作

最近幾星期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臨近戰線地區已驚人地擴大，其面目也非常迅速地改變了。這是戰爭快到決定關頭和戰爭快近終結底預報或伴隨現象。

一方面，在烏拉爾一帶和在烏拉爾本地遼闊的沿戰線地區，由於紅軍勝利和高爾察克底瓦解，加之高爾察克佔領區中革命底增長，已成為我們的臨近戰線地區了。另一方面，由於我方的損失，由於敵人大大接近彼得城，以及他從南部向烏克蘭和俄羅斯中心進犯，使彼得城近郊及南部一帶的沿戰線地區更形擴大了。

於是臨近戰線地區的工作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

在紅軍迅速前進的沿烏拉爾一帶，我們軍隊工作人員、政治委員、政治部人員等以及當地工農，有了一種自然願望，想在新收復地區安居下來進行創造性的蘇維埃工作，人們愈疲於戰爭，高爾察克破壞得愈是嚴重，則這種願望就愈加自然。但若實現這個願望，那便是再危險不過的了。這便會減弱我們的進攻，會使我們的進攻發生停滯，而增加高爾察克還能恢復元氣的機會。這在我們方面說來，簡直會是對革命的罪行。

決不要從東方軍隊中抽調一個多餘的工作人員來作地方工作*！決不要減弱我們的進攻！完全勝利的唯一機會，是烏拉爾一帶和烏拉爾本地所有親身受過高爾察克『民主』恐怖的居民人人參加作戰，繼續向西伯利亞進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亞完全勝利為止。

讓烏拉爾一帶和在烏拉爾本地的建設工作延遲一下，讓這種建設在純粹是當地年輕沒有經驗和力量薄弱的人們參加的條件下，進行得緩慢一些吧。我們並不因此就會招致死亡。但若減弱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進攻，那我們便不免於死亡，我們應當用烏拉爾起義工人底力量，用烏拉爾一帶農民底力量來加強這個進攻；因為這些工人農民現在已親身認識了孟什維克馬依斯基和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的『立憲』諾言是什麼意思，認識這些諾言的真正內容，即高爾察克，是什麼一回事。

削弱向烏拉爾和向西伯利亞的進攻，就是叛變革命，就是叛變把工農從高爾察克跌蹄下解放出來的事業。

在剛被收復的臨近戰線地區工作時，要牢記那裏主要的任務，不僅是要奪得工人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而且也要奪得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實際向他們解釋蘇維埃政權這工農政權底實質，一開始就把握住黨根據二十個月來工作經驗估計所定下的正確方針。我

* 沒有絕對的必要，一般就不抽調他們，需要時可從中部省份轉調！

們在烏拉爾，不應重複我們有時在大俄羅斯犯過，但我們很快就會改正的那些錯誤。

在彼得城近郊沿戰線地帶以及在烏吉蘭和南部那個擴大得如此迅速、如此可畏的巨大臨近戰線地區內，要把一切都轉入戰時狀態，把全部工作，全部努力，全部思想完全服從於戰爭，而且唯一服從於戰爭。否則就不能擊退鄧尼金底進犯。這是很顯然的。而這點是要明白瞭解，並完全加以實現的。

順便說說，鄧尼金軍隊底特點，就是它有大量的軍官和哥薩克。這種成份，沒有羣衆力量作後盾，而非常善於迅速襲擊，實行冒險，採取拚命辦法，唯一目的是在散佈驚惶心理，是在盡情破壞。

在同這種敵人作鬥爭時，必須有最高限度的軍事紀律和軍事警惕性。遺誤時機或張惶失措，就等於喪失一切。每個負責的黨工作者或蘇維埃工作人都應當估計到這點。

在軍事和一切事業上都要有軍事紀律！

要有軍事警惕性和嚴格性，在採取一切慎重辦法時，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對軍事專家的態度

這次在紅丘發生而以出讓彼得堡爲目的的巨大陰謀⁷⁰，又特別迫切地提出了關於軍事專家以及後方肅反的問題。糧食情形和軍事狀況的尖銳化，毫無疑義必然使，而且最近將來還會使反革命份子的活動加強起來（參加彼得城陰謀的有『復興會』，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也有雖是單個個參加，但終究還是參加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樣無疑義的，軍事專家中在最近期間定會產生出高度百分比的叛變者，如像富農，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但因為這點就主張改變我們的軍事政策基礎，那便會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和不能饒恕的怯懦心理。成百上千的軍事專家叛變我們，而且將來還會叛變我們。我們將捉拿他們，槍斃他們，但我們這裏，還有成千上萬的軍事專家在有系統地和長久地工作着，沒有他們參加，便不能把這從過去可恨的游擊主義中生長出的，並在東方獲得燦爛勝利的紅軍建立起來。富有經驗和領導我們軍事機關的人們公正地指出說，在對於軍事專家和剷除游擊主義問題上最嚴格地執行了黨政策的地方，在紀律最堅固的地方，在軍隊中最關心進行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員工作的地方，——那裏一般講來，軍事專家中甘願叛變的人就最少，那裏便於這種人來實現自己圖謀的機會就最少，那裏在軍隊中就沒有廢弛現象，那裏軍隊的秩序和士氣就要好些，那裏勝利也就多些。游擊主義及其殘餘給我軍和烏克蘭軍隊所遭受的禍害、崩潰、失敗、災難以及人員和軍用品之損失，比軍事專家底一切叛變所給予我們的，要大得無可計量。

我們黨綱上，關於一般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以及關於其中一種人即軍事專家的問題，完全確切地規定了共產黨底政策。我黨現在和將來都要『無情地反對那種假急進的，而其實是粗魯的自負心理，似乎勞動者無須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無須利用他們，無須有與他們多年共事的鍛鍊，便能戰勝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制度』。

自然，黨同時對『這一資產階級階層，決不作絲毫政治上的讓步』，黨現在鎮壓着，並且將來還要『無情地鎮壓這階層的一切反革命密謀』。自然，當這類『密謀傾向』出現或多少確定地顯露出來時，就要對它『無情地加以鎮壓』，這種鎮壓所要求的質量，已經不是『多年共事鍛鍊』所要求所教育人們的那種從容不迫，學生底謹慎心理等等的質量了。兩種情緒之間，即受過同軍事專家『多年共事鍛鍊』的人們的情緒，與那醉心於『無情鎮壓軍事專家

反革命密謀』這直接任務的人們的情緒之間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果然引起了磨擦和衝突。對於必需的個人更換，有時是大批軍事專家的調動，也是一樣，這種調動是由於某種反革命『密謀』事件所引起的，更不消說大陰謀案了。

這些磨擦和衝突無論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用黨的方式來解決，並要求黨的一切組織都這樣做去，而且一定要使實際工作不受到任何損失，在採取必要辦法時，沒有半點延遲，在實行我們已規定的軍事政策原則時，沒有絲毫動搖。

如果黨的某些刊物對軍事專家發出不正確的論調（像不久前在彼得格拉有過的那樣），或在個別情形下對軍事專家的『批評』已直接妨害到利用軍事專家這一有系統的和頑強的工作時，黨應立即改正這種錯誤，而且將來還要改正這種錯誤。

改正這種錯誤的主要基本手段，是加強在軍隊中和在被動員者中的政治工作，振奮軍隊政治委員底工作，改善他們的成份，提高他們的水準，由他們來實際執行黨綱之所要求，而往往是執行得極不充分的東西，即是要『把在各方面監督軍隊指揮人員之權集中於工人階級手中』。從旁批評軍事專家，企圖『一舉』改正，這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所以也就是毫無希望而祇有害處的事。凡屬悟解到自己政治責任和憂慮我軍缺點的人，就讓他們加入隊伍行列，當紅軍兵士或指揮官，當政治工作人員或政治委員吧，讓每一個人——任何一個黨員都能因才致用——都到軍事組織內部去為改善這組織而工作吧。

蘇維埃政權早已極度注意到使工人，農民，尤其是共產黨員都能認真地學習軍事。許多組織，機關和短期班內都在這樣進行，但這還進行得非常不充分。這裏，個人的主動性，個人的毅力還應當作出很多的奉來。共產黨員應當特別奮勉地學習使用機關槍，大砲，裝甲車等等，因為這裏我們的落後性更加有害，這裏擁有大量軍官

的敵人佔着更大的優勢，這裏不可靠的軍事專家能給予很大的危害，這裏共產黨員的作用也就大到極點。

後方肅反工作

也如像去年七月一樣，反革命勢力在我們後方，在我們中間抬頭了。

反革命勢力雖已被戰勝，但遠沒有被消滅，它當然要利用鄧尼金的勝利和糧食困難的嚴重情況。那些動搖的，無氣節的，借辭藻粉飾自己行爲的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等，依然跟在直接的和公開的反革命後面，跟在那些因爲自己有資本，因爲與協約國帝國主義有直接聯繫，因爲瞭解專政之不可避免並具有實現這種專政（按高爾察克式）的才能而表現強大有力的黑幫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後面蹣跚着。

對這方面不要有絲毫的幻想！我們知道產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亂和反革命陰謀等等的『策源地』，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鄉村富農，到處的『非黨』人士，還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要十倍地來監督這種策源地。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爲從這方面來的反革命密謀，在目前以及在最近將來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基地上炸毀橋樑，組織罷工，進行各種偵探陰謀等活動，也自然是會多次重複的。凡在反革命『策源地』稍微可能『棲身』的一切而無例外的中心，都必須採取各種最強有力的，有系統的，再三再四的，普遍的和突然實行的預防方法。

關於孟什維克、右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要估計到最近這次經驗。在他們『周圍人』中，在傾向於他們的人羣中，毫無疑義，是有由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方面向蘇維埃政權方面接近的變動情形。我們估計到了這種變動情形，每當這種變動稍微有點實際表現

時，我們就從自己方面採取相當步驟去迎接它。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自己的這種政策，而由傾向於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份子方面，往那傾向於蘇維埃政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份子方面『飛躍』者底數目，一般講來，無疑是會增加起來。

但在目前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首的那班無氣節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是順風轉舵，向勝利者鄧尼金方面動搖着。這對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一般『文藝集團』底『政治領袖』（如孟什維克中的馬爾托夫輩，右派社會革命黨中的切爾諾夫輩）說來，特別正確，至於這些『文藝集團』的會員，除其他種種原因外，還深深惱怨他們在政治上完全破產，因此也就含有未必能『醫治』的這種反蘇維埃政權的冒險趨向。

決不要被他們領袖底言詞和觀念以及他們個人的誠懇或虛偽所欺騙。這對他們每個人底履歷是重要的。但從政治上，即從階級關係，從幾百萬人間的關係上看來，並不重要。馬爾托夫輩『代表中央』莊重地斥責自己的『積極份子』，並以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永遠都是威脅！）。但這並沒有消除以下事實，即這班『積極份子』是孟什維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們藏在孟什維克後面，並進行自己的高爾察克—鄧尼金式的工作。沃爾斯基輩斥責亞甫克森、森欽夫輩和切爾諾夫輩，但這絲毫不妨害亞甫克森、森欽夫輩和切爾諾夫輩比沃爾斯基更加強而有力，絲毫不妨害切爾諾夫說：『如果不是我們，如果不在現時推翻布爾什維克，那麼又有何人和在何時來推翻布爾什維克呢』。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可能不與反動份子，不與切爾諾夫輩作任何勾結而『獨立』『工作』，但其實他們也是鄧尼金底同盟者及其走卒，如同那個因『思想』動機而給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和高爾察克開放戰線的前任總司令而現已去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穆拉維也夫一樣。

馬爾托夫和沃爾斯基之流自以爲是『高於』交戰兩方，自以爲是能夠建立『第三方』的人。

這個願望，縱令它是誠懇的，也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幻想，他們在一八四八年後業已過了七十年的現在，還沒有學會這一初步常識，即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祇能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決不能實現任何第三種專政。大概，馬爾托夫輩至死也拋棄不了這個幻想。那就祇好聽他們的便吧。但我們却要記得，在實踐中這班人總是不免今天向鄧尼金動搖，明天向布爾什維克動搖的。而今天却要做今天的事。

我們的任務是應當直接提出問題。究竟怎樣辦好些呢？是去把立憲民主黨人，非黨份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中那些『起來』（有的用武器，有的用陰謀，有的鼓動反對動員，如孟什維克中的印刷工人或鐵路員工那樣等等）反對蘇維埃政權，亦即擁護鄧尼金的幾百叛亂份子一律逮捕，關在牢裏，有時甚至槍決？抑或是讓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來把幾萬工農斬盡殺絕，一律槍斃，一概鞭死呢？要選擇並不難。

問題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

誰要是至今還不瞭解這點，誰祇會對這決議之『不公正性』訴泣，那他就是不可救藥的人，那他就應當遭受大衆的嘲笑和侮辱。

動員全民作戰

蘇維埃共和國是個被全世界資本所包圍了的要塞。只有那些積極參加戰事並極力幫助我們的人，才有權把這要塞作爲躲避高爾察克的避難所，才有權在其中居住。由此就產生出我們的權利和我們的義務：動員全民參戰，有的動員去直接作戰，有的動員去參加有關作戰的各種輔助工作。

完全實現這點，需要有盡善盡美的組織。既然我們的國家組織還遠未臻於完善地步（如果估計到它還年輕，估計到它在發展中所遇到的新奇事物和特殊困難情況，這也就一點不奇怪），若是想規模浩大地立刻在這方面來實現某種完備無遺或那怕祇是某種範圍廣濶的事情，那都會是組織上的一種最有害的虛幻計劃。

但爲了近於完善起見，在這方面也能作出很多局部的事情來，我們黨的活動份子和我們蘇維埃工作人員在這方面的『創舉』，表現得大大不充分。

這裏提出這個問題並引起同志們注意，也就夠了。並沒有必要來加上某些具體指示或假定。

我們只要指出，那些最接近蘇維埃政權而照例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維克等等中的某些人，特別憤慨人質制這種在他們看來是『野蠻』的辦法。

讓他們去憤慨吧，但不用這辦法就不能進行戰爭，而在危險尖銳化的情形下，這種手段，真正說來，還必須廣大使用，還必須更多地使用。例如，孟什維克的或黃色的印刷工人，『管理處人員』中和祕密投機家中的鐵路人員，富農，城市（及鄉村）富有者以及諸如此類的份子，常常用那種直接轉爲怠工之無限有罪和無限卑鄙的冷淡態度，來對待捍衛我國免遭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蹂躪的事業。要製定出這種種集團人底名單（或強迫他們自己組織連環保團體），不僅要他們去挖戰壕，像有時作過的那樣，而且也責成他們給予紅軍以各種的和多方面的物質幫助。

如果我們能更廣泛，更多方和更巧妙地來應用這種辦法，那末紅軍兵士的田地就會耕種得好些，對紅軍兵士之食品、馬合煙及其他必需品的供給就會組織得好些，成千上萬的工農因個別陰謀等等所遭受的死亡危險，就會人大減少。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總結以上所說，我們就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所有共產黨員，所有覺悟的工農以及每個不願意讓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的人，都應當立即並在最近幾個月內，空前提高自己的毅力，都應當『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既然飢餓，疲勞和困憊的莫斯科鐵路員工，不分工人專門家或粗工，爲了戰勝高爾察克和直到完全戰勝他爲止，都竟能實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在每個星期內無報酬地作幾點鐘的工作，同時發展着空前未有的，比平常高過很多倍的勞動生產率，那末這也就證明出，還能作出很多很多的事。

而我們也應當作出這很多的事。

那時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理事刊第四期。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十一期。

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 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同志們！紅軍從高爾察克手裏收復了烏拉爾全境，並已開始收復西伯利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欣悅鼓舞地歡迎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政權正在以鐵帚掃除所有一切地主資產階級惡棍，這些惡棍竟用苛捐雜稅，鞭笞拷打，侮辱蹂躪以及恢復沙皇壓迫手段，而使人民受盡了折磨和痛苦。

紅軍收復烏拉爾和進到西伯利亞，使我們大家都感到無限歡樂，但這決不應該使我們泰然自安。敵人還遠未被消滅。敵人甚至還沒有被澈底摧破。

必須緊張全力來把高爾察克以及日寇和其他外寇驅出西伯利亞，並要更加緊張力量來消滅敵人，不讓敵人再行開始他的強盜行爲。

怎樣才能達到這一點呢？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所受到的痛苦經驗，以及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弄得困苦不堪的全世界各國底經驗，我們是不應當空空放過的。

以下便是所有一切工農，所有勞動者都應當從這經驗中獲得出來，以資預防高爾察克叛亂災禍重演的五個主要教訓。

第一個教訓。爲要保護工農政權，使其不受匪幫，即地主資本家的侵犯，我們必須有強大的紅軍。我們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證明了：我們能夠建立這樣的紅軍，我們學會了指揮紅軍並戰勝資本家，那怕資本家獲得有全世界最富強各國在武器軍需品方面的大量幫助。布爾什維克已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所有工農——如果他們是有覺悟的話，——應當相信布爾什維克，不是根據空話（相信空話是很愚蠢的），而是根據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千百萬人的經驗。要把武裝工農一舉與那大半是同情地主資本家的舊軍官底指揮職務結合起來，這是極困難的任務。這個任務，只在具有最好的組織才能，嚴格和自覺的紀律，廣大羣衆對工人政治委員這些領導幹部表示信任等條件之下，才能解決。布爾什維克已把這個極困難的任務解決了：舊軍官叛變的事情在我們這裏有過很多，但紅軍畢竟不僅在我們掌握中，而且它還學會了戰勝沙皇將軍，戰勝英法美等國的將軍們。

所以凡是真正想避免高爾察克叛亂慘禍的人，都應當把一切力量，一切資財，一切能力，完全貢獻到建立和鞏固紅軍的事業上。忠誠執行一切關於紅軍的法令和命令，維護紅軍中的紀律，每個人都要竭盡全力來幫助紅軍，——這就是凡屬不願意遭受高爾察克匪患的覺悟工農所應盡的頭一個基本和主要的天職。

必須極力嚴防游擊主義，嚴防個別隊伍擅自行動與不服從中央權力等等行爲，因爲這是會使事業陷於滅亡的；烏拉爾，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事變都證明了這一點。

誰不盡心竭力幫助紅軍，誰不盡力維護紅軍中的秩序和紀律，誰就是變節者和叛徒，就是高爾察克匪幫，就應遭受無情的殲滅。

我們若擁有強固的紅軍，便會是不可戰勝的。沒有強固的紅軍，我們必然會成爲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的犧牲品。

第二個教訓。國家若沒有豐富的存糧，則紅軍便不能鞏固，因為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自由調動紅軍，不能好好訓練紅軍。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供養為軍隊工作的工人。

一切有覺悟的工農都應當知道，應當記得，現在我們紅軍勝利還不夠迅速，不夠穩固的主要原因，正是由於國家的存糧不夠。誰不把餘糧交給國家，誰就是幫助高爾察克，誰就是叛賣工農的人，誰就是造成紅軍中幾萬工農枉然遭受犧牲或痛苦的罪人。

一切騙子，奸商和完全愚昧無知的農民都這樣想：我把糧食照自由價格出賣，總比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所賺的錢要多得多。

但正是由於自由出賣就使投機業增長，使少數人發財，使富有者愈富，而工人羣衆則仍舊忍飢受餓，這是我們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產糧最豐地區所實際看到了的情形。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資本則雄霸一方，勞動則陷於飢餓與貧困。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糧食價格會提高到每普特幾千盧布，貨幣跌價，少數投機份子發財，人民愈益貧困飢餓。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使國家存糧消耗一空，軍隊軟弱無力，工業停頓，而高爾察克或鄧尼金就必然獲得勝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農政權的死敵才自覺地主張自由出賣糧食。凡是因自己愚昧無知而主張自由出賣糧食的人，便應當從西伯利亞和烏克蘭例子中學會並了解，為什麼自由出賣糧食便會使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

還有一種愚昧農民說：讓政府先照戰前價格用很好的貨物來同我交換糧食，那時我就交出我的餘糧，不然的話，我是不會交出的。騙子和擁護地主的人常常是利用這種言論來誘農民『上鉤』。

不難了解，工人國家因被資本家為爭奪君士坦丁堡所進行的四年強盜戰爭弄得破壞無餘，後來又被高爾察克，鄧尼金在全世界資

本家幫助之下，因圖謀報復而大肆破壞，而這樣的工人國家此刻是無法給農民貨物的，因為工業在停頓中。既無糧食，又無燃料，又無工業。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農民都會同意把餘糧借給工人，而以將來用工業品償還為條件。

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一切覺悟的有理智的農民，一切人們，除了騙子和奸商以外，都會同意應當把所有的餘糧全部借給工人國家，因為那時國家就能恢復工業而給農民以工業品。

有人會問我們，農民是否會相信工人國家而把多餘糧食借給它呢？

我們就回答說：第一，國家給與借券，即紙幣。第二，所有農民都從經驗中知道，工人國家，即蘇維埃政權是幫助勞動者而反對地主資本家的，所以蘇維埃政權也就叫做工農政權。第三，農民沒有其他的出路：或者相信工人，或者相信資本家；或者信任工人國家，把糧食借給它，或者就信任資本家底國家。在俄國以及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內，農民都是沒有其他出路的。農民愈有覺悟，就會愈加堅定地擁護工人，就會愈加堅決地盡力幫助工人國家，以便使地主資本家政權無法復辟。

第三個教訓。為要澈底消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就必須遵守極嚴格的革命秩序，必須神聖般地恪守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和指令，並監督一切的人來執行這些法令和指令。

根據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獲得勝利的例子，我們大家都明顯看到，稍微混亂而無秩序，稍微違犯蘇維埃政權底法令，稍不當心或稍許懈怠，都會立刻加強地主和資本家的勢力，促成他們勝利。因為地主資本家並沒有被消滅，並不自認為是失敗了的：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農民都看見，都知道，都懂得，地主資本家只是被擊潰之後才躲避起來了，隱藏起來了，往往改穿了「蘇維埃的」帶

保護色的」服裝。許多地主鑽進到了蘇維埃農莊中，許多資本家鑽進到各種『總局』和『中央』裏，變成了蘇維埃的職員；他們隨時隨地窺伺着蘇維埃政權的錯誤和弱點，以便把這政權推翻，以便在今天幫助捷克斯拉伐克軍團，明天又幫助鄧尼金。

必須用全力偵察和捉拿這些盜匪，這些匿藏起來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在其一切掩蔽所裏去揭露他們，無情地懲罰他們，因為這是勞動者底死敵，是一些熟悉情形，富有經驗的奸滑敵人，他們耐心地等待着組織陰謀的便利機會；這是一些怠工者，他們不惜採用一切萬惡手段來危害蘇維埃政權。對付這種勞動者底死敵，對付地主和資本家，對付怠工者和白匪，應當是鐵面無情的。

爲要善於捉拿這些人，自己就必須是機敏的，謹慎的和有覺悟的人，必須極細心地監視每個稍無秩序的現象，每個略微表示不誠實執行蘇維埃政權法令的行爲。地主和資本家還是強有力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擁有知識和經驗，不僅是因為他們有世界上極富強國家的援助，而且還因為廣大羣衆的習慣和愚昧底勢力，這些羣衆想『照舊』生活，而不了解必須嚴格而誠實的遵守蘇維埃政權的法令。

稍微違反法律，稍微破壞蘇維埃秩序，便已經是可以立刻被勞動者底敵人所利用的缺陷，便是可以使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獲得勝利的支點。高爾察克叛亂開始是由於對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稍欠謹慎，是由於個別團營之小小違反命令，——如果忘記這些事情，便是犯罪的行爲。

第四個教訓。不僅忘記高爾察克叛亂係從細小事情開始，這是一種犯罪行爲，而且如果忘記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了高爾察克叛亂的產生並直接擁護了他們，這也是一種罪行。現在已是學會不按各政黨的言論而要按它們的行爲來估計各政黨的時候了。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稱爲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乃是白匪的幫手，地主資本家的幫手。實際證明這一點的，不僅單是個別

的事實，而且有俄國革命歷史上兩個大時代：（一）克倫斯基的叛亂，（二）高爾察克的叛亂。在這兩次事變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實際上則起了白軍幫手的作用。難道我們竟會這樣愚蠢，現在還相信他們的話，相信他們向我們提議再允許他們『試驗』一次，而把這允許叫做什麼『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統一戰綫』嗎？難道在高爾察克叛亂後，除了個別份子外，農民還不懂得與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結成『統一戰綫』，便是與高爾察克幫手們實行統一嗎？

有人會反駁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經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放棄與資產階級結成任何聯盟。但這不是事實。第一，右派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甚至還沒有放棄這種聯盟，而這些『右派』是沒有一定界限的，其所以沒有，是由於『左派』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罪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甚至最好的份子口頭上『責斥』他們的『右派』，實際上却違反自己的言論而軟弱無力地與右派為伍。第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甚至最好的份子，也恰恰在擁護高爾察克派的主張，這種主張是幫助資產階級和高爾察克與鄧尼金的，是掩蓋這些人所幹的骯髒血腥的資本主義勾當的。這種主張就是所謂人民政權，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制，立憲會議，出版自由等等。在全世界上，我們都看見各資本主義共和國正是用這種『民主』謊話來辯護資本家的統治，辯護為奴役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在我國，我們看見無論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以及任何一個將軍都樂意發出這種『民主』諾言。對這類因聽信口頭諾言而來幫助公開匪徒的人，是否可以信任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無例外的都在幫助公開的匪徒，幫助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而用虛假的民主主義口號粉飾他們的政權，粉飾他們對俄國的進攻，粉飾他們的統治，粉飾他們的政策。所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向我們提議締結『聯盟』，其條件

是我們向資本家及其領袖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讓步，例如『放棄恐怖手段』（當着全協約國的億萬富翁，所有在俄國組織陰謀叛亂的極富強國家正在聯盟採用恐怖手段反對我們的時候），或者要我們開放糧食自由貿易的道路等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提出的這些『條件』就是說：我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動搖到了資本家方面，須知資本家利用每種讓步來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我們却願意與布爾什維克結成『統一戰綫』！不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老爺們，現時在俄國別要想找到還會相信你們的人了。俄國有覺悟的工農都懂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白匪的幫手，其中一部份人是自覺的惡意的這樣做，另一部份人是由於缺乏理智，由於堅持舊錯誤才這樣做，但是所有他們都是白匪的幫手。

第五個教訓。爲要消滅高爾察克及其黨羽，爲要不使他們能重整旗鼓，所有一切農民都必須毫不動搖地來選擇擁護工人國家這道路。人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甚至他們中間的『左派』）都用『一黨專政』，即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專政來恐嚇農民。

農民從高爾察克例子中學會了不害怕這種恐嚇話。

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底專政（即鉄腕政權），或者就是工人階級底專政。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只有公子少爺，小智識份子這些瀏覽壞書一學無成的人，才會來憑空幻想中間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中間道路，而且決不能有中間道路，或者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而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說什麼人民政權，立憲會議，各種自由等等的漂亮言詞掩蓋着），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誰沒有從整個十九世紀的歷史中學會這一點，誰就是無可救藥的白癡。而在俄國，我們大家都看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克倫斯基時代和在高爾察克統治下曾如何幻想這中間道路。

這些幻想是替誰効了力呢？這些幻想又幫助了誰呢？只幫助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而已。幻想中間道路的人就是高爾察克的幫手。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業已根據經驗把資產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專政加以比較過。工人階級專政，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實現的，這個黨還在一九〇五年，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已與全體革命無產階級溶成一片了。

工人階級專政，這就是說：工人國家要毫不動搖地鎮壓地主和資本家，鎮壓幫助這些剝削者的叛徒和變節者，並戰勝他們。

工人國家是地主和資本家、騙子和投機者底鉄面無情的敵人，是土地和資本私有制底敵人，是金錢權力底敵人。

工人國家是勞動者和農民底唯一忠實可靠的朋友和幫助者。絲毫不動搖到資本方面去，結成反資本的勞動者聯盟，工農政權，蘇維埃政權——『工人階級專政』的實際意義就是如此。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想用這些話來恐嚇農民，這是不會成功的。在高爾察克叛亂後，甚至處在窮鄉僻壤的工人和農民都懂得，這些話恰恰是免除高爾察克災禍的良藥。

打倒動搖者，打倒無氣節者，打倒那些誤入迷途而幫助資本的人，打倒那些爲資本底口號與諾言所誘惑的人！與資本作無情的鬥爭，結成勞動者底聯盟，結成農民與工人階級底聯盟，這就是高爾察克事變所給於我們的最後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教訓。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一百九十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四三一至四三六頁。

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

莫斯科徵收黨員週恰逢蘇維埃政權的困難時日。鄧尼金的勝利，引起了地主資本家及其朋友方面拚命加緊組織陰謀，引起了資產階級加緊企圖擾亂人心，用各種手段摧損蘇維埃政權底堅固性。動搖者，觀望者，不自覺的庸人，而與之携手的還有智識份子，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都照例更加動搖起來，最先被資本家嚇倒了。

但是我認為，莫斯科徵收黨員週，恰值困難關頭，這一點反而與我們有利，因為這對於事情更有益處。我們舉行徵收黨員週，不是爲了炫耀觀瞻。裝飾門面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我們也是不收的。世界上唯一不關心於增加黨員數量，而注重提高黨員質量，注意清洗「混進黨來」的異己份子的執政黨就是我們的黨，即革命工人階級底黨。我們重新登記黨員已不止一次，目的在於驅除這些「混進黨來」的份子，以便只讓那些覺悟的和對共產主義真正忠實的人留在黨內。我們利用了動員人上前綫和義務星期六的辦法，來清洗黨內那些只想藉執政黨黨員地位「營私謀利」，却不願負擔自己工作底重担以利於共產主義的人。

現在當加緊動員人上前綫的時候來舉行徵收黨員週是很妥當的，因為不會使那些想混進黨來的份子有機可乘。我們所號召大批入黨的只是普通工人和貧苦農民，即勞動農民，而不是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並不因他們入黨就給這些普通黨員什麼預約，或者就給他們什麼利益。恰恰相反，現在黨員要擔負比平常更困苦更危險的工作。這樣要好一些。這時只有真心贊成共產主義的人，只有誠意忠實於工人國家的人，只有真誠的勞動者，只有在資本主義下被壓迫羣衆底真正代表，才會入黨。只有這樣的黨員，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需要新黨員不是爲了壯耀觀瞻，而是爲了進行森嚴的工作。所以我們號召他們入黨。我們向勞動羣衆大開黨門。

蘇維埃政權是爲完全剷除資本壓迫而鬥爭的勞動者底政權。首先奮起進行這種鬥爭的，是各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工人階級。它獲得了第一次勝利，奪得了國家政權。

它使大多數農民與自己聯合起來。而趨向於資本，趨向於資產階級方面的，則只有農民中的小商人，農民中的投機者，而不是勞動農民。

最進步最覺悟的工人，即彼得城工人，選拔出了最多的人材來管理俄國。可是我們知道，在普通工人和農民中，忠實於勞動羣衆利益，能夠擔任領導工作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在這些人中有許多具有組織天才和管理天才的人，資本主義曾不讓這些人發展，我們却盡力幫助這些人，並應當幫助他們上進，以便擔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要找到這些樸實而不露頭角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要吸引那些歷來被地主資本家壓迫和恐嚇的普通工農來參加國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們所應該進行，而且必須進行的，正是這種不容易的工作，以便從工人階級，從勞動農民的深處吸取新的人材。

非黨的工人和勞動農民同志們，加入黨裏來吧！我們並不因此就約許你們什麼利益，我們號召你們來進行困難的工作，進行國家建設的工作。如果你們是忠誠擁護共產主義的人，那你們就大胆來負起這種工作，不要害怕其中的新事物和困難，不要被那種以為只有受過官家教育的人才能勝任的陳腐偏見，弄得惶惑不安吧。

這樣是不對的。普通工人和勞動農民能夠，而且應當是人數日益增多地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

勞動羣衆擁護我們。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此。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不可戰勝的泉源也就在於此。多吸收羣衆中新的工作者入黨，使其獨立參加建設新生活的工作，這就是我們克服一切困難的手段，這就是我們走向勝利的道路。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百二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四八四至四八五頁。

告紅軍兵士同志們

紅軍兵士同志們！這些沙皇將軍，在北方是尤登尼奇，在南方是鄧尼金，又一次緊張力量，想來戰勝蘇維埃政權，恢復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

我們知道，高爾察克同樣的企圖有了怎樣的結果。他欺騙了烏拉爾工人和西伯利亞農民，爲時是不久的。烏拉爾工人和西伯利亞農民看清了這種欺騙之後，遭受了地主資本家子弟軍官們無窮的暴行、鞭笞、搶劫之後，就幫助我們紅軍打敗了高爾察克。奧倫堡的哥薩克直接轉到了蘇維埃政權方面。

所以我們堅信，我們定會戰勝尤登尼奇和鄧尼金。他們想恢復沙皇地主政權的企圖是不會成功的。這是決不會有的事！農民已經在鄧尼金底後方起義了。在高加索，反鄧尼金的起義火焰已經熾燃起來了。庫班一帶的哥薩克大不滿意鄧尼金爲了幫助地主和英國人所採用的強暴搶劫手段，都憤激不平起來。

紅軍兵士同志們，堅如鐵石吧！工人和農民愈益團結地，愈益有覺悟地，愈益堅決地站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

紅軍兵士同志們，前進啊！爲工農政權而挺身赴戰，反對地主，反對沙皇將軍！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一九年十月刊載於紅軍兵士雜誌
第十至第十五期合刊上。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四八九頁。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臨到蘇維埃政權第二週年的時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寫一本小冊子，可是因為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還祇初步地準備了個別章節。所以我決定嘗試嘗試，用提綱方式把我認為是本問題中最重要的意思簡略敘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敘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點的。但在一篇不大的雜誌論文中，也許總可以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即指出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以供各國共產黨員討論。

(一)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橫着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含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底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具有這種過渡時期特點的整個歷史時代底必然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對於發展論有相當認識的人，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第二

國際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麥克唐納爾和龍格，考茨基和阿得列爾之流在內，不管他們掛着社會主義的假招牌，也都是這樣的民主派）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這種顯然的真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厭惡階級鬥爭，幻想避免這種鬥爭，力圖輾平、調和及鈍化這種鬥爭底鋒芒。所以這類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則認定自己的任務，不是領導兩種鬥爭力量中一方的鬥爭，而是把兩種鬥爭力量調和起來。

(二)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祇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

這些社會經濟基本形態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共產主義。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俄國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廣大的全國統一範圍內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這種勞動底初步形態，與小商品生產，與尚保存着並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復活着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鬥爭。

其所以說勞動在俄國已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了起來，第一，是因為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全國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國有土地上和國有企業中的大生產，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來分配勞動力，把屬於國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

我們是說俄國共產主義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黨黨綱也是這樣說的），因為這些條件在我國還祇部分地實現，換言之，這些條件的實現還處在開始的階段。我們用革命打擊手段，一舉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實現的事情實現了：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無報償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剝奪了。在幾個月內就同樣毫無報償地把幾乎所有大資本家以及工廠、股份公司、銀行和鐵路等等的私有主剝奪了。由國家來組織工業中的大生產，從『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工廠和鐵路，——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實現了，但在農業方面，這還祇是剛剛開始實行（由工人國家在國有土地上組織『蘇維埃農莊』，即大農莊）。同樣把小農組織成爲各種共耕社，作爲從小商品農業進到共產主義農業*的過渡辦法一舉，也剛剛才開始進行。至於由國家組織物品分配來代替私商，即是由國家採辦糧食並運給城市，採辦工業品並運給鄉村這件事，也是如此。下面就有關於本問題的統計材料。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有非常廣濶，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活動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一般就是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

*在蘇俄已經成立的蘇維埃農莊約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個，農業公社約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約有三千六百九十六個。我們中央統計局現時正在把所有蘇維埃農莊和農業公社作一次精確的登記。登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就會開始收到。

(三)

爲了說明這些抽象的理論原則，且來引出一些具體的統計材料。

根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在俄國境內由國家採辦的糧食，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約三千萬普特。下一年約計一萬一千萬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頭三個月的採辦結果大約可達到四千五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裏（八月至十月），則僅有三千七百萬普特。

從這些數目字中間就可看出，在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我們的情形雖改善得很慢，但總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這種改善，是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用盡世界列強所有一切力量來組織國內戰爭，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難條件下達到的。

所以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和暗藏的幫手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主義者』）怎樣造謠，怎樣誣蔑，但有一點總是不容懷疑的：即從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觀點來看，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因爲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會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決不會成功的。

我們在所得到的這個短期間內，並在行動時所處的那種舉世未有的困難條件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戰勝了資本主義，這從下述總結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製定了預備發表的關於蘇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總結如下：

蘇俄二十 六省	人 口 (單位百萬)	產糧數量 (不計種籽 和飼料) (單位百萬 普特)	運到的糧食數 (單位百萬普特)		居民所擁 有的糧食 總量(單 位百萬普 特)	每口人消 費的糧食 量(單位 普特)
			由糧食人 民委員部 運到的	由投機 小販運 到的		
產糧省區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鄉村... 28.6	625.4	—	—	481.8	16.9
消費省區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鄉村... 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總計	(26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糧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糧食人民委員部運到的，另一半是由投機小販運到的。據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糧情形確切調查結果來看，其比例正是如此。但由國家運到的糧食，工人所付的價格要比由投機小販運到的少九倍。糧食的投機價格比國家定價高到十倍。這就是確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確切材料。

勞動羣衆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

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為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語）。

但是勞動羣衆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裏，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却把幾萬萬普特的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和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爲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喝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於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份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只是一部份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份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得無比的任務。而且由於客觀必然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不能用推翻某個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這樣的過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會阻滯這種過渡並增加其困難。只有採取各種使

農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農業技術，並把這技術加以根本改造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爲了解決這個最困難的第二部分任務，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在自己對農民的政策方面，一貫地執行以下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勞動者和農民私有者，即是把農民中的工作者和農民中的商人，農民中的勞動者和農民中的投機者分別開來。

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所在。

無怪乎那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以及考茨基輩）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底這種實質。

這裏所說的分別是很難實行的，因爲在實際生活中，『農民』所有的一切特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異，如何互相矛盾，總是溶合爲一個整體。但是把他們分別開來，還是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條件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家，投機小販，奸商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內）所壓迫。勞動農民在幾百年中養成了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實際生活的『教養』，就迫使農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家，反對奸商，反對投機小販。同時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環境又必然使農民變爲（並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如此）投機小販和奸商。

根據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顯然看出農民勞動者與農民投機者間的區別。有一種農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爲了供給城市裏受餓工人，而按照國家固定價格，把四千萬普特糧食交給了國家機關，雖然當時這些機關還有許多缺點，而這種缺點是工人國家所明白認識，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時期中，是無法免除的，——這種農民就是勞動農民，他們完全不愧爲社會主義工人底

同志，是社會主義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會主義工人在反資本壓迫鬥爭中的骨肉兄弟。還有一種農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飢餓，暗地裏用超過國家定價十倍的價錢，出賣了四千萬普特糧食，這樣來欺騙國家，到處引起並加強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這種農民就是投機者，就是資本家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敵人，就是剝削者。因為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從全國公有土地上收穫來的，而其所用的農具不管怎樣都不僅是由農民，而且是由工人等等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用餘糧去投機，這就是剝削忍飢受餓的工人。

人們從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憲法上工農不平等，指責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用強力奪取餘糧等事實說道：你們是破壞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作過這樣多的事情，來消滅勞動農民千百年來所備受苦痛的那種實際上的不平等，那種實際上的不自由。可是對於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承認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認剝削者可以與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與飢餓者『平等』，不承認前者有劫掠後者的『自由』一樣。而對於那些不願意了解這種區別的有學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對待白黨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那怕這種人自稱為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考茨基派，切爾諾夫派，馬爾托夫派等等。

(五)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階級一消失，專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雖然還是存在，但每個階級都改變了，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並不消失，而只是採取別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壓迫階級，是被根本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是唯一直接而完全與資產階級對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夠澈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成爲統治階級：它掌握着國家政權，它擁有已經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它領導着那些動搖的中間的份子和階級，它鎮壓着剝削者愈益增長的反抗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底特殊任務，這種任務是無產階級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也不能提出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爲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們擁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這使他們獲得極大極大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之反對已獲勝利的被剝削羣衆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得無可比擬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用改良幻想去代替革命這概念（如像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幹的那樣），那麼情形也就只能這樣。

末了，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衆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

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慣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動搖不定，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

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或者說，對於這種社會成份的任務，就是要領導他們，爭取對他們的影響。領導動搖份子和不穩定份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一切基本力量或階級及其由無產階級專政所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國際一切代表們中所流行的，說什麼『經過』一般『民主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極了。這種錯誤觀念底基礎，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下來的偏見，以為『民主制』包含有絕對的，超階級的內容。其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鬥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從於階級鬥爭。

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具體任務，就無異是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從無產階級方面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出：是擺脫哪一個階級壓迫而獲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與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還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等等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²⁴一書中早已解釋過，平等概念是商品生產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瞭解為消滅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會變成一種偏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平等概念與社會主義平等概念

不同的這種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這個真理，那就顯而易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滅階級的方向上實現了最重大的前進步驟，無產階級爲要把消滅階級這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鬥爭、影響和逼迫手段。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待 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〇七至五一五頁。

* 本文未完——編者。

與燃料恐慌作鬥爭

給各地黨組織的指示信

同志們！我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負有統一工人階級鬥爭並領導它爭取工農蘇維埃政權勝利的任務。我們兩年來勝利地進行了這種鬥爭，現在便明白知道，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才得以克服我們面前由於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弄得國家破產以及由於俄國和國際一切剝削者羣起抵抗所造成的莫大困難。

同志們！我們力量的主要泉源，就是我國工人的自覺性和英勇精神，以及勞動農民對工人所不能不始終表示的同情和擁護。我們各次獲得勝利的理由，都是由於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能把當前一切困難和任務公開宣告於勞動羣衆；善於向羣衆解釋，爲什麼在某個關頭應當致全力於蘇維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善於鼓舞羣衆底毅力、熱情和英勇精神，而把革命的高度努力集中於當前最主要的任務之上。

同志們！目前這一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與燃料恐慌作鬥爭。我們正在肅清高爾察克底殘餘，我們已戰勝了尤登尼奇，我們開始有成效地進攻鄧尼金。我們大大改善了採辦糧食和儲藏糧食的工作。但燃料恐慌有破壞全部蘇維埃工作的危險：工人和職員因飢寒交迫開始棄職離散，運輸糧食的車輛中途停止，正因爲缺乏燃料而使真正的災禍日益逼近起來。

燃料問題成了其他一切問題的中心。無論如何都要把燃料恐慌克服下去，否則糧食任務，軍事任務，全國經濟任務，都無從解決。

燃料恐慌也是有法克服的。因為我們雖然失去了頓巴斯的煤炭，又沒有可能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迅速增加煤炭開採量，但我們還有許多森林，我們可以砍伐和運來足夠的木柴。

燃料恐慌是有法克服的。現在要善於集中主要力量來對付我們目前主要的敵人，即對付燃料恐慌，要善於喚起勞動羣衆的熱情，要善於按革命精神緊張一切毅力來極迅速地大批地開採和運到各種各樣的燃料：煤炭，岩炭和泥煤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所有各地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既在兩年來表現有能力有智慧用革命手段解決各種並不輕易而是更加困難得多的任務，現在也定能解決這個任務的。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各地黨組織特別提出下列辦法：

(一) 所有黨組織今後應當經常在黨的會議，首先是在黨委會議的議事日程上提出燃料問題以及與燃料恐慌作鬥爭的問題。爲了克服燃料恐慌，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應當做些什麼？怎樣加強這種工作？怎樣使這種工作更有成效？——所有一切黨組織現在都要來討論這些問題。

(二) 各省執行委員會，各市執行委員會，各縣執行委員會，各區執行委員會，總而言之，一切蘇維埃領導機關，也都應當這樣做去。黨員應當負起首倡責任來在全國範圍內加強統一這種工作，並使這一工作緊張起來。

(三) 要到處進行極廣泛的鼓動工作，主要是在鄉村中進行鼓動工作，解釋燃料問題對於蘇維埃政權的意義。特別要進行鬥爭反對在燃料事宜上專注意地方利益，鄉土利益，狹隘利己傾向。要向大家解釋，不來爲全國需要而進行自我犧牲的工作，便不能挽救蘇維埃共和國，便不能捍衛住工農政權。

(四)要萬分仔細地檢查黨底指示和蘇維埃政權底委託、要求、指令之實際執行情形。在最近一次徵收黨員邁入黨的新黨員，都應當被吸收來檢查全體人員怎樣執行了自己的義務。

(五)全體居民勞動義務制，或動員一定年齡的人去採掘和運輸煤炭，砍伐和運輸木柴到各鐵路車站去，這一工作應當以最大的速度和最嚴格的紀律進行起來。必須規定勞動標準額，並無論如何都要設法完成。對於那些違背再三告誡、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須嚴格無情地加以處分。任何寬容態度，任何軟弱態度，都是對革命的犯罪行爲。

我們提高了軍隊紀律。我們現在應當提高勞動紀律。

(六)義務星期六應當多多進行，要更加積極，更有系統，更有組織，並且首先是在燃料工作中去進行。黨員在遵守勞動紀律和努力工作方面應當成爲一切人的模範。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和其他中央機關以及各地蘇維埃機關關於燃料問題的決議，都應當真心誠意地加以實現。

(七)應派黨內優秀工作人員去加強各地方燃料機關。幹部的分配，應按照這種目的來加以審查和相當改變。

(八)從中央派出的同志，應給以一切幫助，達到在組織、佈置和進行燃料工作方面，能培養出——並且要在實踐中培養出——盡量多的青年人材。在地方刊物上要對這種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把真正優良的模範工作很關心地表彰出來，使大眾知道，同時要無情地反對個別區域，個別機關，個別部門的落後懈怠現象或不善於工作的情形。我們的刊物應當成爲推進落後者，教育人們去執行工作，遵守勞動紀律，從事組織等等的工具。

(九)保證採掘及運輸燃料人馬的糧食和飼料，應成爲糧務機關最重要的任務。要從各方面來幫助這些機關，加強它們的工作，監督工作的執行。

(一〇) 在一切燃料機關中 (以及在一切蘇維埃機關中) 要孜孜不倦地力求做到在實際上保證各人親自担負一定的工作，即嚴格而確切指定了的工作或一部分工作。集體討論的辦法，應當減少到絕對必要的限度，無論何時也不要阻碍迅速和果斷決定問題，無論何時也不要停息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性。

(一一) 關於一切燃料問題的公文手續，必須特別確切而迅速。稍有遲誤，就應受到無情的懲罰。向中央的報告應當是模範式的報告。

(一二) 一般說來，全部燃料工作應當按軍事方式來進行：用戰爭所要求的同樣的毅力、速度和最嚴格紀律來進行。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克服。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擺脫。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全體同志都會緊張全力最積極最確切地來執行這些指示。

為戰勝燃料恐慌而鬥爭！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二至五三五頁。

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 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同志們！我非常高興地代表政府向你們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致敬。大家當然都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共耕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早已撥出了十萬萬盧布基金來幫助創辦這種事業。在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條例上特別指出了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業的意義；蘇維埃政權也就用全力來使這個法令不致成為一紙空文，而能真正收到它所應收到的成效。所有這種企業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原來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仍舊不變，那末任何堅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也就無從談起。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哪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各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來從外面，從旁邊去強迫加以改造，那都是完全荒謬的思

想。我們明白懂得，要想影響千百萬小農經濟，只能採取逐漸的謹慎的辦法，只能用實際模範例子來表明，因為農民非常講求實際，又與舊式農業聯結得非常鞏固，要使他們作某種嚴重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要是這樣辦，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謬。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身經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共耕制的和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嚴重的進步。所以這個賦予你們大家以巨大國家義務和社會主義義務的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底巨大意義，自然使得蘇維埃政權及其代表們對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和特別謹慎。

在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法令中說過，我們認為所有一切共耕的合作的農業企業絕對不應與附近農民隔離起來，表示特殊化，而是必須幫助他們。在法令中這樣寫着，在公社章程中又這樣重複着，在我們農業人民委員部各指令中也經常發揮這點，而這乃是最主要的事情。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找到真正實際辦法，怎樣來實現這點。在這裏我還不能肯定說，我們已經克服了這個主要困難。你們既是從全俄各地來到的公共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可能互相交換經驗，所以我希望，代表大會能掃除一切懷疑，而證明我們能通曉或能開始通曉這鞏固勞動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種集體、公共農業企業的實際事業。但是要證明這點，就需有真正實際上的成果。

當我們讀到農業公社章程或論述本問題的書籍時，總覺得我們過多注意於宣傳和在理論上論證組織公社底必要。當然，這是必須要做的；若沒有詳細的宣傳，若沒解釋共耕制農業的優越性，若不把這個意思千番百次加以說明，我們便不能指望廣大農民羣衆會對本問題發生興趣，而開始來具體試驗實現它的種種辦法。宣傳當然是必要的，再三重複是用不着害怕的，因為對於我們似乎是重

複，而對於成千成萬的農民也許會不是重複，而是他們第一次發現的真理。若認為我們過於注重宣傳，那就應當說，我們還必須加一百倍地這樣做去。但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向農民一般解釋農業公社制度的好處，同時卻不會在實際上把共耕社和勞動組合所給予他們的實際益處表明出來，那末農民就不會信任我們的宣傳。

這法令上說，公社、勞動組合、共耕社應當幫助附近的農民。但是國家，即工人政權撥出了十萬萬盧布的基金來幫助農業公社和勞動組合。當然，如果某個公社從這基金中拿出一點來幫助農民，那末，恐怕這就只會引起農民方面的譏笑。而且這種譏笑是完全有根據的。任何一個農民都會說：『既然撥了上十萬萬的基金給你們，那你們自然不難從這基金中掏出一點，讓我們也來沾沾光哩』。恐怕農民只會譏笑這種行為，因為農民對於這個問題非常注意，而且抱着極不肯輕信的態度。農民千百年來從國家政權方面所遇到的只是壓迫，這點已司空見慣了，所以農民對於凡是官家做出的事情總是表示不肯輕信。因此，農業公社對農民實行的幫助，如果只是爲了奉行法令，那末這種幫助不惟無益，而且只會有害。因為農業公社是個很響亮的名稱，是與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有聯繫的。如果公社在實踐上表明自己是真正在進行認真改良農民經濟的工作，那才名符其實，那時就無疑地會提高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底威信。但往往也有這樣的情形，公社只是激起農民對自己的反感，而『公社』這個名詞有時甚至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口號。並且這種情形不僅當人們荒謬絕倫地企圖用強迫手段迫使農民加入公社時，才發生出來。這種荒謬舉動如此刺目，使得蘇維埃政權早已就在反對這種行動。我希望，假如現在還能遇到有採用強力手段的個別例子，那末這種例子是很少的，而你們也就要利用本屆代表大會來把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殘跡從蘇維埃共和國中根本剷除乾淨，使附近農民不能找到半點口實來擁護舊的成見：似乎加入公社，都是與某種強力手段有關。

但即令我們消除了這種舊缺點和完全克服了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我們還不過是做了我們所應作的極小的一部份工作。因為由國家幫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假使我們若不極力由國家來幫助各種集體農業，那我們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便不是擁護建樹社會主義經濟的人。我們之所以不得不這樣做，也因為這是適合我們全部任務的設施，因為我們深知這些共耕社，勞動組合和集體組織都是新的創舉，如果執政的工人階級不給這些創舉以幫助，那它就不會發育起來。爲了使它真的發育起來，正因為國家根據實情給它以金錢上的及其他各種幫助，我們就要做到使農民不致於來譏笑這種創舉。我們應當經常顧慮到，使農民不會說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的社員是靠官家養活的，說他們與普通農民的區別，只在於他們受到有官家的優待。如果除了土地外還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撥出建築補助費，那末任何一個傻瓜都會比普通農民過着較爲優裕的生活了。農民會說：這裏哪談得上什麼共產主義，這裏有什麼改良，他們有什麼值得我們敬仰的地方呢？當然，如果選出幾十個或幾百個人來，給他們幾十萬萬盧布，那他們都是會工作的。

最使我們憂慮的正是農民的這種態度，我很希望參加此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注意。必須在實踐上適當解決這個問題，使我們能夠自信地說，我們不僅免除了這種危險，而且找到了方法來使農民不僅不會這樣着想，反而使他們在每個公社中，在每個勞動組合中，都看到有由國家政權幫助的某種事情，並在其中找到，不是從書本上和言論中找到，——這是很容易的，——而是從實際生活中找到表明自己是優於舊方式的那種新的農作方法。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所以如果我們手邊只有一些枯燥的數目字也就很難判斷，是否我們已實際證明了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都是真正高於所有一切舊時企業的組織，是否證明了工人政權在這裏幫助農民。

我想，爲要實際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是由你們這些實際認識當地許多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情形的人，製訂出真正實際的監督辦法，來監督那責成農業公社幫助附近農民的法令之實施；監督怎樣實際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去的辦法，以及這些辦法在每個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中的具體表現何在；究竟這個法令是怎樣實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實地執行這個法令，又有多少是僅僅在準備執行這個法令；公社對農民的幫助有過多少次，這種幫助的性質如何，是慈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

如果公社和勞動組合從國家對它們的補助金中分出一部份給農民，那末這只會使每個農民想到，這不過是一些善人在幫助他，但完全不是證明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事實。農民對於這樣的「善人」，自古以來就是懷着不肯輕信的心理。要善於檢查這個新社會制度真正表現何在，究竟用什麼方法向農民證明了，採用共耕和勞動組合辦法經營土地，比個體農民獨自耕種的辦法要好些，其所以好些，並不是由於官家幫助；要設法善於向農民證明，沒有官家幫助，這種新制度實際上也是能夠實現的。

可惜我不能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出席到底，所以我不能來參加規定這些檢查辦法。但我相信，你們和我們農業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同志一塊，定能找出這樣辦法來的。我很滿意的讀過了農業人民委員謝略得同志寫的一篇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着重指出說公社和共耕社不應當與附近農民隔離，而是要努力改善農民經濟。要把公社經營成爲模範農莊，使附近農民自願接近公社；要善於作出實際例子給它們看：應當怎樣來幫助那些在貨物缺乏和全般經濟破壞的困難條件下經營農務的人們。爲要決定實現這點的實際辦法，就必須製定一個很詳細的指令，在這個指令中，應當列舉幫助附近農民的各種方式，應當詢問每個公社，究竟它在幫助農民方面做了一些什麼事情，應當指出具體辦法，如何達到使現有的兩千公社和大

約四千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在實際上成爲鞏固農民信念的核心，使農民相信集體農業這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辦法是有益處的東西，而不是空想，而不是夢囈。

我已經說過，法令責成公社幫助附近農民。要在法令中用另一種方式來表明這種意思，寫出某些實際的指示來，是不可能的。我們本來是要規定出一般的原則，而指望各地有覺悟的同志們會誠意執行這種法令，並善於找到許多辦法，按照各地具體經濟條件來實施這個法令。但是對任何一個法令當然都有法迴避，甚至能夠在外表上假裝實行而來加以迴避。所以關於幫助農民的法令，如果不誠意實行的時候，它可能變成一種真正玩具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

公社所應當發展的方向，就是要使農民在與公社接觸時，能得到物質的幫助，而開始來改變自己的經營條件；要使每個公社，勞動組合或共耕社都善於奠定改良這些條件的基礎，並在實際上加以改良，這樣來實際證明給農民看，這種改變只會對他們有益處。

你們自然可以想到，人們會說，要改良經濟就要有比現在好一些的條件，而現在的條件，乃是由於四年帝國主義大戰以及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進行的兩年國內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在現時我國這樣的條件下，怎麼還可以想到廣泛推行改良農業的事情，要是能勉強強過下去不致於餓死，也就算是托天之福。

當然，這樣的懷疑是可以發生的。但如果我遇到了這種反駁意見，那我就要用以下的話來回答。就假令由於經濟解體，經濟破壞，貨物空虛，運輸力薄弱，工具和耕畜已被毀滅，以致真正無法廣泛進行改良農業經濟吧。可是，在許多個別情形下，相當改良農業經濟，還無疑義是可能實現的。就假令連這點也不能辦到，那末，這是否就可以說，公社無法使附近農民生活改變，無法向農民

證明出，集體農莊不是人工培植的暖室植物，而是工人政權對勞動農民的新幫助，是協助農民去反對富農的辦法呢？我相信，就假令這樣提出問題，就假令我們在現時經濟破壞條件下無法實行改良，但是如果在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有誠意工作的共產黨員，那還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績來的。

爲了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就來舉出我們在城市裏叫做義務星期六的事情來做例子。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時間之外再爲社會需要做幾點鐘的某種義務工作，這種辦法就叫做義務星期六。這種義務星期六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嘉桑鐵路員工倡首實行的。蘇維埃政權有次在號召中指出說，紅軍戰士在前線上忍受着空前的犧牲，他們雖然經受各種困苦，還能獲得對敵人的空前勝利；同時又說，我們要把這勝利貫徹到底，就必須使這種英勇氣概，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不只表現在前線上，而且也表現在後方。莫斯科工人就以實行義務星期六來回答了這一號召。毫無疑義，莫斯科工人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要比農民厲害得多，如果你們考查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並想一想他們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下竟能開始實行義務星期六，那末你們就會同意，決不能藉任何困難條件來拒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實現的事情，只要能運用莫斯科工人所運用過的這種辦法。當義務星期六已經不是單個的現象時，而非黨工人又在實際上看見執政的共產黨黨員擔負起這種義務，看見共產黨徵收新黨員並不是使他們利用政府黨地位來獲得利益，而是使他們做出真正共產主義勞動的模範，即做出無報酬工作的模範，——正是這樣的義務星期六最能幫助提高共產黨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幫助增強非黨工人對共產黨員的敬仰。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底高級階段，那時人們從事勞動，都是由於覺悟到必須爲共同利益而工作。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勞動制，——希望我們的兒輩，也許孫輩能夠把這種制度建成也就算好了。但是我們說，執政的共產黨黨員也

挺身擔負着在與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大多數困難，既動員優秀的共產黨員上前綫，而對於那些不能上前綫的黨員，就要求他們執行義務星期六的工作。

這種義務星期六現時已在每個大工業城市中推行起來，現在黨要求每個黨員都參加這種工作，對於不執行這種要求的黨員，甚至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如果你們把這種義務星期六的辦法也在公社中，勞動組合中和共耕社中實行起來，那就甚至在最壞的條件下，你們都能夠而且應當達到如下的成果，即使農民認識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每個共耕社的特點不在於它領得官家的補助金，而在於這些組織中都有工人階級的優秀份子參加，他們不僅向別人宣傳社會主義原則，而且善於親身實行這種原則，表明甚至在惡劣條件下，他們都能夠用共產主義方法來經營農業，並盡量幫助附近農民。對於這一點是不能用任何遁詞來推諉的，這裏決不能藉口說貨物空虛，種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這裏我們得以實際檢查，這種檢查至少使我們能於精確判斷，究竟我們把擺在自己面前的困難任務實際執行到了何種程度。

我相信，這次公社、共耕社和勞動組合全體代表會議上會把這個問題加以討論，並將懂得，採用這種辦法使會真正成為鞏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極好手段，而且能達到實際成果，使俄國每個地方都不會發生任何農民對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表示敵意的事情。但不僅如此，還要做到使農民對它們表示同感。我們，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自己要盡力來幫助這一點，使我們國家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或其他來源中撥出的補助金，僅僅在勞動公社和勞動組合能與附近農民生活實際接近起來的時候，才來動用。沒有這種條件，則對公社和共耕社的任何幫助，我們都認為不僅沒有益處，而且是絕對有害的。不能把公社對附近農民的幫助當作只是由於富裕有餘，而是要使這種幫助成為社會主義性的幫助，即是造成使農民能從單獨、個體經

濟過渡到共耕農莊的條件。而要做到這點，也就只有用我在這裏說過的義務星期六辦法才行。

如果你們估計到那些比農民生活壞得無可計量，而却首先開始了義務星期六運動的城市工人底經驗，那末我深信，在你們全體一致贊助之下，我們定會達到使現存的幾千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成爲在農民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和概念的真正苗圃，成爲實際上的先例來向農民表明出，雖然它們還是嫩弱的幼芽，但畢竟不是用人工造成，不是暖室中培植出來，而是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時，我們才能鞏固地戰勝舊的黑暗勢力，才能戰勝破產和貧困現象，只有那時，我們才不會害怕廣漠在我們前途上的任何困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刊載於
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和二百七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
第五七九至五八六頁。

關於戰勝鄧尼金事致烏克蘭 工人和農民的信

同志們！在四個月以前，一九一九年八月末的時候，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我曾寫過一封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現在爲了戰勝鄧尼金事，我就把這封信全部抄錄下來作爲致烏克蘭工農的信。

紅軍克復了基也輔，坡爾塔瓦，哈爾科夫並勝利地向羅斯托夫推進。在烏克蘭，反鄧尼金的起義正在沸騰中。必須彙聚一切力量以便把那企圖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的鄧尼金軍隊澈底粉碎。必須消滅鄧尼金，以保證再不遭受任何新進攻的危險。

對於俄國全體工農從高爾察克佔領西伯利亞以及人民受過地主資本家多月壓迫之後又經紅軍收復這一經驗中所得到的教訓，烏克蘭工農應當加以認識。

鄧尼金在烏克蘭的統治，正如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的統治一樣，是一個極痛苦的考驗。毫無疑義，這種痛苦考驗底教訓會使烏克蘭工農也如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農一樣，更加明白瞭解蘇維埃政權底任務，並更加堅定地來保衛蘇維埃政權。

在大俄羅斯，地主土地佔有制已全部消滅了。在烏克蘭也應當這樣做，烏克蘭工農蘇維埃政權應當把澈底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

的事業鞏固起來，使烏克蘭工農完全擺脫地主的任何壓迫，並根本消滅地主。

但是除了這個任務以及其他許多仍舊擺在大俄羅斯勞動羣衆和烏克蘭勞動羣衆面前的共同任務以外，還有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底特殊任務。這特殊任務中有一個在現時是值得格外注意的。這就是民族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烏克蘭成爲單獨的，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結成聯盟（聯邦），或者烏克蘭與俄羅斯組成爲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共和國。對這個問題，所有的布爾什維克，所有的覺悟工農，都應當仔細加以考慮。

烏克蘭的獨立已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所承認了。所以不言而喻，並爲衆所公認的就是，只有烏克蘭工農自己在他們的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才能解決並且定會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烏克蘭與俄羅斯溶合爲一個國家，還是烏克蘭仍爲獨立自主的共和國，而在後一種情形下，則烏克蘭共和國與俄羅斯間，究應建立何種聯邦關係。

從勞動羣衆利益的觀點看來，從勞動羣衆爲使勞動完全擺脫資本壓迫之鬥爭勝利的觀點看來，究應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勞動底利益要求在各國勞動者間，各民族勞動者間，有最完全的信任和最緊密的聯合。擁護地主資本家，擁護資產階級的人都力圖分裂工人，加強民族糾紛和民族仇視，這樣來削弱工人，鞏固資本政權。

資本是國際的勢力，要戰勝這種勢力，就需要有工人底國際聯合，工人的國際親密關係。

我們是反對民族仇視，反對民族糾紛，反對民族特殊化的。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力圖實現使全世界各國工農密切聯合，並完全溶合爲一個統一的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勞動者不應當忘記，資本主義把民族分成爲極少數壓迫的、雄強的（帝國主義的）、有全權的、有特權的民族和極大多數被壓迫的、依賴的、半依賴的、不平權的民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最萬惡最反動的戰爭更加強了這種區分，使在這種基地上發生的憤懣和仇恨更加尖銳化了。不平權的和依賴的民族對雄強的和壓迫的民族如像烏克蘭民族對大俄羅斯民族那樣，所懷抱的義憤和不信任心理，業已積累好幾百年了。

我們主張建立自願的民族聯盟，即不允許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施行任何強力的聯盟，即基於充分信任和明確悟解親密合作而完全自願同意的聯盟。這樣的聯盟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應當以最大的耐心和謹慎態度來逐漸實現這種聯盟，以免損害事業，以免引起不信任心理，好使那種由於歷來地主資本家底壓迫，由於私有財產以及因瓜分和重分這私有財產而引起的仇視等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得以泯滅下去。

所以，在力求實現各民族統一和無情打擊一切離間民族的行爲時，我們應當非常謹慎而有耐心，對民族不信任心理的殘餘採取讓步態度。但在爲擺脫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凡是有關勞動基本利益的一切事情，我們應當是毫不讓步，毫不調和的。至於現在暫時怎樣來決定國界（我們是主張完全消滅國界的），這乃是一個非基本的，不重要的，只有次等意義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可以而且應當從緩解決，因爲在廣大農民和小業主羣衆中，現有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常常是保持得很牢固，急躁辦法反而可以使這種心理加強起來，即是說，反而會危害完全澈底統一的事業。

俄國工農革命，即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底經驗，以及這個革命在兩年內勝利地進行反對國際資本家和俄國資本家侵犯的鬥爭底經驗，極顯然表明資本家得以暫時利用了波蘭，拉脫維亞，愛斯，特蘭，芬蘭農民和小業主對大俄羅斯人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得以暫時

煽起了他們和我們之間在這種不信任心理基礎上發生的糾紛。經驗表明，這種不信任心理是在逐漸消失着，不過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下去，而且曾在長期中充當壓迫民族的大俄羅斯人若表現得愈加謹慎，愈有耐性，則這種不信任心理底消除就會愈有保障。正是承認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斯特蘭，芬蘭的國家獨立，我們就可雖則緩慢但能一往直前地奪得這些隣近小國中最落後、最受資本家欺騙和壓榨的勞動羣衆底信任。正是採用這種方法，我們就能最有把握地把他們從「自家的」民族資本家影響下解脫出來，最有把握地使他們走向完全信任，走向將來統一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

當烏克蘭尚未完全從鄧尼金統治下解放出來時，它的政府，在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就是全烏克蘭革命委員會，其成份除了烏克蘭共產黨人布爾什維克之外，還有以政府委員資格參加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鬥爭派份子。鬥爭派與布爾什維克的區別，主要是在於前者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獨立。布爾什維克並不將這看作是足以引起分歧和分裂的緣由，並不認爲這可以妨碍協同一致的無產階級工作。只要有在反對資本壓迫，爭取無產階級專政鬥爭中的一致，共產黨人不應當因民族國界，因兩國聯繫的聯邦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問題而發生分歧。在布爾什維克中間有人主張烏克蘭完全獨立，有人主張建立比較密切的聯邦關係，有人則主張烏克蘭與俄羅斯完全溶合。

因這些問題而發生分歧是不可容許的。這些問題將由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解決。

如果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堅持要烏克蘭與俄羅斯溶合，那烏克蘭人便易於懷疑他們辯護這種政策的動機，不是想使無產者統一起來進行反資本的鬥爭，而是由於舊時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偏見。這種不信任心理是很自然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可免而且

合理的，因為大俄羅斯人歷來在地主資本家壓迫下，浸染了一種醜惡可恥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偏見。

如果烏克蘭共產黨人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的國家獨立，也可以使人懷疑他們辯護這種政策不是從烏克蘭工農在反資本壓迫鬥爭中暫時利益的觀點出發，而是由於具有一種小資產階級性，小業主性的民族偏見。因為過去經驗千百次地告訴了我們，各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如像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等等一切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假裝為無產階級擁護者，其惟一目的就是用欺騙手段來偷運與『自家』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妥協以反對革命工人的政策。這是我們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國克倫斯基時代的例子中看見了的，這是我們過去和現在在所有各國中都看見到的。

由此可見，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和烏克蘭共產黨人之互不信任心理是很容易發生的。怎樣來與這種互不信任心理作鬥爭呢？怎樣克服這種互不信任心理和怎樣造成互相信任的心理呢？

要達到這一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反對各國地主資本家，反對他們企圖恢復其專橫權力的鬥爭中，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而實行共同的工作。這種共同鬥爭會在實踐上顯然表明，不管如何解決國家獨立或國界問題，但大俄羅斯工人和烏克蘭工人必須有密切的軍事和經濟聯盟，因為不如此，則『協約國』，即英法美日意等最富強資本主義國家底聯盟就會把我們各個擊破，分別室死的。我們在反對那獲得有這些國家資本家底金錢和武器供給的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的鬥爭經驗，顯然表明了這種危險是存在的。

誰破壞大俄羅斯工農與烏克蘭工農的統一和最密切聯盟，誰就是幫助高爾察克輩，鄧尼金輩以及各國資本家強盜們。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應當極端嚴格地防止自己隊伍中有絲毫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因為這種表現，一般地本是叛變共

產主義，便會造成莫大的危害，而使我們和烏克蘭同志之間發生分裂，這樣就正便利於鄧尼金和鄧尼金匪黨。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當有關烏克蘭國家獨立問題，有關烏克蘭和俄羅斯聯合的形式問題以及一般民族問題而與烏克蘭共產黨人布爾什維克及鬥爭派發生爭執時，便應採取讓步態度。我們大家，無論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或烏克蘭共產黨人，或任何一個其他民族的共產黨人，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與資產階級妥協、不容許分散我們在抗拒鄧尼金中的力量等這些對一切民族都同樣是基本的和根本的問題上，應當是不讓步，應當是不調和的。

戰勝鄧尼金，消滅鄧尼金，使這種進犯行為決不能死灰復燃，這就是大俄羅斯工農和烏克蘭工農共同的根本利益。這個鬥爭將是長久而困難的，因為全世界資本家現時都在幫助鄧尼金，而且將來也還會幫助各種各樣的鄧尼金的。

在這個長久而困難的鬥爭中，我們大俄羅斯工人與烏克蘭工人，應當建成極密切的聯盟，攜手前進，因為我們若是各自奮鬥，便定會戰勝不了敵人。至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國界如何劃定，兩國相互關係的形式如何確立，這都是不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而且應當讓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反覆試驗這種那種或第三種辦法，而工農底事業，戰勝資本主義的事業，不會因此遭受覆滅。

但倘若我們不善於保持彼此間最密切的聯盟，來共同反對鄧尼金，共同反對我國和一切國家中的資本家和富農，那末勞動事業定會遭到覆敗，而在長久年代中無法再振，這意思就是說，那時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羅斯就可以被資本家壓倒和窒死的。

各國資產階級和各種小資產階級政黨，以及贊成與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來反對工人的『妥協』黨，它們所最努力的是要分裂各民族工人底團結，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壞工人們密切的國際聯合和

國際友愛關係。資產階級若辦到了這一點，工人事業就會一敗塗地。希望俄羅斯共產黨人和烏克蘭共產黨人能夠耐心地，堅持地，頑強地共同奮鬥，以便戰勝任何一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反動陰謀，戰勝各種各色的民族主義偏見，而向全世界勞動大眾作出各國工農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消滅地主資本家底壓迫，爭取建立全世界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中之真正鞏固聯盟的模範。

尼、列寧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
卷，第六五五至六六〇頁。

論勞動紀律

爲什麼我們竟戰勝了獲得有全世界資本家幫助的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呢？

爲什麼我們堅信我們現在定能戰勝經濟破壞，定能恢復工業和農業呢？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地主資本家，是因爲紅軍兵士和工農都知道，他們是爲自己的切身事業而奮鬥。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是因爲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在這次反剝削者的戰爭中表現了空前的英勇精神，建樹了神勇奇蹟，忍受了空前的困苦，甘願自我犧牲，無情地排除了一切自私自利和貪生怕死的份子。

現在我們之所以相信我們定能戰勝經濟破壞，是因爲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用同樣堅定的意志，同樣英勇的精神，並同樣自覺地起來奮鬥。

當千百萬勞動者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跟隨本階級的優秀人物前進，那時勝利也就會有了保證。

從軍隊中驅逐了自私自利之輩。我們大家現在都要高呼：

『打倒自私自利份子，打倒那些專圖私利和投機，專想逃避工作的份子，打倒那些害怕爲了勝利而忍受必要犧牲的份子！』

勞動紀律萬歲，熱心工作，矢忠於工農事業吧！

走在紅軍前列而犧牲的戰士永遠光榮！

現在引導千百萬勞動者以最大熱情在勞動軍前列中行進的人們永遠光榮！

一九二〇年初的演說詞。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
第四〇二頁。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 五日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 會上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三月二十九日)

同志們，我在沒有開始報告之前，要說一說，這個報告也像在前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樣分爲兩部分：政治部分和組織部分。這種劃分首先就令人想到中央工作從外表上，從組織上看來，其情形怎樣。我們黨自斯維爾德洛夫同志⁷¹逝世後，已經過去一年了；這個損失不能不影響到中央的整個組織。沒有人能像斯維爾德洛夫同志那樣，善於把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兼負於一身，因而我們就不得不試圖用集體工作來代替他一人的工作。

這一年來的中央工作，在執行日常工作上講來，是由中央全會所選舉的兩個集體機關，即由中央組織局和中央政治局來擔負的；同時爲了使兩局決議互相吻合，彼此一貫起見，就由中央書記兼任兩局委員。於是在工作中組織局底真正主要任務就是分配黨的幹部，而政治局底任務就是解決政治問題。自然這種劃分是相當勉強的，自然，任何政策若沒有人員底任命和調動，便無法執行。因此，任何一個組織問題都有政治意義，所以在我們的實踐中，照例只要有一個中央委員作出聲明，就可以根據某種理由而把任何一個問題都

看成政治問題。想用別種辦法來劃分中央工作未必適當，而在實踐中未必能達到目的。

上述工作方式達到了非常好的結果：在我們兩局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困難。這兩個機關底工作一般說來是很一致的，由於中央書記參加兩局而使實際運用方面便利得多了，並且中央書記是完全而惟一執行着黨中央底意志的。爲避免發生某種誤會起見，必須首先着重指出，只有中央已採取的集體決議，即由組織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會業已通過決議的那些問題，黨中央書記才加以執行。否則中央工作是不能正確進行的。

簡單說明中央工作內部分工後，我現在就來執行自己的任務，即作關於中央工作的報告。要作中央政治工作的報告，老實說，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年來政治局底工作，大部份都是隨時解決一切有關於政治，有關於統一各蘇維埃機關和黨底機關及一切工人階級組織底行動，有關於統一並力圖指導蘇維埃共和國全部工作等的問題。政治局曾解決了所有一切關係於國際和國內政策的問題。當然，要想把這些問題來大約列舉一下，都是不可能的。你們可以從中央對本屆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上看到必需的總結材料。要想在報告中來重複這一總結，這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事，而且我覺得也是代表們所不感興趣的。我們每個人在黨和蘇維埃底某個組織中工作時，每天都注視着國內外變化更迭日新月異的各種政治問題。在蘇維埃政權頒佈的法令中，在黨組織底工作中，在每一轉變中，關於這些問題的決定，也就可以用來估計黨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必須指出，問題既如此之多，往往只好在非常匆忙的條件下來解決，只是由於集體中的各成員有完全的相互瞭解，相互信任，知道各人意見上的出入，才得以完成這個工作。否則，甚至這集體底人數再增加兩倍也是無法辦到的。往往有許多複雜問題必須用電話商談來代替開會解決。祇有深信某些顯然複雜而帶有爭論性的問題不會疏忽過

去，才是這樣作法。現在當我要來作一總的報告時，我不來作按年月先後的總覽和按問題門類的敘述，而只說明那些主要的，最重要的問題，並且只是把昨天經驗，正確些說，即過去一年的經驗與目前任務聯繫起來的問題。

現在還沒有到寫作蘇維埃政權歷史的時候。即令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那我要代表我個人說，並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說，我們不預備做歷史家，而我們所關心的只是現在和將來的問題。過去的一年，我們把它當作材料，當作教訓，當作我們往前行進的踏板。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央工作可以分爲兩大部門：一部門是與軍事任務及與決定蘇維埃共和國國際地位的任務有關的工作；另一部門是國內和平經濟建設的工作，這個工作也許只是在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當已完全顯露出，我們在國內戰爭有決定意義各戰綫上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時，才提到第一位的。去年春季，我們的軍事情況是困難到了極點，大家記得，當時我們將要受到多次失利及以前料想不到的反革命勢力和協約國代表從新舉行的大進攻。所以很自然的，這一時期的工作，大半是解決軍事任務和國內戰爭任務，這個任務，在所有那些怯懦無能之輩，更不用說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以及中間階層大眾看來，都覺得是無法解決的，遂使他們完全坦白地說這個任務不能解決，說俄國落後，俄國疲憊不堪，既然西歐革命遲遲未發，那俄國是無法戰勝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所以那時我們必得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完全的堅定態度，保持絕對信心說，我們一定能勝利，必得發出並實行「一切爲了勝利！」「一切爲了戰爭」的口號。爲了實現這個口號，也就必得完全自覺地和公開地不去滿足許多最迫切的需要，往往使極多的人有求無助，而深信我們應當把全力集中於戰爭上，以便在協約國強迫我們進行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只是因爲黨曾時刻戒備，因爲黨有極嚴格的紀律，因爲黨底威信把一切機關及部門

都統一了起來，而數十，數百，數千以至千百萬人都一致遵循中央發出的口號行動，只是因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犧牲，——只是因為有這一切，才造成了現有的這種奇蹟。只是因為有這一切，才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舉行二次，三次以至於四次的進攻，而我們終能獲得了勝利。當然，我們不僅要着重指出這一方面，而且要注意到這一方面所構成的教訓：沒有紀律，沒有集中制，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實現這個任務。爲了剷除反革命而拯救祖國，爲使俄國革命戰勝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我們所忍受的空前犧牲就是全世界社會革命底保障。爲要實現這一點，會必須使黨有紀律，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絕對相信成千成萬人的犧牲定能有助於這一切任務之執行，絕對相信這是真正可能做到和有了保障的事業。爲了這一點也就必須使我們黨和實現專政的階級，即工人階級成爲團結俄國以至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因素。

如果想想，何以一個被削弱了的貧困落後國家竟能戰勝世界上各頭等強國，這種歷史奇蹟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深刻根源究竟何在，那末，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集中制，紀律和空前的自我犧牲精神。這是從什麼基地上發生出來的呢？在一個組織素養最少的國家中，千百萬勞動羣衆之所以能夠組織起來，這種紀律，這種集中制之所以能夠實現起來，也就是因為受過資本主義鍛鍊的工人，已由資本主義所團結起來，因爲在一切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業已團結，而且國家愈是先進，則這種團結底規模便愈加宏大；另一方面，是由於私有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商品生產中的小私有制却又使工人們分裂起來。私有制分裂勞動者，我們則團結勞動者，把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日益增多地團結起來。現在可以說，甚至盲人，至少是那些不願看見這件事情的人都已經看見到了這點。愈往前去，我們的敵人就愈加分裂。他們爲資本主義私有制，爲商品生產私有制所分裂了，不管這些人是投機出賣餘糧，利用工人飢餓來

發橫財的小業主也好，甚至是擁有軍事實力，創立了『國際聯盟』這全世界一切先進民族偉大『統一聯盟』的各國資本家也好。這樣的統一純係虛構，純係欺騙，純係偽造。我們在這方面看見過一個極好的例子，即這個臭名洋溢的『國際聯盟』，它企圖把管理某些國家的權利分授給人，企圖分割世界，可是這臭名洋溢的聯盟，原來是一場虛構，馬上就化爲烏有了，因爲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之上的。我們在莫大的歷史範圍中看見了這一點，而這也就證實着一個基本的真理，根據這個真理，我們證明了自己的正確立場，建立了自己的絕對信心，深信十月革命必然勝利，深信我們所負起的事業，雖然有很大的困難，雖然有無數的障礙，但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一定會奮起加入的。我們會知道，我們有同盟者，但必須在這一負有歷史上光榮艱鉅任務的國家中，善於表現自我犧牲精神，那時這些空前犧牲的代價便能得到千百倍的報酬，因爲我們在自己這國家中每多經歷一個月，我們便能在全世界上獲得千百萬新的同盟者。

如果想想，到底當時爲什麼我們能夠勝利，爲什麼我們必然勝利，這只是因爲所有我們的敵人，那些在形式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政府及資本代表有一切聯繫的敵人，不管他們在形式上是如何統一，實際上却是分裂的；他們之間的內部聯繫其實又分裂他們，使他們互相敵視，加之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瓦解他們，把他們從同盟者變成野獸，以致他們看不到同情蘇俄的人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的英國兵士中，在塞瓦斯托坡里登陸的法國水兵中，在世界各國工人中，——日益增多起來，而在所有一切先進國家裏，社會妥協派都公開站到資本方面去了。歸根到底，就是這個基本原因，這個最深刻的原因，使我們獲得了最可靠的勝利；這個原因便是我們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主要泉源；我們有了這個泉源，就可以大胆地說，當我們在本國實現了完滿的無產階級專政，並經過無產階級先

鋒隊，經過它的先進黨而把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那時我們便可以期待世界革命的到來。這在實際上也就是表現無產階級底意志，表現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決心，表現無產階級與全世界千百萬工人聯合的決心。那些資產者老爺們和第二國際中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却把這稱為鼓吹的辭句。不對，這是歷史的真情，這是俄國國內戰爭中流血困苦經驗所證實了的真情，因為這次國內戰爭是反對全世界資本的戰爭；這個資本在戰鬥中自行崩潰下來了，它自己把自己吞食下去了，而我們在一個飢餓殆斃，傷寒症盛行的無產階級國家中，却由於這次戰爭結果，成為更有鍛鍊，更加強堅的了。我們在這個國家裏有日益增多的勞動羣衆歸附於我們。以前妥協派覺得是鼓吹辭句而為資產階級所慣於拿來嘲笑的东西，在我國革命這一年中，尤其是在報告所包括的這一年中，最終變成了無可爭論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使我們可以極肯定地說，既然我們作到了這一點，就證實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基礎，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廣泛得多的基礎。我們有國際聯合，這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記載出來，沒有正式固定起來，從「國家法權」觀點來看是一無所有，而實際上，在腐朽着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却是無所不有的。我們曾與空前強大敵人對抗的每一個月，不管我們是奪得了新的陣地或者只是保持了原有陣地，都向全世界證明我們是正確的，並使我們獲得千百萬新的同盟者。

這個過程看來是很艱難的，並且遇到了幾次莫大的失敗。在芬蘭開始了空前白色恐怖之後，接着正在過去這年內又有了匈牙利革命的失敗，協約國代表們欺騙本國國會，與羅馬尼亞訂立秘密條約，而把這個革命撲滅了。

這是最卑鄙的叛賣行為，這是協約國底反動陰謀，目的是要用白色恐怖來撲滅匈牙利的革命；更無須說它們怎樣對德國妥協派實行各種妥協，以便撲滅德國革命；更無須說這班揚言李卜克內西是正

直德國人的人怎樣像瘋狗一樣與德國帝國主義者携手，來猛攻這個正直德國人的事情了。他們之如此窮兇極惡，肆意採用高壓手段，只使我們更加鞏固和加強起來，同時却毀壞它們自己的基地。

我覺得，我們已有的這個基本經驗，是我們應當特別估計到的。在這方面最要緊的是要在我們的鼓動和宣傳工作中，極力分析和解釋我們何以獲得勝利的原因，說明為什麼國內戰爭中那些犧牲的代價能得到千百倍的報酬，並且根據這個經驗，應當怎樣作法才能在另一個戰爭中，在不流血的戰爭中獲得勝利，這一戰爭只是改變了形式，而進行這種戰爭來反對我們的，却仍然是舊資本主義世界底舊代表，舊奴僕和舊領袖，不過是進行得更加熱心，更加瘋狂，更加奮熾罷了。在我國革命中，比在任何其他革命中都更加顯著地證明了下述這個原理：革命底力量，革命進攻底力量，革命底毅力，堅決性和勝利愈大，則資產階級方面的抵抗力也就愈益加強。我們的勝利愈多，則資本主義剝削者也就愈益學習怎樣聯合起來，轉而採取更堅決的進攻。因為你們大家都記得很清楚，——從時間上說，這是不久以前的事，可是從事變過程說，却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在十月革命開始時，人們把布爾什維主義當作一種笑柄；在俄國，這種觀點很快就不得不被拋棄了，而在歐洲，這個曾表明無產階級革命尚不發展，尚很薄弱的觀點，結果也被拋棄了。布爾什維主義成了全世界範圍的現象，工人革命抬起頭來了。蘇維埃制度，即我們在十月革命時所建立起來並在其中一面繼承了一九〇五年底遺訓，一面又創作出了自己經驗的這個蘇維埃制度，成了全世界規模的和有歷史意義的現象。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現時在全世界範圍內有兩個營壘完全自覺地互相敵對着。但是應當指出，只是從過去這一年來，它們彼此間的敵對才進到最後決戰的形勢。現在，恰當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我們也許正經歷着最巨大，最急劇而尚未完結的轉變關頭之一，即

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關頭之一。你們都知道，協約國各帝國主義列強底領袖們以前向全世界高喊着：什麼「我們永遠也不停止反對那些篡竊政權，行同匪盜，敵視民主的布爾什維克的戰爭」；你們知道，他們後來却不得不始而撤消封鎖，接着連他們想統一各小國的企圖也破產了，因為當時我們不僅善於把各國工人吸引到了自己方面，而且也得以把各小國底資產階級吸引過來，因為帝國主義者不祇壓迫本國工人，並且也壓迫各小國底資產階級。你們知道，我們怎樣把各先進國家內的動搖資產階級也吸收到了自己方面；結果，現在協約國只好違犯自己的預約、誓言，並違反自己與俄國各種白黨所訂立的幾十次條約，而且也只好望着這些廢紙蹙眉興嘆，因為它們爲了這些條約，曾耗費億萬金錢，却落得一無所成。現在它們撤消了封鎖之後，實際開始與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和平談判，而它們現在又不把這種談判進行到底，所以各小國喪失了對它們的信心，喪失了對它們力量的信心。我們看見，協約國本身狀況，它們外部的情勢，從法理學的通常觀點看來，簡直無法判定。各協約國對布爾什維克的關係，處在不和不戰的狀態中，又承認我們，又不承認我們。我們的敵人原來深信自己是一種力量，現在它們完全崩潰的情形，表明它們絲毫也沒有力量，而不過是一小羣互相嘶吵，完全無法傷害我們的資本主義的野獸。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拉脫維亞正式向我們作了和平提議；芬蘭打來了一個電報，正式提議劃定界綫，其實這也就是過渡到和平政策。最後還有波蘭，波蘭的統治派曾特別耀武揚威以戰爭來威脅，而且現在還繼續這樣威脅我們，它從協約國方面已領到的和仍在領着的大砲最多，並且協約國答應，只要它繼續和俄國鬥爭，便幫助它所需要的一切，加之它的政府地位不穩而不得不去作任何冒險戰爭，甚至處在這樣狀況中的波蘭也送來了請開和議的照會。必須極端謹慎。我們的政策要求非常小心。在這裏極難找到正確的路綫，

因為誰也不知道，此刻火車所停存的軌道是通往何處，連敵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它今後要怎樣辦才好。挑唆波蘭最厲害的法國政策代表者老爺們，以及波蘭地主資產階級領袖都不知道以後的情形將會怎樣，都不知道究竟自己想做什麼。他們今天說：「老爺們，給我們幾列車大砲，幾萬萬款子，我們就決意和布爾什維克作戰」。他們隱瞞了罷工浪潮在波蘭日益高漲的消息，他們嚴令檢查機關，不許洩露真情。而那裏的革命運動却愈益增長起來。德國革命底高漲已進到了新的階段，工人在經過了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政變之後，現時正成立紅軍，最近從那裏發來的電訊直截指明工人愈益熾烈起來的事實。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腦子裏不由地開始瞭解：「不嫌遲麼？不會在國家尚未作出或和或戰的正式舉動以前就已在波蘭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麼？」。他們不知怎樣辦才好。他們不知道明天的吉凶如何。我們却知道，每一個月都會大大增強我們的力量，而且會愈增愈大的。所以現在我們所處的國際地位要比任何時候都鞏固些。但我們對待國際危機應當非常小心，並準備應付任何不測的事變。我們已得到了波蘭正式的媾和提議。這些波蘭統治者現正處在如此絕望的狀況中，弄得他們的朋友，即德國帝制派這些更有鍛鍊的，更有政治經驗和知識的人們都徬徨失措，挺而走險，舉行科爾尼洛夫式的政變。波蘭資產階級急於發出媾和提議，因為它知道，冒險就會是波蘭的科爾尼洛夫式的政變。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敵人處在絕頂困難狀態中，——這些敵人不知自己想做什麼，不知明天要做什麼，——所以我們要十分肯定地自認說，雖然有了和平提議，但戰爭還是可能的。他們往後的舉動如何，是無法預見到。這種人，我們都是看見過的，這些克倫斯基輩，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流，我們都是知道的。在這兩年過程中，我們看見，他們今天怎樣跑到高爾察克方面，明天又幾乎跑到了布爾什維克方面，然後又跑到鄧尼金方面，而這一切都是用自由和民主的辭句作為藉口

哩。我們既知道這批老爺們，所以我們要用雙手抓緊媾和提議，而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我們相信，與各小國締結和約，對於推進事業來說，要比戰爭好到無數倍，因為帝國主義者用戰爭欺騙勞動羣衆，在戰爭掩蓋下，隱瞞着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真象，所以，任何一種和平都會使我們的影響百倍增加和擴展起來。在過去這幾年中，我們的影響本來已經是很巨大的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已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我們同樣也知道，隨時都有迫使我們作戰的可能。我們的敵人自己還不知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本事究竟怎樣。他們正在進行各種的戰爭準備，這是無可懷疑的。現在有很多與俄國毗鄰的國家，也許還有很多非毗鄰的國家，都在進行這種全國的武裝準備。所以在我們的國際政策中要最能隨機應變，最堅決地抓住我們已定的方針，並隨時準備應付一切事變。爲和平而戰，我們是用了極大毅力來進行的。這戰爭正給予我們以最好的果實。在這種戰場上，我們表現得很有本事，至少也不比紅軍在流血戰場上的活動壞些。但是，即令這些小國真正希冀和平，然而與我們締結和約的事情，還不是依它們的意志爲轉移。它們完全依賴於協約國，而在協約國那裏則正在進行拚命的互鬥和競賽。所以我們應當記着，從國內戰爭和反協約國戰爭所開闢的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和平當然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一面作各種促進和平的步驟，同時應當極力備戰，絕對不解除我們軍隊底武裝。我們軍隊是使帝國主義列強不敢作絲毫侵犯我國企圖的真實保障，因爲它們縱然可以指望起初獲得某些僥倖一時的勝利，但結果任何一國都不免要爲蘇俄所粉碎。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這應當成爲我們鼓動和宣傳底基礎，我們要善於準備這一着，要善於在疲憊日增的情形下，解決那迫使把和與戰兩者結合起來的任務。

現在我要說到使我們要用極大的決心引導勞動羣衆利用軍隊來解決當前基本任務的最重要的原則理由。舊的紀律泉源，即資本，

現在已經減弱了；舊的團結泉源已經消失了。我們應當造成另一種紀律，另一種紀律和團結底泉源。強迫手段引起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憤懣，叫囂，喧嚷和號泣；這班人空喊「自由」與「平等」，却不懂得使資本享受的自由便是反勞動羣衆的犯罪行爲。我們爲了反對虛言假語，就決定在實行勞動義務制和團結勞動者的事業中，絲毫不害怕採用強迫手段；因爲從來沒有過進行革命而不採用強迫手段的，無產階級也有權採用強迫手段，以便無論如何都要保持住自己的勝利品。當資產者老爺們，妥協派老爺們，德國獨立黨老爺們，奧國獨立黨老爺們和法國龍格派老爺們爭論歷史因素問題時，他們總是把無產階級底革命決心，堅定性，不屈不撓精神這樣的因素忘記了。當各資本主義國家崩壞，資產階級崩壞的關頭，當資產階級處在絕望和危機的關頭，決定一切的，也只有這個政治因素。至於什麼少數和多數，民主和自由的詞句，不管已往時代的英雄們怎樣陳述過這些東西，都是不能絲毫解決問題的。這裏要由工人階級底覺悟性和堅定性來解決。如果工人階級決心作自我犧牲，如果工人階級表明善於緊張自己的全部力量，那末這就可以解決任務。要把一切都用來解決這個任務。工人階級底果斷精神，它那實現自己「寧死不屈」口號的堅決意志，這不但是歷史的因素，而且是決定一切，戰勝一切的因素。我們有了這個勝利，有了這種信心，才過渡到，並且已經走到實行和平經濟建設的任務，解決這些任務，就是我們本屆代表大會底主要職責。在這一方面，我以爲不能說是中央政治局底報告，或更正確些說，不能說是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而應當直截了當地說：同志們，是的，這便是應當由你們來解決的問題；這便是你們應當用黨底最高機關底權威來作一估量的問題。我們把這個問題清清楚楚地提到了你們面前。我們已採取了固定的立場。你們的責任就在於最終批准，更正或改變我們的決定。但是中央在自己的報告中應當說，它對於這個基本的迫切問題是採

取了完全固定的立場。對的，現在的任務是要把無產階級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無產階級底絕對統一都用在經濟建設的和平任務及恢復被破壞了的生產任務上去。這裏需要有鐵一般的紀律，鐵一般地整齊行列，若是沒有這種紀律和行列，那我們不僅不能支持兩年有餘，甚至兩個月都是不能支持的。要善於運用我們的勝利。另一方面應當懂得，這個過渡是需要大量犧牲的，這種犧牲，我國本來也就已經忍受的夠多了。

原則方面的問題，對於中央是很明顯的。中央全部工作都是服從於這個政策，根據於這種精神。例如你們將要解決的關於集體制與一長制的問題，看來似乎是局部的問題，若是割斷其與各方的聯繫而單獨提出，當然不能說是有根本原則意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都要根據我們在知識，經驗，革命實踐方面之基本收穫的觀點出發。例如有人對我們說，「集體制是廣大羣衆參加管理的形式之一」。可是我們曾在中央討論過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有過決定，而且我們應當向你們報告說：同志們，這種理論上的錯亂是決不能容忍的。假如我們在軍事工作和國內戰爭的基本問題上犯有十分之一的這種理論上的錯亂，那我們就早已被人打敗，而且是理應被打敗的。同志們，請讓我在報告中央工作中，在關於新階級是根據集體制還是根據一長制參加管理的問題上，稍微作點理論上的說明，指出一個階級怎樣實行管理，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這點對我們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而我國革命與已往一切革命的區別，也就在於我國革命中沒有空想成份。新階級之所以能取舊階級而代之，只是由於在與其他諸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它才能保持住自己，而且只有當它能實行根本消滅階級時，才能獲得最終勝利。階級鬥爭底巨大複雜過程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不這樣，你們就會陷於糊塗觀念的泥坑中。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資產階級對封建主實行的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憲法上明文規定了自由

平等。這些都是騙人的話。當有勞動者存在時，私有者是善於幹投機勾當的，而且正由於他是私有者，也就不不得不幹這種投機勾當。我們却說，平等是沒有的，在飽食者與飢餓者之間無所謂平等，在投機者與勞動者之間也無所謂平等。

現時，階級統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無產階級底統治就表現在剝奪了地主的私有權和資本家的私有權。以前所有一切憲法，以至最共和、最民主憲法底精神和基本內容唯一是歸結於私有制。我們憲法之所以奪得了在歷史上的存在權利，是因為不僅在紙上寫着廢除私有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了私有制，並徹底破壞了私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裏。首先就表現在私有制問題上。當在實踐上解決了私有制問題的時候，階級統治也就以此得到了保證。然後，又有憲法在紙上記載那在實際生活中解決了的問題：廢除資本家和地主的私有制，並補充說：據憲法規定，工人階級比農民享受更多的權利，而剝削者則沒有絲毫的權利——這就是在憲法上記載着我們業已實行的本階級底統治，藉此我們也就把勞動者底一切階層和小集團與本階級聯繫起來了。小資產階級私有者是分散的；其中私有財產較多者便是私有財產較少者底敵人，無產者廢除私有制，便是向他們公開宣戰。還有許多不覺悟不開通的人，他們完全擁護任何一種自由貿易，可是當看到在戰勝剝削者事業中的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時，他們便不能參加作戰，他們既不擁護我們，但也無力來反對我們。關於私有制以及某個階級居上的問題，只有由階級統治來決定。誰把階級統治表現所在的問題與『民主集中制』問題混為一談，——這是我們所常看見的，——那他就造成莫大的錯亂，以致在這個基礎上任何有成效的工作也無法進行。明顯性是宣傳鼓動工作底基本條件。如果我們的敵人承認說，我們在開展鼓動和宣傳方面作出了奇蹟，那末這就不應當從外表上來瞭解，以為我們有許多鼓動員，我們耗費了無數紙張等，而

應當按內部實質來瞭解，就是說，我們鼓動中所含有的真理鑽進到了所有一切人的頭腦中。而這個真理是不能拒絕的。

當一個階級代替了另一個階級時，那它就改變了私有制的關係。資產階級代替了封建階級之後，也就改變了私有制的關係，資產階級底憲法上說：『擁有私有財產的人是不與乞丐平等的』。這就是資產階級底自由。這種平等，把國家統治權賦予了資產階級。你以為資產階級代替了封建階級之後，它就把統治和管理混為一談了麼？沒有的事，他們不是這樣的傻瓜，他們說：要管理就要有善於管理的人材，爲了這點，那就要把封建階級的人拿來改造改造。他們果然也就這樣作了。這是他們作了錯誤麼？同志們，不是的；管理的本領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並非自然產生的，不會因這個階級是先進階級，它一下子就有了善於管理的本領。我們從歷史例證中看見，當資產階級初獲得勝利時，它就從另一階級，即封建階級出身的人們中找到實行管理的人，否則，它便無從找到這種人。要清醒地觀察事實：資產階級從以前階級中找到人材，而我們現在也就有同樣的任務，要善於採取以前階級底知識和素養，善於利用它，馴服它，爲本階級底勝利而運用這一切。所以我們說，獲得勝利的階級，應當是成熟了的階級，而成熟性不是由什麼文件證書所能證明，而是要由經驗和實踐來證明的。當資產者獲得了勝利但尙不善於管理時，他們爲了保障自己的勝利，就宣佈了新的憲法，並從自己階級中徵選出行政人員，利用以前統治階級底行政人員而開始向後者學習，並教育本階級中的新人員，訓練他們的行政能力，爲了這件事，運用了全部國家機關，取締舊的封建機關，只讓富家子弟進學校裏學習，於是經過許多年份，經過幾十年後，他們便從自己階級中培養出了行政人員。現時在按統治階級模樣組成的國家中，也應照以前所有一切國家中的辦法來作。我們若不願站到純粹空想和徒託空言的立場上，那我們就要說，我們應當估計

已往年代的經驗，我們應當保障革命所奪得的憲法，但是我們爲了管理，爲了國家建設，就應當擁有具備管理技術，具備治國經驗和經濟經驗的人材，而這樣的人材也只有從以前統治階級中才能找到。

主張集體制的議論中，往往浸潤了一種誣愚昧的精神，即反專門家的精神。具有這種精神是不能達到勝利的。爲要獲得勝利，就必須懂得舊資產階級世界底全部深刻歷史，爲要建設共產主義，就必須獲得技術，獲得科學，並把它們運用到更廣大的羣衆中去，但這種技術和科學也只有從資產階級方面才能獲得。這個基本問題應當提得十分明顯，應當提作經濟建設底基本任務。我們應當藉助於被我們推翻了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來從事管理，這些人浸潤了本階級底偏見，我們應當重新教育他們。同時，我們應當從自己階級隊伍中選拔自己的管理人員。我們要運用全部國家機關，做到使校內教育，校外教育，實際訓練等等這一切，都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從事培養無產者，培養工人，培養勞動農民。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事情佈置妥當。我們既有了兩年來的經驗之後，我們決不能這樣議論，好像我們是第一次才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在斯莫爾雷時期⁷²及斯莫爾雷以後不久的時期中，我們作了夠多的蠢事。這是沒有什麼可恥的。當我們第一次來幹新事業時，是無從找到天才的！我們這樣試作過，那樣試作過。我們曾隨波逐流，因爲那時不能把正確成份與不正確成份區別開來，要辦到這點是需要時間的。現在這已經是過去不久的事了，我們已經離開了這過去時期。這一充滿混亂和熱情的過去時期已經過去了。證明這個過去時期的文件，便是布列斯特和約。這是歷史的證據；不僅如此，這是一個歷史時期。我們之所以被迫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約，是因爲當時我們在各方面都是孱弱無力。這個歷史時期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孱弱無力的時期，我們現在已經克服了這種孱弱無力狀態。這又是通盤集體領導制的時期。如果有人說，集體制是

培養管理人才的學校，要知道這都是無法避過的歷史事實……但決不能永遠停留在學校預備班裏！這樣是行不通的。我們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如果我們的舉動仍舊像小學生一樣，那我們在各方面都會要挨打的。應當前進。應常用毅力，用統一的意志猛求上進。職工會面前有着極大的困難。要極力使職工會理解，真正擔負起這個任務就要與標榜一時的民主制殘餘作鬥爭。所有這種關於指定委派的叫喊，那在各個決議案中，在各種談話中常常說到的全部有害的老廢物，應當一概掃除乾淨。否則，我們是不能獲得勝利的。如果我們在兩年長的期間內竟不能領會這種教訓，那我們就是落後，而落後的人是會挨打的。

任務非常困難。我們的職工會在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方面有過莫大的幫助。職工會是黨與千百萬愚昧羣衆發生聯繫的環節。我們不要蒙住眼睛：當職工會幫助國家辦理糧務工作時，它曾完全負責來與各種患難作鬥爭。難道這不是極大的任務麼？不久前出版了中央統計局要覽。在那裏，統計學家們作出了總結，而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這些人是有信仰布爾什維主義嫌疑的。在那裏有兩個極有趣的數目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消費省區中每個工人每年領得了七普特糧食，而產糧省區中每個農民每年却消費了十七普特糧食。在戰前，這些農民是每年只消費十六普特糧食的。這就是兩個表明糧食鬥爭中階級對比關係的數目字。無產階級繼續忍受犧牲。人們却還高喊什麼強力手段呢！但是無產階級證明了採用強力手段是必要的，並法定了這種手段，而以擔負最大的犧牲來證明了採用這種強力手段是正確的。在我們飢餓破產的俄國，產糧省區中的大多數居民，即農民，第一次比幾百年內在沙皇資本主義俄國時代吃得好些。但我們要說，當紅軍還沒有獲得勝利時，羣衆是會要忍飢受餓的。那時必須使工人階級先鋒隊承擔這種犧牲。它在這個鬥爭中已經有了經驗，但獲得這種經驗之後，我們應當繼續前

進。現在無論如何都要作到這一步。如同任何一種職工會一樣，老職工會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和過去。在這個過去時期中，職工會是反對壓迫勞動制度，即反對資本主義的機關。而當工人階級成了統治階級時，當工人階級現時要擔負極大犧牲，要忍受死亡飢餓時，情形就完全改變了。

這種改變，不是一切人都瞭解到，不是一切人都深刻注意到的。在這裏，有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了我們，他們要求用集體制來代替一長制。同志們，對不起，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我們已經摒除了這一套。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極複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綫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綫上獲得勝利。這一戰爭更加困難。這個戰綫是最艱鉅的戰綫。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到這點。經過了那次我們已在前綫上經住了的戰爭之後，應當還有不流血的戰爭。結果便是我們的勝利愈多，那末像西伯利亞，烏克蘭和庫班這樣的省區也就會愈益頻繁。那裏富裕的農民多，那裏沒有無產者，縱令有無產階級，它也是已經被小資產階級習慣所腐化；並且我們知道，凡是有塊小土地的人都說：『我管政府幹嗎。我要乘別人飢餓發財，想怎樣便怎樣，政府不值得我一睡！』。現在協約國將會幫助那些原來陷在鄧尼金統治下，以後又動搖到了我們方面來的農民投機者。戰爭改變了戰綫和形式。現在的戰爭是商業戰，是小販戰，這種戰爭使小販業成爲國際性的。在中央新聞報上登載過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提綱內，把這點的原則基礎完全表明出來了。他們想使小販業成爲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爲和平地來瓦解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正在嚴加戒備。我們說：我們作過戰，所以我們繼續要把曾經幫助我們致勝的口號，作爲基本口號；我們將這個口號完全保留起來，並把它用到勞動方面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底堅決性與統一的意志。原來留下的那些舊偏見，舊習慣，應當一概掃除…

我在結語時，還要講講古塞夫同志寫的一本小冊子，據我看來，這本小冊子有兩方面都值得注意：它的優越處，不僅是在形式上，也不僅因為是在我們這代表大會開幕前寫成的。不知怎的我們至今都慣於寫決議案。據說，除了枯燥無味的文藝作品外，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都是好的。我以為，凡是決議案都應當歸於枯燥作品之列。如果我們都能做法古塞夫同志的先例，儘量少寫決議案，多寫出些小冊子來，倒是要好些，雖然那裏也有像他這小冊子內所充滿的大批錯誤。但是即令有這些錯誤，而這還是一本很好的小冊子，因為其中所注意的是復興全國工業與生產底基本經濟計劃，因為其中一切都服從於基本經濟計劃。中央委員會今天業已發給大家的大綱中，有整整一節完完全是從古塞夫同志底提綱內摘引來的。我們可以藉專門家們的幫助，更詳盡具體地擬定這一基本經濟計劃。我們應當記住，這個計劃是打算在很多年內實行的。我們並不諳許一下子就使我國免於飢荒。我們說，鬥爭將比在軍事戰綫上更加困難，但這個鬥爭會引起我們更大的趣旨，它是更接近我們那真正基本任務的門徑。這個鬥爭要求極度緊張一切力量，要求意志統一，這種緊張與統一，我們以前曾表現過，現在我們也應當表現出來。如果我們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時我們在不流血戰綫上獲得的勝利，決不會少於在國內戰爭戰綫上所獲得的勝利。

一九二〇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九四至一〇八頁。

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 到創造新制度

我們這個報紙是專論共產主義勞動問題的報紙。

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首先就要好好搞清楚，祇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祇有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之後，祇有在爭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那些組織拚命反抗、組織反革命暴動和國內戰爭的剝削者獲得了決定勝利之後，才能實際上提出這個問題來。

這個時光在一九一八年初，好像業已來到，——而在德帝國主義二月（一九一八年）向俄國舉行武裝進攻之後，果然來到了。但當時，這一時光竟出現得這麼短促，新的、更強有力的反革命暴動與侵略的浪潮竟襲來得這麼急速，使我們蘇維埃政權方面簡直沒有可能來多少聚神地、頑強地從事從事和平建設。

現在我們業已經歷過兩年飢餓、窮困、貧乏這空前未聞與不可思議的困難，同時這兩年又是紅軍對國際資本主義反動寇群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勝利。

現在已經有了真正的機會來指望到（如果法國資本家不把波蘭誘入戰爭），我們將取得比較穩固，比較長期的和平。

兩年來我們已經有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行建設的某些經驗。所以關於共產主義勞動問題，可以而且應當直接提出，——更正確

些，就得這樣說：不是共產主義勞動，而是社會主義勞動，因為這裏不是指從資本主義中成長出來的新社會制度發展底高級階段而言，而是指它的低級階段，即初級階段而言。

共產主義勞動一語，若是比較狹義地，嚴格地說來，乃是有利於社會的無償勞動，這種勞動，不是爲了履行一定的義務，不是爲了獲得領取某種物品的權利，不是按照事先規定的法定標準額，而是自願的勞動，超過定額的勞動，不打算領到報償的勞動，沒有報償條件的勞動，而是爲了公共利益按習慣來操作的勞動，而是按必須爲公共利益操作的這種自覺態度（已成爲習慣）來勞動的勞動，——是健壯身體所自然需要的勞動。

大家都明白，我們，即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結構隔那廣泛地、真正普遍地運用這種勞動的距離，還非常遙遠。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已由全體先進無產階級（共產黨和職工會）及國家政權提起出來，這已經是按這條道路走去的一個前進步驟。

要向大的目標走去，就得從小的目標開始。

然而另一方面，既有了「大的」變革，有了這會推翻資本家私有制而將政權轉交到無產階級的國家變革之後，而在新基礎上來建設經濟生活，就祇能從小的開始。

義務星期六，勞動軍，勞動義務制——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動與共產主義勞動在不同形式上的具體實現。

在實現這種勞動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缺點。用譏笑（或忿怒）態度來對待這些缺點，祇有完全不善於思索的人才做得出來，更不待說那些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了。

在這樣嶄新、這樣困難、這樣偉大的事業中，缺點，謬誤和失錯的地方是決不可免的。誰若是害怕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誰若是對這些困難表示畏縮，灰心絕望或倉皇失措，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創立新的勞動紀律，創立人與人之間新的社會聯繫形式，創立吸引人們從事勞動的新形式和新方法，——這是需要有多年的，幾十年的工作。

這是最能收效和最高尚不過的工作。

幸而，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壓倒了資產階級底反抗之後，我們已能爭得了使這種工作成爲可能的這一基地。

所以我們也就用全副精力來擔負起這一工作。堅韌，堅定，決心，果斷，善於千百次來嘗試和千百次來加以改正，無論如何非達到目的不可，——這種品質，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之前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內就鍛鍊起來的，而它在十月革命之後這兩年期間，雖忍受空前未有的窮困、飢餓、破產、貧乏的苦痛，又繼續鍛鍊過了。無產階級底這些品質也就是無產階級一定勝利的保證。

尼、列寧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刊載於共產主義
義務星期六報。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
第一四八至一五二頁。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 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一九一七年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指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這話的廣義而言：若就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話底最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了。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想必會發生一種劇變：那

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為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歷史階段的客觀情形下，所有一切國家正是從俄國的榜樣中就能看見它們在不遠將來所必然會遇到的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甚至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得列爾等，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派，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為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為全世界革命 „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ücherei, Heft II;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⁷³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明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為，真是登峯造極，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還要提到的只是一點：在老早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為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做了一篇標題為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為，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益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裏去。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

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 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 以前俄國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為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為最強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忠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熱忱，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為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 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還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鬥爭，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夠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們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為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該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

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有堅定性，需要有紀律，需要有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詞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極認真地去分析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夠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

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的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並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沙皇專制壓迫之下，貪饑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極奮勉極仔細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是用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爲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

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為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那怕是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積聚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貪饑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派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派與『社會革命』派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最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在當時刊物上，可以（而且應當）考察到凡是引起後來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間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羣衆武裝鬥爭的一切問題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政派之間，自然還有無數中間的、過渡的、立場模糊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

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己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在羣衆運動中受到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進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內鬥爭形式與國會外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策略與參加國會策略，合法鬥爭形式與不合法鬥爭形式等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中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底整整一年。若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沈、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祕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下去。階級鬥爭完全按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得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多，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他們最具有用最廣大規模、最正確辦法和最強大毅力去恢復工作的本領。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到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必須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合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合法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運拿慘案⁷⁴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布爾什維克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這班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祕密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法機會』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布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⁷⁵。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一切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國外僑民的刊物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

高傲態度，聳起鼻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合法』機會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祕密）交換意見，自由（祕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惡劣的叛徒。而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意大利的屠拉梯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鄙陋下賤、卑污齷齪行爲，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布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成性（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沙皇制度的莫大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更自由一些的共和國。各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原來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關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和諾斯克，考茨基和希法亭，倫勒爾和阿烏斯鈇爾里茨，鮑威爾和阿得列爾，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都是空枯燥無味地重彈陳腔舊調而已（事實上也是如此）。所有這套舊調，我們都從孟什維克那裏聽見過了。

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竟在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之先，就把這表演出來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如果說，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即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問題上的丟臉行為與糊塗觀念特別「燦爛地」表明出來，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那末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偽造了蘇維埃，並因其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以致於破了產；以及現時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但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實際經驗已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極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會制（事實上是國會制）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原來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好些，但「工農」的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原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還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相當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完全認定，而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亦已充分證實：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都是極廣泛的社會階層），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至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此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以及迅速轉為馴服、消沈和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此種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自己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

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即前此所未見過的外形，重新發作起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的一種處罰。這兩種畸形會互相補充。俄國居民內小資產階級成份雖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我國兩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所起的影響却比較微末，其原因，一部分毫無疑義是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之所以說「一部分」，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發展得異常繁盛，因而澈底暴露了它的不正確性，暴露了它不能成為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產生時，便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來是革命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而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基礎的時候，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曾在三個主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厲害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是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須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把個人恐怖和暗殺手段，看作是自己的極端「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表現，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至於有些人竟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行為，或一般斥責那已經獲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採取的恐怖手段，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被普列漢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過和唾棄過。

第三個主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爲自己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惡意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同時他們自己却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模倣該黨內極端的机会主義者。

這裏要附帶說說，歷史事實現時已在全世界巨大範圍內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意見，就是說，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普列漢諾夫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要求開除伯恩施坦底黨籍，而在爾什維克始終繼承着這種傳統，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列金底全部卑鄙、下賤和叛變行爲）原是最最近似於革命無產階級爲取得勝利所必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社會民主黨才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它恢復元氣和重返健康比其他各國黨也要早些。無論在斯巴達克黨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考茨基輩、希法亭輩、萊得布爾輩、克里斯平輩底機會主義和毫無氣節性。如果我們現在把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止這時期作一總的考察，便可十分明確和不庸爭辯地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所採取的一般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寫過一封信給伯伯爾，其中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了當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機會主義國家觀，可是這封信被伯伯爾由一八七五到一九一一隱藏了達三十六年之久）；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才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

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它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什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其範圍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組織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時）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於頑強地不願瞭解必須參加反動『國會』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很好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的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宣佈召集諮議性的『國會』時，布爾什維克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什維克相反，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就果然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估計了當時的客觀形勢，即使羣衆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再轉為革命罷工，再轉為武裝起義的這種形勢。此外，那時鬥爭的要點：是讓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議機關，還是要設法把這召集權從舊政府手中奪取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肯定說會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以及這種形勢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所以，抵制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為它表明了，在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但若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便大錯特錯了。一九〇六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個不大的，容易

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往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能很快高漲和轉為武裝起義，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整個歷史環境，使我們必須把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互相配合起來。現在試回顧這一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的聯繫已完全表現出來，——就可以特別顯明地看出，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合法鬥爭形式與不合法鬥爭形式配合起來，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社等），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的鬥爭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單獨團體或「小組織」，而且存在的時間也不久。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都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列斯特和約，似乎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並且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是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的有害行為。這的確是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種妥協正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的這個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聯底領袖們說，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實行妥協，那他們也可以這樣作」的時候，我總是首先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說：

假定你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自己的金錢、身份證、

* 凡評論個人的話，加以相當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糾正這種錯誤的人。

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你因此才得幸免匪患。這當然是一種妥協。„Do ut des,（「我給」你金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安全逃身的機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合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帝國主義強盜所進行的妥協，正與這樣的妥協相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國的鮑威爾與阿得列爾（更不用說倫勒爾這批先生們），法國的倫諾德爾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份子」）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以及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而且有時是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真是同強盜合夥哩。

結論是很顯然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地絕對地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幼稚氣，對於這種幼稚氣甚至是難於認真看待的。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應當善於去辨別哪種具體的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爲的，對這類具體的妥協便要用全力去批評，最無情地去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它宣戰，決不讓那些老於世故的「求實主義」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狡獪之徒，藉「一般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工聯「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所作的叛賣行爲和已實行的這種確是最惡劣機會主義、叛賣、變節的妥協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給與的禍害，以便後來易於

捕獲和槍斃這班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這點在政治上決不是隨時都像在這個幼稚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想出一個包診百病的萬應藥方，或者約許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那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試來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這個政黨，從一九一四年末，就曾製定出它那真正的國際主義。它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使沙皇帝制失敗的主張，它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議論。這個政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却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革命興起，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好了推倒他們，並且果然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澈底廢除了地主與資本家底私有制。這個政黨既公佈和廢棄了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密約，又向各國人民建議和平，直到英法帝國主義者拆垮了和議而布爾什維克業已竭盡全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政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締結的這樣的妥協，其完全正確性，對於一切人都已是日益昭然若揭的了。

俄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變，直接或間接辯護『保護祖國』口號，即保護本國的強盜資產階級。爾後他們又繼續叛變，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與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聯合，後來又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聯合，正如他們

在國外的同道者與各該國資產階級聯合一樣，都是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抱定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打劫。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我們所要說到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他們不稱自己爲「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中可以看得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是由「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地方黨組」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該反對派意見底實質，敘述得最顯著、確切、簡明而扼要。只須引證其中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底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的，是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呢？!!」。 (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該作者便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包括參加國會）的問題」，只是爲要掩飾它想與獨立黨人聯盟的真正主要圖謀。這本小冊子上接着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以爲共產黨統治與黨底專政的問題，只是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底統治乃是任何

政黨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底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目的。因之，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妥協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拒絕。『應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所專有的革命鬥爭方法。為要包括那些應在共產黨指導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及階層，就必須建立具有最廣闊基礎和最廣大範圍的新的組織形式。這種爲一切革命份子所匯集的地方，便是以工廠組織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聽從『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在這聯合會裏。正是在這裏，把從事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爲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至於此外對從事鬥爭的羣衆之政治教育和鬥爭中的政治指導，則是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可見，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着：

『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而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它不惜採取妥協政策和贊成國會內的鬥爭，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可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羣衆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並只採用一個明確有效的方法，同時排斥任何國會鬥爭和機會主義手段；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條件地推翻資產階級，以便然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專政——這裏是羣衆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旨。

凡是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什維主義發展史的布爾什維克，一讀到這番議論之後，便立刻會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慣了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幼稚氣！」

但是我們要把這種議論更切近地考察一下。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黨）？」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枉費心機，異想天開，結果却弄巧反拙。誰也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只有一般把並不區分其在社會生產中地位的極大多數人民與在社會生產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羣衆和階級對立起來；誰也知道，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明的事實。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胡說八道？偏要這樣標新立異呢？一方面，人們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祕密狀況之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間的普通、正常、簡單關係，於是陷入困難地位而弄得糊塗莫解。在德國，也如在歐洲其他國家裏，人們太習慣於合法生活，習慣於由政黨按期舉行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來自由選舉「領袖」，習慣於用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情緒等等的簡便辦法來檢閱各政黨底階級成份。但是當革命急劇進展，國內戰爭擴大，因此不得不拋棄這種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轉到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其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來提出或組成或保留「領袖集團」——這個時候，人們便張皇失措，於是妄想出一種絕無僅有的謬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內某些黨員，由於他們不幸生在一個小國內，享有特別優越與

特別穩固的公開狀況底傳統和條件，從來不曾見過公開狀況與祕密狀況之互相更替，於是陷入迷途，茫然無措，竟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人們顯然是把所謂「羣衆」和「領袖」這類現代「時髦」字眼，毫不加以思索地隨便爛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並且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善於想一想這是什麼對什麼的關係，不善於把問題闡明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以及戰後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羣衆」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表現得特別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再三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分立出了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底領袖，總是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受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餵養。馬克思之所以從這班混蛋那裏博得很榮譽的仇恨，就是因為他曾公開指斥他們爲叛徒。最新（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替某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在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了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這班變節領袖，他們祇顧本行利益和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於是就造成機會主義政黨之脫離「羣衆」，即脫離最廣大勞動階層，脫離他們中間大多數，脫離工資最低工人的現象。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鬥爭，不把這些機會主義的變節領袖加以揭破，加以恥辱和驅逐，則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便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所進行了的也就是這樣的政策。

在此種情況下，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殊不知在「打倒領袖」這口號掩飾之下，實際上却把一些胡言爛語怪誕百出的新領袖推舉出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持着一般人性見解的舊領袖，這就尤其可笑了。這些新領袖在

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里夫赫木，霍爾聶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額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的，所以政黨根本上就不需要；對這樣的絕頂荒謬之談，也只能搖頭棄絕。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深刻地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總是可以弄成怪誕絕倫的大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主張底必然結論。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也就恰恰是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會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就無異是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而不經過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正經歷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多年內，階級還是會存在的。只有在英國，這個時期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總還是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

* 共產主義工人報（漢譯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所載額列爾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若不先破壞政黨，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制』。

拉丁語系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昏亂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莊重的德國人（額列爾及霍爾聶爾在上述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倫的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原理）也發表這種完全不適當的議論。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俄國特別往往是『時髦的』。

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有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方面的工作，才能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狂熱轉為灰心等等舊病復發的現象。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制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劣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和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組織者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底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為本階級裏全體忠誠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以其日常、瑣碎、無影無形、不可摸捉的腐化作用所造成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誰祇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會的問題。但首先讓我根據我黨經驗來講幾句結束前一問題的話。在我們黨內，過去隨時都有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我記得這樣的攻擊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五年，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城的中央團體⁷⁶已開始形成，它應當負起領導各區團體的責任。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曾有一個小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

治」等等。因此德國「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不經什麼危險就可以痊愈的，在病愈後，機體甚至還會強健一些。另一方面，因公開工作和祕密工作之迅速更替，而必須把總指揮部，必須把領袖特別「隱藏起來」，特別祕密起來，這種情形會常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就是一九二二年馬林諾夫斯基這個奸細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一事實。他使幾十幾百個極好極忠實的同志遭到破獲，弄得他們坐苦工牢獄，弄得其中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未能造成更大的禍害，只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祕密工作配合得恰當，馬林諾夫斯基身任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為博得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幫助我們創辦公開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沙皇制度下也能夠進行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夠採用適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幾百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幹部送進苦工獄，送去遭死，而另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刊物，訓練出成千成萬新的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個事實，那些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美、法、意的同志們），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現時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派遣奸細，而且將來也還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的。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公開工作和祕密工作正確配合起來。

* 馬林諾夫斯基後來曾被德國俘虜。他在布爾什維克執政時回到俄國，立刻被捕，交法庭審判，並被我們的工人槍決了。孟什維克特別厲害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了黨中央委員會。在克倫斯基執政的時期，我們要求逮捕杜馬議長羅將科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細，却沒有把這事實通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但是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羅將科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到鄧尼金那裏去了。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 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已決然對這個問題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爲用幾篇響亮言論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和「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方面作得特別「莊重」和特別魯莽的，要算是霍爾品爾了），也就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堅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而其實這種策略乃是根本錯誤，除了空話之外，別無絲毫內容。

爲了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今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國家中去。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亦即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我國的具體情形有如下述。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據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黨員共有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前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我們就心黨過於擴大，因爲一般趨炎附勢巧於鑽營的人，勢必乘機混進到執政黨內來，而這些人本來是只值得槍斃的。一九一九年冬，當尤金尼奇離彼得堡只有幾俄里遠，鄧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時候，即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之際，而野心家、無賴漢和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份子，決不能指望把加入共產黨作爲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遭受絞刑和拷打）的

時候，——我們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是對於工人和農民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來領導全黨；同時還有人數更少的機關常駐莫斯科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均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五個中央委員組成之。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在我們的共和國內，不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一個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職工會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已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職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是由共產黨員組成，並執行黨底一切指令。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形成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濶的、極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則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系；階級專政便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職工會底熱烈擁護，如果沒有職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奮不顧身的工作，那我們當然不要說兩年，便是兩個月也不能管理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踐上乃是很複雜而紛繁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在羣衆中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人員舉行會議，與孟什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很少），他們教唆這些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鼓吹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實行怠工等等為止。

我們認為經過職工會來與『羣衆』發生聯系還是不夠的。在

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這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我們要用全力來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需要，從他們中間提拔出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國家職務等等。最近頒佈的將國家監督事宜人民委員部改組爲『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擔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當然都是經過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關，就在世界上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曾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於這種大會是極爲注意的），並經過特別派往鄉村去擔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來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對資產階級性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進行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踐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一般機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熟悉這種機構，又親眼看見這種機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祕密的小組發展起來，那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什麼領袖專政還是羣衆專政等等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廢話，如像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些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那種莊重的、非常淵博的、極端革命的論調，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內工作，說什麼可以拒絕這種工作，說什麼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種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樣的論調，我們也不能不覺得是同樣幼稚可笑的廢話。

資本主義所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歷來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它們只

是很緩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才可以而且定會發展成爲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不僅包含同行、同藝和同一職業，並包含整個生產部門），然後經過這種生產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以及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具有全面知識的、受有全面訓練的人，即能夠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去，它必須向這個方向走去，並且定能到達這個目的，不過須要經過許多年份。目前就企圖具體實現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所將造成的此種未來結果，這無異於教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夠（而且應當）不是用幻想的人材，不是用我們所特別造就出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簡直不值一提的輕舉妄動。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爲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當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享有這種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不問政治的傾向以及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底相互作用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底巨大進步，而這時，黨更加必須不僅用舊方法，而且要用新方法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黨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期間內還會是一種必需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自己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使全國經濟底管理職能首先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

業)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上所必需的工人團體。

上述職工會方面的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底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色彩」,企圖避開它,跳過它,那便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就等於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所應起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那種作用。另一方面,倘若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推延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聯主義偏見的工人的那一天,那便是更加深刻的錯誤。政治家底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瞭解)也就在於正確估計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去奪取政權的條件與時機,正確估計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於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充分廣大階層之充分贊助的條件和時機,正確估計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以後能於教育、訓練和吸引日益增多的勞動羣衆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時機。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表現得而且不能不表現得比俄國更加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裏,孟什維克以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職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由於存在有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自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職工會內「盤據」得更加牢實,那裏所形成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只圖私利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趨向於帝國主義的、受帝國主義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要比我們俄國有過的強大得多。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在西歐,同葛培爾茲輩,如沃輩,亨德孫輩,麥爾黑姆輩以及列金之徒作鬥爭,要比在我國同孟什維克作鬥爭困難得多,我們這裏的孟什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上與這些人完全是一邱

之務。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人物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之外為止。如果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夠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但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裏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估計這種程度，只有各國內那些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我國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幾天，即十一月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也就可以作為測量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尺度。在這次選舉中，孟什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僅得七十萬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只有一百四十萬票；而布爾什維克却獲得了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曾登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合刊上）。

但是我們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來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們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上層份子反動和反革命爲理由，便主張…退出工會!! 拒絕在工會中工作!! 要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 這真是不可寬恕的蠢舉，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須知我們的孟什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無非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稱呼孟什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class）這是美國的丹尼耳、德立昂派一種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通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底走狗、工人貴族或『資

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於一八五二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底影響之下。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主義者對於影響『羣衆』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高喊『羣衆』是怎樣濫用這個名詞。要想善於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愛戴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搗亂、陷害、侮辱和追究（他們既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凡是有羣衆的地方，就一定要在那裏工作。應當善於承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忍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是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的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那怕這些組織是極端反動的。而職工會與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羣衆薈萃的這種組織。據瑞士人民政治日刊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的統計，英國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到一九一九年末，其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邊沒有關於德法兩國這同類的材料，但人所共知的確鑿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也大量增加了。

這些事實最顯著不過地說明了一件也爲其他千百個例子所證實了的事情，即正是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需求組織的渴望日益增長着。在英法德各國，有好幾百萬工人初次從一盤散沙現象，進到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接近的（對於那些還受着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所薰染的人們說來）組織形式，即職工會，而那班雖則革命但不高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却袖手旁觀，空喊『羣衆』『羣衆』！竟拒絕在職工會內進行工作！！藉口這些職工會『反動』而拒絕工作！！臆想一種嶄新的、

純潔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具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所作的這種更沒有理智，更危害革命的事情，是再也想像不出來的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空前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份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開。

無疑的，葛培爾輩，亨德孫輩，如沃輩，列金輩先生們一定很感謝這類「左的」革命家，因爲他們正像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裏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並拒絕在工會中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排出工會，使他們極不便於在工會中工作，並對他們施以侮辱、攻擊和追究。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動，巧智，非法手段，緘默態度，隱瞞真情，祇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內面，無論如何都要在那裏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沙皇時代，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公開的機會」，但當暗探局長祖巴托夫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來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石金同志，他是彼得城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沙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

和羣衆取得聯絡，想方設法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祖巴托夫派底影響*。在西歐，因為趨向於合法的，憲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偏見，特別根深蒂固，所以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而且必須有系統地去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那種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極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直接地或間接地，公開地或暗藏地，整個地或局部地——都贊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和第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應該迴避，不應該抹煞，而要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已經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七）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用極端鄙視而且是極輕浮的態度，否定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有什麼論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國會鬥爭形式，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拒絕…」。

這樣誇張其辭真是到了可笑的地步，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制度！莫非德國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那麼又怎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空談麼？

* 葛培爾輩，亨德孫輩，如沃輩，列金之徒與祖巴托夫派毫無二致，所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服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那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了的』。在宣傳上講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廢除國會制度，還相隔得很遠。幾十年前，本已有全部理由來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已經過時了的』，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地上進行很長期和很頑強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講來，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了的』，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但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這從全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看來，並無足輕重，從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是渺不足道，甚至無法加以大略估計的。但正因為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便是理論上莫大的謬誤。

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麼？這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左派』底立場就很穩固了。不過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加以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這種分析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20）上，載有關於國會制度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的左派或左傾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析，在下面我們就可以看見，也是十分糟糕的。

第一，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為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這些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知道，『左派』是錯誤了的。單是這一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那種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據。『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顯然錯誤，現在已不復成為錯誤了。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

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執行自己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仔細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錯誤，這樣也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而是小組，不是羣衆底政黨，而是知識份子和少數沾染知識份子惡習的工人底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法蘭克福地方小組所出版的該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都是反革命的。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無數萬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輕浮，太誇張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乃是不可爭辯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實自己的錯誤。既然『數百萬』和『無數萬』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制度，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末又怎能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是把自己的主觀願望以及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作爲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因爲沙皇制度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暴，而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時日，並以特別複雜的形式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產生了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和意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所犯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地觀察過，特別注意地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當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時，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制度，在德國共產黨人看來，自然是『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們所認爲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爲過了時的，羣衆也認爲過了時的東西。

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善於以階級政黨立場，以羣衆政黨立場來判斷事理，來處事接物。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準上去，不應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準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主義的成見，叫做一種成見。但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正是全體勞動羣衆（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份子）之覺悟程度與準備程度底實在情形。

就即令不是「數百萬」和「無數萬」，而只有人數尚多的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父走，只有人數尚多的農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和富農（Großbauern）走，那末，根據這一點，也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德國的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選舉，必須參加國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不開通的、被抑壓的和愚昧無知的羣衆。在你們還無法解散資產階級國會和其他任何反動機關的時候，你們便必須在這些機關內工作，正是因爲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簡直會成爲空談家。

第三，「左派」共產主義者關於我們布爾什維克，講了很多稱讚的話。有時我禁不住要說：你們最好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布爾什維克底策略，多認識認識這些策略吧！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不正確，那就應該明白指點出來，並加以證明；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確，那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當然，決不能把俄國條件與西歐條件等量齊觀。但當專門談到「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絕對必須切實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爲如果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那麼這樣一個概

念就很容易變成空話。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並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是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着（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着）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殊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至於這幾次選舉曾經得到非常寶貴的（而對於無產階級也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這點，我敢說，我在上面提過的那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的論文中，已經證明出來了。

由此得出一個不容爭辯的結論：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的」的東西。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同時却希冀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眼光來製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便犯了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在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在事實上背棄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看「荷蘭左派」主張不參加國會的論據。上面所提到的「荷蘭派的」提綱，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即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處在革命狀態之中，此時參加國會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直接行動比較起來，已逐

漸失去其意義了。在這種條件下，國會將成爲反革命底中心，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自己政權底工具，這時，拒絕參加任何一種國會活動，甚至是必要的」。

第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爲羣衆直接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爲重要，而不僅在革命時候或有革命形勢的時候才是如此。這種顯然毫無根據，從歷史和政治觀點看來都是錯誤的論證，祇是特別明顯地說明，提綱作者們絕對沒有估計到一般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革命前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沒有估計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關於配合公開鬥爭和祕密鬥爭這一意義重大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因爲在一切先進的文明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內戰日益成熟與逼近，由於盡情破壞合法權利的共和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對共產黨人所施行的瘋狂追究等等，以致公開鬥爭與祕密鬥爭的配合，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很快就會一天比一天成爲必要（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成爲必要了）。這一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一般左派份子却絲毫沒有瞭解。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觀點上看來是錯誤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這種參加，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不但有益，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所謂國會日益成爲反革命底機關和中心（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國會從來都沒有成爲反革命底中心，並且也不能成爲反革命底中心），而工人正在建設作爲自己政權工具的蘇維埃，由這兩句話中就要得出結論說，工人必須準備起來——在思想上，政治

上，技術上準備起來，去進行蘇維埃反對國會的鬥爭，由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政府的蘇維埃派存在，不但不會促進解散國會，反而會使這件事情困難起來。當我們進行勝利鬥爭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時候，我們從來也沒看出，他們那裏有站在蘇維埃方面的無產階級反對派這一事實是對我們的勝利毫無關係的。我們明白知道，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在將被解散的反革命立憲會議中，有澈底擁護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和不澈底擁護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左派反對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一些。這個提綱的作者們完全弄糊塗了，他們縱然不是忘記了一切革命的經驗，至少是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反動國會以外的羣衆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如果是直接贊助革命的，那就更好）反政府派配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一般「左派」在這方面的議論看來，他們不過是革命教條主義者，從來未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也未曾深刻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只一味表現幼稚態度，把主觀上「否認」某種反動機關，看成是實際上業已破壞了這機關，其實要達到這點，非有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不可。

破壞對新政治（不僅是政治）思想的信任並加之以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藉擁護這種思想爲名而把這種思想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因爲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說的一樣），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上所能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可以弄成荒談謬論，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它甚至會必然被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荷蘭的和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此種欲益反損的蠢笨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這裏我不來試圖說明在哪些條件下抵制

國會才是有益，因為本文底任務要小得多，不過是由估計俄國經驗來論到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的幾個迫切問題。俄國經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而正確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誤的（一九〇六年）。當我們分析第一次情形時，便可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沒有召集成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羣衆革命行動（尤其是罷工運動）發展得異常迅速，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給反動政府以任何贊助，革命無產階級由於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而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羣衆的影響。十分顯然，這個經驗對目前歐洲的情形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的理由，也同樣十分顯然，荷蘭人及「左派」擁護（那怕是有條件的擁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根本上是不正確，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祇有害處。

在西歐與美國，國會已成了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份子所特別仇恨的東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也是完全自然的，因為在戰時和戰後，國會中絕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底行為實在是最卑污、最無恥、最變節的了。但在解決怎樣去與公認的毒禍作鬥爭的問題時，若為仇恨國會的情緒所迷惑，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罕有的東西』；人們期待這種情緒，實在是期待得太長久，太枉然，太難耐了，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就使他們這樣易於為情緒所屈。自然，沒有羣衆中的革命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使革命的策略變為行動，但我們在俄國，由於有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經驗，確信到這樣一個真理，就是說，革命策略決不能祇根據革命情緒來規定。規定策略，就必須把本國（及各鄰國和世界上其他各國）一切階級力量加以清醒而極客觀的估計，並且估計到革命運動底經驗。僅僅咒罵國會機會主義，僅僅否認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正因為太容易，所

以這不是解決困難任務和極困難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國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國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祇是下列全部真理局部表現，而全部真理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但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那就比西歐各國要難一些。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是：（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來結束那使工農深受痛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為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為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現時在西歐沒有這樣的特殊條件，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都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要想「繞過」這種難局，「跳過」為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國會的難關，那真是十足的幼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同時却害怕在反動國會內建立由堅決忠實英勇共產黨人所組成的卓越國會黨團時所遇到的困難！難道這不是幼稚氣麼？德國的李卜克內西，瑞典的赫龍特，甚至沒有羣衆自下的贊助，尚且能作出用真正革命精神去利用反動國會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懷有失望與憤激情緒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惡劣的國會內鍛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羣衆，尤其是西歐小農中的落後羣衆所浸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主義偏見，比俄國羣衆中的要厲害得

多，所以共產黨人祇有從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堅強的、百折不回的鬥爭，以便去揭發、消除和克服這種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領袖」壞，因此悲觀失望，以至走到「否認」「領袖」的可笑地步。在「領袖」們常須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受到考驗和有威望的好「領袖」，是特別困難的，而且若不把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配合起來，若不使「領袖」受到考驗（就中也要在國會鬥爭舞台上考驗「領袖」），便無法克服這種困難。我們的批評，並且是最嚴厲、最無情和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拿來反對國會主義或國會活動，而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善於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壇的領袖，特別是反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領袖。只有這樣的批評——當然同時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代之以適當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領袖，同時又教育羣衆，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情況，並學會瞭解從這種情況中產生出來往往是非常複雜錯綜的任務*。

* 我很少有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袒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無疑義是不對的。可是據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和由塞拉底同志主編的四本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這期間內出版的第一期至第四期），以及我所能得到的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之攻擊屠拉梯及其同道者，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人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依然當國會議員，並繼續他們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塞拉底同志及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種現象，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屠拉梯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議員們採取這樣錯誤的，不澈底或無氣節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

(八)「不作任何妥協」麼？

我們從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中引來的那段話裏，看見過「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反對那三十三個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所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也是屬於那種稀罕的和極稀罕的著作家之列的，他們每部大作中的每一句話，都含有極深邃的意思。

恩格斯說：

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我們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是由於我們在達到我們目的的道路上，不願停頓於什麼過渡階段，不願去作妥協，因為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底壽命…」。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是經過一切非由他們而由歷史進程所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清楚楚看見並且始終追求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和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想像自己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便是萬事妥貼了，如果日內「開始起來」（這是他們確信的），而政權落到了他們手中，那末，後天「就會施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辦到的話，那他們也就不做共產主義者了」。

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辯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塞拉底同志顯然不對，他指斥議員居拉梯「不澈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澈底」的，却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居拉梯等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把自己的急躁性當作理論根據，這是何等幼稚氣啊！」（見恩格斯著：布爾基派公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民國報(Volksstaat)上，一八七四年，第七十三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城出版，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對於瓦爾揚深致敬意，說瓦爾揚有「不庸爭辯的功績」（瓦爾揚和黑得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大的領袖）。但對於他的明顯的錯誤，恩格斯都詳盡地加以分析過。自然，在年齡很輕毫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也如歲數頗大很有經驗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一樣，好像「容許妥協」是異常「危險」，是不可瞭解和不正確的勾當。而許多詭辯家（這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蘭斯白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機會主義領袖底議論一樣：「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經過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者，通常都能很好領會恩格斯所敘述的這一深邃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忍受過同被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所作的「妥協」，即當工人要求全未達到，或僅僅獲得部份滿足時，也不得不去上工。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矛盾加劇的環境之下，都看見有兩種妥協間的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窮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効勞，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勸說，或爲資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上，工

聯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國工人都會見到類似這樣的現象）。

當然，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某種「妥協」底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在政治上當然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之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是罷工時的合理「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叛徒領袖等等背叛階級的「妥協」的問題，要困難得多。若是想擬定一種包治百病的藥方，或製定一種能適用於一切情形的總規則（『不作任何妥協』！），那就是荒謬的想法。我們要有政治頭腦，來善於分別考察各個事件。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內領袖底作用，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有思考力的份子*，能經過長期的、頑強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培養出必要的智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警覺性，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爲祇要一般地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任何界限。對機會主義，我們始終進行而且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假使這些人還不懂得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就只有給他們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及增加

* 每個階級，即令在最開明國家底環境下，即令是最先進的階級而且因當前形勢使它的一切智慧力發揚到最高度的時候，其中總還有——而且當階級尚屬存在前，當無階級的社會本身上還沒有完全鞏固和充分發展起來時，必然會有本階級的不去思想和不會思想的份子。否則，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爲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其政治閱歷和生活經驗，才能加以糾正。在每一個別或特殊歷史關頭底實際政治問題上，重要的事情，乃是要善於辨別出其中表現最主要形式的不可容許的、叛賣的、體現着危害革命階級之機會主義的妥協，說明這種妥協的害處，並用全力去與這種妥協作鬥爭。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當兩夥同樣是掠奪和同樣是殘暴的國家集團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最主要的、最基本形式的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掠奪利益。在戰爭以後，保護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訂立的聯盟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容許的叛逆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爲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那小冊子上寫道：

『…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 凡是實行機動和妥協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拒絕』。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此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責斥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它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

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而那些沒有經驗和缺少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為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說這類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裏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哩！！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要薄弱些，首先簡單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繫，其次是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間的任何『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間以及本國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間的任何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各種機會（那怕是極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是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懂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內，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曾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地應用這個真理，那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考茨基，鮑威爾等等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便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善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社會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即彼得堡

一條寬廣，清潔，平坦，筆直的大街）上的康莊走道」。自契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達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們，不致於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曾費了如此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沙皇制度崩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就是說同他們締結過多次實際的妥協；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當布爾什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老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盧威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雖則為時並不長），同時編輯部却善於不斷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進行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防止工人運動內部有絲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表現。布爾什維克總是繼續採用同樣的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同時從來也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第二級選舉或複選時），從來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揭發他們這班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在選舉杜馬時，布爾什維克曾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過短期的正式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時，我們會幾次多年地在形式上與孟什維克共處於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而把他們看作是在無產階級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份『社會革命黨人』（如切爾諾夫，那唐松），締結過某些妥協，同他們在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一齊開會，發表過共同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來反對

「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曾完全接近我們，幾乎是與我們心投意合的一個『革命共產主義』民粹派）。正當十月革命之際，我們曾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非正式，但極為重要（而且是很有成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而未加以絲毫修改，也就是說我們無疑地締結了妥協，爲的是要向農民證明，我們並不想以多數壓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妥協。同時我們會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至布列斯特和約成立後，他們破裂了這個同盟，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時，甚至舉行武裝暴動，後來又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所以，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便攻擊中央，我們自然認爲這是『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左派』顯然的錯誤。我們俄國也有過與德國謝德曼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也有過曾反對孟什維克右派而與德國考茨基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什維克而轉向布爾什維克的情形，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顯然可以看到：在一九一七年六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祇佔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佔有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佔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工人這種與俄國全係同一性質的由右向左的轉變趨勢，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却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從來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祇是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底勢力呢？

很明顯的，這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德國共產黨人執行了錯誤的策

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胆地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左傾』幼稚病底無數表現，此種病症現在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此也就可以更好更快地，對於身體更有益處地把這病症治療好。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證明自己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考茨基，希法亭，而克里斯平，萊得布爾等等，看來大半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即無產階級派，這個派別發展得非常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大概共有七十五萬），是離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比錫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提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獨立社會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了。反之，共產黨人定要去尋找而且要找得同他們進行妥協的一種適當形式，即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並加速與此派作必要的完全溶合，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祇有騙子才會約許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有『容易』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沒有被那些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形形色色的無數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開通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幫、職業、有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即共產黨方面，就必須而且

絕對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的及小業主的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全部問題就在於我們應當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我們應當順便指出一下：布爾什維克戰勝了孟什維克，這不僅會要求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並且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策略，都是足以促進、增進、鞏固和增強布爾什維克而削弱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也在內）必然要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搖擺於愛護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是忽視這種動搖；既是利用這種動搖，那就要對那些傾向於無產階級的份子實行讓步，當其傾向的時候予以讓步，視其傾向的程度來決定我們讓步的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的份子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什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頑強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優秀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優秀份子，都轉入到我們營壘裏來。這乃是長期的過程，至於那種『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機動』的十萬火急的『決議』，只能妨害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己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誤之一。像霍爾士爾的這種見解，表現得愈加「莊嚴」和「鄭重」，愈加「堅決」和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現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僅僅唾棄那種荒謬絕倫得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便對協約國作戰的『民族布爾什維主義』（勞芬別爾格等），是不夠的。應當瞭解，否認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務必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的

47*

這種策略，根本錯誤。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謝德曼輩高踞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要求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所作的機動迂迴辦法，實在不好得很，因為他們多少替叛徒謝德曼輩分担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而且是極冷靜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了『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去。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應當肯定諾許，說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拒絕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屢次叛賣革命，結果障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危害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要加以拒絕。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障着這種運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此，根本的差別也就在此。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把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都空空放過了，那末，這罪過就應由他們去擔負。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具有全世界威力的堡壘）。定要把解除凡爾賽和約的問題，立刻放在第一位，即放在使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就是市儈民族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鮑威爾這一流人去提倡的），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無論哪一個大國家

裏——德國也在內——實現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革命是一個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話，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而且應當容許的。既然俄羅斯一個國家爲了革命利益能夠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那末，蘇維埃德意志，在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盟之下，爲了革命利益而忍受爲時更久的凡爾賽和約，也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做好圈套來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挑撥他們說：「請你們講講，你們不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不去巧妙地運用機動以反對奸狡百出而且此刻還是強於他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却像些小孩子一樣，果然走上這個圈套。事先束縛自己的手足，公開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且何時要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我們明知這場戰鬥對敵人有利，對自己不利，却居然前去應戰，這乃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自己的戰鬥，那末，這種政治家是絲毫也沒有用處的。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闊的、強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極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它們想建立共產黨，彼此間正在進行這一談判。「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的工人無畏週刊（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由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主編，其中載有她寫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敘述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根據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

階級專政等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那知對於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的共產黨加入舊的『工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這個『工黨』係大半由工聯組成之工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也同『社會主義工黨』*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加入『工黨』，因此就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黨員，或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前者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共產主義政黨中的右派』（見潘克赫爾斯特底論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分歧正和德國的相同，雖然分歧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的，比在英國的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來把『左派』的論據考查一下吧。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了登載於該期週刊上加拉克爾（W.Gallacher）同志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國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底左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底代表，這個革命運動的目的是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建立以全國各處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國會議員們吵鬧得夠久了。我們認為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普通黨員羣衆，一想起國會制度，就愈益覺得討厭；幾乎一切地方團體都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委員會。當

* 似乎社會主義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反對參加國會。

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說服他們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所有着重點都是作者加上的）擁護這夥匪徒。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底叛變。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德孫，克略莫斯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爾，斯腦頓這夥人底營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黨員羣衆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這都不過是幫助上面這班先生們。不列顛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這裏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份子來叛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種反動份子非常貪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問號是作者加上的），如火如荼地想證明他們也和「主人」階級中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異常透澈。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善於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會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羣衆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

應該加以愛護，應該關心地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衆，單靠情緒是不夠的；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底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老百姓』都瞭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在任何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底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策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瞭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國會，凡是至今尙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還是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誠實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總是一個最兇惡的反革命。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裏去，不從國會內部來瓦解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將來勝利解散國會這一任務，這樣是否能夠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會想到有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同時該作者却說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科學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底經驗，尤其是這些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業已經歷過的很類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動

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羣衆，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亨德孫輩，克略英斯輩，麥克唐納爾輩，斯腦頓輩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很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其實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共同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式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攫得政權，定會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正確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贊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們以相當的幫助。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且來引用英國現時兩種政治文件：（一）內閣總理路易、喬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上面的記載）；（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在上述的她那篇論文內所發表的議論。

路易、喬治在他的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當時特請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那些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有些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有與保守黨聯合之必要，而且要密切聯合，否則，那圖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即路易、喬治所寧願稱爲「社會主義」黨的工黨，就會獲得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的聽衆，向着那以前大概還不瞭解這點的國會主義的自由黨黨員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布爾什維主義」。路易、喬治又說明，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爲自由黨人是根本贊成私有制的。他說：「文明到了危險境界了」，因此自由黨人與保守黨人必須聯合起來… 路易、喬治接着又說：

『…如果你們走到農業區域去，那末，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自然依舊是那些沒有什麼變動的老黨派。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就會和現在某些工業區域一樣的巨大。我國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的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注意到的一種情形。法國居民大都從事農業，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國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開始動搖起來，那末，由於上述原因，它就會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加厲害』。

讀者從這裏可以看出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他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路易、喬治那裏來學些東西吧。

我們再從路易、喬治演講以後所進行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有趣的問答：

『窩雷斯 (Wallace) 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許多援助，請問內閣總理，究竟認為自己在工業區對於產業工人採取的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該不會因此使目前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所抱定的完全是另一種見解。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一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很能幹，現在他們都從事於破壞政府底威信。結果無疑是大大加強同情工黨的輿論。一般輿論，並不趨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是趨向於工黨，這是最近補選運動所證明了的事實』。

附帶說說，這一段話特別表明資產階級中甚至最聰明的人物，也弄得如此糊塗，而不能不幹出無可救藥的蠢事。就在這點上資產階級也會滅亡的。我們的人，或許也做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改正），但他們終歸會成為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的以下一番議論：

『…應克平同志（不列顛社會黨總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種對於工黨的估計。工黨黨員雖多，但裏面有很大一部分黨員是消極的和萎靡不振的。這些男女工人之所以加入工聯，因為他們廠內工友是工聯會員，又因為他們都想領取補助金』。

『但是我們認為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為工黨是英國工人階級大多數還沒有從中擺脫出去的那一思潮底產物，雖然民衆底腦筋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很快要改變這種情形的…』。

『…不列顛工黨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團體一樣，在社會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會上台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就是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也就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或遊移不定』。

『我們不應當用增加工黨力量的辦法來分散自己的力量；工黨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必須準備着向工黨政府進攻…』。

這樣看來，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他們歷史上已為百年來的經驗所確證，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底兩黨）制，認為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作鬥爭。一部分自由派，好像覆舟時的老鼠一樣，紛紛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工黨必然會上台執政，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他們根據這種情形，竟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用以下的話把這個結論說出來了：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任何妥協… 它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要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為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輩或謝德曼輩這批人走，因為他們還沒有嘗過由這批人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正因為嘗過這種滋味，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由此毫無疑義地要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事實上去認識亨德孫和斯腦頓政府成立後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去戰勝聯合起來的路易、喬治和邱吉爾。若是不這樣做，便會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為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只靠宣傳是決不行的。現在顯然是無力的工人少數知道（或至少應當知道），只要亨德孫和斯腦頓戰勝了路易、喬治和邱吉爾，則工人多數經過一個短時期後，便會對自己的領袖表示失望，轉而擁護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會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大半是守善意的中立），如果此時這無力的工人少數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要勇往前進』，那麼這種口號顯然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交戰一樣，前者本來應當『停住』，『轉折』，甚至締結『妥協』，

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做，却前去與敵人硬拚。這只是知識份子的幼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被壓迫勞動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能作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十倍或甚至百倍地驟增起來），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

在英國，這兩個使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得到勝利的條件，很明顯地正在日益發展着，這是從路易·喬治底演說中也看得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爲我們看到有些革命者對於這兩種條件，都抱着不充分思索，不充分注意，不充分自覺，不充分估量的態度。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爭取羣衆（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簡單的空談家），那末，第一，就必須幫助亨德孫或斯腦頓去打倒路易·喬治和邱吉爾（更確切點說：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從自身經驗中看出我們主張底正確，即是說，使他們確認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流人物完全無用，確認這流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革命的天性，確認這些人物之必然破產；第三，就必須促進這種時機的

到來，即只要多數工人對亨德孫輩表示失望，便可以一舉推翻亨德孫之流的政府，且有獲得勝利的極大可能；因為既然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路易、喬治，尚且表現張惶失措，並由於他昨天和邱吉爾『磨擦』，今天又和阿斯克維特『磨擦』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削弱（並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末，將來亨德孫這批人底政府就定會更加張惶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更具體地來說明這點。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是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可以向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流人提議『妥協』，提議訂立選舉協定，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去反對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辦法）來分配國會中的議席，同時我們要保持着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的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去和他們聯盟，因為否則便是叛變行爲；英國共產主義者也絕對必須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的完全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總共十五年內）曾堅持過並爭得了揭發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即揭發孟什維克的完全自由一樣。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並不去追逐議席，在這件事情上儘可讓步（但亨德孫之流，尤其是他們的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即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目的是爲了獵取議席）。我們便會贏了，因為正當路易、喬治自己『激動』羣衆之際，我們能在羣衆中來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因而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自己的政府，而且幫助羣衆加速瞭解我們共產主義者反亨德孫輩的全部宣傳，我們應該毫無避諱，毫不緘默地去進行這種宣傳。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同我們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為那時我們立刻會指明給羣衆看（要注意，甚至在純粹是孟什維主義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也贊成蘇維埃）：亨德孫這批人寧願接近資本家，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會在羣衆面前佔着上風，這些羣衆聽了路易、喬治那段很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的）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便會贏了，因為那時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了亨德孫和斯腦頓這班人害怕戰勝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路易、喬治底幫助，而路易、喬治却公然力求去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舊曆）革命之後，我們布爾什維克反孟什維克和反社會革命黨人（即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所進行的宣傳，也正是由於同樣的情況獲得了勝利的。我們那時告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着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只佔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俄國的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害怕拋開資產階級而取得政權，資產階級却因明知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將一定獲得多數*，於是就把這個選舉再三拖延下去，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却沒有能力來毅然決然地澈底反對這種拖延現象。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則共產主義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結果如下：根據包括三千六百萬以上選民所投票數統計，布爾什維克獲得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底各政黨共獲得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以及同類的各小團體共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者立刻就可在奪取羣衆同情心並使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喪失信用這方面，獲得贏局，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是毫不重要的。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絕對可靠的區域內，即在我們提出候選人時不致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那時我們在選舉鼓動中，要散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並在沒有我們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候選人而反對資產者。如果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同志，認為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是放棄反叛徒社會黨人的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會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要去接近羣衆，甚至於要使羣衆聽完他們的話，都時常感覺棘手。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講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德孫而反對路易、喬治，那末羣衆定會聽我講話的。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制』招牌作掩飾的）邱吉爾專政好，而且也可以說明我之所以要投票贊成亨德孫，支持亨德孫，正好像絞索支持着絞犯一樣；說明使亨德孫這批人能更快地組織他們的政府，這也會證實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會使羣衆轉到我這方面來，也會促進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正如他們在俄德兩國裏的同道者所遭遇過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羣衆不會了解，說這種策略會分散和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碍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對這些『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自己的教條主義論調，加到羣衆身上去吧！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大概不會比英國的高，而要比英國的低些。但羣衆瞭解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即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了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在蘇維

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又舉行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布爾什維克就把這個立憲會議解散了，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碍布爾什維克，反而幫助了布爾什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意見分歧，亦即是否要加入工黨這個問題，我在這裏不能多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所知道的材料太少，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為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本身結構上，與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太不相同。不過毫無疑義的是，第一，要是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要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就想根據這一類原則得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末，他在這個應否加入「工黨」的問題上也必然要犯錯誤的。因為這一類原則，只不過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公社社員們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任何妥協和任何過渡階段的錯誤。第二，毫無疑義，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和在任何時候一樣，也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原則，應用到本國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底特殊情況上去，應用到本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況上去，這種特殊情況在各國是互不相同的，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猜度這種特殊情況。

但是要講到這點就不僅要聯系到英國一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而且要聯系到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總結。現在我們就來講述這個問題。

(一〇) 幾個結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現出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世界上第一次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底範圍和力量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單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內，罷工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每年罷

工人數，增多到十倍，而自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罷工次數不斷增加，且規模宏大。落後的俄國在許多異常特殊的歷史條件影響下，第一次向全世界不僅昭示了被壓迫羣衆在革命時的自動精神之躍進式的增長（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了無產階級底作用比它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若干倍，昭示了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接着由政治罷工轉爲武裝起義，以及產生了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各階級之羣衆鬥爭及羣衆組織底新形式——蘇維埃。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首先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全面的發展，隨後就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成爲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現時證明：在一切國家的工人運動中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歷着日益生長、日益強健和日益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之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對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什維主義』，即反對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第二，還要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開展起來成爲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它已被打死了）和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是『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還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還是過去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制度所採取的不正確態度，同時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也就是說，非但在國際性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之內，無疑義地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經過實質上乃是同類的預備學校以達到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經歷這一發展過程時，都是各自不同的。並且巨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走着這條道路時，比布爾什維主義快得多；須知布爾什維主義成為有組織的政派以後，歷史給了它十五年的準備期間，它才獲得了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的極短期間內，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把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擊潰了，而第二國際僅在幾個月前，還是比第三國際強大得無可比擬，儼如牢不可破的龐然巨物，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刊物）和思想的贊助。

現在的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國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傾」教條主義作鬥爭之原則上的基本任務，同時又顧計到這種鬥爭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例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種種特徵而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得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正在繼續擴大和增長，這種不滿是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一個真正集中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夠在革命無產階級為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遵循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定、彼此雷同的基礎上。當各民族間的民族差別和各國家間的國家差別尚屬存在時（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在很長時期內存在着），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多樣性，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確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在局部方面能有正確的形式上的變動，使這些原則能正確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在每個國家中為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為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為推翻資產

48*

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而採取具體辦法的時候，應當善於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個民族的特點和特性，這便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擁護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制度，擁護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主要事情（自然還遠不是所有一切事情，然而主要的），已經是做到了的。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往下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並且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是比較次要，——但在實踐上，却更切近於實際解決任務，即是說：要找得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適當形式。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但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時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齷齪，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端反動份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底專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集團和派別，其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把廣大羣衆（而現在廣大羣衆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守舊、因循，而沒有覺悟的）引導到這種新立場上，確切一點說，就是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在這些羣衆接近和轉到新立場上的過程中來領導他們。從前若沒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當時就不能解決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的任務）；現在若不消滅左傾教條主義，不完全克服和擺脫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這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羣衆走上能夠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新立場這任務，也就不能完成。

當以前我們的任務是在於吸引無產階級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時候（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還是這樣），宣傳便佔了第一位；在這方面講來，甚至那些小組，雖帶着小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能作出成效來。但是現在到了羣衆實際行動的時候，要佈置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述語的話），要配備現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單靠宣傳的老技巧，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時，不能像未曾領導過羣衆的小組宣傳員那樣，只以千爲單位來計算；這時應當以百萬人和幾千萬人爲單位來計算。這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一定要是毫無例外的一切階級中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佈置就緒，以致決戰時機已經因有下列條件而完全成熟，也就是說：第一，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第二，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實踐方

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第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只有那時，革命時機才成熟了；只有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一方面在邱吉爾派和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微少的民族差異）中間的分歧，他方面在亨德孫派和路易、喬治派中間的分歧，從純粹共產主義、即抽象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作實際行動、作羣衆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看來，是渺小而毫不重要的。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看來，這種分歧却是極端極端重要。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個覺悟的、篤信的、有思想原則的宣傳家，而且想做一個革命中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他的全部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到這些分歧，在於猜透這些『朋友』中間之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機。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忠忱，與善於在實踐方面從事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轉折、退却等等的才幹配合起來，以便加速亨德孫這派人（如果不舉出人名的話，那末，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即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們）底政權之成立與倒台；加速他們在實踐上的必然破產，因爲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方向去啓發羣衆的；加速亨德孫派——路易、喬治派——邱吉爾派中間（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帝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賈卜派中間等等）必然的磨擦、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以使用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切黨派，並奪取政權。

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史，其內容總是比最好的政黨，即最先

進階級底最覺悟先鋒隊所想像的要豐富得多，繁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好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底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們一切才智能力特別高漲和緊張之際，由最激烈的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底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把握毫無例外的一切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候還要冒着巨大危險去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業）；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時刻刻準備着能極迅速地突然地由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若不決心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那麼誰也會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愚蠢，或甚至是一種罪行。可是這點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加必要。因為在政治上愈難趁先知道，在將來此種或彼種條件下，究竟哪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倘若我們不把握一切鬥爭手段，那末，當其他階級的狀況中發生了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所特別不熟悉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把握了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況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能極迅速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為我們所代表的是真正先進真正革命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以為合法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時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和愚弄了工人；往往以為只有祕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但這不正確。至於那些例如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在最自由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極橫蠻無恥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大戰底強盜性質這一真理的條件下，不能或不願（不要說「我不能」，而說

「我不願」罷)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家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他們便是極壞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經爆發並熾烈起來的時候,誰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於狂熱黨心,有的是由於追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由於貪圖祿位,這時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極大困難,受盡千辛萬苦,才能擺脫這類的假革命家呵。當進行直接公開的、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具備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家,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瞭解必須採用革命行動方法的羣衆中,來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也就有價值得多了。要善於尋求、探索和正確判定那種把羣衆引導去作真正的、堅決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現時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知道,而且任何人也不能預先斷定,那裏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足以喚醒、掀起並推動那些目前還未醒覺的極廣大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準備妥當,以便把「四肢都裝上蹄鉄」(正如已逝世的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那樣)。能引起「山崩地裂」的,或許是國會危機;或許是由紛亂到了極點而日益險惡和日益加劇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是某種其他的事變等等。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哪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懷疑,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是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是堅定不移地解決了的),我們所說的,乃是那種將喚起目前還在沉眠中的無產階級羣衆動作起來,並把他們一直引去

作革命鬥爭的緣由。我們不要忘記，例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在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曾比現時少一百倍的環境中，單是像反動軍閥千百次無恥行爲之一（德來福斯案）的這樣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也就足以激動人民直接去實行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地，毫不放鬆地既利用國會選舉，又利用不列顛政府底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政策上的一切事件，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門和各方面等，到處都按新的方法，即按共產主義的方法，用第三國際底精神而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此地我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布爾什維克」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外國的共產主義者說，這是與通常西歐的國會活動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的國會制度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即第三國際擁護者底任務，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門中，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主義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改造為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在俄國的競選運動中，也曾經常有過真正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只顧小利的，資本主義投機撞騙的行爲。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迥非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祿位的國會工作方式：務使共產黨能提出自己的口號，務使真正無產者能在沒有組織的，備遭抑壓的貧民幫助之下，散發傳單，走遍工人住宅，走遍鄉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幸而歐洲的窮鄉僻壤，要比俄國少許多倍，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走到最平民式的酒館裏去，鑽進最大衆化的會社、團體和偶然集會裏去，在同民衆說話時不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在國會中說話的語氣），絲毫也不爭逐國會

議席的『缺位』，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揭破資產階級食言的地方，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指定的選舉及其向國民發表的口號，極力使羣衆認識布爾什維主義；要知道，除選舉運動外，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平素是得不到這種機會的（自然大罷工的機會是例外，因為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類似的全民鼓動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在西歐和美國，要作到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這些事情是可以作到而且應該作到的，因為不費氣力，一般地就不能解決共產主義底任務，而需要努力解決的正是日益複雜，日益和社會生活各部門緊相聯系，並把各部門先後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實際任務。

在英國，也應當在軍隊中，在「本」國被壓迫和不平等民族（如愛爾蘭與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會黨方式，而是按共產黨方式，不是用改良主義手段，而是用革命手段）來進行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須知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地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大戰後的現在，當各民族已飽受戰爭痛苦而迅速認識真情實況的時候（這種真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之所以被打死和變爲殘廢，只是爲的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而釀成衝突，掀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都有無數火花到處橫飛，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到底是哪顆火花將能燃起大火，即能特別喚醒羣衆；所以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走到各方面，甚至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是毫無希望的場所去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擔負起自己的任務，便不能照顧到各方面，便不能掌握所有各種武器，便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把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按資產階級的方式佈置了——而現在也按資產階級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

能準備好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社會生活。

現在，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出乎資產階級及庸夫俗子意外的迭次勝利之後，全世界都變成了另一個樣子，資產階級到處也變成了另一個樣子。資產階級爲『布爾什維主義』所嚇倒，它因痛恨『布爾什維主義』幾至神經錯亂，所以它一方面既促進事變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布爾什維主義，因之它也就在其他許多場所削弱了自己的障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決定策略時，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人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什維克時，——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而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更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出版至幾百萬份的資產階級報紙用盡各種腔調，大罵布爾什維克，這反而喚起了羣衆去估計布爾什維主義；況且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生活中，又由於資產階級的『熱心』，也大大引起了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的爭論。現在各國百萬富豪在國際範圍內的行動，只會使我們應該對他們表示誠懇謝意。他們盡心竭力攻擊布爾什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之流毫無二致；他們做這件事情，也和克倫斯基一樣，做得『太過火了』，因而也和他一樣幫助着我們。法國資產階級把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作爲競選鼓動的中心，而責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傾向於布爾什維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當作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嫌疑犯大肆逮捕，到處散佈布爾什維克陰謀不軌的謠言，而造成一種人心惶惶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它怎樣聰明，怎樣富有經驗，却做出了想像不到的蠢事，它建立了經費極端充裕的『反布爾什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抨擊布爾什維主義的書報，添僱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神父來專門反對布爾什維主義。我們對於所有這一切資本家先生們，只應

該鞠躬致謝。因為他們在替我們效勞。他們幫助我們，促使群眾來注意布爾什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問題。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另一種作法，因為要想『緘口不說』布爾什維主義，要想剷除布爾什維主義，這點他們已經是辦不到了。

但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布爾什維主義底一方面：即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努力準備在這一方面，實行抵抗。在個別場合下，在單個的國家裏，在某種短促期間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辦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顧計到有這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縱能達到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可說是從社會生活底一切方面『生長起來』，它的幼芽真正是無處不有，『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使用的最『愜意』的比喻）已經根深蒂固地侵入到全機體之內。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傳染病』又會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從完全憶想不到的出口中迸發出來。這是生活的必然現象。儘管資產階級東奔西撞，兇狂暴戾，肆意橫行，做出許多蠢事，預先報復布爾什維克，並儘情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幾千、幾十萬個明天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儘管資產階級這樣橫行無忌吧，但它的命運總是和以前被歷史判處了死刑的一切階級底命運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將來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屬於他們的，因此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既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同時又能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估量資產階級瘋狂奔撞的行動。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布爾什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帝制派將軍們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手段所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日益受到鍛鍊，日益發展起來；它已是根深蒂固，甚至連摧殘追究都不僅

沒有削弱，反而加強着共產主義運動。要使我們更加有把握和更加牢實地走向勝利，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意識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各先進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意識以及在實踐中體現這種意識的本領。

那些曾是博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們如考茨基，鮑威爾等底經歷，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意識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以此教育過別人（從前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極大的錯誤，或在實踐上完全暴露他們是非辯證論者，完全是不善於估計到形式底迅速更變，以及舊形式中迅速充滿新內容的人，遂使他們底命運與漢德曼，黑得和普列漢諾夫相差無幾。

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祇是「呆呆注視着」某一個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面的，他們害怕看見那種因客觀條件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革，而死死地重複那種簡單的、讀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經充實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左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這班聰明角色却固執成見，還繼續在那裏硬向自己和別人担保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黨人不要重複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所犯的錯誤，確切一點說，要趕快糾正並爲了使機體少受損害而迅速消除那種爲「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

面犯的錯誤。不僅右傾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與右傾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比較起來，前者的危險性與嚴重程度，要小一千倍，然而，這祇不過是由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也許容易醫治好，但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已經發展到無可計量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底發展方面看來，我們現在業已有了這樣鞏固、這樣強大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足以使這一內容無論在或新或舊的形式中都能夠而且應該表現出來，都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與征服一切的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但並不是要與舊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所有一切新舊形式變為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澈底的勝利所運用的武器。

共產黨人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發展走上最直接、最便捷的道路，向着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獲得勝利的目標前進。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彷彿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樣，說什麼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不容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已經是錯誤了；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局部地已經並繼續在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右傾教條主義因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忽略新內容，而完全破產了。左傾教條主義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開闢自己的道

路，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把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一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去適應於不是由於我們階級或者不是由於我們努力所引起的此種形式的任何更替。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慘禍，其鄙陋齷齪內容及其所造成的無出路狀況，如此強有力地推動和加速了全世界革命，這個革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發展得特別迅速，具有異常豐富的更替着的形式，並在實踐上格外確鑿地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據，致使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快就可以完全醫治好『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增 補

由於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行報復，把我國掠奪一空，並不顧對本國工人所說的任何諾言，繼續加以掠奪和封鎖，而我國出版局尙未能料理好來印行我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却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材料。我並不把這本小冊子看作是什麼比政論家短評較大的著作，因此要簡略地補述下列幾點。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現已成為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行組織「共產工黨」，以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想必也會走到分裂的地步——我說「想必」，是因為我僅僅有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左派報紙蘇維埃（“Il Soviet”），上面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與必要，並且還講到抵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派別）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內的。

與「左派」，即「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即反對政黨，反對在職工會內工作）實行分裂，好像過去與「中派」（或者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樣，恐怕會成為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觀念混亂要好些，因

爲觀念混亂既妨碍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也妨碍黨內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性的，真正能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實際把自己檢驗一番吧，讓他們不要嚴格集中和具有鉄一般紀律的政黨，不要有善於掌握各場所、各部門、各種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的能力，而去試試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吧。實際經驗很快就會教訓他們的。

不過必須加緊努力，要使與「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儘少妨碍在最近將來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份子必然而且定要匯合成爲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布爾什維克所特別稱幸的，就是他們還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直接鬥爭以前，有十五年功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反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反對「左派」。而在歐美，現在却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這種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覬覦領袖地位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觀念和「光明正大態度」的話），但工人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成爲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能力的黨*。

* 關於「左派」共產主義者，即反國會派，將來與一般共產黨人合併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能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入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長處，就是他們比較一般共產黨人更善於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歷上也屢次看到過這類的事情，不過範圍較小並且是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裏，而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什維克有時候在某些地方鼓動羣衆，比我們更有成效。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曾經說過，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事。此後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證實了。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 („Die Rote Fahne“ Zentralorgan des Komm.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cusbund) 第三十二期上，載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賈卜和留特維茨軍事『官動』及關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正確。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約許對那個『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參加的社會主義政府』，採取『善意反對派』底態度（就是担保不準備用『強力來推翻』這個政府）。

這個策略，基本上無疑義是正確的。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也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政府；謝德曼這一流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這類的话；也決不能寫出像『聲明』底第四條這樣的語句：

局部地這是因為在革命時候或者革命情景還隱隱在目的時候，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比較容易接近羣衆。然而這還不足以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或先進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羣衆，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那末毫無疑義的，它就必須善於採用不管對於城市、對於工廠『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淺近、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的說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的工作。

「…當政治自由可以無限制地享用，而資產階級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專政的這種情況，從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來看，爲了繼續爭取無產階級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爲重要…」

這種情況是決不會有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如德國的亨德孫派（謝德曼派）斯腦頓派（克里斯平派）跳不出，而且也不能跳出资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又不能不是資本底專政。德國共產黨中央爲要達到它所全然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便根本不該寫這些在原則上不正確和在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祇須說（如果要講講國會式的客氣話）：當多數城市工人尙跟隨着獨立黨人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祇好讓這些工人去嘗試『自己』政府底經驗，好使他們自己能拋棄最後的市儈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幻想。問題這樣提法，完全足以作爲這種真正必要妥協的根據，而妥協的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但是在不受官場國會式客氣話所拘束的日常羣衆鼓動工作中，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輩這類下流東西，讓考茨基和克里斯平輩這批庸俗之徒在事實上揭穿自己如何受欺，又如何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會『最清潔不過地』做這一番『清洗』工作，來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叛賣社會主義行爲底骯髒馬廐，『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現時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已經根本喪失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不對的，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說來，要比那些自命爲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得多）底真正面目，在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事變時，即在賈卜和留特維茨底政變時，又一次地暴

露出來了*。一個雖然簡短却很明瞭的描述，便是考茨基所做的一篇小文章，題目叫做決勝負的關頭 („Entscheidende Stunden“)；這篇文章登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Freiheit“（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另外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論政局一文（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善於用革命家的態度去思索和論斷問題。這些些只會嚶嚶啜泣的市儈民主派，如果他們自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便要增加千百倍，因為事實上，他們在每一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都必然要作出叛賣的勾當… 同時却『竭誠地』繼續自信，以為他們是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由於胆小和無氣節的緣故，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毫無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時他們也是想『幫助』無產階級啊！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即意大利社會黨在自己隊伍內，竟容忍這些國會議員，甚至整批國會議員，乃是一種錯誤。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駐羅馬通訊員這個局外的證人，更證實了這點，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了他和屠拉梯的一篇談話。這個通訊員寫道：

『…屠拉梯先生認為革命的危險並不致於在意大利引起無根據的顧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祇是

* 關於這點，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三十日奧國共產黨極好的機關報紅旗上，已異常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闡述過了（參看„Die rote Fahne“ Wien 1920, Nr. Nr. 266, 267; L. 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爲要使羣衆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緊張狀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尙未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是毫不適用的。它只能是使各勞動者階級經常覺得有所希望。用這種學說做幻彩去眩惑無產者的那些人們，係迫不得已進行日常鬥爭，以圖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好來遷延時日，使各勞動者階級不致即時喪失自己的幻想，喪失對自己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接連不斷發生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和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嚴重局勢，愈加嚴重。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全國憤慨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全國頹靡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還遠未覺悟到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其實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國內秩序和優裕生活……』

很明顯的，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教唆者等所隱瞞所扮飾的事情，却被英國的通訊員洩漏出來了。這種實情就是屠拉梯，特列維斯、莫其良尼、杜郭尼一流先生們底思想原則和政治工作與英國通訊員所描寫的恰恰相同。這是澈頭澈尾的社會主義叛徒。他們主張在僱傭勞動奴役制下爲資本家發財而工作的工人應遵守秩序與紀律，單就這一點說，已是十足的叛變行爲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對於我們俄國人該是何等耳熟呵！他們說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該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呵！他們竟絲毫不懂得自發開展的罷工運動底革命作用，該又是何等鈍拙，何等鄙陋的資產階級心理呵！真的，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通訊員替屠拉梯一流先生們幫了一次欲益反損的忙，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波爾迪加同志及其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想在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那就得仗義聲討，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真正的共產黨。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波爾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從對於屠拉梯這流先生們所下的正確批評中，作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為凡是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來辯護這個觀點。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上有過用真正革命方式，即真正共產主義方式利用資產階級國會而毫無疑義是有益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模範例子。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千番百次以至無窮地說那種『舊的』、非布爾什維克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的地方。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僅在國會活動場所，而且在一切活動場所都應該添加（而且若不進行長期的、堅持的、頑強的工作，便無法添加）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傳統決裂的東西（同時要保留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工作來說吧。報章，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每一個多少文明的國家內，任何羣衆運動都非要有編輯機關不可。儘管你責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賭咒要使羣衆不受領袖底影響而保全純潔，也還是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還是不能使我們脫離在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和由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達兩年半以來，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私有制關係的氣氛和環境（在農民中和手工業者中）還流行着。

利用國會是工作底一種形式，編輯事業是工作底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人員都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政黨底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無論在前一方面或後一方面——

而且從資本主義下，以及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無產階級一切的工作，一切都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和特殊任務，各種困難和任務，是無產階級必須用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知識份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加給份子完成其影響，而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的阻礙方（往後還要完全改造不資產階級爲黨）所必須加以克服和解決的。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以前，各國銀行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等等都請馬國斯調度，嘲笑被資本主義所腐化了馬社會黨議員和警官消滅權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藉編輯工作，黨工會工作，去幹同樣資產階級式的鑽營權位勾當，難道這樣的例子當得我們不是覺得非常之多麼？如果只就法國來說，難道如伊和魯爾兩縣那些先前的黨官嗎，不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左」的幼稚病的幼稚氣，就在於他們想用這種「簡單的方法」，「輕易的」，「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各鬥爭中一種困難任務，而其實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對馬基法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罷了。極惡劣的鑽營發財行爲，資產階級式的利用議會肥缺，改良派對國會工作的驚人馬解，卑鄙的市儈諂媚。——凡此種種，毫無疑義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不僅在工人運動以外，而且在工人運動內部產生的通貨和崩潰的標本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環境）：甚至摧殘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滅得很慢，因爲它已經斷不斷的重新產生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一切方面，都產生出形式上相當的，但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勾當，長放夢文「左」的市儈市儈的習氣等等。

激烈的紙面國會派和反國會派嗎，你們自己覺得自己了異常革命了，但事實上，你們是破那種在與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影響在鬥爭時發生的比較不大的困難所嚇倒了，殊不知你們底勝

利，即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是更大得多，更大得無比的困難。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今天的小困難所嚇倒了，却不知在明天和後天你們還必須學習，必須補習怎樣去克服同樣的，其程度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時，會有更多的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人鑽到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裏面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機關中來，因為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並無從去建設共產主義，因為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我們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陶養和重新教育他們，——猶之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一樣，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正是反國會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目空一切，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想一揮手就拋開的那些任務，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中間又復活起來（我們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且打破這種制度是很正確的，但是它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底名義下，又重新復活起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內享受特權的，即熟練程度最高、待遇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制所固有的一切壞處，都在不斷地復生着，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作再接再厲、堅持不懈的長期頑強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當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面，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本主義陋習，是很「困難的」：要把被資產階級偏見所

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爲常的、當國會議員的領袖們趕出黨去，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中間我們所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是人數很少的一部分人）來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很「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真正不愧爲工人階級代表的共產黨黨團，是很「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在羣衆中進行宣傳、鼓動、組織的迫切工作，是很「困難的」。凡此種種都很「困難」，這是用不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爲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若與無產階級在準備獲得勝利時，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終歸必須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如同兒戲。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來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若與以上這些真正宏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黨團，乃是一樁輕而易舉，形同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派」和反國會派的同志們，連像克服現在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末，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使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服從自己並改造這些份子和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這些事情，並由於這樣倉卒方式，就會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則資產階級的環境，自私的習慣，市儈的傳統，就

一定會從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是社會活動即國會活動底這一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所有各方面，在一無例外的一切文化場所和政治場所。在某種工作上，遇着某一樁『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便畏難苟安，託詞躲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爲了這點，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的。應該學習並學會毫不除外地掌握所有一切方面的工作和活動，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氣、傳統和習慣。另一樣的問題提法都簡直是不鄭重的舉動，都簡直就是幼稚氣。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寫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間。

一九二〇年六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

第一六五至二四九頁。

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祇有由共產黨領導的城市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才能使農村勞動羣衆解脫資本和大地主土地佔有制底壓迫，免除破壞現象的災難，免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一再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浩劫。除非與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奮不顧身地來援助它爲推翻地主(大土地佔有者)與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農村勞動羣衆則別無自救的辦法。

另一方面，如果工業工人將以狹隘行會利益和狹隘職業利益固步自封，並自滿自足地只關心到改善自己有時是小康的生活狀況，那他們也就不能執行其使人類解脫資本壓迫和免除戰爭災禍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使命。

在許多有『工人貴族』的先進國家內，情形正是如此，這班工人貴族乃是第二國際中所謂社會主義政黨底基礎，而其實他們是社會主義底死敵，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是市儈沙文主義者，是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底代辦。無產階級要成爲真正革命的階級，成爲真正按社會主義精神來行動的階級，就祇有在自己的一舉一動上都以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先鋒隊資格，以其在推翻剝削者所進行的鬥爭中的領袖資格來出現；但如果不要把階級鬥爭引進到鄉村中去，不把農村勞動羣衆聯合到城市無產階級底共產黨周圍，不由城市無產階級來教育農村勞動羣衆，那末這個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二)城市無產階級所應當引導來參加鬥爭或至少也要吸收到自己方面的農村被剝削勞動羣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階級：

第一是農業無產階級或僱傭工人(年工,季工,短工),這是靠在資本主義農場中出賣勞動力爲生的人。把他們與農村居民的其他集團分開,成立這個階級的單獨組織(政治的,軍事的,工會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等等的組織),加緊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吸引他們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這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二是半無產者或最小農,這是一部分靠在資本主義農業和工業內出賣勞動力,一部份靠在僅能少許自給的小塊私有土地或租來土地上勞作爲生的農民。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村勞動居民中這一集團的人數是很多的,但資產階級底代表們以及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社會主義者」,往往抹煞這一農民集團的存在以及他們的特別狀況,部份的是爲了自覺地欺騙工人,部份的是由於盲目地爲種種庸俗因循觀念所蠱惑,竟把這個集團與一般普通「農民」羣衆混爲一談。資產階級愚弄工人的這種方法,在德國和法國表現得最明顯,其次就是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如果共產黨的工作路線正確,則這一農民集團乃是共產黨的極可靠的擁護者,因爲這種半無產者的生活艱難,他們從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能夠立刻獲得極大的利益。

第三是小農,他們擁有私有的或租來的小塊土地,足以養活家口及供經濟上的需用,並不要僱傭他人的勞動力。這一階層無條件地能從無產階級勝利方面得到好處,因爲無產階級勝利後能立刻地、完全地給他們以下列利益:(甲)免向大土地主繳納租金或一半現糧(例如法國的 métayers,即分成農,意大利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乙)免付典押金;(丙)解脫大土地主方面多種形式的壓迫

及對他們的依賴（在使用森林方面等等）；（丁）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幫助他們的經濟（可以使用無產階級所剝奪來的資本主義大農莊的農具和部分建築物，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把原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替富農與中農服務的這類組織，如農村合作社和共耕社，變成爲首先幫助貧民，即幫助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的組織），以及其他許多利益等等。

同時共產黨應當明白瞭解，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個階層中，不免或至少有一部分人會動搖到求得絕對貿易自由和使用私有財產權由自那方面去，因爲這一階層，既在出賣消費品（雖則範圍不大），也就是被投機業和私有制積習所腐化了的人。但在堅強的無產階級政策下，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充分堅決懲治大地主與大農的條件下，這一階層的動搖不會是很大的，並且這種動搖性不能改變一般和整個地說這階層將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來的事實。

（三）以上所述農村居民底三個集團總計起來，就組成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不僅在城市內，而且在鄉村中都有了充分的保障。與這相反的意見却流行得很廣，但是第一，這種意見祇是由於資產階級科學與統計材料之有系統地進行欺騙，極力蒙蔽上述農村各階級與地主資本家剝削者之間，以及一方面是半無產者和小農，另一方面是大農之間的深刻分裂現象；第二，這種意見是由於黃色第二國際英雄以及各先進國內被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不善於與不願意在貧農中進行真正無產階級的革命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機會主義者底全部注意力無論過去或現在都集中在怎樣去同資產階級，其中也同大農及中農（關於他們的情形可參閱下文）作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妥協，而毫不留意到由無產階級舉行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與資產階級；第三，這種意見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成見（與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制偏見

及國會制偏見結連着的)，以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充分證明及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所完全證實了的真理，表示一竅不通，這個真理是說：以上所述這空前備遭抑壓，零散凋弊，而在一切最先進國家中都是必然要度着半野蠻生活的三種農民，雖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對於社會主義勝利都饒有興趣，但祇有在無產階級爭得政權之後，祇有在無產階級堅決懲治大土地主與資本家之後，祇有在這些備受壓迫的人從實踐上看出他們具備了這種有組織的，充分雄強堅實的領袖和保護者能來幫助和領導他們，向他們指出正確道路的事實之後，他們才能堅決不移地贊助革命的無產階級。

(四)所謂『中農』，這在經濟意義上應瞭解為小的農作者，他們第一，按私有權或租佃權也擁有不多的土地，但這塊土地上的收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畢竟照例不僅供養活家口與經濟上的粗樸用度，並且可能有某種剩餘，這種剩餘至少在好年份內可以變為資本，第二，往往（例如兩三家農戶中便有一家農戶）可以僱傭他人的勞動力。在德國，各擁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集團，可作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中農的具體例子，據一九〇七年的統計，這集團中僱有農業工人的農戶數約佔該集團全農戶數的三分之一*。在法國，因為例如葡萄這類需要有更多更多勞動花費到土地上去的特別農作物更加發達，大概這個集團內使用僱傭勞動力的範圍，還要廣泛。

* 確切數字如下：各擁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數為六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總農戶數為五百七十三萬六千零八十二）；內中各種僱傭工人數為四十八萬七千七百零四，家庭的工作者（Familienangehörige）為二百萬零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在奧地利，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這一集團的農戶數為三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內中有十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六戶是使用僱傭勞動的；僱傭工人數為十四萬六千零四十四，家庭的工作者為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九人。奧地利的總農戶數為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九。

革命的無產階級，至少在最近將來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不能把吸引這個階層到自己方面這點作為自己的任務，而應當祇限於中立中農，即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使中農中立起來。這個階層之動搖於兩個勢力之間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新時代底初期，在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這個階層的主要趨向，將是贊成資產階級的。因為這裏是私有者底世界觀和情緒佔優勢；直接的趣旨是樂於投機買賣，樂於貿易與私有制底『自由』；與僱傭工人的對抗是公開發展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消滅地租與典押金，將直接改善這個階層的生活狀況。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政權決不應該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並且無論如何都要使小農與中農不僅保留他們的土地，而且要把這土地面積擴大到他們平素租來的全土地面積（廢除地租）。

把這種辦法與無情地去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結合起來，就可以完全保證中立政策的成功。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祇有在極端謹慎，按步就班，藉實例之助，不對中農施用任何強力的條件下，才能施行過渡到集體農業的步驟。

（五）大農（„Crossbauern“）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主，照例在經營業務中都僱有幾個僱傭工人，他們之所以與『農民』有關，祇是因為文化水準不高，生活常規相同，在自己農莊內親身參加勞動。這是資產階級內，即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和堅決敵人內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共產黨在全部農村工作中，應該主要注意到同這一階層作鬥爭，要把農村居民中佔大多數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從這些剝削者底思想和政治影響下解脫出來等等。

當城市無產階級勝利之後，這個階層方面的一切反抗形式，怠工和直接反革命的武裝發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開始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來準備必需的力量，以便徹底解除這個階層的武裝，除了推翻工業中的資本家以外，同時還要乘這

階層底反抗初一露頭的時候，便給它以最堅決最無情的殲滅打擊，爲了這點，就得武裝農村無產階級，並在鄉村中組織蘇維埃，其中決不能有一個剝削者，而且必須保證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在裏面佔着優勢地位。

但是，甚至剝奪大農都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底直接任務，因爲還沒有相當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也沒有社會條件來把這樣的農莊公有化。在個別的，大概是例外的情況下，要將他們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份或爲附近小農所特別需要的那部份加以沒收；此外還要保證小農在某種條件下，無代價地來使用大農底一部份農業機器等等。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應當保全大農自己的土地，祇有在他們反抗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政權的情形下，才實行沒收這些土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其中反大農的鬥爭由於許多特殊條件會顯現得複雜而又遷延）底經驗終究表明出，這一階層因極小的抵抗企圖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訓之後，也能於恭順地執行無產階級國家所給予的任務，並甚至開始來尊重——雖則非常緩慢，——這捍衛一切勞動者和無情對待寄生蟲富人的政權。

在俄國，當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進行反大農的鬥爭時，使這一鬥爭陷於複雜遲緩的那些特殊條件，主要是俄國革命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變革之後，經歷過全體農民反對地主的這『一般民主』的，即其基礎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鬥爭階段；其次是城市無產階級文化上和數量上的薄弱；末了便是區域遼濶以及交通極爲不便。既然在各先進國家中沒有這些阻滯條件，所以歐美無產階級應當更積極地準備着並更迅速、更堅決、更順利地貫徹鎮壓大農反抗的完全勝利，奪去他們可以進行反抗的任何可能。這是萬分必要的，因爲在尚未達到這種十二分完備的勝利之前，鄉村中的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不能相信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已是充分穩固了的。

(六) 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和無條件地沒收地主與大土地主底土地，這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就是那些直接或經過自己的法麥爾來有系統地剝削僱傭勞動力和四周小農（部份地也往往剝削中農）的人，他們不參加任何體力勞動，他們大半是屬於封建主（如俄國、德國、匈牙利的貴族，法國復辟了的領主，英國的貴族，美國先前的奴隸主）底後裔，或屬於特別豪富的財閥，或屬於這兩類剝削者和寄生蟲底混合種。

在共產黨隊伍中，決不容許宣傳或實行報償那些被剝奪了的大土地主的土地，因為在現代歐美各國條件下，這樣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就是對被剝削勞動羣衆施行新的貢稅，因為戰爭大大增加了百萬富翁的數量，使他們發了大財，而勞動羣衆所受的戰禍則最為深切。

至於說到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所沒收來的大土地主土地上之經營方式問題，那末在俄國，因為它經濟落後，主要是由農民來分受這些土地，祇有在相當稀罕的例外，才保留過所謂『蘇維埃農莊』，這些農莊由無產階級國家自力經營，並把那裏以前的僱傭工人變為執行國家委託的工作員和管理國家的蘇維埃委員。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說來，共產國際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保留大農業企業，並做倣俄國『蘇維埃農莊』的型式來經營這種企業，乃是正確的辦法。

但如果誇大或死板執行這一例規，而絕對不容許把從剝削者那裏剝奪來的一部分土地無代價地分給附近的小農，有時也分給中農，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一，人們常常藉口大農業在技術上佔優勢這一無可爭辯的理論真理來反對分配大田產，實際上不過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和背叛革命的主張。無產階級爲了這一革命底勝利，決不要害怕生產暫時低降的現象，猶之北美奴隸制底敵人資產階級未曾因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內戰結果所引起的棉花生產一時低落而裹足不前一樣。對

資產者說來，重要的是爲生產而生產，對無產者和被剝削民衆說來，最重要的是推翻剝削者，是保證勞動者確有爲自己工作而非爲資本家工作的條件。無產階級底首要與基本任務，便是保證無產階級之勝利及其穩固性。而如果不中立中農，如果沒有若非全體小農，至少也是極大部分小農底贊助，則無產階級政權便不能穩固。

第二，不僅提高農業中的大生產，甚至是保留農業中的大生產，都必須首先有充分開通的，富有革命覺悟，並在職業上、政治上真正受過有組織鍛鍊的農業無產者。凡是在還沒有具備這種條件或者還沒有可能把這一事業適當地委託給覺悟而又練達的工人的地方，如果企圖把大農莊急忙轉交國家經營，這種辦法只能破壞無產階級政權底威信，那裏在建立『蘇維埃農莊』時，必須萬分小心，必須有最縝密的準備工作。

第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還保留有大土地佔有者對附近小農所施行的中世紀式、半勞役式的剝削制殘餘，例如德國的 *Instleute*，法國的 *métayers*，美國的分成農（在美國南部，不僅黑人多半是受着這樣的剝削，但有時白種人也受這種剝削）。際此情況下，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把小農所承租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原來這些佃戶使用，因爲此外則沒有別的經濟技術基礎，並且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這種基礎。

大農莊的農具，應實行沒收，轉爲國家的公有物，但必須使國營大農莊有了這些農具的保證後，而附近小農在遵守無產階級國家所製訂的條件下可以無代價地來使用這種農具。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初期，不僅絕對必須立刻沒收大土地主底田產，而且絕對必須把他們這些反革命頭目和殘酷壓迫農民的人一律驅逐或加以拘禁；依無產階級政權不僅在城市而且在鄉村鞏固的程度，就必須有系統地努力做到使這階級中擁有寶貴經驗、知識和

組織才能的現有一切人力，都能利用來（由最可靠的工人共產黨員特別監督）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

（七）祇有當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最終壓倒了剝削者底一切反抗，保證了自己地位完全鞏固及政令能充分施行，而在大集體生產與最新（基於全部經濟電氣化）技術基礎上改組着全部工業的時候，則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底鞏固才可以說是有了保證。祇有這樣才會使城市能給落後的零散的鄉村以急進的技術幫助和社會幫助，藉此建立大大提高耕作中和一般農業中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基礎，根據實際例子，並且是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來喚醒小農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的，使用機器耕種的農業上去。這一爲全體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所公認而無可爭辯的理論真理，却在實際上被那統治着黃色第二國際的以及德國和英國『獨立黨人』、法國龍格派等等領袖們的機會主義所曲解。這種曲解就在於他們把注意力移轉到比較遙遠的，美妙的將來，而忽視了這種困難的具體過渡階段和進到這一將來去的最近任務。在實踐中這無非是鼓吹與資產階級妥協，鼓吹『社會和平』，即完全背叛無產階級，而這無產階級現時正在因戰爭所造成的到處空前破產貧困的條件下，正在因戰爭所引起的一小羣富豪空前發財與卑鄙無恥的條件下奮鬥着。

爲使農村中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真正能收到成效，第一，就要各國共產黨都能這樣教育工業無產階級，使他們自覺瞭解到推翻資產階級與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便必須忍受犧牲，並具有承擔此種犧牲的決心，因爲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善於組織並引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同時它這個先鋒隊有着爲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去表現最大犧牲精神與英勇氣概的本領；第二，就要農村中的勞動者和最受剝削的羣衆能從工人勝利方面，在損害剝削者利益的條件下，得以立刻並大大改善本身生活地位，因爲不如此，就不能保

障農村來贊助工業無產階級，而工業無產階級也就無從找到糧食來供給各城市。

(八) 因為在資本主義把農業中勞動羣衆陷入異常疾苦，零星散漫，往往是受着半中世紀制束縛等條件下，組織與教育這些勞動羣衆去參加革命鬥爭一事具有極大的困難，所以各國共產黨必須特別注意農村中的罷工鬥爭，並加緊援助和從各方面去開展農業無產者及半無產者底羣衆罷工運動。由現在德國和其他先進國經驗所證實與擴大的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表明祇有日益開展着的羣衆罷工鬥爭（在某種條件下，農村中的小農也能夠而且應當被吸引到這鬥爭中來）才能打破鄉村內的沉眠狀態，才能喚醒鄉村被剝削羣衆底階級覺悟以及必須有階級組織的覺悟，才能在他們面前明顯地實際地暴露出他們與城市工人聯盟的意義。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斥責這班可惜不僅出現於黃色第二國際，而且出現於退出這國際的歐洲三個特別重要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是叛徒，是變節者，他們不獨巧於對農村罷工鬥爭採取冷淡態度，並藉口有減低消費品生產的危險而公開反對這種罷工鬥爭（例如考茨基）。假若在實踐上沒有實際證明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善於把發展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看得高於一切，善於爲着這一革命去擔負最艱鉅的犧牲，那末任何綱領，任何冠冕堂皇的聲明，都是一錢不值的，因為要避免飢餓、破產和新的帝國主義大戰，此外則別無出路。

尤其要指出，那班現時爲了保存自己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羣衆中的威信而常常在口頭上向共產主義讓步，或甚至在名義上轉到共產主義這方面來的舊社會主義底領袖與『工人貴族』代表們，正要在革命意識與革命鬥爭發展得最厲害，土地主與資產階級（大農，富農）反抗得最殘酷，社會黨妥協派與共產主義革命家之間區分得最清楚的地方，正要在這裏的工作中受到考驗，證明他們是否忠實於無產階級底事業以及能否擔任負責的職務。

(九) 共產黨應當用一切力量儘快地在鄉村中去建立代表蘇維埃，首先是建立僱傭工人和半無產者的代表蘇維埃。祇有與羣衆罷工鬥爭及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聯繫着，蘇維埃才能執行自己的使命，才能鞏固，而使小農受着自己的影響（然後把他們吸收進來）。但如果因爲土地主與大農方面的繁重剝削，又因爲沒有工業工人及其工會方面的援助，以致罷工鬥爭還不發展，農業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力還嫌薄弱，那末，成立鄉村代表蘇維埃就需要有長期的準備，其方法是建立甚至是不大的共產黨支部，加緊鼓動工作，最通俗地來說明共產主義底要求，根據最顯著的剝削與壓迫實例來解釋這些要求，有系統地派工業工人到鄉村中去等等。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六六至二七八頁。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來，關於一般平等（其中也有民族平等）問題之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乃是這一民主制所特有的現象。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示有產者與無產者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在形式上或法權上的平等，藉此來極端欺騙被壓迫階級。資產階級藉口彷彿個人絕對平等，而把本身上就是反映商品生產關係的平等思想，變爲反對消滅階級的一種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思也就祇是要求消滅階級。

(二)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枷鎖而鬥爭底自覺的代表者，它根據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並揭破其荒誕和偽善性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也不應當提出抽象的與形式上的原則，而是應當：第一，精確估計到具體歷史環境，首先是經濟環境；第二，把被壓迫階級和被剝削勞動者底利益，從一般人民利益的概念，即表現統治階級利益的普泛概念中，明確區分開來；第三，同樣將被壓迫的、依賴的、不平權的民族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全權的民族區分清楚，而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對立起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正是蒙蔽着財政資本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有現象，即由寥寥無幾的最富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地球上極大多數人口所施行的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的事實。

(三)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在所有一切民族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面前，特別顯著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辭句

底虛偽性，事實上表明出標榜爲『西方民主』的凡爾賽和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凱撒底布列斯特和約更加野蠻，更加下賤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強暴力量。國際聯盟以及協約國戰後全部政策把這一真理揭露得更加明顯，更加激厲，並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及依賴國一切勞動羣衆底革命鬥爭，而使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處和一律平等的這種市儈民族幻想加速破產。

(四) 從上述基本原理中就得出如下的結論：共產國際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上的主要政策，應當是使一切民族和各國無產者與勞動羣衆接近起來，進行共同的革命鬥爭去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因爲祇有這樣接近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若沒有此種勝利，便不能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權現象。

(五) 現今世界政治形勢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到了日程上面，而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環繞在一個中心點：即環繞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鬥爭底周圍，而蘇維埃俄國却必然一方面團結着各國先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着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底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民族根據自身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戰勝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外，他們則別無救亡之策。

(六) 所以現時不能局限於空口承認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勞動羣衆互相接近，而必須進行這樣的政策，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之與蘇維埃俄國間的緊密聯盟得以實現，根據各個國家無產階級中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根據落後國家或落後民族中工人和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來確定這一聯盟底形式。

(七) 聯邦制是進到各民族勞動者之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

現在的阿捷爾拜疆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中，以及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與原先既沒有國家生存權又沒有自治權的各民族（例如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一九二〇年建立的韃靼共和國）的關係中，聯邦制已在實踐上表現了自己的適當性。

（八）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用經驗來檢查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地上所發生着的這些新的聯邦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就必須力求達到由聯邦進到更加緊密的聯盟，因為，第一，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最緊密的聯盟，便無法捍衛住被軍力方面雄強得無比的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必須有各蘇維埃共和國之密切的經濟聯盟，否則便無法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及保證勞動者的福利；第三，要估計到按各國無產階級所調整的總計劃，建立統一的整個的全世界經濟體系的趨向，這種趨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充分顯然地表現出來，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則是無條件地會繼續發展和臻於完善的。

（九）在國家內部關係方面，共產國際底民族政策，決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樣，只限於空洞地、形式地、純粹宣言式地、實際上是毫無所謂地承認民族平權，這班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管他們是公開自命的民主派，抑或藉社會主義者名稱掩飾的第二國際底社會黨人，都是一樣。

不僅在共產黨底全部宣傳鼓動工作，即國會講壇上與國會講壇外的宣傳鼓動工作中，都應當不屈不撓地揭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違背其『民主』憲法，而經常破壞民族平權，破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種種事實，但同時第一，必須經常解釋，說明蘇維埃制度在反資產階級鬥爭中始而把無產者繼而把全體勞動羣衆聯合起來，祇有它才能在事實上給予各民族以平等權利；第二，各國共產黨必須

直接幫助各依賴國或不平權民族（例如在愛爾蘭，在美洲黑人中等等）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沒有最後這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則反對壓迫依賴國和殖民地的鬥爭以及承認他們有國家分立權等都仍然是一種假招牌，正如我們從第二國際黨那裏所見到的一樣。

（一〇）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在全部宣傳、鼓動和實際工作中，却以市儈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來代替了國際主義，這不僅是在屬於第二國際的各政黨中，而且是在退出了這個國際的各政黨中，甚至往往是在現時自命為共產主義的政黨中最通常的現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由民族性的（即存在於一個國家之內，還不能左右全世界政治的）專政轉變為國際性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的，能夠對全世界政治起決定作用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任務愈迫切，則同頑固成性的小資產階級民族成見這種禍害作鬥爭，就愈加重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宣稱祇要承認民族平權就算是國際主義，同時却保留着（更不待說這種承認是純粹口頭上的）民族利己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求：第一，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應當服從於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正在實現戰勝資產階級的這個民族，要能夠並有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担負最巨大的民族犧牲。

因此，在已經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真正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工人政黨的國家中，第一等重大任務就是要與曲解國際主義及其政策的機會主義和市儈和平主義作鬥爭。

（一一）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及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中，應特別注意以下各點：

第一，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首先是該落後民族在殖民地關係或財政關係上所依賴的那個國家內的工人，應該負最積極幫助的責任；

第二，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教徒及其他中世紀式的反動份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其國王、地主、阿洪等地位的汎回教主義及其他此類流派作鬥爭；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地主、反大土地佔有制、反各種封建表現或封建殘餘的農民運動，極力使農民運動帶有最大的革命性，並實現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及一般落後國家內農民革命運動間之儘量緊密的聯盟；

第五，必須堅決進行鬥爭，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色彩；共產國際祇是在這種條件下，即當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這些將來無產階級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底份子，能夠覺悟到自己與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特別任務，而從此組織起來並受到鍛鍊的時候，才應當援助該國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該去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底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決不要同他們融成一片，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無條件地要保持這一運動底獨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國家內，特別是向落後國家內的最廣大勞動羣衆不屈不撓地說明並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政策，它們建立政治上表面是獨立的國家，却泡製着經濟上、財政上、軍事上都完全依賴於自己的那種國家；在現代國際形勢下，除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依賴國和弱小民族則別無救亡之策。

（一二）帝國主義列強歷來加於殖民地與弱小民族的壓迫，引起被壓迫國家勞動羣衆對一般壓迫民族，同時也對這些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僅表示憎惡，而且表示不信任。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當這一無產階級底大多數正式領袖們按社會沙文主義精神，藉口『保護祖國』而來掩蓋其保護『本國』資產階級之壓迫殖民地和掠奪財政上

依賴國的「權利」時，以致他們這種卑鄙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爲，曾不能不加強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愈是落後，則這國家內的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成見，如民族利己主義及民族狹隘性特別加強和穩固起來。既然這些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逝之後，只有落後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激劇改變之後才能泯滅，那末這些成見要消亡下去，就不能不是很緩慢的。所以，各國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對於遭受壓迫極久的國家和民族內的民族感覺殘餘，要特別慎重，特別注意，同樣，爲了更迅速地消除以上所說的不信任心理與種種成見，還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方面以及全體勞動羣衆方面之自願力謀聯盟與統一的願望，則戰勝資本主義這一事業便不能順利完成。

尼、列寧。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五至二九〇頁。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於八月七日閉幕了。自從共產國際成立以來祇有一年多的時日，但在這短促期間內，已經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巨大成就。

一年前，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祇是樹起了共產主義底旗幟，在這旗幟下面，本來還要把革命無產階級底力量聚集起來；曾經向第二國際，即黃色國際宣了戰，這個國際將那些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並與資本家結成聯盟來敵抗工人革命的社會黨叛徒，都聯合到自己隊伍裏去了。

工人羣衆中對共產主義同情心底增長，迫使第二國際內最主要的歐美政黨：如法國社會黨，德國和英國的『獨立』黨，美國獨立黨，都退出了第二國際，單就這一事實看來，也可顯見這一年來該達到了如何巨大的成就。

全世界各國革命工人底優秀份子已經站到了共產主義這方面，擁護蘇維埃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歐美各先進國內，已經有了共產黨或人數衆多的共產主義集團。在八月七日閉幕的代表大會上，不僅團結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倡導者，而且還團結了與無產者羣衆聯繫着的各堅強雄大組織底代表。這也就是現在擁護共產主義的

革命無產階級底國際軍，也就是這國際軍在這次剛閉幕的代表大會上形成了自己的組織和獲得了明確周詳的行動綱領。

代表大會拒絕了立刻將至今還把『孟什維主義』、社會主義變節行爲、機會主義等的權威代表者保留在自己隊伍中的政黨，如像上述那些已退出第二國際，即黃色國際的政黨，接受到共產國際隊伍裏來。

代表大會在充分確定的諸決議案中否斥了向機會主義開放任何門徑，要求無條件地同機會主義分裂。在代表大會上宣佈的各種毋庸置疑的材料也表明了，工人羣衆是擁護我們的，而機會主義者定會被澈底戰勝。

代表大會糾正了某些國家中那班絕對希望『向左走去』的共產黨員所犯的錯誤，他們否認必須在資產階級國會內，在反動職工會中工作，在一切凡是有仍被資本家及由工人出身的資本家奴僕，也就是黃色第二國際代表人物所愚弄着的成百萬工人的地方工作。

代表大會建立了全世界共產黨的空前未有的團結精神和紀律，這種精神和紀律使工人革命底先鋒隊能夠大步邁進，去達到自己的偉大目的，即推翻資本主義的枷鎖。

因爲有同時舉行的國際女工代表大會，所以代表大會也能鞏固與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聯繫。

各強盜民族底『文明』聯盟所如此野蠻劫掠、征服和奴役的東方殖民地及落後國底共產主義集團與共產黨，也同樣派來了代表出席大會。假如在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中，不同時把遭受這些資本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充分地和最密切地聯合一起，那末，先進國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就不過是一種騙局。

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戰勝了地主與資本家，戰勝了尤登尼奇輩，高爾察克輩，鄧尼金輩，波蘭白匪以及他們的兇幫——法英美日諸國，這些軍事勝利是很偉大的。

可是我們奪取工人、勞動者、受資本壓迫羣衆底意識與心靈的勝利，即全世界上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勝利，還要更加偉大。

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枷鎖，這一事業正在實現着，而且在全世界各國內都定會實現的。

尼、列寧。

一九二〇年刊載於女共產黨員雜誌八
九兩月第三、四兩期合刊上。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第二十五卷，
第三七〇至三七一頁。

青年團底任務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國共產主義
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想來談談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基本任務是什麼，以及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一般青年組織應當是怎樣一種組織的問題。

其所以特別要講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真正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正是要由青年來擔負。須知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培養出來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滅建築在剝削上面的舊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他們至多也只能建立一種新社會制度來幫助無產階級與各勞動階級保持自己的政權並奠下堅固的基礎，至於在這個基礎上來實行建設，就只有靠已經是在新條件下，即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已不存在的環境中從事工作的一代人去擔負。

所以，從這個觀點上來觀察青年底任務問題時，我應當說，一般青年底任務，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一切組織底任務，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要學習。

當然，這僅僅是『一句話』。這句話還沒有答覆主要和最重要的問題——學習什麼和怎樣學習？可是全部關鍵就在於從改造舊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起，那些將擔負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新代人底學

習、訓練和教育，也就決不能是舊時那樣的了。青年底學習、訓練和教育應當是把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材料作為出發點。

只有從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知識、組織和機關底總和出發，並利用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人力與資材，我們才能來建設共產主義。只有把訓練青年、組織青年和教育青年的事業根本改造，我們才能使這代青年努力的成果得以建立起一個與舊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

因此，我們必須詳細講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教青年學習什麼，真正想不愧為共產主義青年的青年應當怎樣學習，以及我們應當如何來培養青年，使他們能夠澈底完成我們所已經開始了的事業。

對於這個問題，看來首先而且極自然地應當這樣來回答說：青年團以及所有一般想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但『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回答還未免太寬泛。爲了學會共產主義，我們究竟需要什麼呢？爲了求得共產主義知識，我們究竟應從一般知識總和中挑選出哪些東西來呢？這裏我們可能遇到許多危險，而這種危險往往當人們把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或者對這任務理解得太片面時，就會馬上呈現出來的。

驟然看來，總不免以爲學習共產主義便是領會共產主義教科書、小冊子和著作裏的一切知識。但把研究共產主義的任務說成這樣，未免太粗笨，太不充分了。

如果說，研究共產主義只限於通曉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末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是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因爲這種人雖把共產主義書本上的東西都讀得爛熟，却不善於將這一切知識融會貫通，也不會按共產主義的真正要求去實際行動。

舊時資本主義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實踐完全隔離，因為我們有過的那些書裏，雖把一切都描寫得再好沒有了，那知它們大半是些極可惡的謊言謬語，虛假地向我們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的情景。所以單從書本上來通曉論述共產主義的書籍裏所說到的東西，便會是極不正確的。

現時在我們的言論與文章中，已經不是簡單重複以前關於共產主義所說的那些話，因為我們的言論和文章都是與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聯繫着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那末單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上的共產主義知識，可以說是一文錢不值，因為這種知識仍舊會是把資本主義舊社會中最可惡的特徵，即理論與實踐隔離的現象保持下去。

假如我們祇求通曉共產主義的口號，那就更加危險了。我們若不及時認清這種危險，若不用全力去消除這種危險，那末，有五十萬或一百萬青年男女這樣學習過共產主義之後便自稱為共產主義者，這一事實就只會使共產主義事業遭到莫大的損害。

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爲了學習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把這一切結合起來呢？從舊時學校，舊的科學中，我們應當採取一些什麼呢？

舊時學校總說它是要培養出通曉各種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為當時整個社會都是建築和支持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壓迫者的基礎之上。自然，舊時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學校，祇能使資產階級底兒女獲得知識。這種學校裏的每一句話，都無非是根據資產階級利益捏造出來的。

在這樣的學校裏，工農青年所受到的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爲迎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爲資產階級造成適用的奴僕，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擾主

人的安寧與閒逸。所以我們反對舊時的學校，而祇從這種學校中採取我們爲了實行真正共產主義教育所必需的東西。

這裏，我就要講到人們常常用來斥責與非難舊時學校的說法，這種說法往往作出完全不正確的結論。

人們說，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學校。這是對的，但是總還要把舊時學校中壞的東西與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區別開來，應該善於從舊學校中挑選出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並把他們變成一些依法泡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無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爲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爲無須領會共產主義學說本身所由產生的全部知識，而祇要通曉共產主義口號，祇要通曉共產主義科學底結論就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便是共產主義從人類知識總和中產生出來的標本。

你們讀過和聽說過，主要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科學，即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位固然是天才社會主義者底紙上著作，這一學說已經成了全世界千百萬無產者底學說，千百萬無產者已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運用着這個學說。

如果你們要問：爲什麼馬克思底學說能夠掌握這最革命階級中千百萬人的心靈，那你們祇能得到一個回答：這是因爲馬克思憑藉了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獲得的那些知識底堅固基礎；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便瞭解到資本主義底發展必然會引向到共產主義，而且主要的，是他只依據於對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確切、最縝密和最深刻的研究，藉助於充分領會以往科學上所貢獻的全部知識，才證實了這個結論。

凡人類社會所創造出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態度來審查過，任何事物也沒有忽略過去。凡人類思想所建樹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並根據工人運動的實踐來一一檢驗過，於是就作出了那些為資產階級狹隘性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例如，當我們說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到這點。若不清楚瞭解到，祇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祇有改造這種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若不瞭解這點，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任務。

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底必然結果。

所有這一切大途小徑，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通向於無產階級文化，猶之馬克思所改造了的政治經濟學向我們指明了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指明了進到階級鬥爭，進到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

當我們聽到有些青年代表者以及某些擁護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攻擊舊時學校，說它是呆讀死記的學校時，我們便回答說，我們應當採取舊時學校中那些優良有用的東西。

我們決不能採取舊時學校裏那種用十分之九無用，十分之一被曲解了的累贅知識來充塞青年頭腦的辦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祇可限於學得共產主義的結論，祇可以去背誦共產主義的口號。須知這樣做去，是建立不了共產主義的。祇有用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寶藏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時，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呆讀死記，但是我們一定要使每個學習者用基本事實底知識來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思考力，因為如果不把所學得的全部知識加以融匯貫通，那共產主義也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變成一

塊空招牌，那共產主義者也就祇會是吹牛家。你們不僅應當通曉你們所學得的知識，並且要用批判態度來領會這些知識，使得自己腦子裏，不是被一堆無用的垃圾充塞着，而是爲現代每個有學識的人所必備的一切實際知識所豐富着。

假如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根據自己所學得的現成結論，却不用一番極認真，極艱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所必須用批判態度來對待的實際事物，便想用共產主義這字眼來妄自矜誇，那末，這樣的共產主義者是很可悲的。這樣一種走馬看花一知半解的態度，是極端有害的。明知我自己懂得的太少，那我就定要使自己懂得的更多，但若有人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同時又認爲自己根本就無須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

舊時學校所培養出來的是資本家所必需的奴僕，舊時學校把科學人材訓練成爲適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破壞這樣的學校，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從這種學校裏採取人類所積聚起來，而爲人們所必需的一切呢？

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善於去區別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東西與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呢？

我們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內違反大多數人意志所施行的舊的強迫紀律，採用工人和農民底自覺紀律，這些工農份子不但能仇視舊社會，而且具有團結和組織自己力量去進行鬥爭的毅力、本領和決心，以便把這分離渙散在遼濶國度內千百萬民衆底意志，統一成爲一個意志，因爲沒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是必然會遭到潰敗的。沒有這樣的團結，沒有工農這種自覺紀律，我們的事業便毫無希望。不具備這些條件，我們便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我們就會甚至連基地也不能鞏固，更談不到要在這個基地上來建成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同樣，我們雖反對舊時學校，對舊時學校懷着完全正常與必要的仇視心理，重視那種毀壞舊學校的決心，但我們却應當瞭解到，廢除舊時崇尚書本、強迫紀律、呆讀死記的方式時，我們必須善於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使我們這裏的共產主義不會是什麼生存活剝的東西，而是經你們自己深思熟慮過的東西，是從現代知識上看來必不可免的結論。

這就是當我們說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時所應當提出的基本任務。

爲要向你們說明這點，同時講到怎樣學習的問題，就讓我來舉出一個實際例子。你們都知道，緊接着軍事任務，即保衛共和國任務之後，立刻就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經濟的任務。

我們知道，如果不復興工業和農業，並且還不是按舊方式來復興工業和農業，那末共產主義社會是建設不成功的。必須在現代最新科學基礎上，來復興工業和農業。你們知道，這樣的基礎就是電氣化，祇有當全國電氣化，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都電氣化的時候，祇有當你們真正担负起這個任務的時候，你們才能替自己建成老年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產主義社會。

你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在經濟上復興全國，就是要在基於現代科學和技術、基於電氣的現代技術基礎上，來改造和恢復農業與工業。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電氣化事業中，不識字的人是沒有用處的，而且僅僅是識字還不夠。這裏祇懂得什麼是電氣還不夠；應該懂得，怎樣在技術上把電氣應用到工業，農業以及工農業的各個部門中去。每個人必須學會這點，必須教導整個勞動青年後輩都學會這點。

這就是一切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底任務，也就是每個自認爲是共產主義者，深知自己一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就負起了幫助黨建設

共產主義，幫助整個青年後輩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責任的青年人底任務。他必須認清，祇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他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通曉這種知識，那共產主義就始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

老年一代人底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那時，主要任務是批評資產階級，發展羣衆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心，提高階級意識，善於團結本階級的力量。

新起一代人底任務，却就更加複雜了。你們不祇是應當團聚自己的一切力量來援助工農政權擊退資本家的侵犯。這點你們應當做到。這點你們懂得很清楚，這點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明確了解。但是這還不夠。

你們應當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前一半工作在許多方面已經作成了。舊的東西已經像應份被破壞的那樣被破壞了，它已經像應份變成廢墟的那樣變成廢墟了。地基業已清除好了，共產主義青年後輩底任務，也就是應當在這塊地基上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任務，你們祇有通曉了一切現代知識，善於把共產主義從背得爛熟的現成公式、意見、方案、章程和綱領變成爲包括有你們直接工作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成爲你們實際工作的南針，那時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這就是你們在教育、訓練和啓發全體青年的事業中所應當奉行的任務。一切男女青年都應該成爲共產主義社會底建設者，而你們就應當是千百萬青年中的第一批建設人。

不吸收全體工農青年來參加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你們就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這裏我自然要講到這樣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我們的方法應該有什麼特點。

我在這裏首先要講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你們應當把自己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青年團底任務，便是要這樣來進行自己的實際活動，使這些青年一面從事學習、組織、團結和鬥爭，同時就把自己以及所有一切將其認作是領袖的人，都培養成爲共產主義者。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養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爲在青年中養成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

但是，究竟有沒有共產主義道德呢？有沒有共產主義德性呢？當然是有的。人們往往硬說我們沒有自己的道德；資產階級特別常常責備我們，說我們共產黨人摒棄一切道德。這無非是淆亂視聽，蒙蔽工農耳目的一種手段而已。

究竟在什麼意思上我們摒棄道德，否認德性呢？

是在資產階級所宣傳的道德這意思上，因爲他們是從上帝意旨中引伸出這種道德來的。關於這點，我們當然說我們不信仰上帝，並且我們明明知道，僧侶、地主和資產階級都是假借上帝名義說話，爲的是要來貫徹他們這些剝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從德性趣旨中，不是從上帝意旨中，而是從唯心主義或半唯心主義論調中引伸出這一道德來，但這種論調始終是與上帝意旨很相類似的東西。

我們摒棄一切從超人類和超階級的概念中援引出來的德性。我們說，這是欺騙，這是爲了地主資本家利益來愚弄和禁錮工農頭腦的伎倆。

我們說，我們的德性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我們的德性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中引伸出來的。

舊社會是建築在地主資本家壓迫全體工農的基礎上面。我們本來應當毀壞這個社會，本來應該打倒這些壓迫者，但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建立一種聯合。上帝決創造不了這種聯合。

這種聯合，祇有工廠，祇有受過訓練而從舊日沉眠狀態中醒覺了的無產階級，才能建立起來。祇有當這個階級已經形成的時候，才有羣衆運動開始起來，這種運動已造成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情

形，即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最弱的國家中已獲得的勝利，這個國家爲捍衛自己而擊退全世界資產階級底逼攻，業已有三年了。

同時我們看見，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上日益增長着。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實際經驗來說，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創造這樣一種堅強團結的力量，既引導零星散漫的農民前進，並且在抗拒剝削者底各次逼攻中支持下來了。祇有這個階級才能幫助勞動大衆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並澈底捍衛和澈底鞏固共產主義社會，把共產主義社會最終建成。

所以我們說：在我們看來，超人類社會的德性是沒有的；這是一種欺騙。在我們看來，德性應該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

這種階級鬥爭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資本家，消滅資本家階級。

階級一般說來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說社會上一部份人佔有另一部份人底勞動。

如果社會上一部份人佔有全部土地，那就是說有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份人擁有工廠，擁有股票和資本，而另一部份人却在這些工廠內作工，那就是說有了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

趕走沙皇，本來就不困難——這總共只花費過幾天工夫。趕走地主也不很困難，這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趕走資本家同樣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消滅階級，那就困難得不可比擬了；工人和農民的區分總還存在着。如果一個農民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擁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餘糧食，而其餘的一切人却沒有糧食可吃，那末，這個農民也就變成爲剝削者了。他所剩餘的糧食愈多，他能獲得的利益就愈大，讓其餘的人去挨餓吧：『他們愈飢餓，我這糧食就能賣得愈貴』。

應該使所有的人都按照公共計劃和公共規則，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廠中工作。這點容易做到麼？你們知道，要做到這點，決不能像趕走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這裏需要無產階級去重新訓練重新教育一部份農民，將勞動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以便把那些富裕的和專靠別人貧困而發財致富的農民底反抗消滅下去。

可見，推翻了沙皇，趕走了地主與資本家，無產階級鬥爭底任務並沒有因之完結，而我們所稱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制度，也就是要來完成這一任務。

階級鬥爭還在繼續着；它不過只改變了自己的形式。這是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其目的就是要使舊的剝削者再不能翻身，使散漫落後的農民羣衆統一成爲一個聯盟。階級鬥爭在繼續着，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這個鬥爭。

所以我們也就要使我們的共產主義道德服從於這一任務。我們說：道德就是用來破壞舊時剝削者社會，並把全體勞動大衆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工具。

共產主義的道德，也就是爲聯合勞動者去反對一切剝削制，反對一切小私有制的這一鬥爭服務的，因爲小私有制把全社會勞動所創造出的東西都交給一部份人的手中。

我國的土地已經是公共的財產。

但是，假如我從這公共財產中拿來一塊土地，種上超過我所需要一倍的糧食，然後把這種餘糧用來投機漁利，那又怎樣呢？假如我這樣來打算：餓肚子的人愈多，那我出賣糧食的價錢就愈高，那又怎樣呢？難道我這是共產主義者的行爲麼？

決不是的，這是剝削者的行爲，這是私有者的行爲。應該同這種行爲作鬥爭。

如果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那一切都會向後倒退，回復到資本家政權，回復到資產階級政權去，如像過去一些革命中所常有過的

情形一樣。爲了使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再復活，就要禁止投機買賣，就要使個別人不能用損人利己的手段來發財致富，就要使全體勞動者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這也就是共產青年團和共產青年組織基本任務底主要特徵。

舊社會所倚據的原則：不是你去掠奪別人，便是別人來掠奪你；不是你替別人作工，便是別人替你作工；你或是當一個奴隸主，或是當一個奴隸。顯然，凡是在這個社會裏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從吃奶的時候就染上了這樣一種心理，習慣和觀點——不是當奴隸主，就是當奴隸，或者是當一個小私有者，小職員，小官僚，知識份子，總之是當一個只關心自己而不顧及旁人的人。

既然我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翁，旁人的事與我全不相干；如果旁人挨餓，那就更好，我可按更高的價錢出賣我的糧食。既然我有了一個醫生、工程師、教員或職員的小職位，那末，旁人的事也就與我完全無關了。也許，只要我獻媚取悅於有財有勢的人，我就不僅能保住我的這個位置，並且還可以高昇到資產者的地位上去哩。這樣的心理和情緒，是共產主義者所不應該有的。

當工人和農民已經證明我們能於用本身力量來捍衛自己並創造新社會的時候，也就開始了新的共產主義教育，即在同剝削者作鬥爭中受到的教育，在聯合無產階級反對利己主義者和小私有者，反對那認爲「我的目的祇在謀利，其他一切與我無關」的心理和習慣的鬥爭中受到的教育。

這就是對於青年後輩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問題的回答。

青年們祇有把自己學習、教育與訓練中的每一步驟同無產者勞動者反對舊的剝削者社會所不斷進行的鬥爭聯繫起來，才能學習共產主義。

當人們向我們講到道德的時候，我們回答說：對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道德都包括在這種堅固團結的紀律和反對剝削者的自覺羣

乘鬥爭中。我們不相信永恆不變的道德，並且要揭破一切關於道德的騙人鬼話。

道德就是要幫助人類社會昇到更高的水準，使人類社會擺脫勞動剝削制。

爲了實現這個任務，就需要有在同資產階級作有紀律的殘酷鬥爭環境中，開始變成爲自覺人物的一代青年。他們只有在這一鬥爭中，才會教育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應當使自己學習、教育和訓練的每一步驟都服從於這一鬥爭，都與這一鬥爭聯繫起來。

教育共產主義青年，決不是向他們講授關於道德的各種甘言和條規。教育的主旨並不在這裏。

當人們看見他們的父母怎樣在地主資本家壓迫下生活的時候，當人們親自也受到那些發動反剝削者鬥爭的人所受到的痛苦的時候，當人們看見爲了保持已經爭得的成果而繼續奮鬥是要經受怎樣大的犧牲，看見地主資本家都是如何兇暴的敵人的時候，——那時他們就會在這種環境中訓練成爲共產主義者。

鞏固與完成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是共產主義道德底基礎。這也就是共產主義教育、訓練與學習的基礎。這也就是對於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的回答。

如果學習、教育和訓練只局限於學校以內，而與蓬勃的實際生活脫離，這樣的教育方式我們是不會相信的。工農一天還處在地主與資本家底壓迫之下，學校一天還操縱在地主資本家手裏，那末青年人始終還會是愚昧無知的。

但是我們的學校却應當使青年獲得基本知識，使他們具有獨立養成共產主義觀點的本領，應該把他們培養成爲有學識的人。我們的學校必須使人們在學習期內便能成爲參加推翻剝削者鬥爭的人。

共產主義青年團，祇有當它能把自已學習、教育、訓練的每一步驟都與參加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總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才

配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你們很清楚地知道，俄國暫時還是個唯一的工人共和國，其餘整個世界上還存在着舊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仍然是比它們弱些，我們隨時都有遭到新的進攻的危險；祇有我們學會團結一致時，我們才能在今後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而當我們業已鞏固之後，那我們才會成爲真正無敵的力量。

因此，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就是要把全體青年都組織和團結起來，要在這個鬥爭中作出受教育與守紀律的榜樣。那時你們才能開始並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大廈的事業。

爲了使大家都能更清楚地了解這點，我來向你們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我們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者呢？

「共產主義者」是拉丁語源的名詞。「共產主義者」一語是導源於「公共」一字。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說：土地和工廠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勞動，——這就是共產主義。

如果每人都在單獨一塊土地上經營自己的業務，那末，勞動能否成爲公共的呢？公共勞動不是一下子就能造成的。公共勞動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需要努力，吃苦，創造，而且是要在鬥爭進程中造成的。這裏，不能憑靠舊的書本，書本是誰也不會相信的。這裏要憑靠自身的生活經驗。

當高爾察克從西伯利亞，鄧尼金從南方進攻時，農民是站在他們那方面的。當時他們不歡迎布爾什維主義，因爲布爾什維克按固定價格收買糧食。但當農民在西伯利亞與烏克蘭嘗試過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政權的味道之後，他們才認清了，農民祇有這樣兩條絕路：或者走到資本家方面去，那時資本家就要你去當地主的奴隸；或者就來跟着工人走，工人雖不約許給你什麼天堂生活，並且還要你在艱苦鬥爭中，遵守鐵的紀律和表現堅強意志，可是它能使你從資本家地主的奴役中解脫出來。

當那些甚至黑暗無知的農民也根據自身經驗懂得和認識了這點的時候，那他們便成爲自覺的，經過嚴酷鍛鍊的共產主義擁護者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就應當把這種經驗作爲自己全部活動底基礎。

我回答過了我們應當學習什麼，我們應從舊學校和舊科學中採取一些什麼的問題。現在我還想來回答應當怎樣學習的問題，我的回答是：祇有把校內活動的每一步驟，把教育、訓練和學習的每一步驟，與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學習這些東西。

我要從某些青年組織底工作經驗中舉出幾個例子，向你們具體說明，應該怎樣進行這種共產主義教育。

大家都在說掃除文盲。你們知道，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單靠蘇維埃政權頒佈一道命令，或者由黨發出一定的口號，或者派一部份優秀工作人員去進行這種工作，是不夠的。還需要這代青年人自己把這一工作担負起來。

共產主義就是要男女青年團員親自說出：這是我們的事情，我們要聯合一起到鄉村中去掃除文盲，使我們這代青年中沒有一個不識字的人。我們力求使青年們能把自己的自動精神用來進行這一事業。

你們知道，要很快就把俄國從一個不開化不識字的國家變成人人都識字的國家，是辦不到的；但如果青年團員負責來進行這一工作，如果全體青年都爲公共福利而努力工作，那時這包含有四十萬青年男女的組織，便有權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了。同時，青年團員底任務，是還要通曉某種知識，好來幫助那些不能自力從黑暗無知中解脫出來的青年。

做一個青年團員，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 and 能力用去爲公共事業服務。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的實質。祇有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青

年男女才能培養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祇有當他們能在這種工作中收到實際效果時，他們才會變成爲共產主義者。

就拿城郊菜園工作來做例子吧。這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之一。人民在忍飢受餓，工廠裏在鬧飢荒。爲要免除飢餓，應該發展菜園業，但耕作還在按照舊方法進行。

所以必須有更覺悟的份子來擔任這件事情，那時你們就會看見，菜園業務會擴大，菜園面積會增加，結果定會好轉起來。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踴躍參加這件事情。每個青年團組織，每個青年團支部，都必須把這看成是自己切身的的事情。

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是在一切工作中都能出力幫助，都表現出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的突擊隊。青年團應當成爲這樣一個團體，使得任何工人都感覺到，這團體中人們底學說，也許還是他所不懂得，也許他還不會一下子就相信，但從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活動上，他却看出他們是真正能向他指明正確道路的人。

假如共產主義青年團不能在各方面這樣來建立自己的工作，那它就會迷失到資產階級的舊道路上去。

我們的教育應當與勞動大衆反對剝削者的鬥爭結合起來，爲的是要幫助勞動大衆來解決從共產主義學說中產生出來的任務。

每個青年團員都應當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閒時間去改善菜園業，或在某個工廠裏去組織青年學習等等。

我們要把俄國從窮困貧瘠的國家，變成爲一個富裕的國家。所以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把自己的訓練，自己的學習，自己的教育與工農底勞動結合起來，不要關閉在自己的學校內，不要祇限於閱讀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子。

祇有在勞動中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才能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必須使大家都看到，青年團員個個都是有知識的，同時又都是善於勞動的。當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已經廢除了舊學校裏的舊的強迫紀律，實行了自覺的紀律，看見全體青年去參加義務星期六，看見他們利用每個近郊菜園來幫助居民，——那時人民就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待勞動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便是要在農村中或在自己街坊裏來實行幫助如像——我舉出這樣一個小例子，——保證清潔或分配食品一類的事情。

在舊時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些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當時每個人祇替自己工作，誰也不去注意那裏是否有老人或病人；或者是全部家務都落在婦女肩上，因而婦女也就處在被抑壓和被奴役的地位。誰應當來反對這種現象呢？青年團。青年團應當出來說：我們來把這件事情改作好，我們組織些青年隊去幫助厲行清潔或分配食品，有系統地去挨戶檢查，有組織地來為全社會公益事情服務，正確地分配力量，並表明出勞動應該是有組織的勞動。

現在已到五十歲內外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能看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因為那時，他們都會死去了。

至於現在還祇有十四五歲的這一代人，他們既可以看見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

所以他們就應當知道，他們畢生的唯一任務便是建設這個社會。

在舊社會中，是各個家庭單獨勞動，除了壓迫民衆的地主與資本家外，誰也沒有把勞動結合起來。任何一種勞動，不管它怎樣髒污，怎樣困難，我們都應當把它好好組織起來，使每個工人和農民都會對自己說：我是偉大自由勞動軍中的一份子，我能不要資本家和地主，來親自建設自己的生活，我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秩序。

必須使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自覺的有紀律的勞動中，教育所有一切從十二歲起的青年。

這樣我們才能指望現在所提出的任務，定會得到解決。

我們應該估計到，要把全國電氣化，使我國的貧瘠土地能用最新技術來經營，那至少要花十年工夫。

所以，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每天在任何鄉村，任何城市裏，都能實際解決公共勞動中的某種任務，那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務。

要保證共產主義建設成功，就要看上述工作在每個鄉村裏進行得怎樣，就要看共產主義競賽發展得怎樣，就要看青年能夠結合自己勞動的實際本領怎樣。

祇有從保證這種建設成績底觀點上來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祇有經常反躬自問，爲了成爲團結和自覺的勞動者，我們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祇有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中，共產主義青年團才能把自己五十萬團員聯合成爲一支勞動大軍，博得普遍的尊敬。

一九二〇年十月五日，六日和七日刊載
於真理報第二百二十一期，第二百二十二期
和第二百二十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
四〇三至四一七頁。

致土拉城同志書⁷⁷

親愛的同志們！

據你們來函上所述理由看來，我同意你們的意見，但如果你們想利用我的意見來反對你們的「反對者」，那就請把你們的來函連同我的回信一齊交給他們。那時他們就會明瞭真象，也能把他們的理由告訴給我，那時我才不致於祇知道單方面的意見。

按問題實質我祇來簡略地說幾句話。當我們還未澈底粉碎弗蘭格爾，還未收復全克里木之前，軍事任務是佔首位。這是絕對不容爭辯的事。

至於對土拉說來，因為那裏有些槍械和子彈製造廠，在一定期間內，甚至在戰勝弗蘭格爾之後，把出產槍枝子彈的工作貫徹到底，這一任務很可能依然會是頭等任務，因為要準備軍隊在春季行動。恕我答覆簡略，並請通知我，你們是否把我的這封回信以及你們的來函都交給「反對者」看過。

此致

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

一九四二年初次發表於列寧文存，第三十四卷，第三七二頁。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
和平工作時期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 黨內統一的決議草案⁷⁸

(一) 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注意到，全黨底統一與團結，保證黨員間的完全相互信任，保證工作上真正齊心協力，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底統一，這在目前，當種種情勢正加強着國內小資產階級民衆中的動搖性的時候，是特別必要的。

(二) 但是還在全黨討論職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已顯露出某些小組組織活動的徵候，即發生了幾個具有其特別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別立門戶並規定出自己派別紀律的小團體。這種小組組織活動的徵候，例如，在莫斯科（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和在哈爾科夫底某次代表會議上，在所謂『工人反對派』方面，局部地也在所謂『民主集中派』方面已經存在了。

必須使一切覺悟工人明白瞭解，任何小組組織活動都是非常有害而決不可容許的，因為就即令是單個派別底代表人怎樣極力想保持黨內的統一，而這種小組組織活動在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協力進行的工作，必然會使混進到政府黨內來的敵人，更力圖重新加深黨內的分立，並利用這種分立來實現其反革命目的。

無產階級底敵人極力利用着一切離開共產黨堅定路線的傾向，這種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的實例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當時，世界

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和白黨份子立刻就表示他們甚至情願接受蘇維埃制度底口號，祇要能推翻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一般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運用了彷彿是爲擁護蘇維埃政權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而舉行暴動的口號。這些事實充分證明，白黨份子極力並且巧於裝扮爲共產黨人，甚至裝扮爲最左的共產黨人，只求削弱與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支柱。喀琅施塔得叛亂前夜在彼得格拉發現的孟什維克傳單，也是表明孟什維克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與某些小組組織底萌芽，以便實際上來鼓舞並支援在喀琅施塔得舉行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白黨份子，而在口頭上則表示自己反對叛亂，擁護蘇維埃政權，祇是要給蘇維埃政權加上一些彷彿不大的修正。

（三）對這個問題上的宣傳內容應當是，一方面根據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基本條件的這一觀點，切實解釋小組組織底危害性；另一方面，要揭露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所以採用之最新策略手段的特點。現在，這些敵人已經知道在公開的白黨旗幟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是沒有希望的了，所以他們拚命攫住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設法使政權轉歸表面上最像是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派別，藉以推進反革命勢力。

在宣傳工作上同樣應當闡明過去各次革命底經驗，當時反革命勢力也曾援助過最接近於極端革命政黨的該黨反對派，以便動搖並推翻革命專政，因而促使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勢力將來獲得完全勝利。

（四）在同小組組織進行實際鬥爭中，必須使黨底每一組織最嚴格地注意到決不容許有任何帶小組性的舉動。應當這樣來對黨內缺點進行絕對必要的批評，使一切實際提議都能以儘量明確的形式，並毫不遲延地立刻提交黨的地方或中央領導機關去討論和決定。此外每一個從事批評的人，在批評形式上應當估計到黨處在敵人包圍

下的情形，而在批評內容上應當是藉自己直接參加蘇維埃和黨的工作，從實踐中來改正黨或個別黨員底錯誤。任何分析黨底總路綫，估計黨底實際經驗，檢查黨決議之執行情形，研究改正錯誤的方法等等，都決不能事先交給擁有某種『政綱』等的小團體去討論，而唯一應當直接交給全體黨員來討論。因此代表大會決定更經常地出版『討論刊』和特別文集，力求按問題實質來進行批評，絕對摒除那種適於幫助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的批評方式。

（五）代表大會在原則上否斥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對這種傾向已有特別決議加以分析），並委託中央委員會來澈底根除一切小組織活動，同時代表大會聲明，關於引起例如所謂『工人反對派』這小團體特別注意的問題，亦即關於清洗黨內非無產階級份子和不可靠份子，同官僚主義作鬥爭，開展民主制和發揚工人自動精神等等的問題，不管是任何的實際提議，都應當十分仔細地審查，並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考驗。全黨應當知道，因為種種困難，關於這些問題我們還沒有採取一切必要的辦法，應當知道，黨一面無情地否斥那些空洞的、小組織的所謂批評，同時還要試用新的方式來極力不倦地繼續鬥爭，反對官僚主義，盡量擴大民主制和自動精神，要揭破、暴露並驅逐混進黨內來的份子等等。

（六）因此，代表大會宣佈凡是按某種綱領組成的派別（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一無例外地予以解散，並責成其立即解散。違反代表大會這個決議的人，就應無條件地立刻被開除黨籍。

（七）代表大會爲了實現黨內和蘇維埃全部工作中的嚴格紀律，並在取締一切小組織問題上達到最大限度的統一起見，決議由中央委員會來全權處理：凡遇有破壞紀律，復活小組織或縱容小組織的情形，即採取黨內一切懲罰辦法，直到開除黨籍爲止，對於中央委員，則貶爲候補中央委員，甚至最後開除出黨。對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採用這種極端辦法時，其條件應當是召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請全體中央候補委員和全體監察委員參加。在黨內最高領導人底這全體會議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表決必須把某個中央委員貶為候補中央委員或開除黨籍時，那末這一決議就應當立即執行。

一九二一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第十次
代表大會速記錄（一九二一年三月八
日至十六日）。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
第二五九頁至二六一頁。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草案⁷⁹

(一) 最近幾個月來，黨內顯然出現了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對這種傾向必須採取最堅決的思想鬥爭辦法，同時要清洗黨，使黨健全起來。

(二) 上述傾向之所以發生，局部地是由於以前的孟什維克以及尚未完全擁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工人和農民加入共產黨內來，但主要地是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影響到無產階級和俄國共產黨裏，這種自發勢力在我國特別厲害，它必然產生無政府主義傾向，尤其是因為歉收和戰爭極端破壞的惡果，致使民衆生活急劇惡化，加之成百萬的軍隊復員，以致幾十萬的工農無法立刻找到正常生活資源的時候。

(三) 此種傾向在理論上最確定的和形式上最完備的表現（另一說法：這種傾向之最確定等等的表現之一），便是所謂『工人反對派』這個小團體底各種提綱及其他作品。極標本的例子就是以下這條提綱：『組織國民經濟管理之權應屬於聯合在生產職工會內的生產者底全俄代表大會，由這些生產者選出管理共和國全國民經濟的中央機關』。

他們這種聲明以及其他很多同樣的聲明，其基本思想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它既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完全脫離，又與一切半無產階級革命和現時無產階級革命底實際經驗總結完全分割。

第一，『生產者』的概念，既是把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以及小商品生產者混為一談，因而完全離開階級鬥爭底基本概念，離開精確區分階級的這個基本要求。

第二，專靠非黨羣衆，或者像上述提綱中所表現的那樣來逢迎非黨羣衆，這也是根本上背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教導說——這種教言不僅形式上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關於無產階級政黨作用決議中已被全共產國際所證實，而且實踐上也被我國革命所證實，——祇有工人階級底政黨，即共產黨，才能聯合、教育和組織這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羣衆底先鋒隊，也唯一祇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拒抗這種羣衆中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拒抗無產階級中工會狹隘性或職業偏見之必然的傳統與惡習，並能夠領導全體無產階級底一切聯合行動，亦即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再經過無產階級來領導全體勞動羣衆。不如此，便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黨對非黨無產階級關係上以及共產黨和非黨無產階級對全體勞動羣衆關係上之共產黨底作用，若不加以正確的瞭解，便是理論上根本背棄共產主義，便是傾向於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而『工人反對派』底全部觀點正是充滿了這種傾向。

（四）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認為，上述這小團體及其他個人想援引俄國共產黨黨綱上經濟部份關於職工會作用之第五條，來擁護自己謬誤觀點的一切企圖，同樣也是根本錯誤的。該條文上說，『職工會應當做到把作為統一經濟整體的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權都切實集中在自己手中』，職工會『因此才能保證國家中央

管理機關，國民經濟與廣大勞動羣衆之間的密切聯繫』，並『吸收』這些羣衆來『直接參加管理經濟事宜』。

俄國共產黨黨綱上同一條文中，宣稱『使職工會愈益擺脫行會底狹隘性』以及愈益包括勞動羣衆大多數，『然後逐漸包括到全體』勞動者，這一過程，便是職工會『應當做到』的這種情況底先決條件。

末了，俄國共產黨黨綱同一條文內又着重指出說，職工會『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法令和已有的實踐，已經是一切地方與中央工業管理機關的參加者』。

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不估計到參加管理的這種實際經驗，不在嚴格適應已達到的成效和已糾正的錯誤的情形下去繼續發展這一經驗，却直接提出召集『選出』經濟管理機關的『生產者底個別代表大會或全國代表大會』口號。黨對無產階級職工會以及無產階級對勞動大眾中半小資產者和直接小資產者羣衆之領導、教育與組織作用，便從此完全拋棄，完全消除，因而就不是繼續和改善蘇維埃政權已開始的新式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工作，而是對這一工作之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破壞，唯一祇能促成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底勝利。

(五)除了理論上的錯誤及對蘇維埃政權所已開始之經濟建設的實際經驗採取根本不正確的立場外，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認為上述小團體及其他類似派別或個人底觀點中還具有極大的政治錯誤，而對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存在說來，有着直接的政治危險。

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有巨大優勢，由於戰爭惡果所不免造成的經濟破壞、貧困、流行病、歉收以及國民貧乏困苦之極度尖銳現象，遂使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中的動搖情緒特別增長得厲害。這種動搖情緒，時而傾向於鞏固這些羣衆與無產階級的聯盟方面，時而又傾向於資產階級的復辟方

面，而十八、十九與二十世紀各次革命的經驗總和，却萬分明顯和萬分確鑿地表明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底統一性、力量和影響若受到絲毫削弱，則這種動搖的結果，便祇能促成資本家地主政權及其私有制底復辟。

因此，「工人反對派」及與之類似份子底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並且在實踐上是各種小資產階級與無政府主義動搖底表現，是在實際上削弱共產黨底堅定領導路線，實際上幫助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敵人。

(六) 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根據這一切情形，除堅決否斥上述表現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思想外，並認為：

第一，必須同這類思想進行有系統的和不屈不撓的思想鬥爭；

第二，代表大會認為宣傳這類思想是與俄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絕不相容的。

代表大會委託黨中央委員會最嚴格地執行大會的這類決議，同時指出，定要在各種專門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另闢專欄，使黨員們關於上述一切問題得以詳細交換意見。

一九二一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速記錄（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二六二至二六四頁。

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讓我首先感謝你們對我表示的敬意，並同樣也向你們的代表大會致敬。在沒有講到直接有關你們代表大會的任務，你們的工作和全蘇維埃政權所期待於你們代表大會的一切等等這題目之前，讓我從多少離開本題的地方說起吧。

剛才我從你們會場上走過時，看見了這樣一個標語：「工農統治是會永遠存在的」。不錯，這個標語不在通常的地方，而是在會場角上，——也許，是誰看出這個標語有毛病，把它移到一邊去了，——但當我讀罷這個奇怪標語時，我便想道：在我們這裏，連關於這種初步和基本的事理，都存在有誤解。老實說，如果工農統治真會永遠存在，那麼，任何時候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便是消滅階級，當工人和農民還存在的時候，不同的各階級也就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備的社會主義。所以我思考到，十月革命已經有了三年半的歷史，怎麼我們這裏還有這類雖說向後移開了一些，但終歸還是存在的很奇怪的標語，同時我就想道，大概，關於在我國最流行、最通用的口號，至今也還有非常大的誤解。舉例來說，我們大家都唱着：此刻我們在進行最後的決戰，——這也就是我們人到處重複的一個最流行的口號。可是如果要問開很大一部份的共產黨員：你們此刻進行的雖不是最後一次決戰，當然，這說得

多少有點過火，但也是我們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究竟是在反對誰呢，——那我恐怕祇有很少數人能正確回答這個問題，祇有很少數人能正確瞭解，我們此刻進行的我們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究竟是反對什麼或反對誰的。我覺得，現時這春季，既有了那些已引起廣大工農羣衆注意的政治事變，所以就必須把這個問題再來從頭審查一次，或至少要試行審查一次，究竟本年春季，也就是此刻我們所進行的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是反對誰的。請讓我來講講這個問題吧。

爲了瞭解這個問題，我以爲要首先盡量精確、盡量清醒地再次檢討敵對的力量，這些力量底鬥爭既決定蘇維埃政權底命運，一般說來，也決定無產階級革命底進程和發展，即爲了推翻俄國資本和其他各國資本的這一革命底進程和發展。究竟這些力量是怎樣的呢？它們彼此間是怎樣安排的呢？它們現時是怎樣部署的呢？每一種多少嚴重緊張的政治局面，每一次新的，那怕是不很巨大的政治轉變，隨時都引起每個有頭腦的工人和農民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現時有哪些力量，究竟它們是怎樣安排的。祇有我們善於正確地、完全清醒地、不管我們的情感願望如何來估計這些力量，祇有那時，我們才能關於我國一般政策以及我們最近任務作出正確的結論。現在就讓我來扼要地講講這些力量吧。

這些力量，主要和一般說來，基本上有三種。我來從最接近我們的一種力量，即從無產階級講起。這是第一種力量。這是第一個特別的階級。大家都深知這點，因爲你們本身就深處在這個階級內面。現時這個階級的情形怎樣呢？在蘇維埃共和國中，這個階級在三年半前奪取了政權，在這期間內實現了統治，即專政，並在這三年半以來比其他一切階級遭受了更多的苦痛、災難、困苦和貧乏。這三年半期間——其中大部份時光內，是蘇維埃政權在進行拚命的國內戰爭，拒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工人階級，對無產階級說

來，乃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困苦、貧乏、備受犧牲和艱鉅至極的時日。結果，奇怪得很。奪得了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是在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它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妄說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尊崇的』政權的空話來自欺欺人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有意思。你們深知，愛說這種空話的人很多，甚至多得無限，可是無論如何，這總不是無產階級裏面的人，因為無產者明白瞭解，並在憲法中，即共和國基本法律中寫道，這裏問題是指無產階級專政而言。這個階級懂得它是在非常困難條件下單獨掌握政權。它實施這一政權時，也是與其他任何專政所採用的方法一樣，即以最大的堅強性，以最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同時，三年半來的政治統治期間，它所遭受的災難、貧苦、飢餓、經濟地位惡化等情形，也是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從來沒有遭受過的。顯然，既經歷了這種超人的緊張局面，結果我們這個階級便顯得特別疲憊，特別困乏。

試問，在無產階級較其餘居民為數極少的一個國家內，在被軍事力量把自己同無產階級人數更多、更有覺悟、更有紀律、更有組織的諸國強行隔離開來的一個落後國家內，加之又是處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逼攻的條件下，一個階級又怎能實現了自己政權的呢？怎能實現到三年半之久呢？對這點的援助力何在呢？我們知道，這種援助力是在國內，是在農民羣衆中。我一會就要講到這第二種力量，但我首先要來把對第一種力量的分析結束一下。我已經講過，你們每個人都曾親眼見到自己工廠裏，機車修理廠裏，作坊裏親近同志底生活情形，也就知道，這個階級底貧困從來沒有像在它專政時代這樣巨大，這樣厲害。我們國家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疲乏，這樣困憊。究竟是什麼給了這個階級以精神力量來熬過這種困苦的呢？顯然無疑義的，定是有某種來源使它本應獲得克服這般

物質困苦的精神力量。大家知道，關於精神力量，關於精神援助的問題，這乃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一切都可以瞭解為精神力量，一切都能掩藏到精神力量裏去。爲了避免這種危險，即藉精神力量這個概念來搪塞某種不確定的或虛幻的東西，所以我常常問自己，能否找到一種初步的定義，確定究竟是什麼東西給了無產階級以精神力量來熬過那種因自己政治統治所遭受到的空前的物質困苦呢？我想，如果這樣提出問題，便可以找到本問題的確切回答。請大家反躬自問，假如與蘇維埃共和國比隣而處的是些落後國家，而不是先進國家，那時蘇維埃共和國能否經受住它在這三年半內所經受過的一切，並如此有成效地捍衛了自己，擊退了全世界各國資本家所支援的白匪底逼攻呢？祇要這樣提出問題，就足以使在回答本題時不致於發生任何猶豫。

你們知道，在這三年半中，反對我國的，是全世界一切最富強的國家。你們既參加過這次戰爭，所以都很好知道，那用來反對我們和援助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與弗蘭格爾的軍事力量，無條件地要比我們的軍事力量大許多倍，大得無限。你們也很好知道，所有這些國家底實力，此刻也比我們的實力，大得不可計量。它們既抱定任務要戰勝蘇維埃政權，但爲什麼它們又沒有戰勝呢？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們有很確切的回答。其所以能夠這樣，其所以真的這樣，是因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都贊助我們。甚至當這無產階級顯然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歐洲各國中，係另外的名稱——影響下時，他們同樣也不贊助反對我國的鬥爭。結果，在首領被迫向羣衆讓步的情形下，工人們便拆垮了這次戰爭。並不是我們戰勝了，因爲我們的軍事力量很小，而是由於列強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軍事力量調來反對我們，這樣才使我們獲得了勝利。先進國家底工人竟能這樣左右戰局，致使違反他們的願望就不能進行戰爭，所以歸根到底是工人們用消極與半消極的抵

抗，拆垮了這次反對我們的戰爭。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確切說明了俄國無產階級是從何處取得精神力量，竟能堅持三年半之久並獲得了勝利。俄國工人底精神力量就是，他們知道、覺得和感到了在這次鬥爭中歐洲各先進國無產階級所給予他們的助力與支援。近年來歐洲工人運動中還沒有過像英法意和其他戰勝國或戰敗國，即在這些文化不同和經濟發展程度各異的國家內社會黨分裂這樣重大的事件，這也就向我們表明歐洲工人運動是在朝着哪個方向發展。本年度在一切國家中的巨大事件，便是從完全被擊潰了的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在俄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另組成了憑藉於工人階級內所有一切先進力量支援的共產黨。當然無疑義的，如果那時進行鬥爭反對我們的，不是各先進國，而是沒有這樣強大無產階級羣衆的落後國家，那末我們不僅不能支持到三年半，甚至不能支持到三月半。先進國家底工人，不顧帝國主義者用千百萬份刊物所散佈的反蘇維埃政權的謊謬言論，不顧這班『工人領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怎樣破壞工人擁護我們的鬥爭，而總是來支援我們，如果我國無產階級不憑藉先進國這些工人底同情協助，那時，它能否具有這樣的精神力量呢。因數量少而顯得軟弱，因貧困而備罹苦難的我國無產階級，憑藉於這種援助力，却獲得了勝利，其所以獲得了勝利是因為它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而表現出自己強大有力。

這就是第一種力量。

第二種力量，便是處在資本發展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小業主，也就是在俄國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這主要是小業主和小農業。農民中十分之九，無非就是這樣的農民。他們並不日常參加勞資間的尖銳鬥爭，他們沒有受過鍛鍊，加之經濟和政治生活條件不使他們彼此接近起來，反而把他們彼此分開，彼此隔離，把他們變成爲千百萬單個的小業主。這也就是你們大家很熟習的事實。不經過積久的年月，任何集體制、集體農莊、公社，都不

能改變這種現象。這種力量，賴有無產階級專政底革命毅力和奮勵精神，就空前迅速地打倒了它右面的敵人，即地主階級，連根剷除了這個階級，用從來未有的速度消除了地主階級底統治。可是，這個力量愈快地消除了地主統治，愈快地在全民公有土地上經營自己的經濟，以及愈堅決地懲治那少數的富農，則它本身也就愈快地變為小業主。大家知道，俄國農村在這個時期內均衡化起來了。大播種主與無播種地農民意數量減少，中農農莊增多。在這期間，我國農村經濟更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這是一個獨立階級，這個階級，自推翻與驅走地主和資本家之後，便成為唯一能夠對峙無產階級的階級。因此，在標語上寫着『工農統治是會永遠存在的』，這乃是無稽之談。

你們知道，從這種力量底政治情緒說來，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這是一種動搖的力量。在我國革命中，我們在國內每一角落上都看見有這種情形——雖在俄羅斯有俄羅斯的特點，西伯利亞有西伯利亞的特點，烏克蘭有烏克蘭的特點，但在全國各地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這乃是一種動搖力量。無論在克倫斯基幫助之下，無論在高爾察克時期，無論在薩馬拉的立憲會議時光，亦無論在高爾察克或其先驅者那裏有孟什維克馬依斯基當總長的時日等等，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都曾長期地抓住這種力量。這種力量動搖於無產階級底領導和資產階級底領導之間。究竟為什麼這一比重極大的力量自己不能來領導自己呢？因為這類羣衆底經濟生活條件決定它本身既不能進行聯合，也不能實行團結。凡是不受關於『全民投票』、立憲會議及其他類似『民主制』的空洞辭句所支配的人，對這個問題都是再明顯不過了；在世界各國，這種民主制欺騙人民已經有幾百年，而在我國，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努力於這種民主制也有幾百個星期，但他們每次都恰巧就在這兒遭到了破產。我們根據本身的經驗知道，並就全世界，例如，近百五十年這新時代一切革命

發展過程中的情形說來也證實着，無論何時何地，其結果都是這樣：即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有農民，凡是想覺悟到自己力量，自行處理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都終於遭到了破產。或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或者在資本家領導下；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這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政治、經濟和歷史都是擯斥他們的。馬克思底全部學說指明，既然小業主是生產資料和土地的私有者，那末，他們彼此交換的結果必然會產生出資本，同時隨着資本一塊，也就會發生勞資間的矛盾。資本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這是必不可免的，這是全世界上到處都表明了的法則，誰要是不願自欺，誰就不能不看清這點。

這些基本經濟事實也就說明，爲什麼這種力量不能獨立表現自己，爲什麼一切革命底歷史中，凡想做到這點的企圖，結果總是遭到了破產。當無產階級尚未能領導革命之前，這種力量總是處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的。過去一切革命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當然，俄國人也並不能是例外，假如他們想超凡成仙，那除了引人發笑以外，決不會有任何結果。不言而喻，歷史對於我們，也同對於別人一樣。在我們大家看來，這一切是異常清楚的，因爲我們都經歷過克倫斯基執政時代的苦痛。當時，那些擁護政府的，在運用政策管理國家方面，都是有智慧、有學識、經驗豐富的政治領導人物，比布爾什維克所有的，要多一百倍。如果再加上一切向我們怠工，但對憑藉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克倫斯基政府却不忘工的官吏，那末這班人就要佔極大的多數。但是這個極大多數，終歸破產了。可見這裏有些原因，這些原因却強過那種慣於管理國家、遠在他們取得國家政權幾十年前就精通此項藝術之知識份子學識力量底巨大優勢。烏克蘭、頓河流域和庫班區也有過形式不同但實質一樣的經驗，結果也到處都是一樣。這裏不能有什麼偶然性。這便是第二種力量底經濟與政治規律：或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這固然是條艱

難道路，但走這條道路可以擺脫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或者在資本家領導下，如像在各先進民主共和國甚至像在美國一樣，美國至今還沒有完全結束無代價分給土地的事實（凡是移來的人，每人無代價的分受六十俄畝土地；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條件！），而那裏，這種情形也就引到了資本底完全統治。

這便是第二種力量。

在我國，這第二種力量動搖着，它特別疲倦。它肩負着革命底重担，最近幾年來的境遇更加難堪：荒年，在牲畜病死、飼料不足的條件下施行餘糧收集制等等。際此情形下，顯然，這第二種力量，即農民羣衆，幾至陷於絕望境地。雖然消滅地主已經有三年半之久，必須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曾無從想到這點。復員的軍隊得不到正確運用自己勞動的機會。所以這種小資產階級力量就轉化為無政府主義份子，而後者乃是以憤激言行來表現出自己要求的。

第三種力量，不言而喻，就是地主和資本家。此刻在我國表面上看不見這一力量。可是最重要事變之一，也就是最近幾星期內一次特別重要的教訓，即喀琅施塔得事變，儼如閃電般的把實際事物比任何東西都照耀得再清楚不過了。

現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內沒有白黨份子。那裏共計有七十萬俄國僑民。這就是逃跑了的資本家和大羣不會遷就蘇維埃政權的職員。我們看不見這第三種力量，它跑到外國去了，但它是在與全世界資本家結成聯盟的情境中生活與行動着，這些資本家援助它，也如援助高爾察克，尤登尼奇，弗蘭格爾一樣，既在財政上援助，也用其他方法援助，因為他們有着自己的國際聯繫。每個人都記得這些人。近來，你們當然注意到了報紙上從白黨刊物中摘錄來的許多說明喀琅施塔得事變的材料。最近，那在巴黎出版報紙的布爾切夫描述過這次事變，米留可夫也估計過這次事變，——當然，你們大家都讀過這些材料。為什麼我們的報紙很注意這點呢？這樣做法對

麼？是對的。因為要清楚知道自已的敵人。當這敵人已經到了外國的時候，自然不能很清楚地見着他。但是看吧——他走得並不遠，最多不過幾千俄里，而他走過這距離後，就隱藏起來了。這敵人還是完整的，他活着，等待着。所以要細心地看着他，尤其是這班人並不僅是難民。不，這乃是全世界資本底直接助手，是靠這資本象養着，同這資本一塊活動的人。

當然，你們大家都注意到了，怎樣會把國外出版的白黨報紙上的摘錄拿來與法英報紙上的材料登在一塊。因為它們是一個合唱團，一個音樂隊。不錯，在這個音樂隊裏並沒有一個按樂譜來指導的導演人。那裏的導演人是國際資本，所用的是比導演小棍更少現形的方法。但他們總歸是一個音樂隊，這是你們從任何引證中都可以看得清楚的。他們認為，如果口號是『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那他們是同意的。而米留可夫關於這點特別明顯地解釋着。他曾專心致志地學過歷史，用親身探討俄國歷史的獨特經驗來裝新自己的全部知識。他以二十個月的自修心得充實了自己二十年來的博學研究。他聲言說：假如口號是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那我也贊成這個口號。這種變動是否會稍微往右傾去，或稍微向左，即往無政府主義者方面傾去，在國外，在巴黎，這是看不出來的。那裏看不見喀琅施塔得的實際情形，可是他說：『君主派諸君，不要急忙吧，不要用你們關於這點的喧嚷來妨礙事情吧』。所以他聲明說，如果這種變動是往左傾去，那他就決心擁護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布爾什維克。

這便是米留可夫所寫的東西，也就是他的絕對正確立場。他從俄國歷史和地主資本家那裏學會了一點什麼，硬說喀琅施塔得事變畢竟是想建立一種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的企圖；稍微往右傾去；稍微能自由貿易，稍微帶點立憲會議。試聽聽任何一個孟什維克的話，也許，甚至不出這會場的門，你們就可以聽見這一

切。假如喀琅施塔得事變底口號是稍微向左傾去——蘇維埃政權由那些因貧困、戰爭、軍隊復員所產生出的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那末爲什麼米留可夫擁護這樣的政權呢？因爲他知道，事情只會或者是傾到無產階級專政方面去，或者是傾到資本家方面去。

不然，政權就不會存在。雖然我們進行着的不是最後一次決戰，而是最後決戰之一，要是問道：究竟我們今天同誰進行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呢，那唯一正確的回答，便是同我們家裏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決戰（鼓掌）。至於說到地主與資本家，那我們在初次戰役中，就已把他們打敗了，但這僅僅是在初次，而第二次戰役就要在國際範圍內了。現今資本主義，就即令它再強一百倍，也不能作戰反對我們，因爲各先進國那裏，工人在昨天已經拆垮了它所掀起的戰爭，今天工人還會更好地、更可靠地來拆垮它所想掀起的戰爭的，因爲那裏戰爭底惡果正在日益厲害地擴展着。我們家裏的這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雖被我們戰勝了，可是它還會捲土重來，地主與資本家們也估計到這一點，特別是那班比較聰明如米留可夫這樣的人，他向君主派說過：你們坐在自己家裏吧，不要作聲，不然，你們就只會鞏固蘇維埃政權。各次革命底一般進程表明了這一點，在這些革命中，常有過由鄉村一時支援的勞動者底短期專政，但却沒有過勞動者底鞏固政權；在短期內，一切都開着倒車。其所以開倒車，正是因爲農民、勞動者、小業主不能有着自己的政策，他們經過多次動搖之後，非向後倒退不可。在法國大革命中或在一切其他革命中（不過範圍較小），都有過這樣的情形。顯然，大家都學會了這一課。我國的白黨份子潛逃到了外國，他們駛行過兩三晝夜的路，現時他們有了西歐資本的鼎力支援，正在那裏窺伺時機。這就是現在的情形。由此，無產階級的任務和職責，也就很明顯了。

在疲倦困憊的基地上，產生着一定的情緒，而有時是絕望的情緒。至於革命份子內面，這種情緒和絕望總是表現在無政府主義

上。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曾是這樣，現時在我國也是這樣。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遭受危機，因為最近幾年來，它處境艱難，縱然沒有艱難得像一九一九年的無產階級那樣，但終歸是艱難的。農民本應去挽救國家，無報酬地繳納餘糧，但它現在已經受不住這樣的重担，所以農民中發生意志頹喪動搖不定的情緒，而資本家這敵人却估計到了這點，他們說：只要一有動搖，接着就會倒下去的。由此可見，從全俄與國際範圍內階級力量的觀點看來，喀琅施塔得事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由此可見，我們現在進行的最後決戰之一，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為我們還沒有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自發勢力，而我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命運，此刻就以能否戰勝這種勢力為轉移。假如我們戰勝不了這一勢力，我們便會像法國革命一樣，向後倒退。這是決不可免的事，所以應當注視這點，不要閉着眼睛，不要徒托空言。應儘力改善這羣衆底生活，並保全無產階級的領導，那時，歐洲正在發展着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能夠得到新的援兵。那裏，今天沒有發生的事情，明天可能發生，明天沒有發生的事情，後天能夠發生，但明天和後天這兩個期間，在世界歷史中，就等於是好幾年。

究竟我們此刻為什麼鬥爭，為什麼進行最後決戰之一，最近諸事變有什麼意義，俄國國內階級鬥爭有什麼作用，——我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便是如此。現在也就一目了然，為什麼這種鬥爭會這樣尖銳，為什麼我們這樣難於瞭解，主要敵人並不是尤登尼奇，高爾察克或鄧尼金，而是我國的環境，我們家裏的人。

我的話已經拉得太長，現在結束時，我就來講講鐵路和水運的情形，講到鐵路和水運人員代表大會的任務。我想，我剛才必須講出的這番話，是與這個任務有密切而不可分離的聯繫的。無產階級中，大概祇有鐵路人員和水運人員的日常經濟活動，才是最明顯地與工農業發生着聯繫。你們應當把糧食運往城市，應當輸送工業品

去活躍鄉村。這點對任何人都很清楚，而對鐵路人員與水運人員更加清楚，因為這是他們日常勞動的對象。由此，我覺得，也就自然可以看到目前鐵路上和水運中勞動者究竟負有什麼重要任務和重大責任了。

大家知道，在你們舉行這次大會時，職工會上下級人員間存在有磨擦，這種不調協現象傳播到了黨內。這個問題曾提到最近這次黨代表大會上，黨代表大會決定，要上級人員服從下級人員的意見，改正上級人員所犯過的那在我看來雖是個別的，但終歸是應當改正的錯誤，這樣使上下級和協起來。大家知道，在黨代表大會上已經有過這樣的糾正，黨代表大會是在較少合乎上級領導人意見的條件下舉行的，它在達到黨員中比至今以前更加團結更加統一的精神上，結束了自己的工作。這也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其領導部份對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運動的一種合理的、必要的與唯一正確的回答。如果我們這些覺悟工人，能認清這種運動底危險性，能團結起來，十倍齊心百倍團結地工作，這就會使我們的力量增大十倍，使我們在戰勝了軍事進攻之後，也能戰勝這種自發勢力底動搖，因為這自發勢力正震撼着我國全部日常生活，所以，我再重覆一句，它也就非常危險。黨代表大會糾正了引起自己注意的那些錯誤，這代表大會底決定，其意義就在於它是無產階級大軍之團結與一致上的巨大進步。現在你們在本代表大會上也要同樣做到這點，並把黨代表大會底決定加以具體實現。

我重覆地說，革命底命運直接依賴於無產階級中這一部份人底工作，比依賴於無產階級中其餘各部份人的工作更大。我們應當恢復農業與工業底周轉，爲了恢復這種周轉，就必需有物質的支柱。聯繫工農業的物質支柱是什麼呢？這就是鐵道運輸和水路運輸。所以你們中間不僅共產黨員，即無產階級專政底覺悟的嚮導人，必須特別嚴重地對待自己的工作，而且那些雖不是共產黨員，可是是那聯

合一百至一百五十萬運輸勞動者的職工會會員，也必須這樣。你們大家學習我國革命及其他已往一切革命底教訓，就應當懂得我們處境中的全部困難，決不要被「自由」，立憲會議，「自由蘇維埃」等等口號所眩惑，——因為用這類口號來裝新招牌是不難的，看，米留可夫也表示自己是擁護喀琅施塔得共和國蘇維埃的人，——你們要看清階級力量的對比，你們才有顯明與堅固的基地，以及作出自己全部政治結論的基礎。那你們就會明白，我們正處在危機時期，這時究竟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像不久以前那樣將一往直前地走向勝利，抑或是由於動搖而招致白黨勝利，以致困局不但無從改變，反而會使俄國革命倒退很多很多年，這就要全靠我們了。對於你們這些鐵道人員和水運人員代表們說來，結論祇能有一個，而且只應當有一個，就是：百倍加強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無產階級的紀律。同志們，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做到這點，無論如何都要爭得勝利。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刊載於
真理報第六十七期和第六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
第二八五至二九五頁。

致阿捷爾拜疆、格魯吉亞、阿爾明 尼亞、達格斯坦、哥里共和國共產 黨員同志們的信⁸⁰

我熱烈地向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致賀，深信它們這一緊密的聯盟，定會造成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從來未見以及在資產階級制度內是決不可能的民族和平底模範。

無論高加索各民族中工人與農民間的民族和平如何重要，但重要得更加無比的，是保持和發展這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蘇維埃政權。任務雖很困難，却完全是能執行的。爲要順利地解決這一任務，最重要的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產黨員懂得他們的那種特殊情形，他們的共和國與蘇俄共和國情形和條件有所不同的那種特殊情形；要懂得決不可機械地抄襲我們的策略，而要深思熟慮變更這一策略底形式，以求適合於特殊的具體條件。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未曾享受過任何地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援助。恰恰相反，過去這幾年內，它都在進行鬥爭反對協約國底軍事侵略及其封鎖。

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却曾有蘇俄方面政治上的援助和不大的軍事援助。這是根本不同的地方。

第二，此刻無須害怕協約國方面的侵犯以及它在軍事上對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達格斯坦、哥里的白黨份子的支援。因為協約國在俄國境內已經弄得「焦頭爛額」了，這迫使它一時大概要放謹慎一些。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國，和俄國比較起來，更加是農民佔優勢的國家。

第四，俄國在經濟上曾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隔離的國家，現時在頗大程度內仍是這樣；高加索却可以更快而更容易地與資本主義的西歐調整「共居關係」和商品交換事宜。

區別還不止這多。但就上述種種區別看來，也足以了解必須採用另一種策略。

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農民，要更加緩和，更加謹慎，更加讓步。在租讓和貿易政策中，經濟上要極力利用，加緊利用和急於利用資本主義的西歐國家。如煤油，錳，煤炭（特克發爾切爾區煤礦），銅，——還有不勝枚舉的其他極豐富的礦產。有充分可能來廣泛開展施行租讓政策及與外國通商。

應該廣泛地、堅持地、巧妙地、考慮周到地做到這點，藉此來極力改善工農生活，吸引知識份子參加經濟建設。要利用與意大利、美國等等的商品貿易，來儘力發展物產豐富的這邊鹽底生產力，即「白煤」，水利灌溉。爲了無論如何都必須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灌溉事宜是特別重要的。

更加緩慢，更加謹慎，更加有系統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這就是高加索各共和國在不同於蘇俄共和國的特點中，可能而且必須做到的事情。這就是在不同於我們的策略中，必須了解和善於實現的策略。

我們打開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破口。破口業已打開了。我們在反對白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有全體協約國的支

援，有協約國底封鎖和武力幫助上的支援）所進行的非常殘酷、超乎自然、艱苦萬分的戰爭中，捍衛住了自己的生存。

高加索共產黨員同志們，你們已經用不着去打穿破口，你們要利用一九二一年這有利於你們的國際形勢，巧妙地，極謹慎地，很有系統地來建樹新的事業。一九二一年，無論在歐洲或全世界上的形勢，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那樣的了。

不要抄襲我們的策略，而是要主動地熟思這策略之特殊性底原因以及這策略的條件和總結，而在自己那裏，不是從字面上，而是從精神上，真諦上，教訓上來運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底經驗。經濟上要立刻憑藉於同資本主義的外國進行商品貿易，不要吝嗇：就讓幾千萬最貴重的礦產品運到外國去吧。

立刻努力改善農民生活，開始電氣化與水利灌溉的巨大工程。水利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便於幫助改造邊疆，復興邊疆，埋葬一切舊的，而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事業鞏固起來。

這封信裏的粗忽之處，請你們原諒，因為我是倉卒寫出，好交麥斯尼可夫同志帶去，讓我再次向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們，竭誠致敬。

列寧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莫斯科。

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刊載於格魯吉亞
真理報第五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
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頁。

論糧食稅

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

代引言

糧食稅問題現時引起了特別多的注意，討論與爭論。這是十分顯然的，因為它真正是當前情勢下我們政策底主要問題之一。

討論多少帶有一些亂雜性。由於極其明顯的原因，我們大家都犯得有這種毛病。所以不企圖從本問題的「日常」意義而從它的一般原則意義來加以觀察，才更有益處。換句話說：就是要注視注視現時我們正在動手描繪目前政策中一定實際措施的這幅圖畫底基本輪廓。

爲了實現這一企圖，我想從我那本當前主要任務。——論「左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的小冊子中，摘引出一長段話來。這本小冊子已由彼得格拉蘇維埃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了，其內容：第一，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在報上發表的論布列斯特和約一文，第二，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登出的與當時左派共產黨人的論戰。論戰部份現在已經用不着了，所以我也就把它刪掉。只留下了有關「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及我國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現時經濟基本成份問題的言論。

當時我這樣寫道：

關於俄國現時經濟

(摘自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小冊子)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情況說來，將是一個進步。假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夠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澈底鞏固，而成爲不可戰勝的。」

我揣測道，一定有人會義憤填膺地起來擯斥這段話…怎麼呢？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去，能會是一個進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麼？」

「…正是要來詳細講講這點。」

第一，應該分析使我們有權有據能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應該暴露那班看不見小資產階級經濟條件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乃是我國社會主義之主要敵人的人們底錯誤。

第三，應該真正瞭解在經濟實質上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的蘇維埃國家底意義。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分析這三種情況。

大概，還沒有一個人人在研究俄國經濟問題時，竟否認到這種經濟底過渡性。大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否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語係意味着蘇維埃政權是要決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總還不是承認現時經濟制度已經就是社會主義的了。

那末，「過渡」這字又是什麼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制度中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份或因素呢？

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並非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思考到了：俄國現存的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我列舉出這幾種成份如下：

- (一) 宗法式的，即頗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農民經濟；
- (二) 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有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 (三) 私人資本主義；
- (四) 國家資本主義；
-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濶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底這各種類型，都錯綜在它內面。特點也就在這裏。

試問，究竟是哪些成份佔優勢呢？在一個小農國家中，顯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土地佔有者底大多數，甚至極大多數，乃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人時此時彼地在破裂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國家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手）底外殼，而投機業的主要對象，便是糧食。

主要的鬥爭正是在這一方面開展着。如果按『國家資本主義』這類經濟名詞說來，究竟是誰同誰在進行這一鬥爭呢？是上述序列中的第四種成份與第五種成份作鬥爭麼？當然不是的。這裏，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攜手，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拒抗任何的國家干涉、統計和監督，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也好，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也好。這乃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許多經濟問題上的錯誤都是由於不瞭解這一事實才發生的。投機者，奸商，壟斷破壞者——這便是我國『內部』主要的敵人，即蘇維埃政權在經濟設施方面的敵人。如果說，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小資

產者這班最顯著最真誠的革命家，只想用絞殺個別不多的『要犯』和頒佈大批通告法令去戰勝投機商人，此種願望尚可以原諒的話，那末現在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純屬空談的態度，祇能引起每個有覺悟的革命家的厭惡和嫉視而已。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投機業底經濟基礎，乃是在俄國蔓延得非常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裏都有自己的代辦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小資產階級多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時此時彼地纏繞着工人中的個別成份；投機業鑽進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底全部機體內，排擠國家壟斷制。

誰要看_不見這點，那它就恰恰因為自己盲目無能，暴露出自己是做了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俘虜…』

『…小資產者擁有在戰時用『正常』辦法，特別是用不正當辦法所積累起來的幾千幾千的小存款。這種標本經濟式樣，也就是投機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底基礎。金錢，這是獲得社會財富底證券；千百萬小私有者緊緊地握着這種證券，對『國家』隱藏起來，不相信任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祇『期待』躲過無產階級的大風暴。或者是我們使這些小資產者來服從我們的監督與統計（我們若把居民中佔多數的貧民，或半無產者組織在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那我們便能做到這點），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必然地和不免地推翻我們的工人政權，如同正是在這小私有制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拿破崙輩和卡芬雅克輩之曾經推翻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問題也祇是如此…』

『…保存有幾千小款的小資產者，係國家資本主義底敵人，他們唯一是想把這款子用在自己身上，反對貧民，反對任何全國性的監督，而這幾千幾千小款却替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業造成若干億萬金錢的基礎。譬如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為數一千的價值。又譬如說，在我國，因為小投機業，各種盜竊公物行爲以及小私有者破壞蘇維埃法令和蘇維埃章程的現象，以致這一

千的價值中有二百落了空。每個覺悟工人就會說：如果我能從這一千中拿出三百來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就不要不止拿出二百，却甘願拿出三百，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與組織都會整飭就緒，小私有者破壞國家壟斷的行動都會被澈底打破，那末以後這種「貢款」就會減輕，譬如說減到一百或五十，已經會是很容易的任務了。

這個普通的數字實例，——爲了要作極通俗的解釋，我故意把它弄得再簡單化沒有，——也就說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現時情況底對比關係。工人掌握有國家政權，他們在法權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這整整的一千都拿上手來，不讓一個哥比落在非社會主義用途之上。基於政權已實際轉到工人手中這一法權上的可能性，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份。可是，小私有者與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却經過許多途徑搗毀法權上的規定，扶植投機業，破壞蘇維埃法令底實施。國家資本主義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即令（所以我故意舉出上述這種數字，極簡截地來表明這點）那時我們比現在所付的代價會更大一些，因為「領教」值得破費，因為這對工人是有好處，因為戰勝茫無秩序，戰勝經濟破壞與鬆懈現象，比一切都重要些，因為讓小私有制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這乃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絕對會使我們趨於滅亡（如果我們不戰勝它的話）的危險，但是我們支付大款給國家資本主義，這不僅不會滅亡我們，反而能經過這一最可靠的道路，把我們引向到社會主義去。若是工人階級學會怎樣捍衛國家秩序來反對小私有制無政府性，學會怎樣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來安排全國性的大生產組織，那時它就能在各方面——恕我用這樣的話來形容，——都佔上風，那時社會主義底鞏固就會有了保證。

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比我國現時經濟要高越得不可比擬，這是第一。

第二，國家資本主義內面，並沒有包含任何對於蘇維埃政權是可怕的東西，因為蘇維埃國家是其中工人和貧民政權有了保障的國家」。

* * *

「…爲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首先舉出國家資本主義底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大家知道，這個例子就是德國。那裏存在有現代最新的大資本主義技術，以及服從於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若把上面這加上着重點的字樣刪去，同樣用國家，但已是另一種社會形式和另一種階級內容的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這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那你便可得到社會主義所給予的各種條件底總和。

沒有建築在最新科學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使千百萬人都最嚴格遵守統一定額的這種有計劃的國家組織，則社會主義便無從談起。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點隨時都講到過，所以對於那些甚至連這點都不瞭解的人（無政府主義者，大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值得絲毫費詞了。

同時，若沒有無產階級在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社會主義亦無從談起，這也是最初步的道理。歷史（除了孟什維克這班頭等蠢材之外，任何人也沒期待它會平穩、安靜、輕易、簡單地生出『完備的』社會主義來）演進得這麼奇特，到一九一八年時，却誕生出了社會主義底兩半，彼此隣近着，好像國際帝國主義這同一蛋殼內兩個未來的雞雛一樣。德國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是再明顯不過地體現了爲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諸條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條件。

若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勝利，那它也就會輕而易舉地一下子摧破帝國主義底任何蛋殼（可惜，這個蛋殼是由最好的鋼鐵所構成，而不是任何…雞雛底力量所能衝破的），也就定會實現世界社

會主義底勝利，而不經過困難，或者只經過極小的困難，——當然，這裏所謂『困難』是指全世界歷史意義範圍而言，而不是指平常小組式範圍的困難而言。

但如果德國革命仍遲延『爆發』，那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學習德國人底國家資本主義，用一切力量來採用這種資本主義，爲了加速野蠻羅斯人去採用西歐成果，應該不惜使用獨裁方式，在反對野蠻勢力時，決不拒絕使用野蠻的鬥爭手段。無政府主義者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若有人（我隨便記起了卡列林和格在中央執委會內所說的話）竟能自矜自傲地議論道，唔，向德國帝國主義『學習』，對我們這班革命家說來，簡直是格格不入的；那就祇應這樣回答說：要是認真來理會這班人的意見，革命便會無可挽救地（並且是完全應分地）遭到滅亡。

在俄國，此刻正是小資產者資本主義佔優勢，從這樣的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走向社會主義，都是走的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一個中間站口——即所謂『對產品生產與分配上實行全民統計與監督』。誰若不懂得這點，那他或者因不知道實際情形，看不見現成事物，不會辨別真理，或者祇局限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抽象的對立性，不去洞悉此刻我國這種過渡底具體形式和階段，而犯了不可饒恕的經濟錯誤。

附帶說說：這也是使新生活報與前進報派營壘中的優等份子喪失頭腦的同一理論錯誤：其中劣等與中等之輩，因爲稟性愚鈍和毫無氣節，已被資產階級所駭倒，追隨着資產階級底尾巴；而其優等人物則不瞭解：社會主義底導師們並不是徒勞無益地說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他們也不是白白強調地指出，新社會之『長時間的臨產苦痛』，並且這個新社會也還是抽象事物，祇有經過多種多樣尚未完善的，以求建立某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具體企圖，然後這一抽象事物，才能體現到實際生活中去。

正因為若不經過為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全民的統計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時經濟情況中前進一步，所以用『演進到國家資本主義一方法』的話來自駭駭人，這乃是理論上的荒謬絕倫之談。其實這也就是不懂得『演進』底真實道路，恰恰在思想上離開這條道路奔竄到『一方』去，而在實踐上這便等於是向小私有制資本主義開倒車。

為了使讀者相信，我還不只在現時，而是當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前，就對國家資本主義給了『高度』的估計，讓我來摘引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寫的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這小冊子中的話吧…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是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即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會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至一些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為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見第二七頁和二八頁）。

『…請看，這是在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寫的，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革命民主』國家。我們從這一政治梯級攀登得愈高，我們在蘇維埃中把這社會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得愈完備，則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就應當害怕得愈少，難道這不明顯嗎？在物質的，經濟的，生產的意思上說來，我們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如果不經過我們還未達到的這一門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難道這不明顯嗎？…』

* * *

「…還有以下這種情況，也是極有教益的。

當我們在中央執委會內與布哈林同志爭論時，他順便指出說：在關於給專門家以高度薪俸的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一些』，因為馬克思說過，在某種條件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是『從這匪幫手裏實行贖買』（即從資本家匪幫，也就是從資產階級手裏，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生產資料），這裏我們並看不出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

這是一番非常有趣的議論』。

『…請思考思考馬克思這話底意思吧。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是壟斷前期資本主義頂點時期，是當時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國家，是當時就工人『贖買』資產階級所有物而言，社會主義底『和平』勝利最有可能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某種條件下，工人並不拒絕向資產階級進行贖買。至於對變革底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束縛自己，也沒有束縛社會主義革命將來的活動家，他極卓越地瞭解到將來會有某些大批新的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環境會怎樣發生變化，這種環境在變革進程中會如何頻繁而急劇地變動着。

但在蘇維埃俄國，自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自從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鎮壓下去之後，某些條件業已按半世紀前在英國，——假如英國當時已開始和平地轉到社會主義，——本可形成的那些條件底樣式形成起來了，這難道不明顯麼？那時在英國本有下列種種情況能夠保證使資本家屈服於工人：（一）由於沒有農民（在七十年代的英國，已經有了一種徵候，可以指望社會主義在農村工人中能獲得非常迅速的成就），以致工人即無產者在全國人口中佔絕對優勢；（二）職工會內無產階級底高度組織性（當時英國在這方面，佔世界上第一位）；（三）無產階級受過歷來政治自由發展的訓練，而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程度；（四）組織得極好的英

國資產階級——當時他們是世界各國組織得最好的（現在這個首位已經轉到德國去了）——長期地慣於用妥協來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也就是因為這些情況，當時才能發生此種思想：可能使英國資本家和平地屈服於英國工人。

在我國，現時因有某些基本前提（十月革命的勝利，從十月到次年二月鎮壓了資本家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使這種屈服已經有了保障。在我國，有生活貧苦和急速破產的農民援助無產者的這種情形，來代替工人、無產者之佔人口絕大多數以及他們高度組織性的事實，而成爲勝利的因素。末了，在我國，雖沒有高度文化水準，却也沒有妥協的積習。如果將這些具體條件加以熟思，那末很顯然的，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當做到把這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要無情地懲治不文明的資本家，即懲治那班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去設想作任何妥協，祇是用投機業和收買貧民等手段來繼續破壞蘇維埃設施的資本家；另一方面要與文明的資本家，即與那班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實行這種資本主義，能以真正用生產品供給千百萬人之大企業底聰明練達組織者資格出現，能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布哈林是一個學識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以他才提到並完全贊同馬克思這樣教導工人的一番話，說正因為要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就得保存大生產組織，說如果（這是一種例外：當時英國就是如此）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並在贖買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好好地來償付資本家，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充分可以容許的。

但是布哈林錯誤了，因為他沒有考慮到俄國目前的具體特殊情形，這種情形之所以特殊，是由於現時，按我國政治制度及按工人政權力量說來，我們俄國無產階級比任何英國和任何德國的還要先進，而同時按相當完善的國家資本主義組織，按文化水準，按「施

行』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準備程度說來，我們俄國無產階級比西歐最落後國家的都還要落後。正因為這種特殊情形，遂使現時工人們應當向那些決心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相當認真幫助組織大規模『國家』生產之最有文化、最有天才和最有組織能力的資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贖買』，這難道不明顯麼？在這種特殊情形下，我們應當極力避免兩種在實質上都是小資產階級性的錯誤，這難道不明顯麼？一方面，這會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即如果聲明說，既然承認我們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不相適應，『所以』，本來就不應取得政權。所謂『囊中人』便是這樣議論着的，他們忘記了，『適應』是永遠也不會有的，無論在社會發展中或自然界發展中，都不能有這樣的適應，祇有經過許多嘗試，——其中每一種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適應的毛病，——才能從全世界無產者底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勝利的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縱容那班吶喊者和空談家，也會是彰明較著的錯誤，這些人表面上顯露得『格外』革命，但對於經過深思熟慮並估計到最困難過渡情形的堅韌革命工作，却無能為力。

幸而各革命政黨底發展以及布爾什維主義同這班人鬥爭的歷史，給我們遺留下了種種極鮮明的印象，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充分表現出是一種不大好的革命家。他們現在竟至瘋狂地叫喊着，急得喉嚨哽詰，高呼反對『右派布爾什維克』底『妥協』。可是他們却不善於想想，『妥協』究竟有什麼壞處，『妥協』又因為什麼要應份遭到歷史與革命進程底裁判。

克倫斯基時代的妥協，曾經把政權交給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政權問題乃是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間一部份布爾什維克底妥協，或者是害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或者是願意不僅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類『不可靠的同路人』，並且與切爾諾夫輩和孟什維克這些敵人來分掌政權，殊不知當時這些敵人在基

本問題上，即在解散立憲會議，在無情地撲滅博加也夫斯基輩，在充分實施蘇維埃制度，在進行每次沒收等等方面，是必然會來妨害我們的。

現在政權已經由一個政黨，即無產階級政黨奪得了，保住了，鞏固了，甚至沒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參加。現在當已經談不到並且也不能談到什麼分掌政權，什麼無產者拋棄反資產階級的專政時來談妥協，就無異於像鸚鵡一樣，祇是簡單重覆那些唸得爛熟，但毫不瞭解的字句罷了。當我們已進到能夠而且應當管理國家之際，我們便不惜金錢，極力吸收那班由資本主義所培養出、文化程度極高的份子到自己方面，任用他們來反對小私有者的分崩離析現象，而在此時把這種舉動竟稱之為『妥協』，這就是根本不善於思索社會主義建設底經濟任務』。

論糧食稅，自由貿易，租讓制

以上所摘引的一九一八年這篇論文中，關於期限一層，有許多錯誤。實際期限比當時所推想的要長久一些。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國經濟底基本成份，依然與從前一樣。農民中的『貧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在極多的場合下，變成了中農。小私有者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因之加強了。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異常加深了國內經濟破壞現象，阻滯了國內生產力的恢復，其中受害最大的正是無產階級。加之一九二〇年的歉收，飼料缺乏，牲畜病死，這便更加厲害地阻滯了運輸業與工業的恢復，於是也就反映到例如由農民馬匹裝運我國主要燃料即木柴的事宜上。

結果，一九二一年春形成的政治形勢，要求必須立刻採取最堅決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

為什麼不是改善工人生活狀況，而是改善農民生生活狀況呢？

因為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就需要有糧食和燃料。從整個國家經濟說來，此刻最大的『阻塞』正是從這裏發生的。要提高糧食底生產和收成，增加燃料底採辦和運輸，祇有首先改善農民生活狀況，提高他們的生產力。應該從農民方面開始。誰若不明白這點，誰若認為把農民提到第一位就等於『放棄』或類似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那他簡直是不去實地思索，而陷入空談。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無產階級這領導階級，即統治階級，應當善於規劃政策，要首先解決最刻不容緩和『迫在眉睫』的任務。現在最刻不容緩的，就是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祇有經過這種辦法，才可達到既改善工人生活，又能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那些想不經過這種辦法來改善工人生活的無產者或無產階級代表，實際上祇會是白黨和資本家的走僕。因為不經過這種辦法，就無異是把工人的行會利益看得高於階級利益，就無異是為了工人直接的，一時的，局部的利益，來犧牲整個工人階級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專政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地主資本家這一聯盟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在為解放勞動擺脫資本桎梏的鬥爭中之領導作用底利益。

總之，首先要採取緊急和嚴重辦法來提高農民底生產力。

要做到這點，就非嚴重改變糧食政策不可。這種改變就是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而此種更替是與至少在地方經濟周轉中繳納稅務之後的自由貿易相聯繫的。

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這政策的實質何在呢？

關於這點，現在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流行着，而且流行得很廣。其不正確的地方，大部份是由於人們不洞悉過渡底實質，沒有反躬自問，究竟這一過渡是從什麼過渡到什麼上去。他們竟異想天開，彷彿過渡是由一般共產主義過渡到一般資產階級性上去。要來反對這種錯誤觀念，不免要指出一九一八年五月我所說過的話。

糧食稅是從因極端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而被迫採取的特殊『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物品交換制的一種過渡形式。而物品交換制，又是從帶有因居民中小農佔優勢所發生之諸特點的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去的一種過渡形式。

特殊『戰時共產主義』原來是這樣的：我們從農民手裏實際上拿來了全部的餘糧，甚至有時還不僅是餘糧，而是農民底一部份必需食糧，我們拿來這些糧食，爲的是供給軍隊，供養工人。其中大部份，我們是當作債務拿來，因爲付給農民的都是紙幣。否則，當時我們便不能在這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內，戰勝地主和資本家。結果我們勝利了（那怕全世界最雄強的國家支持過我國的剝削者），這一事實不僅表明，工人和農民在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該能於建樹怎樣的英勇奇績，這一事實並且表明，當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考茨基之流拿『戰時共產主義』來歸咎於我們時，他們所起的只是資產階級走狗底作用。應該拿這『戰時共產主義』來歸功於我們。

但同樣還必須知道這一功績底真正範圍。『戰時共產主義』曾是由於戰爭和經濟破壞所迫不得已實行的。它不會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在小農國家實現本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其正確政策是要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去交換糧食。祇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適合無產階級底任務，祇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底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進到完全勝利。

糧食稅是走向這種糧食政策的過渡。我國經濟至今還破壞得如此不堪，戰爭（這是昨天的戰爭，但因爲資本家的貪暴，它明天還可以爆發的）把我們仍抑壓得這樣厲害，以致我們尚不能拿出工業品從農民那裏換得我們所必需的全部糧食。我們懂得這點，我們實行糧食稅，就是要把最必需（對軍隊和工人）的糧食量作爲稅務徵收得來，而其餘的糧食，我們則將用工業品去交換。

這裏，還不應忘記以下的情形，貧困與經濟破壞到了這種程度，竟使我們不能一下子來恢復巨大社會主義國營工廠的生產。爲了這點，在各大工業中心需要儲存大量的糧食和燃料，需要有新機器來替代舊機器等等。我們根據經驗，深信一下子要作到這點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們知道，經過這次大破壞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甚至最富庶和最先進的國家，也祇有在一定的，相當長的，多年的時期內，才能解決這個任務。由此可見，必須在某種限度內幫助恢復小工業，它既不需要機器，也不需要國家大量原料、燃料和糧食底儲存，——而又能立刻給予農民經濟以相當幫助，並提高它們的生產力。

這樣，結果又會怎樣呢？

結果就會在相當的（那怕祇是地方性的）自由貿易基礎上，使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復興起來。這是毫無疑義的，漠視這樣的事實便太可笑了。

試問，這是必要的麼？這是對的麼？這沒有危險麼？

同類的問題能發出很多，但這些問題多半祇是暴露發出這些問題的人底幼稚氣（說得輕一點）。

請看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怎樣確定我國經濟上現存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組成部份）。我國存在有自宗法的，即半野蠻的，直到社會主義的所有這五種結構底全部五層梯級（或組成部份），誰要想來爭辯這點，都會是徒勞無益的。在一個小農國家，不言而喻，是小農『結構』，即一部份是宗法的，一部份是小資產階級的結構佔着優勢。既有交換，則小經濟底發展，就是小資產者的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乃是不庸爭辯的真理，乃是政治經濟學上最初步的真理，並且是由日常經驗，甚至是平凡觀察所證實着的真理。

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處在這樣的實際經濟情況下，究竟能進行哪樣的政策呢？是把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中小農所需要的一切產品都

拿給小農，去換得糧食和原料麼？這會是一個最如願的，最『正確的』政策，——這種政策我們也已經開始實行了。但是我們不能拿出全部工業品來，還遠不能拿出，也不會很快就能拿出——最低限度，當全國電氣化計劃的初批工作尙未完竣之前，我們是不能拿出——這全部工業品來的。然則怎樣辦呢？或者是企圖把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條件下所必然發生的這種非國營的私人交換、即商業、即資本主義底一切發展，完全加以禁止，完全封閉起來。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自殺。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其所以是自殺，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黨，就必然會遭到破產。應當承認，有些共產黨員正墮入這樣的政策，而在『思想、言論、行動』上，犯了錯誤。我們力求糾正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這種錯誤，不然後事將不堪設想。

或者（這是最後一種可能的與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企圖禁止或封閉資本主義底發展，而力圖把這一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這在經濟上是可能的，因為凡是有一般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成份的地方，那裏——在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上——就有國家資本主義。

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結合、滲合起來，這是否可能呢？

當然可能。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所要證明的，正是這點。我相信，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也證明過了這點。並且，當時我就證明說，國家資本主義較之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說來，乃是一個進步。在現時政治經濟情勢下，必須把國家資本主義來與小資產階級生產比較，而人們却把國家資本主義祇與社會主義相對照或比擬，那就大錯特錯了。

全部問題——無論理論上或實踐上的問題——就是要找到正當的方法，應該怎樣把資本主義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內和某種

期限內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這必須賴有一些什麼條件,怎樣保證在不遠將來變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盡量明確地想像到,在我們蘇維埃制度內,在我們蘇維埃國家範圍內,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會是怎樣的,可能是怎樣的。

蘇維埃政權怎樣能把資本主義底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以及它怎樣『培植』國家資本主義,此種情形之最簡明的例證,就是租讓制。現在我們這裏,大家都同意租讓制是必要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思索到租讓制有何意義。就所有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及其對比關係說來,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制是什麼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為了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與國家資本主義結成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這就是資本家。他們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業務,是為要獲得利潤,他們與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要獲得高於普通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說,是為要獲得用別的方法所不能得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所獲得的利益,便是發展生產力,便是立刻或在極短期內,增加生產品量。譬如說,我們有一百個某種產業,礦山,林區。我們開採不了這全部企業——我們的機器,糧食,運輸工具不夠。因為這同樣原因,其餘各產區,我們也開採得不好。正由於大企業經營得不好和開採得不充分,以致小私有者自發勢力在各方面都加強起來:削弱附近的(以後便是整個的)農民經濟,破壞它的生產力,降低它對蘇維埃的信仰,盜竊公物行為與大量的,範圍雖小而最危險的投機業等等。蘇維埃政權『培植』像租讓制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就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由自己支配的(自己份內的)大工業生產品量,加強有國家調度的

經濟關係來敵對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係。恰當而審慎地進行租讓政策，這無疑是能夠幫助我們迅速（在某種不大的程度內）改良生產情況，改善工農生活，——當然是有某些犧牲作代價，即要把千百萬普特極寶貴的物品交給資本家。使租讓制對我們有利益而沒有危害，這種範圍與條件的確定，是取決於力量底對比，取決於鬥爭，因為租讓制也是一種鬥爭，是階級鬥爭另一形式底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鬥爭。實踐會指明出鬥爭底方式。

租讓制的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維埃制度下國家資本主義底其他式樣說來，差不多是最簡單、最顯著、最明豁、最確定的形式。這裏我們與最文明的，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的書面合同。我們確知自己的利益與損失，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確知租讓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規定有先期贖回的權利時，我們也確知先期購回的條件。我們給全世界資本主義支付一定的『貢款』，在某種關係上從他們那裏實行『贖買』，同時我們却能立刻獲得鞏固蘇維埃政權地位和改善我國經濟事宜的一定手段。關於租讓制這任務底全部困難歸結起來，就是在訂立租讓合同時，一切都要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就要善於監視該合同的執行。這裏，困難無疑義是有的，這裏，錯誤在初期定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困難，較之社會革命底其他各種任務，就中較之發展、容許和培植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他各種形式說來，還是最小的困難。

由於施行糧食稅，所以黨與蘇維埃一切工作人員底最重要任務，是要善於把『租讓』（也如『租讓』制國家資本主義一樣）政策底原則、原理和基礎，運用到自由貿易及地方周轉等等資本主義底其他形式上去。

試拿合作制來說吧。無怪乎糧食稅法令引起對合作制原則要立刻重新審查，要相當擴大合作社的『自由』及其權利。因為合作制

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不過這種形式比較不很簡單，不很明確，情形比較紛雜，遂使我們政權在實踐上遇到更大的困難。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這裏不是指工人合作社，而是指小農國家內佔優勢的、標本式的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而言）必然產生出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促成這種關係的發展，把小資本家提到首位，給他們以最大的利益。既然是小業主佔優勢，既然交換是可能而且必要，那麼情形也就只能是這樣。在現時俄國條件下，合作社底自由與權利，也就是資本主義有自由、有權利。不看見這一顯明的真理，便是愚蠢或罪惡。

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合作制』資本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不同，它乃是變形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此刻，它在某種程度上，顯然對我們有利益。糧食稅既意味着能自由出賣其餘（除納稅外）的剩餘品，那末我們就必須極力把資本主義底這種發展（須知自由出賣，即自由貿易便是資本主義底發展）方向引導到合作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從便於統計、監督、監察以及國家（這裏是指蘇維埃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合同關係上說來，合作制資本主義近似於國家資本主義。合作社這一商業形式，要比私人商業有利益些，這不僅因為上述原因，並且因為它便於聯合與組織千百萬居民，爾後則聯合與組織全體居民，而這種情勢，從進一步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上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優點。

我們來把國家資本主義底這兩種形式，即租讓制與合作制，加以比擬吧。租讓制是依據於大機器工業，合作制則依據於小手工業，其中一部份甚至還是宗法式的小手工業。租讓制在每一單獨租讓合同上祇關係於一個資本家或一個公司，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合作制則包括成千累萬以至千百萬的小業主。租讓制容許，甚至預先要訂立確切的合同和規定確切的期限。合作制却不能有完全確定的合同或完全確定的期限。取消關於合作制的法律，比解除租

讓合同要容易得多，可是租讓合同中斷，也就是一下子、簡單、立刻中斷與資本家所作經濟聯盟或經濟『同居』底實際關係，至於取消關於合作制的法律以及一般任何的法律，都不僅不會一下子破壞蘇維埃政權與小資本家的實際『同居』關係，而且一般地也不能破壞實際的經濟關係。『監視』承租者容易，『監視』合作社手困難。由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大生產形式。由小業主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這種過渡是比較複雜的，但它在成功時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前期的，甚至資本主義前期的，即最頑強反抗一切『革新』辦法的那些關係底深固根蒂拔掉。租讓制政策奏效時，能使我們獲得爲數不多，但却合乎現代先進資本主義水準的模範（比較我國的說來）大企業；經過幾十年後，這些企業會完全轉歸我們所有。合作制政策奏效時，能使我們振興小經濟，能使小經濟在不定期間，按自願聯合原則，易於過渡到大生產去。

再舉第三種國家資本主義來說。國家把資本家當作商人吸引前來，由他來出賣國家貨物與購買小生產者底產品，付給他一定的代買代賣的利息。第四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把國有的某種場所或產區，林地，土地等租予企業資本家，而且租借合同與租讓合同極相類似。關於最後這兩種國家資本主義，在我們這裏，完全沒有人說到，完全沒有人想到，完全沒有人覺察出它們來。但其所以這樣，並不是因爲我們強大聰敏，而是因爲我們軟弱蠢笨。我們害怕正視這種『粗淺真理』，往往過於爲『帶欺騙性的抬舉』所支配。我們慣於認爲『我們』正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却忘記去明確想到，究竟這『我們』是誰。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論文內所列舉的我國經濟中社會經濟底一切——定是一切，毫無例外——組成部份，一切不同結構，必須加以嚴重注意，使這一明確概念不致於忘記。『我們』，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正在

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這先進部隊祇是全體無產階級中不大的一部份，而無產階級也祇是全民衆中不大的一部份。所以要使『我們』能夠有成效地解決我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這一任務，就應當瞭解：爲了使資本主義前期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究竟需要哪些間接的道路、方法、手段和補助辦法。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試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底地圖吧。在沃洛果達以北，頓河岸羅斯托夫及薩拉托夫東南，奧倫堡和阿姆斯特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這些茫無際涯的空曠地帶上，可以分佈幾十個巨大的文明國家。可是在這些空曠地方，還是宗法制，半野蠻性以至真正野蠻性籠罩着。而在俄國所有其餘那些偏僻鄉村，又怎樣呢？那裏到處一成幾十俄里都是林區小路——正確些說：一成幾十俄里都是無路地區，而把鄉村與鐵路隔離，即與文化，與資本主義，與大工業，與大城市的物質脈絡隔離。難道在這些地方不也到處都同樣是宗法制，奧布洛莫夫精神⁸¹，半野蠻性佔優勢麼？

俄國既是這種情況佔優勢，試問由這種情況能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呢？不錯，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須有一個條件，現在我們由於一種已告成功的巨大科學工作，對這一條件知道得很確切。這個條件就是電氣化。如果我們能建成幾十個區域的電站（現在我們曉得，在什麼地方用什麼辦法，能夠而且必須建成這些電站），如果我們能從這些電站中把電力傳導到每個村莊裏去，如果我們弄得到充分的電氣摩托及其他機器，那時就不需要，或者幾乎不需要由宗法制進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與過渡梯級。但我們深知，實現這『一個』條件，祇是做到頭批工作，就至少要花費十年的功夫，至於縮短這個期限，也祇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德美這些國家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在最近將來這幾年內，要善於想想那些便利於由宗法制，由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我們』往往總還這樣議論：

『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福利』。但這種議論是不正確的，因為忘記了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底全部總和，而所涉及的祇是其中的兩種成份。

資本主義，若與社會主義比較，確是禍害。但與中世紀制，與小生產，與聯繫着小生產者散漫性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便是福利。既然我們還無力實現由小生產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資本主義——它是小生產與交換底自發產物，——在某種範圍內便不可避免，所以我們也就應當把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與社會主義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來利用（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

試舉官僚主義這個問題，請從經濟方面來加以觀察吧。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時，官僚主義還值得我們注意。十月革命半年之後，當我們自上至下已打破了這套舊官僚機關的時候，我們還感覺不到這一惡事。

又過了一年。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至二十三日舉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通過了新黨綱，在這黨綱中，我們公開說，不要害怕承認惡事，要甘願把它暴露出來，加以揭破，使其遭人鄙棄，喚起同惡事作鬥爭的思想，意志，毅力和行動；並且說到『蘇維埃制度內官僚主義部份地復活』這點。

又過了兩年。一九二一年春，當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討論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官僚主義問題，當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一年三月）總結了那與分析官僚主義有密切關係的爭論之後，我們便見到這一惡事是更加顯著，更加明確，更加猙獰可畏了。官僚主義底經濟根源是怎樣的呢？這種根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已臻發展的資產階級，正為了反對工人（局部地反對農民）底革命運動，需要官僚機關，首先是軍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機關。這種機關，我們這裏沒有。我國法院是反資產階級

的階級法院。我國軍隊是反資產階級的階級軍隊。官僚主義並不在軍隊中，而是在為軍隊服務的機關裏。我國的官僚主義具有另一種經濟根源：小生產者底零散狀態，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閉塞，文盲現象，農業與工業間缺乏周轉，兩者間缺乏聯繫和協作用。這大部份是國內戰爭的結果。當時我們被敵人四面封鎖，各方包圍，失去同全世界的連絡，以後又與南方糧區，與西伯利亞，與煤區斷絕關係，我們會無法恢復工業。那時我們本來應當敢於實行『戰時共產主義』，不怕採取過激辦法：我們忍受得住半飢餓的，甚至比半飢餓更壞的生活狀況，但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工農政權，縱然有空前未聞的最大經濟破壞和缺乏周轉的情形，我們也定要堅持住工農政權。我們並不會被那些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實際上大都是因為恐懼，因為驚嚇，才去擁護資產階級）嚇倒了的事物所嚇倒。然而那種在一個被封鎖的國家中，在一個被包圍的要塞內本來成為致勝條件的東西，在一九二一年春，當最後一批白匪澈底被驅出蘇俄領土之後，却表現出了自己的反面。在一個被圍的要塞內，可能而且應當『停閉』一切周轉；因為羣衆底特別英勇精神，使這種情形可以忍受到三年之久。自此以後，小生產者底破產，更加厲害了。恢復大工業一舉，更加拖延，更加緩期了。於是『被包圍』結果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即小生產者之散漫與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築物，便充分顯露出來。

應該大胆承認惡事，為的是要更堅決地同惡事作鬥爭，為的是要再次再次地從頭開始——在將來我國建設底一切部門中，我們還不得不多番重覆地從頭做起，改正沒有作好的事情，選擇各種完成任務的道路。既然恢復大工業要延期了，既然工農業間的周轉『被停閉』得不可忍受，那就應該從較易做到的事開始，即從恢復小工業開始。從這方面來幫助事業，把被戰爭與封鎖弄得一半倒場的建築物底這一邊支撐起來。要用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都要發展工農

業的周轉，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因為在我國（經濟上由於剝奪了地主與資本家，政治上由於存在有工農政權）給予資本主義活動底範圍是充分狹隘，充分不大的。這就是糧食稅底基本意思，這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

黨與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人員，應當用全副力量並百般注意地去造成和喚起各地方在經濟建設事業中的大量主動精神，——省裏的要大，縣裏的更大，鄉裏的和村裏的更要大，——其目的是要刻不容緩地，那怕就是用『小』資料，在小範圍內去振興農民經濟，藉發展附近的小工業來幫助農民經濟。全國統一的經濟計劃，正要使這點成爲注意和關懷底中心，成爲『突擊』工作底中心。這裏所已經達到的，最接近於那極廣泛深刻『基礎』的某種改善，都能使我們在最短期間去更熱烈更順利地恢復大工業。

糧食工作員至今只知道一個基本指令：收集百分之百的餘糧。現在是另一個指令了：在最短期間，徵來百分之百的糧稅，其次是用大工業和小工業生產品，再換來百分之百的糧食。一個徵來百分之七十五的糧稅和另外用大小工業生產品換來百分之七十五（從第二個百分數中）糧食的人，他所做的有利於國家的事情，比另一個徵來百分之百的糧稅和用工業品換來百分之五十五（從第二個百分數中）糧食的人，要多得多。糧食工作員底任務複雜起來。一方面，這是國家財政上的任務。要儘量快和儘量合理地徵收糧稅。另一方面，這又是一般經濟的任務。要極力這樣去引導合作社，這樣去補助小工業，這樣去發展地方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使農業和工業間的周轉得以增大與鞏固。我們還沒有學會做這件事，做得很壞很壞；拿官僚主義來說，也就可以證明這點。應該大胆承認，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而且應當向資本家學習。我們按省、縣、鄉、村來把實際經驗總結加以比較吧：有的地方，私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達到了某種成就。他們獲得的利潤，大約是多少。這也就是我們爲

了『領教』所付出的貢款或酬金。爲了領教，是不惜破費的，祇要能夠獲益就行。在隣近地方，經辦合作社也有了某種成就。合作社底利潤如此如此，至於在第三個地方，用純粹國家的、純粹共產主義的方式，也達到了什麼成績（這第三種情形在目前是罕有的例外）。

任務應當是使每個省的經濟中心，每個省蘇維埃執委會下的經濟會議，立刻把農民繳納糧稅後餘糧『周轉』底各種經驗或制度加以組織好的問題，提在首位。幾月之後，就應當有實際結果，好來從事研究與比擬。本地鹽或外來鹽；從中心區運來的煤油；手工木製業；靠本地原料，生產某些雖不很重要，但於農民有利的必需品的手工業；『綠煤』（利用當地小規模的水力來發電）等等等等——這一切都應當動用起來，無論如何都要活躍工農業間的周轉。誰能在這方面，那怕是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法，甚至是沒有合作社，沒有直接變這資本主義爲國家資本主義，而能達到最大的成績，則他對於全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貢獻，較之那些祇會『關注』共產主義底純潔，祇會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合作制頒佈規章，條文，訓令，但實踐上却不能推動這種周轉的人，要多得多。

可以把這視若奇談：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爲社會主義底輔助物麼？

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不庸爭辯的事實。既然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經過了戰爭與封鎖，運輸業遭到重大破壞，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有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所領導，那末，根據這種情形，第一，就必然產生現時地方周轉底頭等意義，第二，就能夠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儘可少來爭論名詞。直到現在，我們在這方面，還犯着多得無窮的錯誤。在實際經驗中，儘可多具有各種不同的樣式，儘可多來研究這些樣式。有時甚至是範圍最小的模範地方工作，較之中央國家工作底許多部門，具有更重要的國家意義。目前我國恰在一般農民經濟，特別是用工業品交換農業剩餘品方面，其條件正是如此。在

上述方面，雖則是一個區的模範工作佈置，較之『模範』地改善某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這工作，有着更巨大的全國意義。因為我們的中央機關在這三年半來，居然已經擁有某些有害的因循慣習；我們還不能把這種機關大大地和迅速地加以改善，這點，我們不知道怎樣辦才好。要幫助中央機關來比較急進地從事改善，使之增加大批新生力量，使之順利地同官僚主義作鬥爭，使之克服有害的因循慣習，這種幫助就應當從地方得來，從下層得來，從一個不大的『整體』模範佈置中得來，不過，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整體』，即不是一種經濟，不是一個經濟部門，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切經濟關係底總和，那怕是在不大的地方範圍內的一切經濟周轉底總和。

我們中間，凡屬必須留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即令是在相當狹小和直接能做到的範圍內，也得繼續進行這改善機關的工作，清洗其中的官僚主義。但在這方面，主要幫助是來自地方，並且一定可能從那裏來到。據我看來，我們各地方的情形比在中央這裏一般地要好一些，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官僚主義底惡事，自然是集中在首都這裏；在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個壞城市，並且是全共和國內最壞的『地方』。在各地方，有兩種傾向；壞傾向要比好傾向少些。所謂壞傾向，就是那些混入到共產黨裏來的舊官僚、地主、資產者及其他敗類之從中舞弊，他們有時對農民作出種種暴戾欺凌的有害行爲。這裏要用恐怖手段來實行清洗：就地審判，無條件槍決。讓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以及類似他們的非黨市僧，去拍胸叫呼：『謝謝上帝，好在我與『他們』不同，好在我從來都不贊成恐怖手段』。這些傻瓜『不贊成恐怖手段』，因為他們所起的作用，是專在愚弄工農這點上替白匪當鷹犬當奴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贊成恐怖手段』，因為他們所起的作用，是藉『社會主義』旗幟的掩護，把羣衆引進到白匪的恐怖手段下面去。俄國的克倫斯基時代與科爾尼洛夫叛亂，西伯利亞的高爾察克匪行，

格魯吉亞的孟什維主義，都證實了這點；芬蘭，匈牙利，奧地利，德國，意大利，英國等等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⁸² 英雄們的行爲，也證明了這點。讓白黨恐怖主義底鷹犬奴僕們去誇耀他們否認一切恐怖手段吧。而我們還是要說出這一嚴重而不庸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經歷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後空前危機，舊的社會關係中斷和階級鬥爭尖銳的國家裏，——世界一切國家都是這樣，——適與偽君子和空談家相反，沒有恐怖手段是絕對不行的。或者是美國的，英國（對愛爾蘭）的，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德國的，匈牙利的以及其他樣式的白匪和資產階級的恐怖手段，或者是赤色的，無產階級的恐怖手段。決沒有中間手段，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第三種』手段。

好傾向就是：有成效地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極力注意工人和農民底需要，最關心於振興經濟事宜，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各地工農業間的周轉。這種好傾向，雖則比壞傾向頻繁一些，但畢竟還嫌太少。可是這好傾向總算是有了。被國內戰爭和貧乏現象所鍛鍊出來的新穎的，年輕的，生動的共產主義力量，各地方上到處都在成長着。對於自下而上來不屈不撓、有系統地推進這種力量，我們總還做得遠遠不夠。這點可以而且必須更廣泛和更堅定地做去。能夠並且必須把某些工作人員從中央工作中調到地方工作中去：使他們以縣和鄉領導人資格，在那裏從各方面把整個經濟工作模範地佈置起來，這樣，他們會有極大的貢獻，並能比某個中央機構作出更重要的全國性的事業。因為模範工作，將成爲工作人員的養成所和被人做法的榜樣，有了這種榜樣再來加以做法，就相當不困難了，而我們又能從中央這裏加以幫助，使這種模範例子務必在到處廣泛『採用』。

靠繳納糧稅後的剩餘農產品，和靠小工業，主要是靠手工工業來發展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這一事業的本身就需要有地方

上獨立的、明達的、聰穎的主動精神，因為從全國的觀點來說，樹立縣的鄉的模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軍事上，例如，在最後一次抗波戰爭期間，我們未曾害怕違背官僚主義的等級制，沒有害怕『降低位置』，竟把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仍保留他們那高級的，中央機關的職務）調遣到較下級的地方去工作。爲什麼現在又不能將全俄中央執委會或其他委員會的某些委員，或其他身任要職的同志們，甚至派遣到縣裏，甚至派遣到鄉裏去工作呢？真的，我們並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竟會因此『窘悵』起來。何況我們這裏，能夠找得出幾十個甘願去擔負這種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員。全共和國經濟建設事業會由此收到非常巨大的成效，至於若干模範鄉或模範縣就會起着不僅是巨大的，而逕直是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作用。

順便說說，在同投機業作鬥爭這問題的原則提法上，應該加以必要的變更，雖則這是小節，但總還是有意義的。凡是不逃避國家監督的『正當』貿易，我們應當加以支持，發展這樣的商業對我們是有利的。但如果從政治經濟意義上來瞭解投機業，那麼投機業與『正當』貿易也就不能區分開來。自由貿易便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便是投機業，——不看到這點便是很可笑的。

然則怎樣辦呢？難道宣佈投機業是不受懲罰的麼？

不是的。要重新審查與重新製定關於投機業的一切法令，宣佈一切盜竊公物行爲和一切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秘地逃避國家監督、監察和統計的不法行爲，都應受到懲罰（實際上應比以前加倍嚴究）。正要這樣來提出問題（人民委員會已經開始這種工作，也就是說，人民委員會已經下令重新審查關於投機業的法令），我們才能達到把資本主義底必然發展，而在某種範圍內對我們還是必要的發展方向，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

政治總結和結論

我還要那怕是簡略地講講政治形勢，究竟目前的政治形勢怎樣，由於上述經濟情況，它起了什麼變化。

我已經說過，一九二一年我國經濟底基本特徵，是與一九一八年時相同。一九二一年春，主要由於歉收和牲畜死亡，遂使原來就因戰爭和封鎖之故已經非常嚴重的農民生活狀況，極端惡化下去。一般小生產者所『特具』的政治動搖，乃是生活惡化底結果。這種動搖最顯明的表現，便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亂。

喀琅施塔得事變中最顯著的特徵，正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動搖。而充分形成了的，明顯的，確定的東西却很少。無非是『自由』，『自由貿易』，『解放』，『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或改選蘇維埃，或擺脫『一黨專政』如此等等的模糊口號。無論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都宣稱喀琅施塔得運動是他們『自己』的運動。切爾諾夫派了一個專使到喀琅施塔得去：依據這位專使的提議，喀琅施塔得叛亂領袖之一，即孟什維克法爾克在喀琅施塔得也贊成『立憲會議』。所有一切白黨份子，快得像迅雷疾電一樣，立刻動員起來『擁護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黨軍事專家，不止是科茲洛夫斯基一人，還有其他許多專門家，製定了在奧蘭林坂登陸的計劃，這個計劃把擁護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那班動搖不定的非黨羣衆都嚇倒了。有五十種以上在國外出版的白黨俄文報紙，展開了瘋狂的運動，來『擁護喀琅施塔得』。許多大銀行以及財政資本底全部勢力都實行募捐，援助喀琅施塔得。資產階級與地主底一位聰明首領，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則耐心地向切爾諾夫這傻瓜直接解釋（而向那些因與喀琅施塔得事件有關，被禁在彼得堡監獄裏的孟什維克唐恩和羅什科夫則間接解釋）說，用不着

忙於召集立憲會議，可以而且應當主張祇要是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

當然，要比像切爾諾夫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空談英雄，或馬爾托夫這樣的冒充『馬克思主義』的市儈改良主義武士，即此類妄自尊大的傻瓜們聰明一些，並不困難。老實說，這並不是因為米留可夫爲人要聰明一些，而是因為大資產階級黨的領袖，由於自己的階級地位，而對問題底階級實質和政治上的相互關係，較之小資產階級底領袖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看得清楚一些，懂得高明一些。因為資產階級真正是階級力量，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是君主政體內或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必然居於統治地位，同時它必然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贊助。至於小資產階級，亦即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全體英雄，按其經濟地位實質來說，唯一祇能是階級軟弱無力的表現——由此也就產生出動搖，空談和一籌莫展。在一七八九年，小資產者還能成爲偉大的革命家；在一八四八年，他們已是可笑而又可憐；而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時，按其實際作用來說，不管他們是被稱爲切爾諾夫輩或馬爾托夫輩，考茨基之流或麥克唐納爾之流等等等，總之，他們都是反動勢力底可惡鷹犬，都是反動勢力的直接奴僕罷了。

當馬爾托夫在柏林自辦的雜誌上聲明說：彷彿喀琅施塔得不僅實行了孟什維克的口號，並且還證明了可能有個並非完全向白黨、資本家和地主服務的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發生，這正是標本市儈式的自尊自傲精神：喂，我們就簡單閉着眼睛，不去管那所有一切真正白黨都會歡迎喀琅施塔得叛亂者，並經過銀行募款幫助喀琅施塔得叛亂的事實吧！米留可夫與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比較起來，他的話是對的，因為他洩露出了真正白黨勢力，即資本家地主勢力底真正策略：喂，我們來援助任何人那怕是無政府主義者都行，援助任何蘇維埃政權都行，唯一是要能推翻布爾什維克，唯一是要使政權轉

移哩！不管它向右移去或向左移去，不管移到孟什維克手上去或移到無政府主義者手裏去，橫豎一樣，唯一是要把政權從布爾什維克手裏移走；至於其餘的事，——由『我們』米留可夫派，由『我們』資本家地主，『親自』來作好了，我們將把無政府主義者小卒們，切爾諾夫輩，馬爾托夫輩一喝趕掉，也像在西伯利亞趕走切爾諾夫和馬依斯基，在匈牙利趕走匈牙利的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在德國趕走考茨基，在維也納趕走阿得列爾之流一樣。這類自尊自傲的市僧——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非黨份子，曾被真做實幹的資產階級成千累百的愚弄過，被他們在一切革命中，在一切國家中百十次地趕走過。這是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這是事實所已經檢驗過的。自尊自傲之輩將繼續侈口空談，而米留可夫輩和白黨份子却將真做實幹哩。

稍微向右移去或稍微向左移去，橫豎一樣，唯一是要把政權從布爾什維克手裏移走，至於其餘的事，也就自然迎刃而解，在這點上，米留可夫完全對的。這乃是一切國家自中世紀以後新時代底一切革命史所證實了的階級真理。零星散漫的小生產者，即農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資產階級來聯合他們（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一切國家，在新時代一切革命中，從來往往是如此，祇要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永遠會是如此），或者是由無產階級來聯合他們（這在新時代某些偉大革命高潮中最短期間內的萌芽形式上曾經有過；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俄國之比較發達的形式上也有過）。祇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徒，才能空談與夢想什麼『第三條』道路，什麼『第三種』勢力。

布爾什維克費過極大的氣力，在決死的鬥爭中，培養出了能於實現管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創立並捍衛住了無產階級專政，經過四年來的經驗與實踐檢驗之後，俄國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已經成爲再明顯不過的了：唯一革命階級之受過鍛鍊的鋼鐵般的先鋒

隊，小資產階級之動搖不定的自發勢力，再就是隱匿在國外並擁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援助的米留可夫輩，資本家和地主們。問題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只有他們這班人才來利用和能夠利用各種所謂『轉移政權』的勾當。

在上述一九一八年那本小冊子中，關於這點公開說道：『主要敵人』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或者是我們使這種勢力來服從我們的監督與統計，或者是這種勢力必然地和不免地推翻工人政權，如同正是在這小私有制基地上成長起來的拿破崙輩和卡芬雅克輩之曾經推翻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問題也祇是如此』（摘自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的小冊子，見以上本文）。

我們的力量，就是對俄國及國際現存一切階級力量有充分明顯和清醒的估計，再就是由此產生的鬥爭中的鋼鐵毅力，堅韌意志，堅決性和奮不顧身的精神。我們的敵人很多，但他們是分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如一切小資產者，一切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一切非黨份子，一切無政府主義者）。而我們是聯合的——本身的直接聯合，與全世界無產者的間接聯合；我們知道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在國際範圍內，是不可戰勝的，但這絲毫不排除在某一時期中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有遭受失敗的可能。

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無怪乎被稱為自發的勢力，因為這實在是一種無定形的，不固定的，不自覺的東西。小資產階級底自尊自傲之輩，以為用『全民投票』就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小生產者底天性，但其實這祇是幫助資產階級，是藉助於教堂、刊物、教師、警察、軍閥機關、無數的經濟壓迫形式，幫助資產階級去壓服零散的小生產者。經濟破壞、貧困、艱難生活引起動搖：今天贊助資產階級，明天贊成無產階級。祇有經過鍛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於巍然屹立來對抗這種動搖。

一九二一年春的事變，再次表明了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底作用：他們幫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布爾什維克方面動搖開去，幫助把『政權轉移』到資本家和地主方面。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現在學會了用『非黨人』來自加粉飾。這是已經充分證明了的。現在也祇有傻瓜才能不看見這點，才不懂得，我們是決不能受人愚弄的。非黨代表會議並不是可以盲目崇拜的東西。如果我們能用來接近尚未沾染政治的羣衆，接近不問政治的千百萬勞動者，則這種會議是有益的，但如果它們變爲以『非黨人』自飾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講壇，那這種會議便有害了。因爲這班人幫助叛賊，幫助白匪。無論是公開的或粉飾爲非黨人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的位置却應該是在監獄裏（或在國外雜誌上與白黨併列；我們樂意放走了馬爾托夫到外國去），但不是在非黨代表會議上。可以而且應當找到檢查羣衆情緒和接近羣衆的另一種方式。讓那些甘願玩賞議會制，立憲會議和非黨代表會議的人到外國去吧，請你們到那裏去，到馬爾托夫那裏去，請嘗嘗『民主制』的滋味，請問問弗蘭格爾手下的兵士，究竟這滋味是怎樣的吧。可是我們決不得在這些『代表會議』上來幹『反對派』的勾當。我們處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包圍之中，這班資產階級時時刻刻都在窺伺着各種動搖，以便把『自家人』送回，以便恢復地主與資產階級。不管是公開的或粉飾爲『非黨人』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總之我們是要把他們關在監獄裏的。

我們將用一切方式來更緊密地與尚未沾染政治的勞動羣衆發生聯繫，祇是把那些便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利於米留可夫的動搖的方式除外。我們將特別熱心地提拔成千累百的非黨人員，即羣衆中，下層工農中的真正非黨人員來擔負蘇維埃工作，首先是擔負經濟工作，決不是提拔那班『粉飾』爲非黨人員以便暗中奉行有利於米留可夫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訓令的份子。我們這裏，

有成千上萬的非黨人員在工作着，其中有幾十個是擔負極重要極負責的職務。要多多檢查他們的工作。要多多提拔千百下層勞動者來進行新的檢查工作，要考驗他們，根據經驗所檢查的結果，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大批提昇他們到高級職位上去。

我們的共產黨員至今還很少善於瞭解自己在管理上的真正任務：不是要力求『親手』擔當『一切』，反而弄得顧此失彼，一事無成，而是要去檢查幾十幾百個助手的工作，組織自下而上的檢查，即由真正羣衆來檢查他們的工作；一面來指導工作，同時要向那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專門家）和有調整大經濟經驗的人（資本家）學習。聰明的共產黨員決不害怕向軍事專家學習，那怕十分之九的軍事專家隨時都有叛變的可能。聰明的共產黨員決不害怕向資本家學習（姑無論這資本家是承租企業的大資本家，或者承買承賣的商人，還是小的合作社資本家等等），雖然這資本家並不比軍事專家可靠一些。我們學會了在紅軍中捕獲叛變的軍事專家，獎勵正直忠誠的軍事專家，總共運用了成千成萬的軍事專家。對於工程師，教師，我們也在學習這樣做（採取特有的形式）——但在這方面，我們所做的事，比在紅軍裏要壞得多（那裏，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把我們催趕得很好，曾迫使我們盡量迅速、盡量勤奮、盡量有效地學習）。至於對承買承賣的商人，對替國家工作的買辦，對小的合作社資本家，對企業承租主等等，我們也要學會這樣做的（也是採取特有的形式）。

工農羣衆需要立刻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要把新的力量，其中也有非黨人員，安置在有益的工作上面，我們也就定可做到這點。糧食稅及其他與之有關的種種設施，定會幫助這點。我們可以藉此斬斷小生產者之必然動搖的經濟根源。至於對那般只有利於米留可夫的政治動搖，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與之鬥爭。動搖份子多。我們的人少。動搖份子是分裂的。我們是聯合的。動搖份子在經濟上是依

賴的。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獨立的。動搖份子不知道他們自己所想做的事：又愛，又怕，米留可夫又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可是我們却知道我們所想做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會勝利。

結 論

我們的結論：

糧食稅是由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物品交換制的過渡。

由於一九二〇年歉收而更加厲害的經濟極端破壞現象，加之沒有可能迅速恢復大工業，遂使這種過渡成爲刻不容緩的必需辦法。

從此：要首先改善農民生活狀況。辦法是：糧食稅，發展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展小工業。

周轉就是自由貿易，就是資本主義。它能幫助我們與小生產者底散漫性作鬥爭，並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官僚主義作鬥爭，在這一範圍內，資本主義對我們是有益處的。實踐和經驗會來規定這範圍的大小。當無產階級堅牢地掌握着政權，牢固地把握着運輸業和大工業的時候，這裏對無產階級政權並沒有絲毫可怕的地方。

應當將反對投機業的鬥爭轉爲反對盜竊公物行爲，反對迴避國家監察、統計和監督的鬥爭。我們用這種監督把在相當範圍內是不可避免以及對我們說來還是必需的資本主義，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

在振興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底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各式各樣的。

幫助供應農民經濟並促成其發達的小工業；在某種程度內，並給以國家原料，這樣來幫助它。讓原料留着不用，這是罪大惡極的行爲。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同時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曾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的一樣。「學習」底結果，祇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夠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祇要能受到教益。

竭力幫助勞動羣衆，接近他們，從他們中間提拔出千百非黨工作人員來擔負經濟職務。至於對那些正是改穿着很時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黨服裝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班「非黨」人物，——就要極小心地把他們禁閉在監獄裏，或者遣送他們到柏林馬爾托夫那裏，去自由地享受純粹民主制底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同切爾諾夫輩，同米留可夫輩，同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們交換意見吧。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九二一年五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一七至三五二頁。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 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大綱（草案）

（一）蘇俄底國際形勢

蘇俄現時國際形勢的特點是某種均勢的存在，這一均勢雖極不穩固，但終於造成了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局勢。

此種特殊局勢的內容如下：一方面，是國際資產階級充滿了對蘇維埃俄羅斯的瘋狂仇恨與敵視態度，決心隨時侵犯，以便一舉而室死俄羅斯。另一方面，雖然以前蘇維埃政權比現時要弱，而那時在蘇俄境內，又有俄國地主與資本家的幾軍部隊，但國際資產階級耗費了幾萬萬佛郎進行武裝干涉，其全部企圖終歸完全失敗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反對反蘇戰爭的情緒已異常加強，助長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並吸引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極廣大羣衆。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益糾紛原已尖銳化，現時更益加深地尖銳起來。東方民族中千百萬被壓迫民衆的革命運動，極強有力地增長着。由於這一切條件的結果，縱然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蘇維埃俄羅斯要強得多，但國際帝國主義非獨無力來室死它，反而不得不暫時地承認它，或只承認它一半，而與之訂立通商條約。

結果遂造成了這種雖極不堅固，極不穩定，但總還是一種均勢的狀態：即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社會主義共和國可以生存，當然，並不是長期的。

(二)國際範圍內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

根據以上的實際情況，國際範圍內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有如下述：

國際資產階級，既然失去了公開進行反蘇戰爭的可能，於是坐待時機，窺伺有利環境，以便恢復這一戰爭。

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中，到處已產生出了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它們都在成長壯大，一往直前地爭取每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大多數，破壞舊工聯官僚及爲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歐美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影響。

由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作爲先進部份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目前乃是資本主義底主要支柱，因爲工商業中多數的或頗大部份的工人和職員，還依然處在這民主派的影響之下，這些人害怕在發生革命時，會喪失其由於帝國主義特權所造成的比較優裕的小資產者生活狀況。可是日益增長的經濟危機，到處都使廣大民衆的生活愈行惡化，此種情勢，又加之資本主義一日保存，則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愈益顯然地不可避免，遂使上述這一支柱日益厲害地動搖起來。

佔全世界人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勞苦羣衆，已自二十世紀初，特別是被俄國革命，土耳其革命，波斯革命及中國革命喚醒起來，參加政治生活。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以及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把這些羣衆完全變爲全世界政治中及用革命手段來摧毀帝國主義的行動中之積極因素，可是，歐美的那班不無知識的市儈庸人，其中也有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領袖，還頑固至極地不看到此種情形。英屬印度，在這些國家中是居於主腦地位；那裏，一方面工業與鐵路的無產階級愈加壯大，他方面，英國人所日益頻繁施行的大批屠殺（亞姆里特薩爾）與當衆拷打等等恐怖行爲愈加兇蠻，則印度的革命也就愈加迅速地發展起來。

（三）俄國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

蘇維埃俄羅斯內部的政治形勢，是由以下事實來決定的：全世界人類史上，我們第一次見到這裏多年來祇有兩個階級存在：一個是無產階級，它是我國那雖甚幼稚，但終歸是現代的大機器工業在幾十年內所培養出來的階級；另一個是佔全國人口極大多數的小農。

俄國的大地主與資本家，並沒有完全絕跡，但他們已遭受充分剝奪，在政治上已全被粉碎，已不成爲階級，其殘部則已藏匿在蘇維埃政權的國家公務員中了。他們以僑民資格把階級組織保存在國外，人數大概有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他們擁有五十種以上的各資產階級黨與『社會主義』（即小資產階級）黨底日報，有些殘存的軍隊，有與國際資產階級的許多聯繫。這班僑民正在竭力活動，以圖破壞蘇維埃政權，恢復俄國的資本主義。

（四）俄國無產階級與農民

在俄國內部的這種情況下，俄國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底當前主要任務，就是正確規定與具體實現種種必要辦法，領導農民，與農民結成堅固聯盟，以便在多年內逐漸過渡到使用機器經營的大規模的公有農業。因爲我國落後，又加上七年的帝國主義大戰與國內戰爭，結果使我國遭到了極大的經濟破壞，所以這個任務在俄國特別困難。就即令除開這一特點，而此種任務亦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任務之一，這樣的困難任務，也許祇有在英國才是例外，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將來都還是會發生的。然而就英國論，也不能忘記這一事實：英國小佃農階級的人數雖特別之少，可是由於英『屬』殖民地內幾萬萬人實際上遭受奴役，遂造成英國工人和職員中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生活的人數百分比，却異常的高。

因此，從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一個統一的進程）發展底觀點看來，現今俄國所處時代底意義，就是要在實際上來把這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羣衆所採取的政策，加以考驗與檢查。

（五）蘇俄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軍事聯盟

蘇俄無產階級與農民間之正確關係的基礎，已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這期間內建立起來了，當時，既有全世界資產階級，又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各政黨（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支持之資本家與地主底進犯，遂使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軍事聯盟，得以建立、鞏固和形成起來。國內戰爭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這個階級鬥爭愈加尖銳，則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與成見，就在這鬥爭火焰中銷燬得愈加迅速，而實踐的本身，甚至對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也就愈加明顯地表明出：祇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拯救農民，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實際上不過是爲地主和資本家效勞的奴僕而已。

但既然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軍事聯盟，曾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他們的堅固聯盟底初步形式，那麼若沒有這兩階級間的一定經濟聯盟，則這軍事聯盟甚至幾個星期也是支持不住的。農民從工人國家方面得到了全部土地，得到了免遭地主和富農蹂躪的保衛力量；工人從農民方面借來了糧食，一到大工業恢復的時候，即行償還。

（六）過渡到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間 之正常經濟關係

從社會主義的觀點說來，祇有當運輸業和大工業已完全恢復，而使無產階級能於拿出農民日常生活上及改進其經濟上所必需的一切產品來交換農民糧食的時候，則小農與無產階級底聯盟，才能成

爲完全正常和充分穩固的聯盟。但在我國經濟大遭破壞的情形下，無論如何，是不能一下子做到這點的。本來對一個組織得尚不完備的國家說來，爲要在反對地主的空前困難戰爭中堅持下去，餘糧收集制曾是最適當的辦法。一九二〇年的歉收與飼料缺乏，使原來就貧困已極的農民生活特別惡化，使立刻過渡到糧食稅的這一步驟，成爲絕對必要的了。

不重的糧食稅，立刻就會使農民生活大加改善，同時使農民甘願擴大播種與改良農業。

糧食稅是由徵發農民一切餘糧，進到工業與農業間之正常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辦法。

(七)蘇維埃政權容許資本主義容許租讓制的意義和條件

糧食稅自然也就是農民在納稅後有處理餘糧的自由。既是國家還不能拿出社會主義工業品來交換農民的這全部餘糧，所以餘糧的自由買賣，也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底自由發展。

但運輸業與大工業既都操在無產階級手中，所以在上述範圍內，這種情形對於社會主義乃是絲毫也不足怕的。恰恰相反，在破壞不堪與經濟落後的小農國家裏，處在工人國家監督與調劑之下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也就是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意義上說），既能加速農業立刻興旺的過程，則這種發展不但有益，而且必要（當然祇是在某種程度內）。這對於租讓制尤爲正確：工人國家並不廢除任何國有制，祇是把一定的礦山、森林、油田及其他等租予外國資本公司，以便從他們那裏獲得使我國能於從速恢復蘇維埃大工業的補充裝備與機器。

我們用一部份貴重產品所付給承租者的這一代價，無疑是工人國家向世界資產階級繳納的一種貢稅；我們絲毫也用不着隱諱這

點，而應當明確地瞭解到，祇要能加速恢復我國的大工業，並切實改善工農生活狀況，這樣的貢稅對我們是有利的。

(八)我國糧食政策的成效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期間，蘇俄底糧食政策，無疑義是很粗陋，極不完善，並產生出了許多弊端。而在實行這一政策時，也發生過種種錯誤。但一般和整劃說來，在當時條件下，這乃是唯一可能的政策。並且這一政策執行了它的歷史任務：救全了在這經濟破壞和落後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它曾逐漸完善起來，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我們握有全部政權的第一年度（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國家所收集的糧食計一萬萬一千萬普特；第二年度為二萬萬二千萬普特；第三年度達二萬萬八千五百萬普特以上。

現在，既然有了實際經驗，我們的任務則是規定並打算再收集四萬萬普特糧食（其中稅糧等於二萬萬四千萬普特）。工人國家，祇是實際上儲存有充足糧食時，才能在經濟方面站穩腳根，才能雖則步伐緩慢，但是勇往直前地來恢復大工業，建立正常的財政制度。

(九)社會主義底物質基礎和俄國電氣化計劃

社會主義底唯一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問題還不能局限於這個一般的原理。必須把這原理加以具體化。所謂適合於最新技術水準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也就是全國電氣化。擬製全蘇俄電氣化計劃這一科學工作，我們本來是應當做的，而且我們也已經把它做到了。這一工作，有俄國兩百個以上

優秀科學家、工程師與農藝家參加，它業已完竣，並印成一大本書，又經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舉行的第八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般地批准了。現在已準備召集全俄電氣專家代表大會，擬定一九二一年八月舉行，大會上將詳細審查這一工作，然後才可得到政府最終批准。電氣化第一期工作，打算五十年內完成；總共需要三萬萬七千萬工作日。

一九一八年，我國新建立了八個電站（電力平均為四千七百五十七匹羅瓦特），一九一九年，則增至三十六個電站（電力平均為一千六百四十八匹羅瓦特），而至一九二〇年則達到一百個電站（電力平均為八千六百九十九匹羅瓦特）。

對我們這個領土遼闊的國家說來，姑無論這一始基是如何微小，但它終歸是奠定了，工作業已開始，並進行得一天好似一天。俄國農民，經過帝國主義大戰，經過上百萬人在德國當俘虜時對現代先進技術的認識，經過三年內戰中艱苦的而使人受到鍛鍊的實際經驗——自此以後，已不是舊日那樣的農民了。他們日益明豁、日益清楚地看到，祇有無產階級底領導，才能把小農羣衆從資本奴役下解脫出來，而使其走向社會主義。

（一〇）『純粹民主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二半 國際、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這 班資本同盟者底作用

無產階級專政底意思並不是階級鬥爭之停止，而是以新的形式及使用新的武器來繼續階級鬥爭。當階級依然存在，而只在一個國家內已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正在國際範圍內十倍努力地加緊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時候，這個專政是必需的。小農階級在過渡時期中，不能不經歷種種動搖。過渡情況中的困難，資產階級底影響，都不免

有時引起這些羣衆情緒上的動搖。由於本身生活基礎，即大機器工業之破壞因而被削弱了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失去階級地位的無產階級，肩負着極困難而最偉大的歷史任務：即不管這些動搖如何，而堅持自己從資本桎梏下解放勞動的事業，並將其貫徹到底。

小資產階級底動搖，政治上就表現在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即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各政黨底政策上，俄國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也就是這樣的政黨。現在這兩個政黨，在國外設立有自己的總領導機關，辦得有各種報紙，實際上已與一切資產階級反革命派携手共謀，並對它們竭忠効力。

俄國大資產階級底聰明領袖們及其主腦人物——『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可夫，充分明確而直截了當地估計到了這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底此種作用。在喀琅施塔得叛亂中，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白黨力量都聯合在一塊，米留可夫關於這次叛亂情形，說到他贊成『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他在發揮這一思想時，寫道：應該歡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九二一年真理報第六十四期所載，這是從巴黎最後新聞報上摘引來的），因為他們肩負得有最初把政權從布爾什維克手中移走的任務。所有一切的革命都指明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是無能掌握住政權的，他們的職能在任何時候都祇是或則掩飾資產階級專政，或則作為資產階級獲得專政的階梯；而大資產階級底首領米留可夫，對於這一切革命的教訓，都正確地估計到了。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再三證實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革命及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這種經驗，證實着恩格斯於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致伯爾信中所說的話，他說：『…並不妨害它（純粹民主派）在革命時機的短促期間內具有臨時的意義…即起着最後一個救生圈的作用而來拯救整個資產階級經濟，甚至封建經濟。在一

八四八年時，也是如此：所有一切封建官僚，從三月到九月都會贊助自由派，爲的是要使革命民衆俯首聽命……總之，在危機關頭以及危機之後第一天，所有聯合在純粹民主派周圍的一切反革命輩，都會是我們唯一的敵人，我認爲絕對不能忽視這一點』（俄文見阿多拉茨基同志著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民主一文，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發表於共產主義勞動報第三六〇期。德文見恩格斯著：政治遺教，一九二〇年柏林版，國際青年叢書第十二期，第一九頁）。

尼、列寧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三日，莫斯科，克列姆里。

一九二一年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七至四三五頁。

新時光，新形式的舊錯誤

歷史上每一次特有的轉變，總是引起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在形式上的某些變動，這種動搖隨時都與無產階級毗隣着，隨時都在某種程度上侵入到無產階級隊伍裏。

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即藉良善民主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詞句和軟弱願望掩蓋着，而在資產階級面前所表現出的奴僕行爲；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即口頭上威風凜凜、驕大浮誇，實際上則是散漫、虛浮、毫無頭腦的空架子，——這就是這種動搖性底兩大『潮流』。當資本主義底深根還未被剷除之前，這種動搖性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由於蘇維埃政權底經濟政策具有顯著的轉變，所以這種動搖性底形式也在變更着。

孟什維主義者底基本口吻是說：『布爾什維克開了倒車，向着資本主義走去，那他們就是死路一條。革命總歸還是資產階級性的，十月革命也包括在內！民主萬歲！改良主義萬歲！』。不管說出這樣的話，是純粹按照孟什維克的口氣或按照社會革命黨人的口氣，是本着第二國際的精神或本着第二半國際的精神，實質上都是一樣的。

至於類似德國『工人共產黨』或者類似我黨中一部分已經脫離黨或正在脫離黨的過去工人反對派的半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基本

口吻便是：『現在布爾什維克已經不相信工人階級了！』。由此所得出來的口號，多少像是一九二一年春塔琅施塔得的口號。

怎樣能盡量清楚確切地把對實際階級力量的估計和不庸爭辯的事實，來與改良主義庸人及革命主義庸人底哀號與慌亂對立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底任務。

請回憶回憶我國革命底幾個主要階段吧。

第一個階段，是所謂純粹政治的階段，即從十月二十五日起，至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時止。對於真正和澈底消滅俄國封建殘餘這點說來，我們在這十星期內所做到的事，較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時的八個月中（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所做的事要多一百倍。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國外第二半國際底全體英雄，都是反動勢力下可恥的走卒。無政府主義者或則茫然旁觀，或者幫助我們。那時，革命是不是資產階級性的呢？當然是的，——因為當時我們所成就了的事業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當時『農民』內部還沒有階級鬥爭。但同時我們却為社會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做了極多極多的超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一）我們空前地展開了工人階級在自己運用國家政權方面的力量。（二）我們對市僧民主底偶像，即立憲會議和類似富有者出版自由的各種資產階級的『自由』，給了具有全世界意義的有效打擊。（三）我們建立了蘇維埃式樣的國家，這是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七一年之後的巨大進步。

第二個階段。布列斯特和約。反對和約的瘋狂革命詞句，即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中半愛國主義的詞句，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中『左的』詞句，風靡一時。『既然同帝國主義講了和，那一切都完蛋了』，——市僧庸人竟張惶失措或幸災樂禍地硬這樣說。然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以幫助資產階級掠奪工人的剝奪資格與帝國主義講和了，而我們之所以把一部分財物交給強盜而實行了『講

和』，是爲了要救全工人政權，爲了更厲害地來打擊強盜。說彷彿我們『不相信工人階級底力量』這樣的話，當時我們聽得夠多了，但我們却沒有被這類詞句欺騙住。

第三個階段。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即從反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和『立憲會議派』直到反弗蘭格爾時止。戰爭開始時，我們還沒有成立紅軍。如果拿物質力量來比較，那麼就是現在，這個軍隊與協約國任何一國軍隊對峙起來，力量也是很微弱的。雖然如此，但在與強敵一世的協約國鬥爭中，我們却勝利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領導下的農民與工人底聯盟，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品，是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起的作用，都無非是帝制派公開的兇幫（如總長，組織者，宣傳人）或暗藏的兇幫（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的立場是最『巧妙』和最卑劣的，他們彷彿是自居清白，但實際上却在寫東西反對我們）。無政府主義者也曾一籌莫展地突奔着：一部分幫助我們，一部分則叫喊反對軍事紀律或持懷疑態度，這樣破壞了我們的工作。

第四個階段。協約國被迫停止了（能於長久嗎？）武裝干涉和封鎖。遭受空前經濟破壞的國家剛剛開始恢復元氣，祇是現在才看得出經濟破壞底全部深度，經受着最艱鉅的苦難，工業停頓，歉收，飢荒，流行病等等。

在我國這次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我們已昇到最高而同時又最困難的階段。此刻或現今時期的敵人，已經不是昨天的敵人了。現時這敵人已經不是由一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全世界資產階級共同支持的地主們所指揮下的白匪，而是大工業遭受了破壞的小農國家中經濟上的惜常現象。這個敵人便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它像空氣一般籠罩着我們，並極厲害地浸入到無產階級隊伍中。但無產階級失去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即脫出了自己階級生活的正軌。工廠停頓——無產階級也就成爲軟弱無力和分散零落

的了。而國內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却有全世界上畢竟還是雄強一世的資產階級在支持着。

那麼，這又怎得不令人胆怯呢？特別是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類英雄，如第二半國際底勇士，如一籌莫展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愛講『左傾』空話的人等等。『布爾什維克轉向資本主義，布爾什維克塌台了，他們的革命也沒有逃出资產階級革命的範圍』。這樣的狂吠，我們聽得夠多了。

可是這樣的狂吠，我們也已經聽慣了。

我們並不輕視危險。我們正視着這種危險。我們向工人和農民說：危險很大，要更加團結，更加堅定，更加冷靜，請用蔑視的態度，把那些孟什維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份子和驚惶失措搖旗吶喊之徒，一律都拋開去吧。

危險很大。敵人今天在經濟方面比我們強得多，猶之它昨天在軍事方面大大強過我們一樣。我們知道這點，既知道，這就是我們的力量。無論在肅清俄國封建勢力方面，無論在發展工農一切力量方面，亦無論在進行全世界範圍內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以及在促進那擺脫了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卑賤行爲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方面，我們都已經進行了如此巨大的工作，致使那些驚惶失措的吶喊，並不能影響着我們。我們已經充分地，甚至過多地爲自己的革命活動『作過辯護』，已經用事實向全世界人證明，這種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的『民主主義』，以及與藉堂皇辭句掩蓋的胆怯改良主義完全不同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該能於做出什麼事業來。

誰在偉大鬥爭開始之前便害怕失敗，這樣的人只是爲要侮辱工人，才能自命爲社會主義者。

正因爲我們不害怕正視着危險，所以我們才能更好地運用自己力量來進行鬥爭，我們更穩裕、更謹慎、更周到地估量各種時機，所以我們才採取一切用以加強自己力量和分散敵人力量的讓步（現

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一種讓步)。

孟什維克吶喊什麼糧食稅、自由貿易、容許租讓制和國家資本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破產。除這些孟什維克外，還補上了一個外國過去的共產黨員列維；當列維個人犯的錯誤尚能用德國『左派』共產黨員特別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所犯錯誤的反響來企圖解釋時，對於這位列維本應加以辯護；可是當他非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完全滾到孟什維主義裏去的時候，那對於這位列維，就不可加以辯護了。

我們要向吶喊着的孟什維克，簡直地指明這一點：還在一九一八年春，共產黨人就提倡和擁護與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來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這種思想。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爾什維克勝利的頭幾個月！那時，布爾什維克就已經有了這種清醒思想。從那時起，誰也未能駁倒我們對現實力量的此種明確估計。

滾到了孟什維主義的列維却勸告布爾什維克（列維『預言着』資本主義會戰勝布爾什維克，猶之一切市儈、民主派、社會民主黨人等等曾預言我們若解散立憲會議時，那我們就定遭滅亡一樣！）去求助於全工人階級！因為，請看，至今以前，幫助布爾什維克的，還祇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份。

在這方面，列維同那班半無政府主義者和吶喊家，局部地也同某些過去的『工人反對派』恰巧吻合起來，他們愛高談濶論，說布爾什維克現在『已經不相信工人階級底力量』。無論孟什維克或無政府主義份子，都把『工人階級力量』這個概念變成爲偶像，却不善於想想這一概念的實際具體內容。他們不來研究與分析這種內容，却在這裏搖旗吶喊，大肆鼓吹。

至於第二半國際的先生們，雖則很願意稱爲革命家，其實在一切嚴重情況下，都是反革命者，因為他們害怕用強力破壞舊的國家機關，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底力量。當我們這樣說到社會革命黨人

之流時，我們所說的並不是空話。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實際上提供了新的力量，一個新的階級，現在正是無產階級的優秀代表在管理俄國，他們創立了軍隊，指導了軍隊，建立了地方管理機關，領導着工業及其他等等。如果在這管理中存在有官僚主義的歪曲行爲，那我們就不要隱匿這種惡事，而是要把它揭發出來，同它進行鬥爭。誰要是因爲同新制度中的歪曲行爲作鬥爭，就忘記這新制度的內容，忘記工人階級創立了蘇維埃式的國家，並在引導着這個國家前進，那他簡單就是毫無頭腦，徒事空談。

但『工人階級底力量』不是沒有極限的。現時工人階級中新生力量湧現得薄弱，有時還很薄弱，不管有一切指令、號召、鼓動，不管有一切關於『提拔非黨羣衆』的命令，而這種力量之湧現還依然薄弱，但如果因此就大吹大擂，說什麼『不相信工人階級底力量』，藉此搪塞了事，就等於無的放矢。

若沒有某種『暫息』機會，就不會有這些新的力量；這種力量祇能慢慢成長起來；祇有在恢復起了的大工業基地上（更正確、更具體地說，也就是在電氣化的基地上）才能找到這種力量。

遭到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的工人階級，由於失去階級地位而大受苦難，它經過舉世未見的極度緊張生活之後，必須有個緩衝期間，使新的力量能夠成長起來，振奮起來，使老舊的、殘破的力量得以『修復』就緒。創立起一種能於勝利地經受住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考驗的軍事和國家機關，——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業，這是使用了，包括了和盡量吸取了『工人階級』實際的（而不是吶喊家的空喊中存在着的）『力量』的偉大事業。應該瞭解這點，並要顧計到慢慢來壯大工人階級底新力量乃是必然的，也就是說，乃是必不可免的。

當孟什維克叫喊什麼布爾什維克底『拿破崙主義』（說他們竟依靠軍隊與機關來反對『民主派』底意志）時，這不過是再好沒有

地表達了資產階級底策略，而米留可夫本人做得很正確，他擁護這一策略，擁護『喀琅施塔得』叛亂（一九二一年春）的口號。資產階級正確地估計到，『工人階級』的實際『力量』，此刻是由這個階級底強大先鋒隊（俄國共產黨，它不是一下子，而是在二十五年内用積極行動爭得這唯一革命階級之『先鋒隊』底作用、稱號與力量），加上由於失去階級地位而被削弱得最厲害而最易受孟什維克與無政府主義者動搖性影響的那些成份所組成。

此刻宣傳『多多相言工人階級力量』這個口號，其實^其是加強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一九二一年春，喀琅施塔得事件再明顯不過地證明與表明了這點。每一個覺悟工人，都應當來揭發和驅逐這類叫喊我們『不相信工人階級力量』的人，因為這些吶喊家實際上乃是資產階級和地主們底幫手，他們用擴大孟什維克及無政府主義者影響的方法，來實行削弱無產階級，以便利於資產階級和地主。

如果洞察到『工人階級力量』這一概念的實在內容，原來真象就是如此！

敬愛的諸君，你們的工作在什麼地方，你們真正提拔非黨份子到最主要的現代『戰綫』上去，到經濟戰綫上去，到經濟建設中去的事業，又在什麼地方呢？這就是覺悟工人所應當向吶喊家提出的問題。這也就是隨時都可以而且應當用來揭破空喊之輩的辦法，證明他們在事實上，不是幫助，而是妨礙經濟建設，不是幫助，而是妨礙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所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底意圖，而是小資產階級底意圖，他們是在替異己階級服務。

我們的口號：打倒這班吶喊家！打倒這班不覺悟的白黨走狗，亦即重複一九二一年春不幸的喀琅施塔得叛亂者錯誤的人！切實來進行那種善於理解時局特點及其任務的實際工作！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空話，而是實事。

清醒地估計到這一特點，估計到並非幻想出來而是真實存在的階級力量，就可以使我們了解到：

無產階級經過了在軍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創造性方面都有了舉世未見成績的時期之後，現在進到了用大大減慢的速度來增長新力量的時期，這不是偶而是必然到來的現象，不是因為某人或某黨的過失而是因為客觀原因所造成的現象。在經濟工作中，不免有更加困難、更加緩慢、更需要循序漸進的建設過程；較之軍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來說，這種情形是從經濟工作底實質中產生出來，是從這一工作的特殊困難中以及更加深厚的基地（如果可以這樣說）上產生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在鬥爭底這一新的高級階段上決定自己的任務時，就應當格外小心和加倍謹慎。我們應盡量簡樸地來決定這些任務；要實行儘多的讓步，當然，這種讓步是在無產階級依然保持其統治階級地位而可以讓步的限度之內；要儘量迅速地徵收不重的糧食稅；要使農民經濟底發展、鞏固與恢復有儘多的自由；要把我們非絕對必需的企業租予承租者，也包括私人資本家和國外承租人在內。我們需要無產階級國家與國家資本主義結成的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聯盟。應該很巧妙地按『多番計量，一次剪裁』的規則，來實現這種聯盟。留給自己直接開辦的工作部門，不妨儘量少些，祇留下那些絕對必需的部門。我們要把工人階級被削弱了的力量集中在範圍較小的工作上，但同時我們可更加牢實地鞏固起來，不是一次兩次，而是多次地用實際經驗來檢查自己。要按次就班，一步一步地走去——不然，在這條困難道路上，在這個艱鉅環境中，在這一危險場合內，像我們這樣的『軍隊』，此刻就無法前進。誰如果對這一工作『感覺寂寞』，『沒有興趣』，『不能瞭解』，誰要是嫉首蹙額，或則倉皇失措，或則用缺乏『原先高潮』，『原先熱情』等等浮詞炫語來迷醉自己，——對這樣的人，最好是『解放工作』，

57—TOM II

請他「休息」，使他不敢於危害工作，因為他不願意或者不善於考慮當前鬥爭階段上的特點。

國內經濟遭受到極大的破壞，無產階級力量被迭次幾乎是超人的緊張情況弄得疲憊不堪，我們也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來坦負着最困難的事業：奠定真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實行工業與農業間的正常商品交換（更正確地說，是物品交換）。敵人的力量比我們還強大得多；無政府狀態的，投機小販的和私人的商品交換，處處都在破壞我們的工作。我們顯然看到當前的困難，我們要有系統地、倔強地來克服這些困難。各地方上要有更多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要分配更多的力量到那裏去，要更多注意到那裏的實際經驗。工人階級能夠養好自己的創傷，能夠恢復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農民之堅信無產階級底領導，也祇有靠恢復工業和建立既與農民有利也與工人有利的正常的國家物品交換的實際成效如何。而我們之獲得新生力量，也就看這些成效的範圍怎樣；也許，這不會像我們每個人所希望的那樣迅速，但我們是一定能獲得這種新生力量的。

扭負起這種更緩慢而更謹慎，更堅持而更頑強的工作吧！

尼、列寧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刊載於黨理報
第一百九十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三至一一頁。

論清黨

清黨一舉，顯然已發展成爲嚴重而極重要的工作。

有些地方的清黨工作，主要是依據非黨工人底經驗和意見，以他們的意見爲指南，顧計到非黨無產階級羣衆代表的提議。這是最重要而最可寶貴的現象。假如我們真能這樣「不顧情面」，自上而下來實行清黨，那末這真會是我們革命的一種巨大勝利品。

須知現在的革命勝利品不能是以前那樣的了。由於從軍事戰綫轉到經濟戰綫，由於轉向新經濟政策，由於要求首先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紀律的條件，革命勝利品底性質也隨之變化着。這時，那種不是顯然觸目、一望而知的內部改善，即勞動情況、勞動佈置、勞動結果底改善，遂成爲革命底主要勝利品了；這裏所謂改善的意思，就是說要進行鬥爭，反對既腐蝕無產階級又腐蝕我黨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自發勢力底影響。爲了實現這樣的改善，便應該從黨內清除那些脫離羣衆的份子（自然更不待說那些在羣衆面前玷辱黨的份子了）。當然，並不是羣衆底一切意見，我們都要去聽從，因爲羣衆有時——特別是在這負擔奇重疲苦非常的年份，也受着那全然不是先進的情緒所盡惑。可是在估計人

們的時候，在揭破「混進黨來」、「高高在上」、「官氣十足」之輩的時候，非黨無產階級羣衆的意見，往往也有非黨農民羣衆的意見，都是極端寶貴的。勞動羣衆具有最強烈的敏感，極善於摸捉篤誠忠實的共產黨員與那些受到終歲勤勞，既無任何特權，也無『晉陞門徑』的人所憎惡的共產黨員之間的區別。

顧計到非黨勞動者底意見來實行清黨，這是一件偉大事業。它能使我們收到真實效果，能使黨成爲比以前更強得多的階級先鋒隊，成爲與階級有更堅固聯繫的先鋒隊，成爲在大批困難和危險中更加能於引導階級走向勝利的先鋒隊。

我還想指出，清除黨內過去的孟什維克也是清黨中的一部份任務。據我的意見，在一九一八年初以後入黨的孟什維克中，至多祇能大約把百分之一的人留在黨內，並且對每個留下的人，都要個別地和再三再四地加以檢查。爲什麼呢？因爲孟什維克這個派別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期間內，表明出了他們的兩種本性：一種是巧妙地適應環境，『混入』在工人中佔統治地位的政派之內；一種是更巧妙地誠心誠意地替白黨服務，口頭上拒絕白黨，實際上替他們効勞。這兩種本性都是從孟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產生出來的：只要提到阿古雲里羅得提議的『工人代表大會』⁸³以及孟什維克在口頭上和行動上對立憲民主黨（及對帝制）的關係等就夠了。孟什維克之『混入』俄國共產黨，不僅是而且最主要的還不是由於瑪基菲里主義（雖然按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說來，孟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年起就已表明出，他們在這一方面是超等匠手），而是由於他們那『適應環境』的本領。一切機會主義者，都擅長於適應環境（但並非一切適應環境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克這班機會主義者可以說是『從原則上』來迎合在工人中佔統治地位的政派，塗上保護色，正像兔子一到冬天就變成白色一樣。應該明瞭並估計到孟什維克底這個特點。而要估計到這個特點，也就是說，要把從一九一八年以後，即從

布爾什維克底勝利已成為起初可以置信爾後却是毫無疑義的時期之後鑽進到俄國共產黨內的孟什維克全人數中，大約要清出百分之九十九。

應該把欺騙份子，官僚化份子，不誠實的分子，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裝過『門面』，但內心裏還照舊是孟什維克的那些人從黨內清洗出去。

列寧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刊載於

俄國電訊社小報第二十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二至一三頁。

十月革命四週年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底四週年快到了。

這個偉大日子離開我們愈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意義就愈加明顯，而我們對我們整個實際工作的經驗，也就懂得愈加深刻。

這一意義和這一經驗，在最簡略的，當然是極不完備與極不確定的輪廓上，可作如下的敘述：

俄國革命底直接和最近任務，曾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推翻中世紀制度殘餘，澈底肅清這種殘餘，根除俄國內部的這種野蠻現象，這種恥辱，這種極端障礙我國一切文化發展與一切進步的阻力。

我們有權引以自豪的，就是從吸引民衆和深入民衆的觀點上說來，我們進行過這種清洗工作，是較之一百二十五年多以前的法國大革命，更堅決得多、更迅速得多、更大胆、更有效、更廣濶和更深刻得多。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社會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問題，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也就是這種國際社會流派在俄國的代表者），過去和現在都說出許多簡直不可思議的錯亂話。我們在這點上對馬克思主義之正確了解，以及我們對歷來革命經驗的正確估計，已爲近四年

來的事實所完全證實了。我們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任何一個政黨所沒有做到的。我們完全自覺地、堅定地和不屈不撓地向着社會主義革命邁進，我們既知道，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間，並沒有一條萬里長城隔住，也知道究竟我們（終於）能夠前進多遠，究竟巨大無極的任務中，我們得以完成哪一部份，勝利中的哪一部份，我們足以鞏固起來——這祇有靠鬥爭來解決。這在往後就可以見得到的。但此刻我們也已經看見，在按社會主義改造全社會的事業中，對這個經濟上大遭破壞備受苦難的落後國家說來，是已經有了莫大的成就。

可是，我們不來多說我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內容。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很瞭解這點。現在我們只舉出幾個顯著例子來加以闡明吧。

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內容，這就是說——肅清國內社會關係（秩序，制度）內的中世紀制，農奴制，封建制。

究竟到一九一七年時，俄國還有農奴制底哪些最主要形態、殘餘或遺跡呢？君主制，等級制，土地佔有制與土地使用制，婦女地位，宗教，民族壓迫。試從這些不勝清除的骯髒馬廐——即所有一切先進國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二百五十年以至更早（英國在一六四九年）以前完成自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可以說是在頗大程度內尚未澈底清除的骯髒馬廐中，舉出任何一種來吧：那你們就可以看見，像這樣的一切骯髒東西，我們是完全清除乾淨了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起，至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時止，際此短短的十星期中，我們在這方面所做到的事情，較之資產階級民主派與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的八個月內所做到的，要多一千倍。

這些胆小鬼，空談家，自驕自大、猶豫不決之徒曾大揮其紙劍，結果，甚至連君主制都沒有消滅！我們却把全部帝制妖氛掃蕩

得乾乾淨淨，這是任何人從來也未曾做到過的。我們沒有讓這等級制的古老建築物剩下一磚一石（如英法德這些最先進的國家，至今還沒有擺脫等級制的遺跡！）。等級制之最深的根源，即土地佔有制中的封建殘餘與農奴制殘餘，都被我們連根拔掉了。『可以來爭論爭論』（國外有夠多的文藝作家、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可以來作這樣的爭論），究竟偉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歸根到底』會有什麼結果。我們此刻並不願花費時間來進行此種爭論，因為我們是用鬥爭來解決這類爭論以及與之有關的種種爭論。但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八個月內與保持農奴制傳統的地主進行『協定』，而我們却在幾星期中，把這些地主連同他們的一切傳統都從俄國土地上清除得乾乾淨淨了。

試舉宗教問題，或婦女毫無權利，或非俄羅斯民族之受壓迫與不平權現象來說吧。這終歸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班庸俗鄙陋之徒，關於這點，空談了八個月；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最先進的國家，曾在資產階級民主方針上把這些問題澈底解決了的。但在我國，這些問題却已由十月革命在法律上一一澈底解決了。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都在認真地同宗教作鬥爭。我們讓一切非俄羅斯民族，去享有他們自己的共和國或自治省。我們俄國沒有像婦女無權或無全權的這種下賤、鄙陋、卑污的現象，沒有像世界上其他一無例外的國家中，由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以及魯鈍畏縮的小資產階級所不斷裝新起來的這種令人痛恨的農奴制和中世紀殘餘。

所有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內容。一百五十年及二百五十年前，這種革命（如果說到這一共同形式的每一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說是這一切革命）底先進領袖們，曾向各國人民約許，要使人類擺脫中世紀式的特權，擺脫婦女不平等現象，擺脫此種或彼種宗教（或『宗教思想』，一般『宗教信仰』）底國家優越地位，

擺脫民族不平權現象。祇是約許，但沒有執行。他們本來也就不能執行，因為有『尊重』…『神聖私有制』的心理從中作梗。而在我國無產階級革命中，却沒有對這種萬惡的中世紀制度以及對這種『神聖私有制』之可惡的『尊重心』。

但爲要鞏固俄國各族人民所獲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品，我們本來應當繼續前進，而我們也就果然繼續前進了。我們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這些問題，是把它們當作我們主要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作底『副產品』，順便地、附帶地解決了的。我們向來都說，改良是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我們不僅說，而且用事實證明過，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底副產品。附帶說說，所有一切考茨基輩、希法亭輩、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黑爾克維特輩、龍格輩、麥克唐納爾輩、屠拉梯輩以及『第二半』馬克思主義底其他英雄們，不能瞭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前一革命轉變爲後一革命。後一革命順便解決前一革命底問題。後一革命鞏固前一革命底事業。鬥爭，而且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後一革命能夠如何搶過前一革命。

蘇維埃制度正是由前一革命轉到後一革命這轉變底顯著證明或表現之一。蘇維埃制度是工人農民所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主義，同時它又意味着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離，意味着產生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新式民主制，即無產階級民主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

讓垂死資產階級及依附着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走狗和瘟豬們，用層出不窮的詛咒、謾罵、嘲笑來攻擊我們，責難我們在建設我國蘇維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錯誤吧。我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工作中的失利與錯誤，無論過去或現在確實是很多的。在這樣的全世界歷史上的新奇事業，即創立空前未見的新式國家制度中，難道能沒有失利與錯誤嗎！我們將百折不回地來爲糾正我們的失利與錯誤

而奮鬥，力求改善我們實際運用蘇維埃原則這方面所遠未完善的方法。但是我們有權自豪，而且我們正在自豪：我們居然這樣幸運，開始來建設蘇維埃國家，因之開始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就是開始了新階級統治的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被壓迫的，而現今到處都在向着新生活，向着戰勝資產階級，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向着把人類從資本桎梏，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永遠解脫出來的目標邁進。

關於帝國主義戰爭，關於財政資本在現時操縱着全世界的國際政策——此種政策必不可免地要產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必不可免地要空前加強一小羣『先進』列強對落後弱小民族所施行的民族壓迫、搶劫、掠奪和室殺行爲，——這個問題，自一九一四年起，就已成爲世界各國全部政策中的基本問題。這是千百萬人的生死存亡問題。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在我們所親眼見到是由資產階級來準備的、我們親眼見到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內日益成長起來的下一大次帝國主義戰爭中，是否會擊斃二千萬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及至今還未完結之作爲補充這次大戰的各種『小』戰爭中，已擊斃一千萬人），在這必不可免的（如果資本主義還保存着的話）下一大次戰爭中，是否會殘廢六千萬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已殘廢三千萬人）。就在這個問題上，我國十月革命也開闢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而資產階級底奴僕及其應聲蟲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亦即全世界所有這班冒充『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們，却曾嘲笑『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殊不知這個口號，乃是唯一的真理——這個真理雖則是令人難堪的、粗暴的、赤裸裸的、冷酷無情的，但終歸是出現於沙文主義與和平主義之最精巧欺騙底漆黑氛圍中的真理。這種欺騙在崩潰着。布列斯特和約已被揭破了。還有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壞的凡爾賽和約，這和約底意義與後果也在日益無情地被揭破着。而在千百萬思考昨日戰爭原因以

及思考快要臨頭的明天戰爭問題的人們面前，是愈益彰明、愈益顯著、愈益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一個森嚴的真理：除了用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之外，決不能擺脫帝國主義戰爭，決不能擺脫必然產生這種戰爭的帝國主義世界（如果要按我國舊式俄文寫法，那我就會在此地寫出兩個意思不同的『МИР』*），決不能擺脫這個地獄。

讓資產階級與和平主義者們，將軍和市僧們，資本家和庸人們，一切耶穌教徒和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全體英雄們來瘋狂咒罵這一革命吧。然而千百年來，奴隸們第一次公開提出了這一回答奴隸主間戰爭的口號：變奴隸主間的分贓戰爭為各國奴隸反對各國奴隸主的戰爭，——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是任何狂瀾般的惡言謊語造謠攻訐所蒙蔽不了的。

這個口號，千百年來第一次從模糊不清和孤弱無助的期待，變成了明確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千百萬被壓迫者底實際鬥爭，變成了無產階級第一次的勝利，變成了消滅戰爭這事業底第一次勝利，變成了全世界工人聯盟戰勝國際資產階級聯盟這事業底第一次勝利，這些資產階級間無論或和或戰，都無非是在犧牲資本奴隸底利益，犧牲僱傭工人底利益，犧牲農民底利益，犧牲勞動者底利益。

這第一次的勝利還不是最終的勝利，而這次勝利，是由我國十月革命經過了種種亘古未見的艱難險阻，經受了種種空前未聞的疾苦患難，經歷了我方許多巨大失利和錯誤才造成的。難道一個落後國家的人民，不經失利，不犯錯誤，會能戰勝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先進諸國底帝國主義戰爭嗎！我們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將很清醒地來看待這些錯誤，以便學會改正這些錯誤。但事實終歸還是

* 即「мир」和「миръ」，前者是「世界」，後者是「和平」——譯者。

事實：即千百年來所謂用反對一切奴隸主的奴隸革命來『回答』奴隸主間戰爭的這個諾言，是第一次澈底地執行了，並且還在排除一切困難繼續地執行着。

這一事業，我們已經開始了。至於究竟是哪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麼時候，到什麼期限，會把這一事業貫徹到底，——這是一個不關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堅冰已被摧破，航道已被開闢，前程已被指出了。

全世界上『保護祖國』的，即保護日本祖國反對美國，保護美國祖國反對日本，保護法國祖國反對英國等等的資本家老爺們，請繼續玩弄你們那套偽善把戲吧！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英雄以及全世界和平主義的市僧庸人先生們，請繼續用些新『巴塞爾宣言』（按一九二二年巴塞爾宣言式樣）來搪塞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手段問題吧！第一次布爾什維克革命已經使地球上第一批一萬萬以上的人們，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擺脫了帝國主義世界。而爾後其他國家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定會使全人類從這類戰爭中，從這種世界中解脫出來。

最後的一件事——並且是我們最重要、最困難、最沒有做到的一件事，便是經濟建設，便是在全被破壞的封建基地與半被破壞的資本主義基地上，奠定嶄新社會主義大廈底經濟基礎。在這一最重要與最困難的事業上，我們失利的地方最多，所犯的錯誤也最多。難道開始這樣具有全世界意義的新事業，能會沒有失利，能會沒有錯誤嗎！但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我們正在實現這一事業。我們現時正在用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改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如何避免這些錯誤，而在小農國家內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

困難大極了。但我們已經慣於同巨大無極的困難作鬥爭。我們的敵人綽號我們是『頑石』，是『折骨政策』底代表，總有點

什麼理由的。可是我們也學會了，至少是相當學會了革命中另一種必要的藝術——學會隨機應變，善於估計到已變更的客觀條件，而迅速地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假如原先的道路在現時階段上，已經不適當，已經走不通，那我們就另行選擇一條達到目的的道路。

我們被熱忱的浪潮所激勵起來，起初喚起人民一般的政治熱忱，然後喚起他們的軍事熱忱，我們打算依據這種熱忱，就直接來實現與一般政治任務及軍事任務同樣巨大的經濟任務。我們曾打算——或許更正確些說：我們並未經過充分思考就預定——單憑無產階級國家底直接法令而在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以及由國家進行的產品分配。實際生活指明了我們的錯誤。本來是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以便準備——用多年的工作來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是直接依據熱忱，而是藉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忱，依據個人利益，依據個人興趣，依據經濟核算，來在這小農國家內，首先努力建成些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通到社會主義去的堅固小橋；否則，你們就達不到共產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把千百萬人引導到共產主義。實際生活會是這樣告訴我們的。革命發展的客觀進程會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既在這三四年來，稍微學會了一些急劇轉變（當需要急劇轉變時），我們業已開始奮發地、注意地、耐心地（雖是奮發，注意和耐心，但總還不夠）來學習新的轉變，學習『新經濟政策』。無產階級國家應當成爲一個謹慎、勤勉、善操家政的『家主』，成爲一個精明練達的批發商人，——不然，它就不能在經濟上使這個小農國家佇立起來，此刻當我們是處在與資本主義（現時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歐比隣而居的條件下，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其他道路是沒有的。批發商人，彷彿是遠離共產主義猶如天地遙隔一樣的經濟形式的東西。但這正是在實際生活中把小農經濟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引導到社會主義去的一種矛盾。個人的利益興趣能夠把生產提高起來；我

們首先無論如何都要增加生產。批發商業在經濟上能聯合着千百萬小農，能引起他們的經濟興趣，能聯繫他們，能把他們引到下一階段上去，即引到生產本身中的各種聯繫與聯合形式上去。我們已經開始進行我國經濟政策上必要的改造工作。我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某些固然是不大的，局部的，但終歸是無疑義的成功。我們在這新「科學」領域中，快學完預科的功課。我們要堅決地、倔強地繼續學習下去，用實際經驗來檢討自己的每一步驟，不怕多次修改初初着手的東西，不怕糾正本身的錯誤，而要仔細去領會這些錯誤底意義，這樣好來轉入以後的正科。雖然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底實際環境把這一學程延長得比我們所希望的要更長久更困難得多，但是我們一定要將這整個「學程」學完。不管過渡時期中的苦難是怎樣艱鉅，不管貧困、飢餓和經濟破壞是怎樣難受，但無論如何，我們決不垂頭喪氣，我們一定要使自己的事業達到最後勝利。

尼、列寧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百三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二四至三〇頁。

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 後金子底作用

把注意力集中到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這是慶祝偉大革命紀念日的最好辦法。現在當還存在有革命尚未解決的一些根本問題，並需要去通曉某種新的東西（從迄今以前這革命中已做到的一切看來）以便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這樣來慶祝革命，乃是特別適當和特別必要的。

對於我國革命說來，現時的新東西，就是在經濟建設底根本問題上，必須去採用『改良』的，逐次的，審慎迂迴的行動辦法。這件『新奇事情』，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引起許多問題和許多誤解。

理論上的問題是：在整個革命全盤勝利進程的條件下，在實行了許多最革命行動的同一場所，却轉而採取非常『改良』的行動，這種轉變又怎樣來解釋呢？這裏是否有『放棄障地』，『承認破產』等類的事情呢？我們的敵人，自半封建式的反革命派起直至孟什維克或第二半國際底其他英雄們止，當然都說是有的。正因為他們是敵人，所以就管有沒有理由，總在大聲疾呼地這樣聲

明。從封建派直到孟什維克止的一切政黨在這個問題上很動人的統一，祇是又一次證明所有這些政黨真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羣反動派』(順便說說，正如一八七五年和一八八四年恩格斯致伯伯爾的信中所預見到的一樣)。

但在友人中，也有某種…『誤解』之處。

我們要恢復大工業，並調整大工業與小農業間的產品交換，幫助小農業走向社會化。爲了恢復大工業，我們用餘糧收集制的辦法，從農民那裏借來某種定量的糧食與原料。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以前那三年多內所實行過的計劃(方法和制度)。這在直接與澈底摧毀舊社會經濟制度而代之以新社會經濟制度的意義上說來，曾經是解決任務的一個革命辦法。

自一九二一年春以來，我們却實行着完全是另一種的，改良式的辦法(尙不是『已實行了』，而祇還是『正在實行着』，並且對這點我們還沒有充分悟解到)以代替原先行動中的辦法、計劃、方法或制度。所謂改良式的，就是說：並非摧毀舊社會經濟結構，即商業，小經濟，小營業，資本主義，而是振興商業，小營業和資本主義，審慎而逐漸地來把握它們，或者說，祇是按它們振興的程度，使之有可能由國家來加以調劑。

這完全是解決任務的另一種辦法。

比較原先革命的辦法說來，這乃是改良的辦法(革命就是最基本地、最根本地摧毀舊事物的改造手段，而不是力求把它摧毀得儘量少，不是審慎地、緩慢地、逐漸地來改作它)。

於是有人問道：既然你們試行過革命方法，認爲這種方法無效，轉而採用改良方法，這豈不是證明你們一般地宣佈革命是錯誤麼？這豈不是證明本來一般地就不應該先從事革命，而應該先從事改良，並祇限於改良麼？

孟什維克及其同流們所作出的結論，便是如此。但這種結論，或者是那班經過政治『火焰』鍛鍊的人底詭辯和簡單的騙詐行爲，或者是『未經』真正考驗的人底幼稚言論。對於一個真正革命家說來，最大的危險，——也許，甚至是唯一無二的危險，——就是革命誇大狂，忘却革命方法之適當運用與順利運用的界限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假使一開始就大書特書『革命』，而把『革命』抬高到幾乎是神妙而不可攀的東西，但却毫無頭腦，毫無能力去最冷靜地、最清醒地想像、估量和檢查：究竟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按革命方式來行動，而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轉為改良的行動，那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最易於一敗塗地。真正的革命家，若是他們失去清醒頭腦，一心設想彷彿『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行動領域的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而且必須按革命方式來解決任何任務，那他們就會遭到滅亡（並非指他們外表上的失敗，而是指他們事業內部的破產）——且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必定遭到滅亡。

誰要是這樣『設想』，誰就必遭滅亡，因為他在根本問題上所設想的純係蠢事，而在殘酷戰爭（革命是最殘酷的戰爭）期間，對蠢事的懲罰，往往就是失敗。

根據什麼能得出結論，說『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所以採用和必須採用的方法，祇能是革命方法呢？這種結論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這一結論簡直無條件地是錯誤的。如果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立場，從純粹理論原則上說來，這種結論顯然是不正確。我國革命的經驗也證實了這種結論是錯誤的。在理論上：恩格斯說，革命期間，亦如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能作出蠢事來的，他的這句話乃是真理。應該極力少作蠢事，對已經做過的蠢事，要儘快加以糾正，要儘量清醒地估計到，在什麼時候，哪些任務可以用革命方法

去解決，哪些任務却不能用革命方法去解決。我們有過親身的經驗：布列斯特和約，完全不是革命行動底標本例子，而是改良行動，甚至比改良行動更壞的一種行動底標本例子，因為這是開倒車；至於改良的行動，照例乃是緩慢地、審慎地、逐漸地前進，但不是開倒車。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我們策略的正確性，現在已全被證實，已爲人所公認共曉，因而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再提的必要。

我們所充分做到的，僅僅是我國革命中關於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的工作。而我們十二萬分有權來以此自豪。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工作，歸結起來有以下主要三種：（一）用革命手段擺脫了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揭破並拆垮了資本主義世界兩大強盜集團底屠殺；這點在我們這方面，是充分做到的；但要在各方面把這點澈底做到，那就祇有靠幾個先進國家內的革命。（二）建立了蘇維埃制度，亦即建立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世界的轉變業已告成。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時代業已終結。全世界歷史底新篇幅，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開始了。祇是要由其他許多國家來完善和完成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形式。在這方面，我們所尚未作成的事，還非常之多。如果不看清這點，那便是不能饒恕的。我們還要多次地來完善、改造和從頭做起。今後在發展生產力與文化的事業上，我們所能前進與上昇的每一梯級，都應當與完善和改造我們蘇維埃制度這點，併駕齊驅；而我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却還落後得很。尚待改造的事情還非常之多，如果以此『報顏自慚』，那就妄誕至極（甚至比妄誕更壞）了。（三）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底經濟建設。在這方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事還沒有做到。而這也就是我們最可靠的事業，無論從原則觀點或實踐觀點看來，亦無論從現在蘇俄的觀點或國際的觀點看來，都是最可靠的事業。

既然，最主要的事在基本上還沒有完成，那麼全部注意力就應當放在這方面。這裏，困難的地方也就在於過渡形式。

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上，曾這樣寫道：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尋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隱隱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態發展的歷史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那樣笨拙』。

目前在我們所說的活動上，這樣的環節就是要振興國內商業，而由國家加以正確的調節（指導）。商業更是在歷史事件鏈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一環節『抓住』得充分牢固，那麼在最近將來，所有整個鏈條，我們就定能把握住。否則我們既抓不住整個鏈條，而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基礎，也就無從建立了。

表面上看來，這好像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和商業？彷彿這兩者乃是什麼極不連貫、格格不入、相距遙遠的事物。但如果從經濟上深思一下，則這兩者間的距離，並不比共產主義之隔小農經濟和宗法農業的距離更遠。

當我們將來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了的時候，我想，我們會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築成一些公共廁所。這樣使用金子，對於這些後代人說來，乃是最『公平』而最有教益的辦法，因為他們還沒有忘記，正是爲了金子的緣故，曾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偉大解放』戰爭中，亦即在爲了解決這個大問題——是布列斯

特和約壞些，還是凡爾賽和約壞些的戰爭中，竟使一千萬人犧牲，三千萬人殘廢；也正是爲了這金子的緣故，或則於一九二五年前後，或則於一九二八年前後，不是在日美戰爭，就是在英美戰爭，或總之是在此類戰爭中，定會再使二千萬人犧牲，再使六千萬人殘廢的。

姑無論上述這種使用金子的辦法，是如何「公平」，如何有益，如何合乎人道，但我們總歸要說：爲要做到這點，還應當像我們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工作中那樣緊張，那樣有成效地，再操作一二十年吧，不過規模還要更加宏大。而現時在蘇俄共和國內，總還是應當愛惜金子；賣出金子時，金子要賣得貴些，用金子買進商品時，商品要買得便宜些。既是同狼處在一塊，就應當做照狼的辦法，至於說到要滅絕所有的狼，如像在合理的人類社會裏所必需的那樣，那我們就得記住俄國這樣的一句聰明俗話：『上戰場別吹，下戰場再吹吧』…

假如… 假如千百萬小農旁邊，沒有電綫密佈的雄大機器工業，即無論按其技術強力和有組織的『上層物』以及與之伴隨着的現象說來，都是能於用大量優良產品，並較前更加便宜更加迅速來供給小農的這工業，那麼，在此種情形下，商業就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間之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繫。在世界範圍內，這『假如』二字業已實現，這個條件已經存在，可是一個國家，並且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曾在實踐上試圖把工業與農業間這種新聯繫立刻而直接地實現、執行與安排就緒，但它既是未能用『衝擊』動作，一舉解決這個任務，所以現在，它就應當用多次緩慢的、逐漸的、審慎的『包圍』動作來解決這個任務。

把握商業，指導商業，把商業放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所能做到的事。試舉一個極小的例子來說：在頓巴斯，一部份由於提高國營各大礦井的勞動生產率，一部份也由於把小的

農民礦井出租，便已開始了不大的，很不大的，但無疑是實在的經濟復興。因此，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得着數量不多的（從先進國家底觀點看來，乃是微末不堪的，然而在我國貧困現象之下却終歸是彰明較著的）補充煤炭，如把煤的成本作為百分之百，國家就根據這成本比例，按百分之一百二十賣給國家機關，而按百分之一百四十賣給私人使用。（我要附帶聲明一句，這些數目字，完全是我隨意思想的，一則因為我不知道確切數字，二則因為我就即令知道的話，那我此刻也不會來公佈這些數字）。這好像說，雖然規模很小，但我們已開始把握工農業間的周轉，把握批發商業，把握這樣的任務：抓緊着現有小的、落後的工業，或者是大的、被削弱了被破壞了的工業，在當前經濟基礎上把商業復活起來，使中等的，普通的農民（這是農民大眾，是農民羣衆底代表者，是自發勢力底體現人）能感覺得到經濟上的復興，然後利用這樣的機會，更有系統地、更倔強地、更廣泛與更順利地來恢復大工業。

我們決不致於受『情感社會主義』或舊俄國式、半老爺式、半農民式、宗法式等情緒所支配，它們的特性是任意漠視商業。既然要鞏固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繫，要在一個破產遭難的國家來刻不容緩地活躍國民經濟，要振興工業，要便於今後實施更深廣的辦法如電氣化等，那麼所有一切經濟上的過渡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善於利用。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祇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說來，這一關係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底基石，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底ABC，而第二國際底變節領袖以及第二半國際半迂腐、半狡猾的

英雄們却總在曲解與蒙蔽這ABC。當無產階級即令祇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祇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與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爲什麼我們曾能正確運用布列斯特的退守呢？因爲我們前進得如此之遠，我們也就有退却的地方。我們以這樣驚人的速度，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布列斯特和約時止，在若干個星期之內，就建成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澈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甚至就是這一大規模的背進運動（布列斯特和約），也總歸使我們保持了充分廣闊的障地，以便能利用『暫息』時機，然後勝利前進去反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

當無產階級尚未勝利以前，改良是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而在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會因極度緊張運用而弄得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改良（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息期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所謂在物質方面支持下去，——這就是說，保持住力量上的充分優勢，而使敵人不能把我們澈底打垮。所謂在精神方面支持下去，——這就是說，不使自己精神渙散和組織瓦解，却保持住對情況的明確估計，保持住勇敢與堅毅精神，即令就退却得很遠，但祇是退却到一定程度，以便能及時停止退却，並重新轉爲進攻。

我們已向國家資本主義退却了。但我們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現時我們正在向由國家來調劑商業這方面退却。但我們也會是退

却得有限度的。現在業已有了這樣的徵候，可以望見這一退却的終點，可以望見，就在並非遙遠的將來，我們能於停止這一退却。我們進行這次必要的退却愈是自覺，愈是步調一致，愈是少帶成見，則愈能迅速地停止這一退却，爾後我們勝利前進，就會愈加穩固，愈加快便，愈加遠大。

尼、列寧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六七兩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百五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
七九五至八五頁。

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

（一）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

新經濟政策引起無產階級內部情況，因而也引起職工會內部情況有許多根本的變更。在工業與運輸業中，極大多數的生產資料仍屬無產階級國家掌握。加之土地屬於國有，這種情勢表明着，新經濟政策並沒有改變工人國家底實質，但它所根本改變着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底方法和形式，因為新經濟政策，容許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與正在力圖復活的資本主義之間，在經過市場來滿足千百萬農民需要這方面，實行經濟競賽。

社會主義建設底形式之所以改變，是由於現時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在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中的全部政策上，正實行着這一過渡底特別辦法，許多方面是在採取與以前不同的方式來行動，用所謂「新的迂迴動作」來奪取若干障地，結束退却，以便更有準備地轉為重新向資本主義進攻。例如，現在不但容許，而且發展着由國家調劑的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而另一方面，已經社會化的國家企業則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即轉為商業性質，這樣在我國一

般文化落後和疲憊不堪的情形下，必然在羣衆意識中，會多少形成各該企業內管理人員與工人間互相對立的現象。

(二)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 資本主義與職工會

無產階級國家，並不改變自己的本質，祇是在一定的程度內，祇是在由國家來調劑（監察、監督、確定形式和制度等等）私人商業與私人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可以容許自由貿易和發展資本主義。此種調劑的功效，不僅有賴於國家政權，而且更加有賴於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再則有賴於文化水準等等。但是，即令這一調劑充分奏效，而勞動與資本間之階級利益的對立性，無條件地還是會存在的。因此，今後職工會底最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無產階級與資本作鬥爭中，要從各方面並採取一切辦法來捍衛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這一任務應當公開地提在一個首要的地位上，職工會機關應當與此適應而加以改造，改變或補充（應當成立，或正確些說，及時成立各調解衝突委員會，罷工基金，互助基金等等）。

(三)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的 國家企業與職工會

把國家企業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上，這一轉化必然與新經濟政策發生不可分離的聯繫，而在最近將來，這種形式定會成爲若非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在業經容許而日益發展的自由貿易情勢下，這實際就等於把國家企業在頗大程度內轉到商業性質基礎上。此種情勢，由於最迫切地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要做到每個國家企業非但不虧本並能獲利，又由於不免會發生廠方利益以及廠方謀利

熱情過大，便必然在企業內勞動條件問題上，產生出一方是工人羣衆，另一方是國家企業經理、管理人及其所屬機關這兩者間利益上的某種對立現象。因此，在已經社會化的企業中，職工會無條件地必須負責保護勞動者底利益，儘可能促進他們物質生活的提高，經常改正經濟機關底錯誤及其過份謀利的傾向（既然這些現象乃是由於官僚主義歪曲國家機關的行爲中發生出來的）。

（四）承認土地工廠等私有制而由資本家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不承認土地和多數大企業私有制而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這兩者間的根本區別

當階級還存在時，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一過渡時期中，階級必然存在，俄國共產黨黨綱上非常確定地說：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我們所進行的還祇是些初步設施。因此，無論是共產黨或蘇維埃政府和職工會都應當公開承認：當工業與農業中的電氣化尚未實現，或基本上尚未實現，還不能藉此來根除小經濟與市場統治地位之前，經濟鬥爭不但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罷工鬥爭的最終目的，顯然是摧毀國家機關，推翻資產階級底國家政權。而在像我國這樣過渡式的無產階級國家中，工人階級一切發動底最終目的，祇能是鞏固無產階級國家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國家政權，其方法是要與對這國家的官僚主義歪曲行爲作鬥爭，是要與這國家中的錯誤和弱點作鬥爭，是要與資本家們力圖逃脫這國家監督的階級貪慾及其他類似現象作鬥爭。因此，無論共產黨蘇維埃政權或職工會，都不但決不能忘記，而且應當對工人和勞動羣衆指明，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中採

用罷工鬥爭手段，唯一祇是一方面由於對無產階級國家之官僚主義歪曲行爲以及這國家機關內存在有資本主義舊時的各種殘餘，他方面是由於勞動羣衆中政治上不發展以及文化落後的緣故。

所以當工人階級底個別集團與工人國家底個別機關間發生磨擦與衝突時，職工會底任務，就是要促成最迅速和最健全地調解這種衝突，力求盡量有利於職工會所代表的工人集團，祇要無損於無產階級其他部分並一般無害於工人國家及其經濟的發展，因為祇有這種發展，才能造成工人階級之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礎。調解工人階級單個部份與工人國家機關間之磨擦與衝突的唯一正確、健全與適當方法，就是職工會參加仲裁，職工會可以用自己機關的名義，或者根據雙方確切擬定的要求與提議，去向相當有關的經濟機關協商，或則逕直向高級國家機關起訴。

當由於經濟機關底不軌行動，由於某工人集團的落後現象，由於反革命份子的挑撥離間，未了，或由於職工會組織本身缺乏先見之明，以致在國家企業發生罷工等等情事時，職工會底任務就是要採取工會工作性質的步驟，如設法消除真不正確的行爲與混亂現象，滿足羣衆之合理而可以實現的要求，從政治上影響羣衆等等，這樣來使衝突能夠最迅速地得到解決。

職工會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於採取真正在各方面保障工人羣衆利益並及時消除可以造成衝突之根源的這種預見政策，去順利地預防國家企業中帶羣衆性的發動，這是測量職工會工作的正確性及其成效的一種最重要和最確切的尺度。

(五)職工會中恢復自願會員制

職工會把所有僱傭勞動者一無例外地登記爲會員，這種形式上的辦法，已經造成職工會中某種程度的官僚主義曲解，並使職工會本身脫離了自己的廣大會員羣衆；因此無論是個別加入職工會或集

體加入職工會，都必須最堅決地實行自願會員制。決不能要求職工會會員有一定的政治觀點；在這點上，亦如在宗教問題上一樣，職工會應當是非黨的組織。在無產階級國家中，祇能要求職工會會員瞭解公共的紀律並懂得爲了捍衛勞動者底利益和幫助勞動者底政權，即蘇維埃政權，必須團結工人的力量。無產階級國家應當在法權關係或物質關係上，鼓勵工人們聯合在職工會內。但職工會內，沒有義務決不應當有任何權利。

(六)職工會與企業管理方面

在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之後，其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生產品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綱上已經明顯提出，現時由於俄國在軍事時期後所遇到的經濟破壞、飢餓與破產現象，而特別尖銳化了。因此，必須在恢復大工業方面有最快而儘量鞏固的成效，若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造成勞動擺脫資本桎梏這全部事業的勝利，社會主義底勝利就無從說起，而此種成效也無條件地要求在俄國現時環境下，把全部權力集中在工廠管理處。這些按一長制通例組成的管理處，應當根據並限於同職工會締結的集體合同，以最大的機動自由，最嚴格地來檢查提高生產、保證沒有虧損和獲得生產利潤方面的實際效果，最嚴格地選拔極能幹極有威望的管理人員等等，獨立地來規定工資與分配紙幣、口糧、工作服及其他各種供給品。

在這種條件下，職工會對管理方面之任何直接的干預，都應當認爲是絕對有害和決不容許的。

但如果把這一勿庸爭辯的真理，瞭解成爲否認職工會參加社會主義工業組織和參加管理國家工業，那就完全不正確了。在下列的確定形式上，職工會參加這種工作是必需的。

(七)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 機關與管理機關的作用

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轉向於社會主義這國家底階級基礎。在一個小農佔極大優勢的國家內，無產階級祇有在非常巧妙、審慎和逐漸地實行與極大多數農民聯盟的條件下，才能順利地完成這個任務。職工會應當是蘇維埃政權之最親近和最必需的同事，而蘇維埃政權，在其全部政治和經濟工作上都是由工人階級底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所領導的。職工會一般地是共產主義底學校，它對於全體工人羣衆以及全體勞動者說來，又應當是學習管理社會主義工業（爾後逐漸也管理農業）底學校。

根據這樣一種原理出發，即可規定出最近期間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機關和管理機關的下列基本形式：

（一）職工會參加選拔一切經濟機關與有關經濟的國家機關底人員，向那裏提出自己的候補人，指明他們的工作年齡，工作經驗等等。這一問題的決定權，則唯一屬於負該機關工作全責的經濟機關。同時，經濟機關應注意到相當職工會對各候補人所提出的鑑定。

（二）從工人中與一般勞動羣衆中提拔和培養管理人員，這是職工會的首要任務之一。如果說，我們現在已有幾十個充分稱職和幾百個相當稱職的工業管理人，那麼，最近我們就需要有幾百個充分稱職和幾千個相當稱職的工業管理人了。有系統地考察一切適於這種工作的工人和農民，切實地、周到地、細密地檢查他們學習管理的成效，這點今後職工會應當比現在更加百般仔細、百般堅毅地加以實現。

（三）職工會必須加緊參加無產階級國家中一切計劃機關的工作，參加經濟計劃和生產綱領以及關於工人物質供給額分配綱領之製定，參加選擇留作國家經營的企業與擬定出租或租讓的企業及其

他等。職工會並沒有任何職權來直接監督私人企業或出租企業的生產事宜，唯一祇能經過參加相當國家機關，來實行參加調劑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職工會要參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與生產宣傳工作，同時它的這種種活動應更加深刻和更加廣泛地吸引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到國家一切經濟建設中來，使他們認識整個經濟生活，認識全部生產工作，從採辦原料起直到售出產品止，使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之統一的國家計劃以及實現這一計劃對工農有實際利益這點，都有一個愈益具體的概念。

(四)規定工資與配給額等，是職工會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及參加工業管理事宜中，本身工作上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其中社會審判會應當不屈不撓地提高勞動紀律，提高爲紀律、爲增大生產率而鬥爭的文化方式，但絕對不能去干預一般人民法院的職權以及管理機關的職權。

以上所述職工會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中的幾種首要職能，當然，應由相當的職工會機關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來詳細具體規定。爲了提高國民經濟與鞏固蘇維埃政權，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估計到職工會在組織經濟及組織經濟管理方面業已進行的巨大工作底經驗，同時也要估計到因爲無準備、不諳事理、不負責任地直接干預管理事宜而造成不少危害的那些錯誤，以便自覺地、堅決地轉到實地教育工人與全體勞動者來管理全國國民經濟這一個強迫的、實際的並且是要在多年內進行的工作上去。

(八)與羣衆的聯繫是職工會 一切工作底基本條件

與羣衆的聯繫，亦即與極大多數工人（爾後並與全體勞動者）的聯繫，是職工會任何活動成績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條件。在職工會組織及其機關中，自下級以至最上級，都必須建立與根據多年經

驗加以實際檢查過的負責同志底整個系統，這些負責同志並不一定祇是共產黨員，但他們應當處身於工人生活之內，知道這生活的各方面，善於在任何時機，對任何問題都能正確無訛地判定羣衆底情緒及其實際意圖、需要和思想，善於不帶半點虛偽觀念，明白確定羣衆的覺悟程度以及某種舊成見或舊思想殘餘對羣衆的影響，善於用同志態度去對待羣衆，關心地滿足羣衆要求，這樣來爭取羣衆的無限信仰。對於一個黨員人數不多，而以工人階級先鋒隊資格領導着正途走向（至今還沒有較先進國家底直接援助）社會主義的這巨大國家的共產黨說來，最大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羣衆，就是先鋒隊向前跑得太遠，沒有『與隊伍看齊』，沒有與全體勞動軍，即與工人和農民羣衆中的極大多數保持堅固聯繫。猶之一個裝備有極優良發動機與超等工作機的工廠內，如果安設在發動機與工作機之間的傳遞機已經損壞，那末這個工廠也就不能開工了，同樣，如果位置在共產黨與羣衆之間的這一傳遞機——職工會，建立得不正確，或者工作得不對，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必不可免地會遭到破產。這個真理，祇是加以解釋，提到，證實，是不夠的，這個真理應當在職工會全部機構及其日常工作中，從組織上鞏固起來。

（九）無產階級專政下職工會

內部情況的矛盾

從上述問題中，便發生出職工會各任務間的種種矛盾。一方面，職工會的主要行動方法是說服和教育；另一方面，它們既是國家政權的參加者，又不能拒絕參加實行強迫制。一方面，職工會的主要任務，是最直接、最親切地捍衛勞動羣衆底利益；另一方面，它們既是國家政權的參加者與整個國民經濟的建設人，又不能拒絕採用強制手段。一方面，職工會應當按戰時方式來工作，因為無產階級

專攻，乃是最殘酷、最頑強、最拚命的階級戰爭；另一方面，對職工會說來，又是最少能採用特殊的戰時工作方法的。一方面，職工會應善於適應羣衆的生活習慣及其當時政治水準；另一方面，它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助長羣衆底成見與落後性，而應當堅持不移地把羣衆日益提昇到愈高的政治水準上去，如此等等。這些矛盾都不是偶然現象，就在今後幾十年內，也不會消除的。因為，當資本主義與小生產底殘餘依然存在時，整個社會制度中這些殘餘與社會主義新芽之間的矛盾，是無可避免的。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實際結論：第一，爲了有成效地進行職工會工作，祇是正確瞭解職工會的任務是不夠的，祇有正確的職工會機構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種特別的機智，善於在每個具體情況下，用特別辦法去接近羣衆，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把這些羣衆提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

第二個結論：上述各種矛盾必然會產生衝突、失調、磨擦等現象。必須有威信充分的最高機關來立刻解決這些糾紛。這樣的機關就是共產黨及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共產國際。

(一〇)職工會與專門家

俄國共產黨黨綱上已經述叙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理。但如果不再三注意到表明這些原理執行程度的事實，則這些原理不過是紙上空文。近來這樣的事實就是：第一，不僅在烏拉爾的，而且在頓巴斯的社會化的礦井中，發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師的事件；第二，由於共產黨支部黨員以及蘇維埃政權機關之不識事故和絕不容許的行爲所造成的那種惡劣工作條件，竟使莫斯科自來水廠總工程師奧爾登波爾格爾自殺，以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得不把這案件提交法庭審判。

關於這種現象的最大部份罪過，與其說要由職工會來擔負，不

如說要由整個的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來擔負。但此刻的問題，並不是來規定這種政治罪過誰負的輕，誰負的重，而是關於一定的政治結論。如果我們全體領導機關，也就是說，共產黨、蘇維埃政權以及職工會，不做到真正愛護一切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縱令在思想上還完全是歧視共產主義的專門家們，如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那末，也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任何真實成績了。專門家在尚未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之前，終歸還是社會上的一個特別階層，要使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論在物質或權利方面，無論在與工農間的同志合作方面，亦無論在思想方面，即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並覺悟到自己這種工作不依賴於資本家階級底自私自利而對社會有益方面，都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得要好些，這點，我們雖不是很快就能實現，但無論如何都要實現。如果一個機關，不來有計劃地進行這種業經佈置並已收到成效的工作，即在各方面保障專門家，鼓勵其中優秀份子，捍衛與保護他們的利益等等，那麼，任何人也不會承認這樣的機關是多少佈置得不壞的。

職工會進行所有這樣的全部工作（或有系統地參加一切機關中的相當工作）時，應當不從該機關的利益出發，而應當從勞動與國民經濟的整個利益出發。關於專門家這層，職工會應負責進行極艱鉅困難的工作，即經常來影響最廣大的勞動羣衆，使他們能與專門家建立一種正確關係，祇有這樣的工作，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實際效果。

（一一）職工會和對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影響

祇有當職工會把極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聯合起來的時候，那它們才是真實的職工會。因此，就不免發生出——特別是在農民佔極大多數的國家內——各種政治影響在職工會中的相當穩固性，這些政治影響係資本主義殘餘的及小生產的上層建築物。這乃是小資產

階級的影響，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即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各政黨之在俄國的另一形態）的影響，他方面是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祇在這些流派中，還保留有相當多的人數，他們並非從自私的階級動機，而是在觀念上來擁護資本主義，繼續崇信它們所鼓吹的一般「民主」、「平等」、「自由」等等底超階級意義。

正要用上述唯一的經濟原因，而決不是用個別集團，更不是用個別人物所起的作用，才可以解釋我們職工會中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底殘餘（問或還是復生）現象。因此，共產黨，主持文化教育工作的蘇維埃機關以及職工會中的全體共產黨員，都應當更大加注意於同職工會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流派和傾向進行思想鬥爭，——尤其是這新經濟政策不能不使資本主義相當加強起來的時候。加緊與小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影響作鬥爭，藉此來對抗這種現象，乃是真正必要的。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刊於真理報
第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一四七至一五六頁。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請讓我不從年初開始，而從年終來開始說起吧，目前熱納亞⁸⁴問題是個最迫切的政治問題。但因為我國刊物上關於這點已寫的很多，加之我在二月六日⁸⁵的演講中（這個演辭已經發表），也說到了這個問題的主要之點，所以，如果你們不特別要我敘述某些詳情細節，那就讓我不來詳細講到這個問題吧。

關於熱納亞會議的一般情形，你們大家是知道的，因為刊物上對這個問題已經登載得很多，——據我看來甚至是太多太多，簡直多得有損於我國一般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真正、實際和迫切的需要。在歐洲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內，人們關於熱納亞會議極愛異想天開，喧囂一時，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們這次（也不只這次）竟倣法他們，而且做法得太多了。

應當指出，我們在中央委員會採取了最仔細的辦法，以便由我們最好的外交官來組織一個代表團（現在我們已有相當數量的蘇維埃外交官，已不像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初期那樣了）。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給我國到熱納亞去的外交官擬定了充分詳細的指令，並擬製了很久，幾次重新地討論過。顯然，這裏的問題，我雖不能說是軍

事的，因為軍事這個字眼很能引起誤解，但無論如何這也是競賽的問題。在資產階級營壘裏，有個非常強大，比其他派別強大得多的派別，極力想破壞熱納亞會議。但也有另一些派別，它們無論如何都想堅持這個會議，並使之召集成功。後面這些派別目前佔着上風。末了，在所有資產階級國家這營壘裏，有個可稱為和平主義的，即整個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都應列入的一個派別。這是資產階級中企圖堅持許多和平主義提議，並策劃出某種類似和平主義政策的那個營壘。我們共產黨人對於這種和平主義，抱有一定的觀點，不過這裏完全沒有說明它的必要。顯然，我們不是以共產黨人的資格，而是以商人的資格到熱納亞去。因為我們要作買賣。他們也要作買賣。我們想使這買賣對我們有利，而他們則想使這買賣對他們有利。鬥爭怎樣展開起來，將有賴於（雖然在不大的程度上）我們外交官底藝術。

我們既以商人資格到熱納亞去，那我們究竟是要與資產階級營壘中那些趨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代表們周旋，抑或是與那些趨向於和平主義（即令這種和平主義是最壞的，而從共產主義觀點看來簡直是不值一駁）的代表們周旋，這點對於我們說來，顯然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一個商人不善於領會這種區別，不能把自己的策略去適應這種情況，以求達到實際目的，那他畢竟是個不好的商人。

我們到熱納亞去的實際目的是要擴大商業，並造成一種使商業能最廣泛和最順利發展起來的條件。但我們決不來担保熱納亞會議定會成功。要來担保這點，那就會是可笑而妄誕無稽的了，我應當說，在最清醒和最細心估計此刻熱納亞的可能前途時，我總還是認為，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是能於達到自己這個目的的。

如果那裏我們的對方有足夠的理解力，並不過份固執，那就在熱納亞會議上做到這點，如果他們硬想固執下去，那就會在熱納亞會議以外做到這點。但我們總之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

須知，一切資本主義列強近幾年來最迫切、最必要、最實際和最顯明暴露出來的利益，是要求發展、調整和擴大對俄國的通商關係。既然有了這樣的利益，那末就是辯論，就是爭執，就是在各種提議上發生分歧——甚至很可能走到決裂，——但歸根到底，這個基本經濟上的必要性終究會給自己開拓進路的。所以我想，我們對於這點，可以放心。我雖不能担保期限，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正是在這裏大會上可以相當自信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正常商業關係，是必然會向前進展的。這裏能有多久的中斷——這點我將在本報告中相當的地方提到，但我想，關於熱納亞問題可以說到這裏為止。

不言而喻，那些願意更詳細知道這個問題和不滿意報上已公佈的代表團名單的同志們，能夠選出一個委員會或副委員會來考察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材料、信件和指令。當然，我們所規定的細節是帶假設性的，因為直到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究竟是誰去出席熱納亞會議，他們在這次會議上將提出些什麼條件，或先決條件，或附帶條件。我想，在這裏來把這一切都分判清楚是極不適當的，甚至實際上也辦不到。我再重複說，代表大會經過這副委員會或委員會，完全有可能來收集關於這個問題已公佈的和中央委員會現有的一切文件。

我祇限於說到這裏，因為我相信，我們最大的困難並不在這個問題上。全黨應當注意的主要問題並不在這裏。歐洲資產階級刊物把這次會議的意義巧於吹噓，故意誇大，以此欺騙勞動羣衆（在所有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和共和國裏，全資產階級刊物中十分之九總是這樣作的）。我們也多少受了這類刊物的蠱惑。我們的報紙總還是迷戀於舊的資產階級的慣例，不願轉上新的社會主義的正軌，於是我們對問題興起了不應有的喧嚷。其實，對於共產黨人，尤其是我們這些熬過自一九一七年起即已開始的艱苦年代，見過從那時起即已發生的各種嚴重政治錯綜的共產黨員說來，熱納亞會議並不是什麼大的

困難問題。我並不記得，關於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央委員會內，而且在我們黨內有過某種分歧或爭論。這是極自然的，因為從共產黨員（那怕其中有各種不同的色彩）的觀點來看，此地並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地方。我再重說一遍，我們是以商人資格到熱納亞去，以圖達到發展商業的最有利形式，這種商業已經開始，並正在進行，即令有人得以強制地把它中斷一些時日，但經過這種中斷後，它終究是不免要發展起來的。

因此關於熱納亞問題就簡短說到這裏為止，現在我便來講講那些據我看來是過去一年內以及下年度政策上的主要問題。我以為（或至少我是慣於這樣作），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我們不簡單是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作了些什麼，而且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得到了些什麼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教訓，以便正確地來決定自己下年度的政策，以便在這一年內也能學得一點什麼。

主要的問題，當然是新經濟政策。過去這一年，乃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年份。如果說，我們在這一年內獲得了某種巨大的，嚴重的和不可氣奪的勝利品（這點我還不能怎樣確信），那麼，這只是要從這個新經濟政策的始基上學得一些什麼。這一年來，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確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至於我們是否真正學會和學會了多少，要檢查這點，大概是要靠今後的事件，即很少依我們意志為轉移而發生的，例如行將來臨的財政危機這樣的事件。我以為，關於我們新經濟政策問題，主要應注意如下三點，作為估計上年度經驗和獲得下年度實際教訓之一切議論底基礎。

第一，新經濟政策對我們之所以重要，首先因為它是對我們能真正達到與農民經濟聯合的一種檢查。在我國革命發展的過去這一時期，當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都主要用在或差不多都主要消耗在抵抗侵略的任務上時，我們不能認真地思索這個聯合，我們會無暇顧及這點。當時，既有刻不容緩和萬分迫切的任務存在，即是要打破有

立刻被世界帝國主義強勢力所窒死的危險，這一聯合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而且應當加以輕視的。

轉向新經濟政策，這是上屆代表大會上異常一致地通過了的，這種一致，甚至比我們黨內通過其他問題時都要更大（須得承認，大大一致這是我們黨的一般特點）。這種一致，表明已絕對要有新的門徑來接近社會主義經濟。那些從各種觀點來估計情況而在許多問題上抱着不同意見的人們，都一致堅決地很快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接近社會主義經濟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適當門徑，而能於找到這種門徑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經濟政策。當時，由於軍事事變的發展，由於政治事變的發展，由於老的文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地內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的發展，——我們必得乘我國尚屬經濟上若非最落後國家，至少也是最落後國家之一的關頭，首先打穿舊資本主義世界裏一個破口。我國極大多數農民是進行着小的個體經濟。當我們建設我們所規劃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綱領中能一舉實現的東西時，這種建設，在相當程度上曾離開了極廣大農民羣衆的日常生活，我們叫他們負擔了很艱鉅的義務，理由是說戰爭不容許在這方面有任何的動搖。雖然我們不免作過許多錯誤，但這種理由，大體上農民是接受了的。全體農民羣衆看見並瞭解到，爲了捍衛住工農政權，使其免受地主的侵犯，使其不致於被那有奪去革命全部勝利品危險的資本主義侵犯所窒死，這些加在農民肩上的重大負擔，是必要的。可是在已經國有化和社會化的工廠和蘇維埃農莊中建設着的經濟與農民經濟之間，那時並沒有聯合。

我們在上屆黨代表大會上已明顯地看到這點。並且我們看得這樣清楚，以致黨內關於必然要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竟沒有表現過任何動搖。

俄國諸黨派在國外出版的異常豐富的刊物上對我們這個決議所作出的估計，真是令人可笑了。這些估計間幾乎沒有區別：他

們都落在實際生活後面，此刻還硬說左派共產黨人直到現在仍然反對新經濟政策。人們在一九二一年記起了一九一八年有過的事，記起了連我們這裏的左派共產黨人自己都忘記了的事，這班人總在反復咀嚼着，硬說這些布爾什維克是大家都知道的狡猾而虛偽的人；說他們把自己人中有意見分歧的事向歐洲人隱藏起來。當你讀到這點，那你就會想道：讓他們去迷誤吧。既然他們關於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事竟抱着這樣的概念，那就可以按此種概念來判斷這些現已逃往國外似乎是最有學問的老舊人物底覺悟程度了。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過任何意見分歧，其所以沒有，是因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採用旁的辦法這一實際上的必要性，對大家已是完全瞭然的了。

我們這裏，過去沒有同農民經濟的聯合，沒有我們所曾企圖建立的新經濟。此種聯合現在是否有了呢？還沒有。我們只才接近到這種聯合。新經濟政策底全部意義（我國刊物上，人們往往還在到處繼續尋找這個意義，但去找錯了地方）就在於，而且只在於要找到我們正用大力來創立的那種新經濟底聯合。我們的功勞就在這裏，不如此，我們就不會是共產黨員革命家。

我們不顧一切舊的東西，已開始完全按照新方式來建設新的經濟。如果我們不曾開始建設這種新經濟，那我們在頭幾月或頭幾年就會已被人粉碎。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硬要堅持：既然我們這樣絕頂勇敢地開始了新經濟建設，那我們就一定要繼續這樣幹下去。這種主張有什麼根據呢？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我們最初就說過，我們必須去進行無上新奇的事業，如果資本主義較發達國家的工人同志不迅速地來幫助我們，那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頂困難的，並且無疑地會作出許多錯誤。主要的是應善於清醒地來觀察，什麼地方犯了這樣的錯誤，並把一切都從頭加以改造，不是一兩次，甚至是很多次地把一切都從頭加以改造；這也

就會表明出，我們是不帶絲毫成見，真正用明豁眼光來對待我們那在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

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現時主要的是正確領會過去這一年來的經驗。這點必須作到，這點我們也願意作到。既然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作到這點（我們願作到這點，並且定會作到這點！），那就應該知道，新經濟政策之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其餘一切都是從屬的）任務，就是奠定我們已開始建設的新經濟（雖然建設得很不好，很不嫻熟，但畢竟在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新的生產和新的分配法基礎上開始建築起來了）與千百萬農民所經營的農民經濟間的聯合。

這種聯合以前還沒有過，現在我們首先就要建立這種聯合。要使一切都服從於這一事業。我們還應該查明，在建立這種聯合同時又不破壞我們那雖然簡陋但已開始建設的東西方面，新經濟政策究竟有了何種成就。

我們建設自己的經濟是與農民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應當再三改造這種經濟，並要把它安排妥當，使得我們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能與每個農民祇圖逃出貧困，並不異想天開（既是祇爲了逃脫最痛苦的直接餓死危險時，又怎樣能異想天開呢？）而盡力從事的工作聯合起來。

要把這種聯合顯示出來，使我們能明白地看見它，使全體人民能看見它，使全體農民羣衆都能見到；現時在農民羣衆那空前破產、空前貧乏的困苦生活與人們爲遙遠的社會主義理想所進行的工作之間，有了聯繫。要使每個普通平常的勞動者都瞭解到，他自己的生活的真得到了某些改善，而且這種改善並不像地主政權和資本主義時代少數農民所獲得的那樣，那時任何改善（改善無疑義是有的，而且很大）都是與對農夫的譏笑，侮辱，嘲弄以及施於羣衆的暴行緊相聯繫着，這種暴行是任何一個農民也沒有忘記過，而且今後幾

十年內在俄國都不會被人忘記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恢復聯合，用事實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從農民所瞭解，所熟識而此刻在其貧困境况下所易於接近的辦法開始，而不是從農民看來乃是什麼遙遠的，空想的事物來開始；證明出我們善於幫助農民，證明現時共產黨員是在小農處於破產、貧困、遭受饑餓痛苦的極端困難時日，實際地幫助他們。或者我們來證明這點，或者農民把我們拋到九霄雲外去。這是完全避免不了的。

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意義，這就是我們全部政策的基礎。這裏也就是施行新經濟政策過去這一整年來我們的主要教訓，以及本年度中我們的所謂主要政治條規。農民借債給我們，當然，他們在經歷過這種艱難時日之後，也不能不借給我們。廣大的農民羣衆都同意這樣：『好，如果你們不會做，那我們就等等吧，也許你們也能學會的』。但這種債務決不是取之無盡的。

應該知道這點。借了債以後，終歸要着着急。須知快到這樣的日子，那時這農民佔多數的國度不再借債給我們，那時，如果說句生意話，它就會向我們追索現款。『敬愛的當局們，雖說債務展期了幾個月和幾個年頭，但此刻你們終歸找到了最真實和最可靠的辦法來幫助我們逃出窮困，貧乏，饑餓和破產。你們有本領，你們已經證明了這點』。這就是我們免不了快要經受的一種考試，而這種考試終究要決定一切，既決定新經濟政策底命運，也決定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底命運。

我們能否完成我們的直接事業呢？這個新經濟政策是否有點用處呢？如果退却會是正確的，那麼，退却之後就同農民羣衆接合起來，並和他們一塊，雖然行動百倍地緩慢，但却是堅毅不拔地前進着，而使他們經常看見我們畢竟是在前進。那時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戰勝不了我們。直到現在，即在這第一年中，我們還沒有達到這點。這是無可隱諱的。但我深信

（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也能使我們完全明確堅定地作出這個結論），如果我們領會到新經濟政策中所包含的全部巨大危險，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各種弱點上去，那時我們就一定能夠解決這個任務。

與農民羣衆，即與普通的勞動農民接合起來，並開始向前移動，其速度雖比我們所希望的慢得不可計量；慢到了極點，但這裏整個羣衆却真正會和我們一同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運動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速度。據我看來，這便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基本的政治教訓。

第二個較爲局部的教訓，這就是藉國家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間的競賽來實行檢查。現在我們建立着合股公司——往下我要略微來講講它們，——這些公司也像我們的全部國營商業和全部新經濟政策一樣，是我們共產黨人運用商業方法和資本主義方法的表現。這些公司也具有另一種意義，那裏有資本主義方法和我們方法之間的實際競賽。請具體地比較比較吧。我們直到現在只是寫過綱領，作過諾言。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沒有綱領和諾言就不能促進世界革命。如果白黨份子，包括孟什維克在內，因這點來謾罵我們，那這只是證明孟什維克以及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社會主義者關於革命發展的一般情形，一竅不通。除了經過這條道路外，我們便不能開始前進。

但目前的情形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應施行嚴格的檢查，而不往往又是由這些共產黨員組成的監督機關所舉行的檢查，那怕這些監督機關是再好不過的，那怕它們在蘇維埃機關系統中以及黨機關系統中差不多是盡善盡美的監督機關。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從民衆經濟觀點上看來名符其實的一種檢查。

以前資本家會辦理供給。雖然這件事情他們做得很不正當，用強盜打劫的方式欺負了我們，掠奪了我們。這是那些不議論共產主

義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也都知道的，他們不議論共產主義，因為他們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

『但資本家終歸會辦理供給，你們會麼？你們是不會的』。這就是去年春季所常聽到的話——雖然並非隨時都聽得清楚，——但這些話却成了去年春季整個危機底根源。『你們倒是些好人，但你們所擔當的經濟事務，你們卻不會辦理』。這就是農民以及受過農民影響的許多工人，在去年用來反對共產黨的那種最普通和最致命的批評。這也就說明，為什麼新經濟政策問題中舊有的這一條，具有這樣重要的意義。

需要真正來檢查。旁邊既有資本家在動作，他們按強盜方式動作，他們獲得利潤，但他們會幹這一套。可是你們——試按照新方法去作吧：你們既無利潤可獲，原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再好不過的，——你們這些神聖人物，簡直可以活活地升入天堂裏去，——但事情究竟會不會作呢？需要檢查，真正來檢查，並且不是先由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和提出責難，再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處罰辦法這樣的檢查，——不是這樣，而是需要從國民經濟觀點看來是真正的檢查。

借給共產黨員的債比借給任何其他政府的都要多些，但關於償還這層却允許他們百般展期。當然，共產黨員曾幫助他們擺脫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點農民都很重視，所以農民對債務才展期，但這總歸是有一定期限的… 爾後他們就要來檢查：你們經營業務是否不比別人壞些呢？舊日的資本家會經營，你們卻不會經營。

這就是第一個教訓，也就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底第一個主要部份。我們不會經營業務。這是過去一年中所已經證明了的。我很想列舉幾個『國家托拉斯』（若用署格涅夫如此讚揚過的美麗俄文中的新字眼）的例子，來指明我們怎樣不會經營業務…

可惜，因為許多原因，一大部份是因為病的關係，使我不能將報告的這部份充分發揮，只能限於把自己對現狀觀察所得的信念表達出來。我們在這一年來極明顯地證明了，我們不會經營業務。這是主要的教訓。或者我們在最近這一年內證明我們會經營業務，或者是蘇維埃政權不能繼續存在下去。最大的危險就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點。如果全體共產黨員，負責工作人員，都明白瞭解到：自己既然不會，就得從頭學習，那時我們便會獲得勝利，——據我的意見，這才是主要的，根本的結論。但是他們不瞭解這點，却又深信：如果誰這樣想，那他就是不開通的人，就是可惜沒有學習過共產主義，也許學習一下共產主義，那他們就會懂得的。不，請原諒，問題並不在農民和非黨工人沒有學習共產主義，而是在於那個本該宣揚綱領和號召人民來執行這個偉大綱領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既然這個時間業已過去，那末現在就要來證明，你們在目前困難情況下能於實際地幫助工人和農民生底經濟，使他們都看得見，你們確實經受得住這一競賽。

我們已開始組織了合股公司，其中既有俄國和外國的私人資本家參加，也有共產黨員參加，這些公司乃是一種這樣的形式，那裏可以正確地佈置競賽，可以表明並學會，我們能與農民經濟建立聯合並不比資本家作的壞，我們能滿足農民生底需求，能在農民現有的黑暗落後狀態下，幫助他們前進，因為要在短時期內改造農民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競賽這一刻不容緩的任務。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關鍵以及我所認為的黨政策底全部實質。我們這裏的純粹政治問題和困難，應有盡有。這都是你們所知道的：既有熱納亞會議，也有武裝干涉的危險。困難是大極了，但這些困難與競賽的困難比較起來，畢竟還是很微末的。因為我們已經看見那裏的情形，我們在那裏已經學會很多的東西，已體驗過資產階級的外交。這原

來是十五年來孟什維克所教過我們的玩藝，而且是多少使我們受到了教益的玩藝。這並不是新的東西。

請看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要作的事吧：現在就是要賽得過平常的店員，普通的資本家，商人，他們一到農民中去，並不來爭論共產主義——真的，他們也不致於來爭論共產主義，却只來爭論：如果你們需要什麼東西，又要交易公平，又要建築得好，那麼，由我來建築，價錢是很貴的，但共產黨員也許建築得更貴，也許要貴上十倍。這就是現時最能起作用的宣傳鼓動，這也就是經濟根源之所在。

我再重複一遍，由於我們正確的政策，我們已從人民方面取得了債務並展期償還，若按新經濟政策的語句說來，這就叫做期票，但這些期票上並沒有註明期限，什麼時候應交出它們來兌現，這點從期票的條文上是看不出來的。危險就在這裏，政治期票與普通商業期票不同的特點也就在這裏。我們要用全力注意到這點，不要以為在國家托拉斯和合股公司中，到處都是負責的優秀共產黨員而自安自慰——這沒有任何益處，因為他們不善於經營，比較那班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鍊的普通資本主義店員要差一些。這點我們沒有覺悟到，這裏要用同樣美麗俄文中的新字眼說來，就是還存在有『共產主義誇大狂』。問題就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即優秀、純潔、忠實，受過苦役鍛鍊，並且是不怕犧牲的這共產黨員，却不會作買賣，因為他不是精於實務的人，沒有學過這點，又不願意去學習，而且不瞭解應當從頭學起。他這共產黨員，是完成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雖不是四十個金字塔，也是四十個歐洲國家都在期望他去幫助擺脫資本主義制度，他也就應當向那些在糧食行裏蹬了十年並熟悉這門的普通店員學習，可是他這負責的共產黨員和忠實的革命家，不僅不懂得這點，甚至還不知道他是不懂得這點。

同志們，如果我們只把這個初步的無知現象改正過來，這也就

會是極大的勝利。這次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我們應抱定這樣一種信念：我們既不知道這點，今後我們就要從頭來學習。我們總還不失為革命家（雖然很多人甚至不是完全無根據地說，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夠瞭解這個簡單情理，即在新的，異常困難的事業中，要善於再三從頭開始：開始之後，陷入了困境，又重新來開始，——那怕十次改作，但總之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要裝威作勢，自誇自大，說什麼你是共產黨員，而他却是個非黨的店員，也許還是個白黨份子，就即令他定是個白黨份子，但他善於作好經濟上定要作好的事情，然而你却不會作。如果你這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又有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假若你了解這點，那你就應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這點是能夠學會的。

這一年來我們雖有某些小小成績，但這成績畢竟是微乎其微。主要的是沒有悟解到和沒有普遍地使全體共產黨員都相信到，此刻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實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的本領，比任何一個舊時的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復一遍，要開始從頭學習。如果我們悟解到這點，那我們就能經住考試，而考試是很嚴格的，這是由日益臨近的財政危機所舉行的考試，這是由俄國和國際市場所舉行的考試，況且我們是服從於這種市場，是已與之結聯而不能同它脫離的… 這是個嚴格的考試，因為這裏人們能夠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擊敗我們。

問題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因為這裏競賽是很嚴重的，是有決定意義的。我們有過打開我們政治和經濟難關的各種進路和出路。我們可以自豪地誇耀說，我們迄今以前都曾善於適應不同的情況，在各種配合下利用所有這些進路和出路，但現在我們再沒有任何的出路了。這裏請讓我毫無誇大地告訴你們說，真的，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進行這『最後的決戰』，不是同國際資本主義，

——那裏將還有多次『最後的決戰』，——而是同俄國資本主義，同那從小農經濟中成長起來，並由小農經濟支持着的俄國資本主義，進行此種決戰。這裏，在最近將來，就要進行戰鬥，戰鬥開始的日期不能確定。這裏要進行『最後的決戰』。這裏不能再有任何政治上以及任何其他的彎路可走，因為這是與私人資本實行競賽考試。或者我們經住這一與私人資本競賽的考試，或者在這考試中我們完全失敗。爲了經住這個考試，除技巧以外，我們是應有盡有，我們既有政權，又有許多各種經濟資源及其他資源，所缺乏的只是技巧。但如果我們能從過去這一年的經驗中得出這個簡單的教訓，並把這一教訓作爲我們在整個一九二二年的行動指南，那時我們就連這個困難也能夠戰勝，那怕它比以前的困難更大得多，因為這個困難是在於我們本身。這並不是什麼外來的敵人。這個困難就在於我們自己既不願瞭解那強迫我們接受的不愉快的真理，又不願落到我們應該落到的不愉快的情況中，即從頭開始學習。在我看來，這就是從新經濟政策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教訓。

第三個教訓，補充的教訓，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可惜，這次代表大會上沒有布哈林同志參加，我本想同他來稍微爭論爭論，但最好是留到下次代表大會時再說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我以爲我們刊物以及我們黨一般地都犯了這樣一種錯誤，就是我們墮入知識份子的成見，墮入自由主義，異想着如何來瞭解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總是在舊書上來尋找答案。而那裏所寫的，却完全不是關於這個問題：那裏所寫的乃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常有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任何一本書上也未曾寫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甚至馬克思關於這點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去世之後也沒留下一段確切的言論和無可反駁的指示讓我們來引證。因此現在我們就必須靠自己來打破困局。如果一般地觀察觀察我們刊物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所寫的東西，猶如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企圖

作到的那樣，便可以確信地說，那裏完全沒有瞄準目標，簡直是無的放矢。

國家資本主義，據所有經濟學書上的解釋，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當國家政權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時的一種資本主義。而我們的國家却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依據着無產階級，給無產階級以一切政治上的優勢，並經過無產階級把下層農民（大家記得，我們是從貧農委員會開始了這個工作）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弄得很多人都迷惑不清。爲要不致發生這種現象起見，就須記住這一主要的東西，即我們現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無論在什麼理論或什麼著作中都是沒有解釋的，原因很簡單，因爲與這個名詞有關的所有一切通常的概念，都是關係於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政權的。而我們的是已脫去了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的社會制度，可是指導這個國家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人不願來瞭解，當我們說到「國家」時，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我們能夠規定它的界限的一種資本主義，這個國家資本主義是與國家關聯着的，而這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底先進部份，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應當加以一定限制，但至今我們還不善於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全部問題就在這裏。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將是怎樣的，已經要依我們爲轉移了。我們有充分的，而且是極充分的政權；在我們支配下的經濟資料也是充足的，但是被提昇出來，爲的是要去直接管轄，去確定範圍，去劃清界限，去使其服從自己，而不是使自己服從其他的這個工人階級先鋒隊，却缺乏技巧。這裏所需要的只是技巧，而我們却缺乏這種技巧。

須知這完全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情況：無產階級即革命先鋒隊擁有極充分的政權，同時却有國家資本主義並存着。問題底關鍵就

在於要使我們瞭解，這便是我們能夠容許和應當容許的一種資本主義，是我們能夠限制和應當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因為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廣大農民和那作買賣來滿足農民需求的私人資本是必要的。定要把事情安排得使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周轉底通常進程成為可能，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沒有它便不能生活。一切其餘的東西對於他們這個營壘的人，都不是絕對必需的，一切其餘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都是可以通融下去的。你們這些共產黨員，你們這些工人，你們這些負責管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底覺悟部份，你們要善於做到使你們所掌握的國家能按照你們的意志來行動。我們已經過了一年了，國家在我們的手中，——而這一年來，國家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真正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了麼？不是的。我們不願意承認這點。它不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的。然則它是怎樣行動了呢？就像一輛不聽駕駛的汽車，彷彿內面坐着有開車的人，但汽車却不是往他所指出的方向駛去，而是往某個旁人所指出的地方駛去，也不知這個是什麼人，還是祕密的，非法的，憑空來的什麼東西，或是投機商人，或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是兩者一塊，——但汽車却不是完全照着，而且常常完全不照着這汽車駕駛人所想像的那樣行進。這就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所要牢記着的基本點。要在這個基本方面，從頭來學習；只有當這點已成為我們絕對的心得和知覺時，我們才能担保說，我們能學會這點。

現在我就來講到關於停止退却的問題，也就是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業已提到的問題。從那時起，無論在黨報上，無論在同志們的私人來信中，亦無論在中央委員會裏，至今我都沒遇到過任何的反駁意見。中央委員會批准了我的計劃，按這個計劃也就是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盡力着重指出這一停止退却的問題，並請求代表大會給予相當的指令，即用全黨名義提出而必須執行的指令。我們退却已一年了。現在我們應當代表全黨

來說：已經夠了！退却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終結，甚至可以說已經終結了。現在所提出的是另一個目的——就是要重新配置力量。我們已進到新的地方，一般和整個說來，我們總算是退却得比較有秩序。不錯，從各方面有過不少能使這個退却成爲驚惶退却的呼聲。有些人說，你們在某些部份上退却得不對，例如，所謂『工人反對派』（我以爲他們的這個名稱是不正確的）某些代表責備的那樣。他們過分熱心想向一道門裏鑽去，結果却落在另一道門裏了，現在他們已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錯誤。當時他們却沒有看到他們的活動不是來改正我們的運動方向，而其實他們的活動，唯一是引起驚慌，妨害有紀律地實行退却。

退却本是件困難事情，尤其是對於那些已習慣於進攻的革命家，尤其是當他們已習慣於幾年來進攻中的巨大成功的時候，尤其是他們周圍如果有其他國家那些只幻想開始進攻的革命家環繞着的時候。其中有些人看見我們在退却，竟不可容許地像小孩般哭泣起來，如在最近一次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上所發生過的情形那樣。某些同志由於最優良的共產主義情感和共產主義志向，想道，看，這樣好的俄國共產黨員都在實行退却，於是他們也就哭泣起來。也許，雖則我在這些美妙的民主國家內僑居過很多年，現在我也難於瞭解這種西歐人的心理了。但也許在他們看來，這竟是這樣難於瞭解，居然可以哭泣起來。無論如何，我們亦無暇來論列這些感傷心理。對我們是很顯然的，正因為我們在許多年內這樣勝利地進攻，並獲得了這樣多的迥非尋常的勝利（而所有這些，還是在一個遭受了絕頂破壞和失去物質先決條件的國度裏哩！），既然我們獲得了這多勝利，爲了鞏固這個進攻，我們退却本來是完全必要的。那時我們曾不能保持住一舉奪來的全部障地，另一方面，正因為我們是一舉奪來，是在工農熱情的頂峯上奪得了無限多的東西，所以我們才有這樣寬大的地方，使我們能夠實行很遠的退却，甚至現在也還能夠遠遠

60*

退却，絲毫不喪失主要的和重要的東西。雖然驚慌失措的呼聲，也有『工人反對派』在內（它最大的害處也就在這裏！），引起了我們中間的部分損失，造成違反紀律和脫離正確退却的現象，但一般和整個說來，退却是實行得很有秩序的。退却時最危險的事，就是驚慌。如果全軍（這裏我是比仿說）都在退却，這時便不能有全體前進時的那種情緒。這時寸步都可以遇到相當頹喪的情緒。我們人中甚至有過一些詩人，他們寫道，看吧，在莫斯科，是飢寒交迫，『先前，乾淨，漂亮；現在，買賣，投機』。我們有許多這樣的詩歌作品。

顯然，這是由於退却而產生的。這裏含有巨大的危險：經過偉大的勝利進攻後來實行退却，確是一件極困難的事；這裏完全是另一種關係；在進攻時，即令不維持紀律，大家也會自行奔向前去；而這裏紀律還應當更是自覺的，並且百倍地需要，因為當全軍都在退却時，它既不明白，也看不見應行停止的地方，而它所看見的只是退却，——這裏有時只要稍微發出一點驚慌失措的聲調，就足以使大家跑散的。這裏的危險確是很大。當真正的軍隊在實行這樣的退却時，就架上機關槍，若是有秩序的退却轉為混亂逃跑時，那就下令：『開槍吧！』。這是作得對的。

如果當我們進行空前困難的退却，全部關鍵在於保持良好秩序之際，竟有人來散佈驚慌心理，即令這是出於一番好意，也終究必須殘酷無情地嚴格懲治這些稍微破壞紀律的人，這不僅對某些屬於我們黨內的事情應該如此，而且對於孟什維克之流或第二半國際的全體先生們更應該如此。

近幾天內我在共產國際雜誌第二十期上讀到了拉科西同志評鮑威爾所著新書的一篇文章，我們大家有個時候都曾向鮑威爾學習過，但他在大戰後，也如考茨基一樣，已成了可恥的市儈之徒。他現在寫道：『看，他們在向資本主義退却；我們隨時都說：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

當我們說要槍斃作這種宣傳的人時，而那些專在進行此類宣傳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表示驚奇。固然他們都很詫異，但須知問題是極明顯：當軍隊實行退却的時候，那裏的紀律比在實行進攻時更需要百倍，因為進攻時全體都是向前奔進。如果現在大家都開始向後逃竄，那這就是死亡，就是必然死亡和立即死亡。

正是在這種關頭要退却得很有秩序，確切地規定退却底限度而不陷於驚慌失措，這是最主要的。當孟什維克說：『你們現在實行退却，而我隨時都是主張退却的，所以我同意你們的行動，我是你們的人，讓我們來一同退却吧』，——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他們說：『凡是公開表示孟什維主義的人，我們革命法庭應一律處以槍斃，否則，這就不是我們的法庭，那也不知它是什麼東西了』。

但他們怎的也不能瞭解，並說道：『這些人的獨裁癖該是多麼厲害呵！』他們至今還以為我們之所以懲辦孟什維克，是因為他們在日內瓦和我們爭吵過。可是假如我們真的走上了這條道路，那大概我們的政權連兩個月也維持不住。其實，鮑威爾，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領導者們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宣傳出的這些話，也就是他們的本性：『革命進得太遠。我們隨時都在說的，正是你現在所說的話。讓我們再把這點來重複一遍吧』。而我們却回答說：『正因為這點，讓我們來槍斃你們吧。或者請不必說出你們的觀點，或者，如果你們想在目前情況下，當我們的處境比白黨直接進犯時還更困難的時候，來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請原諒，那我們就會像對待最惡劣和最有害的白匪份子一樣來對待你們』。我們決不應當忘記這點。

當我說到停止退却時，我絕不是想藉此來說，我們已學會作買賣了。我的意見恰恰與這相反，若是從我的發言中得出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人們沒有正確瞭解我的話，那就證明我不善於把自己的思想正確敘述出來。

必須使我們這裏由於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焦急和奔忙，以及想把一切都按照新方式來創立來適應的那種趨向，都能停止下去。我們現在有了一些合股公司。誠然，它們的數量是很少的。我們創辦了有外國資本家參加的九個合股公司，這些公司業經對外貿易部批准，此外索科里尼可夫主持的委員會批准了六個，北方木料管理局也結合了兩個。這樣一來，現在就有十七個擁有若干百萬資本，且經相當機關批准了的合股公司。（當然，在我們機關方面也有充分的混亂現象，這裏也可能錯過一些時機）。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與俄國資本家及外國資本家合辦的股份公司。它們的數量並不多。這一雖屬微小但是實際的開端表明着，人們業已重視共產黨員，不過是根據他們的實踐方面來重視，而不是像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委會這類高級機關那樣來重視他們。當然，中央監察委員會是個很好的機關，我們現在將給它以更多的權力。但畢竟還是，如果這些機關檢查共產黨員時，那… 真的，在國際市場上，人們並不承認它們的威信。可是當俄國的和國外的這班普通資本家與共產黨員來組織合股公司之際，我們就說：『我們總還會作一些事情，不管這些事情作得怎樣不好，範圍怎樣狹小，但講到開端這點，我們畢竟有了一點什麼成績』。當然，這成績並不怎樣多；試想想，我們宣稱要把全部精力（人們竟說，我們的精力是很大的）都放到這個事業上，這已經有一年了，可是在這一年之內，我們却只創辦了十七個合股公司。

這證明我們是多麼不靈便，多麼呆笨，我們多少還帶有些奧布洛莫夫精神，因為有這種精神，我們仍是不免要挨打的。但我再來重複說一遍吧，我們畢竟是有了開端，偵察工作已經作過了。如果可供資本家活動的起碼條件都沒有，那資本家是不會到我們這裏來的。但既然有了那怕是極小部份的資本家來到，這也就指明，部份的勝利業已有了。

當然，他們還要在這些合股公司內部來打擊我們，竟會打擊得使我們以後需得好幾年才能整理就緒。但這也不要緊。我並不說這是勝利，——這是一種偵察動作，它指明我們已經有了活動場所，有了一塊地方，所以我們已能停止退却。

用偵察動作去同資本家規訂了的不過是極少數的條約，但這些條約畢竟是締結了。要在這方面來學習，並繼續行動。就這點說來，已是停止焦急、叫喊和奔忙的時候了。紛紛寄來的字條，接連打來的電話，總說：『既然實行的是新經濟政策，可否把我們這裏也來重新改組一下呢？』。大家都狂奔忙，漫無秩序；誰都不實際作事，大家都在議論怎樣適應新經濟政策，却得不到任何結果。

可是商人們在恥笑共產黨員，大概，他們還這樣說：『先前你們是專來開導別人的，現在你們却專來空口議論』。資本家已在譏笑我們，說我們遲延了，錯過了時機，——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所以我提議，要用代表大會的名義批准這個指令。

退却已經終結。怎樣與資本家在一塊工作的主要活動方式，已經規定了。雖然榜樣極少，但榜樣已經有了。

對新經濟政策問題玩弄聰明，憑空議論已經夠了吧！詩就讓詩人去做，這是他們份內的事。但經濟人員們，就請再不要議論新經濟政策，而去增加這些合股公司的數目，去檢查那些善於佈置與資本家比賽的共產黨員人數吧。

退却已經終結，現任的問題是重新配置力量。這就是代表大會應當提出的指令，這個指令應把混雜和忙亂現象完全消除。安靜點吧，不要異想天開，這是不惟無益而且有害的。要在實際上證明，你工作得並不比資本家壞。資本家建立着與農民的經濟聯合，為的是要發財致富；你也應當同農民經濟建立聯合，為的是要加強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底經濟權力。與資本家比較起來你是佔着優勢，因為國家政權在你的手中，許多經濟資料也在你的手裏，只是你不善於運

用它們，你要清醒些來觀察事物，拋去浮誇心理，脫掉華麗的共產主義外服，簡樸地來學習普通事務，那時我們才會戰勝私人資本家。我們握有國家政權，我們擁有大批經濟資料；若是我們戰勝了資本主義，並與農民經濟建立了聯合，那我們就會成為絕對不可戰勝的力量。那時，社會主義建設就不會是汪洋大海中所謂共產黨這少數人的事業，而定會成為全體勞動羣衆的事業了；那時，每個普通農民都會看到：我們是在幫助他；那時，他就會跟着我們走去，就即令這種步度會要慢一百倍，但它却穩固牢實一百萬倍。

就是要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講停止退却的問題，並用某種形式把這個口號變成代表大會的決議，才會是正確的。

我想來講講與這有關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布爾什維克底新經濟政策，是進化呢？抑是策略呢？改換路標派份子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你們知道，改換路標派是俄國僑民中滋長的一種思潮，一個社會政治派別，爲首的就是立憲民主黨大活動家，以前高爾察克政府底某些總長，他們已確信蘇維埃政權是在建設俄羅斯國家，因而要跟着這個政權走去。『但這個蘇維埃政權是在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呢？共產黨人說，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國家，同時認定這是一種策略：布爾什維克在困難關頭一驅過私人資本家之後，就會爲所欲爲的。讓布爾什維克去講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其實這不是策略，而是進化，是內部的蛻化，他們會走到通常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我們應當贊助他們。歷史是異途同歸的』，——改換路標派這樣議論道。

其中某些人假裝共產黨員，但也有比較直率的人，烏斯特亞洛夫就在其列。似乎他當過高爾察克政府的總長。他不同意自己同志們的意見，並說道：『你們關於共產主義隨便怎樣說都行，但我却斷定，共產黨員所作的這一切並不是策略，而是進化』。我以爲，烏斯特亞洛夫的這種爽直聲明對我們有莫大益處。

我們還得多次聽到這樣甜蜜的共產主義謊話，尤其是我因為職務關係，每天都簡直聽得有些苦悶，有時甚至苦悶得無法忍受。現在却有一期改換路標雜誌⁸⁶上不是載的這種共產主義謊話，而直接說道：『你們那裏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只是你們的想像而已，其實，你們是往通常資產階級泥塘裏滾去，而在那裏不過將是標着各種巧妙辭句的共產主義小旗飄蕩罷了』。這是很有益處的話，因這從這話裏我們所看到的，已不是簡單重複我們在自己周圍經常聽到的東西，而簡直是階級敵人底階級真理。瞧瞧這樣的言論倒很有益處，因為寫出這樣的話來，並不是由於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祇准有一種寫法或禁止有旁的寫法，而是由於這真正是階級敵人粗魯而公開說出來的階級真理。『我贊助俄國的蘇維埃政權，——烏斯特亞洛夫說，雖然他是個立憲民主黨人，資產者，贊助過武裝干涉，——我贊助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因為它踏上了可以滾到通常資產階級政權去的道路』。

這是很有益的話，這樣的話，我以為是必須注意到的；改換路標派這樣寫着，對我們說來，是比其中某些有時裝成差不多是共產黨員的人要好得多，從遠處大概你是分辨不清他們的，——也許，他們相信上帝，也許他們相信共產主義革命。老實說，這樣公開的敵人倒是有益的。老實說，烏斯特亞洛夫所說的事情，是可能的。歷史上有過各種變質的事發生；憑藉信念、忠誠和其他優越品質，這在政治中是完全不嚴重的東西。優越品質祇是很少數人才有，而決定歷史命運的却是極廣大的羣衆，如果那少數人不適合於這些羣衆，那麼他們對待這少數人有時也就不十分客氣了。

過去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要歡迎改換路標派底這一公開聲明。敵人說出階級的真理，他就指明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危險。敵人力圖使這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改換路標派表現着成千成萬各種各樣的資產者或參加我們新經濟政策的蘇維埃職員底情緒。主要和真正的危

險就在這裏。因此對這個問題要特別加以注意：真的，是誰會佔上風？我所說的是競賽。對我們直接的逼攻已經是沒有了，現時他們並未扼住我們的喉嚨。明天怎樣，這我們還得看看，可是今天他們已經沒有拿着武器進攻我們，雖然如此，但我們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却已殘酷百倍，危險百倍，因為我們不是隨時都能顯然看到，敵人何在，朋友是誰…

我所說的共產主義競賽問題，不是從同情共產主義的觀點出發，而是從經濟形式和社會結構形式發展的觀點出發。這不是競賽，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一種狂烈的，拚命的，如果不是最後一次，也是接近於最後一次的決死鬥爭。

這就要明顯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何在以及我們所缺乏的是什麼？政權是極充分的。這裏未必有人會來說，在某個實際問題上，在某個事務機關中，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缺乏權力。主要的經濟力量操在我們手裏。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和鐵路等等，都是由我們掌握。不管租賃業有些地方獲得了多麼廣泛的發展，但它一般地還是起着極小的作用，大體上，還只佔極微末的部份。在俄國無產階級國家手裏的經濟力量，完全足以保證過渡到共產主義。究竟缺乏的是什麼呢？所缺乏的東西，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從事管理的那部份共產黨員缺乏文化才幹。但如果就莫斯科（這裏有四千七百個負責的共產黨員）以及這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看來，——究竟是誰在領導誰呢？要說是共產黨員在領導這堆龐然大物，那我却很懷疑。如果說句真話，那就不是他們在領導人家，而是人家在領導他們。這裏便發生了某種類似我們在孩童時代聽人講述過的那番歷史情景。他們教我們說：常常有一個民族攻打另一個民族，於是那個征服了人家的民族，就是征服者，而那個被征服了的，就是被征服者。這是極為簡單，人所共知的事。但對這些民族的文化來說，情形又怎樣呢？這裏却不是那樣簡單了。如果那征服了人家的民族，

文化上高於被征服的民族，那征服者就強迫被征服的民族來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那就會是被征服者強迫征服者來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首都內是否有某種類似這樣的情形，是否是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差不多整整一師人，而且全是最優秀的份子）服從了別人的文化呢？誠然，這裏似乎可以得到一種印象，以為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他們的文化是渺小的低微的，但終究比我們的要高。不管這文化是怎樣渺小得可憐，但它總比我們做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文化要多，因為這些共產黨員沒有充分的管理技巧。成為機關領導人的共產黨員們——因怠工者有時故意這樣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弄到一些粉飾門面的招牌，——往往被人愚弄了。這樣來承認是很不痛快的。或者，至少是不很痛快的，但我覺得，須得這樣承認，因為現在問題底關鍵就在這裏。據我看來，過去一年來的政治教訓，就歸結在這點上，而一九二二年的鬥爭也將在這個標幟下來進行。

蘇俄共和國和俄國共產黨做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能否瞭解他們不善於管理呢？能否瞭解他們自以為是在領導人家，而其實却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能於瞭解，那他們當然也能學會，因為事情是可以學會的，但爲了這層就必須學習，可是他們又不學習。人們祇在到處發號施令，而其結果却完全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

我們宣佈新經濟政策時所提到日程上的競賽，——這乃是很嚴重的競賽。看來，這種競賽在一切國家機關內都有，其實這是兩個絕對互相敵對階級鬥爭底又一形式。這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爭底又一形式，這種鬥爭還沒有終結，甚至在莫斯科中央機關內，從文化要求上說來，也還沒有得到完滿的解決。因為資產階級的活動家對於通曉事物一層，往往比我們那些擁有全部政權和一切資源，但絲毫不會利用自己權利和政權來操作的優秀共產黨員，要高明一些。

我想從亞歷山大、托多爾斯基所著的小冊子內引證一段話來。這本小冊子是在威斯廣斯克城（特維爾省的一個縣城）出版，並且是在俄國蘇維埃革命週年紀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時間已過去的很久了。威斯廣斯克城的這位同志，大概是個黨員。我是很早以前讀過這本書，現在不敢担保，我在這方面不會說錯。他敘述到他如何着手裝置兩個蘇維埃工廠，如何吸引兩個資產者參加，並且這都是按照當時的辦法：在剝奪他們自由權和沒收其全部財產的威脅之下強迫他們來作工的。這兩個資產者就這樣被吸收來參加恢復工廠的工作。我們知道一九一八年吸收資產階級的情形，所以也就用不着詳細地來講這點；現在我們是用另一些辦法來吸收他們。以下就是他的結論：『這還是事情的一半——戰勝和致死資產階級是不夠的，還要強迫它來為我們工作』。

請看這是多麼卓越的語句。這些卓越的語句指明，甚至在威斯廣斯克城，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就正確地瞭解了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與被戰勝了的資產階級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打壞剝削者的雙手，使其不至為害，並致之於死命，這還只是事情的一半。而在我們莫斯科負責工作人員裏，一百個中大約有九十個人都以為全部事情只是致剝削者於死命，使其不至為害，打壞他的雙手就完了。我關於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白黨份子所說的那些話，往往都歸結於要使他們不至為害，要打壞他的雙手（也許，不僅打壞他們的手，可能還打壞其旁的地方），並致他們於死命。但須知這祇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一九一八年，當威斯廣斯克城的同志說出這點時，這還是事情的一半，而現在這甚至至少於事情的四分之一。我們應當強迫資產階級用自己的手來為我們做事，而不是使負責的共產黨員祇居領導地位，祇擁有官職，而却跟着資產階級隨波滾去。全部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

祇靠共產黨員的手來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幼稚的想法，完

全是幼稚的思想。共產黨員不過是滄海之一粟，不過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他們只有在不僅按全世界歷史意義來正確決定道路方向時，才能領導人民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在全世界歷史意義上，我們絕對正確地決定了我們的道路；每個國家的事實都能來確切證明這條道路我們是決定得正確的，而在我們祖國，在自己國家內，我們也應當正確地來決定這條道路。這條道路不僅取決於這點，而且也取決於不會有武裝干涉，取決於我們能夠用商品來換取農民的糧食。農民會這樣說：『你是個極好的人，你捍衛了我們的祖國；因為這點我們才聽從你的話，可是如果你不善於經營，那就請你滾開去吧』。是的，農民定會這樣說的。

只有當共產黨員能夠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的道路時，那我們才能管理經濟。但如果共產黨員自以為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過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並且被我們在戰線上所打殺過的還不是他們這樣的人哩，——正是這種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

如果我們使剝削者不至為害，打壞他們的雙手，並割掉他們的雙手，這還只是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份。這是須得作的。我們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和我們的法庭在這方面，不應當像至今所作的那樣柔軟，要記住，它們乃是處在全世界一切敵人包圍下的無產階級法庭。這點做起來並不難，我們基本上已學會了這點。這裏應該採取某些逼迫手段，但這是輕而易舉的事。

至於勝利底第二部份——即藉非共產主義者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即善於實際地來作經濟上必須作的事情，——這就是謀得與農民經濟的聯合，滿足農民的需求，使農民能承認道：『不管挨餓是怎樣困難，怎樣艱苦，怎樣難受，我却看見，雖說這政權是我所沒有習慣的，但從它那裏能得着實際的，真正感覺得到的好處』。要

做到使那些人數衆多，並超過我們不知多少倍而與我們合作的份子這樣地來工作，以致我們能正視他們的工作，能瞭解這個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某種有益於共產主義的事業來。目前情況的關鍵就在這裏，因為就即令有個別共產黨員已瞭解並見到了這點，但在我們廣大黨員羣衆中，却還沒有瞭解到必須吸收非黨羣衆來參加工作。關於這點不知寫過多少訓令，說過多少話，但這一年來，又作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作到。我們黨內，找不出一百個委員會，甚至找不出五個委員會能表明自己有什麼實際結果。請看我們多麼落在目前迫切需求的後面，我們還多麼厲害地保持着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的傳統。那時本是作出了世界上最偉大歷史事業的偉大年代。但如果只回顧這些年代，却看不見現在面前擺着何種迫切任務，那就會自遭滅亡，無疑的，絕對會自遭滅亡，全部關鍵就在於我們不願意瞭解這點。

現在我想引證關於我們管理情形的兩個實際例子。我已經說過，最好是拿一個國家托拉斯的例子來證明這點。但恕我不能使用這種正確方法，因為這要極具體地來研究那怕是一個國家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沒有可能來作這樣的研究，所以我就祇舉出兩個不大的例子。一個例子是：莫斯科消費協社控告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官僚主義；另一個是頓巴斯方面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很少適當，但我又拿不出更好的例子來。就根據這個例子，我也可以來說明我的主要意思。你們從報紙上都知道近幾個月來我沒有可能來直接過問事情，因為我既沒有來人民委員會辦公，也沒有到中央委員會去。當我偶然暫時來到莫斯科時，總常常聽到有對對外貿易部的許多憤激可驚的怨言。至於對外貿易部工作不好，辦事拖延，這點我從來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但既然這些怨言特別激烈，那我就企圖來加以分析，——只拿一樁具體的事件，將其查究到底，弄明那裏的實際情形，為什麼這架機器動作不起來。

莫斯科消費協社需要購買罐頭。於是就有一個法國人來作這筆買賣。究竟他作這件事情，是否爲着國際政策的利益，是否通報過協約國領導者，或者是否因爲得到了彭加勒，和蘇維埃政權底其他敵人的同意，我却不得而知（我想，我們的歷史家在熱納亞會議後是會來分析這件事的），但法國資產階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也參加了，這是事實，因爲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表竟出現於莫斯科，並出賣罐頭。莫斯科發生飢餓現象，夏季還會有更大的飢荒，肉類沒有運來，並且按衆所週知的我們交通人民委員部工作質量來看——大概是不會運來的。

他們出賣肉類罐頭（罐頭是否完全壞的，當然，將來的檢查會證實這點）來換取蘇維埃的紙幣。還有比這更簡單的事麼？但如果按蘇維埃的方式認真加以考究，原來事情就全不簡單了。我沒有可能來直接注意這件事情，只是組織了人去檢查，現在我這裏一個小本上記得有這一著名事件的經過。事件是這樣開始的：據加米涅夫同志的報告，二月十一日，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決議，贊成在國外購買一批食品。當然，不經過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這些俄國公民哪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呵！試想想：不經過中央政治局，這四千七百個負責工作人（這只是按登記數目）怎能解決關於在國外購買食品的問題呢？這當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加米涅夫同志顯然深知我們的政策和實際情況，所以不過份倚靠大量負責工作人員，而用擒牛直擒角的果斷辦法來下手，如果擒不住牛，那無論如何也得擒住政治局，於是——一下子就做出決議（我沒聽說關於這個問題有過討論）：『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注意從國外購入食品的願望以及關稅』等等。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是注意到了。動作開始。這是二月十一日的事。我記得，我在二月最末的一兩天或稍前一點才來到莫斯科，我首先聽到的就是莫斯科同志的號泣，簡直是絕望的號泣。什麼一回事呀？我們怎的也買不到糧食。爲什麼呢？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辦事遷延。因為我許久沒參加工作，所以當時還不知道政治局對這個問題已有決議，於是我只告訴總務處說：查究清楚，把材料拿給我看。這件事情，只當克拉辛回來，加米涅夫和克拉辛談過話，一切辦妥，我們買到了罐頭之後，才告結束。好在這件事情是順利地結束了。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於協商妥當，並正確決定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線，這點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如果在商業問題方面的政治路線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來決定，那我們這裏就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蘇維埃共和國，但決不能容許每件買賣事情都硬要拉出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和克拉辛來幹，——此時克拉辛正忙於熱納亞會議前這需要絕頂緊張勞動的外交事務，——硬要拉出這兩個同志去向法國人購買罐頭。這樣工作是不行的。這既不是新，也不是經濟，也不是政策，而簡直是一場大笑話。現在我有關於這問題的調查材料。我甚至有兩種調查材料：一種是人民委員會總務主任高爾布諾夫及其助手米羅施尼可夫調查來的，另一種是國家政治保衛局調查來的。究竟國家政治保衛局為什麼來注意這件事，我不知道，而且不完全相信這是正常的，但我並不來講這點，因為我害怕又要來番新的調查。重要的只是材料已經收集好了，現在都在我的手裏。

為什麼我在二月底來到莫斯科後，竟聽到了一種真正的號泣，說什麼「我們買不到罐頭」，同時輪船停在利巴瓦，罐頭就堆在那裏，他們甚至同意用真正的罐頭來換取蘇維埃的錢哩！如果這些罐頭不完全是壞的（我此刻之所以着重指出「如果」這字，是因為我還不完全相信，那時我是否再要指定人作第二次調查，但其結果我們只好留到下屆代表大會上來講了）——就是說，如果這些罐頭不是壞的，又已經買到了手，我試問：為什麼沒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不能作這樣的事呢？從我這裏有的調查材料中，我看到有某個負

責的共產黨員大罵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我又從同一檢查材料中看到，某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向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說：『以後除非有公證人，我決不同你談話』。讀完這段故事後，我就記起二十五年前，當我流放在西伯利亞時我不得不當律師的情形。那時我是個祕密律師，因為我是被放逐的國事犯，是被禁止作這種事情的，但因為沒有別的人，大家也就只好到我那裏來，並訴述某些案件。這裏最難於瞭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有時來了一個鄉下女人，當然，她一開始就講到她的親屬，真難瞭解，究竟她講的是什麼一回事。那知是關於一條白母牛。你告訴她說：『拿憑據來吧』，她走去時，並說道：『沒有白母牛的憑據，他還不願意聽哩』。於是我們也就在自己流犯人中常來取笑這憑據的事。但我總還是把事情稍許改進了一些：當有人來找我的時候，總帶得有憑據，那時我才能弄個清楚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他們訴苦，苦處在什麼地方。這已是二十五年前在西伯利亞的事情（那裏距火車站有幾百俄里）。

為什麼在革命後三年的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爲了買點罐頭，還要經過兩次調查，還須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參加以及政治局底指令呢？究竟缺乏什麼呢？政權麼？不是的。錢也找到了，既有經濟權力，也有政治權力。一切機關全在工作。究竟缺乏什麼呢？就是莫斯科消費協社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員（我絲毫也不反對他們，並認爲他們都是很好的共產黨員）以及對外貿易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員缺乏文化才幹，——他們不能精確地來處理業務。

當我初次聽到這件事情，我就向中央寫了一個書面提議：據我的意見，除全俄中央執委會委員外（這些委員，你們知道，是不可侵犯的），除了這些人外，要把莫斯科各機關中的全體工作人員都放到莫斯科最壞的監牢裏禁閉六個鐘頭，而對外貿易部的工作人員，則禁閉三十六個鐘頭。那知現在却沒找着一個有罪的人。其實

從我所講述的這中間，很顯然是找不出罪犯來的。簡單是由於通常俄國知識份子式的不善於實際作事，雜亂無章罷了。起初急於動手，便想一下作成，爾後才加思索，當稍一走不通的時候，就馬上跑到加米涅夫那裏去訴苦，把問題搬到政治局去。當然，國家的一切困難問題要提交政治局——關於這點以後我還得講到，——但要首先加以思索，然後才動手來作。如果你發言，那就請有憑有據地來發言。起初你可發一個電報，在莫斯科還有電話，也可給相當的機關去個筆記電話，把底稿交盟魯巴，並告訴說：我認爲這買賣很緊急，如果遷延，那我就來追究的。要想想這一起碼的文化作風，對待問題要有充分的思考；要是問題不能一下子在一兩分鐘內或經過電話來得到解決，那你就拿着文件，並有憑有據地說：『如果你要遷延，那我就把你亂進監牢裏去』。但我們這裏沒有任何思考，毫無準備，徒事奔忙，好幾個委員會，弄得大家都疲倦了，困憊了，病倒了，而只是當加米涅夫能與克拉辛接洽時，事情才得到進展。這是極標本式的現象。這種現象決不只發生在首都莫斯科，而且在別的都城，在一切獨立共和國的都城和個別省會內也可見到，而在非都會的城市裏則經常發現這樣的事，甚至是比這還壞一百倍的事。

在我們的鬥爭中應當記得，共產黨員不思考是不行的。他們能卓越地向你們談到革命鬥爭，論到全世界革命鬥爭情形。而爲了逃出極端的貧乏和窮困，就需要有思考，有文化，言行得當——但他們卻不會這樣作。如果我們來歸罪負責的共產黨員，說他們對待事情不誠實，這便是不正確的。其中絕大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九——不僅誠實，而且在最困難條件下業已證明其忠於革命，無論在沙皇制度崩潰前和在革命後都簡直是不願犧牲生命的人。如果在這方面來找原因，那就根本不正確了。需要有文化才幹來對待最尋常的國家事務，務必瞭解這是國家的，商業的事，如果有障

礙，那就要善於把它消滅掉，並將遷延這事的罪人提交法庭審判。我以為無產階級法庭是知道怎樣治罪的，但爲要治罪，就得找到罪犯，我却可以向你們担保說，這裏是找不到罪犯的，你們每個人都來看看這件事情吧，——這裏並沒有罪犯，祇有奔忙、亂雜，瑣屑事情… 誰都不會正確對待問題，誰都不瞭解，對待國家事務是不應該那樣，而應該這樣。一切白匪份子和怠工者也就利用這一弱點。有個時候我們曾與怠工者進行過殘酷鬥爭，這個鬥爭現在也還擺在日程上；當然，怠工者還有，還要同他們作鬥爭，這是對的。但在我所說的這樣一種情況下，難道能和他們作鬥爭麼？這比一切怠工行爲更加有害，怠工者唯一是要看到：兩個共產黨員爲了在什麼時機去向政治局請求關於購買糧食的原則指令問題彼此發生爭論，於是就乘隙而入。如果有個稍微聰明點的怠工者站到這兩個共產黨員的某一方，或依次站在雙方來加以贊助，那就糟透了。那事情就會永遠地被葬送了。誰的罪過呢？誰也沒有罪過。因爲兩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忠實的革命家，竟爭論這樣毫無意味的問題：要在什麼時機把問題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得到購買糧食的原則指令。

這就是問題的實情，這就是困難之所在。任何一個經過資本主義大企業鍛鍊的店員，都會作這樣的事，而百分之九十九的負責共產黨員却不會作，並且不願意瞭解到，自己沒有這種技巧，應該從頭開始學習。如果我們不懂得這點，不進預備班去從新學習，那我們就絕對不能解決現時這全部政策基礎的經濟任務。

我想引證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頓巴斯。你們知道，這是我國全部經濟的中心和真正基礎。如果我們不恢復頓巴斯，不把它提到應有的高度，那就根本談不上任何恢復俄國大工業，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爲除非經過大工業，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在中央委員會裏我們是注意到了這點的。

這個區域並沒把瑣碎問題非法地、可笑地、荒謬地搬到政治局去，而所提出的乃是真正絕不容緩的事情。

中央委員會本應當監督到，使在我們全部經濟底這真正中心真正基礎的地方，真正有條理地來工作，而在『煤炭工業中央管理局』擔任領導工作的，不僅無疑是忠實的，而且還真正是有學問，本領極大，甚至可以說——我這話是不會錯的，——是富有天才的人，因此中央委員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那裏去。烏克蘭是個獨立共和國，這是很好的，但它在黨的關係上有時總想——要是客氣點說——兜圈子，而我們就得設法使之就範，因為那裏的人很狡猾，而烏克蘭黨的中央——我並不說，它存心欺騙，但不知怎的却同我們有些疏遠了。爲了要看到這件事的全部底細，我們就在這裏的中央委員會內審察了這件事情，並發現了其中的磨擦和分歧。那裏有個『小礦井管理委員會』。是的，在『小礦井管理委員會』與『煤炭工業中央管理局』間有着劇烈的磨擦。但我們中央委員會，終究有某些經驗，於是就一致決定，並不撤消領導人員，如果發生磨擦，那就連全部詳情細節也一齊報告我們，因為當我們在那區域有不僅忠實，而且很有本領的人，這時就需要盡力贊助他們，假如他們還沒有學好，那就得使他們真正學習成器。結果，在烏克蘭召集過黨代表大會，——我不知道代表大會上的實情，只知道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事。我問過烏克蘭的同志，並且專門請求過奧爾忠尼啓則同志，中央委員會也就委託他去看看那裏的情形。顯然，那裏有過陰謀傾軋，一踏糊塗，如果黨史研究委員會要來研究這個問題，就費十年功夫也是弄不清楚的。但實際結果是這樣：違反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的指令，而使這批人的位置竟被另一批人代替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批人中的一部份，不管其一切高尚品質，基本上犯了相當的錯誤。他們過份醉心於行政手段。那裏環繞在我們周圍的都是工人。往往人們當一講到『工人』時，就以爲這是指工廠

內的無產階級而言。事情全不是這樣。我國從戰爭開始時起，那些投進工廠裏去的並不是無產者，而是志在躲避戰爭的人，難道現在我國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已能使進到工廠中去的都是真正的無產者麼？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按馬古思的話說來這是正確的，但馬克思寫的不是關於俄國，而是關於從十五世紀開始的整個資本主義。這在六百年過程中是正確的，而對於現在的俄國來說，却就不對了。進到工廠中去的人，往往不是無產者，而是各種各樣的偶然成份。

要善於這樣正確地來安排工作，使其既不落後，又能及時解決已有的磨擦，並使行政手段不脫離政治，——這就是任務所在。因為我們政治和行政手段的基礎，是要使整個先鋒隊與全體無產階級羣衆和全體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如果誰忘記這些小輪子，如果他只醉心於行政手段，那就糟透了。頓巴斯工作人員所犯的錯誤，較之我們其他的錯誤，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這是個標本式的例子，中央委員會一致要求：『留下這部份人，連小的衝突也交到我們中央來解決，因為頓巴斯，這不是偶然的區域，而是沒有它，則社會主義建設祇會是空洞的善良願望』，——但是我們的全部政權，中央委員會的整個威信原來都是不充分的。

當然，這次是在使用行政手段方面犯了錯誤；此外，還有一大堆旁的錯誤。

這個例子就說明，全部關鍵並不在於政權，而是在於要會管理，會正確地安排人員，會這樣來避免小衝突，使國家的經濟工作不致於中斷。我們卻不會這樣做，錯誤也就在這裏。

我以為，當我們說到我國革命和估量到革命底命運時，我們要把那些已完全解決，並已作為某種固定不移事物載入了擺脫資本主義的這一世界歷史轉變史冊中的那些革命任務，嚴格地區分開來。我國革命已成就了這樣的事業。就讓孟什維克和第二半國際代表鮑威爾去叫喊：『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我們却說，我們的任

務，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正如一個白黨刊物上所說的那樣，人們四百年來在我國國家機關中聚集了陳糞，而我們却在四年功夫內便把這些陳糞清除淨盡了，——這是我們最偉大的功績。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作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作。無論在我國也好，甚至在先進文明的德國也好，人們連不能把堆積在那裏的中世紀污垢塗抹出去，反而來挖苦我們的最偉大的功績。把革命進行到了底，——這是我們的不可剝奪的功績。

現在感覺到戰爭的氣氛了。各工人聯合會，例如改良工會，通過反戰決議，並威脅說要用罷工來反對戰爭。不久前，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我看見報上的電訊說，在法國國會裏，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發言反對戰爭，並指出說，工人寧願起義，不願戰爭。現在已經不能像我們在一九一二年公佈巴塞爾宣言時那樣來提問題了。只有俄國革命指明，怎樣才能退出戰爭，這該要費多大的困難，什麼是用革命手段來退出反動戰爭。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在解決這類性質的一切問題時，是決不能忘記，也決不會忘記，那時已有幾千萬人被害，並且現在還會有幾千萬人遭到屠殺的。須知我們是處在二十世紀，俄國民族，是用並非有利於這國或那國政府而是破壞它們的這樣一種革命手段退出了反動戰爭的唯一民族，而俄國革命也就把俄國民族引救出來了。俄國革命所獲得的東西，是不可剝奪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奪去這一勝利的品，猶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奪去蘇維埃國家所創造的東西一樣。這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幾百年來，國家都是按照資產階級樣式建立起來的，現在却破天荒第一次地找到了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也許，我們的機關還不好，但據說，最先發明的那架蒸汽機，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能用。但問題並不在這裏，而是在於發明已經有了。縱令頭一架蒸汽機按其形式說來是不適用的吧，但現在我們畢竟有了火車頭。縱令我們的國家

機關是壞到了極點吧，但它畢竟是創立起來，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業已成功了，無產階級樣式的國家業已創立了，——因此讓全歐洲，讓成千的資產階級報紙去大肆風傳，說我們的情形多麼亂雜，多麼窮困，說勞動人民只過着一種痛苦生活，——但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畢竟還是傾向於蘇維埃國家。這也就是我們所達到的和不可剝奪的偉大勝利品。但對我們這些共產黨底代表說來，這表明只是打開門徑。現在我們面前擺着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這點作到了沒有呢？還沒有作到。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底基礎。那些臆想有了這樣基礎的共產黨員，是大錯特錯了。全部關鍵就在於把我們俄國革命中具有全世界歷史功績的東西，與我們施行得最不好的，還沒有建立的以及還要多次改作的東西，堅決地、明確地、清醒地區別開來。

政治事變常常是很錯綜而複雜的。可以把它們和鏈條相比，為要抓住整個鏈條，決不能只抓住一個環節，決不能人為地隨便挑選你所想要抓住的那個環節。一九一七年時的關鍵何在呢？就在於退出戰爭，這是全體人民所要求而且是籠罩着一切的。革命的俄國達到了退出戰爭的目的。雖曾費過很大的努力，但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正確估計到了，這便使我們獲得了多年長久的勝利…所以人民感覺到，農民看到，每個從前線上回來的兵士也很好地知道，他們獲得了蘇維埃政權這個更民主，更接近勞動羣衆的政權。不管在其他方面我們作了多少糊塗難看的事體，而我們既然估計到了這個主要的任務，也就是說，一切都是正確的。

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關鍵何在呢？——是軍事上回擊敵人。當時雄強一世的協約國來攻打我們，窒殺我們。這裏就無需宣傳，任何一個非黨的農民也瞭解到發生了什麼事。地主快回來了。共產黨員善於同地主作鬥爭。這也就是廣大農民羣衆之所以贊助共產黨員以及我們獲得了勝利的原因。

一九二一年的關鍵是要有秩序地來實行退却。所以那時需要加倍嚴格的紀律。『工人反對派』說：『你們對工人的重視不夠，工人應當表現更大的主動性』。但主動性應表現於有秩序地實行退却，並加倍嚴格地保持紀律。誰要是稍微陷入驚慌或破壞紀律，就會葬送革命，因為最困難的事，乃是帶着那些已慣於爭取勝利，浸透了革命思想觀念，內心裏認為一切退却都類似卑污行為的人們，來實行退却。最大的危險是破壞秩序，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秩序。

至於現在的關鍵何在呢？這個關鍵——我的報告就是要歸結到這點，並以此來結束報告——並不在於政策上的方向改變；關於這點，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緣故，人們已說得再多沒有了。所有這些全都是空話。這是最有害的空談。我們人中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緣故，已着手幹旋，改造機關，建立新機關。這是最有害的空談。我們却說，當前的關鍵——乃是人材問題，乃是選擇人材。這點對那班已習慣於反對細故小事，反對日常文化工作，提出個人作用來代替改造機關的革命家，是難於領會的。但我們現時所處的情況，是要在政治上清醒地加以估計，估計到我們已前進得如此遙遠，使我們竟不能保持住，而且不應當保持住全部障地。

在國際方面，我們的情況近幾年來有了巨大的改善。我們爭得了蘇維埃式的國家，——這是全人類底大進步，而共產國際根據從任何國家所得的消息每天都可向我們證實這點。這是誰也沒有絲毫懷疑的。但就實際工作方面上講來，問題就是共產黨員若不能給農民羣衆以實際的幫助，那農民羣衆就不會贊助他們。注意底中心點並不在於要製定法律，頒佈完善法令等等。我們有過一個時期，法令曾是一種宣傳底形式。當時人們譏笑我們，說布爾什維克不瞭解別人並不執行他們的法令；所有的白黨刊物上全在譏笑這點，但當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並向普通農民和普通工人說：我們就正想要這樣來管理國家，這就是法令，請試試吧，當時這樣一個時期

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用法令形式把自己政策上的概念立即讓普通工農知道。結果爭得了我們在人民羣衆中至今都有的這種巨大威信。這是在革命初必須有的一個時期，若沒有這個時期，我們就不會站在革命浪潮的前頭，而會跟着它的尾巴跑。若沒有這個時期，則那些想在新基礎上來建設新生活的全體工農，就不會信任我們。但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而我們却不願瞭解這點。現在當人們頒佈法令來建設和改造什麼機關時，那工農是會置之一笑的。現在普通的工農對這點不會發生興趣，他們是對的，因為重心並不在這裏。你們共產黨員，現在應向人民宣傳的並不是這點。雖然我們這些坐在國家機關裏的人，面前隨時都堆滿了這類瑣事，但要抓住的並不是鏈條的這一環節，關鍵並不在這裏，關鍵在於人們被安排得不正確，在於很卓越地參加過全部革命的負責共產黨員，却被委任來經營這種是他所一竅不通，並妨礙我們看見真理的工商業務，因為在他背後巧藏有自私自利的人和騙子。問題是我們沒有實際檢查已執行了的事。這是枯燥無味的細小任務，這是些瑣碎事情，但我們經過了偉大政治革命以後，係處在這樣一種條件下，此時我們應得伴着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生存一個時期，此時全部情況底關鍵並不在於政策，——就這字的狹義上說（報章所載的，這是政治的噪聲，這裏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也沒有），全部情況底關鍵並不在於決議，並不在於機關，並不在於改組機關。既然我們需要這一切，那我們也就會來作這點，但不要帶這些東西鑽到民衆裏去，而要選擇必需的人材，並檢查實際工作的執行情形，這才會是人民所重視的。

在民衆中，我們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代表民意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架機器就會倒塌。現在人民和全體勞動羣衆自己所視爲主要的，只是怎樣能實際減輕極端貧困和飢餓的現象，表明生活上真正有了改善，即農民所需要所瞭解的改善。農民

懂得市場並懂得商業。我們曾不能直接按共產主義方式實行分配。爲了這點，還缺乏工廠和工廠裝備。那我們就應當經過商業來實行供給，但要並不比資本家所供給的壞些，否則人民便忍受不了這樣的管理。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如果不發生任何意外事變的話，那這就應成爲一九二二年我們全部工作底樞紐，不過要有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沒有武裝干涉。雖然我們極力從外交上來避免武裝干涉，但同時它每天都可能發生。我們真正應當刻刻警惕着，爲了紅軍的利益，我們應當去作某些重大的犧牲，當然要嚴格地確定這種犧牲底範圍。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就對峙在我們面前，他們只在尋找勒死我們的形式。我們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過是這資產階級的代辦，他們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如此。

第二個條件是如果財政危機不過份厲害。這一危機正在逼近着。這點，你們在財政問題報告時是可以聽見的。若是危機太厲害，太嚴重，那我們就只得來改造很多東西，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點上。如果危機不過份嚴重，那它甚至也許還會有益處：它將把一切國家托拉斯中的共產黨員加以清洗。只是不要忘記作到這點。財政危機震撼到機關和企業，其中無用的首先就要倒塌。只是不要忘記，決不可把這一切都推到專門家身上，說這是他們的罪過，至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那是好到極點了，既在前線上鬥爭過，工作又隨時都不錯。如果財政危機不過度嚴重，那還可以從中收到益處，它會不像中央監察委員會或中央檢查委員會那樣來從事清洗，而是認真地來把經濟機關中全體負責共產黨員一一加以清洗。

第三個條件是要在這個期間不作政治錯誤。當然，如果我們作出政治錯誤，那時全部經濟建設就會遭到挫折，那時就得來爭論關於改正錯誤和確定方針的問題。但若沒有這樣的悲慘錯誤，那最近將來的關鍵就不在於法令，不在於政策（就這字的狹義上說），不

在於機關，不在於機關組織——因為負責的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機關，會按必要程度來做這件事情的，——全部工作底關鍵是在於選擇人材和檢查工作的執行情形。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實際學會了，並作出了具體成效，那時我們又能克服一切的困難。

在結語時，我應當來講講我們高級機關以及黨對它們的關係的實際方面。我們這裏在黨與蘇維埃機關間形成了一種不正確的關係，在這點上我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已舉過一個例子，說明怎樣竟把一件具體小事搬到政治局去的情形。形式上要來避免這種現象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國是由唯一的政府黨在實行管理，決不能禁止黨員來申訴。所以一切問題都從人民委員會搬到政治局來。這裏我的過錯也是很大的，因為人民委員會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繫，很多都是由我親自來主持的。一旦我不得不離開工作的時候，弄得兩個輪子同時都不動作了，為要維持這種聯繫，加米涅夫就得來擔任三重的的工作。因為我在最近期間未必能回到工作中來，那全部的希望就移到這點上：現在還有兩個代理人——一個是瞿魯巴同志，他被德國人清洗得乾乾淨淨，另一個是李可夫同志，他也被德國人完全清洗好了。原來，甚至德皇威廉對我們也有用處，——這是我所沒有料到的。因為威廉有過一個外科醫生，這位醫生就是醫治了李可夫同志的，他把他壞的部份割去留在德國，把李可夫同志好的部份留下，並把這清洗得很乾淨的部份給我們送來。如果這種方法今後還繼續採用，那這會是完全很好的事情。

現在且把笑話擱在一旁，來講講主要的指令。在這方面，中央委員會裏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會大大注意這個問題，並在這一意義上來批准指令，好解脫政治局和中央身上的細小事情，並提高負責人員底工作。要使各人民委員對自己的工作負責，而不是把問題起初提到人民委員會，爾後又提到政治局來。形式上我們不能取消向中央申訴的權利，因為我們的黨是唯一的政府黨。這裏應

該取締一切關於細小事情的請求，但要提高人民委員會底威信，使各人民委員，而不是他們的代理人，來多多參加人民委員會的工作，要在我最近這一年來沒有做到的這方面，來改變人民委員會底工作性質：即對檢查執行一舉加以更大的注意。人民委員會將還有兩個代理主席——李可夫和瞿魯巴。當李可夫任國防委員會紅軍供給部非常全權代表時，他善於把工作整頓起來，事情也就進行得順利。瞿魯巴把自己領導的人民委員部⁸⁷變成了最好的人民委員部之一。如果他們兩人能在執行和負責方面大加注意地督促各人民委員部的工作，那我們在這裏也就會有雖然很小但總歸是現存的進步。我們有十八個人民委員部，其中至少有十五個是全不中用的，——不會是個個人民委員都好，祇希望人們對這點多多注意，也就算不錯了。李可夫同志應當兼任中央局委員和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副委員，因為這兩個機關之間應有一種聯繫，沒有這種聯繫，則主要的車輪有時是會徒然空轉的。

因此要注意到，使人民委員會內和勞動國防委員會內的各種委員會加以裁減，使它們知道並解決自己份內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分散到無數的委員會中去。近幾天來把各委員會都清洗過。總共有一百二十個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有多少個是真正必要的呢？祇有十六個。而這還不是第一次的清洗。不去對自己的事情負責，不去把決議提交人民委員會，不去知道自己對這負有責任，而他們却躲藏在各委員會後面。在這些委員會裏，亂七八糟，誰都弄不清楚是誰負責；一塌糊塗，結果，提出一個由大家共同負責的決議了事。

因此要指明出，必須擴大和發展省經濟委員會底自主性和活動。現在我們以科學作根據，並估計到經濟條件，氣候，生活，燃料供給，地方工業等等的條件，把俄國劃分為各個省區。根據這個劃分，建立了區的和省的經濟委員會。當然，部份的改正是會有的，但要提高這些經濟委員會底威信。

要使全俄中央執委會更加振奮地工作，並正常地來召集常會，舉行常會的時間應當是比較長的。常會應當討論法律草案，這些草案有時並沒有絕對必要，就匆忙提交到了人民委員會。最好是把這些草案攔留下來，先讓地方工作人員去仔細考慮考慮，並對法律起草人提出更嚴格的要求，而我們現在却沒有這樣作。

如果全俄中央執委會常會日期更長，它將分爲各委員會和各副委員會，並善於更加嚴格地檢查工作，找出那些據我看來是目前政治時局底全部關鍵和全部實質的東西：將重心轉移到選擇人材，轉移到檢查實際工作的執行上去。

應該承認和不怕承認：這些負責的共產黨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場合下，都是沒有按各人現有的能力被安排得適適當當，他們不善於進行自己的工作，因之他們就應當立刻學習。如果能承認這點，加之我們既有做到這點的充分可能，——而按一般的國際形勢看來，我們有時間來得及學成，——所以這無論如何都是要作到的。

一九二二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五至二五九頁。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 代表大會閉幕詞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同志們！我們代表大會的工作已經要結束了。

把這次代表大會和上屆代表大會比較一下，首先就可看到這次代表大會表現出了更大的團結，更大的一致，更大的組織上的統一，這是第一個特徵。

只有上屆代表大會一部份反對派中的少數人才把自己置身於黨外。

關於職工會問題和新經濟政策問題，我們黨內並沒有表現什麼意見分歧，或者說，並沒有表現多少顯著的意見分歧。

本屆代表大會上我們所獲得的『新』東西，其根本和主要點就是活生生地證明出我們敵人的謬誤，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不倦地硬說是我們的黨已經衰頹起來，說它正在喪失智力底靈活性和它整個機體底靈活性。

不。我們並沒有喪失這種靈活性。

當按俄國國內和全世界上整個客觀情況說來本應前進，本應以無上英勇精神迅速堅決來進攻敵人的時候，我們也就這樣舉行了進攻。一當環境需要時，我們也就會善於再三再四的這樣作去。

我們也就藉此把我國革命提到了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世界上任何力量，不管它還能給千百萬人帶來多少禍害、災難和痛苦，但我國革命的基本勝利品，它是決不能奪回去的，因為現在這已不僅是『我們一國的』勝利品，而是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勝利品了。

當一九二一年春，我們革命底先鋒隊有脫離人民羣衆的危險，有脫離自己本應善於引導前進的農民羣衆的危險時，那時我們就一致堅決地決定退却。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實行了退却，一般和整個說來，是退却得很有革命秩序的。

世界各先進國內正在成熟着的無產階級革命，除了善於奮勇鬥爭並舉行進攻之外，若不善於保持革命秩序來實行退却，就不能解決自己的任務。我們鬥爭的第二個階段底經驗，即退却底經驗，在將來至少對某些國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適用的，正如我們革命第一階段底經驗，即奮勇進攻的經驗，對各國工人，無疑義是適用的一樣。

現在我們做了決議，承認退却已經終結了。

這就是說，要按新方式來提出我們政策上的一切任務。

現在全部關鍵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革新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羣衆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會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

如果在我們黨內也會出現反對這一過份緩慢和過份小心的前進運動的呼聲，那末這種呼聲祇會是寥寥無幾的。

全黨已經瞭解到，此刻並會用事實來證明着：它是懂得在目前必須這樣，而且只能這樣來佈置自己的工作。既然我們瞭解了這點，那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

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就此宣佈閉幕。

一九二二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一至二七二頁。

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律制度

致斯大林同志轉中央政治局

在被指定來領導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常會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內，關於檢察機關問題引起了意見上的分歧。這種意見分歧雖沒有發展到需要機械地提交中央政治局的程度，但我個人認為，既然這個問題如此重要，提議把它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解決。

意見分歧的實質是這樣的：中央執委會推選出的這個委員會底多數委員在檢察機關問題上，反對地方檢察官祇能由中央委任並祇服從中央節制的辦法。這多數委員主張實行對所有一切地方工作人員規定的所謂『兩重』從屬制，就是說，他們一面服從其所屬中央人民委員部，一面又服從地方的省執委會。

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底多數否決了地方檢察官有權從法制觀點上抗議省執委會及一般地方當局底任何決定。

我實在難於想像，究竟能用什麼理由來辯護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這一顯然錯誤的決定。我祇聽到這類理由，說在此種情形下擁護『兩重』從屬制，乃是進行反對官僚主義集中制，主張地方當局底必要獨立性並反對中央機關對省執委會人員之高慢輕忽態度的合理鬥爭。關於法律制度一層，不能有加路格省或嘉桑省的法制，而祇應是全俄羅斯統一的，甚至是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統一的法制，試問在這種觀點上，有什麼高慢輕忽之處呢？在中央執委會該

委員會中多數人這一獲得了勝利的觀念底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兩重』從屬制的原則運用得不正確。在那些要善於估計到有真正不免的區別存在的地方，『兩重』從屬制是必要的。加路格省的農業與嘉桑省的農業顯然不同。在全部工業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對於整個行政方面或管理機關也是如此。在這樣的一切問題中，若不估計到地方特點，就會陷入官僚主義的集中制等等，就會妨礙地方工作人員去估計地方區別，這種估計乃是合理工作的基礎。但法制應當是統一的，而我國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現象的主要禍害，正是對舊時俄國觀念以及對希圖保留加路格法制使之別於嘉桑法制的半野蠻惡習，採取寬容態度。應該記住，檢察機關與一切政權機關不同，它沒有任何行政權，關於行政上的任何問題，它都沒有表決權。檢察長的唯一職權是：監視全共和國內對法律有真正一致的瞭解，既不顧任何地方上的差別，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響。檢察長底唯一職權，就是把案件提交法院去判決。這些法院是什麼法院呢？我國法院是地方法院。審判官是由地方蘇維埃選定的。所以接受檢察長提來的違法案件的這個當局，也就是地方當局，它一方面必須絕對遵守全聯邦通行的統一法律，而另一方面，在判處罪狀時必須估計到各種地方情形，同時它有權說：雖然這案情顯係違法，但經地方法院查明又是當地人頗為熟悉的某種實際情況，却迫使法院認為必須對某某人減罪，或者甚至認為某某人應經法院判決無罪。如果我們不來絕對施行這種規定全聯邦統一法制的最起碼條件，那就根本談不上對文明性有任何保護和任何建樹了。

至於說檢察長不應有權抗議省執委會及其他地方當局底決定，這也是原則上不正確的；據說，根據維護法制的觀點，這種決定必須由工農檢查院來加以審查。

工農檢查院不僅要從法制觀點上，而且也要從適當性上來從事審查。檢察長的責任是要使任何地方當局底任何決定都不與法律相

抵觸，也祇有從這一觀點出發，檢察長才必須抗議一切非法的決定，同時檢察長無權停止決定本身之執行，而祇是必須設法使對法制的瞭解在全共和國內，都是絕對一致的。所以中央執委會該委員會中多數人底決定，不僅本身是最大的原則上的錯誤，不僅把『兩重』從屬制底原則根本運用得不正確，並且破壞那確立法制和起碼文明性的一切工作。

其次，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還要估計到地方影響的作用。無疑義的，我們處在到處都是目無法紀的環境中，地方影響對於確立法律制度與文明性說來，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礙，也是最有害的障礙之一。大概誰都聽說過，清黨時，在大多數地方審查委員會內，最主要的事實是揭發了當地清黨中有個人和地方的挾嫌報復行爲。這一事實既無可爭辯，也是充分出色的。未必有人敢來否認，我們黨要找到十個法律學識充分和能夠對抗一切純粹地方影響的可靠共產黨員容易，要找到幾百個這樣的人就難得多了。當人們講到檢察機關底『兩重』從屬制或講到它必須祇服從中央節制的時候，問題也就歸結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中央這裏定要找到十來個這樣的人，由他們來實施中央檢察之權，如總檢察長，最高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員部底權限（究竟總檢察長是行使一長制權限，還是與最高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員部分權行使，這個問題，我權且不講，因爲這是一個完全次要的問題，可以由不同方式來解決，總之要看黨是把大權交予一人，或是讓上述三種機構來分權辦理這點爲轉移）。這十來個人居在中央所在地進行工作，受黨的這三個機關：中央組織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之最親近的監視，以及與它們發生最直接的聯繫，而這三個機關都是反對地方影響和個人影響之最大的保障，並且最後這個機關，即中央監察委員會，祇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負責，其中沒有任何委員能在任何人民委員部，能在任何組織或蘇維埃政權任何機關內兼職。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就有了比從來所考慮

到的各種保證都更大些的保證，使黨能夠去建立一個不大的中央集體，既足以在事實上去對抗地方影響，對抗地方的及其他一切的官僚主義，並在全共和國和全聯邦內真正統一地來運用法律。所以這個中央司法集體可能發生的錯誤，也可以被黨的機關就地立刻加以糾正，而這些黨的機關對全共和國內所有我們黨的工作與蘇維埃工作，都一般規定有一切基本原則和一切基本規章。

如果離開這點，那就是暗地裏實行誰也不會直接公開擁護的一種觀點，即我國的文明性以及與之密切聯繫的法制彷彿已經發達到如此之高，使我們可以担保我們這裏能有上百個完全無可非難的檢察長——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受到任何地方影響，而能於自動地規定出全共和國內統一的法制。

末了，我的結論就是說：主張對檢察機關實行『兩重』從屬制並取締它抗議地方當局一切決定的權限，這一主張不僅在原則上是錯誤，不僅妨害我們那堅決實施法制的基本任務，並且反映着地方官僚主義與地方影響底利益和偏見，也就是梗塞在勞動者與地方和中央蘇維埃政權之間以及與俄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之間的一個最有害的障礙物。

所以我向黨中央委員會提議，否決在這方面的『兩重』從屬制；規定地方檢察機關只能服從中央，並保留檢察機關有從維護地方當局決議之法制的觀點上來抗議地方當局一切決議的權限和職責，但無權停止該決議案之執行，而只有權將案件提交法院處決。

列寧。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日述。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初次刊載於真理報第九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二九八至三〇一頁。

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
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講演人名單中，把我列為主要的報告人，可是你們大家都了解，我經過久病之後，不能做很長的報告。我祇能對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作個引言。我的報告題目將是很有限的。『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這個題目，確是過於廣泛，過於龐大，一般說來，一個人在一次報告中，是不能把它發揮盡致的。所以我祇來講講這個題目中不大的一部份，即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我故意祇來講這一小部份，為的是要使大家認識現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這至少對我說來，是最重要的，因為我此刻正在研討這個問題。

總之，我所要說到的是我們怎樣開始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及我們藉助於這一政策達到了一些什麼成果。既然我僅限於講這個問題，那我也許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一般的評述，並使大家對這個問題能得到一般的概念。

如果要從我們為什麼來實行新經濟政策這點開始講起，那我就應當提到我在一九一八年寫的那篇文章。一九一八年初，在一次簡

短的論戰中，我恰恰涉及到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應採取什麼立場的問題。當時我寫道：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亦即當時的）情況說來，將是一個進步。假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夠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爲不可戰勝的」。

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我們當然比現在要蠢些，但無論如何並沒有蠢到這種程度，連這樣的問題都不善於觀察了。

可見我在一九一八年時，就認爲國家資本主義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當時的經濟情況說來，乃是一個進步。這話聽起來是很奇怪，甚至也許是妄誕無稽的，因爲那時我們的共和國已經就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了；那時我們每天都在非常急忙地——大概是過於急忙地——採取各種新的經濟辦法，這些辦法祇能稱爲是社會主義的辦法。但在那時，我總還是認爲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維埃共和國當時的經濟狀況說來，乃是一個進步，爲了證實這個觀點，我並簡單列舉過俄國經濟制度底幾種基本成份。這些成份，在我看來，有以下幾種：「（一）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式的農業；（二）小商品生產（這裏也包括有出賣糧食的農民多數）；（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五）社會主義」。在當時俄國，所有這些經濟成份都是存在的。那時我所抱定的任務，是要說明這些成份彼此間的關係怎樣，是否應把其中非社會主義成份之一的國家資本主義，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高些。我重複地說：在一個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裏，竟把非社會主義的成份估計得比社會主義還高些，認爲它是駕乎社會主義之上，這在一切人看來，都覺得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你們記起，我們並沒有把俄國經濟制度，看成是什麼同一種類和高度發達的東西，而是充分覺察到在我們俄國，除

了社會主義形式的農業之外，還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式的農業，那麼，問題也就會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國家資本主義能起什麼作用呢？

我並反躬自問：這幾種成份中，哪一種是佔優勢的呢？顯然，在小資產階級隊伍中，是小資產者的成份佔統治地位。當時，我就覺察到是小資產者的成份佔優勢：不能有另一種想法。當時我所想到的問題，——本係發生在與現時問題無關的一次特別爭論中，——就是：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態度怎樣？於是我曾回答自己說：國家資本主義，雖然它不是社會主義的形式，但對我們和對俄國說來，會比現有形式要適宜些的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雖然我們業已完成了社會革命，但我們無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底萌芽或基礎，都未曾估計過高；反之，我們當時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覺察到：如果我們能首先進到國家資本主義，然後才進到社會主義，那麼，就會是好一些。

我之所以應當特別強調這部份問題，因為我認定祇是從此，第一，可以說明現時的經濟政策，究竟是什麼；第二，可以作出對於共產國際也很重要的實際結論。我並不是說，我們會事先就準備好了一個退却計劃。這樣的計劃，以前並沒有過。當時這些簡短的爭論詞句，決不是什麼退却計劃。例如，對國家資本主義具有基本意義的重要之點，即自由貿易，那裏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但這總歸是已給了一般的，尚不明確的退却思想。我認為，不僅從這個按經濟制度說來至今還是很落後的國家底觀點出發，而且從共產國際及西歐各先進國家底觀點出發，我們都應當注意到這個問題。例如，現在我們正在製定綱領。我個人認為，頂好我們此刻祇在一般地，即所謂初步地把全部綱領加以討論之後就交去付印，但採取最終的決定，不必定要在此刻或在今年。為什麼呢？我想，首先當然是因為此刻我們未必能把這全部綱領都思考得很周到。而其次，還因為我們

幾乎完全未曾想到可能退却與保證這一退却的問題。然而這是當全世界範圍內都起了根本變化，如推翻資本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及其巨大困難的情形下，我們無條件必須加以注意的問題。我們不僅應當知道，當我們直接轉為進攻並在這進攻中獲得勝利時，我們究竟該怎樣行動。在革命時期中，這點並不是很困難，但亦不很重要，至少也不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在革命時期中，常常有這樣的時機，即乘敵人頭腦昏聩之際，若是我們向它進攻，那我們就可輕易獲得勝利。但還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因為我們的敵人，如果具有充分的堅忍性，它還能事先聚集力量等等。那時它能很容易首先挑起我們去進攻，然後把我們打得退後很多年。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準備着有退却可能的這種思想，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並不僅從理論觀點出發是如此。就是從實際觀點看來，所有一切準備在最近將來轉為直接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政黨，此刻也應當想到，怎樣來保證自己退却的問題。我想，如果我們除了注意到我國革命經驗中其他一切教訓之外，還注意到這個教訓，那麼，這對我們不僅不會有任何害處，而且在很多場合下，定會對我們有益處。

我既着重說過，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就已把國家資本主義視為可能的退却路線，現在我就來講到我國新經濟政策執行底結果。我重說一句：那時這還不過是一個很模糊的思想，但在一九二一年時，即當我們渡過了國內戰爭中最重要的一段，並且是勝利地渡過這個階段之後，我們就碰上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極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不僅造成頗大一部份農民的不滿，而且造成頗大一部份工人的不滿。這是蘇維埃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的情形，我相信這也是最後一次的情形，那時大量農民，雖然是不自覺地，但却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我們。這種特殊的，對我們自然也是很舒適的情況，究竟是由什麼原因產生的呢？原因是我們在自己的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沒有替自己保證充分的根據地，

羣衆已感覺到了我們在當時還不善於自覺地去認識，但不久、祇經過幾星期後我們也就承認了的情勢：即向純社會主義形式與純社會主義分配的直接過渡，乃是我們力量所不能勝任的事，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却以便祇限於肩負較輕的任務，那我們就有遭到滅亡的危險。我覺得危險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的。到同年春，我們便一致決定——關於這點，我並沒有看見我們中間有過什麼大的意見分歧——轉到新經濟政策。經過一年半以後，即到現在一九二二年末，我們已經能夠作出某些比擬。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情形呢？這一年半以上的時日，我們是怎樣渡過了的呢？獲得了什麼樣的結果呢？這一退却是否使我們得到益處，它是否真正挽救了我們，抑或結果還在動搖莫定之中呢？這就是我所想說的主要問題，而且我認爲這個主要問題，對於各國共產黨說來，也有着頭等意義，因爲假如這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們大家都會是陷於滅亡的了。我認爲，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肯定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說，過去這一年半的時期，確定地絕對地證明我們是經受住了這次考驗。

我現在就想來證明這點。爲此我應當略舉我國經濟中一切組成部份。

首先我要講到我們的財政制度以及著名的俄國盧布問題。俄國盧布數量，現已增至以億兆計，我想，只就這點也夠認爲它是很著名的了。這總有點什麼意義。這乃是天文學上的數字。我深信，此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這數字的真實意義。但我們就從經濟觀點看來，並不認爲這種數字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數字上的零雖多，須知是可以勾去的。我們在這從經濟觀點看來是全不重要的藝術上，已經達到了某種成就，我相信在今後發展過程中，我們在這種藝術上還會達到更大的成就。而實際上真正重要的，却是穩定盧布的問題。我們正在着手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優秀人才也集中在這方面，而且我們認爲這一任務具有決定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做到使盧布先穩

定一個較長的時期，然後又繼續永遠穩定下去，那我們便獲得贏局了。那時這一切天文學上的數字，——所有這些億億兆兆的數字都會毫無危險。那時我們能夠把我國經濟安置在一個堅固的基地上，並在堅固基地上繼續向前發展。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我能夠向你們列舉些很重要而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在一九二一年，紙盧布價格穩定時期，繼續了不到三個月之久，而在現時一九二二年，這個穩定時期雖還未結束，但也繼續了五個月以上。我認爲舉出這點已經就夠了。如果大家還想要我們拿出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我們將來能完全解決這一任務，那末這個例子當然還嫌不夠。可是據我的意見，要來完全充分地證明這點，一般是不可能的。我所舉的實際材料，證明從去年我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起，直至今日，我們已經學會了前進。既然我們已學會這點，那我相信，祇要我們不作出什麼特別的蠢事來，今後在這方面我們也能學會達到更大成就的。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商業，是我們所需要的商品周轉。如果說，雖然我們曾處在戰爭狀況下（因爲大家都知道，祇在幾星期前，我們才把海參崴奪回）⁸⁸，雖然我們祇是現在才能完全有系統地開始我國的經濟活動，而我們也能夠在兩年來開展商業，而我們總還是達到了使紙盧布的穩定時期從三個月延長到五個月，那麼，我認爲，並敢於說，這也就能夠使我們滿意了。須知我國是孤立無援的國家。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都借不到任何外債。所謂如此『爛爛』地組織自己資本主義經濟，甚至至今還不知道走向何處去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中，任何一個也未曾幫助過我們。他們藉凡爾賽和約建立了一種連他們自己都摸不清內中底細的財政制度。既然這些巨大資本主義國家都這樣經營着，所以我認爲，我們這些落後無知的人，居然通曉了這件最重要的事：即通曉了穩定盧布的條件，我們也就可以此滿意了。這並不是用什麼理論分析來證明着，而是由實踐來證明着的，我以爲實踐是比世上任何學理上的辯論，都重要些。而實踐證明

着，我們在這裏達到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結果，即我們在穩定盧布這方針上，已能把經濟推向前進，這對於商業，對於商品自由周轉，對於農民以及大量的小生產者羣衆說來，是具有最重大意義的。

現在我來講到我們的社會目標。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農民。一九二一年時，巨大部份的農民無條件地是不滿意的。後來我國又遭到了飢荒。而這對於農民，乃是一次最艱鉅的考驗。當時，國外到處都叫喊着：『看吧，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其實，飢荒乃是國內戰爭的可怕結果，人們對這點當然表示緘默。一九一八年開始向我們進攻的一切地主與資本家們，把事情說成這樣，彷彿飢荒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當時，飢荒確是巨大而嚴重的災禍，竟至有毀滅我國全部組織工作與革命工作的危險。

那麼，現在我就問道：經過這次空前罕有和突如其來的貧困之後，自從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准許了農民貿易自由之後，此刻的情況又是怎樣呢？這答覆是很顯然而且是人所共見的，即是說：農民在一年來，不僅克服了飢荒，並且繳納了這樣多的糧食稅，使我們現時就已收到了幾萬萬普特的糧食，並且幾乎沒有採用過任何強迫辦法。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可說是成爲俄國一般現象的農民暴動，差不多已完全絕跡。農民滿意自己的現狀。我們能夠安然認定這點。我們認爲，這種證據比任何統計數字的證據，還重要些。農民是我國有決定意義的因素，這點是誰也不懷疑的。現在，農民的情況已使我們再無須害怕他們會有什麼反對我們的舉動。我們是完全自覺地說到這點，絲毫也沒有過甚其詞。這是已經做到的了。農民可能不滿意我國政權工作的某一方面，他們也許會埋怨。當然，這種現象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的機關和我們國家經濟尚極不完善，還不能預防這種現象，但無論如何，要說是全體農民大不滿意我們，這種情形是絕然沒有的了。這是一年來的成就。我認爲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現在我來講到輕工業。我們在工業問題上，正應當把重工業與輕工業區分開來，因為它們的情況是彼此不同的。關於輕工業，我可以安然地說：這裏已可見到一般的高漲現象。這點我不來詳細地講。因為我的任務，不是來列舉統計材料。可是這一般的印象，是有事實作根據的，所以我能擔保地說，在這種印象的基礎上，並沒有任何不足信或不確切的東西。我們可以指出輕工業底一般高漲，及與此有關的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工人生活之相當改善情形。在其他區域內，這種現象較少看到，因為那裏是重工業佔優勢，所以這點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但我要重覆一句，總之，輕工業無條件地是在高漲着，彼得格拉與莫斯科工人生活底改善——這已是無疑義的事實。一九二一年春，在這兩個城市內，工人中籠罩着不滿的氣氛。現在，這種現象已經沒有了。我們每天都在注視工人底生活與情緒，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會犯錯誤的。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重工業。我應當說，這裏的情形仍舊是很嚴重。到一九二一年，這方面的情況開始有了某種轉變。因之我們能夠希望，在最近將來，情形就會好轉的。我們已部分地為重工業搜集了必要的資金。在資本主義國家內，要振興重工業，就必需有若干萬萬的債款，沒有這批巨量的債款，重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史指明出，在落後國家內，必須有幾萬萬美金或金盧布的長期債款，才能成為發展重工業的適當資金。我們以前沒有過這樣的債款，至今也未得到任何的債款。人們現在關於租讓業及其他等等所寫到的一切，除了紙上空文以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我們最近關於這點，特別是關於烏爾卡爾特的租讓，也寫得很多。然而我們的租讓政策，我覺得是很好的。雖則如此，但稍可滿意的租讓業，至今我們還沒有。請大家不要忘記這點。所以，對於我們這個落後國家說來，重工業情形實在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因為我們曾不能指望富庶國家的外債。雖然這樣，我

們已見到有顯著的改善，並且我們看見，我國的商業活動，已替我們弄來了一部份資本。不錯，這數目還很小，略略超過二千萬金盧布。但無論如何，始基是已經奠定了：我們從我國商業中已能弄到資財，我們能夠利用這種資財來改善重工業。現時，我國重工業情況，至少還是極度困難的。但我認為，我們已能多少節省一批資財。今後我們也還要這樣做去。雖然這種來源往往是出自人民身上，但此刻我們總還得百般節省。現在我們正在研究怎樣縮減我們的國家預算，裁減我們國家機關的人員。後面我還要略略說到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我們無論如何，應當縮減我們的國家機關人員，我們必須盡量節省。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之為獨立國家的地位。這點我們知道得很清楚。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而為了要使重工業的情況興旺，就需要有多年的努力。

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了。總之，我們在這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步驟。我們籌到了為建立重工業基礎所必需的資金。固然，我們至今所已籌到的數額，祇略略超過二千萬金盧布，但無論如何，這個數額總算是籌到手了，並且這筆款項，是預定唯一用來發展我國重工業的。

我想，我已照我所允諾過的話，概括地向你們敘述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主要的成份，我想，從這一切中可以作出結論說，新經濟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成果。現在我們業已有了確實證據，證明我們這個國家能夠經營商業，能夠保持農村經濟中與工業中的堅固地位，而向前邁進。實際的活動已證明了這點。我想，這對於我們，暫時

也就夠了。還有很多東西，我們應加以學習，而我們也瞭解到，我們還必須學習。我們掌握政權已有五年，並且這五年期間，我們都是處在戰爭狀態中。可見，我們已經有了成就。

這是當然的事。因為當時農民贊成我們。農民已是極力贊助我們了。農民懂得，贊助白黨的是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地主。所以農民才帶着最大的熱忱和全副忠摯心來贊助我們。要做到使農民捍衛我們，反對白黨，這本不困難。原先就痛恨戰爭的農民却曾儘一切可能，來幫助反白黨的戰爭，幫助反地主的國內戰爭。雖然如此，但這還不夠，因為實際上這裏的問題，祇是政權將留歸地主還是留歸農民的問題。這對我們說來，曾是不夠的。農民瞭解到，我們為工人奪取了政權，我們的目的是要藉這政權的幫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以那時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是在經濟上準備社會主義經濟。過去我們不能去走直路來準備這種經濟。我們迫不得已才走彎路來達到這點。我們在我國所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乃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與普通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不同。我們掌握有一切經濟命脈，我們操縱着已歸國有的土地。這點極為重要，雖然我們的敵人斷言說，彷彿這點毫無意義。這是不對的。土地已歸國有，這種情勢非常重要，在經濟方面，也有極端重大的實際意義。這點我們已經做到了，我應當說，今後我們一切活動，也應當祇限於這種範圍內發展。我們已經做到了使我國農民滿意，使工業復興，商業活躍起來。我業已說過，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一般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僅掌握有土地，而且掌握有工業中一切最重要的部門。我們出租了的首先祇是一部份的中小工業，而其餘的一切仍留在我們手中。至於商業方面，我還想着重地說說，我們設法建立合股公司，並已在建立這樣的公司，其中一部份資本屬於私人資本家，而且是外國資本家，另一部份資本則是我們國家的。第一，我們用這種辦法來

學習經商，這對於我們是必需的，第二，如果我們認為必要，我們隨時都有可能取消這種公司，所以說，我們這樣做，絲毫不冒險。我們向這班私人資本家學習，並注視着我們怎樣才能上進，我們犯有一些什麼錯誤。我覺得，我說到這裏，也就用不着再講下去了。

不過，我還想涉及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無疑的，我們過去做過極多的蠢事，將來也還會做出大量蠢事來的。對於這點，誰也不比我判斷得更好，誰也不比我觀察得更清楚。

爲什麼我們做出蠢事來呢？這是很顯然的：第一，我國是個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國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會來幫助我們。反之，他們都在反對我們。第四，是我們國家機關的過失。我們承受了舊的國家機關人員，這也就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人員往往在工作中反對我們。實際情形是，一九一七年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國家機關人員曾對我們怠工。當時我們很表示驚愕，於是向他們說：『請你們轉回到我們這裏來吧』。於是他們都轉回來了，這也就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擁有大量的公務員，但我們却缺乏有充分知識的人材去真正管理他們。實際上往往發生這種情形：在上面這裏，即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人員總還能盡些職能，但在下面那裏，即在他們所管理的地方，他們却在這管理中常常反對我們的設施。在上面我們自己的人，我雖不知確數，可是我想，無論如何總祇有幾千，最多也不過幾萬。但在下面，却有幾十萬從沙皇制度及資產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官吏，他們一部份是自覺地，一部份是不自覺地在工作中反對我們。這裏，在短時期內顯然是無濟於事的。這裏，我們應當有多年的工作，才能把機關加以改善，才能改革這種機關，才能吸收新的力量進來。這點，我們做得相當迅速，也許過於迅速。我們創辦了許多蘇維埃學校和工人班，有幾十萬青年在學習，也許學

習得過於迅速，可是，無論怎樣，工作已經是開始了，我想，這一工作是會收到成效的。如果我們工作得不過於倉忙，那麼經過幾年之後，我們就可以培養出大批能於根本革新我們機關的青年。

我說過，我們做了大量的蠢事，但在這點上，我也應當說到我們的敵人方面。如果我們的敵人責難我們說：看，列寧自己也承認，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這樣來回答他們：對的，但你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蠢處，較之你們的說來，終歸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我們祇是剛剛才開始學習，但我們已經學習得極有系統，竟使我們深信，我們一定能達到良好的成績。可是，如果我們的敵人，即資本家與第二國際英雄們，強調我們所作過的蠢事，那我爲了比喻比喻起見，就來引證俄國一位著名作家的話，這句話我略加變更後，就成了這樣：如果布爾什維克做出蠢事，那麼布爾什維克也不過是說：『二乘二等於五』；至於我們的敵人，即資本家與第二國際英雄們做出蠢事來，那麼，在這班人那裏就得出：『二乘二等於燭』。這是不難證明的。例如，拿美英法日諸國同高爾察克簽定的條約來說吧。我問問大家：世界上還有比它們更文明更強大的國家麼？結果是怎樣一回事呢？它們既不估量，又不思索，也不觀察觀察，居然允諾了幫助高爾察克。我以爲，這從理性常識上看來，甚至都是難於瞭解的大失敗。

或者，再舉一個更近而且更重要的例子：凡爾賽和約，我問問大家，這裏，『偉大』，『榮譽』列強們幹的是什麼一回事？它們現在從這一混亂糊塗中，怎能找到出路呢？如果我再重覆地說，我們作出的蠢事，較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世界和第二國際所共同作出的種種蠢事說來，還算不得一回事，我想，這並非過甚其詞。所以我認爲，世界革命底前途——這是我應當簡略涉及到的題目，——是順利的。並且我認爲，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前途，還會是更好些的。關於這種條件，我想來說幾句話。

在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過通了一個關於各國共產黨組織結構及其工作方法與內容的決議案。決議寫得極好，但它幾乎完全是俄國式的，也就是說，完全根據俄國條件寫出的。這點是決議案的好處，同時也是它的壞處。壞處就因為（我深信）差不多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把它讀完。我在出席講話之前重新又把這決議讀了一遍。第一，這個決議案太長，其中有五十或五十段以上。這種文件，外國人通常是不能讀完的。第二，即令把這決議案讀完，也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懂得這決議案，正因為它太俄國化了。這並非由於它是用俄文寫成，況且各國文字的譯本都譯得很好，而是由於它內面充滿了俄國精神。加之，第三，縱然例外地有某個外國人能懂得這決議案，那他也不能把它實際執行。這是決議案的第三個缺點。我同某些來此出席的代表談過話，我希望，在本大會今後進程中，雖然我不能親自參加——可惜，我沒有可能參加——但我希望同各國很多代表來詳細談談。我覺得我們因為寫出這樣的決議案而犯了很大的錯誤，即我們自己截斷了今後成功的道路。我已經說過，決議案寫得極好，其中總共五十或五十多段我都贊成。但我們却沒瞭解，怎樣使我們俄國的經驗適用於外國人。決議案中所說到的一切，結果都成了死的條文。可是，如果我們不懂得這點，那我們是不能前進的。我認為對於我們大家，無論是對俄國同志或外國同志，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俄國革命五週年之後，我們都應當學習。祇是現在我們才有可能來學習。我不知道，這一可能究竟能繼續多久。我不知道，資本主義列強能讓我們安靜學習多久。但我們應當利用沒有戰爭行動和脫離了戰爭的每一時機來從事學習，並且是從頭學習。

我們全黨和俄國各階層的人都在渴求知識，這也就可以用來證明這點。這種致力學習的趨向表明出，此刻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但是外國同志們也應當學習，這並不是說，他們要像

我們所還需要的這樣來學習——讀，寫，瞭解讀過的東西。人們爭論說，這是有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還是有關於資產階級的文化呢？我不來答覆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學習讀、寫與瞭解讀過的東西，這是毫無疑義的。外國同志們已不需要這樣作。他們所需要的，是比較高深的東西：這裏首先是要使他們也了解到，我們寫出了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外國同志們既沒有讀，也不瞭解，却在上面署了名。這應當成爲他們的首要任務。必須使這個決議案見諸實行。這點，一個夜晚是做不到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決議案過於俄國化：上面所反映的是俄國經驗，所以外國人完全不瞭解，而他們也決不會滿意於把這個決議案當作神像掛起，向它祈禱。這樣是不會有任何成就的。他們應當把一大部分俄國經驗消化下去。至於能怎樣做到這點，我却不知道。也許，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會向我們大大效勞：他們會向意大利人表明出，意大利人所受的教育還不夠，他們的國家還不能保證不發生黑幫派。也許，這會是很有益處的。我們俄國人也應當設法向外國人來解釋這個決議案底原理。不然，他們是絕對無力執行這個決議案的。我堅信，在這方面我們不僅應向俄國同志說，而且也應向外國同志們說，在當前這時期內，最重要的是學習。我們是在一般意義上學習着。他們却應當在特殊意義上來學習，爲的是真正能理解革命工作底組織、結構、方法和內容。如果做到了這點，那時，我深信世界革命底前途，不僅會是很好，而且會是優越的。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刊載於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刊（俄文版）第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二至三五五頁。

關於我國出席海牙會議代表 團任務問題的幾點意見⁸⁹

海牙會議快要開幕，在反戰爭危險問題上，我想，最大的困難就是要克服這種偏見，彷彿這是一個簡單、明瞭而比較容易的問題。

——我們要用罷工或革命來回答戰爭，——一切最出色的改良主義者領袖們，照例都是這樣向工人階級說。這種答覆在外表上往往表現的急進性使工人、合作社家和農民得到滿足與安慰。

也許，最正確的方式，是一開始就極嚴厲地駁斥這種意見。直接聲明道，特別當戰爭完結後不久的現在，祇有最蠢笨或虛偽得不可救藥的人才能硬說，這樣答覆反戰問題會有什麼用處。直接聲明道，用罷工來『回答』戰爭是不可能的，猶之用此類最普通的直接字義上的革命來『回答』戰爭，是不可能的一樣。

應該向人們說明真實情況，解釋戰爭所由產生的祕密是如何之大，而工人底尋常組織，雖然在戰爭真正愈益臨近之際尙自命為革命組織，但它們是如何軟弱無力。

應該極具體地再三再四向工人們說明最近這次戰爭期間內的情形，為什麼這種情形祇能是這樣。

特別要說明這一有重大意義的情況，即『保護祖國』必然會成為極大多數勞動者將不免在有利於本國資產階級方面來解決的問題。

所以，第一，要闡明『保護祖國』的問題；第二，因之就要闡明『失敗主義』的問題；末了，還要闡明反戰鬥爭的唯一可能手段，就是保存與建立一切參戰革命者底祕密組織來進行長期反戰工作，——所有這些任務都應當提到第一位。

抵制戰爭——這是蠢笨的空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投身到任何的反動戰爭中去。

頂好列舉甚至是德國戰前刊物中的實例，特別是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大會底實例，異常具體地指出：凡在理論上承認戰爭是罪惡，說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戰爭是不可容許的等等，這都無非是些空話，因為這樣提出問題，是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的。至於戰爭如何能夠來臨和定會來臨這點，我們沒有給羣衆以任何真正生動的概念。反之，無數萬份的當局刊物，每天都在蒙蔽這個問題，並對這個問題散播出極端虛偽的言論，此種言論是軟弱的社會主義刊物所完全無力反對的，何況社會主義刊物在和平時期，對這個問題所持的觀點也就根本不正確。大多數國家內的共產主義刊物，想必也是很自慚的。

我想，我國出席國際合作社家與工聯會員大會的代表們，應該分担任務，把人們現時用來辯護戰爭的一切詭辯，詳盡無遺地加以分析。

也許，吸引羣衆參加戰爭的最主要手段，正是資產階級刊物所憑藉的這種詭辯論；也許，那表明我們反戰無力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或者我們沒有事先分析這種詭辯論，或者我們甚至用些廉價的，吹噓的，全係空洞的辭句，而以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的精神，說我們不容許戰爭爆發，說我們十足了解戰爭罪惡等等等等來對待這種詭辯論。

我覺得，如果在海牙會議上我們有幾個人能用這國或那國語言出來反對戰爭，那麼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駁斥這種意見，彷彿出席

會議的人都是戰爭底敵人，彷彿他們都懂得，戰爭怎樣能夠而且是會在最出人意料之際迫近他們的眉睫，彷彿他們多少悟解反戰方法，彷彿他們多少能於採取合理的、可以達到目的的反戰步驟。

我們應當根據不久前戰爭的經驗說明，當戰爭一旦宣佈之後，該會發生如何多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而使極大多數被徵入伍的人，沒有任何可能以多少清醒的頭腦與多少不帶成見的正直態度，來對待這些問題。

我想，說明這一問題，應當特別詳盡，並且要從兩方面着手：

第一，要敘述與分析過去這戰爭期間的情形，並向所有出席會議的人聲明，說他們都不了解這點，或者他們是假裝了解，實際上却閉着眼睛，不去看看問題的關鍵何在，如果不知道這一關鍵，也就根本談不上任何反戰鬥爭。關於這點，我認爲必須分析以前俄國社會主義者中對戰爭問題所發生過的一切思潮和一切意見。必須證明，這些思潮並非偶然發生，而是由現代一般戰爭底本性中所自然產生出來的。必須證明，若不分析這些意見，若不說明這些意見怎樣不免發生，及其對於反戰鬥爭問題如何具有決定意義，若不作這樣的分析，便根本談不上什麼準備對付戰爭，甚至談不上對戰爭所持的自覺態度。

第二，應該舉出現時那怕是最微末的衝突實例，並根據這些例子來說明，由於英法兩國間有關土耳其所結條約中某項條款的爭論，或由於日美兩國間因任何太平洋問題所引起的小小分歧，或由於任何大列強間對殖民地問題所發生的爭執，或因它們的關稅政策以及一般商業政策上的爭論等々等，以致戰爭在每天內都有爆發的可能。我以爲如果稍微懷疑到恐怕在海牙會議上不能完全自由說出自己反戰爭的全部言論，那就應該想方設法，以便那怕祇說出主要的東西也好，至於未能說完的材料，以後再用小冊子刊印出來。但定要一直講到大會主席停止你發言時爲止。

我想，爲了達到我們這一目的，代表團裏，除了能夠並應該作一般反戰演說，即發揮反戰鬥爭的一切主要理由和各種條件的演說家之外，還得有通曉三種主要外國語的人參加，這些人要同各國代表談話，查明他們對於各個基本理由的了解程度怎樣，以及是否有必要提出某種論證或援引某些實例。

也許在很多問題上，祇有援引過去這次戰爭中的實例才真正能起作用。也許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真正能起作用的僅僅是闡明各國間的現有糾紛及其可能發生武裝衝突的情形。

關於反戰鬥爭問題，我記得我們各國共產黨國會議員在國會內和在國會外的反戰演說中，有過許多內容上極不正確和極其輕忽的聲明。我想，對於這類聲明，特別是在戰後作出的這類聲明，應當最堅決地加以反對，並最無情地列舉出每個這種演說人底名字。當批評這種演說人的時候，特別是如果有必要時，辭句儘量可以緩和，但對於這類意見，却一次也決不能默然放過，因爲對這個問題採取輕忽態度，便是一種再有害不過的罪惡，這種罪惡是絕對不能寬恕的。

在一些工人代表大會上，有許多蠢笨與輕忽得不能饒恕的決議。

應該立刻收集所有這些材料，其中每個問題底每節每段以至該代表大會上的全部『戰略』，都要一一詳加討論。

在我們這方面說來，關於這個問題，不僅不容有錯誤，就是實質上不充分的地方，也是決不能容忍的。

列寧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九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三七二至三七五頁。

日記摘錄

根據一九二〇年統計，最近出版的俄國居民識字調查材料（俄國識字情形一覽，中央統計局國民教育統計科印行，一九二二年，莫斯科）表明出一種很重要的情形。

我來把這個調查材料中關於一八九七和一九二〇年的俄國識字人數統計表引證如下：

	每一千男子中 識字人數		每一千婦女中 識字人數		每一千人口中 識字人數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歐俄部份	326	422 [*]	136	225	229	330
北高加索	241	357	56	215	150	281
西伯利亞（西部）	170	307	46	134	108	218
總計	318	409	131	244	223	319

當我們泛論到無產階級文化以及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間的對比關係時，實際的數目字表明，甚至較之資產階級文化說

來，我們的情形也是很薄弱的。果然，我們距全民識字的程度，還落後得很遠，就拿沙皇時代（一八九七年）來比較，我們在這方面的進步，也還是過於緩慢。這點對於那些至今還幻想『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乃是一種嚴重的警告和責難。這表明爲要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準，今後我們還要怎樣埋頭苦幹。並且這表明出，爲要在我國無產階級已獲勝利品的基地上真正達到多少高度的文化水準，今後我們該要進行如何浩大的工作。

我們不應局限於這一不容爭辯，但過於理論化的原理。應該在最近審查我國三個月預算案的時候，我們也能實際地把這一工作擔負起來。當然首先應當縮減的，並不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開支，而是其他部門的費用，以便把縮減出來的款額增加到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經費中去。像今年這樣的年份，我國糧食相當有保證時，不應該吝嗇於加增教員們的麵包額。

現在，國民教育方面的工作，一般地講，並不能說是過於狹隘。爲了把舊的教育界推向前進，爲了吸收他們來擔負新的任務，使他們對新教育法感覺興趣，使他們注意到例如宗教這樣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做的也很不少。

但我們所做的還不是最主要的事。我們沒有關心到，或者極不充分地關心到把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不如此，則任何文化：無論是無產階級的文化，或甚至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都無從談起。問題就在於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這種狀態我們至今還沒有掙脫，若不嚴重努力，我們也就不能掙脫這種狀態，固然我們本來可以做到這點，因爲任何一國的民衆，都沒有像我國民衆這樣愛好真正的文化；任何一國都沒有把這種文化問題，像我國提得這樣深刻，這樣澈底；因爲任何地方，任何一國的國家政權都不是操在工人階級手中，而這個階級底大多數人都深知自己的缺點——我所說的，不是文化上的缺點，而是識字上的缺點；任何一國的工人階

級，爲了改進自己這方面的狀況，也沒有像我國工人階級這樣決心承受並正在承受如此巨大的犧牲。

至於爲了使我國全部國家預算去首先滿足初級國民教育需要，這方面我們還做的太少，少得無可比擬。甚至在我們教育人民委員部下，也往往有某個國家出版局人員過多的現象，而同時却絲毫也沒關心到，國家所應當首先注意的，並不是出版局，而是讀者，而是要有更大量能於閱讀的人，而是要使將來俄國出版局底政治規模更加宏大。我們至今總還是按照舊的（鄙陋的）習慣，把更多的時間與力量花費在出版局這類的技術問題上，而不是花費在關於國民識字這一般的政治問題上。

如果就職工教育總局來說，那我們深信，此地也可以找出許多由於機關利益所擴張起來而不適合於廣大國民教育需要的多餘無用的東西。在職工教育總局裏，還遠非一切人事都能滿足首先提高我國青工教育並給以實際方針的合理願望。如果加意考察職工教育總局的員額，其中許多東西，從這點上說來都是龐大虛構，值得取締的。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國家中，爲了促進國民識字教育，還有很多很多經費可以節省，而且應當節省下來；辦法就是取締一切或則是半老爺式的玩具，或則是這樣一種機關，即在統計材料所說明的國民識字情況下，沒有它，我們不但能夠而且還長久地能夠和應當過下去的機關。

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昇到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教師們所始終不能達到的高度上。這乃是無待證明的真理。我們爲了這點，就必須進行有系統的、一往直前的工作，既要提高教師的精神狀態，也要使他們擁有各方面的修養，以期真正符合他們的崇高稱呼，而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

應當有系統地加緊組織國民教師的工作，要把他們這至今以前在一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資產階級制度底支柱，改造成爲

蘇維埃制度底支柱，以便經過他們吸引農民，使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而來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

簡括地說，爲要做到這點，特別重要的就是必須有系統地到鄉村中去巡視；不錯，這種巡視工作我們已在進行，而且今後還應當有計劃地加以發展，我們往往把錢白費在那些幾乎完全是老舊的國家機關上，而現在像這種巡視工作的辦法，我們却要毫不吝惜金錢。

我收集過一些材料，準備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城市工人協助農村居民問題的報告，但這個報告沒有作成。其中有些材料是哈多洛夫斯基同志供給我的，既然我沒來得及研究好這個問題及經過蘇維埃代表大會發表出來，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問題提出，由同志們來詳加研究。

這是城市與鄉村關係中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整個革命，具有決定的意義。一切資產階級國家都一貫地用全力來愚昧城市工人，並爲了這一目的，把由國家及由沙皇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開支出版的全部刊物都動員起來，而我們能夠並應當使用我們的政權把城市工人真正培養成爲在農村無產階級隊伍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

當我一說出『共產主義』一語時，就急忙要附帶加以說明，怕的是會引起誤會，或使人過於機械了解。無論如何，決不能把這了解成爲彷彿我們應當立刻將純粹的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進到農村中去。當我們鄉村中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如果這樣做去，可以說是極有害的，也可以說是會使共產主義遭到覆滅的。

決不能這樣。應當從建立城市與鄉村間的交際來往開始，但絕對不能事先定下在農村中實行共產主義的過早目的。這一目的，此刻是不能達到的。這一目的現在是不適時宜的。提出這個目的，對事業不惟無益，而且有害。

可是建立城市工人與農村工作者間的交際來往，在他們中間規定出彼此易於建立的一種協助形式，——這就是我們的職責，也就是執政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之一。爲此必須由工廠工人建立種種團體（黨的，職工會的，個人的），這些團體的經常目的，就是有系統地幫助鄉村來發展文化事業。

把所有的城市支部按所有的農村支部『配合』起來，使每一個『配上』相當農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有系統地利用一切機會，來滿足自己這弟兄支部的某種文化需求，這點究竟能否做到呢？或者能找出其他的聯繫形式來呢？這裏，我祇限於提出這個問題，以便引起同志們的注意，以便指明西伯利亞底現有經驗（這一經驗是哈多洛夫斯基同志向我說過的），以便提出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巨大文化任務。

除了我國正式預算外，或除了國內正式聯繫外，我們對於農村，幾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不錯，我國現時城市與農村的文化聯繫是自然不等地帶有另一種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所給予農村的，乃是在政治、經濟、道德、生理等方面腐化農村的東西。而在我國，城市自然而然開始給農村以恰恰相反的東西。可是這一切都是自然地、自發地在進行着，但若在這工作中加上自覺性、計劃性與系統性，則這一切就能夠加強起來（以後並能夠百倍地擴大起來）。

祇有當我們着手研究這個問題，當我們將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工人團體——極力避免它們的官僚主義化——以便提出這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具體實行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才能開始前進（祇有那時，我們才能真正百倍迅速地開始前進）。

尼、列寧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三八七至三九〇頁。

論合作制

(一)

我覺得，我們這裏對合作制注意得不夠。現在，即自十月革命以來，且不管新經濟政策怎樣（在這方面，反而應該說，正由於有新經濟政策的緣故），我國的合作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關於這層，未必所有的人都瞭解。在舊日的合作制提倡者的理想中，曾有過許多幻想。他們的這種幻想常常令人可笑。爲什麼說這是他們的幻想呢？因爲他們不了解工人階級爲推翻剝削者統治的這一政治鬥爭底重大基本意義。現在，我國已推翻了剝削者底統治，現在，凡舊日合作制提倡者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甚至是奇談，甚至是庸俗不堪的東西，都日益變成爲最明顯的現實事物了。

在我國，既然由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既然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這個國家政權，實際上，我們這裏的任務，祇是要把居民合作化。在居民儘量合作化的條件下，以前曾引起那些公正深信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必須爭取政權等等的人士之合理嘲笑與蔑視的社會主義，自然也就可以達到目的。可是並非所有一切同志都明瞭，把俄國居民合作化這點，現在對於我們說來該具有如何巨大無極的意義。新經濟政策中，我們曾經向以商人資格出現的農民讓了步，即向私人貿易底原則讓了步；合作制底巨大意義也正是從此產生出來（這與人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將俄國居民充分廣泛

充分深刻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我們現在找着了把私人利益、私人營業利益與由國家檢查監督這一利益二者結合起來的標準，即使私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標準，而這點對於以前許多許多社會主義者說來，曾是不可解決的難題。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這種情況也就是我們許多實際工作人員所估計得不夠的。他們輕視我國的合作社，他們不瞭解：第一，從原則方面說來（生產資料所有權操在國家手中），第二，從採用對農民盡量簡單、容易和便於接受的辦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說來，這種合作社該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

須知這點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種種勞動聯合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學會實際建設社會主義，而使一切小農都能參加此種建設，又是另一回事。這段階梯現在我們是已經達到了。無疑義的，我們雖達到了這段階梯，但却絕少加以利用。

我們轉到新經濟政策時做的有些過份，這並不是說我們過於重視自由工商業的原則，而在於我們完全忘記了合作制，現在對合作制估計不足，開始忘記合作制在上述這雙重意義上已有的巨大意義。

我現在想向讀者們說到，根據這『合作制』原則看來，此刻在實踐上可以而且應當做到的，究竟是些什麼事情。為了使一切都

明瞭「合作制」原則底社會主義意義起見，此刻可以而且應當用來開始發展這一原則的，究竟是些什麼手段？

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使它不僅一般地和經常地獲得某種優待，並且使這種優待成爲純粹資財上的優待（減低銀行息金等等）。要用國家資金貸予合作社，這種資金額應比我們借給私人企業的，甚至比借給重工業等等的還要多一些。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周轉，而只是幫助有真正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周轉。獎賞參加合作社周轉的農民，——這種形式，無條件是對的，但同時應當檢查這種參加的情形，檢查它的自覺性及其質量，——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合作社手到達鄉村，在那裏開設起合作店舖，這樣，嚴格說來，居民還完全沒有參加這一工作，但同時又因爲有利可圖，那他們也就會急於試試參加這合作店舖的。

這件事也還有另一方面。從一個「文明」（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底觀點上說來，爲了要促使所有的人個個都來參加，並且不是消極地，而是積極地參加合作事業，那我們還需做到一件小小事情。老實說，我們還沒有做的「祇有」一件事：就是要使我國居民具有這種「文明」程度，以致懂得人人參加合作社的利益，並把參加合作社一舉加以實現。「祇有」這一件事。現在爲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並不需要其他特別高明的辦法。可是，爲要做到這「祇有」二字，却需要有全盤的改革，需要全體民衆經歷文化方面的整個發展階段。所以我們的條規應當是：少用些高明辦法，少來些巧妙花樣。新經濟政策在這方面，乃是一種進步辦法，因爲它恰恰適合於

最普通農民的水準，它對農民並不提出絲毫過高的要求。但是爲要經過新經濟政策來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要花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但這終歸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不經過這一歷史時代，不做到人人都識字，沒有足夠的知識程度，沒有充分教導居民去閱讀書報，以及沒有做到這一切的物質基礎，沒有例如防荒防飢等等的相當保障，——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現在，全部問題就在善於把我們已經並很充分表現出來而且完全奏了效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熱忱（此地我幾乎是敢於說）與那種能稱爲精幹而又有知識的商人本領結合起來，具有這種本領也就夠成爲一個優良的合作社手了。我所說的要具有商人本領，乃是指要具有文明商人本領而言。讓俄國人或普通農民牢實地記着這點。他們以爲一個人既是在做買賣，那他就具有本領當個商人。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他雖然在做買賣，但做買賣與有本領當個文明商人，這中間的距離還遙遠得很。此刻他是在按亞洲方式做買賣，但如果要有本領當個商人，那他就應當按歐洲方式來做買賣。但是他要能做到這層，還得經歷一個很長的時期。

現在來結束我的話：用經濟上、財政上及銀行方面的種種特權來支援合作社，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居民的新原則所應當有的贊助辦法。但這還祇是一般提出了任務，因爲在實踐上這一任務的全部內容，還沒有確定，還沒有詳細規定出來，也就是說，應該善於找出我們給合作事業的『獎賞』形式（以及給獎條件），找出我們能充分幫助合作社的獎賞形式，找出我們能培養出文明合作社手的獎賞形式等等。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在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條件下，文明合作社手的制度，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底制度。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

(二)

當我一寫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我總是引證一九一八年我寫的那篇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文。這點不止一次地引起某些年輕同志的懷疑。可是他們所懷疑的，主要是抽象政治方面的問題。

他們覺得，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政權也屬於這工人階級，這樣的制度不能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沒有看出，我之所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第一，是爲了要把我們現時的立場與我在反對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論戰中的立場從歷史方面聯繫起來，並且那時我已屢次證明出，國家資本主義會比我國當時經濟要高一些；那時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規定普通國家資本主義與我在介紹讀者去認識新經濟政策時所說到的那種特別的，甚至是完全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直接聯繫。第二，實際目的，原來對我隨時都是很重要的。而我國新經濟政策底實際目的，就是要能實行租讓制；按我國條件說來，租讓制已無疑義會是一種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也就是我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推論。

但還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其中我們需要有國家資本主義，或至少也需要有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比擬的東西。這就是合作制問題。

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下，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同樣無疑義的，在我國現時經濟實際環境內，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但唯一是在公有土地上，唯一是在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與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建築企業用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於國家）結合起來時，這裏也就發生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亦即合作企業，這種企業，從原則意義上說來，以前並未起過獨立作用。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後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爲合作企業，第

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

當人們議論到合作社時，他們正是對於我國的這種情況，估計得不充分。他們常常忘記，由於我們國家制度的特點，我國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制區分開來（順便說說，我國租讓事業，並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那麼在我們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

現在我就來說明自己的意思。為什麼說自過文起所有舊時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計劃都是幻想的呢？就是因為他們不估計到如階級鬥爭，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推翻剝削者階級底統治等基本問題，而夢想用社會主義來和平地改造現代社會。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把這種『合作制』社會主義，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簡單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將階級敵人轉為階級朋友，將階級戰爭轉為階級和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當作甚至是庸俗不堪的東西。

從現時基本任務看來，我們無疑義是正確的，因為沒有爭取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

可是，既然國家政權已由工人階級掌握，既然剝削者底政權已被推翻，加之全部生產資料（除了由工人國家臨時有條件地自願租給剝削者的那些生產資料外）都把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請看，現在的情況已發生了怎樣根本的變更。

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這種根本變更，就在於以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不能不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和奪取政權等等方面。現在這一重心却改變了，亦即轉移到和平的，

組織上的『文化』工作方面。我敢於說，假如不是國際關係，不是必須在國際範圍內要爲我們的立場而鬥爭，那我們的重心就得移到文化建設上去。但若把國際關係置之不論，祇就國內經濟關係來說，那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是歸結在文化建設方面。

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那完全從舊時代接受過來，簡直是壞透了的國家機關；在五年來的鬥爭中，我們對於這種機關來不及，並且也不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農民中的文化工作。農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將它當作經濟目的看待，那就正是實行合作化。在居民完全合作化的條件下，我們也就會已安安穩穩地站在社會主義的基地上。但這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是包含有農民（正是廣大農民羣衆）底高度文化水準在內，即如果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麼，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們的敵人屢次向我們說，說我們做些沒有頭腦的事，把社會主義培植在一個文化不足的國度內。可是他們錯誤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把我國政治、社會變革竟發生在文化變革或文化革命之先這點，看成是我們沒有從（一切迂儒）理論所墨守的那一端開始，而這文化革命現時却正擺在我們面前。

現在有了這文化革命，我國也就夠稱爲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但是這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爲我國的文盲現象）或在物質方面（因爲要成爲文明國家，就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生產物質資料，必須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困難。

列寧 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日刊
載於真理報第一一五期與一一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三九一至三九七頁。

論我國革命

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一)

這幾天內我瀏覽了蘇漢諾夫論革命的札記。特別刺目的，就是我國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也如第二國際底全體英雄一樣表現着迂腐的見解。姑且不說他們胆小如鼠，甚至他們中間傑出的人物，一遇到必須稍微離開德國模樣時，都總要來點支吾搪塞，姑且不說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在整個革命時期已經充分表現出了的這種特性，而且他們那種奴僕式的模倣已往的態度，也是很刺目的。

他們都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却迂腐到了萬分。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其革命辯證法，他們是一竅不通的。甚至馬克思說在革命時期必須有極大的機變性這直接指示，他們也絕對沒有瞭解，甚至例如馬克思好像是在一八五六年寫的通信中，認爲可以指望德國將有一次能夠造成革命形勢的農民戰爭來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這直接指示，他們也在百般迴避着，就像小貓在熱粥旁邊繞圈子一樣。

他們在一舉一動中，都揭露自己是些怯懦畏縮的改良主義者，深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與資產階級絕緣，同時却又用荒謬絕倫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胆怯心理。而且他們甚至在單純理論方面，也暴露出自己完全不瞭解馬克思主義如下一種意見：他們至

今只看見過西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發展底一定道路。所以他們就不能想像到，這一道路，若不 *mutatis mutandis*，即若不加以某些更正（從全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是完全不重大的更正），是不能當作模範的。

第一，就是關於與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相聯繫的革命。在這樣的革命中，不免要現出一些新的特徵，或正由於這次戰爭而有所改變的特徵，因為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在這種環境下發生過這樣的戰爭。我們看見，最富強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在這次戰爭之後，至今都不能調整『常態』的資產階級關係，而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即儼然以革命家自命的小資產者，却始終認為常態的資產階級關係乃是絕對無法超越的界限，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常態』的瞭解，又是極端死板和狹隘的。

第二，他們根本不瞭解，全世界歷史發展是按着總規律進行這一事實不僅毫不排斥，反而預定這一發展過程中的個別階段在發展的形態或次序上表現出一種特色。例如他們甚至絕然沒有想到，俄國是介乎各文明國家與初次由這次戰爭最終捲入文明軌道的各東方國或非歐洲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會能夠並且必定表現出某些特色，這些特色固然是遵循着世界發展底總路綫，但它却使俄國革命與以前西歐各國革命不同，而在達到東方國家去的道路上，引起某些局部的新奇的特點。

例如，他們死守着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爛熟的論據，認為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如像他們中間某些『飽學』先生所講的那樣，硬說我國還沒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他們任何人也沒有想一想：一個國家的人民既然碰到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難道他們為沒有出路的境況所迫而不可以起來奮鬥，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爭得一些並非尋常的條件，以保證文明更進一步發展嗎。

「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準」。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英雄們，當然也包括蘇漢諾夫在內；開口閉口總在重複這種爛調。他們把這個不容爭辯的論調反覆咀嚼，竟以為這就是估計我國革命時有決定意義的標準。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情況把俄國捲入了西歐一切多少重要的國家都被牽入的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把俄國頗與東方正在開始和部份已經開始的革命相近的發展進程放置到這樣一種條件下，使得我們能夠實現正如馬克思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八五六年論到普魯士時所認為是一種可能前途的『農民戰爭』與工人運動的聯合，——那又怎樣呢？

既然完全沒有出路的境況把工農力量多倍地增加起來，使我們能夠沿着另一種途徑去創設文化底基本前提，而不走一切其他西歐國家的舊路，——那又怎樣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綫是否就會因之改變了呢？每個正在或已經捲入世界歷史總進程的國家內主要階級底基本相互關係是否就會因之改變了呢？

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相當的文化水準（雖然誰也不能說，這個相當的『文化水準』究竟怎樣），那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得造成這個相當水準的必要前提，然後就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二)

你們說，爲了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有文明的。好極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守這種文明底前提，即驅逐地主和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向社會主義方面進展呢？你們究竟在哪一本書上讀過，說通常歷史程序底這類變態是不容許的或不可能的呢？

得記拿破崙這樣寫過：«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 意譯出來就是：『首先要去苦戰一番，然後再看分曉』。我們也就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苦戰過一番，以後我們也就看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約，或新經濟政策等類事變發展中的枝節（就世界歷史說來，這當然是枝節）。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說，基本上我們是已經勝利了。

我國的蘇漢諾夫之流，更不待說那些比他們更右的社會民主黨人，連做夢也沒有夢想到，非如此便根本不能實行革命。我們的歐洲庸人們連做夢也沒有夢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更多得無比，社會條件更特殊到萬分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是會向他們表現出比俄國革命更為特殊的情況來的。

考茨基式的教科書，在當時不待說是很有益處的。但現在終歸已是放棄認為這種教科書把今後世界歷史進程中一切形態都已預察周到的想法的時候了。現在已經應該說，這樣設想的人，簡直是些傻瓜。

列寧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一百一十七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三九八至四〇一頁。

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

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案⁹⁰

工農檢查院對我們說來，無疑義是個巨大的困難問題，這個困難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我認爲那些正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同志，否認工農檢查院底益處與必要，這是不正確的。但同時我並不否認，關於我們國家機關及改善這種機關的問題，乃是極端困難，遠未解決，同時又是非常迫切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外，在極大程度上都是舊時機關的殘餘，祇在最小程度內，才經過多少認真的改變。這些機關祇是外表上微微加了一點修飾，而在其餘關係上，却仍是我國舊時國家機關中一種最標本的舊式機關。所以，爲了設法把它真正加以革新起見，我覺得必須參照參照我們國內戰爭的經驗。

在國內戰爭比較危急關頭，我們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把我們黨內的優秀人才集中在紅軍裏；我們動員了我國工人中的優秀份子；我們向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尋找新的力量。

據我的意見，我們也應當在同一方向來尋求改組工農檢查院的門徑。茲向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議，採納下列這種改組計劃，其基礎就是在特殊方式上擴大我們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已經立意把自己擴大成爲黨的一種高級代表會議。黨中央全體會議平均每兩月至多舉行一次，至於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則由我們黨中央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等代表中央委員會負責進行。我想，我們應當貫徹已經開始的這種辦法，並把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最終變爲黨的高級代表會議，其中有中央監察委員會參加，每兩月舉行一次。根據下述條件，把這中央監察委員會同已經改組過的工農檢查院基本部份結合起來。

我向代表大會提議，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七十五至一百個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新委員。這些被選人，亦如中央委員會普通委員一樣，也應在黨的資格方面，經受考核，因爲這些被選人將來也應享受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一切權利。

另一方面，工農檢查院應當縮減到三百至四百個職員，這些職員，無論在忠誠性方面或通曉我們國家機關情形方面，都要經過特別考查，此外，對於一般勞動底科學組織法原理，特別是在行政、管理等等勞動底科學組織法基本知識上還要受到特別考驗。

據我看來，把工農檢查院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結合起來，這對於雙方機關都會有益處。一方面，工農檢查院藉此就能獲得極高的，至少不亞於我們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威信。他方面，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協同中央監察委員會，就會最終走上轉到黨高級代表會議的道路，其實中央委員會本已走上了這一道路，而且爲了在以下這兩方面都能正確執行本身任務起見，它還應把這條道路貫徹到底，一方面，保證自己組織和工作上的計劃性，適當性和系統性；另一方面，經過我國工農中的優秀份子，而與真正廣大羣衆聯繫起來。

我預見到會有一種反對的意見，直接或間接地從那些使我們機關成爲舊式機關的氣氛中，亦即從這班甘心要把我們機關至今仍保持在極端難堪的革命前狀態上的人們中發生出來（順便說到，我們現在得着歷史上相當稀罕的機會，來規定進行根本社會改革所必需

的期限，而現在我們又明顯地看見，在今後五年之內，我們能夠做到什麼，哪些事情是需要更長得多的時期）。

這種反對意見是，彷彿我提出的改革只會唯一引起混亂。中央監察委員們會徘徊於各機關間，不知道往哪裏去，去幹什麼，找誰接洽，以致到處瓦解組織，耽誤公務員們的日常工作等等等等。

我想，這種反對意見底險惡來源，明顯得甚至無須加以解答。不言而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和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及其所部負責人員（而在相當情況下，也有我們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要協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正確地組織自己的人民委員部及其工作，還需要有幾年的堅強努力。據我的意見，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可以，而且應當仍舊是人民委員（亦如其他負責人員依然是負責人員一樣），仍舊負責領導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的全部工作，並領導那些「派來」聽其支配的一切中央監察委員。按我的計劃，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應留下的三四百個職員，將一方面在工農檢查院其他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會補充委員指導下，擔任純粹秘書性的職務，而另一方面，這些職員應當是非常熟練，經過特別考察，異常可靠，薪資很高，能使他們完全擺脫現時工農檢查院官員們底真正困苦（如果不說得更壞）生活狀況。

我深信，把職員減少到我所說的這個數目，會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底質量以及全部工作底質量改善許多倍，同時使該人民委員及各負責人員，能夠集中全力去組織工作，去有系統地、一往直前地提高工作質量，這對工農政權和我們蘇維埃制度來說，是絕對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也想到，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必須把組織勞動的各高級研究院（中央勞動研究院，勞動科學組織研究院等等），一部份合併，一部份彼此協調起來，這樣的研究院，現在我國至少有十二所。過於單一化及由是發生的勉強合併的企圖，都是有害的。恰

恰相反，要在一方面把所有這些機關合併爲一，他方面又保持每個機關有相當獨立性的條件下正確劃分它們的界限——這兩者間找出合理適當的折衷辦法。

無疑的，經過這樣改造後，對於我們中央委員會本身的好處並不比對於工農檢查院少些，因爲對於中央委員會說來，這無論在與羣衆的聯繫上，或在工作底經常性與調整性上，都是有利的。祇有那時，才能夠（而且應當）規定出更嚴格和更負責的秩序來準備政治局會議，出席這會議的人中，應當有某一時期或按某一組織計劃所規定的定量中央監察委員。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應當協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來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的分工，這無論從他們必須出席政治局會議，並檢查一切交給他們審閱的各種文件這點，或從他們必須分出工作時間來學習理論與研究勞動底科學組織法這點，或從他們必須在實際上參加監督並改善我們國家機關（自各高級國家機關起直至各下級地方機關止）這點等等說來，都是必要的。

同時我還認爲，經過此種改革後，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能更好地熟悉各種情況，能更好地準備出席政治局會議（一切與政治局會議有關的文件，均應在該會議舉行二十四小時之前，交到各中央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至於絕不容許有任何延宕的情形，則屬例外，因爲這種情形需要有特別程序使各中央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加以認識，並需要有這種問題的解決程序），除開這種政治上的益處以外，還有這樣一種好處，就是在我們中央委員內面，定會減少純粹個人情況或偶然情況底作用，因之也就縮小分裂的危險。

我們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嚴格集中與威信極高的集體，可是這個集體的工作還不夠符合本身的威信。我所提出的改革意見，對這點應當是有幫助的；那些必須出席政治局每次會議的定數中央監察委員，應當形成一個緊密的集團，它應『不顧情面』，使任何人的威

信，也不能妨礙他們去從事提出質問，檢查文件，並一般地做到使各種情事都臻於絕對清楚和格外正確。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工農這兩個階級底合作上面的，現時在某種條件下，也容許『耐潑曼』，即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如果這兩個階級間發生嚴重的階級分歧，那時分裂就不可避免，但在我國社會制度內，並沒有必然發生這種分裂的基礎，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黨的主要任務，是要注視着可能發生分裂的情勢，預防這種情勢，因為歸根到底，我們共和國底命運將取決於是農民羣衆同工人階級一塊前進，忠實保持與工人階級的聯盟，還是農民羣衆讓『耐潑曼』這新興資產階級來使自己脫離工人，同工人分裂。今後我們愈是明瞭地看見這兩種可能的結局，我國全體工人和農民愈是明顯地了解這種結局，那我們就有更多的可能來避免那種足使蘇維埃共和國覆沒的分裂危險。

尼、列寧 一九二三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
第四〇二至四〇五頁。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⁹¹

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問題上，我認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不應當貪求數量，不應當倉忙急躁。直到現在，我們對於國家機關的質量，還很少能加以思索與關心，殊不知特別認真準備這個機關，把真正現代品質的人材，即不亞於西歐優良榜樣的人材集中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裏，這乃是一種應份合理的關心。當然，對社會主義共和國說來，這種條件還嫌過於簡樸。但第一個五年的情況，曾使我們相當充滿了不信任的和懷疑的心理。我們對於那些過於頻繁和過於輕易地侈談什麼『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不由地抱着這種態度：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沒有資產階級制度前期特別惡劣的文化，即官僚式或農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行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與誇張都是最有害不過的。我們年輕的文藝作家與共產黨員，對這點應該好好記着。

所以，關於國家機關問題，我們現在也應當根據過去的經驗做出這樣的結論：最好是慢一些。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如果不說是可惡，至少是可悲到了極點，致使我們必須首先切實加以考慮，怎樣來與這機關的缺點作鬥爭，同時要記着，此種缺點是根源於過去的東西，這些東西雖已被搞毀，但還未消滅，還未退到已屬悠遠的文化階段上去。我在這裏之所以正是提出文化問題，因爲在這一事業中，祇有那些已深入

文化、生活和習慣內的東西，才能算是已達到的成績。而在我國，可以說，凡是社會制度中好的東西，都未經充分思索、瞭解和覺察到；祇圖急忙領會，既未檢查，也未考驗，既未被經驗證實，也未實際鞏固起來，如此等等。當然，在革命時代和使我們在五年內就從沙皇政體進到了蘇維埃制度這令人頭暈目眩的發展速度中，情形本來也祇能是這樣。

應當及時猛省。應當對那種突飛猛進的運動，對一切虛張聲勢的誇耀等等懷着必要的不信任態度，應當考慮到怎樣檢查我們每小時都在倡導，每分鐘都在進行，而後來每秒鐘都證明其不穩固、不堅牢和不可瞭解的前進步驟。這裏最有害的，就是急忙。最有害的，就是以爲我們總懂得一點什麼，或以爲我們總具有頗大數量的成份來建立真正新的機關，即真正配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等等的機關。

其實不然，在我們這裏，這樣的機關，甚至這樣機關的成份，都簡直少得可笑，所以我們應當記住，爲要建立這種機關不應吝惜時間，而是要花費多年多年的光陰。

我們這裏有些什麼成份可以用來建立這樣的機關呢？祇有兩種成份。第一，是傾心爲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工人。這種成份所受的教育是不夠的。他們很想給我們造成優良的機關。但是他們不知怎樣做法。他們不能做到這點。他們本身上至今還沒有養成爲建立這種機關所必具的知識與文化程度。要做到這點正是需要文化。這裏用蠻幹猛衝手段，或用奮勇堅毅精神，或用一般任何個人的優良品質，都是毫無成就的。第二，是有知識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成份，但這種成份在我國，較之其他一切國家說來，都是少得可笑。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總還過於想用熱情和急性等等，來補償（或者希圖可以補償）這種知識。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定下這樣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要使我們這裏的學科不致成爲死板文字或時髦空談（老實說，這在我國是特別常見的現象），要使學科切實滲透到機體內部，完全並真正變爲生活底組成部份。總之，我們所應當提出的，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其目的在於發展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應份適當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應當把這作爲改善我國機關之工具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造成爲真正的模範機關。

要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能昇進到必要的高度，就應當遵守這樣的規則：多番計量，一次剪裁。

要做到這點，就應當把我國社會制度中真正優秀的人事，極謹慎地、熟思地、格外明確地吸收來建立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

要做到這點，就應使我國社會制度中現有的優秀成份：第一，是先進工人，第二，是真正開明的，能於保證絲毫不信空言，絲毫不昧良心說話的份子，——都絕不害怕承認任何困難，不怕爲達到嚴重目的而進行任何鬥爭。

我們爲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已經空忙了五年，但正因爲是空忙，所以這種行動在這五年期間，僅僅證明了自己是無用，不唯無益，或甚至有害。正因爲是空忙，所以這種行動祇使我們具有工作底外表，實際上却混亂了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頭腦。

這種現象，終非根本改變不可。

應該遵守這一規則：寧肯數量少，但要質量好。應該遵守這一規則：與其白白空忙，毫無獲得精幹人材的希望，不如再等兩年，甚至三年，倒是要好一些。

我知道，這一規則會是難於遵行，難於運用到我們實際生活中去的。我知道，相反的規則會在我國經過無數孔隙鑽進來的。我知

道，將要給以莫大的反抗力，要表示頑強的堅定性；我知道，這裏的工作，至少在頭幾年內會是很少有顯明結果的；雖然如此，但我深信，祇有經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祇有達到了這一目的，我們才能建立真正配稱為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等等的共和國。

大概，許多讀者認為我在前一篇論文中引來作為例證的數字太少。我相信，可以舉出很多統計來證明這些數字是不充分的。但我以為我們應當把真正模範質量底利益這點，提在一切計算之上。

我認為，正是現在這個時候，對於我們國家機關說來，我們終於應當萬分認真地來進行這番工作，這時，急躁就幾乎是這工作中最有害的毛病。所以我很加意隄防，不要人們來擴大這些數字。反之，在我看來，這裏的數字，應該特別吝嗇。說句老實話，現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是沒有任何威信的。大家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得更壞的機關，在現時條件下，這個人民委員部也祇能是這樣。如果我們抱定目的，真要在最近幾年內，把它造成為這樣的機關：第一，應當是模範的，第二，能引起大家的絕對信仰，第三，向所有每個人證明，真不愧為像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一個高級機關的工作，那我們就應該牢記着這點。按一般定額招來職員的法辦，據我的意見，應立刻地永久地根除。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底職員，我們應當來完全特別加以選拔，非根據極嚴格的考試不可。如果這個人民委員部裏，工作馬馬虎虎，仍得不到任何信仰，說話幾乎沒有半點威信，那末設立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想，在我們現在所講到的這類改造工作中，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避免這種現象。

我們吸收來擔任中央監察委員的工人，應當是無可非難的共產黨員，我想，對這些人應當加以長期訓練，教他們學會工作方法，

了解工作任務。其次，這工作中，應有定量的祕書人員來當助手，在任命這種人員之前，定要經過再三審查。末了，凡屬我們破例要立刻任命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的人，應當具備下列各條件：

第一，他們應有幾個共產黨員底介紹；

第二，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具有通曉我們國家機關的知識；

第三，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懂得我們國家機關問題的理論基礎，懂得管理法和辦事手續等等的基礎；

第四，他們應與中央監察委員及本部祕書處極協調地工作，使我們能夠信託這整個機關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這些要求應具有莫大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很耽心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中大多數『實踐家』會宣稱這些要求是執行不了的，或者以輕蔑態度來譏笑它們。但我要問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有的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與之有關的人，他能否真心向我說出，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有什麼必要呢？我想，這個問題能夠幫助他們去適當地判斷。或者，值不得來進行改組（這樣的改組我們曾進行過很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無希望的事情，或者，真正定下自己的任務，用緩慢、艱難、迥非尋常的辦法，經過多次檢查，來建立真正模範式的，能夠引起所有每個人來尊敬（而不祇是因爲職銜要求這樣做）的機關。

如果不能忍耐，如果不準備花費幾年功夫來做這件事，最好是完全不要動手。

據我看來，要從我們在高級勞動研究院及其他方面業已潦草建成的機關中間，選出最少數的機關，檢查它們充分認真的工作，而祇有這樣去繼續努力，使這工作真正合乎現代科學的要求，使這工作能給我們以一切的保證。那時在幾年之內，能確實指望會有一個機關能名符其實地工作着，也就是說，能享受着工人階級、俄國共產黨

以及我國全體民衆底信任，有系統地和一往直前地來爲改善我們國家機關而工作着。

這點，本來此刻就可以着手準備。如果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贊成上述的改造計劃，那麼它現在就可以開始實行準備的步驟，以便有系統地進行工作，直到這些步驟全部實現爲止，既不用急躁，也不要拒絕把已做過一次的事再重新改作一遍。

這裏，凡屬不澈底的決定，都是再有害不過的了。凡屬根據其他任何理由製定出來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底定額，其實都不過是依據舊官僚式的理由，依據舊日的成見，依據已經注定作廢了的，祇能引起一般譏笑的東西等等。

實際上，這裏的問題是如此：

或者表明現在我們在國家建設事業中，是真正學會了一些什麼（五年內也應該學會一點東西），或者表明我們還沒有成熟到這種程度；那時，也就值不得動手去做。

我想，依我們現有的人材看來，如果說，我們已經相當學會能於有系統地，從新地建成一個人民委員部，這種假設，並不誇張。不錯，這樣一個人民委員部也就應當決定我們整個的國家機關。

此刻要懸賞徵求編製兩種或更多的關於組織一般勞動，特別是組織管理勞動底教科書。我們現有的葉爾曼斯基著的那本書，可以作爲基礎，雖然（要附帶說一句）他顯然同情孟什維主義，是不能利用來編製適合於蘇維埃政權的教科書的。不久前出版的克爾仁澤夫那本書也可以作爲基礎；末了，現有的一部份參考教材內，也有些可以適用的地方。

要派遣幾個有學問與忠誠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蒐集書籍和研究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英國，是恐怕沒有可能派人到美國或坎拿大去。

要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起草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同樣也製定出中央監察委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

這種和諧如此類的工作，當然既不會使人民委員作難，也不會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負責人員或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感覺困難的。

同時必須指定一個預備委員會來挑拔充當中央監察委員的候選人。我相信現在我們無論從各機關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中，無論從我們蘇維埃大學生中，都能找出過額的候選人來充任這種職位。如果事先排除某一種人，那就未必正確了。大概，必須寧可使這個機關具有各種各樣的成份，我們應當使這種成份成爲多種品質底結合和各樣優點底錯綜，總之，是需要花費一番工夫來解決擬定候選人這個任務。舉例來說，如果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是由一色一樣的人所組成，譬如，都是些帶官吏性的人，或者其中沒有帶鼓動性的人，或者其中沒有那長於交際或能深入到爲這種工作員所相當生疏的人羣中去的人等等——那就會是最壞不過的了。

* * *

我想，如果我把自己的計劃來同學院式的機關比擬，那便能最好地表達我的意思。中央監察委員，應當在自己主席團領導下，有系統地來考察政治局底一切文件。同時他們應當正確分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來個別審查我們各機關的文案手續，從最小的局部的機關起，直至高級的國家機關止。末了，他們的工作範圍內，還要包括研究理論，即研究組織他們所要致力的這一工作的理論，並且還要由老同志或由勞動組織高級研究院教授來領導他們作實踐學習。

可是我想，他們決不能祇限於這類學院式的工作。除了此項工作之外，他們還要準備自己去做另一種工作，這種工作，我可以不

客氣地稱之爲——雖不是捉拿拐騙，但總之是與此相這類似的事，並要想出特別巧妙辦法來掩護自己的偵察襲擊等行動。

在西歐國家機關中，這樣的提議會引起空前的忿懣與激怒心情等等，但我相信，我們還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以致能於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國新經濟政策還未能如此受人尊敬，以致人們當想到我們這裏必須捉拿人的時候，竟會見怪起來。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成立得不久，各種陳腐廢物還堆積得如此之多，當一想到可以利用某種巧計，利用有時追尋深源及蜿蜒曲折的偵察辦法去實行搜掘時，求必有誰會見怪起來，假如有人見怪，那便可以相信到，我們對這樣的人定會捧腹大笑的。

我相信，我們新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一定會拋棄這種壞的品質，這種品質，法國人叫它是 pruderie，我們稱之爲可笑的裝模作樣或可笑的自尊自傲，這種品質會完全助長我國蘇維埃機關或黨機關內的官僚份子。附帶說說，我們這裏，不僅在蘇維埃機關內，而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份子。

我在上面寫過，我們應當學習，應當到高級勞動組織研究院去學習等等，這絕對不是說，我所瞭解的『學習』是指什麼學校式的學習，或者僅限於學校式的學習。我相信，每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不會懷疑到，我在這裏所說的『學習』，內中也包含有某種半玩笑式的作法，某種巧計，某種花樣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知道，在西歐官氣十足莊嚴堂皇的國家裏，這種意見會引起真正的大驚小怪，決沒有一個正派的官吏甚至會同意把這意見提出來討論。可是我相信，我們還沒十足地官僚化，在我們這裏，要是討論這種意見，祇會引起歡悅而已。

究其實，又爲什麼不能把快意的東西和有益的東西結合起來呢？又爲什麼不利用某種玩笑式的與半玩笑式的作法來揭露那般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的等等東西呢？

我以為，如果我們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把這些理由都拿來考察一下，那會是獲益不少的，並且我們中央監察委員會或它那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方面的同事所藉以獲得最光榮勝利的奇案紀事中，在那些是正式莊重的教科書上不常寫出的地方，又將添上我們將來的『工農檢查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所作的不少的功績。

* * *

怎樣可以把黨的機關與蘇維埃機關結合起來呢？這裏不會有什麼決不容許的事情麼？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以我在上面暗示過的這些人的名義，我說，我們這裏，不僅是蘇維埃機關內，並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份子，這也就是指這些人說的。

其實，如果是爲了工作的需要，爲什麼不能把這兩種機關結合起來呢？大家未必不知道例如外交人民委員部自開始時起就已實行這類結合，並收到非常大的益處嗎？難道在政治局內沒有用黨的觀點常常來討論許多大大小小關於我們方面回答外國列強『進程』的『進程』問題，以預防它們的（要說得客氣一點就是）奸謀詭計麼？難道蘇維埃機關與黨的機關這種靈敏的結合，不是我國政策中非常力量底泉源麼？我以為在我們對外政策上所已證實和鞏固了的東西，在這方面已成了慣例而不致引起任何懷疑的東西，對於我們一切國家機關至少也同樣合宜（我想，還更合宜得多）。而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也就是爲我們一切國家機關而設的，它的活動應毫無例外地涉及一切國家機關，地方的，中央的，商務的，純粹官廳的，學術的，檔庫的，戲院的等等，——總之，各機關一無例外。

爲什麼對於這樣規模宏大、此外還需要有非常靈敏的活動形式的機關，——爲什麼對於它，就不容許黨的監察機關和蘇維埃的監察機關有一種特殊式的合併呢？

我並不認爲在這方面會有任何妨害。而且我想，這樣的合併是使工作順利進行的唯一保證。我以為關於這點的一切懷疑都是從我們國家機關內沾滿塵垢的份子方面發生出來的，對於這種懷疑祇能置之一笑。

* * *

還有另一種懷疑：把學習活動與職務活動結合起來是否適宜呢？我覺得不但適宜，而且應當這樣。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西歐的國家機構雖然取完全革命的態度，可是居然已中了這般國家機構的遺毒，沾染了它許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成見，而局部地便是我國那些親愛的官僚們故意把這種毒物來傳染我們，故意投機，以為在這類成見的渾水內，他們往往撈得到魚；並且他們在這渾水內撈得這麼厲害，致使我們人中間，祇有盲人才看不見如此廣泛的撈魚勾當。

我們在所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一切關係方面，真是『非常』革命了。但在尊敬上司，遵守辦事形式和禮節方面，我們的『革命性』往往由最腐敗的守舊積習所代替。在社會生活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最有趣的現象：一面是最偉大的向前躍進，但要實行極微小的變革時却胆怯得要命。

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最勇敢的前進步驟，是在於早已構成爲理論範圍的這一方面，是在於主要由理論、甚至幾乎完全由理論開發出的這一方面。俄國人因厭煩那種可惡的官僚生活，而在家裏構思非常勇敢的理論系統，所以這些非常勇敢的理論系統，在我們這裏就常常帶着非常的片面性。在我們這裏，一般思想系統中理論上的勇氣和對於某種最小的辦公手續改革上所表示的異常膽怯心理，這兩者共居在一塊。具有爲任何他國所未有的勇敢精神，開創出最偉大的帶全世界意義的土地革命，但同時對於某種極不重要的辦公

手續的改正，則缺少勇氣；或者缺少勇氣，或者缺少耐性來把在一般問題上已收到『燦爛』效果的一般原理運用到這種改革上來。

因此，我們現時在實際生活中，既包含有萬分勇敢的驚人特徵，同時又有害怕最微小變革的怯懦心理。

我想，在任何一個真正大革命中，情形也祇能是這樣，因為真正的大革命都是從舊東西，從整理舊東西的意向與力求新東西的極抽象意志這兩者間的矛盾中產生出來的，這種新東西應當新到這種程度，要使其中連一點舊東西都不能存在。

這種革命愈急進，則許多這樣的矛盾存在的時間，就會愈延長。

* * *

現在我們實際生活底一般特徵如下：我們已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工業，我們曾力求澈底摧毀中世紀式的制度，摧毀地主土地佔有制，並在這個基地上培植了小農和最小農，這些農民因為信仰無產階級的革命工作成績而跟隨着無產階級前進。然而我們要靠這種信仰心來支持到各較發達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日，那是不容易的，因為小農和最小農，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下，按着經濟底必然性，還處在勞動生產率極低的水準上。加之國際環境也曾使現時俄國後退，使我國國民勞動生產率，一般地整個地比戰前低得多。西歐資本主義列強，一部份是有意地，一部份是自發地，曾竭力使我們後退，利用俄國內戰中的各種因素來儘量破壞我國。正是這樣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看來當然就有很大的好處。這些列強大概這樣推論，而從它們的觀點出發也祇能這樣推斷說：若是我們推翻不了俄國的革命制度，那我們至少也要使它難於發展到社會主義。結果，它們的任務祇一半得到解決。它們並沒有推翻我國革命所創立的新制度，可是它們也未曾使這新制度立刻就能這樣大步前進，去證實社會主義者預言底正確，去使社會主義者能夠極迅速地發展生產力，發展足

以形成爲社會主義的一切資源，昭然若揭地向一切人和每個人證明社會主義蘊蓄有莫大的力量，證明人類現在已轉進到了一個新的，具有非常光明前途的發展階段。

現在國際關係的體系已成爲這樣，即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歐有些國家，而且是些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處於一種便利地位，能夠利用這一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關重要，但終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而造成某種『社會和平』局面的讓步。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等等，正因爲受到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已最終循着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軌道行進了。在它們那裏已開始醞釀着一般歐洲式的事變。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楚：這些國家已被捲入到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中去了。

因此，我們面前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處在我國這種小農和最小農生產情況以及我國這種經濟被破壞情況之下，我們是否可以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呢？但這些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種發展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我國說來，應規定出怎樣的策略呢？策略顯然是如此：我們應當極端慎重來保持我國的工人政權，來把我國小農和最小農維繫在這工人政權威信和領導之下。在我們方面有這樣的長處，就是全世界現時正進到一定會產生全世界社會主義革

命的運動中。但我們方面也有這樣的短處，就是帝國主義者已經得以將全世界分裂為兩個營壘，並且因為德國這個真正先進、文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時已極難振作起來，使這種分裂更加複雜化了。所謂西歐的一切資本主義列強都在啄食它，不使它抬起頭來。而另一方面，整個東方若干萬萬被剝削得幾乎過着非人生活的勞動人民，已被陷入到這樣的境地，就是他們所有的體力與物力都決不能去與西歐任何一個要小得多的國家底體力、物力和武力作任何比擬。

我們是否能避免將來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呢？我們是否能希望西方強霸帝國主義國家和東方強霸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將給我們以第二次的遷延，如它們第一次所給過的那樣呢？那時西歐反革命派曾出兵幫助俄國的反革命勢力，但因為西方與東方反革命營壘中的矛盾，因為東方剝削者與西方剝削者營壘中的矛盾，因為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矛盾，遂使這次進犯遭受了失敗。

我覺得，對上面的問題應當這樣來回答：問題底解決要依極多的情況為轉移，鬥爭底結局，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祇有根據地球上人口底絕大多數終究是由資本主義本身在教育 and 訓練他們去作鬥爭的這一事實，才可以預先見到。

鬥爭底結局，歸根到底是取決於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種情形。正是這世界人口底大多數，最近幾年來也非常迅速地捲入謀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關於世界鬥爭問題底最終解決，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了保證的。

可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這種必然性。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我們俄國共產黨，我們俄國蘇維埃政權，為要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來撲滅我們起見所應當採取的策略。為要保證

我們能夠生存到在反革命帝國主義的西方與革命民族主義的東方之間，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與東方式的雖則落後但是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之間發生下一次武裝衝突的時候，——那麼這大多數就必須趕快發展文明。我國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雖然我們有了達到這點的政治前提。我們應當抱定這樣的策略，或者爲自救起見，我們必須採取如下的政策。

我們所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遺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國家機關盡量節省。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中所有的一切浪費現象的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

這不會是農民的狹隘眼界麼？

決不是的。我們只要能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就能在我們國家裏用極嚴格節省的辦法把任何一點貯蓄都保存起來，藉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加緊開採泥炭，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建築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用個比喻來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由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由倚靠於破產農民國家的種種節省辦法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努力尋求，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去，跨到巨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去。

我便是這樣把我們的工作、政策、策略、戰略等底總計劃與改組後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底諸任務聯繫起來。我們之所以應當對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特別關心，特別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別之高，使它的領導人能與中央委員會有同等權利等等等等，其理由就在這裏。

這種理由也就是說，祇有儘量清洗我們的國家機關，充分裁減其中一切非絕對必需的人事，祇有經過這種辦法，我們才定能支持下去。並且我們還不是支持在小農國家底水準上，不是支持在這種普遍狹隘性底水準上，而是定能支持在不斷向前發展，邁進到巨大機器工業的水準上。

我對於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所理想的崇高任務，就是如此。我替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計劃到把最有威信的黨的上層人員與『普通的』人民委員部合併起來的目的，就是如此。

尼、列寧 一九二三年 三月二日。

一九二三年三月四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四十九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四〇六至四一八頁。

簡 要 註 釋

¹ 紐委，即紐織委員會，是孟什維克底領導中心。——（見正文第一八頁）。

² 統一報是由普列漢諾夫主編，於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該報採取極端沙文主義的立場，進行反布爾什維克的瘋狂鼓動，堅決主張與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底政黨，即立憲民主黨聯合。——（見正文第二〇頁）。

³ 俄國意志報是由大銀行出資舉辦的資產階級報紙，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出版於彼得格拉。——（見正文第二一頁）。

⁴ 布朗基主義者是法國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底信徒。馬列主義底創始人認為布朗基是個傑出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底黨護者，但同時批評了他的宗派主義和陰謀活動手段。列寧曾寫道：『布朗基主義是一種否認階級鬥爭的理論。布朗基主義妄想不用無產階級鬥爭手段，而用極少數智識份子的陰謀手段來使人類擺脫殘酷奴隸制度』。——（見正文第二五頁）。

⁵ 『血腥的』尼古拉，即羅曼諾夫、尼古拉第二（一八六八——一九一八）綽號，他是被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最後一個俄皇。——（見正文第二七頁）。

⁶ 『絞手』斯托雷平，即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曾任俄國內務總長和內閣總理。他的名字是與經歷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最殘暴政治反動時期，即斯諾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相聯繫的。他這『絞手』綽號，是因為他對工農橫施殘暴屠殺而獲得的。——（見正文第二七頁）。

⁷ 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資產階級主要政黨，即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立憲民主黨在虛偽民主主義掩蓋之下，自名為『人民自由』黨，力求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他們極力想在立憲君主制形式下保存沙皇制度。爾後，立憲民主黨變成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該黨黨人曾組織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陰謀和暴動。——（見正文第二七頁）。

⁸ 克倫斯基是社會革命黨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總長，爾後任內閣總理，該政府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見正文第二八頁）。

⁹ 在克雷洛夫著的有名寓言貓與廚子故事中，敘述貓兒吃雞肉，廚子叨叨不休地訓誡貓兒行爲不規，而貓却一面聽，一面大啖其肉。——（見正文第三三頁）。

¹⁰ 路易勃朗主義是來源於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一八一——一八八二）的理論。列寧認爲路易勃朗主義乃是離開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對資產階級實行妥協政策，用小資產者的空想和軟弱願望來代替與階級敵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見正文第三六頁）。

¹¹ 馬尼洛夫精神，因戈里里所著死人口一書中的地主馬尼洛夫得名，以泰然自若，富於甜蜜情感，癡心妄想爲特色。——（見正文第四三頁）。

¹²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境內齊美爾瓦爾得村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上，列寧成立了左派集團，即所謂「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在這左派中間，祇有俄國布爾什維克採取了唯一正確的，澈底反對戰爭的立場。——（見正文第四五頁）。

¹³ 昆塔爾宣言是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昆塔爾城召集的國際主義者第二次國際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宣言。——（見正文第四九頁）。

¹⁴ 是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爲繼續帝國主義戰爭所發行的「自由公債」而言。——（見正文第五二頁）。

¹⁵ 本決議案是按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所作報告通過的。——（見正文第六〇頁）。

¹⁶ 略霍夫係沙俄軍隊上校，他曾統率俄軍，鎮壓了一九〇八年波斯民族革命運動。——（見正文第六九頁）。

¹⁷ 是指發護照給麥克唐納到斯托哥爾摩去參加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一事而言。——（見正文第七一頁）。

¹⁸ 卡芬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是法國將軍，陸軍總長，一八四八年六月用殘暴手段鎮壓了巴黎工人的起義。——（見正文第七八頁）。

¹⁹ 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刊，其組織者和領導人是列寧和斯大林。該報在俄國工人運動史上起了巨大作用，是布爾什維克黨在鞏固自己的組織和爭取羣衆影響方面的雄強武器。一九一二年創刊的真理報，——斯大林同志寫道，——『奠定了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主義勝利底始基』。真理報曾屢遭沙皇政府封閉，但在先進工人積極支援下，又繼續用各種新名義出版。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專制制度之後，真理報成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機關報。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期間，該報因受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締而輸入秘密狀態後，不得不幾次改變名稱繼續刊行。迨至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起，又用原先的名義出版。一九一八年三月移到莫斯科刊行。從此時起，真理報就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機關報名義出版了。——（見正文第七九頁）。

²⁰ 這是指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月間科爾尼洛夫將軍掀起的反革命暴動而言，其目的是要撲滅革命，推翻蘇維埃，成立武人專政政府。由於布爾什維克黨積極領導武裝回擊反革命勢力之結果，科爾尼洛夫暴動遂被消滅下去了。——（見正文第九六頁）。

²¹ 這是一九一七年九月間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召集的所謂全俄民主會議而言。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各工會黨、各蘇維埃、各職工會、工商業界及其他組織底代表。會議上推舉出了所謂預備國會，即共和國臨時委員會。召集這次民主會議乃是想把國家由蘇維埃革命道路轉到資產階級憲制道路，即阻止革命發展而沒有成功的一種嘗試。——（見正文第一〇〇頁）。

²² 啓特、啓對奇輩是工商業界富豪之綽號，這人原是俄國戲劇家奧斯特羅夫斯基所著滑稽劇雙端遺囑中的典型富商。——（見正文第一〇〇頁）。

²³ 『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煤區礦物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

『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一二八頁）。

²⁴ 彼得格勒的亞歷山大戲院是民主會議開會的地方。彼得巴洛堡在冬宮對面，是沙皇時代禁錮革命家的地方。——（見正文第一四二頁）。

²⁵ 野蠻師是由高加索山民部隊所編成，科爾尼洛夫（參看註²⁰）曾企圖利用這師人去進攻革命的彼得格勒。——（見正文第一四二頁）。

²⁸ 卡列金叛亂，是一九一七年末和一九一八年初俄國哥薩克上層份子在卡列金將軍領導下掀起的反革命暴動。——（見正文第一四九頁）。

²⁷ 工人之路報是真理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公曆十六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藉以出版的名稱。——（見正文第一五八頁）。

²⁸ 這是指陸軍總長維爾合夫斯其因聲言俄國軍隊再不能繼續戰爭遂被臨時政府撤職一事而言。——（見正文第一六〇頁）。

²⁹ 費邊派是英國資產階級知識集團於一八八四年成立的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費邊社」社員。該社得名於古羅馬統帥費（「緩進家」），他素以緩進待機，迴避決戰聞名。費邊派誘導無產階級脫離階級鬥爭，鼓吹用微小改良辦法，妄圖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見正文第一六二頁）。

³⁰ 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係英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見正文第一六八頁）。

³¹ 米海次夫斯其（一八四二——一九〇四）是俄國社會政治運動中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民粹派思想家，即所謂「社會學主觀方法」底代表人物。——（見正文第一六八頁）。

³² 哥達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一七八頁）。

³³ 這是列寧增補在俄文第二版上的。——（見正文第一八八頁）。

³⁴ 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二一八頁）。

³⁵ 反社會黨人法令，又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是一八七八年在德國施行的。這個法令禁止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組織，取締了工人羣衆團體，封閉了工人刊物，沒收了各種社會主義刊物，所有社會民主黨人都遭到壓制。該法令在廣大工人運動的反抗下，於一八九〇年被廢除了。——（見正文第二二〇頁）。

³⁶ 這是指普魯士當權派「自上」用武力把分裂的德意志各邦統一為一個國家而言。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結果，成立了北德意志聯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便成立了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帝國。——（見正文第二二二頁）。

³⁷ 這是指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間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言。代表大會原已在布魯塞爾開幕，但因警察追究不得不遷往倫敦。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代表大會，在這裏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代表大會上所展開的黨內兩派（列寧領導的革命派和馬爾托夫領導的機會主義派）之間的鬥爭，使黨分裂成了兩個集團：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意思就是多數派和少數派，因為在投票選舉黨中央機關時，列寧底擁護者獲得了多數，而他的敵人獲得了少數。——（見正文第二三一頁）。

³⁸ 是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干、巴蘭諾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而言。——（見正文第二四二頁）。

³⁹ 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一個典型高利貸者。——（見正文第二四四頁）。

⁴⁰ 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小說教會學生而言，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氣。——（見正文第二四五頁）。

⁴¹ 考茨基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並經通過的決議案，容許（雖然帶有附帶條件）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二五四頁）。

⁴² 憲章運動是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在英國發生的，「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列寧，見本卷第五七〇頁）。這次運動因英國工人向國會所呈遞的內中載有政治要求的請願書（即憲章）而得名。——（見正文第二七四頁）。

⁴³ 是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由君主派普里什克維奇所組織的反革命陰謀而言。——（見正文第二九〇頁）。

⁴⁴ 烏克蘭拉達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各黨派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基也輔成立的議會。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該拉達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支援頓河流域的卡列金及其他白黨將軍，走上了公開反蘇維埃政權的道路。一九一八年四月德國佔領軍廢除了拉達，而代之以斯科羅帕茨基底督統署。——（見正文第二九七頁。）

⁴⁵ 拜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係革命民主主義者，俄國典型哲學創始人之一，卓越的批評家和政論家。他在俄國革命社會思想發展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見正文第三〇七頁）。

⁴⁶ 見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馬克思致布拉克的信。——（見正文第三一一頁）。

⁴⁷ 這是哥德著的浮士德（第一幕）中米費斯托法爾所說的話。——（見正文第三一一頁）。

⁴⁸ 本宣言草案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初寫的。斯大林得到列寧底同意，在這個草案中加上了幾點修正。草案就以這樣的形式成為全俄中央執委會宣言底基礎，宣言於一月五日在立憲會議上宣讀過。立憲會議中佔多數的反革命派竟拒絕加以討論。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舉行的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將這宣言批准了，後來包括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舉行的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之蘇俄憲法中，成為其組成部份。——（見正文第三一四頁）。

⁴⁹ 本草案寫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有斯大林同志參加起草。全俄中央執委會當天就通過了這個法令。——（見正文第三一七頁）。

⁵⁰ 甘尼巴爾（紀元前約二四七——一八三）是喀他基那的統帥。「甘尼巴爾已闖到門口了」一語是國難當頭的意思。——（見正文第三三七頁）。

⁵¹ 共產主義者報是「左派共產黨人」底派別機關報，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見正文第三三九頁）。

⁵² 拉斯普庭是尼古拉第二朝廷中影響極大的一個惡棍。——（見正文第三五六頁）。

⁵³ 這是指國家杜馬代表被迫簽署書面誓詞一事而言。——（見正文第三五七頁）。

⁵⁴ 郭福曼是德國將軍，一九一八年在布列斯特進行和平談判時，充當德國代表團底首席代表。——（見正文第三五九頁）。

⁵⁵ 這是指列寧所起草，而在第四次全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於批准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案。在該決議案第四段上說：「代表大會向全體工人，兵士，農民，向全體勞動者和被壓迫羣衆，極堅決地提出目前最主要、迫切和必需的

任務：要提高勞動羣衆積極性和自我紀律，到處建立起強固而嚴整的組織，使其儘可能包括一切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事宜；要與各種混亂現象，搗亂組織現象和經濟破壞現象作無情的鬥爭，這些現象乃是痛苦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必然產物，同時也是妨礙社會主義獲得最終勝利並鞏固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最大障礙」。這個決議案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的真理報上。——（見正文第三七二頁）。

⁶⁶ 博加也夫斯基是頓河流域哥薩克反革命勢力的領導人之一。——（見正文第三七四頁）。

⁶⁷ 新生活報和前進報是孟什維克黨報紙，人民事業報是社會革命黨黨報紙，我們時代報是立憲民主黨黨報紙。——（見正文第三九九頁）。

⁶⁸ 這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俄國由俘虜編成的捷克斯拉伐克軍團而言。一九一八年五月間，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得到蘇維埃政府許可取道西伯利亞和遠東開回歐洲去時，在窩爾加河中部區域和西伯利亞掀起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這次叛亂係英法帝國主義者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積極援助下所策動起來的。——（見正文第四一九頁）。

⁶⁹ 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起源一書。——（見正文第四三九頁）。

⁶⁰ 彼特魯什卡是戈里里所著小說死人口中的一個奴僕，其特色是讀書時只圖涉覽，不求解意。——（見正文第四六八頁）。

⁶¹ 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是薩爾退可夫、謝德林所著小說果洛孚略夫家中的一個農奴地主形象，以喪盡天良，貪吝鄙陋為特色。——（見正文第四七一頁）。

⁶² 沙溫可夫是社會革命黨人。曾執行外國間諜機關的命令組織過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和陰謀活動。

李伯爾蕭恩是譏諷兩個孟什維克領袖李伯爾與蕭恩的綽號。

波特列索夫是孟什維克領袖之一。

「積極份子」是孟什維克黨內的極右派，產生於一九一七年末。他們公開號召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並直接參加了這種鬥爭。——（見正文第四七一頁）。

⁶³ 見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見正文第四七九頁）。

⁶⁴ 普、馬斯洛夫係孟什維克，俄國土地問題一書底作者。——（見正文第四九〇頁）。

⁶⁵ 斯、馬斯洛夫是社會革命黨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農業總長。——（見正文第四九六頁）。

⁶⁶ 這是指給各地土地委員會的農民委託書而言，該委託書包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舉行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之「土地法令」中，成爲其組成部份。委託書原文見本卷第二八一至二八三頁。——（見正文第五〇一頁）。

⁶⁷ 『囊中人』係柴霍夫所著同名小說裏的典型庸人，其特色是固步自封，害怕任何新事物、主動性和冒險行爲，絕不願及周圍的實際生活和情況。——（見正文第五一一頁）。

⁶⁸ 這是指第二國際而言，第二國際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起，就分裂爲各單獨的社會沙文主義政黨，而不復是國際組織了。大戰後，正式恢復第二國際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在伯恩城舉行的，因有此名。——（見正文第五九一頁）。

⁶⁹ 薩多瓦在捷克境內，會戰發生於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這次會戰決定了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勝利的結局。——（見正文第五九四頁）。

⁷⁰ 一九一九年六月由英國間諜機關所組織的紅丘砲台上的叛變以及同時的大規模反革命陰謀，都在斯大林同志親身領導之下被發覺和及時被消滅了，當時斯大林是受黨中央委託來到彼得格拉組織該城防衛的。——（見正文第六一五頁）。

⁷¹ 斯維爾德洛夫（一八八五——一九一九）是布爾什維克黨底卓越活動家，蘇維埃政權最初組織者之一，是列寧和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他當選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見正文第六六八頁）。

⁷² 斯莫爾雷，即彼得格拉前斯莫爾雷女子大學的校舍。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遷都到莫斯科以前，這裏是蘇維埃政府最初的所在地。——（見正文第六八二頁）。

⁷³ 該小冊子底作者爲鮑威爾。——（見正文第六九〇頁）。

⁷⁴ 連拿慘案是指一九一二年四月沙皇軍隊槍殺連拿金礦（西伯利亞）中舉行罷工反對資方殘酷剝削的工人一事而言。俄國各地工人用羣衆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

回答了這次慘案。這些罷工和示威奠下了國內工人革命運動強大高漲的始基。——（見正文第六九六頁）。

⁷⁵ 第四次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因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以「叛國」罪名，於一九一五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見正文第六九六頁）。

⁷⁶ 這是指列寧所領導作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主腦的中央團體而言。本「鬥爭協會」係列寧於一八九五年秋創立的，它把彼得堡的一切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都聯合了起來。它是倚據於工人運動的俄國革命政黨最初真正的萌芽。——（見正文第七一一頁）。

⁷⁷ 俄國共產黨（布） 土拉省委主席圖幾個委員在致列寧的信中，請示「在蘇俄現今局勢下，是把和平建設提到第一位的立場正確呢，還是把緊張一切力量來解決我國軍事任務提到第一位的立場正確呢」。該信作者們害怕土拉省委個別委員要把經濟和教育任務放在第一位的這種提法，結果會減弱土拉軍事工廠中的緊張工作和紀律。——（見正文第八一七頁）。

⁷⁸ 本草案是列寧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四至十五日擬定的；三月十六日當列寧報告了論黨底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之後，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了列寧所提出的這個決議案。——（見正文第八二一頁）。

⁷⁹ 列寧提出的本草案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為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所通過。——（見正文第八二五頁）。

⁸⁰ 這是列寧致奧爾忠尼啓則同志的信。——（見正文第八四二頁）。

⁸¹ 奧布洛莫夫精神是以俄國作家甘察洛夫所著長篇小說奧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得名，以因循守舊，迂滯頑固為特色。——（見正文第八六五頁）。

⁸² 「第二半」國際，即「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大會上成立的，大會參加者是那些因受工人羣衆革命情緒所壓迫而一時退出第二國際的中高黨派。「第二半」國際領袖們（如亞德列爾、鮑威爾、馬爾托夫等等）口頭上批評第二國際，其實在無產階級運動底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實行機會主義政策，並極力設法利用這一聯合來對抗共產黨人在工人羣衆中日益增大的影響。一九二三年間，「第二半」國際又與第二國際合併了。——（見正文第八七一頁）。

⁸³ 是指一九〇五年孟什維克領袖阿克雪里羅得所提出，而為列寧及時揭穿了
的召集所謂「工人代表大會」這一機會主義思想而言。據阿克雪里羅得底意見，
召集這代表大會就是要建立有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參加的
「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工人政黨」。——（見正文第九〇〇頁）。

⁸⁴ 這是指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熱納亞舉行的國際經濟代表會
議而言。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確立資本主義世界與蘇俄間的關係。其中一方
面有英法意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參加，另一方面有蘇俄參加。各資本主義國家代
表向蘇俄代表團提出一些無異於是把蘇維埃國家變成西歐資本之殖民地的要求
（如索還戰前與戰時的債款，把已收歸國有的外國資本家財產仍發還給原主及其
其他等），蘇俄代表團堅決拒絕了外國資本家們底一切無理苛求。——（見正文第九
三一頁）。

⁸⁵ 這裏列寧是指他在全俄五金工人第五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上所
作「論蘇維埃共和國國際和國內狀況」的報告而言。——（見正文第九三一頁）。

⁸⁶ 改換路標雜誌，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俄國僑民集團在巴黎出版的雜
誌。——（見正文第九五三頁）。

⁸⁷ 這裏列寧是指糧食人民委員部而言。——（見正文第九七二頁）。

⁸⁸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因遠東共和國軍隊乘勝進攻的結果，海參崴的
白匪和日本武裝干涉者全被肅清了。——（見正文第九八六頁）。

⁸⁹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五日}舉行的海牙國際和平會議，是阿姆斯特丹
職工國際為了討論日益臨近的戰爭危險問題而召集的。——（見正文第九九五頁）。

⁹⁰ 列寧底提案成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
檢查院決議的基礎。——（見正文第一〇一五頁）。

⁹¹ 本文是列寧所寫的最後一篇論文。——（見正文第一〇二〇頁）。